

沈迪成 主编
SHENDIANCHENG
ZHUBIAN

百年史

1896—1996

上册

中国人留学日本

辽宁教育出版社
LIAONING JIAOYU CHUBANSHE

沈殿成主编
SHENDIANCHENG
ZHUBIAN

百年史

1896—1996

下
册

中国人留学日本

辽宁教育出版社
LIAONING JIAOYU CHUBANSHE

G649.29
S380
=1

百年史

1896 - 1996

上册

中国人留学日本



087924

G649.29
S380
=2

百年史
1896 - 1996
下册

中国人留学日本



037925

主 编 沈殿成
副主编 沈殿忠 庞玉珍 李维国
邓玉萍 王连捷 徐凤舞
赵 朔 赵 玲 赵 喆
张 莉 金文学 马 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上下册/沈殿成主编.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9

ISBN 7-5382-4864-1

I. 中… II. 沈… III. 留学生教育-教育史-中国-1896~1996 N. G649.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7854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760 千字 印张: 35.75 插页: 8

印数: 1—1,000 册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赵中男 王丽君 责任校对: 刘 粟

封面设计: 冯少玲

定价: 56.00 元

目 录

导 论 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 100 年的评估	1
一、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的缘起	3
二、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的“纵向”线索	6
三、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的“横向”结构	11
第一篇 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的兴起和高潮	
(1896—1911)	17
第一章 揭开近代留学日本运动的序幕	
(1896—1900)	18
第一节 赴日本留学前的中国学生	18
1. 近代中国涌起“西学东渐”潮流	18
2. 留学欧美使中国人大开眼界	21
3. 张之洞极力主张中国人留学日本	30
4. 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成为清政府的国策	35
第二节 赴日本留学期间的中国学生	42
1. 十三人成了第一批留日生	42

2. 留学费用及入学过程	45
3. 一所中国人办的学校	55
4. 中国留学生与戊戌流亡者	60
第三节 离开日本后的中国留学生	65
1. 首批留日学生的不同归宿	65
2. 自立军起义中的留日学生	73
3. 留学生结业后的不同流向	79
4. 留日运动的中断和延续	84
第二章 近代留学日本运动的第一个高潮 (1901—1906)	92
第一节 留学生纷纷东赴日本	92
1. 清政府进一步鼓励留学	92
2. 多种多样的派遣渠道	97
3. 自费生人数急剧增加	105
4. 留日人数达到第一次高潮	110
第二节 生机勃勃的留学岁月	115
1. 为中国留学生创办的学校	115
2. 成城学校的入学事件	121
3. 反对《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的运动	131
4. 出现在东京的女子留学生	144
第三节 蓬勃发展的留学生团体	154
1. 留学生团体纷纷成立	154
2. 留学生团体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156
3. 留学生团体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162
4. 拒俄运动与拒俄义勇队	171
第三章 近代留学日本运动的持续发展 (1907—1911)	179

第一节 清末留日运动的回落	179
1. 清政府严定留日生选派条件	179
2. 从 6797 人到 3328 人	196
3. 留学生地区来源的重大差异	213
4. 清政府对留日学生的管理	219
第二节 丰富多彩的留学生活	226
1. 留日学生的衣食住行	226
2. 清国留学生会馆与留学生自治	233
3. 陆军士官学校里的中国学生	241
4. 为反清革命而奔走	248
第三节 蜂拥问世的留学生杂志	262
1. 同盟会成立前后的留学生杂志	262
2. 丰富多彩的期刊内容	269
3. 刊行期数少, 发行范围广	274
4. 留学生文化活动的两种作用	280
第二篇 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的发展和风潮	
(1912—1930)	284
第一章 辛亥革命后留学日本运动出现第二个高潮	
(1912—1914)	285
第一节 重新走向高潮的留日运动	285
1. 辛亥革命期间留日学生骤减	285
2. 黄兴等革命党人支持留日运动	289
3. 留日运动出现第二次高潮	293
4. 教育部相继公布学生留日规则	300
第二节 创办的新校与恢复的旧校	306
1. 招收中国学生的学校再度创立	306
2. 中国留学生向往的一所学校	310

3. 主要招收革命人士的两所学校	313
4. 几次变更的留日官费规定	317
第三节 留日学生在日本的爱情与婚姻	321
1. 夫妻携手日本行	321
2. 禁止通婚难奏效	327
3. 回国厮守到终老	331
4. 半路分离情犹在	336
第二章 民国前期留学日本运动风波迭起 (1915—1919)	340
第一节 赴日留学道路上的风风雨雨	340
1. 反对“二十一条”的英勇斗争	340
2. 为护国战争做出重要贡献	345
3. 留学生的进步团体与学习政治	351
4. “大江歌罢掉头东”	355
第二节 留日学生生活的足迹	362
1. 教育部公布《选派留学外国学生规程》	362
2. 《留日官自费生奖励章程》公布而未实施	368
3. 留日学生打工的经历	371
4. 日本人对中国学生的戒备与歧视	375
第三节 五四爱国运动中的留日学生	379
1. 留日归来的新文化运动主将	379
2. 留日学生为五四运动做了重要准备	387
3. 留日学生在国内参加五四运动	396
4. 留日学生在日本声援五四运动	401
第三章 现代留学日本运动的新阶段 (1920—1930)	406
第一节 留日运动迈出重要的一步	406

1. 日本各界反省接收留学生政策	406
2. 日本政府对华留学生实施经济援助	411
3. 留学生帮助华工成立共济会	414
4. 以留学生身份从事革命活动	421
第二节 关东大地震前后的留日运动	426
1. 留学生中政派林立	426
2. 大地震后留学生的灾难	436
3. 王希天被杀的冤案	441
4. 留学生的大学生活及学位	447
第三节 终生从事中国留学生教育的松本龟次郎先生	451
1. 走上教育中国留学生之路	451
2. 参加救援中国留学生的活动	455
3.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与日华学会合并	460
4. 为中国留学生撰写日语著作	465
第三篇 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的曲折和回潮 (1931—1945)	470
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后留学日本运动的反复 (1931—1934)	471
第一节 为了救亡图存而出国留学	471
1. “九一八”后留日学生的“归国潮”	471
2. “一·二八”后留日学生的“返日潮”	475
3. 来自东北的留学生	480
4. 持续上升的留学人数	486
第二节 留学中的斗争与斗争中的留学	488
1. 补习日语与讲授汉语	488
2. 学习文化与学习政治	490

3. 向日本介绍中国与向中国介绍日本	494
4. 组织联谊与联谊组织	497
第三节 反战运动中的中国留学生	501
1. 日本反战同盟中的中国留学生	501
2. 强烈声讨殖民侵略的诗篇	505
3. 筹备“远东泛太平洋反战大会”	508
4. 被迫退学，驱逐出境	512
第二章 留学日本运动出现第三个高潮 (1935—1937)	515
第一节 1935年成了留学日本的“高峰年”	515
1. 留日学生突见增加	515
2. 大批青年东渡日本的缘由	517
3. 中华民国留学生	521
4. 伪满洲国留学生	523
第二节 留日学生转向更高级课程的学习	546
1. 留日学生大部分进入专科以上学校	546
2. 重文轻理现象有所改观	553
3. 遍布 59 所学校的女子留日学生	556
4. 钻研学问，争取地位	558
第三节 “七七”事变前后留日运动的起伏	560
1. 精心策划绿川英子访华	560
2. 抗日救亡，再掀“归国潮”	563
3. 抗日战场上的留日学生	565
4. 留日学生训练班	570
第三章 留学日本运动进入萧条期 (1938—1945)	575
第一节 萧条时期的伪满洲国留日生	575

1. 伪满洲国留日学生增多	575
2. 伪满洲国留日学生会	581
3. 伪满洲国留日学生的特点	585
4. 日本士官学校的留学生	588
第二节 萧条时期赴日留学的不同道路	591
1. 来自伪内蒙古自治政府的留日生	591
2. 来自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留日生	596
3. 来自山西沦陷区的留日生	603
4. 来自汪伪统治区的留日生	608
第三节 萧条时期赴日留学的不同归宿	611
1. 追求崇高的革命家、外交家	611
2. 学而有成的导师、学者	614
3. 异彩纷呈的留日学生作家群	617
4. 留日学生的左翼文化运动	619
第四篇 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的持续和低潮	
(1946—1976)	628
第一章 “战后”留学日本运动的波动	
(1946—1969)	629
第一节 没有完全中断的赴日留学运动	629
1. “战后”仍在日本求学的中国留学生	629
2. “战后”国民党政府对留日学生甄审与召回	632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召唤留学生回归祖国	638
4. 日蒋条约为台湾留日活动奠定基础	641
第二节 台湾地区重建中国人留日运动新格局	643
1. 台湾当局第一次修订留学规程	643
2. 公费自费留学考试接连举行	646
3. 各种奖学金生纷沓留学日本	651

4. 留日学生的人数、学科及其管理	654
第三节 台湾地区留日活动的拓展与延伸	660
1. 留学规程几次修订改变	660
2. 一部分人得以免试出国留学	663
3. 特殊人才进修得到优先照顾	665
4. 公布教员及科技人员进修办法	667
第二章 留日学生与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的发展	671
第一节 留日学生与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政治发展	671
1. 留日学生与中国国民党	671
2. 留日学生与中国共产党	678
3. 留日学生与中国的民主党派	686
4. 留日学生与中国的汉奸集团	697
第二节 留日学生与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的社会发展	701
1. 留日学生回国从事金融商业活动	701
2. 留日学生归国参加实业建设活动	704
3. 留日学生学成归国致力技术活动	710
4. 留日学生播布不同倾向社会思潮	718
第三节 留日学生与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文化发展	724
1. 留日学生与中国文化社团的发展	724
2. 留日学生与中国文化事业的建设	731
3. 留日学生与中国文化人才的培养	737
4. 留日学生与中国科学文化的进步	742
第三章 留学日本运动的多元化格局	

(1970—1976)	746
第一节 留日学生促进中日关系发展	746
1. 留日学生与中日文化交流	746
2. 留日学生与中日经济交往	749
3. 留日学生与中日关系正常化	754
4. 留日学生的作用被弱化	759
第二节 台湾地区留日活动的变化	768
1. 留学甄试办法的实施及废止	768
2. 公费留学政策具体而严格	770
3. 台湾留学生结业后的不同流向	773
4. 经济问题对台湾留日活动的影响	779
第三节 中国大陆留日运动的复苏	783
1. “文革”前的中国大陆留学运动走向	783
2. 中日民间人士呼唤留学活动复苏	786
3. 留学日本运动复苏于中日邦交正常化	794
4. 鲜为人知的第一批中国大陆留日学生	795
第五篇 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的重振和热潮	
(1977—1996)	800
第一章 留学日本运动进入新时期	
(1977—1986)	801
第一节 赴日留学运动的历史性转折	801
1. 邓小平提出扩大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的意见	801
2. 中国政府制定新的留学政策	804
3. 新时期留日运动的先声	810
4. 从“留美热”、“留澳热”、到“留日热”	819
第二节 留学生在日本的初步体验	824
1. 通过留学类书籍了解日本	824

2. 留日学生的生活费用与打工	833
3. 留日学生的入学与学习	839
4. 留日学生对日本社会的体验	849
第三节 留日运动的主流特征	857
1. 日本的奖学金及其政策	857
2. 帮助中国留学生的日本民间团体	890
3. 留学成就引人瞩目	901
4. 中国留学政策出现新的迹象	910
第二章 中国大陆掀起“留日热” (1987—1989)	916
第一节 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赴日留学高潮	916
1. 自费留学生中就学生大量增加	916
2. 留日运动兴起最大的高潮	920
3. 变相的就学生出现	926
4. 逾期不归的现象在增加	938
第二节 制定新政策, 再创新成绩	944
1. 中国相继制定新的留学政策	944
2. 中国的留学服务与管理工工作日益加强	954
3. 学业的进步与广泛的活动	962
4. 留日学生社团的初步建立和发展	971
第三节 出现的问题与日本政府的整顿	975
1. 超时打工与严格限制	975
2. 语言学校泛滥与严格审查	980
3. 掮客的出现与留学生上当	992
4. 留学生经济问题有所解决	996
第三章 留学日本运动方兴未艾 (1990—1996)	1001

第一节 留学生生活走向新阶段	1001
1. 学业成绩日益提高	1001
2. 留学生活动趋向多样化	1015
3. 留学生生活呈现多层面	1037
4. 留日学生纪念中国留日运动百周年	1051
第二节 留学生学成归国建佳绩	1058
1. 中国鼓励留学生学成归国	1058
2. 从事文教科研活动的归国留日学生	1077
3. 从事实业活动的归国留日学生	1081
4. 从事商贸服务业的归国留日学生	1088
第三节 留学生停留日本和转往他国	1092
1. 定居日本的中国留学生	1092
2. 在日供职的中国留学生	1099
3. 在日创建公司的中国留学生	1102
4. 转往他国的中国留学生	1107
结语 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的展望	1112
后记	1127

导 论

中国人留学日本 运动 100 年的评估

留学，是世界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文化从过去走向今天的重要途径，也是世界文化从现在走向未来的重要媒介。

留学，是中日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日关系从过去走向今天的重要渠道，也是中日关系从现在走向未来的桥梁。

留学，曾给中国的社会变迁以重大影响，曾给中国的社会进步以重大推动。

留学，曾给日本的社会发展以重大促进，曾给日本的社会

变革以重大启示。

留学是一种运动。从广义上讲留学运动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派遣学生到国外去学习；二是接收学生来国内学习。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既有接收外国留学生的活动，也有派遣留学生的活动，两种活动是相辅相成的。

在中日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既有日本向中国派遣留学生的举措，也有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举措。当然，不同的历史时期，派遣留学生的走向和重心又有所不同。

从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为止，整整 100 年的时间里，在不少日本人分别或相继到中国留学的同时，则有数量更多、规模更大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从而形成了中日两国之间相互派遣留学生的一场波澜起伏、经久不衰的留学运动。

100 年里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已经成了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和中国当代史中的重要篇章。这是一部特殊的历史，一种特殊的运动。这是对中国近 100 年的历史发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是对中国近 100 年的社会发展发生重大促进的运动，是对中国近 100 年的文化变迁发生重大催化的篇章。

100 年里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已经成了中日关系史中的重要篇章，特别是成了近、现代以来中日关系史的重要篇章。正是这场运动，直接或间接地造就了一大批对中日关系发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也正是这些人物对中日关系的走向、机制、结果和趋势，发生了重大的制约和作用。试想，中日关系史上多少“叱咤风云”的人物，不正是从这场留学运动中走出来的吗！

今天，当我们回首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的百年史时，不仅有对过去的留恋和反省，对现在的关注和沉思，也有对未来的向往和探索。如果说过去的历史已不能更改，那么未来的历史则有待创造。

一 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的缘起

称得上是完全意义的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发生于 19 世纪末的 1896 年。

留日运动发展到 1996 年的今天，已整整走过了 100 年的历程。

1896 年 3 月，唐宝锷、胡宗瀛等 13 名中国青年，受清政府驻日公使馆的招募，随理事官员吕贤笙东渡日本。清政府驻日公使馆历来有在使馆内设东文学堂、中国人在那里学习日本语的传统做法，以应使馆需要。1896 年之前，也有人在使馆内的东文学堂学习，他们仅仅是学习语言，还不能称其为留学生。

对 1896 年渡日的十三人，公使裕庚却改变了原有的做法，把他们送到了当地日本人办的学校中去就读。他们成了留学生。

原本不是渡日留学的十三人，成了实际意义上的留学生。

很偶然的一次机遇，幸运之神垂青他们，让他们开创了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先河。

于是，中国人的留日运动便从 1896 年开始了。紧接着，清政府陆续向日本派遣留学生。

自此，一群群、一批批的中国人走上了留学日本之路。他们由少到多，形成了潮流，汇成了江河。

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的发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有其偶然性。说其有偶然性，是说 13 名青年成为留日学生的第一群体有偶然性。

十三人渡日之后中国政府陆续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由此发生了一场浩荡未息、持续了百年的留日运动，从这一点来说，留日运动的发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人们应该记得，在 1000 多年的中日交流史中，中日之间的旅途上奔波过一批又一批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他们泛海西渡，恭恭敬敬地来学习中国古老的文化。时过境迁，至 19 世纪末，中日两国持续了千余年的老师与学生的地位发生了逆转，昔日的学生成了今日的老师，昔日的老师成了今日的学生。地位发生逆转之时，也就是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之始。

1840 年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清政府的统治，在近代文明武装起来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冲击之下江河日下，已呈摇摇欲坠之势。1894 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政府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结束，给中国人很大刺激。长期以来不为中国人所重视的日本，靠洋枪洋炮打败了泱泱大国。究其原因，朝野上下一致认为，日本骤然强盛的原因与派留学生出国学习有很大关系。

于是，日本成了中国仿效的典范。

于是，日本成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现代文明的“二传手”。

19 世纪 90 年代，清政权一些上层具有开明思想的人物纷

纷倡导留学日本。张之洞著《劝学篇》，全面论述留学的必要，盛宣怀上奏提出派学生留洋“以广才识而资大用”。

可以说，是世界大势的冲击卷起了中国人的留日潮，是中国社会变迁的大势激发了中国人的留日热，是中国人不甘落伍的上进心推动他们走上泛海东渡求学的道路。

事情的发生与发展，往往都是两方面、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从中国人留日运动来说，它的发生，不仅仅在于中国一方面的认识与需要，同时，它还有事物的另一面，即日本方面的各种因素在起作用。

1894年以后，刚刚作起了老师的日本人，其中一些放眼长远、筹划未来的人士，对中国有了超乎寻常的关心，“中国热”在日本风行起来。对中国关心的人，其心态又不尽然相同，大致说来，中下层人士希望通过中国学生赴日加强两国的学术文化交流，加深两国人民的感情。少数上层人士，则寄希望于通过吸纳留学生，培植中国人的亲日感情。当时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即称：接受中国留学生，“受我感化之人才播布于其古老帝国之中，实为将来在东亚大陆树立我之势力之良策”。日本政府一些要员，如矢野文雄等人，为达吸引中国人留日之目的，也多番游说于清政府上层人物之间。

中日双方的共同需要，致使中国人留日运动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以此为源头，演出了轰轰烈烈、持续长久的一场运动。

二 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的“纵向”线索

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从产生至今已经历了 100 年。

100 年的历史，相对于人类历史的长河，它是短暂的一瞬；相对于某一具体的问题，它又是属于天长日久。

人们回过头看这 100 年，它既遥远且目之能及，它既悠久又举手可触。

回眸百年留日运动，人们不能不发现，一百年来，留日运动的潮流奔腾未息，它有一泻千里的湍急，也有风平浪静的港湾，它有波涛汹涌的险滩，也有涓涓流淌的河流。

审视百年的历史，思索百年的发展与变化，人们一定会发现，100 年的留日运动，作为中国人留学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中国人留学其他国家相比，它产生的不是最早，但影响却最为深远，它所经历的波折最多，但加入的人员也最多。

要想清晰、准确地阐述百年留日运动，从而把握它发展的脉络和特点，就必须搞清楚这场百年运动演变的基本线索。

对从 19 世纪末期开始的留日运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日学者皆有广泛的评论与研究。追溯中国留日运动研究的历史，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几乎是与留日运动产生的同时，研究留日的论著即已出现。如 1899 年姚锡光所著的《东瀛学校举概》，即有相当的研究留日色彩。至 20 世纪初期，更有多种关于日本留学的书籍出版，如《日本游学指南》、《日本留学指掌》、《留学生鉴》等，这一类指导留学实用色彩浓郁的书籍，包含了更多的研究留日成分，只不过它们的研究，是对一定时期的

研究，是局部的研究，再之后，中国又出现了《近代中国留学史》等研究专著。

掩卷沉思，我们会发现，从整体上来说，研究留学日本的著作，基本是侧重于对清末、对民初的研究，跨度长的也仅止于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在日本，情况也是大同小异。所以这样，自有其道理，因为那一个时期历史积淀已深，很多问题已有较一致的看法，那一个时期留日运动最辉煌。然而，辉煌之后留日运动并没有停止，只不过是它由大河变成了细流，况且细流之后又有了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重兴。既然留日运动持续百年没有终止，我们就有必要从整体上对它进行研究、探索。

从整体上看，百年的留日运动大致可分为五个比较明显的历史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896年至1911年，即从13名中国青年留日到辛亥革命爆发，是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的兴起和高潮期。这是留日运动辉煌的时期，是留日运动值得纪念的时期。

在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兴起和走向高潮的这个历史时期里，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和这场留学运动自身矛盾的变化，因而在发展过程中又呈现了不同的阶段，具体看有三个阶段：一，从1896年到1900年，是中国人揭开近代留学日本运动序幕的阶段；二，从1901年到1906年，是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走向第一个高潮的阶段；三，从1907年到1911年，是中國人在清政府的衰落中，坚持使留学日本运动持续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既是中国人留日运动的发轫期，又出现了百年留日史中的第一次高潮，并且是仅次于20世纪80年代后的一

次高潮，因此说这一历史时期在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百年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第二个时期，从1912年至1930年，即从中华民国成立到“九一八”事变之前，是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的发展和风潮期。这一时期，留日运动继续发展。在发展中，有低潮，也有高潮，特殊的时代使这一时期的留日运动风波迭起，浪潮翻涌。

在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继续发展和出现浪潮的这个历史时期里，可划分出如下三个阶段：一，从1912年到1914年，是辛亥革命后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出现第二个高潮的阶段；二，从1915年到1919年，是民国前期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风波迭起的阶段；三，从1920年到1930年，是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进入中国现代史的新阶段。这一历史时期，留日运动继续发展，并出现了近代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因此说，它在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百年史上，同样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第三个时期，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到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是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的曲折和回潮期。这是中日关系史上一段最令人不愉快的时期，因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的曲折和回潮。

在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发生曲折和回潮的这个历史时期里，也可以划分出不同的历史阶段。具体看有三个阶段：一，从1931年到1934年，是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因“九一八”事变而发生反复的阶段，引人注目的“归国潮”和“返日潮”又一次发生，并使中国留学生在斗争中再次经历考验。二，从1935年到1937年，是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发生第三次高潮的阶段，曾在历史上发生重要影响的中国留日学生的左翼文化运

动，主要发生在这一阶段及其前后。三，从 1938 年到 1945 年，是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的萧条期。萧条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即由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阻塞了一大批中国人留学日本的道路。当然，萧条并不意味着留学运动的中止，而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依然持续。特别是来自中国东北地区（即伪“满洲国”地区）和中国关内某些地区（主要是日军占领的“沦陷区”）的一些人，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里依然不断地赴日本留学，并和从其他途径赴日留学中国人一起，构成了留学运动的特殊群体。

第四个时期，从 1946 年到 1976 年，是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的持续和低潮期。这是社会变革接连不断的时期，是中日关系大落大起的时期。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导致了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的低潮和持续。低潮，是同中日外交关系的中断直接相关的，由此导致了中国大陆学生难以大批赴日留学；持续，是同中日民间关系的发展及中国台湾地区与日本关系的发展直接相关的，正是这种特殊的地方性、民间性的关系，才使中国人留学日本的运动得以在低潮中持续发展。

在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进入低潮的持续发展时期里，也可划分出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具体看有三个阶段：一，从 1946 年到 1949 年，是“战后”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的重建阶段；二，从 1950 年到 1969 年，是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持续发展的阶段；三，从 1970 年到 1976 年，是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格局多元化的阶段。总的看，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20 世纪前半期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是在这一时期结束的，而 20 世纪后半期的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当

20世纪前半期的留日运动结束之际，人们已开始日益明确了中国的留日学生在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当20世纪后半期的留日运动开始之时，人们也开始日益认识到中国的留日学生在中国大陆的社会变迁，中国台湾的社会变迁，港澳地区的社会变迁及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第五个时期，从1977年到今天，是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的重振和再度进入高潮的时期。

在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的重振时期里，迄今可以划出三个阶段：一，从1977年到1986年，是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进入新时期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赴日留学运动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和大发展的契机。二，从1987年到1989年，是中国大陆掀起“留日热”的阶段，也是出现了中国人留日运动史上第四次高潮的阶段，并且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赴日留学高潮。三，从1990年到1996年，是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方兴未艾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这场运动的结构和功能正在发生新变化，产生新特点，蕴育新趋势，从而为这场运动的未来前景，提供和开辟了更广阔、更深远的发展条件和发展道路。

纵观百年留日运动，可以发现，留日运动的发展与延续，与中日两国关系有最密切的关系，而在所有的中外关系中，中日关系又是波折最多、起伏最大的。

留日百年的五个时期里，每当有决定中日关系的重大事情发生，就要对留日运动产生重大影响。

从每个时期来看，每当有涉及中日关系的事件发生，就要对留日运动有所冲击。

留日运动，是波澜起伏、反复曲折的运动。

留日运动，是产生中国留学生最多的运动。

留日运动，是中国留学史上最壮阔的运动。

三 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的“横向”结构

为了全面把握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不仅要在这场运动进行纵向分析，即基本线索的分析，也要进行横向分析，即基本结构的分析。

结构，一般地说来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特定对象的组成部分是什么，二是各个组成部分的联系是什么。持续了百年的中国人留日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其内部亦有一定的结构，只有把握了这种结构，才能把握留日运动的整体特征，才能清晰、全面地认识留日运动发展的内在逻辑，发展了百年的留日运动的整体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而其各个部分又是相互联系的。把握了留日运动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留日运动的本质特征。

中国人留日运动，其结构是由赴日留学前的活动、在日留学期间的活动、离日归国后的活动三个部分组成的。

留学前的问题，大致需要对留学生的原籍、性别、年龄、身份、阶层、学历等进行分析。

留日学生的原籍。一般地说来，留学生多出自于经济发达、思想开放的地区。留日运动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在相当长的时期之内，都保持了“南多北少”的基本态势。比如从1908年到1911年3年的统计看，全国各地留日人数相差极大，

400 人以上的有湖北一省，300 人以上的有江苏、浙江、四川三省，200 人以上的有湖南、广东二省，100 人以上的有直隶、江西、山西、江宁、云南六省，而有的省仅占 10 人之内，如甘肃有 2 人，吉林有 1 人。留学生原籍的这种分布，与当时各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基本是同步的。

“南多北少”的原籍结构至 20 世纪 80 年代“留日热”以后，发生了重要变化，南北方已难分伯仲，北方甚至有超然居上之势。

留日学生的性别。留日运动兴起不久，即出现了女留学生。但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等因素制约，留日运动前四个时期之内，尽管女留学生群体始终未断，但男女比例相差严重悬殊，男性留学生多于女性留学生。

留日运动的第五个时期，即 80 年代“留日热”发生以后，留学生的性别比例发生了重大变化，女留学生比例上升，尽管从整体上而言，仍然保持了男多女少的基本特征，但就从某个地区、某一个阶段、某一个学校、某一个专业的局部来说，出现了女性超过男性的结构逆转现象。80 年代以后所出现的留日生性别结构特征，符合世界留学大势，是一种比较“合理”的结构构成。

留日学生的年龄。从一般意义上说，留学生的年龄都应比较轻，是 20 多岁的青年，世界各国都如此，中国也应须如此。然而在百年历史长河中，各种特定的因素，如运动初起、政策演变、某一阶段的留学热突然爆发等，使某个时期的留学人员年龄出现了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最明显的是出现在留日第一和第五个时期，同时，不均衡性也演出了一种颇为壮观的景

象。20世纪初，清政府对公派留学生的年龄没有严格的限制，再加上“独来独往”的自费留学者，使往来于留日旅途的，加入了六七十岁的老翁、十来岁的少年。运动再向前发展，国家对公派留学生年龄有了严格的限制，自费留学者也走向年轻的统一化。

再一次出现较大的年龄不均衡性，是20世纪80年代“留日热”的初始阶段。这一阶段中，出现了相当一批30多岁、甚至接近50岁的留学生。到90年代，留学生的年龄结构再度趋向了统一化。

留日学生的身份。在留学生身份上，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公派留学，一是自费留学，至于80年代“留日热”兴起以后所出现的“自费公派”留学等，是属整个留日运动中的一个小小支流，姑且搁置不议。在百年的留日运动中，留学生身份基本保持了统一的态势，自费留学生超过公派留学生。超过多少，各个历史时期不尽相同。但是，自费多公派少这一特征，并非贯穿于百年留日运动史的每一个时期的每一个阶段。20世纪初的几年中，所表现出的就不是自费多公派少的结构特征。其时，公派渠道极多，中央的学部、练兵处、邮传部派遣，地方的各省、县派遣，各地的工商矿局、商会等民间团体也派遣，这个特定时期出现的就是公派多自费少的结构特征。

留学期间的活动，大致可分为专业学习、课外生活、社会活动、社团活动等。

留日学生的专业学习。严格地说起专业，它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留日前的学习专业，二是留学时的学习专业。后一种情况，它实际也包含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学习的科目，二

是专业的等级。

从学习科目来说，留学运动的初期，学文科者居多，学农、工、理科的较少，两者的差距，甚有 10 倍之殊。这一特征，逐渐变化，差距不停缩小，到 80 年代“留日热”后，两者的地位已达到了逆转。

从专业等级来说，其间的发展变化可以分成特点相近的两个大的时期，即百年留日运动的前四个时期和第五个时期各为一个大的时期，以每个大的时期的初起阶段为起点，留学生所学专业等级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所差别的是，前者持续时间长，演变进度慢，后者持续时间短，演变进度快。但两个大的时期初始阶段留学生所学课程之“初级”，也是中国人全部留学史中独有的现象。

留日学生的课外生活，大致都经历了从陌生到熟悉再到接受的轨迹。在这个过程中要具体面对衣、食、住、行等一系列“琐碎”的问题。生活还有另外一层很重要的内容，即婚姻生活。从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兴起以后，一直持续到 80 年代“留日热”，有一少部分中国留学生与日本人联姻，其中还有因婚姻而在日本长期居留、定居，并由留学生改变成了日籍华人。

留日学生的社会活动，大致又可分为社会文化活动和政治活动，不论哪种活动，它都与社会发展、政治发展有密切关系，因此它们的出现频率、发生程度在留学运动各个时期都表现出了差异。仅以办刊来说，百年中最大的一次高潮是在留日运动第一个时期内，其间留学生在日本办的杂志计有 87 种之多，其精彩纷呈程度，后来的年代里未有企及。左翼文化活

动之热烈，当属 30 年代。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留日学生在日本期间的社会政治活动，构成了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中的一个极有特色的内容。从整个近、现代以来的中国人留学运动看，有两部分留学生特别地参与了社会政治活动，一部分是留俄学生，一部分是留日学生。比较起来，留日学生的社会政治活动更有不同于留俄学生的特色。可以说，在 20 世纪前半期的留日运动中，相当一大部分的中国留学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同一时期中国历史上一系列重大的政治运动，并对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留日学生的社团活动，与社会动荡、政治变革、中日关系有密切的关系，它是留学运动规模宏大的结果，它是留学运动走向成熟的表现。如辛亥革命前的 1898 年到 1910 年，几乎每年都有新的留学团体出现。此种热烈的程度，在以后再也没有出现。

留学者归国之后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留学功能的发挥上，即留学生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作用。这些作用，有的时期因留学人数较少，有的时期因距今较近，表现的尚不明显。表现明显的，当属 20 世纪前半期，当然，这不等于这种作用在 20 世纪后半期就不存在了。

相当一批留日学生归国后加入了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比较活跃的政党，且在党内取得了不同职位，因此，他们在各政党所发动和从事的斗争及合作中，起了推波助澜、甚至领导潮流的作用，对这一时期中国政治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或迟滞作用。

相当一批留日学生归国后或投身于中国的实业建设，或致

力于科学技术工作，因此他们对 20 世纪中国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积极、重要的推动作用。

大批留日学生归国后从事教育、文化事业建设工作，因此他们对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文化事业的创立，乃至对整个 20 世纪文化事业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另外，留日学生归国后，同时也成了中日交流的先行者，为中日交流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以上对留日运动的“横向”结构分析中，不难发现，不同时期的留日运动有不同的结构特征。但是，有的结构特征又不是某个时期所独有的，即它们是某几个时期所共有的。还有，有的结构特征，在所有的留日时期里，都保持了基本稳定的态势，而这种“稳定”，又只能说成是“基本”，因为每一种结构特征，都有流变的趋势。

第一篇



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 的兴起和高潮 (1896—1911)

第 一 章

揭开近代留学日本运动的序幕 (1896—1900)

第 一 节

赴日本留学前的中国学生

1. 近代中国涌起“西学东渐”潮流

所谓的“西学”，是作为“中学”的对立物而出现于中国近代社会的。近代中国的教育，就是在“西学”与“中学”的斗争中发展的，二者的斗争集中表现为“西学与中学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学校与科举之争”，归结来说，也就是中国要不要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的什么东西。

“西学”之东渐，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西学”之东渐，促进了中国社会的革命。

清代的学校规制，基本沿袭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学校分官学和书院、塾学。官学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中央设国子监，是掌管全国学校的最高行政机构，也是全国最高的学府，即所谓的太学。地方官学按地方行政区域依次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即所谓的“儒学”。

清代的书院，作为清代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被政府官学化了，成了官学的重要补充形式。

清代的塾学虽然发达，但其教授的也仅仅是读书、习字，以《三字经》、《百家姓》作为教材，高级的学“四书”、“五经”，学作八股文。

官学与科举相辅而行，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皆如此，及至清末，学校已完全成了科举的附庸，在历史上西方所无法企及的中国教育制度，到了近代社会则日益显露出了它的弊端。

清末的官学衰败不堪，学风颓败。同治年间，李慈铭对此有过生动的描述：“嘉庆以后之为学者，知经之注疏不能遍观也，于是讲《尔雅》，讲《说文》；知史之正杂不能遍观也，于是讲金石，讲目录；志已偷矣。道光以后，其风愈下，《尔雅》、《说文》不能读，而讲宋版矣；金石、目录不能考，而讲古器矣。至于今日，则诋郭璞为不学，许君为蔑古。偶得一模糊之旧槧，亦未尝读也，瞥见一误字，以为足补经注矣。间购得一缺折之臆器，亦未尝辨也，随摸一刻画，以为足傲汉儒矣。”当时学校的风气，正像缪良在《学堂通弊记》中所说的：“讲讲谈谈，空挨岁月；嘻嘻笑笑，空度光阴。看诗书，阅经传，聊且乘兴一时；斗口角，讨便宜，从不让人半句。文期将到，先愁明日何题；交卷已完，脱却自家干系。搭起空心架

子，或可欺同类之人。”^①

应该说，19世纪末叶以前，中国的科学文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较东邻小国日本的先进。传教士是在东方传播西方文化的重要载体，近代传教士传播西方文化的初期，西方传教士到东方传教的重点是中国而不是日本。据统计，至康熙十二年（1674年）以前来中国的著名西方传教士有90余人，而日本则只有6人，因此，中国所接纳的西方文化远比日本要多。

历史发展到清末，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日本所接纳的近代西方文化已明显地超出于中国，其实质上是反映了两国教育制度的差距。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制定了“教育立国”的国策，要使日本“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至明治末期六年义务教育的入学率已达98%。

与日本相反，囿于封建模式教育的清王朝则忽视近代教育，远远地被日本抛在了后面。通过下面几组数字的对比，可以更清楚地看清这个问题——

日本创办翻译学校九段坂下建洋学所为1855年，中国创建第一所翻译学校北京同文馆为1862年，比日本晚7年；

日本创建综合性大学东京大学为1877年，中国创建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大学京师大学堂为1902年，比日本晚25年；

日本第一次向西方派遣留学生为1862年，中国首派赴美国留学生为1872年，比日本晚10年；

日本公布新学制为1872年，中国废科举兴学堂为1905年，比日本晚33年；

^① 璩鑫圭主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64页。

到了19世纪60年代，将要终结的清政府陷入了内外交困之中，其统治集团内部也逐渐分成了两个政治派别，顽固派极力守旧，洋务派则主张引进西方的洋枪洋炮和某些科学技术以“自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朝廷中的奕訢、文祥，地方上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自强新政”的口号下，掀起了“洋务运动”。他们开设近代工厂，修筑铁路，开创矿业，设办邮电，训练新军。

与“洋务运动”同时展开的，还有“洋务教育”，他们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翻译“西学”书籍，办洋务学堂。“西学东渐”之风兴起，为留学教育的出现起了促进作用。

2. 留学欧美使中国人大开眼界

“洋务派”提倡的“洋务教育”一个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发展留学教育。近代中国人虽然首先是赴欧美，不是赴日本，但它却为后来的留日运动的发生起到了促进作用。通过留学欧美，更多的中国人大开了眼界，唤醒了中国人的留学意识，待机遇出现，时机成熟，中国人便利用有利条件，大批地涌往日本。

近代有稽可查的最早留美学生是容闳、黄宽、黄胜三人。

容闳（1828—1912），广东香山南屏镇（今属珠海）人，少因家贫受教会的资助进入澳门的教会学校马礼逊学堂学习。1846年冬日，马礼逊学堂迁往香港后，校长塞谬尔·布朗宣布他身体状况欠佳，拟回国调养，愿带三五名学生同去美国，帮

助他们接受新式教育，并称：诸生有愿意前往者，可即起立。

当场应声而起者有：容闳、黄宽、黄胜三人。于是，他们三人成为了载入史册的首批留美者。

他们是属于教会资助的留学者。

1847年1月4日，美国阿立芬特兄弟公司的“亨特利思”号运茶帆货船免费运送他们前往美国。1847年4月12日船抵纽约港，共历时了96天。他们被送入到了颇有名气的麻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

1848年秋，黄胜因病回国，后又随第二批留美学生赴美，曾在中国驻美公使馆任译员。

1850年，黄宽从孟松学校毕业，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医科攻读7年，回国后成为中国第一位正规医科大学毕业的西医师，并参与创办医学校。

容闳从孟松学校毕业后，考取美国第一流大学耶鲁大学。1854年11月13日，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乘船离开纽约，154天后，回到了阔别7年的祖国。

容闳对近代中国留学事业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做了“留美第一人”，更主要的在于他积极地促进了后来向美国官派留学生。

在史学界，关于是谁最早提出了留洋的思想有所争议，但容闳所起的作用是得到了充分肯定的。

1870年6月，容闳正式提出了他设想的留学计划：建议选派青年往外国留学，接受完善之教育，以为国家服务。可先试行派遣一百二十名学生，这一百二十名可分为四批，每批三十人，逐年派送一批。留学期限可定为十五年。平均年龄以十

二岁至十四岁为限。如第一批及第二批学生证实确有成效，以后可派遣中文教师随同出国，以便留学生在美国仍能学习中文。并需委派监督二人，管理学生一切事宜。政府可由上海关税中抽拨数成作为留学生经费。^①

曾国藩、李鸿章积极支持容闳的留学计划，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出洋预备学校出洋肄业局（出洋局），招考学生，训练外语，补习中文。

1871年9月3日，曾国藩和李鸿章奏呈《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具体地提出了实施办法：

商知美国公使，照会大伯尔士顿，将中国派员每年选送幼童30名，至彼中书院肄业缘由与之言明，其束修膏火一切均中国自备，并请俟学识明通，量材拔入军政船政两院肄习，至赴院规条，悉照美国向章办理。

上海设局，经理挑选幼童派送出洋等事。拟派大小委员三员，由通商大臣札飭在于上海、宁波、福建、广东等处，挑选聪慧幼童年十三四岁至二十岁为止。曾经读中国书数年，其亲属情愿送往西国肄业者，即会同地方官取具亲属甘结，并开明年貌、籍贯、存案，携至上海公局考试，如姿性聪颖并稍通中国文理者，即在公局暂住，听候齐集出洋，否即撤退

^①容闳著 王兼译：《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中华书局1991年，第98页。

以节糜费。

选送幼童，每年以 30 名为率，4 年计 120 名驻洋肄业。15 年后，每年回华 30 名，由驻洋委员胪列各人所长，听候派用，分别奏赏顶戴官阶差事。此系官生，不准在外洋入籍逗留，及私自先回，遽谋别业。

赴洋幼童学习一年，如气性顽劣，或不服水土，将来难望成就，应由驻洋委员随时撤回，如访有金山地方华人年在 15 岁内外，西学已有几分工夫者，应由驻洋委员随时募补以收得人之效，临时斟酌办理。

赴洋学习幼童，入学之初所习何书，所肄何业，应由驻洋委员列册登注，四月考验一次，年终注明等第，详载细册，赍送上海道转报。

驻洋正副委员二员，每员每月薪水银 450 两，翻译一员，每月薪水银 160 两。

每年驻洋公费银共约 600 两，以备医药信资文册纸笔各项杂用。

正副委员、翻译、教习、来回川费每员银 750 两。

幼童来回川费及衣物等件，每名银 790 两。

幼童驻洋束修、膏火、屋租、衣服、食用等项，每年计银 400 两。

每年驻洋委员，将一年使费开单知照上海道转报。倘正款有余，仍涓滴归公，若正款实有不足之处，由委员随时知照上海道稟请补给。

每年驻洋薪水膏火等费，约给库平银 6 万两，以

20年计之，约需库平银120万两。^①

容闳被任命为第一批留美学生的副监督。对如何选拔第一批留学生，容闳是这样回忆的：“留学生总数是120人，分四批出国，每批30人，每年遣送一批，连续派遣四年，每年大约都在同一时期。学生年龄最小不得小于12岁，最大不得超过15岁。学生须出身清白，或有妥靠的保护人。学生须经过中文考试和医生的健康检查。所谓中文考试，也就是按规定的中文阅读和写作，假如应考生曾在英文学校学习过，还须加试英语。被录取后，每天要到预备学校补习。预备学校的教师，一方面为他们补习英语，一方面使他们继续学习中文。在留学生去美国以前，至少要在补习学校学习一年。

“学生家长和保护人须签署一份志愿书，证明志愿送子弟或被保护人赴美留学15年，对留学生的死亡或事故，政府不能负责。

“学习期间，政府保证负担一切费用。每批学生均有一位中国教师陪同前往美国，并供给所需装备……

“1871年夏天，在中国招收的第一批留学生未能满额，为了凑足三十人之数，我不得不亲自到香港，由英国政府设立的学校中挑选几个聪明学生补充名额。这些学生不但学过汉文而且也学过英语。当时中国还没有报纸来传播消息，北方尚不知道政府制订了这样一个教育计划，所以起初只有极少数人申请入预备学校。所以申请者大都来自广东省，特别是香山县。在

^①《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三十二上，第4页。

120名留学生中，90%是南方人，就是这个缘故^①”。

1872年夏末，第一批留美学生踏上了征程。

以后，清政府又相继向欧洲派出了留学生。

1876年4月，在北洋海防营任教习的德国人李勋聘期已满准备回国时，李鸿章挑选卞长胜、刘芳图、查连标、袁雨春、杨德明、朱耀彩、王德胜等七名军官随李勋赴德国学习军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批官派留德陆军学生。

派遣海军留学欧洲的呼声早已有，1877年1月13日，沈葆楨联合李鸿章向清廷呈奏章，再一次强调了留学的必要：

……窃臣葆楨前于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奏陈船工善后事宜折内，请于闽厂前后学堂选派学生分赴英、法两国学习制造、驾驶之方，及推陈出新、练兵制胜之理，速则三年，迟则五年，拟令船厂监督日意格详议章程，经总理衙门议请敕下南北洋大臣会商熟筹等因。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旋因台湾有事，倥偬未及定议。

上年臣等筹议海防折内，于出洋学习一事，断断焉不谋同辞。及臣日昌、臣赞诚先后接办船政，察看前后堂学生内秀杰之士，于西人造驶诸法多能悉心研究，亟应遣令出洋学习，以期精益求精。臣等往返函商，窃谓西洋制造之精，实源本于测算、格致之学，奇才迭出，月异日新。即如造船一事，近时轮机铁肋

^①容闳著 王兼译：《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第103—104页。

一变前模，船身愈坚，用煤愈省，而行驶愈速。中国仿造皆其初时旧式，良由师资不广，见闻不多，官厂艺徒虽已放手自制，止能循规蹈矩，不能继长增高。即使访询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若不前赴西厂观摩考索，终难探制作之源。至如驾驶之法，近日华员亦能自行管驾，涉历风涛；惟测量天文、沙线，遇风保险等事，仍未得其深际。其驾驶铁甲兵船于大洋狂风巨浪中，布阵应敌，离合变化之奇，华员皆未经见。自非目接身亲，断难窥其秘钥。查制造各厂，法为最盛；而水师操练，英为最精。闽厂前堂学生本习法国语言文字，应即令赴法国官厂学习制造，务令通船新式轮机器具无一不能自制，方为成效。后堂学生本习英国语言文字，应即令赴英国水师大学堂及铁甲兵船学习驾驶，务令精通该国水师兵法，能自驾铁甲船，于大洋操战，方为成效。如此分投学习，期以数年之久，必可操练成才，储备海防之用。至学生中有天资杰出能习矿学、化学及交涉公法等事，均可随宜肄业。

惟人数既多，道路辽远，非遴选贤员派充监督，不足以资统驭而重责成。查有三品衔候选道李凤苞学识宏通，志量远大，于西洋舆图算术、各国兴衰源流，均能默讨潜搜，中外交涉要务尤为练达，实属不可多得之才，以之派充华监督，必能胜任。至访询各国官厂官学，安插学生，延请洋师，仍应有情形熟悉

之员，联络维持，主客方无隔阂。臣葆楨原奏所称正一品銜閩厂監督日意格，前已回国，经臣等催调来华，商办一切。该员久襄船政，修理熟谙，于船厂学生情谊亦能融洽，以之派充洋监督，必可胜任。

六月间，李凤苞、日意格二员来津，稟商臣鸿章，适有烟台之役，即携该员等同往，飭令筹议章程。滇案结后，曾将该员等所议各节，抄送总理衙门核夺。兹经臣等再四讨论，复与李凤苞、日意格切实核减，学生员数以三十名为度，肄习年限以三年为度，责以成效，严定赏罚，出洋经费分年汇解，约共需银二十万两，此项经费必应筹定有著之款。臣鸿章前议由閩省额拨南北洋海防项下酌提动用，先尽厘金拨解；厘金不敷，即在閩海关四成洋税项下就近凑拨。旋准福州将军臣文煜咨称：閩海关四成洋税，暂无存款，俟第六十五结届满，再行核数拨解等因。新授閩浙督臣何璟过保定时，臣与面商一切，亦深以为然。兹由臣日昌函致臣鸿章，议定由閩省厘金项下筹银十万两，閩海关四成洋税项下筹银五万两，船政经费项下均拨银五万两。是此项二十万之数，均已议有着落。查照分年汇解章程：第一年七万三千两有奇，第二年六万两有奇，第三年五万八千两有奇，并游历及应支教习修金等费，随时核计拨汇。閩力虽甚拮据，必能酌量缓急，以符定议，应请于海防额餉内作正开销。

查西洋各国，均能以中国遣人赴彼学习为和好证

验，前派幼童赴美国，英使即有该国大书院极多，将来亦可随时议派之语。秋间滇案议结时，臣鸿章面告威妥玛，以拟遣学生赴英学习，该使允俟总理衙门知照到日，转致本国外部，九月间威妥玛回国过晤，臣复与商明照办。惟该国兵船定例稍严，闻日本近时已有七人在英兵船学习。臣在烟台阅视洋操，即见有日本武弁在英国铁甲船随同操演。今议学生分班送往，又有郭嵩焘等驻英商办，当无碍难之处。至法使自来尼屡以日意格办船有效为言，此举亦该使所深愿。现拟令该监督等率同学生，于明年正月启行。应请敕下总理衙门，迅速分别知照英法驻京公使，令其转达本国，妥为照料。臣鸿章于本年三月间，因洋员李劭协回国之便，派令武弁卞长胜等七人同赴德国军营学习兵技，当时未派监督，心甚悬念。此次李凤苞出洋，飭令该员按三个月一次由轮车驰赴德国，兼查卞长胜等功课，并请总理衙门酌量照会德国驻京公使，一体知照办理。

近自同治十二年筹遣幼童赴美学习之后，上年日意格回国，臣葆楨遣学生数名随往游学，本年臣鸿章又遣卞长胜等赴德国学习，此次又系李凤苞等率领学生分赴英法两国，从此中国端绪渐引，风气渐开，虽未必人人能成，亦可拨十得五，实于海防自强之基不无裨益。谨将臣等筹议船政学生出洋章程及经费数目，分缮清单，恭呈御览，仰恳飭下总理衙门核准施

行。^①

1877年、1883年、1886年和1897年，李鸿章等人共选派福建船政学堂学生、船厂艺徒等多批人赴欧美留学。

以上所说的留学欧美，不仅仅是开创了近代中国人留学运动的先声，而且它也为日后留日运动的产生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留学欧美运动促进了留日运动的产生，留日运动产生又壮大、发展了中国的留学运动。

3. 张之洞极力主张中国人留学日本

谈起近代中国人留学欧美，必然要提到李鸿章；谈起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必然要提到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27岁中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他一生担任过乡试考官、学政、巡抚、总督。

为官期间，他每到一处必抓教育，兴办学堂。1867年，他出任浙江乡试副考官，随又任湖北学政，后又于1874年在成都创办尊经书院；1882年出任山西巡抚，次年在太原设立令德书院；1884年任湖广总督，1902年设立湖北学务处，作为管理全省教育行政的机构；1907年8月升任清廷军机大臣，主管学部，总揽全国教育大权。

张之洞是清末洋务教育的开拓者之一。1886年，他在广州黄埔鱼雷局内附设鱼雷学堂；1887年8月，他奏准创办广

^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二十八，第20—24页。

东水陆师学堂；1896年2月，他奏准在南京设立江南陆师学堂；1897年3月，他奏准在武昌设立湖北自强学堂；他还于1896年在南京创办储才学堂；1898年在武昌设立农务学堂。

张之洞在从事洋务教育活动中，大胆地整顿传统教育的积弊。任湖北学政期间，他针对清末教育的空疏，提倡实学，主张经世致用。他认为，学堂单习经学是不够的，还要学习西学。1897年，他改定两湖书院学规和课程，次年又改制经心书院，增加了自然科学、西文的课程，使它们成为了新式学堂。

早在留日运动开始前，张之洞即已热衷于留学运动。1892年，他派译员俞忠沅携工匠十人到比利时学习炼钢铁；1896年，他选派学生40名，分赴英、法、德等国学习。

19世纪末，中国正面临群犬争食的危险，张之洞认为，“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惟有练兵、修铁路两事是救死急着，须刻定程限，必以4年内完成，或可稍支危局，可以做到弱而不亡四字。”^①同时，他对日益高涨的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清活动更是忧心忡忡，认为如不加以遏制，“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②为“避”维新派的“邪说”，他于1898年3月著成了《劝学篇》。

对《劝学篇》，有的学者指出：“张之洞撰写《劝学篇》固然是为了反对维新变法，但他还有另一个用意。在维新思想盛行之时，他曾投机地附和维新派，还捐款赞助维新派办学会、

^①《张文襄公全集》，电牍三十三，31页。

^②张之洞：《劝学篇》序。

兴学校，后来他觉察了政治风云不对头，立即改变附和维新派的举动，而且反过来攻击和镇压维新派，并以《劝学篇》进呈清政府，为自己剖白，表示对清廷的忠诚。当戊戌变法被镇压后，张之洞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更飞黄腾达了。”^① 另有学者评论说：“张之洞著《劝学篇》立场是偏向保守的，立论是中庸折中的，主导的方法是从文化教育入手，使中国近代化有中西之长而无中西之弊。”^②

在这里姑且对张之洞的政治态度与为文目的不论，仅单纯从《劝学篇》本身来说，它确是在中国人留日运动史上，尤其是在留日运动的初始阶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该文创作于留日运动的发轫期，观点明确，论述精当，发声强烈，再辅之以张之洞本人的地位与声望，它的作用之大更是可想而知了。

《劝学篇》共24篇，4万余字，分为内、外两篇。内9篇，即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外15篇，即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弼兵、非攻教。张之洞关于留学日本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游学篇中。

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游学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亲贵。尝见古之游历者矣，晋文公

^①郑登云编著：《中国近代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5页。

^②蔡振生：《张之洞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30页。

在外十九年，遍历诸侯，归国而霸。赵武灵王微服游秦，归国而强。春秋战国，最尚游学：贤如曾子、左丘明，才如吴起、乐羊子，皆以游学闻。其余策士杂家，不能悉举。后世英主名臣，如汉光武学于长安，昭烈周旋于郑康成、陈元方。明孙承宗未达之先，周历边塞，袁崇焕为京官之日，潜到辽东；此往事明效也。请论今事：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不特此也，俄之前主大彼得，愤彼国之不强，亲到英吉利荷兰两国船厂，为工役十余年，尽得其水师轮机驾驶之法，并学其各厂制造；归国之后，诸事丕变，今日遂为四海第一大国。不特此也，暹罗久为法国涎伺，于光绪二十年，与法有衅，行将吞并矣；暹王感愤，国内毅然变法，一切更始；遣其世子游英国，学水师。去年暹王游欧洲，驾火船、出红海来迎者，即其学成之世子也。暹王亦自通西文西学，各国敬礼有加，暹罗遂以不亡。上为俄，中为日本，下为暹罗，中国独不能比其中者乎？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

可？或谓昔尝遣幼童赴美学习矣，何以无效？曰：失之幼也。又尝遣学生赴英法德学水陆师各艺矣，何以人才不多？曰：失之使臣监督不措意，又无出身明文也。又尝派京员游历矣，何以材不材相兼？曰：失之不选也。虽然，以予所知，此中国亦有足备时用者矣。若因嗜废食之谈，豚蹄篝车之望，此乃祸人家国之邪说，勿听可也。尝考孟子所论圣贤帝王将相，历险难，成功业，其要归不过曰“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已；曰“生于忧患”而已。夫受侮而不耻，感国而不惧，是不动也。冥然罔觉，悍然不顾，以效法人为耻，是不忍也。习常蹈故，一唱百和，惮于改作，官无一知，士无一长，工无一技，外不远游，内不立学，是不增益所不能也。无心无性无能，是将死于忧患矣，何生之足云^①？

据许同莘所编张氏《年谱》卷6记载：“日撰一首，率以灯（灯）下为之，黎明而就，次日复改，易稿至于六七。书成镂版，风行海内。五月袁忠节（昶）重刻于芜湖，公续有改正，此为定本。”

1898年7月，张之洞的门生、翰林院待读学士黄绍箕将《劝学篇》进呈，光绪帝“详加披览”，赞扬其“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下令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要求“广为劝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又

^①《劝学篇·游学》。

谕总理衙门排印 300 部，作为钦差“维新教科书”，“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十日间三易版本，绝对是当时的“畅销书”，同年即有西湖书院石印本、桂垣书局刊本、中江书院重刊本、汉川治谷堂重刊本及各省刊本，估计总印数不下 200 万册。

《劝学篇》出版后，有人称它是“拯乱之良药”^①。它的影响还传到海外。吴板桥、乌特波莱基将它译成英文在《教务杂志》上从 1898 年 11 月起连载，并于 1900 年改名为《中国的唯一希望》在纽约全文出版。耶稣会传教士也将其译成法文出版。

《劝学篇》的广泛传播，尤其是清廷的高度重视，无疑为留日运动的发展添加了推动力。

4. 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成为清政府的国策

自从 1840 年以后，清政府的统治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冲击之下江河日下。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 年 4 月 17 日缔结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给中国人很大刺激。战前并不为中国人所重视的日本，竟靠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军队打败了中国。中国朝野上下纷纷探究日本强盛的原因。

探究的结果，认为日本的强盛与派留学生出国学习有很大关系。“日本在同治初年，锁港拒敌，旋为美英兵船所乘，发愤求自强之策，历遣榎本武扬、山县有朋、陆奥宗光、伊藤博

^①叶昌炽：《缘都庐日记钞》。

文等，率其徒百余人游学欧洲各厂，或肄政治工商，或究水陆兵法，学成而归，渐加濯用，国势遂日强一日，此遴派亲贵贤能，重出洋之选，其明效大验也。”^①日本由弱而强的历史给了人们重要的启迪，不仅仅张之洞一人，其他一些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对出国留学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具有开明思想的大臣纷纷提出留学日本的事宜。

1898年，盛宣怀在《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中提出：“上院学生毕业后，择其优异者咨送出洋，照日本海外留学生之例，就学于各国大学堂以广才识而资大用。”^②

同年5月，御使杨深秀又提出上奏，指出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靠的是向西方大量派遣留学生，中国变法必须学习日本的经验，“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政俗文字同则学之易，舟车饮食贱则费无多。”^③

留日运动的发生与发展，还有日本方面的原因。1894年之后，日本兴起了研究中国的热潮，研究团体和协会纷纷成立，多数中下层人士希望通过中国学生赴日加深两国的学术文化交流，加深两国人民的感情。少数日本当权者则希望通过中国人留学日本，培植中国人的亲日感情。在这方面，矢野文雄就是很具有代表性的。

矢野文雄是日本的政论家、小说家，1897年至1898年任日本驻华公使，任公使期间，积极筹划招收中国留学生之事，

^①《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三十二上，第28页。

^②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155页。

^③《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第248页。

并曾致函清政府总理衙门，表示愿意接受 200 名中国留学生，并承担费用。

矢野文雄如此大卖力气、煞费苦心，其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当然，他对中国人说的是一套，其真实目的及其详细计划，我们从他 1898 年 5 月 14 日以“机密第四十一号”致日本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信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该信原文如下：

关于福建省内铁路事项中所陈，设若向彼提出要求，为表示超于口头友谊之实际友谊，提出我接受留学生教育之要求，据观察所得，势必为清政府所欢迎。此举不仅有助于此次要求之成功，而受我感化之人才播布于其古老帝国之中，实为将来在东亚大陆树立我之势力之良策。兹将其缘由详陈如下。如斯，则彼之从于武事者，不仅限于模仿日本之兵制，军用器械等亦必仰给于我；聘用军官等人员也将求于日本。毋庸置疑，清军事之大部行将日本化。理科学生亦必求其器械、工人等于日本。清之商工业自身，则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而为我商工业向清扩展打开门路。另，法律、文学等科学生，为谋清之进展，必将遵袭日本之制度。若能至此，我势力将及于大陆，正未可量也。斯时清之官民对我依赖之情，亦必胜于今日十倍。由于此辈学生与日本之关系，将来清政府必陆续不断自派学生来我国，如是则我国之势将悄然驷驷于东亚大陆。故而无论从何方考虑，望我政府适应时机，接受清之留学生。同时思及此事可有助于促成

铁路事件之要求，故前件第四十号信所附抄本，业已电报分别请训在案。如该信中所陈，本月至总理衙门，于商妥福建铁路事件协议之后，向总理衙门诸大臣陈述如下意见：

“日清两国间，值此赔款终于清偿，威海卫占领撤离之际，邦交可望日益辑睦之时，日本政府愿向清政府表示诚挚之友情。今闻清政府开设文武专科，变通武备，因之亟须拔擢人才。盖造就人才在于教育学生，清政府若有派遣学生去日本之意，日本政府愿接受多数之学生，为之提供费用，施以教育。希请亮察诚意，惠予答复”。

因需事先提出学生数额，故先此之电禀中乃提出要求接受多数之学生，夫以清朝之土地广袤，五十或百人之数，不足以使彼感恩怀德。复从为培植我国将来之势力而言，亦属多多益善。然鉴于对方一时难以派出多数学生而希逐步派遣之情状，故本公使口头提出接受二百名之数。另关于费用一事，希我政府同意供给前述二百名之费用。若以每一名一年不超过三百元（指日元，下同——译者）左右计，则二百名一年间终不超过六万元上下之数。以此微少之费用得为前陈大业之一部分，其得失甚为明显，毋庸赘言。另，应对方之请，于次日（8日）送致本公使所述要旨之咨文（见另纸乾号抄件）。其后于昨日（13日）得清政府之答复（见坤号文），感谢我政府之友好情谊，然以方在设立日本语学校之际，当熟虑更加切实之方

法，再行提出留学生之事云云。盖以清政府中，有欢迎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之开明派，亦有不欢迎之守旧派。因而属于前者之大臣中，如李鸿章当然欢迎此举；二三守旧派之意向究至如何，现当难以推测察知。本公使当逐步说服彼等，期能逐渐派遣多数之留学生来我国。当续与彼等会商，议及细节^①。

从矢野文雄的信中很明显地看出，其策动中国人留日，就是要使“受我感化之人才播布”，“为将来在东亚大陆树立我之势力”。

6月3日西德二郎复信矢野文雄：

第四十一号件关于清之留学生事，业已阅悉。根据上件，阁下曾以书面向清政府提出我帝国接受多数清之留学生事，且支办有关之一切经费。并在会见清政府官员时，口头提出接受二百名留学生等由。此事颇出本大臣意料，盖我帝国政府为清政府留学生支出六万元之巨款，首先不仅无支付此款之来源，且其事本身即应熟虑。阁下关于此事之意见，大体似为得当，但实际得益，即是否能达所期目的，则甚难逆料。诚然，由清之富豪缙绅子弟中选拔其受有家庭教育者，我帝国施以专门教育，或可有益。但一般而

^①《清国留学生招聘策》，载《近代史资料》第7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95页。

言，若贫家子弟当其选，既缺乏报效之志，且费用亦不能自筹，设若不断东来，由我帝国政府资助彼等学习，是否能取得良好结果，殊属怀疑之事。不仅如此，察迩来清国顾及自身利害，各地频有自行向我帝国派遣留学生之举，如浙江巡抚要求派遣来日研究陆军兵学留学生四名，文学研究留学生四名；复有湖广总督提出在近期派出多数留学生之打算。因而由我帝国承担直至支办经费之留学生教育，是否有此必要，当属疑问之事。然鉴于贵公使已以书面向清政府提出此事，现即碍难取消。如清政府进一步响应，要求派遣留学生时，可复以设法安置极少数之人。在对方回复阁下照会时，乞注意对其请求勿表示过分热烈，使此事系不出于我之鼓动，任其自然成行为好^①。

西德二郎在复信中虽然表示了与矢野文雄的计划不尽相同之意，毕竟也表示了可以接受安置一部分中国留学生。

另外，日本参谋总部的福岛安正和宇都宫太郎也历访张之洞、刘坤一、岑春煊及袁世凯，力陈派遣留学生学习陆军的重要。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磨及前司法大臣清浦奎吾等人也趁游历中国之际，多方向清廷要人游说。

1898年旧历三月，总理衙门转述了矢野文雄关于派人留日的建议，山东道监察御使杨深秀奏上了由康有为代拟的《议

^①《清国留学生招聘策》，载《近代史资料》第74号，第97页。

游学日本章程片》。总理衙门奏说：“近年以来，日本讲求西学，大著成效。又与中国近在同洲，往来甚便。既经该国函请派往游学，臣等公同商酌，拟即妥订章程，将臣衙门同文馆东文学生酌派数人；并咨行南北洋大臣以及两广湖广闽浙各督抚，就现设学堂中遴选年幼颖悟粗通东文诸生，开具衔名咨报臣衙门，知照日本使臣陆续派往，即由出使日本大臣就近照料，无庸另派监督。各学应支薪水用项，由臣衙门核定数日，提拨专款，汇交出使大臣随时支发。”^①

1898年8月2日，光绪皇帝谕军机大臣等：“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着即拟定章程，咨催各省迅即保定学生陆续咨送；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亦一并咨送，均毋延缓。”^②

由一部分军政大臣鼓吹，到光绪皇帝下旨，可以说，清政府已把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正式作为一种国策确定了下来。

清政府把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作为国策确定下来，是由于外国侵略势力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煞费苦心的洋务运动又以失败而告终，清廷命运且不保夕，并且留学日本路近、费省、文化风俗相近、语言障碍相对不大等，是为培养人才，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采取的一种国策。

留日政策确定之后，清政府便在9月间以“大清国大皇

^①《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三十二下，第15—17页。

^②朱有墩：《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7页。

帝”名义致日本国国书^①，正式向日本政府表示感谢。

应指出的是，这个时期制订的留日章程、规定尚属粗略，未言及自费留学问题，所言皆是公费派遣办法，自费留学是在“顺其自然”状态中发生与发展的。

第 二 节

赴日本留学期间的中国学生

1. 十三人成了第一批留日生

1896年旧历三月末，中国驻日公使馆理事官员吕贤箴在返回日本之际，带去了十三名中国学生。

吕贤箴同十三人一行从北京出发，经通州、天津、上海，再乘法轮“奥西那”号驶往日本。一路上，十三人兴奋不已，围着吕贤箴问个喋喋不休。船行临近日本，他们指指点点日本沿海的秀丽风光。

“奥西那”号停靠码头，十三人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这种新的生活在他们栖息于家乡时被招募，甚至于他们踏上轮船后也未曾预料到。

十三人是被招募到中国驻日公使馆学习日语的，并非是留学生。

中国社会长时间封闭锁国，外语人才一直比较缺乏。1859年2月26日，时任翰林院编修的郭嵩焘奏请咸丰皇帝设立外语学校。他说，中外交兵议款20年来，中国情形虚实，外国

^①《致日本国国书稿》，载《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2，第7页。

皆所周知，可是对于外国呢，中国竟始终无一人真正知悉。他认为这种情况很不正常，甚至是种倒退，因为康熙时候，还派人和俄国互习文字，设法了解外国情况。他建议朝廷，飭令两广、两江督臣，黑龙江将军和库伦办事大臣，从其所辖之地，推求通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资送入京，给之薪米，“使转相传习，亦可以推考诸夷嗜好忌讳”。^① 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提出设立外语学校的主张。

1862年，京师同文馆开办，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外语学校。开办之初，仅设英文馆，次年设立法文馆和俄文馆，但长时间没设日文馆，直到1897年才开设东文馆，“学生十二人肄习东文”。^② 设立东文馆是较晚的事，连德文馆也是在此之前于1888年设立的。

1864年广州广方言馆开办，最初也是授英文，东文馆亦属后来才开。

清政府从1876年开始在外国设立公使馆，自此，便有了送学生去中国驻外公使馆学习当地语言的做法。国内外语学校开设东文馆较晚，更须送学生去驻日公使馆学习，以培养日语人才。当时京师同文馆内所设东文馆，所以不称日文馆，同文馆一名学生的解释是：“甲午中日之战，日本已强，又添设了日本文，彼时名曰东文馆。其所以名曰东文馆者，有两种原因，说来也很可笑。一因甲午之战，官员们为堂堂中国同一小日本打仗，说起来丢人，意思是它不配与中国为敌，避免中日

^①《四国新档》，英国档下，第854页。

^②《同文馆章程及续增条规》，第46页。

合称，而云中东之战，所以名曰东文。二因其他四国文字都是西文，所以名曰东文。”^①

十三人就是这样被带往日本的。他们分别是唐宝锷、朱忠光、胡宗瀛、戢翼翬、吕烈辉、吕烈煌、冯闾谟、金维新、刘麟、韩筹南、李清澄，另有两人，只知一姓王，一姓赵。

中国驻日公使馆以往的做法，是将从国内招募来的学生安置在公使馆内，从外面请日本人教日语。十三人这一次，公使裕庚改变了以往的做法，他要把十三人送到公使馆外面去学习日语。

为此，裕庚把十三名学生学习的事委托给了日本外务大臣兼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西园寺公望转而又将十三名中国学生交给了嘉纳治五郎。

嘉纳治五郎（1860—1938）时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是著名的教育家。他1870年到东京学习，后入东京大学文科部，毕业后再攻哲学。1891年初起，他费一年时间赴欧洲考察教育，1894年起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后来黄兴、鲁迅、陈独秀等中国留学生，都受过他的教育。

嘉纳治五郎接收十三名中国学生后，颇费了一番心思。他为中国学生在高师校内开设了一个特别的班，租赁东京神田区三崎町一丁目二番地的一所房屋，作为中国学生的宿舍兼教室，安排本田增次郎做教学活动的监督，吉田和后藤等人做任课教师。他们为中国学生开设的课程有日语、数学、物理、化学和体育，除理化实验课和体育课，中国学生要到“御茶水”

^①《齐如山回忆录》，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第28页。

去利用高师的教学设备外，其余的大部分课程都在那所房屋处学习。

十三人走入日本学校，就成了实际意义的留学生，并且是近代中国第一批留日生。

一般地说起中国近代留日运动的发生及发展，就要提起路短、文近、费省，提起张之洞的《劝学篇》，提起清政府一些开明官员的主张等等。但是，从以上所述近代第一批留日学生产生过程看，与这些所谓的留日运动“因素”全都没有直接关系，它是偶然因素作用下的一种结果。

我们说它是偶然因素作用的结果，如果从时间因素来看，则会看得更加清楚。

提倡留日最烈的张之洞著《劝学篇》，是1898年，清政府把送学生留日作为国策确定下来，也是1898年，二者皆在十三人留日之后。

从十三人留日到《劝学篇》及确立留日国策之间的两年时间里，另有数十人留学日本。

所以我们说，留日运动的发生，从个别事件上说，具有偶然因素，甚或可以说是偶然因素直接作用的结果，但把它作为事物一个整体来说，则它的发生与发展却有了必然因素。偶然因素与必然因素的相互作用，揭开了中国近代留日运动的序幕。

2. 留学费用及入学过程

十三人留日后，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形成了留日高潮，此中原因，除文化等方面因素外，还因为留日所需费用低，尤其是对于自费生而言，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当时对于一个尚处于经

济落后的国家，普通百姓的思想比较保守，守旧的思想意识决定了人们不可能做到举债留学，因此费用的多少是人们决定能否留学必须考虑的因素。

一般地说，当时留学日本的费用比在国内上学多不了多少。

所谓的留学费用，不外乎旅费、学费、学习用品费、杂费、服装费等等，这些费用分别为多少，章宗祥有过一个很详尽的统计。章宗祥（1879—1962）是19世纪末期留学日本的，他于1901年出版了《日本游学指南》一书。该书虽然出版于1901年，但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书中所写的是19世纪末期、留日运动刚刚兴起时的实际情况的。

书中分别列数了各项留学费用，因列得详尽而具体，作者当时又正在留日，所列费用必会准确，这里不避烦赘，引述出来：

经费者，游学之母也。欲计游学，以筹经费为第一义，然吾国之人，往往以为至外国游学，费用不费，其实不然。日本物价，虽三倍于吾国，然一般学生社会，其节俭之状，较之吾国苦学之士，有过之无不及，故核算其费用，若力意减省，则吾国志士能自办者，尚不鲜也，今列举各项必不可少之费，说明如下：

第一节 学费

学费分为二种。一受验料，即资金是也。初入学时纳之。一授业料，即束修是也。官立学校，大抵分

二季或三季征收。私立学校，则有总征收者，亦有每月分征者，其额如下：

一、受験料

官立学校 自一元至五元不等

私立学校 自一元至二元不等

二、授业料

官立学校 每月自一元至二元五角不等（间有三元者）

私立学校 每月自一元至二元不等，每年以十月计算，夏季休假二月概不征收。

第二节 旅费

旅费者，专指住宿费而言。住宿有三种方法。一学校寄宿舍。一下宿（即常年租定客棧）。一租屋。三种之中，各有便利之处，听各人自定，其费约定如下：

一、学校寄宿舍，每月约五六元左右

二、下宿，分为三等。（下宿之外，复有所谓贷间者，即住家之中以其余屋出租之谓。其居停亦颇有极亲切者，价约与下宿等，而房屋较清静焉。）

上等 房屋每月约五六元

饭食每月约十元

中等 房屋每月约三四元

饭食每月约七八元

下等 房屋每月约二元

饭食每月约五六元

此外尚有炭费油费每月约一元左右。（又下人赏费一元或半元随意。）

三、租屋，每月房饭一切约十元至十二元左右。住宿之法，大都有此三种。寄宿舍价最廉，规则亦佳，惟与日本学生杂居，稍有不便，又学校不尽有寄宿舍，故不能一律而论。下宿最便利，一切均由旅店主人招呼，且随时迁徙，均可自由，惟下宿中人类最杂，良莠不一，交际最宜留心。租屋非得四五人不办。此法最为适意，一切习尚，可以从我之意，惟终日与本国人同居，语言之进步，不无稍阻，故最好俟半载或一年以后，然后约伴租屋，最为得计。此外又有寄居日本人家中之法，然中上之家，大抵不愿寄留外国人。下等人家，则又无味，故颇不易言，若得熟人能介绍至中上以上之人家居住，则更佳矣。

第三节 书籍及笔墨纸费

日本大学校及各专门学校，大都均用笔记。（即教师口讲而学生笔述之谓。）故用教科书者甚少。此所谓书籍，专指教科书而言。每月匀计约得二元左右已足。若论各种参考书，则需用甚多，不能豫定。至笔墨纸费，每月约一元左右。总计二项费用，每月约三元左右，然此固至简之数也。

第四节 杂费

杂费者，指一切零星费用而言。如剃头、洗浴、洗衣、新闻纸、邮票等类，每月节省用之，约三元左右可足。兹为略举各项价目如下：

剃头 每次一角二分或一角五分（辮发须随时自理，日本剃头店无能之者）

洗浴 每次二分（日人最尚洁，约间日须一次，学生社会均然）

洗衣 每件大者四分，小者一二分不等

新闻纸 每种约三角

邮票

其他杂费

第五节 衣服费

日本各学校，各有一定服饰，谓之制服，故凡入其学校者，必服其制服，以归一例。今就寻常学生衣服，约定价如下：

冬服一套 约八元至十元

外套一件 约八元至十元

夏服一套 约三元至六元

帽靴及衬衣等 约五元左右

衣服费约计如上，然此不必每年新做，故初到之时，费用稍大，此后不过随时添补而已。

第六节 交际费及旅行费

凡外国人与本国人不同。与日人来往，不能无应酬之举。譬如，教习及同学等，须随时酬劳之，则更加一层亲切，又或彼等先施，则不能无以答之，此交际费之所以不可少也。旅行费者，大都在假期中用之。各学校学生，至放假时，往往至各处旅行，或夏期至山中避暑，又有至各地方工厂学校等参观者，学

校给以凭票（惟官立学校有之），随处可以进去，谓之实地研究，又谓之修学旅行，此亦于游学最有益处，且可以借此入其内地考察一切，惟费用甚巨，不能豫定。以上二项，均随各人之境遇，以为支用之方，无从算入正项费用之内也。

以上所列，大概不出此数种。今就其至俭之数，核算一表如下：

	(月 额)	(年 额)
学费	1元至2元半	10元至25元
旅费	6元至9元	60元至90元
书籍、纸墨、笔费	3元	30元
杂费	3元	30元

夏期放假二月，不算在内。总算在内，则再加旅费及杂费二月可也。

总额 13元或18元左右 150元或200元左右
(夏期放假二月亦算在内)①

当时的留学程序，可以说是简单极了。

从去日本来看，可以说是花钱即买票，买票即上船，船靠日本码头即上岸，全无我们今日所必需的护照、签证等等。

从入日本学校来说，也是比较简单。官费留学生，须公使馆官员作保，持有关证件；入私立学校者，只须普通的中国人或日本人做下担保就可以了。

①《日本游学指南》，第23—27页。

关于赴日、入学方面的问题，章宗祥在《游学日本指南》中同样有较详细、具体的介绍：

游学有种种方法。启行时舟车一切，如何情形。到日本后如何情形，及进学校时如何办法，均游学者所急欲知之者也，兹分节略述之。

第一节 上路之情形

凡自吾国至日本，分为南北二大道。南省各地，以上海为出发之地。北省各地，以芝罘为出发之地。自芝罘动身，可买船票至神户。由神户换坐火车到东京，凡火车行十七点钟，计路程共十日。自上海动身，可买船票至横滨，换坐火车到东京，凡火车行一点钟，计路程共七日。若买票至神户，由神户坐急行火车至东京，则五日可到。到日本之第一埠，为长崎，其次为马关，其次为神户，其次即为横滨。各埠除马关外，均为从前通商口岸。吾国有领事馆焉。商人以广帮宁帮为最多。此外各帮均有。若有相识之人，则到埠停船时，可以上岸访之，托其引导一切，并可望其代为招呼，惟船每到埠，停几多时刻，及何时开船，均有一定，必须打听明白，先期回船，否则恐有失误，船或先开，受累不浅也。

凡自吾国至日本船只，有英国公司、法国公司及日本邮船公司。其中以日本船为最亲切便当。若言明留学生，则看待更好，其船中理事等，大都从学生出身，故于学生另有一番看待，盖同类使然也，其船价

分为三等，亦列举如下：

自芝罘至神户

一等 65 元 二等 45 元 三等 18 元

自上海至横滨

一等 54 元 二等 33 元 三等 12 元

自上海至神户

一等 42 元 二等 26 元 三等 10 元

凡轮船至神户或横滨后，须换坐火车，再到东京，其车价亦分三等如下：

自神户至东京

一等 12 元 二等 7 元 三等 4 元

自横滨至东京

一等 9 角 6 分 二等 5 角 6 分 三等 3 角 2 分

凡无论舟车，一等客舱，大抵系官员及富商等乘坐。二等及三等则寻常人均来坐之。日本学生，则往往坐三等者居多，取其廉也。三等舱固为最下，然较之吾国航船，及轮船之散舱，则舒服远矣。惟火车若行李过多，（凡行李以少为贵，衣服有学校制服，故可不必多带。中国书籍，固不可少，然有图书馆可以借阅，故不带亦可）则反不如坐二等之得，因各等应带货物，其磅数均有一定，三等磅数最少，而另加则甚昂，且路途稍远，须在车中过夜，则二等为最宜，三等则恐人数过多，不得坐地，晚上甚不便也。

第二节 到岸之情形

到神户或横滨上岸时，如该埠有熟人，可于到长

崎发一电报（价甚廉，不过一、二角），或发一信，嘱其某日某时，至该船来接，则一切可有招呼，否则可先至日本客栈托其招呼一切，亦甚妥当。凡船到埠时，即有无数接客，至船中招揽生意，身上均穿店中号衣，一望而知，可择定一家，将行李几件，一一点清，交付与渠，搬运一切，均听渠为之，万无一失。上岸时，即由渠引至店中，暂时休息，然后再托渠代买车票上京，最为妥当。（凡行李几件由本栈按数发出铜牌，到时凭牌领取，惟零碎小物，均须手携也。）日本客栈，大都均靠得住，其中招呼吾国人最熟悉者，今略举如下：

神户 田中屋

横滨 高野屋 山崎屋

上岸以后，行李一切，均须先搬至税关，待其查验，行李上可贴明留学生字样，关吏较为亲切，然万不可因此夹带私货，自失体面。又钥匙须随身带，否则匆促之间，欲开箱时，殊不便也。上京最终之停车场名曰新桥，此处即为东京。东京多少必有熟人，在未上车之先，可先发一电，言明某时开车，某时可到，嘱其来接，必可无误，否则下车后，可即至停车场侧，购买东洋车票，不必先付钱，但告以某处某地，到后然后照票付钱亦可。行李可暂存车栈，随后往取，惟铜牌万不可遗失。此最宜留意。凡初到时，总未免人地生疏，故在本国未动身之先，最好宜先托人介绍在东某人，则到后一切，即可由某人招呼，若毕竟无

人，则到京后，可坐车至中国公使馆，告明来由，托馆员或馆中留学生招呼一切，亦无不可也。

第三节 入学之情形

凡学校分为二种。一官立学校，即由国家设立者；一私立学校，即由民间设立者。进官立学校者，必须吾国钦使或领事等先行咨照彼国外部，转达文部，故必须钦使或领事作保。进私立学校者，则无须乎此，但须资格稍深者作保，或中国人或日本人，均无不可。官立学校，去年曾定外国留学生之例，今照译如下：

文部省直辖学校外国委托生规则（明治 33 年 7 月 4 日文部省令第 11 号）

第一条 凡外国人进文部省直隶学校（即官立学校），不照学校通则，于所定学科中，肄习一科或数科者，必须其本国公使或领事咨送，始能许可，作为外国委托生。

第二条 凡外国人入学时，必须其本国公使或领事之委托书，与入学志愿书，同呈于帝国大学总长或各学校校长。

第三条 帝国大学总长及各学校校长得以上志愿书时，必察看其有相当之学力，始能许可。其学力未到者，不在此例。

第四条 凡外国委托生，卒业时试验有成绩者，亦得给予凭据。

第五条 凡外国委托生，于一切受験料及授业料，可

免征收。(按此条近尚未实行,随各学校校长之意而定,有征收者有不征收者,不一例也。)

第六条 本令应有之细则,由帝国大学总长及各学校校长,经文部大臣之认可,随时定之。

第七条 本令施行之前,凡外国人已进各直辖学校者,以卒业为止,可以不在此例。

据以上规则,进官立学校之情形,可以概见。私立学校,亦大率类是,惟不必公使或领事咨送耳^①。

3. 一所中国人办的学校

在整个中国人留日运动史中,在日本,招收中国留学生的学校,应该都是日本人办的,实际情况也基本是这样。但是也有例外,有极个别的学校是中国人办的,这样的情况只有几例,其中除有的仅具有“补习班”性质,并非严格意义的学校外,有一所可以被称得上是学校,并且这所学校就出现在留日运动之初的19世纪末,那就是东京高等大同学校。

对东京高等大同学校,有的著述中称它是旅日华侨所办的“华侨学校”。这样说,也没错,因为它的确是旅日华侨所创办,而且也招收华侨子弟入学。但我们在这里将它列入在日本的招收中国留学生的学校,是因为,第一,它有别于其他华侨学校,如1897年冬,日本华侨在横滨成立的大同学校;1898

^①《日本游学指南》,第27—32页。

年日本华侨成立的横滨中华学校，这两所学校都是专门招收华侨子弟的学校，学校创办之初就是如此；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则不同，它既招收华侨子弟，又招收从中国来日的留学生。第二，东京高等大同学校（也有人称其为东京大同学校）主要是以招收中国留学生为主，也可以说是为招收中国留学生而设。

因此，我们既可以称东京大同学校是华侨学校，又可以说它是招收中国留学生的学校。

东京大同学校是东京成立最早的一所华侨学校，它是梁启超流亡日本后亲手创办的。

1898年9月21日，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黑暗的日子。腐败昏庸而又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调集重兵发动了戊戌政变，囚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捕维新派于京城内外，杀“六君子”于菜市街口，废维新政令于朝夕之间，一场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和洋务运动破产以后，重新确立新政治目标的戊戌变法，一场来去匆匆而又把中国的文化思潮带进新阶段的维新，就这样被扼杀了。

维新派被屠杀，被通缉，康有为侥幸脱险，梁启超也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逃亡日本。

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十分重视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戊戌政变后到日本的第二个月，他就创办了立宪色彩浓郁的《清议报》，后还与孙中山合办两期《中国秘史》杂志，创办《新民丛报》、《小说月报》等，他曾说：“徒以现今之组织，循而不改，不及三年，国心大乱，而至于亡。”^①正是在这种思想

^①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年，第195页。

指导下，梁启超创办了东京高等大同学校。

1899年9月，“梁启超向横滨华商郑席儒、曾卓轩等募款三千元，创设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牛込区东五轩町。从学者有前湖南时务学堂旧生林锡圭（述唐）、秦鼎彝（力山）、范源濂（静生）、李群（彬四）、蔡良寅（松坡，后改名锜）、周宏业（伯勋）、陈为璜、唐才质（法尘）、蔡钟浩、田邦璇、李炳寰等十余人。横滨大同学校学生冯自由、郑贯一、冯斯栾、曾广勳、郑云汉、张汝智等七人。梁自任校长，日人柏原文太郎为干事。”^① 柏原文太郎是日本进步党首领犬养毅的代表，有材料说他是学校的教务长。

梁启超创办东京高等大同学校是准备重新培养人才，积蓄力量图谋再举，所以这所学校虽说是招收中国留学生的学校，但却与其他日本人创办的招收中国学生的学校迥异，校内不用日语授课，而是用汉语授课，其学生多不是为留学而来，是为学习政治而来。

学校的生源一是招收日本华侨的子弟，二是招募国内的进步学生。

后来成为著名护国军将领的蔡锷便是被招募来的。

梁启超创校伊始，便想到了他在国内时的门生蔡锷，于是秘密寄信回国，召唤蔡锷到日本去深造。

蔡锷，1882年出生于湖南邵阳县，1897年考入湖南时务学堂。次年，谭嗣同被征召进京，擢任四品军机章京，入值内廷，参与新政。离湘赴京的前夜，蔡锷去看望恩师谭嗣同，谭

^①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72页。

说，现在国家最需要的是人才，“昨日，卓如也有信来，要我们立即从时务学堂和其他书院学校生员中，挑选出七八十名最优秀的青年，送往日本去留学，学习东西洋列强的成功经验，然后回国来改革我中国的社会、政治与经济，从事新政建设。这是极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已经请示督抚及有关各方，立即筹措款项，着手施行，很快就将招考，一两月内即可成行。你素质很好，志向亦坚，一定要去投考，争取这个机会，出国去深造，以便学成归来报效国家。”^①

谭嗣同走后不久，湖南署抚和学台衙门就制定并公布了招收70名学生赴日本留学的办法，并立即举行了招生考试。

蔡锷兴奋地报了名，考试的结果是，在70名录取生中，他考了第三名。这一年他刚刚16岁。

其时，中国的留学日本政策刚刚确立，留学生极少，能够考上公费生，是件很荣耀的事，“不仅是他的亲人家属，乡党邻里，都为之欣喜，甚至整个家族，全县邑人，也都引以为荣，敲锣打鼓，披红挂彩，争相来舍，鸣炮贺喜；有的还捐资赠款，为他筹措盘缠，整治行装，设宴壮行。”^②

蔡锷尚未成行，社会风云突变，戊戌政变发生，百日维新夭折，湖南时务学堂被撤消，学生被遣散，正要派遣学生留学日本的活动也被勒令禁止了。

蔡锷留学日本未能成行，便与时务学堂的同学范源濂、唐才质三人前往武汉。在武汉，他们入学无门，正在无路可走之

^①任光椿：《将军行——蔡锷传》，团结出版社1996年，第18页。

^②任光椿：《将军行——蔡锷传》，第19页。

时，突接梁启超的密信，三人便结伴共同赴日，进入了东京高等大同学校。

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内政治气氛浓烈。康有为流亡加拿大等国期间关心大同学校，梁启超更是关心大同学校，他们都把大同学校看成是培养政治人才的海外摇篮。另一方面，孙中山在流亡日本期间，也极为关注大同学校。

在学校内，不仅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政治意识强烈，就连其所招收的日本华侨子弟学生的政治意识亦同样强烈。

冯自由是来自横滨大同学校的华侨学生。其父冯镜如，在日本经营一家文经商店，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后，这家商店便成了中国革命党人在日本的一个活动据点。冯自由从小受西方自由民主、天赋人权诸说的影响，又受革命环境的熏陶，入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后，其室内高悬自撰自书对联一副：“大同大器十九岁，中国中兴第一人。”他又自撰自书《爱国歌》一首，贴于墙壁之上，歌云：“懋龙少年负奇气，折天誓拯神州弱，每闻时事怒冲冠，要把强夷一缚。”冯自由原名懋龙，入东京高等大同学校时正值19岁，其激昂的政治言辞令人刮目。

政治意识的强烈，使大同学校的学生参与了很多政治活动，如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等，也培养出了日后多从事社会活动的人才，如范源濂等。

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后因梁启超离开日本而发生了一系列变故。

1900年自立军起义失败，康有为对梁启超在日本过激的言论与行为不满，派人携款至日本，逼梁启超赴檀香山。梁启超离校后，由流亡来日的麦孟华代理校务，其后，“麦以诸生

咸心醉民族主义，与保皇会宗旨不合，遂废止汉文讲习，而改为攻读日文之专修学校。及汉口之役失败，校中经费不继，势将解散，乃由日人柏原向日政党募款，在小石川区建筑新校舍，易名曰东亚商业学校。除旧生外，新生由本国来者颇不乏人，王宠惠、蒋尊簋、蒋方震，其最著者也。”^①

更名大会上，与会者“为日本伯爵前总理大臣大隈重信、伯爵东邦协会总理副岛重臣、公爵贵族院议长近卫笃磨，其他之名之士不计其数。而旅横滨经商支那有志之士，亦不下百数十人。”^②

从此，这所学校由创办之初的注重政治学习转向了注重商务学习。

再后来，“此校续办二年，复以无法维持，改由清公使蔡钧接办，更易名清华学校。”^③

4. 中国留学生与戊戌流亡者

19世纪末期，中国留日运动刚刚开始，恰巧这一时期又值中国戊戌变法失败，变法的领袖人物除谭嗣同等人被杀外，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逃亡日本，于是，在其时人数尚不多的中国留学生队伍中，就有了相当一部分人同戊戌流亡者们有了

^①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72—73页。

^②秦力山：《开办东亚商业学校记》，《清议报》第78册（1901年5月9日）。

^③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73页。另有一说：“犬养毅任校长，柏原文太郎及湖北留学生总督钱恂二人同任监督。”（实藤惠秀著 谭汝谦 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第28页。）

各种各样的交往，这些交往成了留日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康、梁流亡日本伊始，立刻成了当地的新闻人物，也成了中国留学生追逐、崇拜的对象。

围绕在康、梁周围的中国留学生，有追随他们而去日本的戊戌流亡者，有他们抵日后召唤而去的胸怀变革中国社会大志的青年，还有先他们而去的赴日留学生。

与康、梁交往较多的留学生，当属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的学生。

戊戌变法失败，康、梁等维新派匆匆走上了流亡道路。寄寓海外的维新派同所有的流亡者一样，难免要产生分歧，要争吵不休，要重新分化组合，要打出各种各样的旗帜。历经海外的风风雨雨，戊戌流亡者们也产生了分歧，康有为高举保皇派旗帜，梁启超高举立宪派旗帜，章太炎高举革命派旗帜。留日学生就在这一面面的旗帜下，与流亡者们保持了或疏或密的关系。

康有为流亡日本后，仅过5个多月，他就无奈地离去，因为清政府不断地向日本政府提出引渡，密令中国驻日公使馆实施暗杀。他亡日时间虽短，但他对留日学生的影响却很大。这里所说的有影响，并不是等同于赞成，其中也有不同的声音。

一次，在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内，康有为的门人、学校的主事人之一麦孟华与留学生们闲聊时说：“唉，现在我们讲课、作文都有许多难处，康先生要求极严，决不准我们的议论或作文中出现任何‘独立’、‘平等’、‘自主’等字样，尤其厌恶‘自由’二字，一经发现，便严加呵责，追究不已。卓如兄最近出版一本《饮冰室自由书》，被康先生发现了，便来信责问，硬要卓如兄去掉‘自由’二字。卓如无奈，只好将‘自由’改

为‘自立’，康先生才勉强罢休。卓如兄尚且不敢有丝毫违拗，何况我辈，更有什么办法。”

麦孟华在政治主张上是倾向于康有为的。连他都如此无奈，可以想象别人会是怎样。

麦孟华说话时面带愁容，众学生中的冯懋龙一听则火了，他站起来大声叫道：“这是什么话！平等自由乃人类天赋之权，西方列强富强之道，当今时代之潮流。西方有格言云：‘不自由，勿宁死！’有法律云：‘侵人自由为最大的犯罪。’这老康如此专制，哪有些许现代人的气味？时至今日，唯有身负奴隶根性而又不能自我解放者，始屈从于他人耳！我却不愿屈从于他。现在，我当众宣布：从今日起，我冯懋龙立即改名为冯自由，并宣誓终生为自由而奋斗，看看谁敢来干涉我！”^①立刻有留学生表示赞同冯懋龙的观点。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有的留学生既把康有为看成是变革的领袖，但又不赞同他的保皇派主张。

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流亡日本的时间要长。梁启超亡日期间，直接主持创办了东京高等大同学校，亲自招募来了一批中国留学生入校学习，因此他同留日学生的接触更多，更直接。

梁启超在日期间，思想上经历了较大起伏和变化。他进一步信仰社会达尔文主义，大力鼓吹新民与自由，革命与破坏，排满与共和，突破了维新变法、改良的羁绊，最后终于坚定地举起了立宪派的大旗，他也成了立宪派的思想主帅和精神领袖，由此也决定了他与留日学生接触更密切。

^①任光椿：《将军行——蔡锷传》，第24页。

梁启超创办学校，接触留日学生，意在栽培未来的政治力量。一方面，他参与策动了自立军起义；另一方面，他又对参加起义的留日学生格外关护。

1899年冬季的一天，梁启超等人为即将归国举事的唐才常、林锡圭在东京红叶馆设宴饯行，孙中山、陈少白、平山周、宫崎寅藏等中国革命党领袖和日本友人也前往参加。血战在即，生死当前，群情激昂，慷慨话别，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概。

此情此景，参加饯行的留日学生热血沸腾，纷纷要求同回国内参加战斗。此刻，梁启超毕竟还很冷静，他拒绝了几位欲离校返国的学生的请求。

饯宴会结束，蔡锷、唐才质等人回到学校，连夜再找梁启超。梁说他们年纪还小，学业要紧，不同意他们过早地投入冒险行动。他说：“你们的心意，我是很明白的。今日的中国，专制独裁黑暗腐朽愚昧落后，瓜分之兆，已迫在眉睫，凡我血性男儿，忧国志士，谁不焦虑？谁还能安心坐在书斋里平静地读书？你们对复生师的感情和复仇之心，我也都能体味。我同谭复生的交谊也是很深的。北京诀别时，他对我讲的那些话，时时都如暮鼓晨钟，滚滚春雷，长鸣在我的耳畔，轰响在我的心头。这样一位一心为国为民，无私无畏的奇男子，竟然遭到杀害，伏尸街头，谁又能不痛心切齿？！但是，大丈夫生世间，固当为国家民族立大志，建大功，创大业，造福万民，流芳后世，方不负此一生，切不可轻举妄动，因小忿而乱大谋。而图大事者必须谋深虑远，待时而动，忍人所不能忍，耐人所不能耐，岂可逞一时之忿，感情用事，轻易冒险，满足于匹夫匹妇

之勇哉？你们年纪都还很小，十七八岁，脑力正健，根基又好，正宜乘此人生最宝贵之时光，刻苦学习，丰富自己，待学业成就之后，再去报效国家，才能有大的建树和更好的奉献。古人云：‘十年面壁’，‘百年树人’，‘大音希声’，‘大器晚成’就是这个道理。这次起义，有佛尘、锡圭、力山他们去办就行了。他们年龄比你们大，经验比你们足，朋友比你们多，情况比你们熟，会有成功之望的。至于你们，我看还是先安心在这里学习为好。”^①

后来在二人的强烈要求下，才同意了他们回国参加战斗的请求。

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的维新派中的一些人转入到了革命派阵营，代表人物是章太炎等一批革命家，其中也还有人是在留学日本过程中实现转变的。

在留日过程中成为革命派的，秦力山是较典型的一位。

秦力山，名鼎彝，号俊杰，早年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戊戌政变后，他为新学新政顿遭摧残而扼腕痛惜。不久，他应梁启超之召而自费赴日留学，就读于东京高等大同学校。

在其他留日学生看来，秦力山丰神秀朗，热情洋溢，在社会活动中显得十分活跃。人们知道，他与孙中山结交甚早，在他留日期间，孙中山恰好也在日本流亡，孙中山与中国留日学生之间的联系，多是由他居中沟通。

秦力山还是章太炎的挚友，章太炎曾亲自为他作传，由此可见二人关系之密切。另外，章太炎与孙中山在日订交也是由

^①任光椿：《将军行——蔡锷传》，第28页。

他牵的线，所以云南革命党人誉其为“革命先觉”。

第 三 节

离开日本后的中国留学生

1. 首批留日学生的不同归宿

唐宝锷、戡翼攀等十三人，是近代中国人留日运动的先驱，先驱者的足迹就不会平坦。留日之时，他们还是 18 至 24 岁的青年，陌生的国土，生疏的环境，甚至还有民族间的隔阂、敌视，突然间一齐向他们压来，使他们有了一些窒息感，无法言状的郁闷和痛苦折磨着他们，不习惯的饮食困扰着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十三人出现了不同的结果：有人中途退学，有人 3 年后从东京高师毕业即归国，有人从东京高师毕业后留在日本继续深造。从十三人后来的人生道路看，结果也不相同：有人“青史留名”，成为了中国社会某一方面的专门人才，有人成了销声匿迹、默默无闻的普通国民。

十三人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不到两三个星期，有四人因经受不住日本顽童“清国奴”的叫骂和难以下咽的饮食，愤愤而又无奈地离日回国。

再后，又有两人退学归国。

1899 年，余下的七人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嘉纳治五郎发给他们的毕业文凭上写着，他们修业的“正科”为日语，“别科”为化学、物理、数学等。唐宝锷后来回忆说，嘉纳治五郎认为，毕业七人的学业水平，约略高于高等师范学校

附属中学三四年级的程度^①。

下面，再对十三人的情况作一分述。

唐宝锷从东京高师毕业后，进入东京专门学校，再转入由该校升格而成的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1905年毕业归国。

戢翼翬从东京高师毕业后，就读于亦乐书院和东京专门学校，长时间在日本从事编译等活动，1908年归国。

胡宗瀛从东京高师毕业后，考入东京专门学校，晚年曾在伪满洲国财政部任职，后任伪满洲国矿山公司理事。

朱忠光从东京高师毕业，曾任四川候补道，后任奉天铁岭交涉员。

吕烈辉从东京高师毕业，归国后曾任高等判事、学校教授。

吕烈煌从东京高师毕业，归国后曾任外务部翻译科科长。

冯阎谟从东京高师毕业，曾任北京师范大学翻译、陆军学校翻译，后任主事。

金维新、刘麟二人中途退学。

韩筹南、李澄清、王某和赵某，入东京高师两三个星期即退学归国。

在十三人中，以唐宝锷、戢翼翬的事业成果最为显著。

唐宝锷祖籍广东香山县唐家村，18岁时留学日本，是十三人中年纪最小者，从东京高师毕业时，他是十三人中成绩最优者。归国后，考试及进士，后多次到日本视察，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随清政府出洋政治考察大臣出访日本；1920年随赴

^①实藤惠秀著，谭汝谦 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0页。

日本记者考察团出访日本；1922年赴日本参加和平博览会等等。

后来北京、天津等地相继开设法律事务所，从此唐宝锬长期担任中国律师公会会长，成为了中日之间的法律问题专家。

唐宝锬的事业成就还反映在著译著作上。他一生共有著译17部：

- 《东语正规》（合著）
- 《日本刑法注释》
- 《日本刑事诉讼法注释》
- 《宪法访问录》
- 《司法访问录》
- 《铁道访问录》
- 《教育制度访问录》
- 《汉译日本铁道制度汇编》
- 《日英美德法比六国司法制度》
- 《日本明治维新概要》
- 《欧战中立条例补遗》
- 《中国与国际法之关系》
- 《清朝司法辩言》
- 《中华民国党派沿革考》
- 《朝考卷》（殿试答案）

《日本陆军刑法》^①

戢翼翬留日期间曾返国参加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起义失败后又返回日本学习。他的事业主要反映在两个时期，一是在日本时期，二是归国后的时期。

自入东京专门学校起，戢翼翬就开始了文化社会活动。他与留日学生共同创建了译书汇编社，大量翻译及出版日文书籍。

译书汇编社 1900 年成立于东京，在上海设有总发行所。这是中国留日学生第一个译书机构，其成员有：

- | | |
|-----|----------------|
| 戢翼翬 | 字元成，东京专门学校毕业生 |
| 王植善 | 字培菽，上海育才学堂总理 |
| 陆世芬 | 字仲芳，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学生 |
| 雷 奋 | 字继兴，东京专门学校学生 |
| 杨荫杭 | 字补塘，东京专门学校学生 |
| 杨廷栋 | 字翼之，东京专门学校学生 |
| 周祖培 | 字仲荫，前东京专门学校学生 |
| 金邦平 | 字伯平，东京专门学校学生 |
| 富士英 | 字意诚，东京专门学校学生 |
| 章宗祥 | 字仲和，帝国法科大学校学生 |
| 汪荣宝 | 字袞甫，庆应义塾学生 |
| 曹汝霖 | 字润田，明治法学院学生 |

^①实藤惠秀：《中国留学生史谈》，东京，第一书房 1981 年，第 15—16 页。

钱承志 字念慈，帝国法科大学校学生

吴振麟 字止欺，帝国法科大学校学生

译书汇编社的译书办法是将单本日文书译出，分期连载于《译书汇编》杂志上，然后再出单行本。因其成员多为政法专业留学生，故所译书籍多为政法方面。

该社成立第一年刊行了下列单行本：

(书名)	(著者)	(译者)
波兰衰亡战史	涩江保	译书汇编社同人
国家学原理	高田早苗	嵯 镜
国法学	岩崎昌 中村孝	章宗祥
各国国民公私权考	井上毅	章宗祥

1901年7月30日发行的《译书汇编》第7期的“已译待刊书目录”列有如下书籍：

(书名)	(原著者)
政治进化论	[英] 斯宾塞尔
社会平权论	[英] 斯宾塞尔
教育论	[英] 斯宾塞尔
政党论	[德] 伯伦知理
今世国家论	[法] 鲍罗
理学沿革史	[法] 阿勿雷脱

欧洲文明史	〔法〕尼骚
教育论	〔法〕卢骚
平民政治	〔美〕勃拉司
政治泛论	〔美〕威尔孙
社会学	〔美〕吉精颜斯
教育论	〔美〕如安诺
东西洋教育史	〔日〕中野礼四郎
美国民政	〔美〕莫里
国际论	〔日〕陆实
国法学	〔日〕有贺长雄
文明之概略	〔日〕福泽谕吉
明治历史	〔日〕坪谷善四郎
外交通义	〔日〕长冈春一
加藤讲演集	〔日〕加藤弘之
国际法论	〔法〕罗诺而
自助论	〔英〕斯迈尔
新闻学	〔日〕松本君平
国家学原理	〔日〕高田早苗
近世二英雄传	〔英〕格里飞司
经济学史	〔日〕井上辰次郎
俄罗斯史	〔日〕山本利喜雄
十九世纪	〔日〕博文馆编
丈夫之本领	〔日〕铃木天眼
政教进化论	〔日〕加藤弘之
近世海軍	〔日〕福本诚

近世陆军	〔日〕新桥荣次郎编
万国国力比较	〔英〕默尔化
国法学	〔日〕岩崎昌、中村孝

另据《译书汇编社出版及发行书目》，可知该社还有下列译书：

欧美日本政体通览
日本制度提要
法律学论纲
最近俄罗斯政治史
法制新编
欧洲财政史
日本财政之过去及未来
美国独立史
日本维新活历史
名学
物竞论
生物之过去及未来
论理学
女子教育论
比律宾志士独立传
累卵东洋
爱国精神谭

学校建筑模范图^①

译书汇编社成立早，译书多，对中国留日学生影响很大，对国内也有相当影响，其所译政法书籍被近代学术界认为是最早向中国系统介绍西方政治学和法学的著作，“促进吾国青年之民权思想，厥功甚伟。”^②

戢翼鞏归国后的主要事业成果，主要反映在创办作新社上。

作新社是戢翼鞏等留日学生在上海创办，在东京设有发行所，其译作偏重于介绍进化论、民约论和世界近代史，以宣传救亡图存为宗旨，重要译作有加藤弘之著、杨荫杭译《物竞论》，羽化生编译的《英国维新史》，作新社译的《最近外交史》，松平康国编、作新社译的《世界近世史》，其中卢梭的《民约论》（今译《社会契约论》）是第一个完整中文译本，该书由日本原田潜译成日文《路索民约论》，杨廷栋又从日文转译^③。

另外，唐宝锷与戢翼鞏合著的《东语正规》，是中国留学生出版的第一本研究日本语的书籍，实藤惠秀誉其为“是划时代的日语教科书”，“对后来的留日学生有很大帮助”^④。

从以上的叙述看，唐宝锷等十三人留日，至少可以给后人以下启示：一，开创了近代中国人留日的先河；二，他们在不

^①以上译书目录见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18—221页。

^②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144页。

^③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5页。

^④《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1页。

同的方面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三，留日运动不平坦，有成功者，也有无功而返者。

2. 自立军起义中的留日学生

1900年8月，自立军起义发生。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对自立军起义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次起义也是留日学生的一次重要斗争实践。

自立军起义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唐才常领导发动的。

唐才常，1867年生于湖南省浏阳县，1887年入长沙岳麓书院肄业，兼在校经书院附课。1891年冬，应四川学政瞿鸿禨聘任教读，兼四川学署阅卷总校。1894年春，考入武昌两湖书院。

戊戌变法时期，唐才常曾在湖南兴办算学社、群萌学会，编撰《湘学报》、《湘报》，积极主张变法维新，与谭嗣同同属改良派的左派。1898年9月，他应谭嗣同的电召，欲赴北京，参与政事，甫抵汉口，政变猝起，于是折回湖南，前往上海。其后，周游新加坡、香港、日本等地。在海外期间，思想受到革命思想的沾染，一度表现比较激进。

1899年秋，唐才常经香港、南洋重赴日本，在横滨见到孙中山。孙中山这时正积极部署革命斗争，酝酿惠州起义，唐才常受其启发，开始酝酿起义之事。

义和团反帝运动发生后，流亡海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想乘机勤王，救出皇帝继续维新变法，因而酝酿东南独立；革命派则派郑士良入惠州，史坚如入广州，部署发难，要推翻清朝政府。唐才常利用这种时机，在日本进行起义的准备活动。他

“对康、梁则曰勤王，对留学生则曰保国保种”，^①并把1899年冬在上海成立的正气会改为自立会，组织自立军。

留日学生对自立军起义所做的贡献，首先表现在策划起义于日本。

自立军起义，有康有为的授意和梁启超等人的参与策划。参与策划的，还有留学生秦力山、林锡圭等人。经他们的反复策划，决定派人回国，在长江沿岸联络会党，策反新军，发动民众，起兵勤王，先占领长江沿岸各重要口岸，并以武汉为根据地，夺取汉阳枪炮厂的武器，然后扩军北上，直捣幽燕，拥光绪帝复位，继续将维新大业进行到底，将中国建成为一个虚君立宪的现代民主国家。

在起义前的组织工作上，他们决定，康、梁负责向海外华侨募集饷糈，唐才常等人运动各省会党和新军发难。

运动会党参与起义，是起义组织者的一个重要决策，他们把会党的参与看成是起义成功的保证之一，梁启超、唐才常以及林锡圭、唐才质都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目前起义，只能依靠会党势力，先借助会党的力量，打垮满清军队和封建政府，然后再图建设与改造。为此梁启超参加了势力很大的会党三合会，成为该会龙头大爷，企图掌握该会以成大业。

对于如何看待会党的作用，在研究起义的步骤和方法时，蔡锷则与众人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会党势力当然也可以适当地有选择地予以利用，但是，会党人员芜杂，又有浓厚封建意识，难以成就大事，因此不可能作为主要的依靠。起义的

^①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76页。

主力，还应该是经过训练的有组织的军队。真正起义了，打起仗来，没有正规的军队，也是不行的。因此，他认为当前最要紧的工作，还是要深入各地新军队伍中，做好宣传、串连工作，以忠君爱国思想激励新军军官后，发动他们起来勤王讨贼，支持维新变法，起义才有成功的希望。”^①看来，蔡锷的主张是比较贴近实际的。但是，当时的蔡锷，在别人看来还是个不满 20 岁的“孩子”，他的思想不可能成为影响决策的观点。

其次，留日学生对自立军起义所做的贡献，表现在离日举事于国内。

1899 年夏天，唐才常偕林锡圭等人回国做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离开日本前，孙中山给予了他们实际的支持。孙中山为他们介绍了汉口某俄国商行买办、兴中会员容星桥，又派毕永年偕日人平山周赴湘、鄂各地视察哥老会实力。毕永年到汉口后，会同林锡圭等人往返湘、鄂，联络哥老会党。林锡圭在给容星桥的信中说：“满事未变（按指戊戌政变）以前，中峰（指孙中山）主于外；既变而后，安兄（指毕永年）鼓于内。考其鼓内之始，安兄会中峰于东而议定，与平山周游内至汉会弟，乃三人同入湘至衡，由衡返汉，其中入湘省一度，乃得与群兄（指各哥老会龙头）定约。既约之后，赴港成一大团聚。

^①任光椿：《将军行——蔡锷传》，第 29 页。

于是本公司之名大噪，而中峰之大英豪人人始得而知仰企矣。”^① 这说的，即是指自立军与会党联合筹商起义之事。

归国后，唐才常为起义还做了其他军事部署。他成立了自立军，自任总督办，下设七军：秦力山为前军统领，驻大通；田邦璇为后军统领，驻安庆；陈犹龙为左军统领，驻常德；沈荇为右军统领，驻新堤；林锡圭为中军统领，驻汉口；另外还有总会龙军和先锋军，自立军的势力遍及湖北、湖南、安徽诸省及宜昌、荆州、安庆等地。

自立军计划于1900年8月9日在汉口、汉阳及安徽、江西、湖南同时起事。

不幸的是，起义前，秦力山在大通组织起义的活动，被安徽保甲局爪牙许鼎霖侦破，被迫提前仓促起事，打乱了整个自立军起义的计划。秦力山率领起义军，散发“安民”告示，用“讨贼勤王”的名义占领了大通县城，与清军激战七昼夜，终因兵力不敌，于11日失败。

自立军在汉口也受顿挫。他们在汉口英租界李顺德堂和宝顺里的秘密据点相继遭到破坏。秦力山大通失败后，唐才常再定于8月23日发难，未及举事，清政府勾结英军警，将唐才常、林锡圭、李炳寰、田邦璇等捕获，自立军骨干被一网打尽，起义以失败告终。

据统计，在整个自立军起义的成员中，骨干成员共有50余人，其中林锡圭、秦力山、吴禄贞、戢翼隼、沈翔云、黎

^①林锡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筹划起义书》，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63页。

科、傅慈祥、蔡丞煜、刘伯刚、吴念慈、李炳寰、蔡钟浩、田邦璇等 20 多人是留日学生；林锡圭、李炳寰等 10 多人为此献出了生命。由此可以看出，留日学生为自立军起义做出了多么大的贡献。其详情可见下页表^①。

参加起义的留学生，戢翼翬、吴禄贞、秦力山等人幸免于难。在幸免于难的留学生中，还有两人，即蔡锷和唐才质。

蔡锷和唐才质为参加起义回到上海后，唐才常并没有给他们俩安排什么任务，理由是他们年纪还太轻，不想让他们过早地卷入险恶的社会斗争中。这是说出来的理由，这其中恐怕还有未说出来的理由，那就是除了他和唐才质的特殊关系外，还因为蔡锷、唐才质所以能够留日还和他的支持有一定关系^②，故此会对他二人有些许怜惜、照顾之意。

在蔡锷和唐才质的执意要求下，唐才常给他们安排了危险性较小的工作：唐才质留上海，做起义的后勤工作；蔡锷回湖南，与新军联系，伺机策动新军起义。

蔡锷回湖南后，投奔新军威字营统领黄忠浩，黄忠浩知其来意，便以礼相待，虚与委蛇，口头答应支持自立军起义，实际上拖延时日。待到自立军起义计划泄露后，黄忠浩出于惜才之意，为蔡锷觅得一艘洋商货轮，并派几个亲信兵弁，乔装改扮，护送他离湘去沪，再逃往日本。

^①沈殿忠等著：《中日交流史中的华侨》，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441 页。

^②唐才质后来在《唐才常烈士年谱》中有言：“（一八九九年）秋七月，公资送范源濂、蔡良寅（后改名锷）、唐才质赴日本留学。”可知支持之意。见《唐才常集》，中华书局 1982 年，第 274 页。

自立军起义中部分留日人员情况一览表

姓名	籍贯	留日时间	留学校	返回时间	自立军中职责情况	起义失败后去向
林錫圭	湖南	1899	东京高等大同学校	1900	主持自立军事，汉口中军统	殉难
秦力山	"		"	"	皖省大通难之责	逃亡日本
李炳寰	"		"	"		殉义
田邦璇	"	1899	"	"	安庆发难之责	遇害
蔡忠浩		1899	"	"		在湘被逮死亡
黎科	广东	1899	东京帝国大学	1899		就义
郑葆丞	福建		东京日华学堂	1900		殉义
傅慈祥	湖北		成城学校	"		"
蔡丞煜	直隶	1899	东京日华学堂	1899		就义
戴翼攀	湖北	1899		1900		避匿友人家
安煌琮	不详	1899	东京日华学堂	"		起义死于汉口富有票之役
沈翔云	浙江	1899		"		其后发刊国民报于东京
吴禄贞	湖北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参与自立军之役	逃亡，返日本士官学校
刘百刚	湖北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与庚子自立军有关	
吴念慈	"		"		"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参与起事的留日学生幸免于难者，一部分再返日本，重新走上了留学道路，如秦力山等人，从此完全脱离了保皇派，投入了革命派旗下。

3. 留学生结业后的不同流向

在中国近代发生的留日运动序幕阶段里，有 200 余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在历史跨入到 20 世纪后，这些学生也基本结束了第一阶段的留学生活，随之而来的，是他们下一阶段的人生道路。这一阶段的留日学生，他们在此后的阶段中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有了不同的生活选择。概括起来说，他们的流向主要有：

第一阶段的学业结束后即行回国；
先归国继之又返回日本重续学业；
入日本的高等院校继续深造。

在这一阶段中，还有另一种情况的留学生，即他们的第一阶段留学生活本身就没有结束，自然仍在日本进行学习，由此而成了“跨世纪”的留学生。

因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下面仅就上述情况进行简要地加以阐述。

第一，结束第一阶段学业后随即归国的大有人在，这一种流向在其后几十年的留日运动中一直存在，很多留日学生在日本期间只完成初级阶段的学习，或甚至是仅仅学了日语，其他专业课程没有涉猎或涉猎很少。这一点也有别于留美学生。中国近代以来的留美学生基本都完成了较高程度的专业学习。

第二，先是回国，继之又再返日本，重续学业。这一方面

的典型人物莫过于蔡锷。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蔡锷侥幸逃回日本，为排遣心中的郁闷，作了一组诗《杂感十首》：

拳军猛焰逼天高，灭祀由来不用刀；
汉种无人创新国，自将庞鹿向西逃。

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
湖湘人杰消沉未，敢谕吾华尚足匡。

圣躬西狩北廷倾，解骨忠臣解甲兵；
忠孝国人奴隶籍，不堪回首瞩神京。

归心荡漾逐云飞，怪石苍凉草色肥；
万里鲸涛连碧落，杜鹃啼血闹斜晖。

卅年旧剧今重演，依样星河拱北辰；
千代湘波长此逝，秋风愁煞屈灵均。

哀电如煌飞万里，鲁戈无力奈天何；
中原生气戕磨尽，愁杀江南曳落河。

天南烟月朦胧甚，东极风涛变幻中；
三十六宫春去也，杜鹃啼血总成红。

贼力何如民气坚，断头台上景怆然；
可怜黄祖骄愚剧，鸚鵡洲前戮汉贤。

烂羊何事授兵符，鼠辈无能解好谏；
驰电外强排复位，逆心终古笔齐狐。

而今国士尽书生，肩荷乾坤祖宋臣；
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囷。

起义失败使蔡锷认识到了，仅凭“书生”之为改变不了中国的面貌。由此他毅然弃置文墨，投身军事，进入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

第三，入日本高等院校继续深造学习的，也有一部分人。该种情况我们从范源濂身上可以看得出来。

梁启超、唐才常与中国留日学生共同在日本策划自立军起义之事时，范源濂说：“（起义）不是根本之计。要救中国，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普及现代教育，非先以爱国主义和进步思想教育国民不可。如果我同胞都具有现代文明素养，懂得爱国，知道怎样爱国，知道怎样维护和发挥自己的民主权利，以监督政府，推动社会进步，中国的事情也就好办了，不愁不富强了。如果老是像现在这样，百分之六七十、七八十的人，都是文盲和半文盲，处于愚昧落后之中，我们就是起义一百次一千次，国家也还是无法富强的，……目前我们还是应以学业为重，从根本上做起，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地做去。轻举妄动，急躁冒

进，看似爱国，实则误国，那是没有什么好处的。”^①

基于上述认识，很多留日学生回国发动起义时，范源濂果然仍留在东京高等大同学校继续学习，后来则在由大同学校改成的东亚商业学校继续深造。

范源濂留日期间，还积极推动留日运动的发展。1904年，他回到家乡湖南，倡议送女学生到日本学习师范教育，经过一个多月的奔波，招收到20名女生，亲自领到日本，送入东京实践女学校，这一做法推动了中国女学生留学运动的发展。

留日归国后，范源濂积极从事教育活动。1905年，任北京政法学堂学部主事。1906年，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创设了殖边学堂，教授蒙藏语言和垦殖等功课，接着又筹办师范学堂和清华学校。1909年冬天，他发起组织尚志学会，附设医院和学校，编译文化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1910年开始，他先后任学部参事、教育次长、教育总长等职。他多次到美国考察美国各州教育实际状况，特别是农村教育。1923年，他到英国，参加讨论返还庚子赔款等问题，主张设立各种研究院、图书馆、补助留学经费。为宣传中国文化，主张在国外设立中国学术讲座。1924年，担任了中国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长。

综观范源濂的一生，他确是都在为教育事业而耕作。

近代中国留日运动虽然发生于1896年，但最初阶段仅有十三人，随后的几年时间内，人数增加缓慢，至1901年，有

^①任光椿：《将军行——蔡锷传》，第30页。

相当一部分留日学生去日本时日不多，还正在进行第一阶段的学习。这一点，从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尽管很早、很积极的湖北的情况也会看得很分明。

湖北派遣留日生最早议于1897年。当时日本使馆附参谋大佐神尾光臣到湖北访问张之洞未晤，与江汉关道与洋务委员畅谈所谓中日同文同种同教，称甲午之战“彼此有误”，提出中国派员赴日学习军事，以此作为“两国重新联交之始”。张之洞于同年12月2日致电神尾，邀其再来鄂商议。日本派参谋部员陆军少佐宇都宫太郎与张之洞会谈。12月30日，张之洞电奏日本人：“言今日武备最要，嘱派人到彼，入武备及各种学堂。”^① 1898年1月18日，张之洞致电总署称：“日本人力劝华人入彼学习，拟明春派学生赴东洋（电日尚为阴历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入武备农工各学堂。”^②

1898年春夏，张之洞与湖南巡抚陈宝箴电商，最初设想“鄂拟派学生百人，分两起往，每人岁需费四百元，较西洋所省过半”，“湘自湘、鄂自鄂，分为两局，各办各事。”^③ “送学生往东事，此时尚有不便，稍缓具奏时，自当将湘省之五十名，并案会奏。”^④ 6月，总署电询张之洞：“湖北自强学堂内东文学生，有无年少颖悟堪以派往（日本）之人，约若干名？”^⑤

①《张文襄公全集》卷79，电奏7，第19页。

②《张文襄公全集》卷154，电牍33，第18页。

③《张文襄公全集》卷155，电牍34，第9页。

④《张文襄公全集》卷155，电牍34，第28页。

⑤《张文襄公全集》卷155，电牍34，第32页。

由上可见，湖北派遣留日学生是 1898 年下半年之事。

所以说，本书所指留日运动“序幕”终了之时，尚有一批留日学生正处于留学生活的初始阶段。这一批人中，也有的后来成了“名人”，如张继。

张继 1899 年留学日本，1903 年学成归国，曾与人创办《国民报》、《苏报》、《国民日报》、《民报》等，1914 年任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议长，1921 年后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北京支部部长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司法院副院长等职，是西山会议派的重要人物。

4. 留日运动的中断和延续

19 世纪末的几年间，中国的留学日本政策刚刚确立，留日人数还不多，仅有 200 余人，他们的来源为：

一，各地方派遣。清政府正式下令各省督抚选派学生赴日留学后，湖广总督张之洞派遣官费留日生 20 多人，北洋大臣、南洋大臣以及浙江求是书院等也纷纷派出留日学生。

二，追随流亡者。“1898 年戊戌维新失败以后，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等被迫亡命日本。1900 年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又有一批反清志士流亡日本。20 世纪初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也屡次因发动武装起义受到清政府通缉而到日本避难。这些亡命客周围常有留日学生相从，有的青年学生甚至为了追随他们而到日本留学。而不少流亡志士在日本入学，本身也成为留日学生。当时日本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在国外进行活动和宣传的主要基地，同时也成为 20 世纪初中国各种新思潮流派的发源地。这也吸引了大批中国进

步青年为扩大眼界、追求真理以及开展爱国、革命活动而赴日留学。”^①

三，自费。这个时期留日者自费生较少，尽管在清末的留日运动史上自费生总人数超过了官费生人数，但在留日运动之初的几年里，留学日本的主要还是清政府派遣的官费生。这一点，从日华学堂的自、官费生比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日华学堂沿革》中谓：“初由浙江省求是书院派来文学生四名，本年（明治三十二年，即 1899 年）一月由南洋公学堂派来文学生六名，又有公学生及自备资斧而来者三四人，至今年四月由天津头等学堂、水师学堂派来入本堂专学日语者十二人。总计学生共有二十六人。”

据《日华学堂沿革》，这 26 名学生的入学时间、来源分布可列成下表：

1899 年日华学堂中国留学生情况统计表

姓名	来源分布						入校时间
	浙江	江苏	广东	直隶	福建	安徽	
陆世芬	√						1898 年 6 月
陈 幌	√						
钱承志	√						
何燭时	√						
汪有龄	√						

^①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 1992 年，第 348 页。

续表

姓名	来源分布						入校时间
	浙江	江苏	广东	直隶	福建	安徽	
吴振麟	√						1898年10月
章宗祥	√						1899年1月
富士英	√						
雷 奋		√					
胡祖泰		√					
杨荫杭		√					
杨廷栋		√					
陈玉堂			√				
郑康耆			√				1899年3月
黎 科			√				
张煜全			√				
王建祖			√				
张 奎		√					
周祖培		√					
高淑琦	√						
安庆澜				√			
蔡成煜				√			
金邦平						√	
沈 琨					√		
另二人 不详							
合计	9	6	5	2	1	1	

1899年，日华学堂所有的26名中国留学生中，公学生及自费生加起来才有三四人，可见自费生比例之低。但是，“自此而后，各省均派遣学生去日，私费前往者亦多。”^①

出于各种目的，当时日本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界十分重视接受中国留学生的的工作，有人认为，“不论是在中国独立事业上或中日提携事业上，这一群留学生都是一大力量”，“日本帝国必须不惜金钱为清国留学生建立完备设施”。^②因此，日本社会出现了多所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学校。

这一时期，日本人为中国留学生办了数所学校，这些学校兼顾大学预科教育及中等程度教育。它们主要有：

成城学校，是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学校。

亦乐书院，1899年嘉纳治五郎由其私塾改成。

这一时期很著名的一所学校是日华学堂。

日华学堂是高楠顺次郎1898年6月在东京本乡西片町创立的，专为中国学生补习语言文字及各种学科。该校章程中说：“本学堂专在教养清国学生，务使学生从速讲习我语言，谙熟我风俗，并修普通各科之学，而为治专门各科之地步，以使培其成材。盖日本国学校之制有普通之学及专门之学……（本学堂）务为省功而效于实用，勉就简捷而速成其艺。故本学堂课程分为正科、另科：正科则有普通预备科、高等预备科，另科则有预备选科、日语专修科，使学生量力修业以培其

^①舒新城编：《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27页。

^②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第351页。

基，而后再进入大学或高等各学以治专门之学。”^①

日华学堂的普通预备科“为高等及专门学校之预备，修业期二年，授日语、英语、德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诸科。高等预备科为进帝国大学分科之预备，肄业期约一年，功课为法学、文学、工学、理学、农学等。预备选科为曾通普通科之学生拟从速进帝国大学或专门学校而设，修期无定期，大约为二年，功课亦无定，可在高等预备科中选习数科。日语专修科为愿速说日语者而设，专教日语，肄业期限约一年。”^②

以上所说的是专门招收中国留学生的学校。

这一时期中国留学生进入的其他日本学校，也很多。从章宗祥的《日本游学指南》中，可知另有多所学校中有中国留学生。该书虽然出版于1901年，但基本上可以认为在1900年时这些学校中已有了中国学生。这些学校是：

法科大学
工科大学
农科大学
第一高等学校第一部
第一高等学校第二部
东京专门学校
庆应义塾普通部
高等商业学校
蚕业讲习所

^{①②}舒新城：《中国近代留学史》，第25—26页。

东京外国语学校
陆军士官学校
成城学校

这一时期，中国各方面人士纷纷赴日考察教育，归国后撰书刊行，这无疑也增加了中国人对日本教育的了解，推进了留日运动的发展。

1898年，姚锡光奉张之洞之命，到日本专门考察教育两个月，归国后出版了《日本各学校章程》（1898年夏浙江书局刊本）。次年该书增订为《东瀛学校举概》再次刊行（京师刊本）。该书连续刊行，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姚锡光在《东瀛学校举概》中，详细介绍了日本各类学校的情况。其介绍的情况见下页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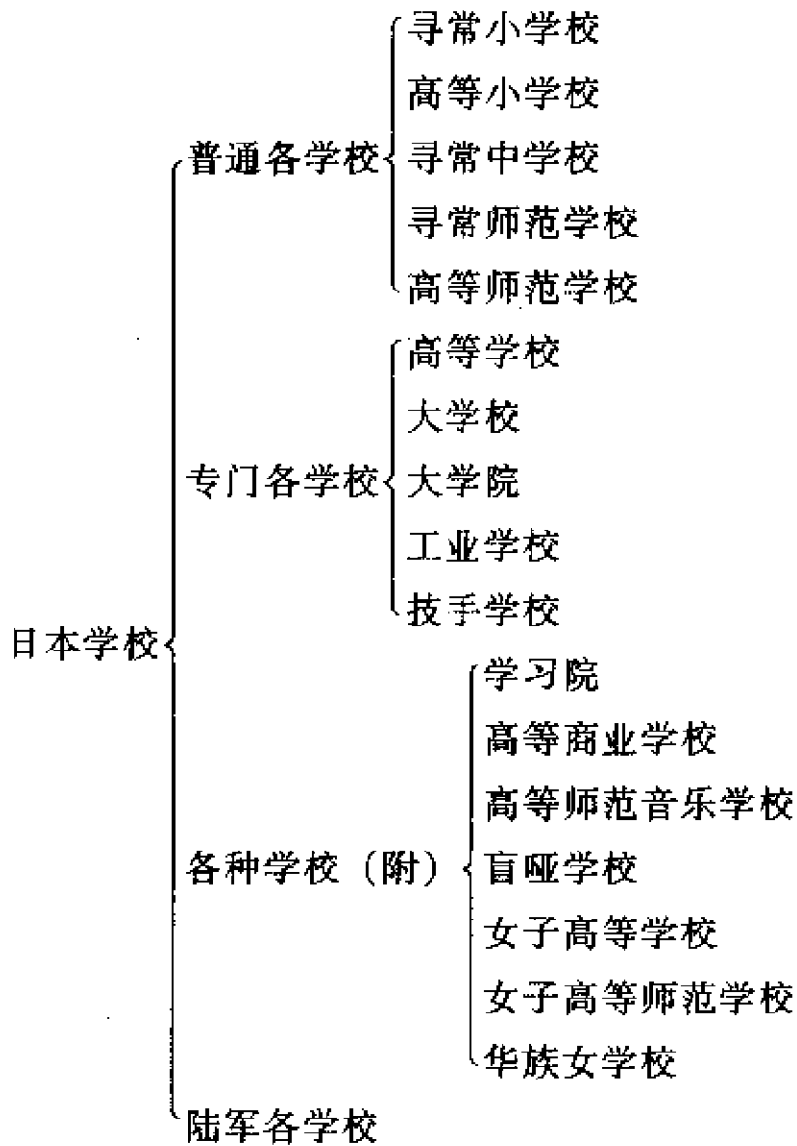
1898年，江西经济学堂教师朱绶自费赴日本考察教育，归来后写了《东游记程》一书，书中还附有日本学校系统图。

在各种因素的促动下，这一时期留日人数逐年增多。据统计，其人数分别为：

1896年，13人
1897年，9人
1898年，18人
1899年，207人^①

^①实藤惠秀著，谭汝谦 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451页。

日本各类学校情况



这一阶段留日运动也出现过小的波折。

1898年9月21日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受日本人庇护流亡日本。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多次训令中国驻日公使馆向日本提出引渡要求：“照万国公法，他国漏网之犯，无容留之别，况中朝现与日本已敦睦谊，若贵国庇护我国罪人，不免为列国所讥。”^①

清政府遂以康、梁事件为由，曾停派留学生赴日。但是，民间的赴日留学并没有因此中断。

在引渡康、梁的要求遭日本拒绝后，清政府又提出将二人驱逐出日本的要求：“若贵国容留，于中东友谊大有不便，以后岂敢深信。倘能交出或驱逐，方显中东友好实据。”^②

日本军部以容留二人“有碍日清邦交”为由，迫使政府“去康留梁”，致使康有为离日去加拿大。于是，中国停派留学生做法即形取消。

^①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2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3年，第113页。

^②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2册，153年，第618页。

第二章

近代留学日本运动的第一个高潮 (1901—1906)

第一节

留学生纷纷东赴日本

1. 清政府进一步鼓励留学

1900年以前，清政府虽然把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作为国策确定下来，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入侵等使政局不稳，清政府无暇他顾，因此并没有积极推行留学政策。

从1901年开始，清政府对留学日本从原来的认识、确立作为国策转变到实施、制定具体政策上来。

这一时期相继实施的办法和制定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留日运动的发展。概括起来说，这些办法和政策主要有：

第一，清政府推行“新政”，张之洞提出“奖励游学”。

戊戌政变两年后，出于挽救封建王朝的动机，清朝统治者开始倡言“变法”、“自强”。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在西安颁布了“预约变法”的上谕，指出：数十年积习相应，因循粉饰，致成大衅，欲求振作，当议更张，“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法治，……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

“新政”提出的同时，明令“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己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①

根据上谕的要求，1901年7月，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发出“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一折为《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内分：一，设文武学堂；二，酌改文科；三，停罢武科；四，奖励游学。

张之洞、刘坤一在折内“奖励游学”条中强调：第一，游学可补充国内办学之不足。国内设立学校有两难，求师之难又甚于筹费，“天下州县皆立学堂数必逾万，无论大学小学断无许多之师，是则惟有赴外国游学一法。”第二，留日的好处有：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81—82页，转引自蔡振生：《张之洞教育思想研究》，第164页。

教法最善，文字较近，课程较速，比到欧洲各国求学经费可省三分之一，学成往返日期可速一倍，江鄂等省在日本学堂也多。第三，游学所习科目应突出师范，“此时宜令各省分遣出洋游学，文武两途及农工商等专门之学，均须分门认习”，“并且专派若干人入其师范学堂、专门师范，以备回华充各小中学普通教习，尤为要着。”第四，鉴于官费留学用资甚巨，不能多派，因此主张奖励自费留学。“官筹学费究属有限，拟请明谕各省士人如有自备斧资出洋游学，得有优等凭照者，回华后复试相符，亦按其等第作为进士举贡。如此者游学者众而经费不必尽由官筹。”^①

清廷对张之洞、刘坤一提出的“新政”措施十分赞赏。8月20日的--份上谕中称：“昨据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必行西法各条，其中可行者即著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②

由此可见，张之洞、刘坤一关于“奖励游学”的建议已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重视。

第二，制定鼓励游学章程，留学政策正式确立。

1903年5月下旬，慈禧召见张之洞，“以出洋学生流弊甚多，饬筹防范之法，当经面奏：“学生在外国境内，中国法令难行，必须先商彼国政府，允为协助，事始有济。仰蒙慈允，遵即晤商驻京日本使臣内田康哉与筹办法。该使臣以两国法律不同，办理动多窒碍，谈次颇有难色。继经剖切开譬，告以出

^①《张文襄公全集》卷51，奏议51，第27—28页。

^②《光绪朝东华录》二十七年八月，第四册，总第4770—4771页。

洋学生如不妥筹约束，听其浮游废学，任性妄为，犯义干名，陷于罪戾，则此后有志之士，不复敢远游就学，往取师资。其先已在洋笃志力学者，亦且惧为牵累，废然思返，永无成就通才之日，为害不可胜言。该使臣审思至再，始谓如有妥善办法，亦愿电彼政府赞成此举。惟必须中国于安分用功学成回国之学生，予以确实奖励，使各学生有歆羨之心。并使彼国学堂确见中国有劝学求才之实意，始于不安分学生有助我约束之法，属先酌拟章程，再为商办。……当即酌拟约束游学生鼓励毕业学生章程各一通，迭次与日本使臣往返商榷。复由该使臣转达其政府，与各学校校长公同会议，期于中国学生有裨，而于彼国法权无碍，斟酌至于再四，日来始克议成。计拟定约束章程十款，鼓励章程十款，又另拟自行酌办立案章程七款。”

1903年10月16日，张之洞上呈了《筹议约束鼓励游学生章程折》，其中“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的内容为：

中国游学生在日本各学堂毕业者，视所学等差，给以奖励。但须由中国出使大臣总监督查明该学生品行端谨，并无过犯，出具切实考语，咨送归国。由钦派大臣详加查核，果系品行端谨，毫无过犯，并按照所学科目切实详细考验。果系所学等差，确与所得学堂文凭相符者，再行奏请奖励。

在普通中学堂五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以拔贡出身，分别录用。

在文部省直辖高等各学堂暨程度相等之各项实业学堂三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在学前后通计八年），

给以举人出身，分别录用。

在大学堂专学某一科或数科，毕业后得有选科及变通选科毕业文凭者（在学前后通计或十一年，或十年），给以进士出身，分别录用。其由中学堂毕业径入大学堂学习选科，未经高等学堂毕业者（在学前后通计或七年或八年），其奖励应比照高等学堂毕业生办理。

在日本国家大学堂暨程度相当之官设学堂，三年毕业，得有学士文凭者（在学前后通计十年，较选科学问尤为全备），给以翰林出身。

在日本国家大学院五年毕业，得有博士文凭者（在学前后通计十六年）除给以翰林出身外，并予以翰林升阶。

以上所列之外，在文部大臣所指准之私立学堂毕业者，视其所学程度一体酌给举人出身，或拔贡出身。

游学生原有翰林、进士、举人、拔贡出身者，各视所学程度给以相当官职。

凡毕业学生，首以品行为贵。应请各学堂注重学生品行，与各科学一律比较分数，必所定品行分数满足乃为及格。

游学生于各学堂毕业年限，须与日本学堂原定本科毕业年限毫无短减，不得别自为班，希冀速成。

此次定章以前，已经毕业回国之各省官派学生，均照此次章程由各省督抚考查其品行心术，如实系端谨无过者，考验其所学程度查验文凭实系相符者，即

照新章给以出身。已有出身者，给以相当官职。其学速成科毕业减短学科年限者，应查明所短年限令以回国后当差劳绩之年资补之。扣足年限，亦一体给以出身，或相当官职。凡定章以前之毕业回国学生，其中如有请赏举人者，俟奏准后，应咨送京城由管学大臣复试。惟中国留学生非在照办约束留学生章程之日本学堂毕业者，概不给本章程所定奖励^①。

外务部随后在上述章程的末条添入“中国留学生非在照办约束留学生章程之日本学堂毕业者，概不给本章程所定奖励。”第一节末段添入了“而该官私学堂自行收留者，将来毕业后概不给以奖励。”^②

上述奖励办法公布后，刺激了人们的留学热情，科举制度开始贬值。

第三，颁布新学制，废除旧科举。

1903年，中国颁布了具有近代意义的第一个新学制《奏定学堂章程》；随后又正式宣布完全废除科举制度。除旧布新的教育措施，更骤然间刺激了人们的留学欲望，推动了留日运动再向纵深发展。

2. 多种多样的派遣渠道

出洋之门洞开，留学政策确立，随之而来的就是一浪高过

^①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80—184页。

^②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86页。

一浪的留日潮。

自1901年以后，留学生被纷纷派往日本。派遣渠道之多，大有令人目不暇接之感。

首先，中央的练兵处、商部、学部以及京师大学堂等派遣，如：

1904年5月，练兵处奏定《选派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16条，并派学生百名至日本振武学校、士官陆军学校学习^①。

1905年10月31日，商部选实业学生30人，派赴日本学习农务^②。

1906年8月26日，《学部奏进士馆变通办法遣派学员出洋游学折》中称：自去年钦奉明诏，科举废止，今进士馆尚有两班人没有毕业。查日本东京政法大学将开设补修科，法政大学将开办速成科第五班，“臣等再四筹商，莫若乘此时机，分别遣派新进士赴日本游学，除癸卯进士毕业期近，仍留本馆肄习，俟毕业后，再行遣派出洋游历外，所有甲辰进士现在馆肄业之内班，均进入政法大学补修科，其外班之分部各员，有志游学者，分别选择送入法政大学速成科……”^③ 学部将“进士”都送走留日，可见派遣之广泛。

京师大学堂为培养教习，也大批派人留日。1903年12月31日，张百熙在《奏请京师大学堂派学生出洋折》中谓：臣百熙“深以教习乏才为念，当经奏陈京师大学堂，宜派学生出

^①耿申等编：《北京近代教育记事》，北京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0页。

^②耿申等编：《北京近代教育记事》，北京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3页。

^③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73页。

洋，分习专门，以备教习之选。计自开学以来，将及一载，臣等随时体察，益觉资遣学生出洋之举，万不可缓，诚以教育初基，必从培养教员入手，……现就速成科学生中，选得余荣昌、曾仪进、黄德章、史锡倬、屠振鹏、朱献文、范熙壬、张耀曾、杜福垣、唐演、冯祖荀、景定成、陈发檀、吴宗栻、钟庚言、王桐龄、王舜成、朱炳文、刘成志、顾德邻、苏潼、朱深、成俊、周宣、何培琛、黄艺锡、刘冕执、席聘臣、蒋履曾、王曾宪、陈治安等共三十一人，派往日本游学，定于年内起程。”^① 这31人计划留日7年，川资等不计，需费9万余两。

1904年初，该31人赴日本，是为京师大学堂派出的第一批留日学生^②。

除上述外，八旗子弟亦出洋留日。1902年2月1日，“谕宗人府、八旗都统遴选各旗子弟在15岁以上、25岁以下，志趣正大、资质聪明、体气强壮者，造册开送军机处进呈，听候派员复核挑选，给资遣赴各国游学。”^③

其次，地方的各省、县派遣，如：

1901年，四川首次派出官费留日生，其人数是22人。但遗憾的是，这22人被人“调包”，实际赴日本的只有一少部分，其余大部分赴日的不是四川人士，因此四川方面提出意见，要求补齐22之人数。这在留日史中是比较少见的，所以，这里将提及此事的《总督部堂（锡良）咨驻日杨（枢）公使官

^①朱有贻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第920—921页。

^②耿申等编：《北京近代教育记事》，第19页。

^③耿申等编：《北京近代教育记事》，第16页。

费遗额以川生尽补之》引述于下，该文原载 1904 年的《四川学报》。

为咨商事。学务处案呈：光绪三十年三月初三日，据川绅京官陈钟信、高树、王乃征、骆成骧、乔树枏、余堃、李稷勋、曾鉴来函，以前督部堂奎任内，川省资遣学生出洋，定额二十四名，川人仅占八名，余皆官幕子弟充选，无益于蜀，而徒夺其费。商请乘今更换及期之时，概改令本地士民往补前额，其尚有留学属于官幕子弟者，各令其本籍自行筹款拨助，等语。当经本署督部堂复许咨商，去后。查二十六年，奎前任奏派游东学生，计止定额二十二名，除客籍外，本省只得八人。准前公使蔡咨，到东者二十一人，并送入年半毕业之成城学校。而据四川同乡会调查，则川生又止六人。盖原派列册八名中之巴县胡景伊，华阳徐孝刚，双流周道刚并入一年毕业之陆军士官学校。成都张天培，简州毛席丰，并入三年毕业之陆军士官学校。巴县陈崇功入四年毕业之高等师范学校。尚有巴县龚秉权，邹绍陶两名，并未表见。其表见之六名，皆自二十七年十月到东入学，各由成城普通毕业、递入专门，原占成城名额，尚未开除，并应各按现入各学学期，分别毕业回国，始有遗额可补，今固均非其时也。惟查奎前任原咨名册，核以去年八月初十汪监督咨开经费清册及先后来咨：本客两籍姓名人数，互不相符，而各生成城毕业，竟截至何时为期？所升入各项专门，如川省同乡会调查所列，未准咨明。其原派二十二人，是否一体递入？抑半途已有更换？所更换之遗额是否以客籍充补？其期又在何时？支用四川经费，本籍客籍究各若干？原咨之龚秉权，邹绍陶两名，是否在东有无剔退情事？现时在

东留学者，或更或补，是否仍足前此原咨二十二名之数？抑尚有增减？拟请逐一查明咨复，并一面酌定额数，即以二十四名为定额，而专以川人承充^①。

像四川这样名额被挤占的不多，但像四川这样官费派遣留日生的，各地却都有。

再次，各地的工商矿局、商会等民间团体以及学校派遣留日学生，如：

1904年，湖南明德学堂欲派生赴日，并请求准予同官学一体选派。他们称：“出洋留学，实系讲求实业之急务……拟请于明冬毕业后择其年长学优者派充各中学教习，其年少品端者派往东洋留学，届时分别开单，呈恳考核，与官立学堂一体选派。”^②

各种渠道派遣的留学生中，又以派遣学习师范者为多，不仅经济发达地区选派，经济不发达地区也同样选派，其人数不在少数。

1904年旧历七月，林绍年等人在“出洋游学片”中说：

伏维兴学，原以储才，教育端在师范。滇处边瘠，民智未开，延聘教习尤极不易。自上年开办学堂，虽中西兼授，而教习乏人，一切教法程度未尽合式，各府厅州县尤难遍及，若不亟图培植师范，究无以宏造就而裨学业。当经督同学堂司局设法筹商，分

^①《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1980年印，第207—210页。

^②朱有熾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第446页。

行劝谕，于通省品学较优之绅衿生监及本年会试举人内，慎选保送派往日本学习速成师范。兹选得进士刘盛堂等四十一名，自备资斧；廪生张景栻指分四川县丞附生李燮阳，复加查看，均属学裕品端，有志上进，定为出洋速成师范学生。庶毕业归来，足以分派。并以刘盛堂等六名兼充考察学务。其由滇起程者，计刘盛堂等二十三名，应需学费路费每名各给银六百两；其由汉口起程者，计周钟嶽等十八名，路费较省，每名各给路费学费银五百五十两，均由拟发各府直隶厅州中学堂津贴银两项下暂拨支用。……臣复查无异，除给咨批暨开单咨明出使日本大臣兼管留学生总监督，照会日本外部，照约保护，俟其到日分别派入各学堂肄业，随时严加管束，按期卒業，给照回滇，照章办理，并俟查看三月后，如有不堪造就，即行送回，以昭慎重^①。

又据1905年8月30日的《黔抚林奏选派学生往日本学习师范并专门科学折》^②中称：巨到任即与司道等商榷，先通飭各属地，每州县至少应资送速成师范一二人，款如有余，加送专门科学一二人。兴义县咨送三人，另送自费生一人，各属亦陆续申送，间有自费生。臣又在高等学堂内选学生八名。半年

^①《林绍年会同云贵总督丁振铎云南学政吴鲁选派速成师范学生出洋游学片》，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第458—459页。

^②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第459—460页。

以来，共资送过官费公费前往日本游学生 51 名，其中习师范者 29 名，习专门科学者 22 名；另有自费生 11 名，其中考察学务者 2 名，习速成师范者 2 名，习专门科学者 7 名；再有随宦子弟自费生 2 名，共计 64 名……

从贵州的情况看，不能不说他们在资送留日生方面确实下了很多功夫。

为向日本派遣习师范生，1904 年 9 月 5 日，直隶山西两省还与日本经纬学堂签订了代办师范速成班的协议，该协议对学习期限、学生人数、课程开设、学费缴纳等都做了明确规定。这种做法，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留日运动已走上了正轨。

光绪三十年（1904）直隶山西两省委托 日本经纬学堂代办师范速成班协议

直隶、山西两省派官费学生入经纬学堂肄业习速成师范科，以十个月为卒業期限。拟订课程表如下：

学期 学科	第一学期 自九月中旬 至十二月	第二学期 自一月至三月	第三学期 自四月至 七月中旬
西洋伦理	1	1	1
教育学教育史	4	5	4
伦理 心理	3	2	
学校制度		2	2
学校管理法			2
教授法			
教科书编纂法			4
西洋历史	2	2	

续表

学科 \ 学期	第一学期 自九月中旬 至十二月	第二学期 自一月至三月	第三学期 自四月至 七月中旬
地 文	3		
音乐大意		2	
博 物	3		
物理化学		3	3
算术几何代数	3	4	3
法制经济		2	2
图 画	2	2	
日语 日文	10	4	4
体 操	3	3	3
计	34	32	28

第二学期第三学期，其本课教授时间外，按每礼拜赴各学校及图书馆博物馆工场等观览，尚开随意讲义科，系有关于本科学课者，使诸生以增实验而宏智识。两省监督，如查有应添应改学科，亦可随时与校长商酌添改。

一原议每班学生以六十名为额，如两省官派学生不满此数，另有他省官费或自费生请附入此班肄业者，须经本监督等承认，函送经纬学堂，始准其附课。其学费由该生等自理，与本两省无涉，所有科学，须照商定，一体办理。一（直隶山西）两省官费生学费，由各本省监督三月汇交一次，以免参差。一

现定各条不过大概情形，如有未尽事宜，可由监督与校长随时商订。以上商订各条缮写汉文三分，彼此盖印为凭，各存一分，以便遵守。直隶师范学堂总教习孟庆荣 山西总办学务处李宗棠 直隶留学生监督马延亮 山西留学生监督吴春康 经纬学堂校长岸本辰雄 经纬学堂学监木下哲三郎。

光绪三十年八月二十一日

明治三十七年九月三十日^①

就这样，多种渠道派遣留日学生，使留日运动蔚为壮观，愈演愈烈。

3. 自费生人数急剧增加

这一时期留学日本的胡汉民，对该时期留日人员的情况，曾有过回忆：“其时学生全体内容至为复杂：有纯为利禄而来者，有怀抱非常之志愿者；有勤勉于学校功课而不愿一问外事者（此类以学自然科学者为多），有好为交游议论而不悦学者（此类以学社会学者为多）；有迷信日本一切以为中国未来之正鹄者，有不满意日本而更言欧美之政制文化者。其原来之资格年龄，亦甚参差。有年已四十、五十以上者，有才六、七岁者；有为贵族富豪之子弟者，有出身贫寒来自田间者；有为秘密会党之领袖以亡命来者，有已备有官绅之资格来此为仕进之

^①直隶学务处：《教育杂志》，1904年，第一卷，文牍，第9—12页。

捷径者（法政学校更有为新进士所设之特班，殆如散馆之人翰林院，功令使然）。杂糅以上种种分子，而其政治思想则可大别之为‘革命’与‘保皇立宪’两派，而其时犹以倾向‘保皇立宪’者为多（‘立宪’‘保皇’相表里，其名不同，其实一也）。亦有初至日本倡言革命，迨将毕业则亟言保皇或立宪者。故日本留学界虽大有生气，然此二万余人者，乃复杂混乱，无所不有。”^①

胡汉民回忆中所说的四五十岁以上者，六七岁幼童者，绝对不会是官费留学生，必是自费留学生无疑。

实藤惠秀说：1903年新学制颁布后，自费留日学生年年增加，“后来几年，在急剧增加的留日学生中，大部分是自费生。”^②

自费留学生纷纷涌往日本，其人数急剧增加，甚至有超过公费生人数之势，这和清政府鼓励自费留学的政策有关。

清末兴起留学日本，其原因之一就是省费。尽管如此，在留日运动骤然兴起的情况下，学资也成了派遣者所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学资的紧张，迫使派遣者一是想办法筹措到更多的派遣留学生费用，二是想办法增加自费留学生的数量，减轻派遣者的经济负担。

张之洞比较早地提出了鼓励自费留学的主张。1901年7月，他与刘坤一合呈的有关“奖励游学”的折中即说：“官筹学费究属有限，拟请明谕各省士人如有自备斧资出洋游学，得

^①《胡汉民自传》，第13页，载《革命文献》第三卷，1953年台湾出版。

^②实藤惠秀著，谭汝谦 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34页。

有优等凭照者，回华后复试相符，亦按其等第作为进士举贡。如此者游学者众而经费不必尽由官筹。”

同年5月，张之洞在致清江张漕台的电文中也表示：“游学费用尤不宜惜。宜派理明志定者，如明旨许以出路，在外国书院得有优等凭据者，可照等作秀才举人进士，自备资斧者必多。”^①

张之洞的一系列主张和观点，都表明了要把自费生在某些方面同官费生同等对待，以期增加自费留日生的数量。

1902年，外务部在《奏议复派出洋游学办法章程折》中，将留学生分为贵胄学生、官派学生、游学学生（民间自备资斧出洋者）三种，并提出了自费留学生同其他留学生同等待遇的办法：“如各项学生遇有患病及一切丁忧事故，应照成案办理，或酌予奏恤，所有用费作正开销。”^②

清政府的留学政策鼓励人们自费留学，它成了推动留日运动发展的助动力。

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人们通过各种方式涌往日本自费留学。在所有的 ways 中，还有留日者的大力宣传。很多留日者以自己留学的现身说法鼓励人们留学。

湖北留学生李书城在致友人的信中鼓励友人“留学于外洋”，信中说：

弟今者请为诸兄陈一策，即留学于外洋是也。夫

^①《张文襄公全集》卷172，电牍51，第18页。

^②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78页。

人足不出闾里，目不睹瀛寰，则铜蔽之所从出也。铜蔽既久，则尝执一隅以概五洲，据一节以方全体，浸淫于老生腐儒、假名士、伪通人之说，踴跃自喜，沉醉不醒，则浅狭之见又生焉，此无他，前瞻后瞩，左眺右盼，皆不出此小圈限之中。而此小圈限外之隆隆突起、浩瀚无涯之大世界，皆本此小圈限中之所见闻者以推测之、比例之，此警儒之所以日多，而奇才异杰千万不得一也。

.....

夫竞争学问，何以必于外洋？盖今日学问竞争之大市场，惟外洋最盛。欧西各国其为大市场之更大者不必论矣，即日本三岛，已将欧人之精液而吸纳之。凡政治、法律、陆军、教育、农、工、商、医及社会各实业，皆有学校。又先授以普通知识，使知识不偏于一隅。凡此学校，我国之留学者皆得入之，诚哉为学问竞争之大市场也。夫人抱爱国、爱同胞之志，而学问不足以辅之，则是龙无鳞甲，虎无爪牙，凤无羽仪耳，岂能望飞之、搏之、舞之耶？诸兄，诸兄，曷无奋然而起也^①？

1905年春夏之交，正在日本青山实践女学校留学的秋瑾回国度假，实践女学校请她代为招生，并散发该校师范、工艺

^①《潜江李书城致友人书》，载武汉大学历史系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1981年版，第519页。

科“招生章程”。秋瑾散发招生章程的同时，还写了《实践女学校附属清国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略章启示》，配合招生章程一同发放，鼓动人们留学，文中称：

顷者留日诸君组织速成师范女学校，凡我留学
者，未尝不为我国女界幸，及将来之中国幸也。意自
后我国姊妹苦经费之艰难、期间之短促、有志未逮
者，咸得束轻便之行装，出幽密之闺房，乘快乐之汽
船，吸自由之空气，络绎东渡，预备修业。而毕业以
后委身教育，或任教师，或任保姆，灿祖国文明之
花，为庄严之国民之母，家庭教育之改良，社会精神
之演进，无量事业、无量幸福，安知不胚胎于今日少
数之女子。此诸君成立速成师范之热心，而秋竟报告
姊妹之希望也。然而近顷以来，我诸姊妹之航海而东
者，又复寥寥，意内地之姊妹，风气未开，或不知游
学之利焉，或知其利而不知游学之可以速成焉。即知
之，或以家族、经济种种之苦难，未克达其目的。是
以秋竟不屑牺牲个人之学业，于月前顷，回国为我亲
爱姊妹奔走呼号也。然而念二行省，吾不能家喻户晓
也，即浙之东西，又苦交通之不便，我之奔走呼号于
最亲爱之姊妹者，仅属之于笔墨之间接力，或诸姊妹
量其苦衷，有表同情者，无论自费，或须筹费，请各
抒高见，商榷办法，通函于绍城万安桥下明道女学

堂。并祈开明籍贯，以便函商一切。秋竞雄启^①。

1906年，山东文登留日学生丛继珠回国度假，竭力劝人留日，结果有八九十人随往^②。中国留日共爱会于1903年9月21日在《江苏》第6期登《共爱会同人劝留学启》，鼓动人们留日。此类事情，在当时不属鲜见。

4. 留日人数达到第一次高潮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势力纷至沓来，相继踏足中国，有血性的中国人则把留学看做是学习知识以强国的重要途径。他们认为，“惟游学外国者，为今日救吾国惟一之方针”^③；“留学外国者，今日之急务也，无贵、无贱、无富、无贫、无长、无幼，所宜共勉者也”^④。

不仅是普通百姓，就是眼界开阔的上层人士，也把派遣留学生看成是维系统治的重要之道，自义和团运动之后，“疆吏之奏新政者无不以游学为言”^⑤。

于是，赴日之人不绝于旅，留日运动颇为壮观。不光青年人留日，更有六七十岁的老翁和十来岁的幼童，有缠足女子和举人、秀才、进士，有父子、全家等留日的现象。当时东渡日

①《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9页。招生章程原件系铅印单，现存绍兴鲁迅纪念馆。

②《东方杂志》第三卷，第3期。

③《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载《游学译编》第6期。

④《与同志书》，载《游学译编》第7期。

⑤舒新城编：《近代中国留学史》，第46页。

本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从天津搭船，一是从上海启航；去日本的轮船往往人满为患，单人独行者极少。松本龟次郎在《中国留学生教育小史》中说：“老人多有来学一事——像云南省派来某人，已届70岁左右的高龄，但每能凌驾年轻人，一派天真，热诚地担任班长的的工作，……归国以后，到80余岁，还从事省里的教育事业。”《东方杂志》讲过一个故事：辽宁省某县城，一位12岁的少年，听说赴日留学，偷偷外出，想要赶往东京，但身上分文没带，几天后才被父母寻找回来。

1903年农历二月初，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从长沙启程到日本留学，经上海乘海轮到东京。这一年，他已近40岁，同行的有30余人，其中有多人后来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名人。朱师晦在《癸卯日记》中写道：“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为日本之行，屏挡家事，检点征装，朝勤而暮不休，一食犹三起焉！同行者为家弟鲤庭（德裘）、姻家弟张竹吾（藻六）、吴子昂（家驹）、子骏（家骏）、梁和甫（焕均）、顾甫（焕庭）、周稼生（大备）、黄稚彝（笃恺）、王文郁（代懿）、李侗君（悦）、胡彦远（荣迈）、罗子明（宜照）、杨仲子（政），以上湘潭十四人。长沙一人，为杨华生（昌济）。善化三人，为刘耕石（颂虞）、王俊生（闾宪）、陈子美（家瓚）。湘阴仇蕴存（式匡），……湘乡二人，陈壬林（尔锡）、萧澧衡（仲祁）。安化一人，陶叔晦（思曾）。宝庆府三人，为邵阳石醉六（陶钧）、为新化曾凤冈（继梧）、陈星台（天华）。岳州府为巴陵吴焱初（友炎）、焱初之弟友松。常德府为武陵戴豹珍（侈礼）。辰州府为溆浦舒子彝（和钧），……衡州府自备生一人，为衡山刘铃生

(揆一)。”^①

这次赴日留学共 35 人，其中近现代史上知名人士有：杨昌济、仇蕴存、萧仲祁、石醉六、曾继梧、陈天华、余焕东、刘揆一等。

石醉六后来在自述《六十年的我》中记述道：“这次东行，同伴三十余人，年龄大的如杨昌济，将近四十岁；小的如梁焕廷，不过十二岁。到了东京，都在嘉纳治五郎为中国留学生所特设的弘文学院住下来，受预备功课一连几个月。”

为更多地选派赴日留学生，各地政府做了积极的努力。如贵州，本属偏壤，林绍年于 1905 年调任贵州巡抚后，筹办了多所学堂，为解决新学堂师资奇缺问题，他上奏选派学生赴日留学。一年内，经过努力，共选派赴日考察学务人员及官费、公费、自费留学生 151 名，成为贵州向外选派留学生最多的一年。其中上半年资送官费、公费生 51 名，自费生 13 名，计 64 名。下半年，除选派十四人赴日考察学务（其中两人自备资斧）外，又陆续派遣，共计 73 名。

下面是 1905 年贵州选派赴日留学生名单：

上半年选派名单。

（一）习速成师范者有：

官费及公费生：举人廖杭、周恭寿、李启艺、林榷枏、李庆云；廪生陈鸿翥、乔运亨、郭德裕、戴登荣、傅德洋、肖开锦、王家珩、孙仲瀛、陈潞、王万杰、李永葵、刘葵照、朱俊

^①袁鹤皋：《朱师晦的〈癸卯日记〉》，载《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11 辑，第 141—142 页

龙；拔贡王显荣；贡生钟昌祚；增生高兆奎、吴恩庆；附生罗廷彦、高裕昆、刘宗杰、王孝瑞、高正笏、朱劼、任树铭。

自费生：丁忧湖南即用知县刘钟俊；附生陈锴。

(二) 习专门科学者有：

官费及公费生：廪生周英、符诗熔、万勛忠；附生尹于忠、张振纲、赵世型、王佩芬、刘文龙、况天爵、吴会贤、黄延祚、马宗裕、漆运钧、张锦林、朱沛霖、李培元、穆邦荣、保衡；监生周步英、李楨、王文选；童生陈其彝。

自费生：增生杨梧林；附生陈祖姚、杨梓林；监生杨桂林；童生陈琨、张靖、许宗溥。其中有随宦子弟自费生二名：浙江金焕常、云南陈伯械。

(三) 考察学务者：

优贡刘显治；监生蔡岳。

以上共计 64 名。

下半年选派名单。

(一) 习完全师范者有：

黄宝森、吴绪华、杨灿、陈玉润、梁天柱、邓光济、龚荫槐、胡肇安。

(二) 习专门科学者有：

傅良弼、解江、杜源贵、薛尚铭、陈学钊。

(三) 习速成师范者有：

傅师闵、肖万举、文大炎、易尚濂、张墜涛、刘光烈、赵本发、杨光明、胡祖同、邓复、罗昆琦、陈毓善、周正仪、赵金声、徐志源、唐化溥、童汇源、张鸿藻、刘湘、杨成铸、黄行恒、陈钟浚、牟琳、光光沛、高煌、王懋德、黄先楨、肖士

杰、方承恩、李懋森、黄德馨、黄承恩、王锡恩、熊继飞、徐炳仁、谢绍苍、张行健。

另外，还有 23 名随宦子弟及绅商自费生：刘宗朴、吴祖信、刘慎铨、刘庆奎、安其光、袁汝谦、李锦忠、李鉴忠、李炜忠、周启滨、黄锦江、阮德炳、陶文林、武荣熙、赵显彬、李映雪、卢德斋、周承荣、刘应镛、蔡之韶、陈碧、袁汝楫、胡登铨。

而在此之前（八月份）派出考察学务诸事的 14 人是：

知府吴嘉瑞、陈鸿年；通判闵世荣、李绶；知县刘华琼、罗万华；从九周篆训；教职吴鼎、宋葆昌、季熙熙、李立成；教员黄禄贞。自备资斧一同前往考察的有二名：直隶州知州谢祖禹、知州李大森。

以上共计 87 名^①。

从上述留日人员中可以看出，有举人、廪生、优生、贡生、拔贡、教员等等，成分甚是广泛。贵州能在一年内派出这么多人留日，其采取的办法是：饬令各属就地筹款，除官费选派外，还通过公费及自费选派，并且给各属分配最低指标，令其完成。

光绪末年，清朝统治已摇摇欲坠，国库空虚，经济支绌，贵州尤甚，要想大量派遣学生出洋留学，在经济上是有很大困难的，但是林绍年采取了分配名额、就地筹款、多方派遣的办法，很好地解决了省府经费不足的问题。

中国人源源不断地留学日本，到 1906 年，中国留日学生

^①（贵州）《云岩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1989 年印，第 146—147 页。

总人数已达到 7285 人^①，其他年里留日生人数为：

1901 年，280 人；

1902 年，约 500 人；

1903 年，约 1000 人；

1904 年，约 2406 人；

1905 年，近 7285 人^②。

留学人数如此之巨，使近代中国留日运动达到了第一个高潮。

第 二 节

生机勃勃的留学岁月

1. 为中国留学生创办的学校

留学生大量涌入，给日本社会提出了一个如何实施教育的问题。因为赴日的中国留学生成分十分复杂，有的是京师大学堂、东文学堂、北洋大学的毕业生，有的是刚走出私塾的旧书生，有的是各类专门学堂的高材生，还有官绅子弟、新军士

^①汪向荣：《日本练习》，三联书店 1988 年，第 117 页。此书称，这一数字是据 1981 年日本公布的材料而来。这一年的人数，历来有各种说法，陈青之在《中国教育史》中认为有 12000 人。

^②实藤惠秀著，谭汝谦 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 451 页。此书称 1905、1906 年人数各为近 8000，参考《日本教习》，1905 年人数以近 7285 名为妥。

兵。他们的普通科知识、日语水平参差不齐，有人可讲一口流利的日语，有人日语假名都不会发音。

教育的问题实际就是学校的问题。针对中国学生的知识结构特点，日本人一方面让已具有相当水平普通科知识和口语水平的中国学生直接进入日本学校，与日本学生共同学习，另一方面又为中国学生相继成立了一些学校，专门进行补习知识。留日运动初期，中国学生只有极少数有较好的日语基础与普通科知识，绝大部分留学生都是先进入日本各方面专为中国人办的学校，在这类学校里接受日语与普通科知识教育。

从1896年至1900年，相继有数所为中国留学生办的学校成立。

第一所学校，是嘉纳治五郎教育13名中国留学生的学校。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一所正规的学校，它缺乏相应的教学设施，甚至没有校名。最初是借用神田地区一所房子作为校舍兼宿舍，理科与体育课，在高等师范学校讲授。3年之后，7名中国留学生从这里毕业。可以说，这是为教育中国留学生成立的第一所学校。

从1898年开始，日本各方面专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兼顾大学预科教育及中等程度教育的学校相继建立，主要有：

成城学校。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1898年设清国留学生部。成城学校校长是日本参谋总长川上操六。留日生在这里主要是学习日语和军事基础知识，毕业后入日本士官学校。成城学校直至1937年芦沟桥事变留学生全部归国为止，一直坚持接收中国留学生，是招收中国留学生较早又历时最长的学校。成城学校早期学生，多由士兵选来，第3期起，才有

文学生进入。1903年规定禁止自费生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成城学校从1904年起没有了自费生。

日华学堂。1898年6月高楠顺次郎创建于东京本乡西片町，为中国学生补习日语和基础知识。

亦乐书院。1899年10月由嘉纳治五郎将原来教育13名中国留学生的学校改成。

1901年到1906年，是留学运动走向高潮的时期，也是日本方面为中国学生办学校最多的时期。这一时期创办的学校主要有：

东亚商业学校。1901年4月由清华学校改成。改名的目的是出于商业是国家内政与外交的出发点的考虑。

东京同文书院。1902年1月东亚同文会创办于东京神田区，招收中国与朝鲜留学生。

宏文学院。1902年1月由嘉纳治五郎创立，以后相继设有5个分校，1909年夏天停办。它是所规模最大的学校之一，鲁迅、黄兴、陈独秀等人皆入过此校，它培育过大批中国留学生。

东斌学堂。1903年由寺尾亨博士创立，专收振武学校不收的学军事的自费生，1908年停办。

振武学校。1903年7月建立，由清政府与东亚同文会主办，是学习军事的留日生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前进行预备教育的学校。成城学校的学生全部转入此校。

法政速成科及普通科。1904年5月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应中国留日生的要求而设。学生毕业后可入法政大学的预科或大学部学习。

经纬学堂。1904年9月吉田义静创办，是明治大学的下属机构，1910年停办。

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1905年9月建立，1910年停办。

另外还有路矿学堂、警监学校、志成学校、警官速成科及其他几所著名学校。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女子学校和招收女留学生的学校。早在1900年横滨大同学校即设女生部。1902年实践女学校的创立者下出歌子设中国女生部，1904年11月开设清国留学生部。成蹊女学校也招收中国留日女生。

上述学校，是留学生进入日本后接受初步教育的学校，它们包括陆军士官学校和预备学校，教授日语与普通课程的学校和既教授日语与普通课程，又提供速成教育的学校。

上述学校中，有教授日语和普通课程，又兼有速成教育的学校。这一类学校中，宏文学院是比较典型的。鲁迅1902年入宏文学院时，学校就有诸如“速成师范”、“速成本科”、“速成警务”等速成教育。1906年以前，清政府出于迫切需要师资等方面的考虑，大力提倡速成教育，以便留学生能速回中国效力。这一阶段的速成教育，确也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急需的各方面人才。后来的速成教育大有泛滥之势，日本各方面为了迎合清政府提倡速成教育，出现了竞相攀比的情况，一个比一个“速成”，一年、半年到几个月以至几天就毕业并且发证书的“学店”产生了。如讲授肥皂制造法的，即使学生连日语也不懂，几天之内就教授完毕并发证书。比较正规的学校里速成教育要好一些，不过有时学生与校方也会发生摩擦。例如，

1903年3月29日，鲁迅等宏文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全体罢课，抗议学校对速成教育的不负责任。

教授日语与普通课程的学校以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为典型。该校不主张速成教育，学生修业年限超过其他的学校。

这一时期，中国留学生多在专门招收中国学生的学校中学习，学习日语，学习普通科知识，进行速成教育，入专科学校或大学学习的则较少。这一特点，从1904年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校分布中可看得十分清楚。

1904年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校分布表^①

学 校	人数	学 校	人数
东京帝国大学	5	大阪高等工业学校	15
西京帝国大学	2	高等商业学校	13
早稻田大学	23	第一高等学校	45
东京法学院大学	6	第二高等学校	1
庆应义塾大学	1	第三高等学校	22
明治大学	3	千叶医学校	7
法政大学	1	金泽医学校	4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12	仙台医学校	1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13	熊本医学校	5
大阪医学校	2	工艺学校	2
东京药学校	4	高田穗学校	1
东京高等农学校	2	美术写真学校	1

^①李育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9—154页。

第一篇 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的兴起和高潮

续表

学 校	人数	学 校	人数
盛冈农学校	3	熊本手取学校	2
扎晃农学校	17	顺天求和社	4
铁道学校	45	东京蚕业讲习所	5
西京染织学校	11	西京蚕业讲习所	3
东京音乐学校	4	手工学校	24
大阪工业学校	1	正则英语预备学校	45
大阪商业学校	1	国民英语学校	3
早稻田实业学校	2	英语学会	4
警察学校	39	西京同志社	2
物理学校	3	水道学校	1
数学馆	1	体育学校	12
数学专修塾	1	法政大学速成科	295
测量专门学校	2	宏文学院	604
同文书院	148	制造工厂	1
成城学校	151	化学制造品所	3
振武学校	305	织布工厂	2
清华学校	69	机械工厂	2
东京高师附属中小学校	9	印刷厂	2
经纬学堂	135	东京印制局	5
熊本中学校	4	上野工场	1
晓星中学校	3	英佛和语学校	1
早稻田中学校	1	女子美术学校	2
庆应中学校	2	预备学校	178
大成中学校	1	保姆讲习所	1

续表

学 校	人数	学 校	人数
东京各小学校	5	实践女学校	10
西京小学校	1	东亚菁华女学校	2
制纸工场	13	女子实修学校	2
帝国制币局	2	女子实业学校	2
图版合资会社	2	预备学校	16

另外，这一时期中国留日学生在国内的来源也不均衡，差别极大。从下面的表中可以看出这一特点。

1904年留日学生省别来源分布表^①

省别	人数	省别	人数	省别	人数	省别	人数
江苏	280	湖北	336	直隶	172	河南	11
广东	172	江西	51	山西	56	湖南	359
四州	320	贵州	39	山东	60	安徽	84
浙江	189	云南	126	旗人	30	四川	1
广西	26	福建	75	陕西	3		

2. 成城学校的入学事件

清政府派遣学生出洋留学，具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想把留学生造就成人才，致国家于富强之境；另一方面又怕留学生在海外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危及大清皇朝的统治。因此，清政府对于进入日本武学堂的留学生，限制极严，非由

^① 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第149—154页的材料而统计。

各省督抚保送不得出国，非官费不得进入士官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又根据清政府的请求，非由中国驻日公使签证，不许新生入校。

1902年7月，中国自费留日学生钮璠等九人，准备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成城学校，校方以没有中国驻日公使的保证，不准入学，而中国驻日公使蔡钧又拒绝在九名留日学生的人学证件上盖章，由此导发了一场中国驻日公使与中国留学生之间的冲突。

事前，先是由吴敬恒（稚晖）为9名自费留学生写了一封信给驻日公使，建议由在日的留学生作担保人，每五人保一人。时逢学者吴汝纶在日本视察学务，吴稚晖前去恳托，请他代向公使请求允许9名自费生入成城。几天后，吴汝纶回复：关于保送九人人学堂之事，蔡公使已允可。

吴稚晖再访留学生监督夏某，夏某亦说：“昨日已闻此事，公使已命（日本）参谋本部书写公文。”

8月26日，吴稚晖突然接到了由吴汝纶转来的“参谋本部复蔡公使书”，拒绝了九人入学。其书云：“现由在京贵国留学生章宗祥等，保送江苏、浙江、江西自费学生九人，愿入成城学校肄业等因。准此。惟向例进学均由贵大臣保送，方准进校。今据来文，似稍与向例不符。仍请贵大臣亲行保送，以符向例……”

情况突变，留学生们心情十分紧张。第二天，吴稚晖与众保证人及要求入学之九人再往见吴汝纶，吴汝纶说：“参谋本部不答允，公使不允亲自保证，我亦无力左右公使。”

见吴汝纶无着，众留学生们径往公使馆。

到达公使馆，学生要求面见公使，公使馆负责学务的王宗炎向公使转达，一会儿出来说公使有事，不能接见。

留学生再强烈要求见公使，陈述理由，王宗炎再为转达，许久没消息。留学生正等待之际，公使馆的仆役来到会客室，要求大伙离去。双方你言我语，言辞渐趋激烈。

公使馆方面打电话请来了参谋本部的藤青少佐及外务省的小林通译官（翻译官）。

小林氏问明缘由，则说：“学生保送学生不行。要进成城学校，不必要公使保送，就是做买卖的亦好。”

留学生听此，更要见公使。僵持许久终未见到，小林氏与留学生相继离开公使馆。

留学生当天又到公使宅前，经反复请求，终于见到了公使。

公使说：“你们要见我，有什么话说，赶快说。”

吴稚晖说：“前求公使保送自费学生入成城学校，蒙示参谋本部复函，已邀允准。惟函内云，留学生自保学生，与例不符，仍请贵大臣亲行保送，以符向例。”

公使说：“你们这话从何说起？那一天吴大人拿了你们的证书送进来，本大臣马上就送参谋本部去了。这是参谋本部不答应，有什么法子可想。向来保送学生，终要有本国督府的咨文，或者有原籍地方官的印结才可保送。你们既没有咨文，我这儿又没有办过这种案卷。我如何能开这个端。吴大人来给我说：‘咱们政府屡次说述，自费学生不可再送。’这儿（参谋本部）福岛又这么说，我很为难。我跟吴大人说：‘即是他们在校的学生，五人保一人，该靠得住，姑且给他们碰一碰。’谁

知参谋本部不答应。你们要知道，本大臣从你们把保证书送来，就马上给你们办，又没有一点儿耽搁，这时候参谋本部不答应，其权操之于他，如何怪起我来。”

从晚五时至七时半，双方争执没有结果。公使召警察到场，给予保护，事情因而趋于恶化。

当天夜里，吴稚晖、孙揆均被日本警察带走。第二天二人返回寓所。

下午，吴稚晖前往警察署，抗议被捕之事，小林氏说：“逮捕的事，并非日本警察的主意，而是贵国公使的命令，你们何不向公使责问？”

吴稚晖往警署的同时，数十名留学生直闯公使馆，与警察发生口角，有20多人被捕，随即释放。

留学生被逮捕之事发生后，梁启超在横滨主办出版的《新民丛报》杂志连续作声援报道：《蔡使要求警察入署拘捕学生始末记》、《第二次要求警察入署拘捕学生始末记》、《敬告留学生诸君》、《上蔡公使书》、《留学善后事宜质疑》、《论留学生之责任与其箴言》等等。

8月5日，一警官闯入吴稚晖寓所，将他带到警视厅，给他看了日本内务大臣内海氏的命令：“自清国来本邦居留之吴敬恒、孙揆均二人，因触犯妨碍治安之例，飭令离开本国。特令彼二人于明朝六时，与巡警同乘火车至神户，即日登轮返国，此令。”

吴稚晖同时被告知：“此事纯因贵国公使的请求，我们警官才到公使馆逮捕留学生，绝非我国要行使强权，你们不要弄错，请离去吧。”

二人被押解出境时，吴稚晖跳河欲自杀，被人救起，其衣内有一封书，书中云：“信之以死，明不作贼，民权自由，建邦天则。削发维新，片言可决。以尸为谏，怀忧曲突。唏嘘悲哉，公使何与。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亡国之惨，将有如是，诸公努力，仆终不死。”

吴敬恒绝命作此。敬恒所以就死于大日本国者，奉劝大日本念唇齿之义，留学一事，不可阻碍。如欲兴我国家，尤以顾全私费学生之便利为最要。若专取现在政府之信用，恐未得其益，先受其害，因我国皇上方蒙难，官场之腐败为二十四史所少见。若大日本国官人久与相处，与之俱化，则支那之利益不可得，而大日本之良风隳矣。大日本良风一隳，将胥黄种人尽奴于白种人，岂不可哀矣哉。

又敬恒一人已伏其罪。一切被连引之孙君等，宜可复其自由归国之权。 光绪廿八年七月三日，即明治卅五年八月六日。”

吴稚晖自杀未遂事件发生后，更激起了留学生的愤慨，于是他们寄出了《留学生等致蔡公使书》，该书亦在《新民丛报》刊出，其文如下：

钦使大人节下

日前迭来晋谒，未睹钧颜。不数日间，乃日人遽来干涉。有吴、孙二君退去之命。诸生惶恐，莫知所为。不揣冒昧，敢竭愚忠，为左右陈之。

吾国晦盲否塞，孱弱极矣。内乱外侮，环视迭起。兵戈死丧之惨，牛马奴隶之悲，中原四顾，为期

匪遥。我生不辰，罹此巨厄。嗟乎，上下之人，亦可以知所鉴戒，急图救死矣。今同国之人，来寓斯土者，上有钦使，下有学生。为钦使者，当如何竭诚尽忠，以称其职；为学生者，当如何相勉相劝，期各致力，以报其国家。故设钦使漠视学生，以学生为不足恤，知己之可以为力而不为，或为焉而不力，是钦使负学生；负学生，即负国家也。设学生薄视钦使，以钦使为不足恃，知钦使可以为力而不请，或请焉而不坚，是学生负钦使；负钦使，即负国家也。钦使不愿学生负国家，学生亦岂欲钦使负国家哉。

乃知事有大谬不然者。吾国留学生欲学陆军，必入成城学校。入成城学校，必钦使咨送，是成例也。迩来有私费学生数人，求请咨送未蒙俞允。

窃谓私费留学，宜蒙奖励，乃反遭排斥，是何意耶？贤者用意，良非下愚所知。意者节下驻扎此邦，职重外交，故学生入学一事，可置之不问乎？然已入成城诸生，皆经咨送者也。抑官费学生，有王公大人之恃，当垂青眼，私费学生，下贱者多，宜遭白眼乎！然成城学生，未尝无私费者也。抑陆军定额节下预有成算，成城诸生，学成而归，已足干城之选，余者可概置不理乎？抑后来诸生，均有宿仇，不宜辅虎以翼乎？数者均小人臆度，君子谅不出此。然可以为力而不为，学生等疑惑不解者一也。

吴敬恒孙揆均等，亦留学生耳，热心爱国，不忍坐视，于是有联名环保之议。经吴京卿之请，而承节

下允准。惟不愿亲自保送，径以环保诸人向参署保送，该署因与向例不符，即行驳回。而节下不图更正，延搁至今。夫始不肯送，继因不得已而送。乃又不自保送，致参署照例驳回，而又不思更正。种种阻抑，学生等所疑惑不解者二也。

吴孙二君因此入署请谒，面陈衷曲，时因钦使适有要公，无暇接见。吴孙等忍饥以待，自午至夜，无有倦容。既得赐见，坐地陈辞，未尝失敬。至力争辞职等语，缘节下非喜誉恶直者流，故不自居于失言之列。况父有诤子，君有诤臣，古人以为美谈，载之史册。吴、孙之言，何以异此。上足追古人之遗风，下足矫当今之谀习。乃节下不察，始而忿不可遏，拂衣而去；继而电请警察，押入警署。夫学生本国之学生，警察外国之警察，借外人之威力欺本国之学生，稍有人心，当不出此。而节下竟毅然为之。是学生等大惑不解者三也。

翌日复有学生二十余人，相率求见；而警察林立，如临大敌，被捕者复有数人。辱士辱国，莫此为甚。数日前，日本政府遽命吴孙二君退去，警察遮护，无异虏囚。呜乎！逐吴、孙二君，辱学生，小事也；钦使与学生交涉，而日本政府强行干预，失国权，大事也。使退去之令，出于钦使之请，是钦使惟恐国权之不失，而求外人夺我权也。是惟恐学生有志，惟恐学生热心，已无辞摧残热心有志之学生，假手于外人以偿私志也。是惟恐有志之学生忠君爱国，

君祚长，国势强，已不能为贪官污吏，故挫辱之使无所成也。是惟恐热心有志之学生，国家必爱护之，辱士辱国之臣子，国家必惩罚之，诬以国罪，治以国法，无从为计，故不惜失国权而使外人治之也。呜乎！如是者，尚得谓人乎？贤明如节下，岂忍出此！是必外人无故而干预也。然事经数日，岂不知之，而漠不动心，一无所谋，是学生等大惑不解者四也。

要而言之，学生欲入成城学陆军。学生未尝自暴自弃以负国家也。环求咨送，坚请不已，未尝薄视钦使，以负国家也。吴孙二君不忍旁观，始而恳求，继而谏诤，终而受辱。是厚待同学，重视钦使，热心爱国者也。而节下始则不允咨送。继则不肯亲送，是失职也。负学生负国家也。不责己之不尽职，不咎己之不纳谏，反召外国之警察，捕本国之学生。及学生受无故被逐之大辱，仍袖手缄默若不闻。是大负学生，大负国家也。

前事往矣。节下忍以之待学生者，学生决不忍以之待节下。来者可追，今学生请之，愿节下允之。钦使职重外交，非专为留学生一事而设；然钦使自有照料留学生之责成。留学生万无要挟钦使之情理。若钦使不失其责成，学生何从而要挟。钦使苟失其责成，学生有恳请之实，自不得避要挟之名。此次钮璠等九人，尊谕本云徐图转圜，但徐而又徐，久之又久，吴、孙二君既冒昧而受巨辱，谅节下必不因此而食前言。仍请照例咨送。俾遂钮璠等入学之愿。书至此，

又见第二次尊谕。因有革逐劣生，辞退狂生在内。故碍难容送云云。夫无论革逐辞退不当其罪，改过即为无过，古圣明训，夫人知之。即不邀宽宥，而九人中除狂劣诸生外，可不容波及。仍请照例容送，至以为祷。以正吴、孙等急迫之罪，以明节下爱惜抚慰之心。此毓璠等所恳求者一也。

吴孙等初次求见，有力争辞职等言，是规谏非谩骂也。尊谕称之曰谩骂，盖举其词，以服人心。伊等多名列胶庠之士，或登桂籍，或任方州，非若贾竖贱贩者流，左弃筐篚，右绾组符之比也。况为入学之事特来请谒，以礼列坐，长跪谨对，毫无决敬之容。而尊谕称之曰突入、曰闯入、曰索送、曰要勒。非拟稿者措词失当，即深文周纳，借曰有之。而使馆为治外法权之地，何损于日人，而日人干预之耶？至道上行走，通衢阔达，区区数十学生，岂实不能容。而日本政府罪之曰妨害治安，窃所不解。即日妨害，数日之内，前后趋谒者，不下百人，吴、孙所识者，仅居其半，而独以妨害为二人罪，是何以故。虽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此列强外交家之要诀也。彼日以进，我日以让，得寸则寸，得尺则尺，涓流不息，将成江河。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惟有仰求节下具文驳诘，声明前事。囑其收回成命，彼如不允则力争，力争不允则要挟以辞职。钦使所以尽其职者在此，所以报国恩者在此。不然，学生求见钦使，彼即下令斥逐，求见钦使者益众，被斥逐者亦益众，势必尽逐而后已。

学生既尽，将继之以商人，商人既尽，将继之以钦使。缅想前途，怒然心伤。因循任之，势必至此。学生所恳求者二也。

所陈四惑，所求二事。容后趋谒台从，恭聆训诲。当言不言，学生即为负国之民；当争不争，钦使即为负国之臣。据理而谏，以身殉道，当仁不让，虽死无悔。呜呼！鬻拳要君，左氏美之；言论自由，文明公理。国步艰难之日，非阿附谄谀之时矣。专肃。敬请
崇安。统希
荃照不宣。

留学生 秦毓璠、张肇桐、
吴荣鬯、胡克猷、杨我江、
夏士骧、许家澍、钮 瑗、
顾乃珍、沈宏豫同上言

七月初九日

再之后，留学生与公使馆和警察又有几次冲突。

由于吴汝纶和外务省、东亚同文会等居中斡旋，事情终于有了结果，中日之间达成如下协议：

- 一 凡拟入日本文部省直辖学校者，须由东京同文书院、宏文学院、清华学校三校中之一校保送外务省，再由外务省咨送，方得入学。
- 一 欲经上述三校保送者，须具下列之资格：

甲在校半年以上，品行端正，成绩优良者；

乙旅居日本十年以上之男子，得校方认为适当，复得二人保证，并纳保证金三十元者。

- 一 曾在上述三校中肄业，但中途退学或遭拒绝保送者，未得该校同意，一概不得保送。
- 一 欲入海陆军学校者，当俟福岛少将回国后，再行商议。
- 一 依中国政府之复函，在日本设置留学生监督一员。

次年1月，蔡钧离任，9名学生进了成城^①。

3. 反对《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的运动

1905年，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又发生了规模浩大的反对《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②的运动。这一年，以反清革命为宗旨的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惧。留日学生有很多是同盟会的领导人员或会员，清政府请求日本政府对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加以镇压，于是，11月2日，日本政府发布了“取缔规则”。规则共有15条：

第一条 公立或私立学校，在许可清国人入学之时，于其入学申请书中必须附加清国驻本邦公使馆之介绍书。

^①成城学校入学事件，据李宗棠为调查该事件而写的《查办学生案日记》及《新民丛报》有关文章而写。

^②日语中取缔二字有管理、督束、监督之意。

第二条 公立或私立学校，得依清国学生本人志愿，于该校所定学科中，阙修一科或数科。

第三条 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立或私立学校，须备有关教职员名簿、清国学生学籍簿、考勤簿、以及来往书信文件登记册。

前述之学籍簿，须记载学生之姓名、原籍、年龄、住址、入学前之经历、介绍入学之官厅名称、官费或自费、赏罚、入学转学退学之年月日及其学年、毕业之年月日、转学及退学之事由等。

第四条 公立或私立学校，如欲许可清国学生转学或退学时，其申请书必须附加清国驻本邦公使馆之承认书。

第五条 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立或私立学校，须于每年一月及七月份两次将其六个月期间许可清国学生入学之人数，呈报文部大臣。

清国学生之转学、退学以及毕业人数，亦依上述规定呈报。

第六条 公立或私立学校，遇有清国学生毕业或飭令退学时，须于一个月内，将其姓名及飭令退学之事由，报告介绍其入学之清国公使馆。

第七条 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立或私立学校，经文部大臣认为适当者，将特选定之，并通告清国政府。

第八条 公立或私立学校，欲得前条所述之选定时，其管理者或设立者，须具下列事项，径向文部大臣申请。但依特别规定，即已申请或经认可之事项，得省略之。

一 该校教育清国人之沿革。

- 二 校规中关于教育清国人之规定。
- 三 校长或学校代表者之经历。
- 四 教员之姓名、资格、学业经历及担任学科科目。
- 五 清国学生名额及学年学级现在人数。
- 六 清国学生在校外之监督方法。
- 七 清国人毕业人数及毕业后之情况。
- 八 供清国学生使用之校舍及宿舍之蓝图。
- 九 经费及维持方法。
- 十 教科书、教具、器械及标本之目录。

前述第二项及第八项如须变更，须经文部大臣之许可。

第九条 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其供清国学生宿泊之宿舍或由学校监管之公寓，须受校外之取缔。

第十条 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不得招收为他校以品行不良而被飭令退学之学生。

第十一条 文部大臣如认为必要，得派员临视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之考试，或查阅考试问题及答案。

该员如认为考试问题或方法不适当，得命其变更。

考试问题、答案及成绩表最少须保存5年。

第十二条 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于每学年结束后一个月内，须将清国学生教育之概况，呈报文部大臣。

第十三条 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如违背此“规则”或其成绩不良者，文部大臣得取消其选定资格。

第十四条 依本“规则”呈报文部大臣之各种文件，须经由地方长官呈报。

第十五条 本令之各项规定，亦适用于小学及与小学同类

之各种学校。

附则：本令自明治三十九年（1906）一月一日起施行。

《规则》公布后，留日学生纷起反对，中国驻日公使杨枢令留日学生总会审决可否，以备咨复。留学生总会干事与各省同乡会干事对《规则》逐条加以研究，他们认为，多数条款旨在整饬营利之学校，但第9、10两条有妨学生自由，损学生人格。贵州同乡会干事韩汝庚说：“第9条剥夺我居住自由权，日本惟对娼妓有勒令居住于指定地点之规定，今直以娼妓视我也！第10条‘性行不良’一语，不知何者为良不良之标准？若以高谈革命为清廷所忌者，可以授意日本，诬指为‘性行不良’，而绝我入学之途，是其设计之险毒，可谓蔑以复加。故非取消此两条，决不能轻易罢休。”^①

会议决定，联名上书于公使，书云：

具稟留学生总会干事暨全体留学生，谨稟钦使监督大人阁下。窃生等于日本明治三十八年（1905）十一月二日官报中，见所载文部省令第十九号《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十五条，自三十九年一月一日施行。绎其文意，无非为吾国学生谋学课之改良，期教育之完善，以使异邦来学者得善良之结果，以归饷其本国，其用意，至为美矣。夫吾国来此

^①张篁溪：《1905年留日学生罢课运动始末》，载《文史资料选编》第33集，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87页。张氏亲历这场运动，并写了《记乙巳年留日同学反对颁布取缔留学规则运动事》、《篁溪笔记》，并留有当时日记，故《始末》一文记述准确、详尽。

留学者，日益加众，而日本所有公立私立学校，可令入学者，其美善者固多，然其未臻完善者亦非无有，此生等所未能无歉然于心而莫可如何者。今文部省乃起而整齐之，是吾国留学生之所望而不可得者也，故凡见此者莫不感慰。惟其中第九、第十两条，所规定范围极广，界限未明，将来施行之际，吾国留学生必有因此而受不利益之影响者。群情汹汹，或惧因此约束，遂有难于久留之势。生等揣文部省之本意，原为吾国学生谋利益起见，然一方为利益，一方必有不利益者。文部省于吾国学生实际情状与其困苦之处，容或未知而未顾及，亦事理之宜然。特将学生实状与此二条施行时之利害，略一陈述，祈鉴察之！

第九条云：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必须使清国学生住居宿舍或指定之旅馆，以加监督。

日本人士，近日多于东京市内设立各种学校，以教育清国学生为名，然其规模狭隘，学课不良，任学生之来去自由，而并不加校外取缔，实于吾国学生，非徒无益，而且有害，揣其目的，不过以射利为宗旨。文部省有此规则，是等学校，当不在其选定之列，且足以令吾国学生之求学者知所趋向，诚为吾国学生之利益矣。然日本各校之建设既久，规模较大，声名素著，向来所设之寄宿等，亦未必尽适宜，故吾国学生，常有不愿居住者。若一旦文部省所选定，一以此规程限制之，则吾国学生所受不利益之影响，必有如下之数种：

(一) 于经济有损害。吾国来此留学者，现已至数千人，其中官费少而私费多；私费之中，裕余者少而贫困者多。以贫困之人勉留于此，其衣服、居住、饮食等事，自不能不以价廉者为便利。使得自居于下宿屋，或数人赁屋合居，则可以己意为节省。若必欲使居于学校之寄宿舍或其监督之旅馆等，则食宿料即有一定之价格，凡同校者必皆一律而无差等，虽欲择别以为去留，势必有所不能。如东京各学校寄宿舍之学生，尚不过其食宿料价格无贵贱之殊耳。除食料以外，其余衣服冠履等类，尚皆由学生依其校制自行购备，精粗美恶，任个人之自由。然如某学校者，则无论其为校内或外塾，亦无论其为官费与自费，一月必须二十五圆。其所以为此之昂贵者，名为食宿料及教科书、衣服冠履等类之费一概在内，皆由学校代办。其实则教科书等应发者不发，衣服冠履等应制者不制，皆必以价廉而粗恶者以与学生。学生因书籍之不足以供研究也，衣服冠履等之不足以阅寒暑而被风雨也。求其改良，彼殊不问，无可如何，仍须自出经费，别自略办。甚至于洗濯衣服等事，按月亦限以次数，若欲求多，则亦当自出费。凡在彼校者，其书籍、衣服冠履等事之代金已每月照缴于学校，而究竟仍须自备。凡官费不得已而居其寄宿舍者，已无不因其种种计算而甚苦之。若将来自费生亦依文部省之规程，而逼以不得不入居，则试一计算，平日可以支三月之费用者，势必仅以供二月之费用而犹嫌不足。学

校得此文部省之规程，愈可以迫挟各学生，使尽入其范围，以遂其营利之目的，将无以异于专利之旅馆。而学生则以经济之受伤损，虽欲不弃其求学之目的，以矢志而归国，亦为势所不能矣！夫西洋各国，留学外国学生，其兼充工人以为学费者甚多，日清两国学生留学外国者，亦多如此。外国留学生之贫苦，原为事所常然，此当为所在国教育当事者之所怜护，而不能以庄严之格式求之。若西洋各国政府，而亦如日本文部省也，则日清两国学生之在西洋以必居寄宿舍等之故，而不能做工，势必不能更留。其影响之所至，与驱逐外国学生者当无以异矣！且日本国内学生，现今犹多兼贩卖牛乳等事，以为求学之费者，此日本教育界当事者所共知。是学生之贫富不一，未能以一律遇之而强相齐者。此国内与国外学生所同然，而非吾国学生皆为裕余，可不为虑及经济上之损伤也。

（二）于学问无补益。学校之有寄宿舍，必其关于学问上之设备完善，使学生入居于此者，可得学问上之补益，与居外者迥然不同，而后于学生为有益。东京所设各学校，其学问上之设备不完全，如前论教科书应发者不发等事，即其一端也。此外各学校管理若能严肃整齐，亦可使学生养成善良之习惯。然如数月前，某省官派学生数十人，居某学校外塾，诸学生见其管理太无秩序，要求改良，彼仍不顾；其后诸学生乃拟《自治规则》以自约束，求学校之承认，且为监督施行，其校长乃不得已而许之。如此等之寄宿

舍，则不特于学问无补益，且以养成不良之习惯，学生即入居之，亦何益也？

（三）于卫生有妨碍。以吾国现今之国势，既不能不求学于人国，则虽以何等之艰苦，亦当忍而受之。惟以达吾求学之目的，其余皆所不计，此稍有识者所能知之而能言之者也。然各国之习惯，亦有其原来之差别，骤强同之，转有生害者。如吾国人之饮食，自哺乳之时而与日本殊，吾国人之不卧地，自数千年而已然。何者为良，何者为恶，姑不必论，但习惯既久，其关系遂有影响于生理者，此吾国学生以饮食不宜而成胃病，以卧地潮湿而得脚气等者，时时有之。学生等之顾惜大体者，往往不肯以此等事要求学校，惧人之讥我求安适也。然此等事，在日本人则习惯成性，而在吾国人之于卫生，谓其无所妨碍，实亦颇有难言者。故此间吾国学生，于居学校之寄宿舍及居旅馆等外，尚多赁屋自居，自由布置者，于卫生上亦其一原因也。若尽强令居于寄宿舍及学校监督下之旅馆，惟一依学校之布置，而学生又耻为格外之要求，即要求之，学校亦可不应，则疾病必较加多，是可逆睹者也。

（四）于兼学不利。东京各学校中，为吾国学生特设一班，又或于专为吾国学生设立之学校中，别设专科一班者，常有之。吾国学生不皆人人肄业于一学校也，其以一人而兼赴二三学校听讲者，亦常有之。其居处必择二三学校之间适中之地，乃能便于奔走。

若各校之学生皆必居其寄宿舍及其监督下之旅馆，时居于甲校者，或以距乙校过远而不能兼学，或以乙校因其不居校舍有违文部省规程而不令通学，则学生必以专习一校为限。而兼习之道路已断，既与本人之志望相违反，而于吾国学生求学之方法，亦为不利益也。

以上四者，皆往事之经验，而学生之苦情。文部省徒知为吾国学生谋利益，而此种不利益之情况，必非所知。即令将来为文部省选定之各学校较此时略为整齐，然如前列四项之不利益，必皆为事实之所难免，文部省虽注意监察之，亦未见其能彻底改观也。

第十条云：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遇有曾经他校以“性行不良”而被斥退之清国学生，不得准其入学。

吾国学生来此日众，流品既杂，良莠不齐。欲使各学校之生徒皆得善良之结果，自当去其败群者，此亦洗涤学界之良法，实心求学之士无不颂美之者也。惟“性行不良”四字，范围甚广，各学校之办事人，若非实心为吾代谋教育，则不难利用此规定，而以爱憎行乎其间。从前各学校，或有因学课不良、教习不善、管理不得其宜等事，学生要求改良而犯学校之怒，斥令退学且欲通知他学校不得收入者。夫学生果真性行不良，则本无求学之资格，斥退乃其应受者，亦何能以咎学校。若关于学问上之要求，则或者以知识之不足，未能知教育者之用意，乃有之耳。若谓之

为“性行不良”而绝其求学之路，则其人以急于求学之原因，而得不能求学之结果，亦可冤矣！且学生之被斥革者，不仅皆为要求学课改良之一端而已也，即如上列关于经济及卫生等事而与学校争议者，亦间有之。在学生一方之举动，虽未必事事皆合事理，然学校之不完善，则亦事实所难辞。即令将来文部省选定之学校，亦未必遽能骤然大加改良，而学生之要求，或仍在所难免，皆事之可逆知者。若学校对于学课、卫生等之要求而有怒于学生，加以“性行不良”之名目令其退校，不得更入他校，则学生其何幸之有？且如前论，学校以寄宿舍及其监督下之旅馆，不皆可以居住之理由列有四项；若学生有以此四项为言者，是否即为“性行不良”之行为，亦一疑问。若不居其寄宿舍及其监督下之旅馆等者即为“性行不良”，则非为吾国学生谋居学校之便利，直以“性行不良”之名目，尽驱之聚居一处，为夺其居住自由权矣。且性行不良之人，非不可改悔者；若斥革退学之后而性行虽已改良，然犹不能复入他校，则是以一次之过失，而绝其终身求学之路也。夫各学校之收纳生徒，原可任其择别，其性行良者则收之，否则不收，岂非至易之事？何为不可慎之于入校之始，而必穷之于退校以后乎？此乃不利益之可见者。度文部省之用意，未必如上所言。然其影响之所至，则有必至于此者。此虽先事预言之，而可决其非过论也。

以上所列，乃举文部省《规程》中第九、第十两

条对于吾国学生可生不利益之影响者，特为述其利害与其苦情，以达大览。可否仰邀大力，照会日本外务省，转咨文部省，请其将《规程》第九条及第十条，允与取消之处，敬乞裁察！若能如此，则吾国学生，庶得以达求学之目的，而无不可复留之疑惧。是不仅学生之利益，抑亦两国交际之利益，而于日本代为吾国振兴学术之盛心，更为圆满无缺者也。特此肃稟。敬乞鉴察而图谋之。不胜引领待命之至！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稟

给公使书发出后，在留学生中逐渐传开，《规则》是清政府勾结日本政府而成。于是有人匿名投书于使馆，或称将公使置于死地，或称将剪掉公使发辫。

12月1日，有了“公议罢课”之说。3日，路矿学校留学生发出传单，言：“文部省颁布之《规则》，辱我国体，我辈当另结团体，誓死力争，必尽废此全部《规则》而后止。”他们号召5日全体留学生罢课。

4日，路矿学校首先罢课，实务学校、经纬学校亦随同罢课。

罢课风潮即起，停课者奔走呼号，四方联络。

5日，警察学校、同文书院、女子师范学校、宏文学院的三所分校等学校皆停课。是日，宏文学院尚有五人上课，因罢课者干涉课未终即退。

各校选出代表，成立了各校联合会，选胡瑛为总干事。会议制定了《学生自治规则》，条文如下：一，对于日本之个人，

不宜有恶感情；二，在旅馆及寄宿舍或下宿屋宜安静；三，不宜于停课期内游公园、上料理馆饮食，并不宜入各劝业场、各商品店购买物件；四，因有要事外出，宜自爱自重，勿致为警察干涉。

各学校门前还设了学生纠察员，监督检查，对私自行动定有罚例。联合会公布的《纠察学生自治规约》规定：

- 一 无论开会议事及寻常谈论，不宜喧哗。
- 一 各省宜举巡查员，严行稽查，为自治巩固计，对不自爱之人处以重罚。
- 一 各寄宿舍各旅馆，宜每日轮派弹正员纠察。
- 一 多约分路秘密探查，若有犯前约及续约之人，秘密探查员勿辞劳怨，轻则极力规劝，重则将其姓名报知该同乡会或总会馆。

以上诸条，实行纠察自治之事。我辈方以日本取缔规则为侵我主权，伤我国体，不甘任受，罢课争之，如因此闲暇，放荡游逸，令日本有所借口。且彼于此时，必令警察严加监视，制造口实，稍不自治，不惟抵抗无效，全国大体、个人名誉，貽羞无穷。故宜格外自治，互相勉勗，不可不谨！

法政大学于3日开会决议，本不主张停课。4日，两种观点的人互相冲突，课遂不停而停。5日，上课者已无几。6日，全校各班一律停课，主张罢课者声言：凡上课之人，须以“汉奸”治之。

东斌学校、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等校，也于6日停课。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于5日召开各班代表会，4个班主张停课，6个班不主张停课。然至次日，去上课者仅有12人，方至校门，即被罢课者所拦，双方几致斗殴，遂全部罢课。

6日以后，东京公立及私立各学校，除振武学校和女子实践学校，全部停课。与日籍学生合班听课的留学生，也相继停止到校。

中国留学生罢课后，日本各报相继登载，其中多有冷嘲热骂之事。留日学生陈天华愤而发怒，以死相争。8日，投大森东滨海峡而死。

在这场斗争中，留学生中间发生了较大分歧。据《秋瑾年谱》载：“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总数约八千余人，对此事的意见显分两派：一派主张立即退学回国，表示抗议；一派主张暂时妥协，忍辱就学。双方各争一词，互有辩驳，争之至烈，秋瑾属前一派。”她在“反对取缔规则”运动中，“异常活跃，一度担任女留学生代表。”^①

关于留学生在这场斗争中的分歧情况，《廖仲恺和何香凝》一书也有具体记载：在留学生“反对取缔规则”斗争中，廖仲恺和何香凝夫妇的态度一直十分鲜明。他们和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一样，一开始就“坚决主张同盟罢课，以示抵抗”。担负“反对取缔规则”会长的胡瑛和宋教仁等人，主张坚持罢课和全体归国，他们成立“留日学生联合会”。汪精卫、胡汉民等

^①郭延礼：《秋瑾年谱》，齐鲁书社1983年，第66页。

人收到孙中山从越南拍来的关于“不赞成留日学生全体归国”的电报后，和一些人搞起了个“维持留学生界同学会”，天天鼓吹不要再扩大事态，应劝告各校同学“一体上课”。在两派激烈辩论的情况下，廖仲恺夫妇认为，“孙先生不赞成留日学生全体归国是完全正确的”，全体归国的决定，虽出于义愤，但不够策略，“要说全体留日中国学生都罢学回国，不仅实行起来颇有困难，而且大批同盟会员回国之后，也有被清政府一网打尽的危险”。在行动上，廖仲恺与何香凝既注意说服胡瑛等人，遵照孙中山的指示，在斗争中掌握策略，又反对汪精卫等人攻击主张坚决反抗到底的同志们的错误作法。由于廖仲恺夫妇的耐心细致工作，“很多青年学生在这次斗争中受到了启发和教育”。

中国留日学生所进行的这场斗争，赢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日本的反对党也强烈指责政府的行径。在各种舆论的压力下，日本政府不得不对中国学生做出让步，答应了留学生的10多项条件。这场斗争，以留学生在一定程度上的胜利而结束。在这场斗争中，留学生中有很多人归国以示抗议；在斗争胜利之后，留学生又陆续返回日本。

4. 出现在东京的女子留学生

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中，开始有了女留学生。女留学生首先出现在东京。

据1901年12月调查，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有3

名女学生^①。可惜她们的姓名至今人们不详。这是中国女学生自费留学日本的开始。1902年夏天，又有20余名女学生赴日留学。她们最初随父兄或夫婿一同留日，后来变成了单独留学。初期自费留日的女学生，绝大多数出身于比较富有的家庭，并且年龄参差不齐，“长者二十余，幼者八九岁”^②，她们有的进女子大学校，有的进高等女学校，有的甚至进幼稚园。

1905年，湖南20名女学生留日，成为中国官派女留学生之始。这20名女留学生是：

姓名	籍贯	年龄
聂缉熙	湖南衡山	48岁
黄宪祐	湖南善化	43岁
杨庄	湖南湘潭	28岁
张汉英	湖南醴陵	29岁
朱秀松	湖北江陵	25岁
凌樵松	湖南平江	23岁
姚宁生	江苏上元	22岁
黄国厚	湖南长沙	22岁
许馥	湖南善化	21岁
曾尚武	湖北江陵	19岁
朱敬仪	湖北江陵	17岁
陈光璇	湖南长沙	17岁

①《日本留学生调查录》，《选报》第10期。

②《共爱会同入劝留学启》，《江苏》第6期。

许璧	湖南善化	18岁
黄华	湖南湘潭	29岁
王昌国	湖南醴陵	29岁
许薇	湖南善化	23岁
吴双	湖南湘潭	17岁
黄国巽	湖南长沙	17岁
黄辉	湖南长沙	15岁
胡懿琼	湖南湘潭	14岁 ^①

以上20名女学生，前13名学习师范科，后7名学习工艺科。另外，奉天省派遣熊希龄到日本视察教育后，便与下田歌子约定每年遣送15名女学生到实践女学校肄业。1907年，奉天女子师范学堂派出21名学生到实践女学读师范科。江西省也派出10名官费女学生到实践女学读书。云南省派出13名女官费留学生。此外，还有一些自费女学生补了官费。1907年，仅在东京一地，就有约100名中国女留学生。1908年，中国留日女学生为126名，1909年达到了149名，她们多数是自费生。为接纳和教育中国女子，1904年，下田歌子的实践女学校专门设立中国留学生分校。1905年3月，东亚女校附设“中国女子留学生速成师范学堂”；1906年12月，成（蹊）女学校特设“支那女学生部”，接受中国女学生。当时中国学生主要集中在这几所学校，尤其以实践女校为最多。除此之外，日本其他十余所学校也有中国学生入学就读，如女子美术学

^① 见《中国留东女学生》，《顺天时报》1905年8月4日。

校、日本女子大学校、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东京女医学校、共立女子学校、高等女子实修学校、三轮田女学校、高等圭文美术学校、东京音乐学院、女子学院、目白女子大学、千叶医学专门学校、长崎的活水女子学校等。她们所学的专业，以师范、家政、工艺科为多。

提起清末女学生留学日本，必定要提起下田歌子，因为她为中国女留学生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下田歌子，原名平尾 铎岩村藩人，丈夫下田猛雄病歿后，致力于女子教育工作达 20 年之久。其间曾赴欧美各国观妇女活动，返日后，竭力普及中等以下阶层之女子教育，成立帝国妇人协会，帝国妇人协会先后于 1899 年成立实践女学校与女子工艺学校。1905 年 7 月，校长下田歌子为了接收 20 名湖南女学生在赤坂桧町成立中国留学生分校，本科学制为 2 年，特别科为 1 年，特别科以师范速成科和工艺速成科为主。1909—1910 年两年中，共有 67 名中国留学生从该校毕业。1909 年毕业生共 40 人，其中工艺科 20 人，师范科 14 人，中学科 6 人。1910 年毕业生共 27 人，其中师范科 13 人，中学科 4 人，工艺科 6 人，幼儿园速成保育科 4 人。辛亥革命后，实践女子学校失去了中国女子留学教育的中心地位。

1906—1911 年间，女留学生的情况可见下表：

1906—1911 年留日女学生统计表^①

学习学校	姓名	籍贯	费别	到日年月	入学年月	所学科目
实践女学校	王 诗	四川成都	官费	1904.6	1904.10	工艺科

^① 谢长法：《清末的留日女学生》，载《近代史研究》1995 年 2 期，第 276—279 页。

第一篇 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的兴起和高潮

续表

学习学校	姓名	籍贯	费别	到日年月	入学年月	所学科目
实践女学校	邱新荣	广东	自费	1905.3	1905.10	中学科
	胡懿琼	湖南湘潭	官费	1905.7	1906	工艺科
	王昌国	湖南醴陵	自费	1905.7	1910.2	幼稚园 保育科
	徐秀荣	奉天开原	官费	1906.5	1906.5	工艺科
	吴汝震	安徽舒贻	官费	1906.5	1906.5	工艺科
	田应弼	湖南凤凰厅	官费	1906.5	1906.5	补修科
	邱兆东	四川	自费	1906.9	1907.3	本科
	袁笃修	湖南	自费	1906.11	1909.12	保姆科
	邓启华	湖南	自费	1906.11	1909.12	保姆科
	周秀贞	奉天铁岭	官费	1907.4	1907.4	师范科
	冯淑歆	奉天承德	官费	1907.4	1907.4	师范科
	崔可言	奉天承德	官费	1907.4	1907.4	师范科
	曾淑琛	奉天承德	官费	1907.4	1907.4	师范科
	马淑恒	奉天承德	官费	1907.4	1907.4	师范科
	陶淑凤	奉天承德	官费	1907.4	1907.4	师范科
	韩淑玉	奉天承德	官费	1907.4	1907.4	师范科
	陶淑贞	奉天承德	官费	1907.4	1907.4	工艺科
	耿桂英	奉天承德	官费	1907.4	1907.4	工艺科
	徐锦屏	奉天开原	官费	1907.4	1907.4	师范科
	杨启东	奉天法库	官费	1907.4	1907.4	师范科
	禧扈云	奉天铁岭	官费	1907.4	1907.10	工艺科
	张 执	湖南善化	奉天官费	1907.4	1907.4	工艺科
	郭 珊	浙江山阴	奉天官费	1907.4	1907.4	工艺科
	张 珺	浙江钱塘	奉天官费	1907.4	1907.4	研究科

续表

学习学校	姓名	籍贯	费别	到日年月	入学年月	所学科目
实践女学校	李锡锦	浙江会稽	奉天官费	1907.4	1907.4	师范科
	韩淑志	山东黄县	奉天官费	1907.4	1907.4	师范科
	束静涵	江苏丹阳	奉天官费	1907.4	1907.4	工艺科
	朱 徵	江苏宝山	奉天官费	1907.4	1907.10	中学科
	赵顾玫	江苏上海	奉天官费	1907.4	1907.10	中学科
	欧阳雅琴	江西南城	官费	1907.5		
	陶淑仙	浙江	奉天官费	1907.6	1907.6	工艺科
	马玉瑛	奉天	官费	1907.9	1908.4	中学科
	陆嵩玉	奉天	官费	1907.10	1908.9	编物本科
	金振声	湖北黄陂	江苏官费	1907.10	1907.11	工艺科
	贺 莹	湖南清泉	官费	1907.10	1908.7	
	黄自立	湖北	自费	1907.12	1908.4	编物科
	程 竞	河南洛阳	官费	1909.2		中学科
	王葆芬	奉天承德	官费	1909.3	1909.3	工艺科
	日本女子 美术学校	何香凝	广东南海	官费	1902. 冬	1908.11
陈惠馨		广东	自费	1903.11	1906.10	编物科
鲍桂娥		广东	自费	1903	1906.5	刺绣科
朱 华		江苏	自费	1905.8	1907.5	
吴巽华		四川达县	官费	1906.3	1910.3	编物科
廖冰筠		广东	自费	1906.5	1908.5	刺绣科
马淑和		山东兰山	官费	1906.8	1909.10	西洋画科
陈静怡		广东	自费	1906.8	1909.5	编物科
魏象环		四川	自费	1907.5	1908.3	造花科
冯擷英		浙江仁和	奉天官费	1907.6	1907.8	西洋画科
谭佩鏞		广东	自费	1907.10	1908.4	刺绣科

续表

学习学校	姓名	籍贯	费别	到日年月	入学年月	所学科目
日本女子美术学校	谭纫秋	广东	自费	1907.10	1908.4	造花科
	张志俊	浙江	自费	1908.3	1908.4	
日本女子大学	李元	湖北罗田	官费	1904.5	1908.3	英文科
	黄辉	湖南长沙	奉天官费	1905.7	1909.5	英文科
	黄国巽	湖南长沙	奉天官费	1905.7	1909.5	教育科
	陈德馨	浙江山阴	官费	1905.10	1907.5	博物科
	马君干	安徽桐城	官费	1906.8	1907.2	理科
	杨希孟	陕西	自费	1905.4	1908.10	师范科
大成女学校	田思平	江苏	官费	1905.9	1908.10	师范科
	笕尊三	江苏	自费	1906.6	1908.12	师范科
	祝赛贞	江西	自费	1906.10	1907.4	师范科
	王余景蓉	四川	自费	1907.7	1908.10	师范科
	葛文媛	湖北	自费	1908.3	1908.11	师范科
	李世箴	江西	自费	1908.7	1908.10	师范科
东京女子音乐学校	刘莲淑	广东	自费	1904.5	1908.3	
	许璧	湖南善化	奉天官费	1905.7	1907.10	
	唐群英	湖南衡山		1905.10	1909.8	
	殷复权	江苏	自费	1906.8	1907.3	
	滕卓	湖南	自费	1906.9	1906.11	
	陈从志	奉天承德	官费	1907.10	1908.9	
东京高等女子师范	汪平	湖北罗田		1904.5	1909.10	专攻科
	方君瑛	福建侯官	自费	1905.11	1907.4	专攻科
	张佩芬	云南太和		1906.10	1909.3	理科
	杨荫榆	江苏无锡	官费	1907.10	1909.5	理科
东京女子师范学校	伍崇敏	江苏上元	直隶官费	1904	1907.7	
	李鼎香	陕西蒲城	官费	1905.9	1908.2	

续表

学习学校	姓名	籍贯	费别	到日年月	入学年月	所学科目
	黄誉珍	江西萍乡	官费	1906.4	1909.3	
东洋女艺学校	张蕙东	湖北	自费	1907.4	1907.9	专修科
	吴玉梅	江西	自费	1907.8	1909.5	专修科
	齐 辉	浙江	自费	1908.2	1908.3	造花摘 细工科
	富伯贞	奉天	官费	1908.6	1908.6	造花摘 细工科
东京蚕业讲习所	胡灵媛	广东	官费	1905.9	1907.9	制丝科
	李哲子	湖北	官费		1907.10	制丝科
	潘 英	江苏吴县				
	叶若萱	福建闽县				
东京女医科	熊松雪	江苏溧水	直隶官费	1905.10	1908.10	
	苏淑贞	广东顺德	官费	1906	1909.4	
	黄道邻	广东南海	官费		1908.7	
女子职业学校	潘承昆	江苏	自费	1906.2	1907.10	图画刺 绣科
	潘承冠	江苏	自费	1906.2	1907.10	造花科
修技女塾	袁希滨	江苏	自费	1908.5	1909.5	摘科
	唐桂英	江苏	自费	1908.9	1909.2	
东京女塾	徐夏宣	江苏	自费	1907.11	1909.3	选科
神户女学院	王季昭	江苏	官费	1907.9	1907.11	理科
日本音乐院	陈月贞	奉天	官费	1907.10	1909.12	音乐科
奎文女学校	韩淑瑶	奉天	官费	1906.6	1906.10	研究科
吉冈女子学校	朱葆贞	江西	自费	1908.7	1909.7	高等科
官立女校	王鹤传	湖北江夏	官费	1905.8	1909.4	技艺科

续表

学习学校	姓名	籍贯	费别	到日年月	入学年月	所学科目
横滨女子实业补习学校	杨励予	广东	自费	1905.11	1906.8	造花部
英佛和高等女学校	桂圆城	江西德化	官费	1907.5	1907.5	
东京女子体操音乐学校	王慧贞	奉天	自费	1906.9	1906.11	
京都女子高等手工艺学校	樊 慧	浙江	自费	1908.8	1908.9	造花科
日本妇人美术造花学校	郭照澜	安徽	自费	1904.8	1905.9	高等科
体育会女子部和洋裁缝学校	滕 超	湖南	自费	1906.11	1906.11	
东京保姆传习所	余 铭	江苏奉贤				
神田数学学校	李 瑛					

另外，在1906年到1911年间，留日女学生中，其姓名可考者尚有：方萌、王颖（方声洞妻）、李自平（冯自由妻）、吴木兰、马秋仪、方国瑛、李竟成、王振汉（徐锡麟妻）、周怒涛、徐亚尊、张旭、张维英、张维西、张鹦子、曾醒、康同荷、郑萌、陈梦飞、陈湘芬（陈范妾）、陈璧君、陆恢权、潘世英、刘青霞、蔡惠、李椿生^①。

留日女学生除学习十分认真外，也同男留学生一样，积极参

^① 孙石月：《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年，第106页。

加社会活动。她们先后组织了共爱会、中国留日女学生会等多个团体，并积极参与了拒俄运动等多次留日学生的进步活动。对中国女留学生，下田歌子作了如下评价：“中国妇人情性可特书者，约有三端：一、性情伶俐，学问易成是也。中国妇女概言之，伶俐且敏慧，教以一事，不崇朝而已谙熟不忘，亦有以一隅反三者，加以素有汉学之根蒂，如文学，概多明大体。”“二、善娴交际，而巧应对是也。……至与人交际，敏而且慧，巧于应对，初不可以固陋卑屈视也。”“三、妇人情性与美人酷肖是也。吾邦妇女，以温顺与贞婉为美德，犹不无一种抑屈之虑，至交际一途，逊于中国妇人甚多。今视其情态，旋似美国妇人，此明标进取气象者，非吾邦妇人，专以温顺贞婉为要之可比也。”^①

20世纪初，在封建氛围浓厚的中国，一批批女学生赴日留学，不仅在留日运动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而且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亦有重要的意义。对此，有人作了这样的评价：“清末的女子留学运动，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这些女留学生，绝大多数是抱着救国救民解放妇女的愿望出国学习，寻找救国真理的。她们在异国他乡勤奋学习，以便学成后归来报效祖国，献身妇女解放事业。她们在国外结团体，开展爱国运动和革命活动，为妇女投身于民主革命和妇女解放斗争作了思想准备。不少人后来成为民主革命者和妇女解放运动的积极活动家。”^②

^① 下田歌子：《述教育中国妇女事》，《顺天时报》1907年1月12日。

^② 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第247页。

第 三 节

蓬勃发展的留学生团体

1. 留学生团体纷纷成立

清末，中国留学生怀着学习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寻求真理、振兴国家的美好愿望，踏上了留学日本的道路。留学，不仅使他们学习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思想上也得到了陶冶，特别是社团意识得到提高。从1898年东京九段体育会成立开始，到1910年两湖铁路会成立，几乎每年都有新的留学生团体成立。这一时期留学生建立和参加的部分团体可参见下表：

清末中国留学生建立和参加的部分团体一览表^①

团体名称	成立年代	主要创建人或参加者
东京九段体育会	1898	蔡锷、林锡圭
励 志 会	1900	唐才常、叶澜、黎科
译 书 汇 编 社	1900	戢翼翬、陆世芬、雷奋
广东独立协会	1901	欧榘甲、李自重
青 年 会	1902	金邦平、叶澜、周宏业
留 学 生 会	1902.2	钱洵、蔡锷
教科书译辑社		陆世芬

^① 李喜所：《辛亥革命前的留日学生运动》，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635页；本书在此基础上又有所辑录。

续表

团体名称	成立年代	主要创建人或参加者
湖南编译社	1902	杨度、周家树、杨毓麟、黄兴、张孝准
国学社	1903	张肇桐、叶澜、秦毓璠、汪荣宝、稽镜
浙学会	1903	龚宝栓、鲁迅
土曜会	1903	湖南留日生
青山军事学校	1903	孙中山、胡毅生
闽学会	1904	福建留日学生
拒俄义勇队	1903.4	蓝天蔚、陈天华、王璟芳
共爱会	1904.10	秋瑾、胡彬夏
演说练习会	1904	宋教仁、秋瑾
新华会	1904.1	余焕东
洪门三合会	1904	梁慕光组织，留日生加入
革命同志会	1904.12	黄兴、宋教仁
十人会	1905	秋瑾、刘道一
社会主义研究会	1905	景梅九等
赤十字社	1905.5	胡彬夏、林宗素、钱丰保
军国民教育会	1903.5	秦毓璠、叶澜
丈夫团	1905.8	黄兴、李书城、蒋作宾
明明社	1905	朱炳麟、景梅九、唐宝忠
春柳社	1906	谢抗白、李涛痕、曾孝谷、李叔同
留日女学会	1907	燕斌、刘青霞
共进会	1907.11	张伯祥、刘仲文、邓文辉
政闻社	1907.7	梁启超组织，留日生加入
两湖铁路会	1910	两湖留学生

上述仅是清末留日运动期间出现的部分团体，除此之外，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团体还有很重要的一大类别，即各种同乡

会组织，其中比较活跃的有 10 个左右。加上以上所列各团体，同留学运动有关的团体至少有近 40 个，实际上可能更多一些。

从各个团体与留学生的关系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完全由中国留日学生组建的，例如，励志会、译书汇编社、留学生总会、共爱会、拒俄义勇队、留日女学生会等等；一类不是、或不完全是由中国留日学生组建的，但有留日学生参加，或留日学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青山军事学校、政闻社等等。

从各个团体自身的性质看，大体有如下几种类型：一是公益团体，如留学生会馆、留学生总会等；二是同乡团体，如各省留学生组织的同乡会；三是文化团体，如编译社、演说练习会、春柳社等；四是爱国团体，如广东独立协会、拒俄义勇队、赤十字社、两湖铁路会等；五是反清革命团体，如青年会、青山军事学校、共爱会、军国民教育会等。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团体，即秘密会社（会党）团体，例如三合会、三点会等。

当然，不少团体的性质不是单一的，因而它们之间也没有十分严格的界限。有的团体可能既是文化团体，又是爱国团体；有的团体可能既是同乡团体，又是公益团体；有的团体可能既是秘密会党团体，又是反清革命团体。总之，任一留学团体往往既有多重性质，又有比较突出的倾向。由于多重性质，使各团体之间互相渗透；由于倾向突出，使每一个团体有了其特定的作用。

2. 留学生团体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清末留学生团体，按照它们的历史发展，大致可以以

1903年4月为限划分为两个阶段。

清末留学生团体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从1898年始到1903年4月拒俄义勇队成立止。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留学生的文化团体和公益团体得到了比较充分发展，成为本时期成立最多的两种团体；爱国团体有了初步发展；反清革命团体则处于萌芽阶段。

这一阶段留学生的文化团体和公益团体有东京九段体育会、励志会、编译社和留学生总会等。这些团体对政治也表示有不同程度的关心，但主要是从事学习、研究一些问题，并组织各种有关活动。东京九段体育会是留学生成立的第一个团体，以学习日本兵式体操和射击打靶等体育活动为主。译书汇编社的译书活动，是中国留学生译书活动的开端。励志会是清末留学运动史中著名的团体之一，该会成立时确定宗旨为“联络感情，策励志节，对于国家无政见”，章程中有“研究实学以为立宪之预备，养成公德以为国民之表率，重视责任以为辨办之基础。”^①

留学生总会的前身是清国留学生会馆，它是负责组织、指导留学生赴日、学习、日常生活、业余活动等项事务的一个自治团体。冯自由在回忆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时写道：“1901年^②，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开始激增，是年秋冬间遂有中国留学生会馆之组织，馆址设于骏河台，外观颇为宏伟，由各省学生

^①《译书汇编》第6期，转引自李喜所：《辛亥革命前的留日学生运动》，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第636页。

^②据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称：“清国留学生会馆在1902年建成”，见该书第168页。

开全体大会选举干事若干名以处理之。开幕之日，鄂省士官学校学生吴禄贞宣布开会辞，谓此会馆之于中国，无异美国之独立厅云。会馆成立后，以经费支绌，乃请清公使蔡钧拨款补助，蔡钧要求须将中国二字改为清国，始允所请，干事会不得已许之。”次年“是冬会馆以经费不足，通知各省学生同乡会请代征收每人月费以资维持。照会章每一学生须纳月费三角，由同乡会代收缴付。自会馆改名清国后，学生借口不交者，大不乏人。因是发生种种纠纷，而干事会遂穷于应付，……讨论结果，卒通过缴纳月费与否任人自由之议案”^①。

这一阶段留学生的爱国团体主要有广东独立协会、拒俄义勇队。这些爱国团体的特点是，组织结构松散，参加的人员广泛，有革命派、改良派和无党派，有青年学生、贵族子弟、留学的官绅等。这些团体的政治主旨是爱国，基本上没有提出反清的问题。围绕着爱国，它们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斗争方式多采取请愿、通电等合法手段。它们存在的时间也较其他性质的团体短暂。广东独立协会是反对将广东割让与他国而成立的一个很短暂的留学团体。

1903年在留学生组织团体的运动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拒俄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产生了拒俄义勇队。拒俄义勇队虽仅存在了一个多月，但它对清末留学生革命运动的发展与留学生革命团体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这一阶段的留学团体中，各同乡会相继产生和发展，比较活跃的有云南、湖南、湖北、浙江、福建、山西、四川、广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99—100页。

东等同乡会。同乡会成立的动因，据《江苏同乡会创始纪事》^①一文报道：江苏留日生认为“国之存亡，要以能群不能群为断。而欲成大群，又必集合小群相联结。故各省团体不固，不独无以联情谊，抑亦何以立自治之本以战胜于生存竞争之域？于是有同乡会之议。”各省同乡会成立之后，十分关注本省的各方面情况，四川同乡会曾为川汉铁路修筑权发布《敬告全蜀父老书》，浙江同乡会曾发电抗议绅商盗卖浙江矿权。

这一阶段由中国留日学生直接创建的反清革命团体主要有青年会，其他还处在萌芽状态。1902年4月，章太炎、秦力山等人发起召集“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鼓动了留学生组织反清革命团体活动的发展。1902年冬，原励志会部分成员组成了青年会，这是留学生界第一个比较稳固的、带有浓重的反清革命色彩的团体。

这一阶段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译书团体。

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翻译日文书的高潮，最主要的译者是大批中国留日学生。他们留学日本后，极力想把新思想新知识介绍给国内。留日学生第一个翻译团体译书汇编社即称：“同人等负笈他邦，输入文明，义不容辞。”^②

留日学生译书，其中相当部分是译书团体所为。他们的翻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

译书汇编社的成员大多是励志会的成员，除戡翼鞏外，还

^①《江苏》杂志第1期，第145—146页。

^②《译书汇编》第2年第1期，1902年4月3日。

有东京专门学校学生金邦平、杨廷栋、雷奋及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学生陆世芬等，他们译书多，影响大。

教科书译辑社，是译书汇编社成员陆世芬所创，基本上可以看成是译书汇编社的一个分社。教科书译辑社主要是译日本的中学教科书，以供国内中学采用。

《江苏》杂志第一期载，教科书译辑社所刊行的书有：《中学地文教科书》（神谷市郎著）、《中学物理教科书》（水岛久太郎著，陈槐译）、《中学生理教科书》（美国斯起尔原著，何焯时译补）、《中学化学教科书》（吉田彦六郎著）、《中学代数教科书》（陈槐译）、《中学几何教科书》（周家彦译辑）、《物理易解》（陈槐译辑）、《中学地理教科书》（夏清贻译辑）、《普通经济学教科书》（王宰善译辑）、《社会学提纲》（美国吉登葛斯原著，吴建常重译）和《国家教育》、《教育原理》等。

另据《译书汇编》第二年第三期的广告，教科书译辑社的译书计划还包括《伦理学》、《东洋史》、《西洋史》、《平面三角学》、《中等植物学》、《中等动物学》、《新式矿物学》、《体操教范》、《法制教科书》、《中等管理教授法》、《中等万国地理》、《图画术》等教科书。

从以上书目看，教科书译辑社所译之书，几乎涉及中学的史地、数理化、动植物以及体操、图画等中学的所有学科，他们译书，缓解了国内各新式学堂急需大量中学教科书的紧张形势。

湖南编译社，其成员杨度、周家树等人多是湖南留日学生中的佼佼者，他们“所译以学术、教育、军事、理财、时事、历史、地理、外论为主；其余如中外近事，各国现今之风俗习

尚，材技艺能，无论书报，择其尤者，由同人分译，皆于题下或文后旁注揭明所译原书名及著者姓氏，或于一书中摘译精华，亦必载明摘译某氏、某书报。”^①

湖南编译社发行的刊物《游学译编》，1902年11月创刊，至1903年11月，共出版了十二册。其译文十分广泛，如《支那地理概述》（梶原陈政）、《经济政策论》（天野为之）、《武备教育》（民友社编）、《十九世纪学术史》（太阳报）、《学校行政法论》（山田邦彦）、《支那之耶稣教与日本之耶稣教》（松村），它还刊登过有关世界各国历史与现状的译著，如《记十八世纪末法国之乱》、《十四年来的德意志》、《埃及亡国惨记》、《列强在支那的铁道政策》等。

湖南编译社还出版了一批日本著作的中译单行本，如《史学原论》（浮田和民著，杨毓麟译）、《国家学》（贺长雄著，许直译）、《政治学大纲》（小塚喜平次著，杨君译），以及《文明史》、《哲学大观》、《支那哲学史》、《宗教研究》、《地学概论》、《新国民之资格》、《日本矿山学》、《国际地理学》、《国际调查法》等。

国学社，是由张肇桐、叶澜、秦毓蓁、汪荣宝、稽镜等江浙留日学生为主创办的，成立于1903年。国学社先后编译了一批中小学教科书，如秦毓蓁、稽镜编译的《中学读本》、《小学读本》，汪荣宝编译的《中学文典》、《中学国史》、《小学国文典》、《小学国文史》，叶澜编译的《中学本国地理志》、《小学地理志》，周逵编译的《法制教科书》、《经济教科书》等。

^①《游学译编》第二册，1902年12月。

国学社还编译了一些专著，如稽镜辑译的《国体政体概论》，黄以仁译的《中江笃介》，董鸿祎辑译的《中俄交涉史》等。

闽学会，是福建留日学生发起成立的，始创于1904年，出版有《西力东侵史》（斋藤阿具著，林长民译）、《哲学原理》（王学来译）、《史学原论》（浮田和民著，刘崇杰译）、《人种志》（鸟居龙藏著，林楷青译）等等。

留日学生团体以及其他留日学生译书，为20世纪初中国近代文化的引入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3. 留学生团体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清末留学生团体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从1903年5月军国民教育会建立始，到1910年两湖铁路会产生止。这阶段的特点是，反清革命团体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本时期占主导地位、在留学生中影响最大的一种团体。文化团体与爱国团体等类组织平稳发展，新成立的少，也没有形成轰轰烈烈的社会效应。

留日学生组织的反清革命团体大发展是从拒俄义勇队成立之后开始的。拒俄义勇队成立之后，向清政府要求回国开赴前线抗击沙俄。清政府不但拒绝了学生的要求，反而下令逮捕参加拒俄运动的学生，在上海，封闭了革命报纸《苏报》，逮捕了邹容与章太炎。从这些事件中，青年学生认清了清政府的反动本质，得出了要爱国只有革命的结论，留学生团体也从爱国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在拒俄义勇队之后，相继产生的反清革命团体有军国民教育会、共爱会、青山军事学校等。

青山军事学校是孙中山先生“于同盟会成立前手创之一秘密组织，”^① 1903年夏，由于中国赴日“私费学生之有志入陆军初级的振武学校者，常因清使馆严厉禁阻，不能入学，咸怀失望。同志李自重、黎勇锡等以此向总理求助，总理乃与日本同志武官日野熊藏少佐商设军事学校，以收容有志青年，是为兴中会特设之军事教育机关。……是校设于东京青山，日野自任校长，陆军上尉小室健次郎为助教，均属义务性质。是校仅收容学生李自重……等14人，……开学之前，各生均须向总理宣读誓辞，辞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② 该团体原定学期8个月，后因孙中山离日游美，校内各树派别，意见分歧，4个月后不得已宣布解散。

共爱会也是这一阶段建立的反清革命团体。据《秋瑾年谱》载，1904年10月，“瑾与留日女生陈撷芬等在留学生会馆召开大会，重组‘共爱会’，名之曰‘实行共爱会’，‘宗旨是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主张女子从军，救护受伤战士，一面通信国内女学，要求推广’。众推陈撷芬为会长，潘英为书记，瑾任招待。”^③ 该会会长陈撷芬是《苏报》发行人陈范的长女，曾受到《苏报》革命宣传的很大影响。“到日本后，她加入了反清秘密会党三合会和留日女学生组织的‘以拯救二万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具国家之思想，以得尽女国民之天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第38页。

^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18—19页。

^③ 郭延礼：《秋瑾年谱》，齐鲁书社1983年，第46页。共爱会成立当在1904年7月之前（参见陈象恭编著：《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中华书局1983年，第16页）。

职为宗旨’的妇女团体共爱会，积极参加拒俄运动，随后又和秋瑾一道改组共爱会为实行共爱会，被推为会长。”^①

共爱会的章程如下：

第一节 宗旨

本会以拯救二万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为宗旨。

第二节 办法

(甲) 先组织在东留学女子之团体，互相研究女学问题，以渐达其权力于祖国各行省。

(乙) 本会会员公认本会为其托命之所，凡本会之成立及其发达，各会员当以女学上之运动为其唯一之责。

(丙) 本会公选会员四员，每月各作论说一、二篇，交事务长代为登报，以流达于祖国。

第三节 职掌

(甲) 公选事务长一员，凡会中一切事物皆属之。

(乙) 公选书记一员，掌通信记事之事。

(丙) 公选评议员二员，佐事务长，以评议本会种种之办法，改良及其发达。

第四节 规则

(甲) 职掌会员由投票公选，每三月改选，或连选及他选，皆以投票决之。

^①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59—560页。

(乙) 每月开会二次，以月之第一日曜日及第三日曜日为率，下午一时起至二时止。遇有要事可开临时会，日期由事务长择定。

(丙) 凡遇举人决事，会员到者须有三分之二，方可议决。

(丁) 会员中如有特议之事，得三人之赞成，可开临时会。

(戊) 开会时，会员均须一律到会，如有要事，须先函知，开会时由书记报告同人。

(己) 开会时，首演说，次议会中之事。

(庚) 演说以循环法，每次三人，用拾票检定甲乙。

(辛) 会员每月须纳会费一角，于开会时纳之事务长。

(壬) 演说议事时，不得谈笑，阻人听闻。

(癸) 职员既承公选之后，不得放弃其责任。

这一时期留学生反清革命团体的特点：一是与革命党有着较多联系，参与革命党反清革命活动，青山军事学校这样的团体还是在革命党人直接领导下成立的。二是参加人员比较少，规模小，有的崇尚少数人的暗杀活动。三是组织严谨，每个团体都有一套较为严格的管理办法，有的人会时要有人介绍，要宣誓，活动有严密的监督系统。四是活动采取秘密方式，多以其他公开活动作掩护。

1904年秋，秋瑾加入了反清团体三合会，其《年谱》中

记载了入会过程及仪式：

秋瑾由李自平（冯自由妻）介绍，在横滨加入三合会（又称三点会，成立于本年春，是一个秘密反清团体，宗旨为“推翻清朝，恢复中华”。此次为第二次拜盟），被封为白扇。同时入会的有刘道一、仇亮、刘复权、彭春阳、曾贞、龚宝铨等九人。王时泽在《回忆秋瑾》文中说：“约定某日晚饭后在南京街（日本横滨一条街道的俗称，中国人聚居于此），某广东商店后进举行入会仪式。到了预定时间，入会的人陆续到来，共计十人，除我以外，还有秋瑾、刘道一、仇亮、刘复权、彭春阳、曾贞、龚宝铨等（其余两人，忘其姓名）。冯自由、李植生、梁慕光都在场。首先由冯自由向我们交代宣誓的问答语，叫我们在宣誓时依样回答。交代完毕，即由梁慕光主持宣誓仪式。他手执钢刀一把，架在宣誓人颈上，由各人依次宣誓。刘道一是第一个宣誓的。轮到我宣誓时，梁问：‘你来做什么？’我照冯自由嘱咐的话回答：‘我来当兵吃粮。’问：‘你忠心不忠心？’答：‘忠心。’问：‘如果不忠心，怎么办？’答：‘上山逢虎咬，出外遇强人。’全体宣誓毕，梁与冯自由横牵一幅六七尺长的白布，上书斗大的‘翻清复明’四字，命各人俯身鱼贯从布下穿过，以示忠于主义。又在室内烧一堆火，命各人从火上跳过去，表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然后分别刺血，杀了一只大雄鸡，共饮雄鸡血

酒。冯、梁两人当场宣布这个团体叫做‘三合会’（取合天、合地、合人之意），向我们交代了一些规矩，如见面手势如何摆，如何问话答语，进门要用右脚向前跨，握手时要捏紧对方的无名指，等等。并交了一本书给刘道一，叫我们互相传抄。我粗略地翻了一下，里面写了一些会规，还画了许多旗帜的样式。最后，每人交纳入会费十元日金，就算了事。这次入会，刘复权被封为洪棍，秋瑾被封为白扇（俗称军师），刘道一被封为草鞋（俗称将军），是谓‘洪门三及第’。（后来刘道一在辛亥革命前壮烈牺牲，刘复权背叛革命，做了两江总督衙门的密探头目，后被民军枪决）。”^①

这一阶段留学生的文化团体，主要有1906年建的春柳社，它也是中国早期话剧（新剧）的第一个演出团体。该社成立的经过，《春柳剧场开幕宣言》中说：“溯自乙巳（1905）、丙午（1906）间，曾存吴、李叔同、谢抗白、李涛痕等，留学扶桑，慨祖国文艺之堕落，亟思有以振之；顾数人之精力有限，而文艺之类别綦繁，兼营并失，不如一志而冀有功。于是春柳社遂出现于日本之东京，是为我国人研究新戏之始，前此未曾有也。”^②春柳社分设戏剧、音乐、诗歌、绘画等部门，以戏剧为主，其宗旨是：“本社以研究各种文艺为目的。创办伊始，

^① 陈象恭：《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第18—19页。

^② 丰子恺：《回忆李叔同先生》，《天津日报》1956年10月6日。

骤难完备，兹先立演艺部，改良戏曲，为转移风气之一助。……以研究新派为主，以旧派为附属科。……无论演新戏、旧戏，皆宗旨正大，以开通智识，鼓舞精神为主。”^①春柳社成立后于1907年2月公演了《茶花女》第三幕，这是中国公演话剧（新剧）的开始。不久欧阳玉倩等人人社，又公演了《黑人吁天录》、《热血》，宣传了民主革命思想。辛亥革命后，春柳社移回国内继续进行戏剧活动。

演说练习会也是一个文化团体。1904年9月，秋瑾等人组织成立该会。次年初，宋教仁向秋瑾言“愿入此会，秋君诺之。”^②演说练习会的章程中规定：

- 一、本会目的注定“练习”二字，其性质与别的演说会不同。
- 一、会中练习之所最注意者有二：曰修辞，曰仪容。
- 一、演说分二种：一、汎论，一、实学。凡关于各专门学及新理想议论精确于国内有影响者，其稿交书记录存，以备印刷发行。
- 一、演说学之书颇多，可择其最明晰者，作为会中研究之正鹄。
- 一、中国语言各处不同，故演说者虽滔滔不绝，而听者竟充耳罔闻。会中当附属一普通话研究会，凡演说皆用普通话，研究此普通话，公举会中善于

^①《春柳社演艺部专章》，载《北新杂志》1907年第30卷。

^②陈象恭：《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第21页。

普通话者担任之。

- 一、会所暂设中国留学生会馆中。
- 一、选举书记、会计兼庶务、普通话教授各一人。
- 一、会友须轮流演说，不得推诿。
- 一、入会者纳入会费洋五角。
- 一、延请著名演说之人来会演说，以资模范。
- 一、会期在八月份，每逢月曜日开会一次，自下午七时起至十时正。
- 一、演说时如仪容不正，会员有纠正之责。
- 一、演稿每期发行时，内附写真数枚。其目的专对于学界及游历官，凡足以兴起国民之精神及警惕败类之心目者，由会员侦探确实，临时口绘，以资模范，并作警钟，而会员皆有侦探之责任。

这一阶段爱国团体有赤十字社与两湖铁路会等。赤十字社是1905年5月女留学生成立的抗俄组织，两湖铁路会是在1910年收回粤汉川铁路筑路权斗争中诞生的团体。它们存在的时间都较短，没有产生太大的历史影响。

留日女学生会是爱国团体。1906年暑假的时候，19岁的湖北女留学生李元，到日本留学已有好几年了，因为女留学界缺少团体，便四处奔走，调查运动，要组织一个留日女学生会，后来得到了70多位女留学生赞成，于是议定了章程，在中国留学生会馆召开了第一次大会，公举黄华为会长。

留日女学生会成立，有女性互相照顾、提携之意。“从前因为没有团体，没人招待，以至初来留学的，人生地疏，言语

不通，有多少苦处，今后有了这个会，凡是内地女同胞要来留学的，不怕没有来过。只要由上海或天津动身之前，寄一封信来，说明来的人姓甚么，名甚么，年岁、籍贯，何日动身来日本，坐的是甚么名字的船，大约是哪一天可到横滨，或是只坐船到神户，由神户坐火车来东京，只要此信一到，立刻就可以会知招待员，届时去到横滨海岸上招待。若是由神户换坐火车的，则只可在新桥火车站招待……”^①

但是，留日女学生会的成立，其根本之旨还在于救国。其在《成立通告书》中说：“丙午（1906年）秋，留东女学界同人聚谋所以拯救祖国女同胞之策，金曰：是非普及教育不可，非结大团结不可，”遂组织中国留日女学生会^②。

关于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基本倾向，孙中山先生后来有一个分析，可以作为这一时期留学生活动的总结：“从前的留学生，大概分为两派：其一派鉴于祖国之危亡，异族之凭凌，废弃学业，奔走革命；其又一派，既不能与革命诸志士一致进行，又不能研究实学，只想弄一个方法，混一纸文凭，以夸耀乡里。这也难怪他们。此辈人见中国事已不可救，革命事业，自己扪心揣度，又做不来，求了学问，又无用处，无法可想，只好鬼混一辈子。将来中国不幸瓜分，横竖中国是已经亡过一次的，随便做哪一国的顺民，哪一国的奴隶，都是无甚紧要的，只要有一个吃饭的所在就是

^①《留日女学生会》，载《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期，1907年2月5日。

^②《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年—1918年），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第356页。

了。”^① 孙中山先生的这一段分析，对于理解辛亥革命以前留日运动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对于理解留日运动中各种社团的发展变化有深刻启示。

4. 拒俄运动与拒俄义勇队

1900年，沙俄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直到1903年初，沙俄还不肯按照《辛丑条约》议定的条款撤兵，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1903年4月18日，沙俄又向清政府提出了七项要求，妄图保证其在东北的占有权。4月下旬，日本报纸报道了沙俄的新阴谋，立刻引燃了留学生反俄的烈火。

4月29日，留日学生秦毓蓁、叶澜、王嘉榘、钮永键及各省同乡会在东京锦辉馆召开全体留学生大会，有人主张打电南、北大臣请主战，钮永键主张留学生应自行组织义勇队，准备赴国内拒俄，得到了留学生的赞成。会议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同时做出如下决议：愿入义勇队赴前敌者，尽两日内签名；未即赴前敌者，别设本部，部署军队各事；致电北洋大臣袁及上海各团体；发电后，更致北洋大臣函，请将义勇队编其麾下；遣特派员至天津与袁订定彼此关系；遣人至本国内地各殷富地方；遣人至南洋各埠；遣人至欧美各国。

对拒俄义务队的成立过程，冯自由有如下记述：“癸卯春，俄国进兵东三省，且向清廷提出七项新要求，留东学生闻之大

^① 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2月23日），载《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24页。

愤，各省同乡会纷纷开会研究对策。钮永键（惕生）时在东京，忽发奇想，欲发起拒俄义勇队，走告留学生会馆干事章宗祥、曹汝霖等，请其以会馆名义召集全体学生，组织学生军，以拒俄人侵略。章、曹等以学生手无斧柯，决无所成，且易引起政府之疑忌，拒绝其请。叶澜闻之，及话同乡秦毓璠等曰：‘青年会揭糞民族主义，留学界中赞成者极为少数，欲图扩张，至为不易，吾人盍赞成惕生组织拒俄义勇队之主张，借此题目结一大团体，以灌输民族主义乎？’青年会员均以为然。惕生既说章、曹等失败，愤懑不胜，一日访秦毓璠，滔滔述其主张，秦及叶澜等赞成之，且允联名为发起人。永键大喜，即在秦寓草传单，定期开大会于神田锦辉馆，各省学生到者五百余人。有蒯寿枢（若木）、钮永键、叶澜、林长民、王璟芳等演说，激昂慷慨，鼓掌如雷。全体通过组织拒俄义勇队，举陆军士官学生蓝天蔚为队长，日日操练，备赴疆场。先致电于北洋大臣袁世凯，请其拒绝俄人，否则与之决绝，且告以学生军之组织，请求其麾下，求其援助。”^①

拒俄义勇队成立的次日，即有 130 多人报名参加，他们准备为反抗沙俄而进行殊死的斗争。

5月2日，东京留学生再开大会于锦辉馆，商议改义勇队为学生军，并派特派员回国，运动南、北政府抗俄。学生军规则中规定，设队长一人，区队长三人，参谋长一人，分队长十二人。学生军队长为蓝天蔚。学生军中，还有 12 名女留学生，她们是：林宗素、王莲、曹汝锦、陈懋懿、华桂、胡彬、龚圆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

常、方君笄、钮勒华、吴芙、周佩珍、钱丰保。学生军规则如下：

第一、定名：学生军（本名义勇队，后易此名）。

甲、军队。

乙、本部。

第二、目的：拒俄。

第三、性质：

甲、代表国民公愤。

乙、担荷主战责任。

第四、体制：在政府统治之下。

第五、组织：

甲、队中职员：队长一人（军法会议其议长即队长）、区队长三人、参谋长一人、分队长十二人。

（队中看护员由女学生组织之）

乙、本部职员：部长一人、运动科长一人、经理科长一人、会计科长一人、书记科长一人、参议科长一人。（其余运动员、经理员、会计员、书记、参议，均无定员）

第六、会议：为全军之总机关。议员以二种人组织之：

甲、队中队长及区队长、参谋长。

乙、本部部长及诸科长。临时议员凡在队人员有意见者为之。会议时应立议长一人（临

时)。

第七、军纪：

甲、谨守秩序。

乙、服从号令。

第八、筹款：

甲、出发款项（预先运动，临时取款）。

乙、寻常款项（即学生义务捐及特别捐）。

义务捐：一等二元，二等一元，三等五角。

第九、讲习：

甲、操习。

乙、讲课。

（每日约各一时以上，另有表）

第十、出发：俟特派员复信后。

第十一、解队：

甲、目的已达。

乙、目的消灭。

第十二、附则：

甲、编队次序（每日照常在校上课，课余轮班至讲习所讲习）。

乙、退队次序（出发定期后，即当报告监督及各校长退学）^①。

学生军成立后，立刻引起日本当局的警觉，据载：

^①《湖北学生界》4期，1903年4月27日。

军队成立仅五日，神田警察即来干涉，请王君嘉集、钮君永健、张君肇桐、林君长民四人往警察署。时钮、张二人不在公馆，即由王、林二君往见。其问答之词如下：

问：闻贵国留学生因满洲问题有义勇队之设，确否？

王答：有之。

问：闻队中规则及组织，有队长，有军曹等名目，是与军队无别。此事于日本外交上颇有阻碍。

林答：此事虽名为队，其内容不过练习体操，并无军械、军服，不能成为军队。

问：留学生监督知之否？

王答：知之，昨日已有命嘱吾等废止。但此次创立此举时，本因俄国七条条约，并俄使宣言欲收东三省入俄版图而起。据目下情形，七条之约已经取消，此事照原定规则已议停止。

问：体操时有用铁銃否？

王答：无之。但会馆中本有体操器械，即不关满洲问题，留学生亦时在练习。

问：练习时人数过多，邻舍闻之，亦颇张皇。

林答：教育的体操亦与乱暴举动不同。

警察长言：教育的体操尚无妨害，若组成军队，则日本有主权，不能不干涉。

林答：并非军队。此事当俄使宣言号外发行时，

本度即日开战，则留学生等当即日返国。彼时成军与否，系在敝国国境，并不在贵国也。若今日情形，则在贵国一日，便为一日学生，与军队实不相类。

警察长言：君等爱国之心实在可敬。

林答：此为有生所同具，无所别于众。

警察长言：自表面视之，实有军队形成。务望速解。

林答：照规则办理，自当解队，但体操为体育起见，仍时常练习。此于外交主权等问题似不相关，今晚当有复信。

是晚，开谈话会于会馆，先由王君嘉榘报告与神田警察长问答情形。次钮君永键云：俄国问题，午后号外又加紧急，但现在办事，内外皆困，只得照昨晚议论，解散形式，不解散精神，改作军事讲习会，请众公决。盖昨晚因日本外务部以义勇队事，招汪监督往，言此事于国际上有碍，故蓝君天蔚、钮君永键、蒯君寿枢、叶君澜、谢君晓石曾于此研究过也。是以今晚之会，多主张改变面目，而精神断不能解散云。

其覆警察署信稿录于左（下）：

“义勇队已照队中规则解队，惟教育的体操此后仍时时讲习，不同军队形式。特此奉告。”^①

5月11日，学生军又改为军国民教育会，叶澜、林长民、

^①《留学界记事》，载《浙江潮》第四期，1903年5月16日。

蔡文森任书记，陈福颐、张肇桐、蹇念益任会计，王璟芳、周宏业、王嘉榘、谢晓石任经理，秦毓鏊、蒯寿枢、董鸿祚任执法，决定向国内派遣运动员。军国民教育会制定了公约、自治公约、运动员公约等。

在这场拒俄运动中，东京留日学生组织军事训练和救护训练，准备归国抗俄，又派汤尔和、钮永键等人回国，还向国内发电鼓吹拒俄。学生的爱国行动，受到了清政府的压制。据1903年6月5日《苏报》的《密谕严拿留学生》所载：

顷由密友访来严拿留学生之密谕，略云：

前据有御史某参奏，东京留学生已尽化为革命党，不可不加之防备。

又云：有一尚书某等奏亦略同。

又云：近日本蔡钧来奏：“此间革命党，近业已组成军队，将托于拒俄一事，分奔各地。”又云：“前岁汉口唐才常一事，则托于勤王以谋革命；此间则托于拒俄以谋革命。其用意与唐才常相似，而党羽较密，训练尤严”各语，已不胜诧异。国家养士二百载，共自祖宗以来，深仁厚泽，姑置忽论。即如近年以来，各直省地方遇有水旱，无不立沛恩施，普行赈济。顷者，乱离虽构，而乡、会试亦不忍遽停，况本年于复试以后，又创行经济特科。国家待士，既优予以进身，又欲广其登庸之路，凡在食毛践土，具有天良，而乃不思报称，反言革命，似此则国家果有何负于该革命党！前已饬蔡钧、汪大燮于在日本东京留学

生举动，务加详察。各直省地方官，于日本游学生之返国者，亦暗为防堵，遍布耳目。昨据袁世凯密折，内言东京留学生蓝天蔚等各若干人，编集数军，希图革命。其电该督臣之意，又有谎言俄患日深，求该督助其军火，在日本东京各学生，便可至东三省与俄人决战。情形叵测。就使本为忠议，然距义和团之日未久，亦深虞其有碍邦交。联以为该学生等既反叛朝廷，朝廷亦不得妄为姑息。蔡钧、汪大燮于在日本东京留学各生，即可时侦动静。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拿到，就地正法。然亦须分别首从，不得尽人诬陷善良也。此为联万不得已而保全国本以固邦交至意。将此密谕蔡钧、汪大燮及各省地方督抚咸共凛遵。

拒俄义勇队是突发事件的产物，有众多的留学生参加了这个团体。义勇队仅存在了一个多月，但它对清末留学生革命运动的发展与留学生团体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三章

近代留学日本运动的持续发展

(1907—1911)

第一节

清末留日运动的回落

1. 清政府严定留日生选派条件

清末中国的留日运动有两个特征，一是学习的内容多是普通学科而非专门学科，二是教育的性质多是速成教育而非正式教育。这样说，并不是说没有学专门学科、没有接受正式教育的，只不过是相比较而言它们占的比例较小。

中国人留日之初，接受速成教育与学习普通学科，是情况所迫、形势所需。

1903年，中国才制定了第一个近代新学制，在这种情况

下，各地新学堂师资奇缺，社会急需通过速成教育培养出懂得普通学科的人才，因而出现了清末留日运动的两个特征。

日本各校的中国留学生毕业人数表^①

学 校	年 度											合 计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东京帝大						1				1	2	3
京都帝大						1			2	2		5
北海道帝大						2	6	3	1	2	1	15
大阪帝大						4	5	5	8	12	9	43
名古屋帝大									1		5	6
第一高等学校		1	1			2	7	15	46	46	47	165
第二高等学校								1	4			5
第三高等学校							1	1		2	1	5
第五高等学校									1	2		3
第六高等学校									4	3	4	11
第七高等学校									1	2		3
教育 4 校								4	3	8	18	33
工业 18 校				4	3	1	8	5	22	32	26	101
商业 9 校			2		3	1		15	9	16	20	66
医学 23 校					3		4	9	6	11	19	51
农业 11 校	1	3	1	2		5	4	4	10	13	15	58

^①实藤惠秀著，谭汝谦 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 113 页。

续表

年 度 学 校	1 9 0 1	1 9 0 2	1 9 0 3	1 9 0 4	1 9 0 5	1 9 0 6	1 9 0 7	1 9 0 8	1 9 0 9	1 9 1 0	1 9 1 1	合 计
早稻田大学		1	2	4	4	12	6	228	196	209	98	760
明治大学							11	54	127	131	152	475
中央大学				4	2	1	1	7	38	36	36	125
日本大学							2	13	44	65	55	179
私大6校										2		2
陆海军21校	39	25		93				254		74	174	659
艺术7校											3	3
女子14校				2		12	2	5	13	13	6	53
合 计	40	30	6	109	15	42	57	623	536	682	691	2831
%	1.4	1.1	0.2	3.9	0.5	1.5	2.0	22.0	18.9	24.1	24.5	

上表说明，从1901年到1911年毕业于日本各校的中国留学生总数为2831人，比1906年一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7285人，还要少4454人。可见，清末时赴日的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专科学校和大学毕业者少，只学了速成课程与普通课程的多，二者比例相差悬殊。

留日学生未从专门以上学校毕业的，还有两种情况：只学语言和中途退学。一份反映清末四川合江县留日学生的材料即称：进入日本各种学校的合江学生，“由于各种原因，也有中途休学的。”“还有少数或因原来的知识基础较差，或因经济条件限制，他们不会日语，也未进入任何学校学习，只是与合江

籍的留日生住在一起，外出时也须会日语的留学生当翻译，他们住了一段时间便回国了……”^①

接受速成教育与学习普通学科，在特定时期自有其积极意义，但连年持续下去，则产生了各种流弊。“当时，日本学校甚至出现激烈的竞争倾向，如甲校用一年教授完毕，乙校减为八个月，而丙校更缩成半年。尤有甚者，竟有数月以至速日的速成科。如肥皂制造法等，通过传译（按指在课堂上把老师说的日语向学生译成汉语的人）的说明，数日便讲授完毕，并且颁发证书，纯粹是商人经商牟利的作风。留学生方面，由于心目中有手持证书愈多愈好的浅薄想法，多集中到这类‘学店’来。”^②

速成教育的积弊，引起了日本一些正直的教育学者的忧虑和中国政府的关注。

实际上，早在留日运动之初，清政府就对留学者资格限制问题有所考虑。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旧历十一月，外务部在《奏议复派赴出洋游学办法章程折》中即提出：“近年出洋学生，各省各派，各有各章，学生既未考究根底，所派之员又多不习外国语言学问，办理未能一律，废时糜费，莫此为甚。方今参酌中西政要，择善而从，宜于未派出洋之前先通中学，将派出洋之时，务毕普通之学，既派出洋之后，精求专门之学，夫而后中西可以贯通，成就可期远大。”^③

1906年以后，清政府鉴于速成教育与普通学科对于国内

^① 廖士元：《清末合江的留日学生概况》，载《合江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1988年印，第85页。

^② 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60页。

^③ 《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三十二上，第29页。

来说已不是最需，并且速成教育与学习普通学科已积弊明显的情况，多次制订新章程，限制留学生资格，严定选派条件，更强调了留学生质量。如1908年，清政府在《限制游学办法》中称：对留学者“资格宜限定：学长期者除习浅近工艺仅需预备语言，于学科毋庸求备外，凡欲入高等以上学校及各专门学校者必须有中学毕业以上之程度，且通习彼国语言方为及格，……习短期者除游历官绅可少宽限制，其习速成科者或政法或师范，必须中学与中文俱优，年在二十五岁以上，于学界政界实有经验者方为及格……”

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月，学部曾通令各省，无论官费、自费、师范、政法，一律停派速成生。但是，日本官立高等以上学校升学要求严格，中国学生普通科毕业后也很难考入。为此，清政府与日本文部省交涉，希望日本官立高等以上学校增收中国学生。1907年中日两国订成特约五校协议，其要点是：

- 一 自光绪三十四年（1908）以后15年内，第一高等学校每年招收中国学生65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25人，东京高等工业学校40人，山口高等商业学校25人，千叶医学专门学校10人，合计165人。中国政府补助每名学生教育费每年由200元至250元不等，由中国公使馆交各该学校。
- 一 以上165名额，直隶、奉天、山东、河南、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大省各派九名。吉林、黑龙江、山西、陕西、甘肃、新疆、广西、贵州、云南等各派六名。其经费分由各

省负担。

一 各校参加入学考试及格者，得选为官费生；学生之教育费（补助费）及学费，每名每年平均为 650 日元。

以上协议签订后，清政府为此制定章程 9 条，其要点是：

(1) 由驻日公使在留日学生中选择“品行端正，汉文通顺，普通学已毕业之人”考试，考取者即给官费。

(2) 学费及补助费每人每年 650 日元，由各省分认。

(3) 前两年以在日留学生送考，再后由各省续派中学毕业生往日人各校之预科，预科期间学费自负，正式考入后给以官费。

(4) 五校毕业留学生先供出学费之省，余者再分邻省。

(5) 毕业生先归各省尽若干年义务，分年扣回留学期间所给之官费。

协议实施后，1908、1909、1910 年三年内，进入五校的留日生有 460 余人，其中 1909 年为 158 人，其情况如下页表。

1909年考入日本五校中国学生统计表①

姓名	籍贯	年龄	原系费别	抵日时间	毕业学校	考入学校
许崇清	广东番禺县	22	官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	同文书院	第一高等
周 览	湖南善化县	19	官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	宏文学院	第一高等
丁绍级	湖北应山县	24	官	光绪三十年	经纬学堂	第一高等
陈瑾昆	湖南武陵县	22	自	光绪三十一年二月	宏文学院	第一高等
刘展超	广东香山县	22	自	光绪三十二年正月	经纬学堂	第一高等
陈 翰	浙江平阳县	22	自	光绪三十二年二月	同文书院	第一高等
刘鸿浙	浙江山阴县	24	自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	宏文学院	第一高等
毛颂芬	源北安陆县	21	自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	同文书院	第一高等
黄 骥	浙江平阳县	23	自	光绪三十二年三月	同文书院	第一高等
曹庸夫	浙江黄岩县	20	自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	上海南洋中学校	第一高等
陈士杰	湖北安陆县	23	自	光绪三十二年二月	同文书院	第一高等
朱祖成	广东南海县	23	自	光绪三十二年正月	同文书院	第一高等
张乘运	湖北东湖县	21	自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	宏文学院	第一高等

①据沈云龙主编：《清末各省官自费留日学生姓名表》，文海出版社，第271—283页。

續表

姓名	籍貫	年齡	原系費別	抵日時間	畢業學校	考入學校
黃武	廣東開平縣	23	自	光緒三十二年二月	同文書院	第一高等
譚徽鑫	湖南慈利縣	23	自	光緒三十二年八月	宏文學院	第一高等
付式說	浙江乐清縣	19	自	光緒三十二年正月	同文書院	第一高等
何鴻熙	浙江永嘉縣	23	自	光緒三十二年正月	同文書院	第一高等
文元模	貴州貴筑縣	18	自	光緒三十三年三月	同文書院	第一高等
樊季聖	江西萍鄉縣	20	自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	同文書院	第一高等
周昌壽	貴州貴陽府	20	自	光緒三十三年三月	同文書院	第一高等
邱其俊	廣東嘉應州	18	自	光緒三十三年三月	经纬學堂	第一高等
初兆琳	山東甯海縣	20	自	光緒三十二年七月	宏文學院	第一高等
聂俊	湖南桃源縣	18	自	光緒三十一年三月	宏文學院	第一高等
楊冕	湖南善化縣	22	自	光緒三十二年八月	宏文學院	第一高等
高維魏	浙江紅和縣	22	自	光緒三十一年八月	成城學校	第一高等
鄭員文	福建長樂縣	19	自	光緒三十二年七月	宏文學院	第一高等
金其壽	江蘇華亭縣	23	自	光緒三十年九月	東京中學校	第一高等
成漢	湖南新化縣	20	官	光緒三十一年五月	大阪高等預備學校	第一高等

续表

姓名	籍貫	年齡	原系費別	抵日時間	畢業學校	考入學校
柳金田	广东香山县	18	自	光緒二十七年二月	大成中学校	第一高等
刘兆麟	四川广安州	23	自	光緒二十九年九月	成城学校	第一高等
杜维常	山东嘉祥县	20	官	光緒三十一年九月	宏文学院	第一高等
郑寿祺	江苏吴县	24	自	光緒三十年十一月	成城学校	第一高等
陈发榛	广东琼山县	18	自	光緒三十二年七月	经纬学校	第一高等
潘应霖	广西桂平县	20	自	光緒三十二年十月	同文书院	第一高等
丁仕猷	湖南攸县	21	自	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	正则英语学校	第一高等
罗鼎	湖南攸县	22	官	光緒三十一年八月	成城学校	第一高等
戒肇敏	浙江慈溪县	23	自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	清华学校	第一高等
徐道渊	江西临川县	23	自	光緒三十二年八月	经纬学校	第一高等
劳勉	广东南海县	24	自	光緒三十一年四月	经纬学校	第一高等
胡鯤	浙江慈溪县	19	自	光緒三十二年六月	经纬学校	第一高等
徐涌明	浙江新昌县	20	自	光緒三十年十月	清华学校	第一高等
黄照邻	福建莆田县	20	自	光緒三十二年六月	经纬学校	第一高等
苏炳麟	广东顺德县	19	自	光緒三十年八月	大成中学校	第一高等

续表

姓名	籍贯	年龄	原系费别	抵日时间	毕业学校	考入学校
王孝德	福建闽县	22	自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	振武学校	第一高等
王孝緜	福建闽县	20	官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	成城学校	第一高等
张安邦	广东嘉应州	19	自	光绪三十二年二月	清华学校	第一高等
冷光炯	湖北汉阳县	18	自	光绪三十二年正月	成城学校	第一高等
戎春田	直隶隆平县	24	自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	经纬学校	第一高等
柳南柱	广东香山县	20	自	光绪三十一年	清华学校	第一高等
林尹民	福建	23	自	光绪三十二年正月	成城学校	第一高等
马春芳	奉天	25	官			高师
何礼贤	广东	29	自			高师
吴家镇	湖南	20	自			高师
许陈琦	浙江	20	自			高师
刘维廉	广东	18	自			高师
陈浩年	山西	22	自			高师
王普基	江西	24	官			高师
魏宪章	福建	24	官			高师

续表

姓名	籍贯	年龄	原系费别	抵日时间	毕业学校	考入学校
邓萃英	福建	24	官			高师
林炯	福建	27	官			高师
吴则范	福建	25	官			高师
薛维桢	福建	25	官			高师
孙其昌	奉天	23	官			高师
张维祺	直隶	26	官			高师
蒋拱辰	江苏	20	自			高师
叶炳蔚	江西	25	自			高师
司徒欽	广东	22	自			高师
林兆燕	福建	26	官			高师
张仁辅	直隶	26	公			高师
薛德焯	江苏	22	自			高师
邓曾绪	江西	28	公			高师
张远荫	四川	20	自			高师
王寿彭	江西	27	官			高师

续表

姓名	籍贯	年龄	原系费别	抵日时间	毕业学校	考入学校
钟正懋	四川	23	自			高师
金之铮	直隶	25	自			高师
祁祖雄	江苏	25	自			高师
康耀宸	陕西	29	官			高师
焦增钰	直隶	17	自			山口高等商业学校
林楠	浙江	22	自			山口高等商业学校
李震东	浙江	20	自			山口高等商业学校
何文鑫	湖南	25	自			山口高等商业学校
黄骥	浙江	23	自			山口高等商业学校
李摸	湖南	22	自			山口高等商业学校
林绍楠	浙江	20	自			山口高等商业学校
张燕翼	浙江	23	自			山口高等商业学校
黄遇穆	江苏	22	自			山口高等商业学校
李圻纶	直隶	22	自			山口高等商业学校
方宗鳌	广东	25	自			山口高等商业学校

續表

姓名	籍貫	年齡	原系費別	抵日時間	畢業學校	考入學校
叶云表	直隸	24	自			山口高等商業學校
唐 碧	湖南	22	自			山口高等商業學校
鍾崇越	廣東	20	自			山口高等商業學校
曹金奎	安徽	20	自			山口高等商業學校
張 鑒	四川	23	自			山口高等商業學校
韓開運	湖北	24	官			山口高等商業學校
楊允楷	安徽	21	自			山口高等商業學校
張彥清	四川	21	自			山口高等商業學校
沈朝陽	廣東	20	自			山口高等商業學校
孫少堂	直隸	24	自			山口高等商業學校
韓秉瑞	直隸藜鹿縣	23	自	光緒三十二年二月		山口高等商業學校
周大賈	湖南湘潭縣	23	自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		山口高等商業學校
張鍾韓	江蘇吳縣	23	自	光緒三十年	成城學校	山口高等商業學校
唐 翼	浙江瑞安縣	23	自	光緒三十年十月	同文書院	山口高等商業學校
林堯清	福建侯官縣	17	自	光緒三十三年九月	清華學校	山口高等商業學校

续表

姓名	籍贯	年龄	原系费别	抵日时间	毕业学校	考入学校
吴树中	广西桂平县	24	自	光绪三十二年二月	大阪高等预备学校	山口高等商业学校
刘 辉	湖北荆门市	23	自	光绪三十年九月	宏文学院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龚 鉴	江苏崇明县	22	自	光绪三十二年	清华学校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钟齐闻	广东南海县	21	自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	大同学校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欧阳麟	安徽巢县	21	自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	宏文学院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陈景松	福建闽县	24	官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	大成中学校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李寿彤	江苏丹徒县	20	自	光绪三十二年正月	成城学校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许世芬	湖北夏听	22	自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	宏文学院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张骏猷	浙江黄岩县	23	自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	同文书院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陈宗孟	广东顺德县	25	自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	大阪高等预备学校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王元斌	浙江镇海县	18	自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	大阪高等预备学校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梁舒宽	福建闽县	21	自	光绪三十一年二月	成城学校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丁 猛	浙江天台县	20	自	光绪三十二年	宏文学院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何樵龄	浙江鄞县	24	自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	同文书院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朱应和	湖南桂阳县	20	自	光绪三十四年七月	湖南经正中学堂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续表

姓名	籍贯	年龄	原系费别	抵日时间	毕业学校	考入学校
任鸿葵	四川巴县	23	自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	同文书院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张宗芳	直隶南皮县	25	公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	宏文学院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赵承恣	江苏上海县	26	自	光绪三十年五月	早稻田大学预科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宓铁铮	浙江海宁州	26	自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	同文书院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李梦鹤	河南武安县	21	自	光绪三十二年正月	宏文学院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朱浩如	江苏江宁县	26	自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	大阪高等预备学校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罗宗楷	四川合江县	21	自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	大成中学校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徐 瑾	广东嘉应州	19	自	光绪三十二年三月	成城学校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史振鹏	浙江象山县	26	自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	清华学校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胡仁清	浙江日安县	23	自	光绪三十四年七月	宏文学院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林季芳	福建闽县	23	官	光绪三十三年十月	福建高等学堂预科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陈有丰	江苏加定县	22	自	光绪三十二年二月	民立上海中学堂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黄日东	广东香山县	17	自	光绪三十年	经纬学校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崔哲夫	广东南海县	24	自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	大阪高等预备学校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黄维金	广东东莞县	22	自	光绪三十二年三月	同文书院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续表

姓名	籍贯	年龄	原系费别	抵日时间	毕业学校	考入学校
黄少仲	安徽桐江县	22	自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	经纬学校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熊付第	江苏上元县	22	自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	同文书院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何寿田	广东大埔县	22	官	光绪三十二年正月	成城学校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高炯	贵州贵筑县	18	自	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	同文书院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彭钟瑄	四川泸州	23	自	光绪三十二年三月	成城学校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陈其文	浙江归安县	25	自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	成城学校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马江	直隶衡水县	19	自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	京华商业学校预科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陈铭	福建闽县	19	自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	宏文学院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陈延焯	广东番禺县	20	自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	同文书院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王学良	江苏甘泉县	24	自	光绪三十二年二月	成城学校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石声灏	湖南湘潭县	27	官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	宏文学院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卜占元	盛京锦义县	23	自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	经纬学校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赵鍾溢	直隶冀州	21	自	光绪三十二年二月	宏文学院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刘鉴塘	直隶束鹿县	19	自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	经纬学校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李久身	浙江余姚县	21	自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	清华学校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续表

姓名	籍贯	年龄	原系费别	抵日时间	毕业学校	考入学校
米其辉	浙江山阴县	25	自	光绪三十四年	浙江高等学堂预科	千叶医学专门学校
吴祥凤	浙江嘉兴县	20	自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	宏文学院	千叶医学专门学校
赵录敏	山东安邱县	23	自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	宏文学院	千叶医学专门学校
毛浚泉	浙江余姚县	20	自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	宏文学院	千叶医学专门学校
刘文纲	江西安福县	21	自	光绪三十二年三月	早稻田大学预科	千叶医学专门学校
何焕奎	江西进贤县	24	官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	经纬学校	千叶医学专门学校
陈佩完	广东镇平县	20	自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	同文书院	千叶医学专门学校
金子直	浙江东阳县	25	自	光绪三十一年	同文书院	千叶医学专门学校
萧登	湖南溆浦县	23	自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	经纬学校	千叶医学专门学校
高光第	浙江松阳县	20	自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	经纬学校	千叶医学专门学校

2. 从 6797 人到 3328 人

1906 年以后，由于清政府对留学生的条件限制趋于严格，再加上在反对《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运动中留学生返国有未归者，所以从 1907 年至 1911 年，清末的留日运动出现了回落期。这时期的留日人数如下：

1907 年，6797 人

1908 年，5217 人

1909 年，5266 人

1910 年，3979 人

1911 年，3328 人^①

可见，不论是就这一阶段本身而言，还是同前一阶段比较，留日生人数基本都呈逐渐减少的趋势。

在这一阶段里，自费生超过官费生，但因有很多自费生中途退学，并没有毕业，在毕业的学生中，官费生略多于自费生。其情况可见下表：

^①参见汪向荣：《日本教习》，第 117 页。

清末日本各校中国毕业学生统计表

毕业学校	时 间		宣统元年七月至宣统二年六月		宣统二年六月至宣统三年七月		合计
	自费	官费	自费	官费	自费	官费	
东亚蚕业学校	26	2	7		5		40
宏文学院	20	9	6	1	5		41
法政大学	90	23	51	87	109	17	377
东斌学校	57	12	4	1	2		76
成城学校	6		2	2		1	11
岩仓铁道学校	7	4	7	15	5	19	57
经纬学校	10	1	8		7		26
同文书院	5	3	3		2		13
早稻田大学	77	163	64	112	6	46	468
千叶医学校	1	1		4		11	17
明治大学	69	51	74	32	102	51	379
东京铁道学校	1						1
日本体育会	1		3				4
士官学校	2	253		52		56	363
测量部		11			1	25	37
东京女子体操音乐学校	1		1				2
同文学校	5		6				11
大森体育会	1		1				2
信浓蚕业学校	24	1	2		1		28
邮传学校	3						3
大阪高等预备学校	2		1	1			4
宪兵练习所				12			12

第一篇 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的兴起和高潮

续表

毕业学校	时 间 别	光绪三十四 年九月至宣 统元年七月		宣统元年七 月至宣统二 年六月		宣统二年六 月至宣统三 年七月		合计
		自费	官费	自费	官费	自费	官费	
山中织机传习所				1				1
警监学校		2		1	1			4
工手学校		2	3	2	1	2		10
日本大学		24	7	25	17	33	25	131
体育会女子部和 洋裁缝女学校		1						1
大阪关西工学校		2						2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3		5	2	17	27
东京外国语学校		1		1				2
大阪府立农学校		1						1
大阪府立师范学校		1						1
东亚铁道学校		25	3	20	7	13	12	80
西京纺织工场		1						1
千叶县立茂原农学校		1			1			2
东京数学院		2		3	1		1	7
大阪普通学校		1						1
东京铁道学校		2						2
札幌农学校		1	1					2
女子美术学校		1		1		4	1	7
东北帝国农科大学			1					1
宏文普通学校		1		1	1			3
白马绘画会			1					1

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

续表

毕业学校	时 间 别	光绪三十四 年九月至宣 统元年七月		宣统元年七 月至宣统二 年六月		宣统二年六 月至宣统三 年七月		合计
		自费	官费	自费	官费	自费	官费	
东京帝国医科大学			3					3
东京帝国法科大学			1					1
高等农业学校		2		2				4
同校大学部		1						1
中央大学		11	12	23	15	19	20	100
京都染织学校				1				1
广岛师范学校					2			2
高等商业学校			8		8		6	22
大阪高等学校			7					7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13		17	25	8	63
中央中学		1	7					8
农科大学		1	5					6
东京蚕业讲习所			2		8		3	13
帝国大学			9		10		14	33
大阪高等工业学校			1		1		9	11
女子音乐学校		3		1			1	5
物理学校		1	1	2	1	2	3	10
成女学校		1						1
熊本高等工业学校			1		2	1	1	5
西京高等工艺学校		1	1		1			3
共立女学校		1						1
东洋大学		0	1	2	1	2	1	7

续表

毕业学校	时 间		光 绪 三 十 四 年 九 月 至 宣 统 元 年 七 月		宣 统 元 年 七 月 至 宣 统 二 年 六 月		宣 统 二 年 六 月 至 宣 统 三 年 七 月		合 计
	费 别		自 费	官 费	自 费	官 费	自 费	官 费	
盛岗农林学校				4		4		3	11
山中染织学校					2				2
晓星学校					1				1
一贯堂学校	1								1
京都蚕业讲习所	1								1
关西商工学校				1					1
东京药学校							2		2
富士见町寻常小学校	1								1
正则学校	1								1
医科大学				1					1
体育学校	1				1				2
关西大学							1		1
美术造花学校					1		1		2
仙台医专学校								2	2
同仁医学校					3		1		4
金泽专门医学校								2	2
振武学校								3	3
帝国模范中学校							1		1
神田数学校								1	1
警察行政研究所							2		2
正则簿记学馆					1		1		2
铁道院								20	20

续表

毕业学校	时 间 别	光绪三十四 年九月至宣 统元年七月		宣统元年七 月至宣统二 年六月		宣统二年六 月至宣统三 年七月		合计
		自费	官费	自费	官费	自费	官费	
慈善医学校						2		2
路矿学堂							1	1
修技女学校				2				2
奎文女学校					1			1
神户女学院							1	1
大成学校				5	1	2		8
神户高等商业学校							4	4
福冈工业学校						3		3
经理学校					5		5	10
津轻军营将校							8	8
小笠原造花女学校							1	1
吉冈女子学校						1	1	2
长崎专医学校					1		2	3
长崎高等商业学校					3		5	8
工科学校							7	7
东洋音乐学校						2		2
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					5		5	10
农业讲习所						1		1
美术学校				4		2	3	9
山口高等商业学校					3		1	4
日文书院						1		1
实践女学校				3	19	3	1	26

续表

毕业学校	时 间 别	光绪三十四 年九月至宣 统元年七月		宣统元年七 月至宣统二 年六月		宣统二年六 月至宣统三 年七月		合计
		自费	官费	自费	官费	自费	官费	
大阪医学校							1	1
高等警务学校						1		1
奥羽种马牧场							2	2
陆军兽医学校				1			2	3
农事试验场					1			1
东祥女艺学校				2				2
农科大学							2	2
日本女子学校							1	1
东京帝国大学			4		10		14	28
高等女子师范学校						1		1
东北帝国大学					2		1	3
水产学校		1					1	2
水产讲习所					2		4	6
爱知县立医学专门学校				1			2	3
群馬县高山社蚕业学校						16		16
东京高等农业学校				1				1
女子职业学校				2				2
东京实科学校				1				1
东京女塾				1				1
信浓宏支					1			1
东京工科学学校				1				1
嘉越织机制作所					1			1

续表

毕业学校	时 间		宣 统 元 年 七 月 至 宣 统 二 年 六 月		宣 统 二 年 六 月 至 宣 统 三 年 七 月		合 计
	自 费	官 费	自 费	官 费	自 费	官 费	
东京瓦斯工场			11				11
东洋女艺学校			1	1			2
横浜女子实业补习学校			1				1
技术学校			1				1
合 计	506	635	373	479	392	454	2971

●据沈云龙主编《清末各省官自费留日学生姓名表》而统计

●三年中依次有 2 个、8 个、3 个津贴生计入了官费生

从以上所列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至宣统三年（1911）九月的统计看，中国留日学生所毕业的学校共有 135 所，各学校人数相差极为悬殊，3 年间总人数排在前 5 名、也是留日毕业生人数达到百人以上的学校分别是：早稻田大学（468 人）、明治大学（379 人）、法政大学（377 人）、士官学校（363 人）、中央大学（100 人），5 所学校合计为 1687 人，占该时期留日毕业生总人数的 56.78%，达一半以上；而 3 年间仅有 1 名留日毕业生的，就有 39 所学校，占学校总数的 28.89%。

这一时期，考入高等专门以上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其所学习的科目以医科、药学科、法科等为最多，这种情况从下面的两个表中可以看出来：

1909年考入日本大学暨各高等专门学校
部分中国留学生分科统计表

学科	人数	学科	人数	学科	人数
现习学科	1	制造科	1	药学科	10
农业实科	4	渔捞科	1	医学科	8
林学实科	4	机械工学科	1	医科	2
兽医学实科	4	采矿冶金学科	6	造船科	1
土木工科	6	电气工学科	1	应用化学科	2
材科	2	建筑科	1	烹业科	1
农科	4	机织科	4	林学选科	1
兽医科	1	色染科	4	养蚕科本科	1
农业选科	2	图案科	1	制丝科本科	1

1909年考入日本五校中国留学生分科统计表

学科	人数	学科	人数	学科	人数
文科	1	史地	4	电气机械科	7
法科 文	3	英语	6	建筑科	5
法科	10	数理化	10	医学科	8
文科 法	1	博物	7	药学科	2
理工 工	4	色染分科	3	理农科	1

续表

学科	人数	学科	人数	学科	人数
工 科 理	8	机织分科	5	医 科	15
农 科 工	2	实 业 科	4	工业图案科	3
理 科	2	应用化学科	7	机 械 科	8
工 科 农	1	电气化学分科	2		

这一时期中国留日学生的年龄，以 1909 年考入日本大学暨各高等专门学校的情况作一分析。

1909 年，考入日本大学暨各高等学校（不含协议五校）的中国留学生共 95 人，平均年龄为 23.3 岁。

年龄最小的是焦增铭，17 岁。

焦增铭，直隶束鹿人，1905 年自费留学日本，就是说，13 岁那年他已踏上了留东之路。从经纬学堂毕业后，他于 1909 年考入了京都高等工艺学校图案科。

年龄最大的是徐光炜和张仁任，分别都是 30 岁。

张仁任，广东嘉应人，1904 年自费留学日本，就是说，留日之时他已经 25 岁。在日本学习 5 年后，他从清华学校毕业，于 1909 年考入了东京帝国农科大学农学实科。

徐光炜，安徽宣城人，1904 年官费留学日本，从经纬学堂毕业，于 1909 年考入了长崎高等商业学校。

这一时期留日学生的年龄、毕业学校等情况，可参见下表：

1909年考入日本大學暨各高等專門學校中國學生統計表

姓名	籍貫	年齡	費別	抵日時間	畢業學校	考入學校
張冕延	山東萊陽縣	22	自	光緒三十二年八月	經緯學校	東京帝國農科大學
夏樹人	湖北利川縣	22	公	光緒三十二年七月	宏文學院	東京帝國農科大學
鍾毅	江西興國縣	24	官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	經緯學校	東京帝國農科大學
張仁任	廣東嘉應州	30	自	光緒三十年二月	清華學校	東京帝國農科大學
趙宗香	四川宜賓縣	22	官	宣統元年二月	四川游學預備學校	東京帝國農科大學
余繼彤	四川巴縣	18	自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	同文書院	東京帝國農科大學
吳桓如	江蘇嘉定縣	20	自	光緒三十二年十月	宏文學院	東京帝國農科大學
楊汝鉞	山西陽曲縣	22	半費	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	宏文學院	東京帝國農科大學
鄭璿	安徽桐城縣	23	自	光緒二十九年四月	成城學校	東京帝國農科大學
王汝霖	山西霍州	24	官	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	宏文學院	東京帝國農科大學
杜延風	四川綿竹縣	24	官	光緒三十四年正月	四川游學預備學校	東京帝國農科大學
江書祥	四川資陽縣	23	自	光緒二十九年	成城學校	東京帝國農科大學
黃銘新	廣東開平縣	24	自	光緒三十二年	宏文學院	東北帝國農科大學
黃秉端	江西臨川縣	23	自	光緒三十一年	清華學校	東北帝國農科大學
張澤瀾	湖北武昌縣	22	自	光緒三十一年五月	宏文學院	東北帝國農科大學

续表

姓名	籍貫	年齡	費別	抵日時間	畢業學校	考入學校
宋維城	山東趙城縣	29	官	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	大阪高等預備學校	盛岡高等農業學校
楊澤	山西渾源縣	21	自	光緒三十二年九月	经纬學校	盛岡高等農業學校
曾公智	湖南邵陽縣	25	官	光緒三十年正月	清华學校	盛岡高等農業學校
田汝弼	山西渾源縣	22	自	光緒三十一年九月	经纬學校	盛岡高等農業學校
耿臻显	山西渾源縣	22	官	光緒三十年九月	经纬學校	盛岡高等農業學校
龙克敬	湖北沔陽州	21	官	光緒三十一年	岩手縣立農學校	盛岡高等農業學校
黄召棠	江西清江縣	22	自	光緒三十二年四月	宏文學院	鹿兒島高等農業學校
俞良謨	浙江奉化縣	20	自	光緒三十一年八月	大阪高等預備學校	鹿兒島高等農業學校
姚懋敏	直隸寧河縣	23	自	光緒三十二年七月	宏文學院	鹿兒島高等農業學校
刘宗翰	浙江鎮海縣	22	自	光緒三十二年九月	成城學校	東京蠶業講習所
曾朝选	四川納溪縣	20	官	光緒三十四年正月	四川游学預備學校	東京蠶業講習所
徐宗彦	浙江鎮海縣	26	自	光緒三十三年四月	大阪高等預備學校	東京水产講習所
何拔禺	湖南桃源縣	22	自	光緒三十一年	東洋大學	東京水产講習所
唐声太	湖南寧鄉縣	25	官	光緒三十年三月	成城學校	熊本高等工業學校
仲漱蓉	江寧沐陽縣	27	官	光緒三十二年正月	成城學校	熊本高等工業學校

續表

姓名	籍貫	年齡	費別	抵日時間	畢業學校	考入學校
張星煥	四川金堂縣	20	自	光緒三十年十月	成城學校	熊本高等工業學校
張 沆	四川資州	27	官	光緒三十四年正月	四川游學預備學校	仙台高等工業學校
張丙昌	陝西富平縣	22	官	光緒三十二年四月	经纬學校	仙台高等工業學校
曹樹聲	江西新建縣	26	官		清華學校	仙台高等工業學校
張振綱	貴州印江縣	28	官	光緒三十一年五月	宏文學院	仙台高等工業學校
歐陽沂	江西宜黃縣	28	官	光緒三十二年三月	经纬學校	仙台高等工業學校
錢殿奎	浙江慈溪縣	24	自	光緒三十二年正月	清華學校	仙台高等工業學校
鄒 灝	江西宜黃縣	21	自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	宏文學院	名古屋高等工業學校
李宗典	四川仁壽縣	25	自	光緒三十一年正月	成城學校	名古屋高等工業學校
孫自悟	湖北漢陽縣	23	自	光緒三十年五月	宏文學院	名古屋高等工業學校
張安蒞	湖北黃陂縣	19	自	光緒三十一年八月	宏文學院	名古屋高等工業學校
郭受齡	四川巴縣	28	自	光緒三十年四月	大阪高等預備學校	名古屋高等工業學校
趙鴻翔	江蘇鹽城縣	24	自	光緒三十二年四月	宏文學院	京都高等工藝學校
劉爾昌	直隸丰潤縣	25	公	光緒三十一年三月	大阪高等預備學校	京都高等工藝學校
朱銘軒	山東單縣	21	自	光緒三十三年三月	宏文學院	京都高等工藝學校

续表

姓名	籍貫	年齡	費別	抵日時間	畢業學校	考入學校
焦增銘	直隸東鹿縣	17	自	光緒三十一年八月	经纬學校	京都高等工芸學校
毛景遂	浙江諸暨縣	22	自	光緒三十二年三月	大阪高等預備學校	大阪高等工業學校
胡善志	湖南武陵縣	22	自	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	宏文學院	大阪高等工業學校
湯文聰	廣東新會縣	26	自	光緒三十二年八月	经纬學校	大阪高等工業學校
趙序東	山東栖霞縣	20	自	光緒三十三年九月	宏文學院	大阪高等工業學校
潘楷	廣東新會縣	22	自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	宏文學院	大阪高等工業學校
廖樹勛	湖南湘潭縣	24	自	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	大阪高等預備學校	大阪高等工業學校
譚光藻	貴州鎮遠縣	22	自	光緒三十二年二月	成城學校	大阪高等工業學校
王佩芬	貴州貴陽府	23	官	光緒三十一年五月	宏文學院	岡山醫學專門學校
舒元馨	山東福山縣	28	自	光緒三十一年	清華學校	長崎醫學專門學校
周培	浙江麗水縣	21	自	光緒三十二年十月	同文書院	長崎醫學專門學校
朱榮錦	江蘇高淳縣	23	自	光緒三十二年八月	大阪高等預備學校	長崎醫學專門學校
胡澄	浙江仁和县	22	自	光緒三十一年七月	大阪高等預備學校	長崎醫學專門學校
斯明	浙江諸暨縣	22	自	光緒三十二年	经纬學校	長崎醫學專門學校
丁維群	浙江錢塘縣	22	自	光緒三十一年九月	大阪高等預備學校	長崎醫學專門學校

续表

姓名	籍贯	年龄	费别	抵日时间	毕业学校	考入学校
金体选	浙江镇海县	28	自	光绪三十一年五月	早稻田大学理化科	长崎医学专门学校
萧也规	湖南善化县	24	官	光绪三十年七月	宏文学院	长崎医学专门学校
刘辅定	湖南醴陵县	28	自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	宏文学院	长崎医学专门学校
戚学绣	山东文登县	24	自	光绪三十一年二月	清华学校	长崎医学专门学校
陶铸	浙江会稽县	24	自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	经纬学校	长崎医学专门学校
唐兆槐	四川乐山县	25	自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	大阪高等预备学校	长崎医学专门学校
林维周	浙江镇海县	22	自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	大阪高等预备学校	长崎医学专门学校
杨自沂	湖北钟祥县	23	自	光绪三十年	宏文学院	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王功科	湖北麻城县	24	自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	宏文学院	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黄震亚	浙江瑞安县	19	自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	同文书院	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郑国光	江西宜黄县	23	自	光绪三十二年	宏文学院	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沈警	浙江瑞安县	18	自	光绪三十年三月	同文书院	大阪府立高等医学学校
李崑	浙江永嘉县	22	自	光绪三十年三月	同文书院	大阪府立高等医学学校
瞿钧	江苏上海县	22	自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	同文书院	大阪府立高等医学学校
余岩	浙江镇海县	26	自	光绪三十一年五月	日本体育会及宏文学院	大阪府立高等医学学校

续表

姓名	籍贯	年龄	费别	抵日时间	毕业学校	考入学校
高越	安徽合肥县	23	公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	宏文学院	长崎高等商业学校
张培礼	河南太康县	24	官	光绪二十九年	宏文学院	长崎高等商业学校
陈会	湖北安陆县	21	自	光绪三十二年正月	宏文学院	长崎高等商业学校
卢维周	江西南康县	25	官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	宏文学院	长崎高等商业学校
魏邦辉	湖北江夏县	23	自	光绪三十二年	宏文学院	长崎高等商业学校
徐光炜	安徽宜城县	30	公	光绪三十年正月	经纬学校	长崎高等商业学校
曹树藩	江西新建县	24	官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	经纬学校	长崎高等商业学校
汪宗洛	湖北江夏县	24	官	光绪三十年三月	成城学校	长崎高等商业学校
尹威龄	湖南酃县	24	官	光绪三十年三月	成城学校	长崎高等商业学校
朱仲飞	浙江归安县	22	自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	大阪高等预备学校	长崎高等商业学校
甄硕球	广东新宁县	22	自		海星商业学校	长崎高等商业学校
刘青黎	云南保山县	22	官		成城学校	东京高等商业学校
高兆霖	湖南新化县	22	官	光绪三十年七月	宏文学院	东京高等商业学校
陈杨鏞	福建侯官县	21	官	光绪三十一年	成城学校	东京高等商业学校
刘宏钰	湖南安福县	25	自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	宏文学院	东京高等商业学校

续表

姓名	籍贯	年龄	费别	抵日时间	毕业学校	考入学校
林取奇	福建长乐县	24	官	光绪三十二年二月	宏文学院	东京高等商业学校
葛宗楚	湖北通城县	25	官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	宏文学院	东京高等商业学校
阮钧	湖北竹溪县	24	官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	宏文学院	东京高等商业学校
徐钟英	湖北崇阳县	23	官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	宏文学院	东京高等商业学校
张鸿翼	湖北穀城县	25	官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	宏文学院	东京高等商业学校

●据沈云龙主编：《清末各省官自费留日学生姓名表》

中国留学生人数减少之后，由于生源不足，一些原来专门招收中国学生的学校陆续停办，如：

东斌学堂，1908年停办；

宏文学院，1909年夏天停办；

经纬学堂，1910年停办；

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1910年停办。

3. 留学生地区来源的重大差异

留日学生在国内的籍贯分布不均衡，并且差距悬殊，是贯穿于留日运动始终的一个问题。一般地说，经济比较发达，开放比较早，文化比较先进的地区留日学生多，否则，留日学生就比较少。来源差别情况请看下表：

清末各省留日毕业学生统计表^①

籍贯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至宣统元年七月			宣统元年七月至宣统二年六月			宣统二年六月至宣统三年七月			总计
	自费	官费	其他	自费	官费	其他	自费	官费	其他	
湖北	42	91	3	70	72		53	78	1	410
直隶	24	56	1	21	27		12	26		167
湖南	42	59	1	28	30	1	31	47		239
四川	108	36	4	58	26	1	46	23		302
江苏	55	39		86	69	4	64	14		331
浙江	58	90		52	27		66	25		318
广东	32	46		52	16		52	15		213
江西	9	28		14	31		15	33		130
山东	9	22		7	11		8	11		68
广西	25	9	1	15	4		10	1		65
辽宁	13	4		6	22		4	35		84
安徽	22	16		23	19		19	7		106
山西	3	24		6	16	1	4	12		66

^①据沈云龙主编《清末各省官自费留日学生姓名表》而统计。

第一篇 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的兴起和高潮

续表

籍贯	时间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至宣统元年七月			宣统元年七月至宣统二年六月			宣统二年六月至宣统三年七月			总计
		自费	官费	其他	自费	官费	其他	自费	官费	其他	
河南		7	9			9			8		33
陕西		2	5		3	6		3	8		27
福建		27	21		38	21	1	16	16		140
贵州		16	4		5	11		4	4		34
江宁		4	25			27			21		77
甘肃						1			1		2
云南		10	35		3	11		8	12		79
江南		1	3								4
京口驻防									1		1
北京旗									1		1
畿辅省						4			7		11
邮传部						2			2	2	6
陆军部									10		10
学部						1			1		2
海军部									7		7
京旗省						9			2		11
进士馆									1		1
京师大学堂									3		3
大学堂						1			2		3
绥远城			1								1
顺天		2									2
满洲			5								5

续表

籍贯	时间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至宣统元年七月			宣统元年七月至宣统二年六月			宣统二年六月至宣统三年七月			总计
		自费	官费	其他	自费	官费	其他	自费	官费	其他	
荆州驻防			3								3
盛京						1					1
蒙古						1					1
使署						1					1
正红旗省						1					1
八旗省						3					3
吉林						1					1
总计		501	631	11	487	480	9	415	434	3	2971

从上表可以看到，从1908年到1911年的3年时间里，全国各地留日人数差距很大。400人以上的仅有湖北1省；300人以上的有江苏、浙江、四川3省；200人以上的有湖南、广东2省；100人以上的有直隶、江西、山西、江宁、云南6省。其余各地人数均不足50，不少省和部门仅有数人留日。上述表明中国留日人数在国内的分布很不平衡，尽管他们归国后不完全回原籍活动和工作，但是留日的全过程对于各地影响是极不相同的，它对于后来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地域性特征有重要影响。

留日学生籍贯分布差别问题，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情况也看得出来。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分省统计表

入学时间 期数 人数	籍贯																				合计		
	1 9 0 0 1	1 9 0 0 3	1 9 0 0 6	1 9 0 0 7	1 9 0 0 7	1 9 0 0 8	1 9 0 0 8	1 9 0 0 9	1 9 0 0 9	1 9 0 0 9	1 9 0 0 9	1 9 0 0 9	1 9 0 0 9	1 9 0 0 9	1 9 0 0 9	1 9 0 0 9	1 9 0 0 9	1 9 0 0 9	1 9 0 0 9	1 9 0 0 9		1 9 0 0 9	
浙江	4	16	13	9	7	3		1	2	1													91
湖南	6	4	8	14	25	7	7	4	1	1	1	2											134
安徽	3	18	3	1	11	6	3	2	2	4		2											96
湖北	11	19	2	36	21	19	1	2	1	2													142
江苏	4	1	15	8	3	13	9	2		3	2	1	1										117
广东	3	2	2	4	1	26			4	1	1	6											185
直隶	9	1	15	3	2	30	10	3	15	5	2	3	13	8									129
贵州	1						2			1	2	1											14
福建		2	1	4	2	7	3		2	1													61
四川		5	1	3	9	4	4	2	3	1													158
山东		10				8	1	2	2	1		1											53
河南			6	1		4	1	1	4	2	1	1	1										45

续表

期 人 数	1 9 0 0 1	1 9 0 0 1	1 9 0 0 1	1 9 0 0 1	1 9 0 0 1	1 9 0 0 1	1 9 0 0 1	1 9 0 0 1	1 9 0 0 1	1 9 0 0 1	1 9 0 0 1	1 9 0 0 1	1 9 0 0 1	1 9 0 0 1	1 9 0 0 1	1 9 0 0 1	1 9 0 0 1	1 9 0 0 1	1 9 0 0 1	1 9 0 0 1	1 9 0 0 1	1 9 0 0 1	1 9 0 0 1	1 9 0 0 1	1 9 0 0 1	1 9 0 0 1	1 9 0 0 1	合 计																																																																																																																																																																																																																																																																																																																																																																																																																																																																																																																																																																						
籍 贯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1 842 843	844 845 846	847 848 849	850 851 852	853 854 855	856 857 858	859 860 861	862 863 864	865 866 867	868 869 870	871 872 873	874 875 876	877 878 879	880 881 882	883 884 885	886 887 888	889 890 891	892 893 894	895 896 897	898 899 900	901 902 903	904 905 906	907 908 909	910 911 912	913 914 915	916 917 918	919 920 921	922 923 924	925 926 927	928 929 930	931 932 933	934 935 936	937 938 939	940 941 942	943 944 945	946 947 948	949 950 951	952 953 954	955 956 957	958 959 960	961 962 963	964 965 966	967 968 969	970 971 972	973 974 975	976 977 978	979 980 981	982 983 984	985 986 987	988 989 990	991 992 993	994 995 996	997 998 999	100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 1008	1009 1010 1011	1012 1013 1014	1015 1016 1017	1018 1019 1020	1021 1022 1023	1024 1025 1026	1027 1028 1029	1030 1031 1032	1033 1034 1035	1036 1037 1038	1039 1040 1041	1042 1043 1044	1045 1046 1047	1048 1049 1050	1051 1052 1053	1054 1055 1056	1057 1058 1059	1060 1061 1062	1063 1064 1065	1066 1067 1068	1069 1070 1071	1072 1073 1074	1075 1076 1077	1078 1079 1080	1081 1082 1083	1084 1085 1086	1087 1088 1089	1090 1091 1092	1093 1094 1095	1096 1097 1098	1099 1100 1101	1102 1103 1104	1105 1106 1107	1108 1109 1110	1111 1112 1113	1114 1115 1116	1117 1118 1119	1120 1121 1122	1123 1124 1125	1126 1127 1128	1129 1130 1131	1132 1133 1134	1135 1136 1137	1138 1139 1140	1141 1142 1143	1144 1145 1146	1147 1148 1149	1150 1151 1152	1153 1154 1155	1156 1157 1158	1159 1160 1161	1162 1163 1164	1165 1166 1167	1168 1169 1170	1171 1172 1173	1174 1175 1176	1177 1178 1179	1180 1181 1182	1183 1184 1185	1186 1187 1188	1189 1190 1191	1192 1193 1194	1195 1196 1197	1198 1199 1200	1201 1202 1203	1204 1205 1206	1207 1208 1209	1210 1211 1212	1213 1214 1215	1216 1217 1218	1219 1220 1221	1222 1223 1224	1225 1226 1227	1228 1229 1230	1231 1232 1233	1234 1235 1236	1237 1238 1239	1240 1241 1242	1243 1244 1245	1246 1247 1248	1249 1250 1251	1252 1253 1254	1255 1256 1257	1258 1259 1260	1261 1262 1263	1264 1265 1266	1267 1268 1269	1270 1271 1272	1273 1274 1275	1276 1277 1278	1279 1280 1281	1282 1283 1284	1285 1286 1287	1288 1289 1290	1291 1292 1293	1294 1295 1296	1297 1298 1299	1300 1301 1302	1303 1304 1305	1306 1307 1308	1309 1310 1311	1312 1313 1314	1315 1316 1317	1318 1319 1320	1321 1322 1323	1324 1325 1326	1327 1328 1329	1330 1331 1332	1333 1334 1335	1336 1337 1338	1339 1340 1341	1342 1343 1344	1345 1346 1347	1348 1349 1350	1351 1352 1353	1354 1355 1356	1357 1358 1359	1360 1361 1362	1363 1364 1365	1366 1367 1368	1369 1370 1371	1372 1373 1374	1375 1376 1377	1378 1379 1380	1381 1382 1383	1384 1385 1386	1387 1388 1389	1390 1391 1392	1393 1394 1395	1396 1397 1398	1399 1400 1401	1402 1403 1404	1405 1406 1407	1408 1409 1410	1411 1412 1413	1414 1415 1416	1417 1418 1419	1420 1421 1422	1423 1424 1425	1426 1427 1428	1429 1430 1431	1432 1433 1434	1435 1436 1437	1438 1439 1440	1441 1442 1443	1444 1445 1446	1447 1448 1449	1450 1451 1452	1453 1454 1455	1456 1457 1458	1459 1460 1461	1462 1463 1464	1465 1466 1467	1468 1469 1470	1471 1472 1473	1474 1475 1476	1477 1478 1479	1480 1481 1482	1483 1484 1485	1486 1487 1488	1489 1490 1491	1492 1493 1494	1495 1496 1497	1498 1499 1500	1501 1502 1503	1504 1505 1506	1507 1508 1509	1510 1511 1512	1513 1514 1515	1516 1517 1518	1519 1520 1521	1522 1523 1524	1525 1526 1527	1528 1529 1530	1531 1532 1533	1534 1535 1536	1537 1538 1539	1540 1541 1542	1543 1544 1545	1546 1547 1548	1549 1550 1551	1552 1553 1554	1555 1556 1557	1558 1559 1560	1561 1562 1563	1564 1565 1566	1567 1568 1569	1570 1571 1572	1573 1574 1575	1576 1577 1578	1579 1580 1581	1582 1583 1584	1585 1586 1587	1588 1589 1590	1591 1592 1593	1594 1595 1596	1597 1598 1599	1600 1601 1602	1603 1604 1605	1606 1607 1608	1609 1610 1611	1612 1613 1614	1615 1616 1617	1618 1619 1620	1621 1622 1623	1624 1625 1626	1627 1628 1629	1630 1631 1632	1633 1634 1635	1636 1637 1638	1639 1640 1641	1642 1643 1644	1645 1646 1647	1648 1649 1650	1651 1652 1653	1654 1655 1656	1657 1658 1659	1660 1661 1662	1663 1664 1665	1666 1667 1668	1669 1670 1671	1672 1673 1674	1675 1676 1677	1678 1679 1680	1681 1682 1683	1684 1685 1686	1687 1688 1689	1690 1691 1692	1693 1694 1695	1696 1697 1698	1699 1700 1701	1702 1703 1704	1705 1706 1707	1708 1709 1710	1711 1712 1713	1714 1715 1716	1717 1718 1719	1720 1721 1722	1723 1724 1725	1726 1727 1728	1729 173

续表

入学时间 期数 人数	籍贯																			合计													
	1900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1912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1		
台湾																				1	4											5	
蒙古																																5	7
北京																																4	4
石门市																																1	1
上海																																1	1
合计	41	25	96	83	58	205	55	55	39	35	19	20	18	19	22	2	4	24	79	153	102	132	87	90	24	18	25	27	24	46	1627		

●据沈云龙主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民国留学生名簿》统计。该书称实有 1638 人，但只列出 1627 人；第 19 期有一位籍贯不详，未统计入内。

从上表可以看出，150 人以上的有广东（185 人）、四川（158 人）两省；100 人以上的有湖北（142 人）、湖南（134 人）、直隶（129 人）、辽宁（125 人）、江苏（117 人）五省；5 人以下的地区和部门有台湾、京旗、北京、甘肃、热河、石门市和上海。

这种分布差异，与普通留日生籍贯分布差异所反映出的问题还不完全相同，它除了反映出各地的经济、开放和文化差别外，还反映出了各地政治势力的衍变、消长情况。因为有些军阀比较注重咨送自己的属下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以培养人才，备作将来之用。这种情况在各路军阀割据时期并不鲜见，如阎锡山军队、奉系军队等，在不同的时期里曾相继向陆军士官学校输送过很多留学生。

4. 清政府对留日学生的管理

中国近代留日运动之初，清政府对留学没设专门的管理人员与机构。1899 年 6 月 21 日，《总理衙门奏遵议遴选生徒游学日本事宜片》中称：留学生赴日本后，“由出使日本大臣就近照料，无庸另派监督。”

在中央政府未设统一、专门的管理机构之前，有些省份在派遣留日学生的同时，已开始安排自派留日学生的管理工作。湖北是派遣留日学生较早的省份，张之洞同时又先后派遣张斯恂和钱恂任过湖北留日学生监督。另外四川等省也向日本派过留日学生监督。

1902 年，成城学校入学事件发生。事件发生后，中日间达成的协议中有一款：依中国政府之复函，在日本设置留学生

监督一员。

为了区别于此前各省已有的留学生监督，把中央政府派出的监督叫做总监督。

根据中日之间的协议，清政府于1902年9月任命外务部员外郎汪大燮为首任留日学生总监督，汪大燮则于1903年1月1日赴东京视事。

为任命留日学生总监督一事，外务部在奏议中称：“查近来屡奉诏飭各省逐派学生出洋肄业，并准自备资斧前往，士皆竞奋于学，不惮负笈出游。日本地近费省，趋之者尤众，其官派学生，各省或有委员监督，或无委员监督，自费学生则自保送入学后，并无约束。情谊既难联络，规则亦未整齐。出使大臣虽有稽查照料之责，而交涉事繁，兼顾实难周到。该学生等分疏事隔，且虑下情无以上达，一涉猜疑，转生纠葛，自非特设专员总司其事，不足以端正其趋向，策励通才，仰副朝廷作育裁成之至意。此次载振过日本时，见其外部大臣小村寿太郎即以选派博学爱才之人充总监督驻扎是邦为言，臣等屡晤日本驻京使臣内田康哉，及其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来京，皆述游学生各节，望中国派员监督，妥定章程，俾各学生免误方向，学业有成，以备将来任用。其词意俱甚切挚。联友邦维持之谊，慰多士仰望之心，责成尤在得之造就，方有实效。臣等公同遴选，查有四品衔臣部员外郎汪大燮品端学裕，器识宏通，随使出洋，办事妥恰，于日本游学生情形，尤为稔悉。拟请派为总监督前往驻扎。所有官派自费各学生统归管辖……应请将该员赏给卿衔，由臣部刊给木质关防一顆，文曰大清管理赴东洋游学生总监督之关防，以昭信守，准其酌带随办文牍及

翻译共二三员，所需薪水用项，每岁准支银二万两，由出使经费内提拨。三年期满，再行奏请更换，随带人员，届时照出使章程请奖。”^①

汪大燮出任留日学生总监督之前，清政府有关留学生在日本的事宜都由出使大臣裁办。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外务部在《奏议复派赴出洋游学办法章程折》中，规定下列事项由出使大臣办理：

第一，贵胄学生留洋之时，对他们的“一切稽查调考，仍归出使大臣办理。如不安分闹事过犯者，责成出使大臣破除情面，切实注劣咨送回华，以免贻笑外人，致伤国体。”

第二，官派留学生，应“先期将该生衔名、年籍、派学何项专门，逐一咨会使馆，俟该生到洋面加查考后，即派参赞一人为之监督，安置住所，寻觅学堂，稟商咨送所有学生经费，由原派大臣先期咨送，使馆即派该监督妥谨经理，年终造册，报由出使大臣复核咨。学生功课行为，由该监督随时稽察切实稟报，每年大考一次，由使臣亲自考校……俟专门毕业呈验文凭，报由使臣定期面试，如果相符，即将该生人品、学问、数年中有无过犯，出具切实考语，咨复原送大臣，并报明外务部转咨管学大臣存案。随飭监督为之预备归装，赁购仓位，送回中国听候复试。”

第三，自费生，不必限以年岁，“除到馆报名留书住址以便查询保护外，如无不安本分及别有过犯，使馆即无庸过为刻核。”

^①《约章成案汇览》卷三十二下。

汪大燮到任后，则负起了留日学生的具体管理之责。其具体之责，从1903年10月张之洞和刘坤一奏呈的《筹议约束鼓励游学生章程》中可见一斑。

其中《约束游学生章程》有言：

一，无论官费生、私费生，并无论日本官设学堂、私设学堂，均非出使大臣总监督公文保送不准收学。

二，游学生在学堂中品行归学校考察，其在外言动举止，如有不轨于正之据，经中国出使大臣总监督察访得实，随时知会该学堂商酌，务减其品行分数。

三，学生如妄发议论，刊布干预政治之报章，如经中国出使大臣总监督察访，随时知会该学堂，令其停辍，不遵则即行退学。

四，现已在日学生，无论官费私费，查有过犯品行不端者，经中国出使大臣总监督知会该学堂请为斥退。

五，各省所派官费生及私费生，经本省督抚查有不安本分品行不端之人，随时咨明中国出使大臣总监督，转达日本各学堂请为斥退。

六，经中国出使大臣总督查有实据，在日本国内刊印“矫激之说，紊纲纪害治安”之书者，随时知会日本应管官署商酌办法，实力查禁。

七，中国游学生会馆，办事有紊纲纪害治安不安分者，由出使大臣总监督咨会日本应管官署随时查禁。

其中《自行酌办立案章程》与留日学生总监督之责有关的为：

一，凡不遵守约束之学生，商明各日本学堂斥退后，应由

出使大臣总监督随时严密稽察，其无悔改之望者，务须查照定章程，商请日本官署勒令该学生附船回国。

二，在日本私设学堂毕业回国之学生，除由出使大臣总监督确查其平日品行果系端谨，科学果系优娴，始准保送进京候考外，应请钦派大臣考察试验时格外认真查核。

从以上章程中所列有关留日学生总监督之职责的内容看，清政府派遣总监督一职，除要进行正常的留学生行政管理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管制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正因如此，后来在各种政治运动中留日学生频繁地与留日学生总监督发生冲突。

1906年，中国近代留日运动达到第一次高潮。这一时期，留日学生有参加革命活动者，有终日闲荡者，日本的学校也纷杂不齐，质量不一。于是，1906年12月2日，清政府奏定《管理游学日本学生章程》^①，决定在驻日公使馆内设管理游学日本学生监督处，署总监督与副总监督各一员，其下设庶务、会计、文牍、通译等科及编报、监察等机构。

该章程包括总纲、权限、责任、管理条规、设员办事条规、经费等六项。

章程总纲为：（一）于驻扎日本出使大臣署内设游学生监督处，为管理游学生治事之所；（二）设监督一员，管理游学生一切事宜，以出使日本大臣兼任；（三）设副总监督一员，由学部会商出使日本大臣奏派。

其权限为：（一）副总监督承总监督之指挥，办理所有游学生事务；（二）凡游学生事项，有关于外交者，由副总监督

^①《学部奏咨辑要》第一编。

稟请总监督主持；（三）凡关于各学校及关于游学生之事项，副总监督得自行办理；（四）监督处办事各员有不得力者，副总监督得随时稟请总监督撤退。

其责任为：（一）对于学部及各省督抚应将学生成绩高下、功课勤惰、品德优劣据实报告；（二）对于游学生应负爱护指导纠正扶持之责。

其管理条规分普通管理条规、官费生管理条规与自费生管理条规。

普通管理条规为：（一）凡游学日本学生无论官费自费，所入学校，非经日本文部省选定及出使日本大臣认定者，概不送学，将来毕业，亦不给证明书；（二）凡游学日本学生，无论速成毕业、普通毕业、专门高等及大学毕业，均须有总监督证明书，无证明书者，不得赴部投考，并不得充各省官立学堂练习；（三）凡游学日本学生入学、退学、转学及改学科、请假等事，均须本处认可，未经认可而擅行者，将来毕业概不给证明书；（四）凡游学生如有品行不修，学业不进者，经本处查明，即行勒令退学，并咨回原省；（五）凡游学生非在本国中学堂毕业及有同等之学历，或在日本各普通学校毕业者，不送入官立高等及专门学校，非高等毕业者，不送入官立大学；（六）每处应于每年正二月间查明日本普通各学校年内所有游学生、毕业者若干人，毕业以后愿学何科，愿入何校，审定人数，先与日本文部省协商预为布置。

官费生管理条规为：（一）凡官费生所习学科，虽有本生认定，本处亦得斟酌指派，但须说明指派事由；（二）凡官费生寄宿舍除在学校外，其在旅馆下宿或自租房屋者，如本处认

为不适当，得限令迁移；（三）凡官费生学费概照本章程所定数目，由本处按照人数，将学费汇存银行，每学生各给一簿，由学生按照西历每月持簿赴银行支取，不得预支。

自费生管理条规为：（一）凡自费生能考入官立高等或专门学校及大学者，应由总监督商请该生本省督抚，现给官费，其余官费缺出，概不补入；（二）凡自费生先有名籍在使馆，而又能遵约束者，如有资斧不继，总监督查明属实，得在该生本省经费项下拨借，至多不得过 50 元，限两月清还，拨借之时须有官费生三人担保，如逾期不还，即于保证人名下按数匀扣归还，以后该生不得再借，曾为人保证有应代还之款未及还清者，不得再充保证人。

同年 12 月 28 日，官费生管理条规又增加为：（一）凡官费生患病非入医院不可者，应入监督择定之医院，医费一切宜从节约，由副总监督派员与医院清算，毋庸学生经手；其可不必入医院者，概不给费。（二）凡官费生既入医院，学费即行停止，俟其出院入学，再行发给。

自费生管理条规又增加为：（一）凡自费生先有名籍在使馆，而又能遵约束者，如有疾病入医院，已逾三月之久，资斧不继，自愿回国者，总监督得在该生本省经费项下，酌给川资五十元，但以一次为限。（二）凡自费生有死亡者，由总监督分别路途远近，于该生本省经费项下，拨给棺敛运柩费，惟至多不得过 300 元。

从以上章程的诸项条款可看出，所订之监督处职责分明，组织严密，规划周详。自此以后，清政府对留日学生的管理与监督有所加强。

1908年，清政府据出使日本大臣胡维德建议，公使不再兼任总监督，副总监督亦取消，由学部会商出使大臣于使馆参赞内遴选专员任监督，禀承公使办理管理留学生事宜，其余都无大变化。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管理留学生是公使职内的事，其本人不必再兼任总监督。

清末，汪大燮于1902年首任留日学生总监督；1906年，王克敏再任；1907年，张煜全又任。

第 二 节 丰富多彩的留学生活

1. 留日学生的衣食住行

1896年首批中国留学生去日本以后，日本逐渐成了中国人向往的地方，留学生也身价倍增。“国家因拳匪乱后，知闭关之不足自存，竞谈新学。江介大侠，馨遁老儒，其聚于东京者，近将万人。”^①

人们虽然大批赴日，但日本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陌生的。这种陌生不仅是由于感性认识上是一片空区，连从书本上得到的感知也极度贫乏。在这种情况下，留学生踏上日本国土后，就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第一，清末留学生的学习生活是艰苦而多样的。

留学生踏入日本国土之后第一个要学习的是日语。国内清末已有专门学习日语、为留学做准备的学堂，但其数量有

^①《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36页。

限，绝大多数人留学之前享受不到这种受教育的机会。即使是在国内已很有地位的举人、进士，到日本后也需要过语言关。张之洞等人倡导派遣赴日留学生的理由之一，就是中日文字同宗，有相通之处，但留学生到日本之后发现，正是这种相通之处反为学习语言设置了层层障碍。中日都用的汉字，在意义上有不不同的地方，留学生们皆为之惊奇。1906年留学日本的苏高曼在他的日记中录有“日本奇字”：名刺（名片）、空（天）、大丈夫（不要怕）、考案（思索）、程（大概）、仕合（幸福）、明月（中秋）、息子（儿子）、天气（天气好）、游君（荡子）等数十个^①。1902年有《和文奇字解》出版，专门讲解日本语奇字。为使中国留学生学习日本语，从1900年到1910年日本出版的日本语书籍有59种^②。其中有中国人写的，又有日本人写的。据现在可以统计出的54种，共约17014页，平均每种315页。

中国留学生到日本后，有人先补习日语，也有人直接进入专门为中国人办的学校里学习。这类学校往往讲授日本语和普通课程，课程安排以宏文学院较为典型。宏文学院开设的课程有修身、历史和地理、算数、英语、物理、化学、图画、体操、动物学、植物学等，即除了补习日语，还要学习中学的普通课程。每学年分三个学期，每星期有33个课时。第一学年的第一个学期，每周日语课27节，占总课时的82%；第二学

^①实藤惠秀著，陈固亭译：《明治时代中日文化的连系》（台湾版），第188—189页。

^②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41—43页。

年的第一个学期，日语每周 12 节，占总课时的 36%，理科、示教、算术共 10 课时，占总课时的 30%；第三学年的第一个学期，日语每周 9 课时，占总课时的 27%，动物、植物学 15 课时，占总课时的 45%。三个学年的日语课，占全部课时的 40.4%，其他的课程则占 59.6%，即普通课超过了日语课，是日语课的 1.48 倍。到 1909 年学校关闭，入校学习者共 7192 人，从这里毕业的有 3810 人^①。

速成教育比学普通课程要紧张，它往往只用普通学习几分之一的时间来学完课程。为了快速，有的速成教育往往由日本老师讲授，有人在课堂上当场翻译成汉语供中国学生学习。

学习完日语与普通课程之后，有的人返回国内，有的人进入专门学校和高等院校。进入专门以上学校学习者，所在的学校有大学、实业专科、师范学校等 80 多个，学的科目有工科、理科、外语、师范、史地、法政、军事、手工、美术、音乐、农牧、商业、体育、医药、染织等几乎当时所见的全部科目，这反映了留学生们学习兴趣的广泛。20 世纪初期以来归国的留日学生，对中国各项文化与技术事业进步所做的贡献，与这个时期留学生专业的选择是有一定关系的。具体看，在广泛的学习科目中，留学生以选择学文科者居多，学农、工、格致等实业的少。据统计，1906 年湖北留日学生入高等以上学校者共有 96 人，其中学法政、高等师范、高等商业的有 89 人，学实业专科的只有 7 人^②。李四光就是当时少数学工科的留学生

^①实藤惠秀著，谭汝谦 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 47 页。

^②陈群等著：《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第 9 页。

之一。

第二，清末中国留学生的日常生活是清苦而紧张的。

清末赴日留学生人员多，他们的出身与去日资格不同。官宦与富家子弟在日本留学期间经济生活比较充裕，有的带佣人一同赴日料理生活；有的在日本雇工料理生活。但是绝大多数官费与自费生的生活是清苦的。1905年清政府对官费留日生的学费做过规定^①：

学普通学科和肄业私立高等专门学校及私立大学者，每年日金400元。

由官立高等学校毕业升入官立大学者，每年500元，入官立大学只习选科者，每年450元。

肄业官立高等专门学校者，每年450元。

靠上述标准的学费生活在日本的官费留学生，生活基本可以保持在当时日本人民一般生活水平线上，生活节俭一点，可以维持留学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开支。与上述规定同一年以官费留学日本人宏文学院的黄尊三在1908年8月27日的日记中列了一个详尽的月支出表，房租、吃饭、学习用具、日常用品、衣服、医药、车费等方面16项费用，共计日元33元5分^②，基本上相当于从政府所得到的学费的数量。留学生生活的清苦。从秋瑾的家书中可见一斑：“衣服、零用、纸笔等，每月需三十元之谱，尚不敢奢侈一点；出门行路，并

^①李喜所：《近代中国留学生》，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37—138页。

^②实藤惠秀著，谭汝谦 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137页。

未坐过人力车也。”^①总的说，官费留学生的生活还是可以的。曾担任过四川省留日同乡会会长的廖希贤 1905 年初至 1911 年秋在日本留学，由于当时日本的生活费用很低，“他由成都府官费派往日本留学，每年发给学费一百八十几元，医药费三十几元，赴日本及回川旅费另发。他在日本一切费用开销后，一年还可节余二三十元兑回给家用。”他所在的“合江籍的留日学生，大都是与本县或外县志趣相投的几个留学生共同一处日本民房居住，雇请一名日本妇女代为煮饭及浆洗缝补。”^②

日本各校对留学生服装也有要求。学陆军的要穿立领金扣的制服，其他学校的留学生，刚一入学也要做统一式样的制服，有冬服、夏服各 1 套，外套 1 件，还有靴帽及衬衣，约花费二三十元。以后则是根据自己情况随用随添置，所需费用不多也不集中了。黄尊三所列的月支出表中，衣着上只花费 2 元。

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初期，对日本饮食很不适应，1896 年去日本留学的韩筹南、李清澄、王某和赵某抵日后很快返国即与此有关。中国留学生大量涌入日本之后，情况稍有好转，在日本出现了中国风味的餐馆，有的留学生还自己做饭。居住时间一长，慢慢可以适应日本的饮食习惯。初去日本时，往往要有个适应过程。黄尊三在 1905 年 8 月 26 日的日记中称：“高等学堂一起来日的同学，大都染病，是气候和食物不适之

^①陈象恭：《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中华书局 1983 年，第 24 页。

^②廖士元：《清末合江的留日学生概况》，载《合江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七集，第 84—86 页。文中所说的“一百八十几元”该是有误。

故。”^①

清末留学生的住宿有三种情况。一是住学校宿舍，一是租客栈住，一是几个人合租房子住。第一种情况省钱，但人多不方便；第三种情况钱稍贵点，但最为自由，鲁迅留学日本时为了方便学习多是这样住宿。在住宿问题上各校又有不同的规定。成城、振武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的留学生必须住校，其他普通的学校情况不同。法政速成科及普通科，要求留学生必须住校，宏文学院原则上也要求住校，情况特殊者经过申请可以不住校。有些学校在住宿问题上没有限定，任凭学生选择。在住宿时中国留学生有很强的自觉性，有一套全面的公寓生活中不是正式规定的规定——留学生自治要训，这个要训关于生活方面的主要内容为，保持室内卫生，不影响别人学习和休息，爱护公寓内的公物，爱护他人的物品等等。^②

清末中国留学生赴日本人数渐多以后，在日本为中国留学生服务的设施也逐渐多了起来。东京神田区像是一座留学生城，在那里有为中国留学生服务的书店、商店、旅馆、当铺、印刷所等。日本有的报纸也开辟了为中国留学生服务的专栏。这一切都为留学生的生活创造了方便条件。

第三，清末中国留学生的业余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大多数留学生在渴望学习西方现代科学知识及了解现代社会思潮的思想驱使下，在业余时间把读书看成是第一要义。到日本后他们经常跑书店，涉猎各方面书籍，有西方人和日本人

^①藤惠秀著，谭汝谦 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130页。

^②实藤惠秀著，谭汝谦 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166页。

写的书，有中国的古典名著，还有当时刊行的各种杂志，在异域广采博收充实自己。周作人就是这样，据他的传记作者讲，在日本留学期间，“周作人生活中，唯一的事情，也是最主要的乐趣，就是逛书店。”在他曾居住过的神田、本乡一带，有许多书店、书摊。如神田的相模屋主人小泽民三郎，就因售书周到“而得到周作人的信任”，直到留日6年回国后还托他代购书刊。“此外，本乡的南江堂以出售德文书著称，东京常常有日本新刊书与杂志，文求堂多中文旧书，郁文堂、南洋堂总分店则以卖洋书出名，都是各具特色，也是周作人、鲁迅（还有许寿裳）经常光顾的。”^①

除了读书，留日学生们还组织各种活动，集会、演讲最为盛行。吴稚晖在宏文学院时的演讲就颇得人们的好感。他们演讲的内容涉及学习、时事、政治等各个方面。1902年清国留学生会馆建成，更为各种活动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会馆里有会议场、演说场、日语教室和俱乐部、接待室、事务室等，它成了留学生从事各种活动的聚集地，留学生们经常在这里集会。体育运动也是留学生们喜爱的一种业余活动，活动的内容也丰富新颖，有游泳、滑冰、滑雪、跑步、骑马、爬山等。柔道对留学生来说也是一项吸引人的运动，宏文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在嘉纳治五郎的提倡之下，很多人参加过柔道这项体育活动。

跳舞、游玩也是留学生乐于从事的业余活动。留学生到日本后，被绮丽的大自然风光所吸引，尤其是具有日本民族象征

^①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22—123页。

意义的富士山与樱花，成为留学生们渴望欣赏的景观。节假日里，留学生们成群结队地涌向了他们所向往的地方。“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却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少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①有的留学生结伙搭伴涉足野游，徜徉海滩。日本的山水，深深地吸引了他们。

廖希贤曾说：日本妇女在社交方面较当时旧礼教束缚下的中国妇女要不守旧些，她们与中国留学生一道外出郊游、野餐，一道唱歌也是常有的事。他“和刘汝琼、韦德周、龚农瞻（江津县留学生）几个人便曾几次与日本女友一道去郊外野餐和大家一起唱歌。”^②

留学生的业余生活，还包括著书、译书活动。他们既著有日语教科书，又翻译了大量社会学、政治学、外交史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对后来留学生从事这类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2. 清国留学生会馆与留学生自治

留学生出洋在外，远离故土，环境陌生，学业紧张。在这种情况下，留学生们自我管理、独立生存，显得尤为重要。

实际上，从近代留日运动开始，中国留学生在留日期间，便发扬了中华民族勤劳、朴实、自尊、独立等的优秀品格，自我顽强生活，相互关照支持。

20世纪初，留日学生中间便开始流传一本名为《留学生

^①鲁迅：《藤野先生》，载《朝花夕拾》，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61页。

^②廖士元：《清末合江的留日学生概况》，载《合江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第86页。

自治要训》的书，内中有住宿、上街、交友等方方面面应注意的事项，各事项写得详尽、具体，显得甚是实用，新到日本的留学生见到它，便立刻会知道很多“该怎么做”、“该注意什么”。该书要项如下：

留学生自治要训^①

- 一 往来道路须靠左行。
- 一 在路上遇见友人，不可扬声呼唤，也不可久立路边闲聊，稍作倾谈，行过礼即宜分手。
- 一 不可随地吐痰。
- 一 不可随地小便。
- 一 前往参观时，要认清出口、入口，不可大声谈话。
- 一 进入陈列所时，不可随便打听价钱。
- 一 对下女要庄重（不可开玩笑）。
- 一 电车满座之时，应让座与老人、小孩和妇人。
- 一 电车内不可抽烟，或盘腿而坐。
- 一 待车停定后，始可上下电车。
- 一 室内要打扫干净。
- 一 不要穿著拖鞋进入屋内。
- 一 夜间不要大声呼叫。
- 一 厕所的木屐和草鞋，只许在大小便时穿著。
- 一 大小便要排在便器中。

^①实藤惠秀著，谭汝谦 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165—167页。

- 一 入浴之际，先把下半身洗干净，才可进入浴池里。
- 一 痰要吐在痰盂里。
- 一 就寝时要熄灯。
- 一 不能代收别人的挂号邮件。
- 一 同住者写信时或温习时，不要在旁打扰。
- 一 他人书桌上的书籍或抽屉中的物件不可乱翻。
- 一 慎密保管手表及金钱。
- 一 衣服要清洁。
- 一 夏天也不可赤身露体。
- 一 访友之时，请先打听是否在家，呈上名片，当入屋时，要脱下鞋子进入。
- 一 在室内应坐下，不可徘徊打转。
- 一 出入房间之时，应要行礼。
- 一 在吃茶果子时，应用筷子夹起，放在左手手掌中才吃，不可把筷子立即送入口中。
- 一 食物掉落在席上时，应该拾起放在厨房一角，不能再放回口里。
- 一 不要随便打听别人的年纪。
- 一 出入之时，要记得关上门户。
- 一 不可吃冰。
- 一 日本的米难消化，不可吃太饱。
- 一 要多运动。

以上要训，主要是指一般生活中的问题，基本上可以称其

为是留学生的一种自我约束。除此之外，留学生的自治还应有更深层次的一种意义，即自我发展。

留学生结为团体，编辑报刊，出版教科书等，可以看成是自我发展的表现，另外，在中国留学生中还出现了其他一些体现自我发展的事项。比如，当时因为大批中国留学生聚集东京，他们急需日语等方面的补习，便有了留学生自办补习班的现象。

蒋百里留日期间，即办过一所补习预备班。

陆军士官学校“自第四期（1906年）开始，中国学生入学者更多，单是百里的求是老同学就有十人之多。过去百里受过师友们的提携，现在他自己也要提携后进，为中国建军干部充当识途之马。他与投考生商办一所临时预备班，在住在士官校对过的老大娘小田园之家租屋一间，其条件是每逢星期日借用半天，茶水由房东供给，费用由大家公摊。教师仅有百里一人，每星期他必如时而往，讲解入学须知及日本军事概况。他所讲的日军编制法、动员法、军人教育、排连营团长的职守及其升调手续，都是从课本及实验中得来的。”^①

蒋百里办班之时，他刚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不久，他即回国，该班自行解散。

如果说蒋百里办的班创始之初即具有“临时”性质，那么范源濂所办的则是志向于长久。

范源濂留日期间，创办了速成法政师范学堂，设法科与师范科，学习期限为一年半和半年。办学中，范源濂聘请专门翻

^①梅菊隐：《蒋百里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1页。

译人员翻译日文讲义，学生不学日语可直接学习中文。

秋瑾留日期间便在范源濂所办的班中学习过。

1905年暑假后，秋瑾回家休假后再渡日本继续留学，进入了东京青山实践女校附设的清国女子速成师范专修科的师范班学习教育及工艺等科，该校校长是下田歌子。

同年11月6日，秋瑾在一封信中提及该师范班：“学校为范源濂与下田歌子所办，学规甚紧，每礼拜三十点功课，又自修六时，学费十六元，须买书参考，甚贵。”^①

王时泽在《回忆秋瑾》一文中对该师范班也有所记述：“秋瑾由国内省亲回来，入青山实践女校附设师范班学习（这个师范班是范源濂与实践女校校长下田歌子所发起的，修业期限为一年，除国文教员章士钊外，其余教员均系日本人，用翻译上课）。……实践女校师范班仅办一期即未续办。”^②当时该班有湖南官费生20人，自费生约有10人。

清末，中国留日学生的自治管理与清国留学生会馆有很大关系。该会馆建立，标志中国留学生的自我管理已系统化、规范化、高度化。

清国留学生会馆成立于1902年3月16日，它又叫中国留学生会馆或支那留学生会馆，位于东京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18番地（今骏河台2丁目3番地），主体是二层建筑。

在新年团拜会上，留日学生向驻日公使蔡钧正式递交了成立留学生会馆申请书，而后获得了批准，并获得了驻日公使馆

^①徐象恭编著：《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第24页。

^②徐象恭编著：《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第25页。

的相当支持。

会馆成立大会是在东京锦辉馆召开的，公使蔡钧出任会馆总长，留日学生总监督钱恂任会馆副长。会议通过了章程，选举了首届干事 12 人，他们是：吴振麟、钱承志、范源濂、蔡锷、陆世芬、王璟芳、曹汝霖、张绍曾、吴禄贞、高逸、金邦平、章宗祥。

会馆章程规定：其宗旨为联络情谊，交换知识；干事由投票产生，半年改选一次，不得连任；12 名干事内互选执事 6 人，书记 4 人，会议 2 人；会馆每年春秋各举行一次会员大会；干事每月第 4 个星期日集会协商馆务；经费由集捐充之，每位会员每年捐银 3 元，每两月捐 5 角；收支帐目定期公布。

会馆制订了馆内规则 18 条，其主要条文有：

1. 会馆每日午前 7 时开馆，午后 10 时闭馆。
2. 馆内设事务室、应接室、阅览室、食堂各一处，其余为谈话室。
3. 馆内不得过于喧哗，以示自重。
4. 馆内雇用门丁、小使各一名，以备伺应，门丁不得差遣出外。
5. 凡同人信件，除银洋要件外均可代收，惟仍俟本人自取，概不分送。
6. 事务室为职员办理馆务之处，除有事外，不得纷扰。
7. 馆内设住址簿一册，凡同人住址有迁移者，可随时记入。
8. 馆内设题名簿一册，请新来者自签姓名，以便刊入同瀛录。

9. 馆内设参议簿一册，凡有未尽妥善之处，同人见闻所及，足匡不逮者，请随时记录，以备议改。

10. 同人欲借会馆宴会者，须三日前照会庶务干事。

11. 宴会之外，馆内不得饮酒。

12. 凡饮食当在食堂内，宴会亦同。

13. 馆内只备茶水、灯炭，此外概不供应。

14. 凡馆内一切器具，不得任意搬动、污坏及出借。

15. 会馆办事人员一概不支薪水。

16. 外人欲参观会馆者须同人介绍。

清国留学生会馆还规定，会馆对新来留学生要派人招待，并制订了《清国留学生会馆招待规则》，其规定如下：

一 东渡留学之士，因人地生疏之故，本馆特设专门部门，代为招呼，凡致函本馆者，本馆即尽招待之义务。

一 招待之地方有二，一在横滨，一在新桥。凡由神户上岸者，本馆之干事当至新桥招呼。由横滨上岸者，本馆之干事，当在横滨招呼。其于神户、上海、天津三处一律有本馆之赞成员，代为经理。即：

神户 冯悦甫君 神户市山下町清国领事馆

神户 孙实甫君 神户海岸仲通清商盛源号

上海 王培孙君 上海大东门内育材学堂

天津 张亦湘君 天津玉皇阁前日日新闻社

一 各省之东渡留学者，固可至本馆赞成员所在之处

就询，并购买船票。一切情形，可于动身前七日先行致函本馆，以便于该日前往招呼。

- 一 取天津航路至神户登岸者，船抵长崎后，发函致冯君或孙君。言明乘坐何船，何日何时可至神户也。至时，二君代为照料，于神户易车之后，可托二君代为电知本馆（电费约二~三角）并车于何时抵京，本馆干事即至新桥招呼。
- 一 取长崎航路至横滨登岸者，可由长崎或马关致函本馆，谓船于何日何时至横滨也。届时，本馆干事即至横滨招呼。
- 一 东渡之士，行李物件，极力以少带为便。其烟、酒、绸缎各项入港时应课税者，决不可携带，以免多生枝节。
- 一 到京之后，或入预定之学校寄宿，或暂寓旅馆，一律听本人自便。
- 一 本馆招待干事之一切费用，一律由本馆公款供给，至其本人之一切费用，则由本人自理。
- 一 本馆各处之招待人员，若有更动，当随时登报申明。

清国留学生会馆是在原有的留日学生同乡会、恩亲会和校友会基础上自发组创的全体留日学生的会馆，既经成立，它立刻成了留日学生活动的大本营，交流、会友、联谊在这里，开会、演讲、出版等活动在这里，可谓是功能齐全、利用率高。

译书汇编社等留学生团体，《江苏》、《湖北学生界》等杂

志，先后设址于清国留学生会馆。遇有涉及全体留学生的活动时，这里更成了活动的中心。如1905年11月开始的反对取缔规则斗争期间，留学生便以此地为大本营，在此的活动先后有：11月21日开会商讨；21日至28日先后协商决定上书公使；12月3日召集紧急会议协商是否罢课；5日成立各校联合会；6日，各校联合会代表同总会干事研究运动发展方向，有人提议全体归国……

约1907年前后，因中华青年会馆活动的冲击，清国留学生会馆由盛转衰，渐渐失去了留日学生大本营的地位。

总之，清末的中国留日学生，通过种种自治管理的办法，为自身的学习与生活创造了诸多的方便条件，同时也推动了留日运动的向前发展。

3. 陆军士官学校里的中国学生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中国留日运动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学生去日本学习陆军，基本都是进的这所学校，在其他军事学校毕业的，则人数寥寥。该校共招收中国学生31期，毕业生1627人，其中在中国20世纪以来的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如蒋介石、阎锡山、李烈钧、蔡锷、张群、何应钦等人，都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

中国留学生想入士官学校，较之普通的赴日留学，要难得多。因为留日运动开始后不久，清政府就制定政策，严格控制学军事的留学生：“保送学生入日本各学堂，除农工商各项实业学堂及文科医科各专门不限人数外，其政治法律武备三门，宜分别限定名数，每年只准保送若干名。武备一门，非官派学

生不准保送。”^①

入陆军士官学校，必须要经以下几个阶段：（一）预备教育。在成城学校，以后又加振武学校。（二）正式教育。预备教育结业后，进入联队试习，叫入伍生，又叫士官候补生，接受下等兵至下士的训练，为期半年至一年。（三）后期教育。候补期结束后，以下士资格进入士官学校，学习士官课程，为期一年或一年以上。（四）士官见习。士官生毕业后依志愿再入联队试习，为期三个月至半年，期满后以少尉任用。

清政府限制入士官学校首先从成城学校开始，不仅自费生不准入成城，即使进入的官费生，如发现有不端行为，也处心积虑地想法惩治。陶成章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1902年，陶成章“赴日本，入清华学校，继入成城学校。时留学生监督汪大燮，知先生（陶成章）系革命实行家，畏先生学陆军，多方阻难之。适清吏陶大钧、那桐、载振等往大阪，观博览会，游历东京。大燮与陶大钧密商，诈称予以兵柄，先生急于进取，遂拟归国，与大燮约曰：‘章之归也，系向学校请假，并非退学。’汪唯唯。及抵北京，大钧畀以他事，先生不就，拂袖而出。至天津，遇某君，假十余金，始得南下。”迨至东京，汪大燮已先让成城学校开除了他的学籍。陶成章为此几次找汪大燮理论，汪都避而不见^②。

陆军士官学校是所教授初级军事知识的学校，分有步兵

^①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86页。

^②汤志钧：《陶成章年谱》（初稿），载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471页。

科、骑兵科、炮兵科、工兵科、辎重科、野炮科、野战重炮科和山炮科，中国学生以学步兵科者为多。其详情可见下表：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分科统计表^①

人 期 数	兵 数	科								合 计
		步	骑	炮	工	辎重	野炮	野战 重炮	山炮	
1		23	4	9	5					41
2		16	2	4	3					25
3		36	12	28	16	4				96
4		37	14	20	9	3				83
5		23	8	11	12	4				58
6		115	24	41	17	8				205
7		28	10	12	5					55
8		28	10	12	5					55
9		30	7	1	1					39
10		13	18	1	3					35
11		6	3	6	2	2				19
12		8	4	4	2	2				20
13		5	2	7	2	2				18
14		4	3	7	3	2				19
15		7	3	7	5					22

^①沈云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民国留学生名簿》统计。

续表

人 期 数	兵 数	科	步	骑	炮	工	辎重	野炮	野战 重炮	山炮	合计
16			2								2
17			2		1	1					4
18			21	2		1					24
19			36	6	24	11	2				79
20			78	17	42	16					153
21			39	8	2	8		39	6		102
22			67	12		15		24	10	4	132
23			47	9				26		5	87
24			34	10		17		23		6	90
25			16					8			24
26			8					10			18
27			14					11			25
28			16					11			27
29			13					11			24
31			36	10							46
合计			808	198	239	159	29	163	16	15	1627

蒋介石是陆军士官学校的候补生，下联队见习的生活，他亲身体会过。

1906年，蒋介石“只身到日本去，原想在日本进军事学

校学习军事”，“在日本住了半年”，没能入学，“只好回国，进保定军官学校肄业。当年年底，因为成绩优良，就被选送到日本留学，第二年春东渡，到日本学习军事的目的终于达到了。”^①

同蒋介石一起赴日的张群回忆当时东渡的情形时说：“留日考试合格的学生，好像有六十人左右。能够畅通日本话的人，由保定起程直接前往日本；我们虽然（包括蒋在内）能够懂得日文，但因为说得不好，暂且先到东北的陆军部集合，然后由大连乘船前往神户，换乘火车到达东京。”^②

到日本后，蒋介石成了振武学校的第11期学生。在振武学校学习3年，1910年毕业，之后被分配在驻新潟县高田市野炮兵第13师团第19联队见习，同时也成了士官候补生。后来他自己说：“我在二十四岁，就派到日本野炮兵联队，入伍一年。这一年中间，所过的完全是士兵生活。”^③

关于这一阶段的生活，有史料记载：“五名中国留学军官被派到第十九联队”，“这五名中国留学生，都是很优秀的，他们对于大炮的构造和它的附属品，都有详细的研究。”“不过叫他（蒋介石）和普通的兵一样，派去扫马房的时候，他的面上立刻就现出一种悲愤的神色。然后因为军队里的军纪关系，一切都是遵照长官的命令，自然也就服从了。”他“平时很少说

^①潘公展：《蒋主席》，转引自李敖：《蒋介石研究》，华文出版社1988年，第11页。

^②杨树标：《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1989年，第9页。

^③杨树标：《蒋介石传》，1989年，第10页。

话，没有甚么可以引人注意的事情。”^①这个时候的蒋介石，具有一定的民族意识，他曾写过一首诗：“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也就在留日期间，蒋介石由1906年赴日留学的陈其美介绍认识了孙中山。陈其美对蒋介石“一见如故，即与订交，介绍入同盟会”。^②后来蒋介石一度追随陈其美参加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1911年夏，蒋介石请假归国，密谋起事，假期将尽的时候返回日本。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后，又“应陈英士先生电邀，回国参加革命”，^③结束了第一次留学日本的生活。此次离日前，他只被获准48个小时的假，于是，与张群一同经过化装后秘密离开日本。归国后，在陈其美领导下参加了反清起义活动。

入士官学校的，还有后来成为军事理论家的蒋百里。在士官学校期间，他以学习优秀著称。

蒋百里留日后，先入成城学校，“进士官的那一年，实际上是一九〇四年士官的第三期，即因日俄战争停办后士官校重开之年。士官的中国早期生多由士兵中挑选而来，第一期有哈汉章、第二期有蒋雁行、王廷祯等。直到第三期才有文学生投入，其知名人士除百里与蔡锷两人而外，尚有李烈钧、张澜、许崇智、蒋尊簋等。蔡与百里、张孝准三人有‘中国三杰’之称。张孝准也是湖南人（字润农，长沙人），后来曾一度出任湖南都督府军事厅厅长，不久又出长湘省樞政，中年死于脑溢

^①杨树标：《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1989年，第10页。

^②杨树标：《蒋介石传》，第23页。

^③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转引自李敖：《蒋介石研究》，第17页。

血症，而其名不彰。百里与伯器（蒋尊簋字）同为浙江人，一个学步兵，一个学骑兵，章太炎誉之为‘浙之二蒋，倾国倾城’，不知者以为难兄难弟，却是同姓不宗。”

“一九〇五年（乙巳年，光绪三十一年），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毕业。根据日本军部规定，上官榜首由天皇亲自赐刀，日本人引以为荣。此次为中国留学生所得，他们又不免耿耿于怀。所以，从第四期起，步兵科中日学生分开授课，以防中国学生再度夺得锦标。“百里虽是步兵科第一，但对骑术也很有研究，在全校中有‘善骑者’之称。他对骑术有一套经验之谈，要做到‘马上无人，胯下无马，人与马浑然一体，才可以与言骑’。他又风趣地指出步骑兵苦乐不同之点：‘我们步兵以行军为最苦，除攀山越岭而外，身上还得系着粮袋、水瓶和弹药，可是到了宿营地，我们卸下了仔肩，就可以轻松愉快了。反之，骑兵行军时可以驰骋自如，而到驿站后却要伺候马，替它擦汗、喂草料，忙个不停。’”^①

同蒋百里同时入士官学校的，还有后来与他形影不离的蔡锷。他二人“是中国留日学生进入日本士官学校最早的一批人中的佼佼者。”“他俩入校不久，就都以优异成绩崭露头角。”^②他们不仅学习刻苦，而且还潜心求索，发表了不少极有创见的军事论文，其中蔡锷写的《军国民篇》和蒋百里写的《军国民之教育》，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连载后，日本学者下河边半五郎还将其结集出版，并且连续再版7次，在中国留日

^①陶菊隐：《蒋百里传》，第9—10页。

^②任光椿：《将军行——蔡锷传》，第41页。

学生中和在日本军界都产生了很大反响。

在士官学校期间，蔡锷、蒋百里以及黄兴等其他湖南籍留学生，认为要振兴中华，必须从开发民智入手，而译书普及，正是开发民智的重要措施。于是他们决定成立湖南编译社，向国内介绍西方现代思想学说、政经理论、管理经验和科技成果。

为筹集创办湖南编译社的款项，蔡锷专门写了一篇《致湖南士绅书》，并特意回到国内，走遍湖南的长沙、湘潭、常德等地，向各地士绅散发《致湖南士绅书》，为湖南编译社的成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4. 为反清革命而奔走

孙中山先生，是鸦片战争后半个或多个世纪里，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是伟大的辛亥革命的卓越领袖。

跟随孙中山一同进行民主革命的，就包括留日学生中的很大一个群体。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壮举，一座彪炳千秋的丰碑。在以往漫长的时代里，多少次农民斗争揭竿而起，多少位农民英雄饮恨而亡，可是都没有改变过封建社会的形态，都没有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的革命。只有辛亥革命，才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民主革命，“从此以后，任何人想复辟君主专制制度，想穿龙袍、当皇帝，没有不遭到彻

底失败的。”^①

参加辛亥革命，是留日学生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大贡献。

从1895年广州起义，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有16年之久。16年中，孙中山流亡海外，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日本度过，曾流亡日本12次。这期间，一大批思想先进的留日学生，紧紧地追随在孙中山以及其他革命者周围，废弃学业，奔走革命，抑或是毕业以后，投身于革命。留日学生在辛亥革命前的反清活动大致可以分述如下：

第一，留日学生在日本建立革命政团。

从1900年开始，留日学生中相继产生了具有不同程度革命倾向的政团。如：1900年，曹汝霖、章宗祥、吴禄贞、傅慈祥、戢翼鞞、沈云翔等人建立了励志会；1901年，王宠惠等人发起成立广东独立协会；1902年，叶澜、汪荣宝、秦毓鎏、张继等人成立青年会；1904年产生的更多，如秋瑾等人成立共爱会，仇鳌等人组织新华会，程潜和唐继尧等人组织革命同志会等等。

孙中山曾说：“兄弟从前提倡革命的时候，一般学生诸君，大半热心赞助革命，究竟革命事业能成功不能成功，那时非所料及的。彼时学生诸君，前途绝无希望。国家前途，甚为危险。未光复之先，我辈均受制于专制政府之下，非我族类，横暴不堪。处处极端压制，民权不克申张，俯首帖耳，任人摧残，刀俎听命，鱼肉听命……所以大家志士，都不惜牺牲性

^①李新：《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上），中华书局1981年，第5页。

命，以求急切之改革，而还我自由之幸福。”^①

1905年之前，留日学生中产生了一批又一批具有革命倾向的政团，出现了各种政团林立的局面。其中既有如东京青年会和军国民教育会那样旗帜鲜明、宗旨坚定者，又有立足独立、两派均容者，如广东独立协会。

东京青年会“明白揭示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其“以早稻田大学学生为多，是为日本留学界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② 广东独立协会，其主张不仅为孙中山所积极支持，也不与梁启超一派的组织相冲突。

这一时期的留学生革命社团，还出现了内部分化，难以发展的趋向。如：成立于1900年的励志会，由于各种原因，内部相继发生分化，先是分化出激进派与稳健派，激进派又在革命和保皇中间进行抉择。

1905年同盟会成立，标志留日学生的各种革命政团走向了实现联合、统一活动的阶段。

1905年，孙中山结束一年半的美欧之行再返日本，要组织一个新的联合的革命团体。他首先取得了黄兴的支持。

黄兴1902年留学日本，官费入宏文学院师范科。留日期间，他积极创办杂志，热心社会活动，富有组织才能，成了留学生中的一名领袖人物。1903年毕业回国后，参加和组织了一系列革命活动，特别是1904年创立了华兴会。长沙起义失

^①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21—22页。

^②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02页。

败后，他再度流亡日本。

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和黄兴分头邀请各省倾向革命的留学生，在东京召开了同盟会筹备会。与会者除孙中山、黄兴外，有陈天华、张继、程家桢、冯自由、胡毅生、吴春阳、宋教仁、田桐、黎勇锡、朱少穆、马君武、邓家彦、但焘、时功玖、何天炯、康宝忠、刘道一、蒋尊簋、朱执信、古应芬、李仲揆（四光）等70余人，大部分是在校的留学生。

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成立之初，同盟会的实际主持人大都是留日学生，如庶务科有黄兴、刘揆一、孙毓筠、张继，书记科有胡汉民、马君武、但焘，外务科有廖仲恺、程家桢，评议员有朱执信、田桐、曹亚伯、董修武、胡瑛、吴玉章、冯自由、秋瑾等。

第二，留日学生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

留日学生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一个重要方面是长期坚持反清革命宣传。

他们通过办报刊、著书和演说进行革命宣传。

在辛亥革命前的10余年里，留日学生出版了大量革命书籍，流传广泛，影响巨大，其中尤以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最著名。邹容生于1885年，四川巴县人，1902年9月赴日，就读于东京同文书院。1903年2月，刘成禺等借新年团拜发表排满演说，邹容起而响应。不久，因愤于一个清朝官员的丑行，他与同学一起去强行剪了此人的辫子，被迫回国，与章炳麟、章士钊、张继结为兄弟。《革命军》是邹容在日本时写成的书，回沪后重加增润，由章炳麟作序，于1903年5月间出版。在自序中，邹容自称为

“革命军马前卒”。这本书大声疾呼革命，要求推翻集专制、卖国与种族压迫为一体的清政府，受到社会上的热烈欢迎。孙中山称誉它“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端方说：“此书逆乱，从古所无，竟敢谤及列祖列宗，且敢直书庙讳，劝动天下造反，皆非臣子所忍闻。”^① 陈天华生于1875年，湖南新化人。他于1903年3月，留学日本，先后入东京宏文学院、法政大学。1903年夏至1904年初，他先后写成了《猛回头》、《警世钟》两书。这两本书反帝爱国思想的强烈程度超过了当时的同类作品。为了阻止《警世钟》的流传，清朝上海当局在1904年制造了“《警世钟》案”，但清朝当局的禁止，反倒促使此书更加广泛地风行起来。

在辛亥革命前的10余年里，留日学生还利用各种机会发表演说，充分运用这种方式进行革命宣传。在演说上不能不提及著名女革命家、女英雄和才华閃煜的女诗人秋瑾。她在同盟会成立前后两次旅居日本。1904年，她不顾丈夫阻挠，自筹学费，毅然东渡。据《秋瑾年谱》载，同年“秋瑾又与留日同志组织‘演说练习会’。订《演说练习会简章》十三条。每月开会演说一次。秋瑾著文称赞演说的五大好处：（一）‘随便什么地方，都要随时演说’；（二）‘不要钱，听的人必多’；（三）‘人人都能听得懂，虽是不识字的妇女、小孩子，都可听的’；（四）‘只须三寸不烂的舌头，又不要兴师动众，捐什么钱’；（五）‘天下的事情，都可以晓得’。并进而指出：‘唤醒国民开

^①《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二），第446页。

化知识，就可以算得这个演说会开端的了。’秋瑾有口才，善演说，吴芝瑛《记秋女侠遗事》云：‘生平豪纵尚气，有口辩，每稠坐论议风发，不可一世。’徐自华《鉴湖女侠秋君墓表》云：‘丰貌英美，娴于辞令；高谭雄辩，惊其座人。’陈去病《鉴湖女侠秋瑾传》云：‘君亦负奇磊落，往会必抠衣登坛，多所陈说。其词淋漓悲壮，荡人心魂，与闻之者，鲜不感动愧郝而继之以泣也。’8月13日（9月22日），东京中国留学生举行‘戊戌六君子’殉难纪念会，瑾到会演说，词意沉痛，闻者泣下。”^①

留日学生在日本进行的反清革命活动，还包括从事实际行动。

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批加盟者，有400余人，他们绝大多数是留日学生。国内所发生的反清起义，多有同盟会的支持、参加。如1906年12月间，“萍醴起义消息传到东京，同盟会员纷纷要求回国参加战斗，孙中山和黄兴立刻派一些会员分赴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策应起义。”^②

第三，留日学生回国发动革命斗争。

其一，回国进行宣传活动。

宣传活动是革命行动的前声，留日学生从未放弃过回国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他们在国内相继创办了一批报刊，如：1903年陈撷芬编辑《女苏报》，1910年宋教仁编辑《民立报》，1911年田桐编辑《国光新闻》；1902年秦力山等办《大陆报》，1903年陈撷芬办《女学报》，1906年秋瑾办《中国女报》等等。

^①郭延礼：《秋瑾年谱》，齐鲁书社1983年，第45页。

^②《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第84页。

其二，回国组织革命活动。

1903年末到1904年初，国内出现了一批反清革命小团体，分布于各省重要城市，进行公开或秘密活动，它们大都与归国的留日学生有一定联系。如西湖地区的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主要是由留日归国人员建立起来的。1903年黄兴留日回国后抵长沙，在明德学堂主持第一期速成师范班，同时又协助留日归国的胡元倓创办经正学堂。他借教书为掩护，白天在学堂授课，晚间策划革命。1903年11月4日，黄兴以过30岁生日为名，邀人集会商议筹设革命团体。次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到会者有黄兴、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秦毓蓁、胡瑛、张继等，他们都是留日生，其会员也多是留日学生。

江浙地区的革命团体光复会，也是由留日学生回国组织起来的。1903年10月和11月，在东京的一批江浙籍留学生两次集会，密议建立新的革命团体，决定派陶成章、魏兰往浙江、安徽，龚宝铨往上海，沈懋民往湖南，进行联络和组织工作，其中，陶成章贡献最大。次年10月，光复会在上海正式成立。秋瑾先参加同盟会，归国后也加入了光复会。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除东京本部外，在国内设置了东（上海）、西（重庆）、南（香港）、北（烟台）、中（汉口）五个支部以及隶属于各支部的各省分会。在本部加盟的留学生按省区组织分会，管理本省留学生入会主盟事务，并负责派遣人员归国组织本省同盟会。同盟会在各地的主盟人主要由留日生担任。如香港的李自重、冯自由，天津的廖仲恺，南洋的胡汉民，广东的胡毅生，福建的林时爽，河南的朱炳麟，贵州的平刚，云南的吕天民，四川的黄复生，湖南的宋教仁，湖北的时功玖，浙江的秋瑾，江

苏的邹鲁，安徽的吴春阳，山东的徐镜心，直隶的张继等等。再有，宋教仁曾于1907年赴辽东创设同盟会辽东支部，井勿幕在陕西建同盟堂，陈动云回河北建同盟会支部。

另外，留日学生建立了在日本的军国民教育会，也向各省派“运动员”，这些人到浙江、上海、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广泛“运动”，筹建革命组织。留日学生吴祿贞返国后帮助刘静庵扩大日知会，武昌的许多革命小团体皆以留日生为骨干。共进会在1907年于日本东京成立后就派人回各省发展组织，留日生焦达峰在湖南，刘仲文、孙武在湖北，邓文辉在江西，张伯祥在四川都取得了很大进展。

其三，回国进行暗杀活动。

在辛亥革命前的长期革命斗争中，不时出现暗杀活动。特别是1907年以后，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更加频繁起来。这种斗争手段的时兴，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一些中国留学生和流亡者接受了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以暗杀为主要斗争手段。二是在长期的、艰苦的革命斗争中，由于不断遭受挫折和失败，有些人丧失了信心，醉心于一拼了事。这种暗杀之风曾在旅居日本的革命党人中间盛行一时。在东京成立的军国民教育会，不仅把暗杀列为主要的革命方法之一，还派人到国内组织暗杀团。光复会、华兴会的重要领导人都曾参与其事。同盟会成立后，也设立了专门的暗杀团体，聘流亡在日本的俄国“虚无党”人为教授，黄兴、秋瑾、黄树中、汪精卫等均曾加入学习。有留日学生参加的暗杀活动主要有刘思复炸李准、汪精卫等炸载沣事件，以及黄兴组织的李沛基炸风山事件。总的看，暗杀活动是十分危险的，虽然有些人在这一事业中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大无

畏精神，并且也曾铲除掉统治阶级中的个别人物，但是，不可能推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有时这些个人恐怖活动还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失，造成不良影响。

其四，回国举行起义活动。

辛亥革命前 10 余年，国内发生一系列起义中，归国的留日学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不少起义还是由他们直接策动的。

留学生回国参加起义，先从自立军开始。同盟会成立后，较大规模的起义有 10 多次，留日学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06 年 12 月，萍醴起义，孙中山、黄兴派胡瑛、孙毓筠回国策应，起义失败后，不少回国留日学生被捕遇害或被判监。

1907 年 2 月 19 日，黄冈起义，廖仲恺等人受命归国，并计划派人运送军械。

1907 年 12 月 2 日，镇南关起义，黄兴、胡汉民等随孙中山赴前线指挥作战。

1908 年 3 月，钦州马笃山起义，黄兴自任总司令。

1908 年 4 月，河口起义，云南留日学生声援，计划入滇援助义军，途中知悉失败而折转。

1911 年 4 月，黄兴根据孙中山指示亲自发动了黄花冈起义。在这次起义中牺牲的 72 名烈士中，有 8 名是留日学生，他们是：日本大学学生林时燠，日本千叶医学学生方声洞，日本庆应大学学生林觉民，日本千叶医学学生喻培伦，日本警监学校学生石德宽，日本陆军士官生林尹民，日本早稻田学生陈与燊，日本正则学校学生陈可钧^①。

^① 参见《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辛亥革命》丛刊第 4 册，第 248—249 页。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一举成功，敲响了埋葬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丧钟。在这场革命风暴中，留日学生发挥了多方面作用，突出地表现为以下几点：其一是，在武昌首义的准备和酝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1908年冬，由日本归国的共进会领导人之一孙武抵武汉，组织湖北共进会。1911年9月24日，共进会、文学社召开联合大会商量首义计划，确定10月6日（中秋节）为起义日期，推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尽管此后意外事件接踵发生，但起义的枪声仍在10月10日打响。其二是，长期以来担任中国南部各地起义组织者的黄兴，这次又发挥了重要作用。武昌起义爆发同月24日，黄兴到达上海，次日和宋教仁、刘揆一、徐宗汉等改装乘轮西上。28日到达武昌后毅然应承了指挥汉口军事的重任，当战时总司令。黄兴到汉口的消息一传开，给正在苦战中的革命军以很大鼓舞，士气为之大振。其三是，在武昌首义过程中，有些留日学生献出了宝贵生命。其四是，武昌首义后各省起义和独立运动中，新军中的留日学生发挥了重要作用。士官学校学生归国后，各省抚争相延揽，授予要职，新军中的协统、标统、管带、督办、统制等几乎都由他们担任，如湖北的吴禄贞、浙江的蒋尊簋、云南的蔡锷、福建的许崇智、上海的陈英士、安徽的王天培、江西的李烈钧、东北的蓝天蔚、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凤翔、四川的尹昌衡、直隶的张绍贞等，他们的转向对辛亥革命成功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参加云南起义的40名军内领导中，有31人是留日生，详见下表：

云南起义中旅日人员情况一览表

姓名	籍贯	留日学校	云南起义时任职	加入社团
蔡 饴	湖南	东京高等大同学校 日本士官学校	云南陆军步兵第三十七协统领	
李根源	云南	日本士官学校	云南讲武堂监督总办、督练处参议官	同盟会
罗佩金	"	"	云南随营学堂监督，讲武堂教官，督练处参议官， 陆军小学堂总办，步兵第七十四标统带	同盟会
殷承献	"	"	云南陆军第十九镇正参谋官，参谋处总办	
韩建铎	河南	"	云南陆军第十九镇正参谋官，教练处总办，炮队 第十九标统带	
谢汝翼	云南	"	云南讲武堂教官，炮队第十九标第三营管带	
李鸿祥	"	"	云南讲武堂教官，教练处提调，步兵第七十三标 教练官，步兵第七十三标第三营管带	
唐继尧	"	"	云南讲武堂教官，讲武堂监督	
张开儒	"	"	云南讲武堂教官，讲武堂提调	同盟会

续表

姓名	籍贯	留日学校	云南起义时任职	加入社团
刘存厚	四川	日本士官学校	云南教练处提调, 歩队第七十四标第二营管带	
庾恩赐	云南	"	云南讲武堂教官, 炮队第十九标教练官, 炮队第十九标第一营管带	
黄毓成	"	"	云南讲武堂教官, 马队第十九标教练官	
刘祖武	"	"	云南讲武堂教官	
顾品珍	"	"	"	
张子贞	"	"	"	
黄毓英	"	日本东斌学校	云南歩队第七十三标排长	同盟会
杜韩甫	"	"		
赵复祥	"	日本士官学校	云南临安歩队第七十五标教练官	
曲同丰	山东	"	云南歩队第七十四标统带, 大理歩队第三十八协统领	
杨振鸿	云南	日本振武学校陆军测量部	云南体操专修学堂监督, 腾越巡防军统带	

续表

姓名	籍贯	留日学校	云南起义时任职	加入社团
王养石	四川	日本东斌学校		同盟会
刘九畴	云南	日本明治大学	云南杂志发行业员，经营革命，呕血死	"
李烈钧	江西	日本士官学校	云南讲武堂教官，兵备处提调，陆军小学总办	"
方声涛	福建	"	云南讲武堂教官	
赵康时	湖北	"	云南讲武堂教官	"
吕志伊	云南	日本宏文学院 早稻田大学政治部		"
赵伸	云南	日本成城学校	云南杂志主干	"
席聘臣	"	日本京都大学法科	云南杂志编辑	
张耀曾	"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科	"	
姜梅龄	"	日本士官学校	"	
沈汪度	湖南	"	云南讲武堂教官，讲武堂监督	

资料来源：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六集，第222页。

第 三 节

蜂拥问世的留学生杂志

1. 同盟会成立前后的留学生杂志

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大批选派学生留日不久，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就开始了创办中文期刊的活动。从留学生创办的《开智录》、《译书汇编》等最早的期刊开始，在以后的数年间，留学生所办的期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有的书称清末中国人在日本创办的中文报刊为62种^①，有的书称清末留学生在日本编辑出版的中文刊物有60种^②、50种^③、43种^④。据我们统计，从1898年至辛亥革命，中国人在日本办的期刊共有87种。详情见下页表。

①实藤惠秀著，谭汝谦 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346—348页。

②董守义：《清代留学运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3—308页。

③汪向荣：《中国的近代化与日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6—70页。

④李喜所：《辛亥革命前的留日学生运动》，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第623—624页。

清末日本华文报刊一览表^①

刊名	期	编辑人	刊址	创刊时间	备注
清议报	十日	梁启超	东京	1898.11	立宪派刊物
开智录	半月	冯自由、郑贯公	横滨	1900	宣传自由平等
译书汇编	月	戢翼攀、杨廷栋、 杨荫杭、雷奋	横滨	1900.12	译欧美政法名著
国民报	月	戢翼攀、秦力山、 王宠惠、沈翔云	东京	1901.5	最早的革命刊物
新民丛报	半月	梁启超、韩文举、 冯紫珊	横滨	1902.2	宣传立宪
新小说	月	梁启超、罗孝高、 赵毓林	横滨	1902.10	宣传反抗异族压迫
游学译编	月	杨笃生、陈天华、 梁焕彝、黄兴	东京	1902.10	以翻译为主
湖北学生界	月	刘成禺、李书城、 王璟芳、尹援一	东京	1903.1	后易名为《汉声》
直说	月	直隶留学生	东京	1903.2	
浙江潮	月	蒋智由、蒋方震、 孙翼中、马君武	东京	1903.2	革命
江苏	月	秦毓蓁、张肇桐、 江荣宝、陈幌	东京	1903.4	革命

^①董守义：《清代留学运动史》；实藤惠秀著，谭汝康、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1—5集，人民出版社；方积根、胡文英：《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新华出版社1989年。

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

续表

刊名	期	编辑人	刊址	创刊时间	备注
政法学报	月	胡英敏	东京	1903.4	介绍西方法律
汉声		刘成禺、李书城、 王璟芳、尹援一	东京	1903.6	出三期
旧学		刘成禺、李书城、 王璟芳、尹援一	东京		《汉声》增刊， 时间不详，暂 列入1903年中
新白话	月		东京	1903	不详
江西白话报		张世膺	日本	1903	
日新月报		葛冈信虎、周金 史	东京	1904.7	
白话	月	秋瑾	东京	1904.8	
海外丛学录		由宗龙、刘昌明	东京	1904.8	革命
女子魂		抱真女士	东京	1904	
二十世纪 之支那	月	白逾桓、宋教仁、 田桐、蔡序东	东京	1905.6	反对日本侵略
第一晋话报	月	山西留日生同乡 会	东京	1905.7	革命
醒狮	月	李县	东京	1905.9	革命
晨钟	周	蒋衍升、丁鼎丞	东京	1905秋	
民报	月	胡汉民、章太炎、 汪精卫、陈天华	东京	1905.11	同盟会机关报
天讨		胡汉民、章太炎、 汪精卫、陈天华	东京	1906	《民报》之增刊
音乐小杂志		李叔同	东京	1906.1	
法政杂志	月	张一鹏	东京	1906.3	

续表

刊名	期	编辑人	刊址	创刊时间	备注
革命军报		旋亭	东京	1906.12	
复报	月	柳亚庐、雷铁崖、田桐	东京	1906.5	革命
新译界		范熙壬	东京	1906.10	
云南	月	张耀曾、席聘臣	东京	1906.10	反对英法侵略西南为宗旨
滇粹		张耀曾、席聘臣	东京		《云南》之增刊时间不详，暂列入1906年中
腾声	不定期	雷铁崖、董修武、李肇甫	东京	1906	
直言		直隶留学生	东京	1906	
洞庭波	月	杨笃生、陈家鼎、仇亮、宁调元	东京	1906.10	次年易名为《汉帜》
豫报	月	河南留日学生	东京	1906.11	二期后停刊
教育	月	蓝公武、冯世德、张东荪	东京	1906.11	
官报		东京留学生监督处	东京	1906.12	公报类刊物
法政交通社月报	月	孟昭常等	东京	1906.12	
农报	月		东京	1906	不详
汉帜	月	杨笃生、陈家鼎、仇亮、宁调元	东京	1907.1	

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

续表

刊名	期	编辑人	刊址	创刊时间	备注
学 报	月	何天柱、梁德龙	东京	1907.1	介绍学术
中 国 新 报	月	杨度	东京	1907.1	宣传改良主义思想
汉 风		时甦	东京	1907.2	革命
中国新女界	月	燕斌、刘青霞	东京	1907.2	宣传妇女解放
牖 报	月	李庆芳	东京	1907.3	介绍学术
大江七日报		夏重民	东京	1907.3	复汉灭清
医药学报	双月	中国医药学会	千叶	1907.4	
大 同 报	月	叔达	东京	1907.5	
天 义 报	半月	刘光汉、汪公权、何震	东京	1907.5	
远东见闻录	旬	李士锐	东京	1907.6	
秦 陇 报	月	陕西留学生	东京	1907.7	
晋 乘	不定期	景定成、景耀月、谷思慎、茶炳、茶福桐	东京	1907.9	探索救国之路
政 论	月	蒋智由	东京	1907.10	立宪派刊物
粤 西	月	卜世伟、刘崛	东京	1907.10	
二十世纪之中国女子	月	恨海女士	东京	1907	
大 江 报		夏重民、卢信	东京	1907	
政 法 学 报	月	沈其昌等	东京	1907	介绍政治、法律
河 南	月	刘积学	东京	1907.12	革命

第一篇 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的兴起和高潮

续表

刊名	期	编辑人	刊址	创刊时间	备注
晋声	月	景定成、景耀月、 谷思慎	东京	1907	
四川	月	雷铁崖、邓絮、 吴玉章	东京	1908.1	革命
学海	月	北京大学留日生	东京	1908.1	介绍学术
关陇	月	党松年、白毓庚 等	东京	1908.2	
滇话	月	刘钟华	东京	1908.4	
夏声	月	陕西留学生	东京	1908.2	《关陇》中的陕西留学生创办
武学	月	武学编译社	东京	1908.5	留日陆军生所办
教育新报	月	留日湖北教育会	东京	1908.6	
支那革命丛报			东京	1908.7	不详，革命
梅州		问津	东京	1908.11	久居日本的华侨所办
国报	月	曹澍等	东京	1908.12	
江西	月	江西留日生	东京	1908	革命
日华新报	五日	夏重民	东京	1908	
农桑杂志			日本	1908	不详
海平		海军留学生监督处	东京	1909.6	
湘路警钟		焦达峰	东京	1909.8	一期后移上海，改名《湘路危言》
宪政新志	月	吴冠英	东京	1909.9	立宪刊物

续表

刊名	期	编辑人	刊址	创刊时间	备注
学林		章绛	东京	1909	
女报		东京女报社	东京	1909.1	
中国商业研究会月报	月	中国商业研究会	东京	1910.1	
教育今语杂志		章太炎、陶成章	东京	1910.3	
铁路界		杨日新	东京	1910.7	革命
中国蚕丝业会报	双月	中国蚕丝业会事务所	东京	1910	振兴实业
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	季	李文权	东京	1910	振兴实业
浙湖工业同志会杂志		东京浙湖工业同志会	东京	1910.12	
中国青年学粹			东京	1911.2	不详
留日女学会杂志	季	唐群英	东京	1911.4	

上述杂志,《清议报》为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创办,《官报》为留学生监督处所办,《海军》为海军留学生监督处所办,《梅州》为居住在日本的华侨所办,其余的83种,基本上可以确定为是留学生创办或留学生参与办的。就是说,从清政府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至中华民国成立,留学生在日本创办的中文刊物至少有83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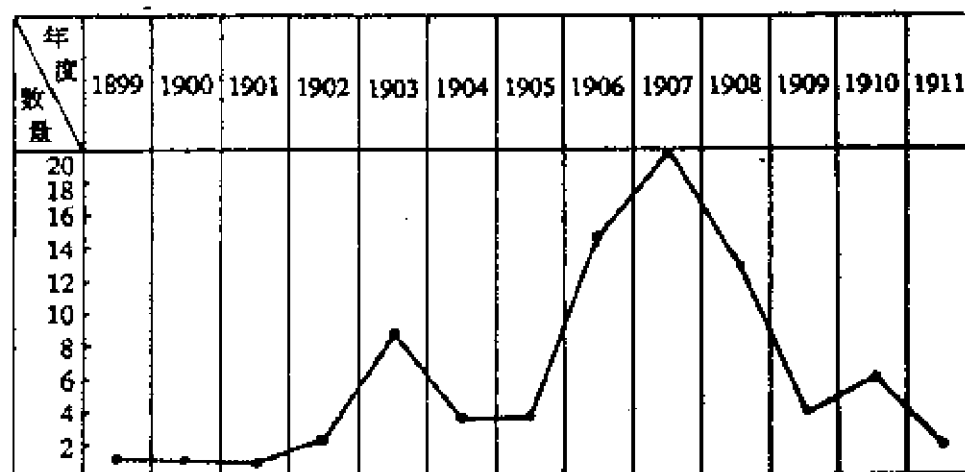
为了弄清这一时期留学生刊物的发展特点,可将历年创刊的刊物数量变动情况列成下表:

清末中国留日学生创办刊物数量统计表

年 度	刊物数	%
1899	1	1.2%
1900	1	1.2%
1901	1	1.2%
1902	3	3.6%
1903	9	10.8%
1904	4	4.8%
1905	4	4.8%
1906	15	18.1%
1907	20	24.1%
1908	13	15.7%
1909	4	4.8%
1910	6	7.2%
1911	2	2.4%
合计	83	

中国留日学生在这一时期所办刊物变化动态见下图：

清末中国留日学生创办刊物数变化图



以上图表说明，清末中国留日学生所办刊物数量在发展过程中，曾出现三次峰值，第一次峰值出现在1903年，这一年发生了拒俄运动；第二次峰值最大，出现在1907年，正是同盟会成立后大力开展革命活动的时期；第三次峰值较小，出现于1910年，是清政府垮台前夕，大量留学生归国参加革命斗争。显然，留学生所办刊物的变化与留学生的政治斗争动态有密切关系，因此说这一时期的留学生刊物大都有不同程度的革命倾向或进步倾向。

2. 丰富多彩的期刊内容

这一时期留学生刊物的发展动态，与这一时期整个留学运动的动态有直接关系。清政府大批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最初的几年人数并不多，1899年末才开始出现了留学生在日本创办刊物的先声。从1900年开始以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寻求救国之路为己任的中国青年赴日人数渐多，创办各种刊物已成为他们留学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思想激进的留学生，更是通过创办刊物向留学生及中国人民介绍先进科学，介绍新文化和新思想。1906年留日学生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刊物随之也在1907年达到了历史上最高峰，已经存在的和这一年新办的达数十种之多，成为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一个重要阵地。同样，留日学生也成为民主革命的一股重要力量，有的留学生最后成为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

这一时期留学生刊物的思想内容，呈现出以进步倾向为主，观点新颖，内容丰富的倾向。

留日学生所办的第一个刊物《开智录》具有革命倾向，这

也是留学生所办刊物的主导倾向。

《开智录》，1900年12月22日在日本横滨创刊，铅印，半月刊，1901年春停刊。冯自由记载：“己亥庚子二年（清光绪二十五、六年），留学界始发刊杂志二种，一为译书汇编，……二为开智录，粤人冯自由、郑贯一、冯斯栾等主持之；该报为旬刊，在横滨出版，专发挥自由平等之学说，于南洋各埠颇为流行。”^①

《开智录》的内容有议论，有翻译，共分八栏：本会论说、言论自由录、杂文、译书、小说、词林、时事笑潭、粤讴解心。它的主办人是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生郑贯一、冯自由、冯斯栾。郑贯一同时是《清议报》的人，便利用该报的印刷条件和发行机构刊行《开智录》，每期印5000份，因而凡有《清议报》销行的地方，就有《开智录》，它以文字浅显，立论新奇，受到广泛欢迎，“尤以南洋群岛为最”。

《开智录》先后转载了卢骚的《民约论》、大井宪太郎的《自由原论》、中川笃介的《民权真义》和《法国革命史》，宣传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思想，抨击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由于它的革命倾向越来越明显，于是保皇总会解除了郑贯一的编辑职务，《清议报》也拒绝承印《开智录》，它便被迫停刊。

留学生所创办的另一份具有初步革命思想的刊物，是1901年5月10日创刊的《国民报》，它也是早期留学生刊物中革命倾向最明显的一种。

^①《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第47页。

《国民报》创刊于东京，月刊，共出过4期，同年8月10日终刊，主编秦力山，沈翔云、戢翼翬为主要支持者，每期印逾2000份。自立军起义失败后，秦力山与康有为、梁启超绝交，转而投身革命阵营，在孙中山资助下出版了《国民报》。

《国民报》辟有社说、时论、丛谈、纪事、外论、译编、答问、来文等8个专栏，刊有《论汉种》、《中国灭亡论》、《亡国篇》、《正仇满论》、《二十世纪之中国》等文章，攻击了封建制度和清朝政府；转载了杰斐逊起草的《美国独立檄文》，宣传了资产阶级天赋人权思想，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做了思想准备。

留学生最关心的怎样拯救中国于危难之中问题，在众多的刊物中都有所表现。1904年由云南留学生由宗龙等人创办的《海外丛学录》，提出要发展教育，提倡地方自治，尚武治兵，注重学习外交学、国际法常识、实用科学，以振兴中华。1905年7月创刊的《第一晋话报》，根据他们当时的认识，提出了救国图存的方案：1. 实行兵民合一，提倡尚武精神，增强国民素质。2. 强调发展实业，提倡实力相争主义。提出要自创铁路，自办开矿，并提出了这些活动的具体办法。3. 发展教育，指出：“一国中所最要紧的是政治和教育两件事。政治为国家的机关，教育为人民的根本。”这两件事不能偏轻偏重，这是世界的公理。《晋乘》提出，在经济方面，要振兴实业，使国家富强，以利于抵抗列强侵略；在政治方面，认为国家的强盛取决于国民的民族自觉心和竞争力；在文化方面，提出了“发扬国粹”的主张。他们的这一系列理论和主张，虽不免还带有幼稚或偏激的因素，但其中不失为充满激情的爱国主义思

想，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传播做了重要探索。

留学生创办的某些刊物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第一个刊物《开智录》提出过帝国主义的概念。《国民报》和1903年创办的《新白话》，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宣传。1903年创办的《江苏》杂志，以反清作为其办刊的宗旨。1906年创办的《鹃声》，反对在中国进行改良，主张进行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运动。这种反对满清统治的思想，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做了重要的准备。

80余种留学生办的刊物，由于人员复杂，政治态度也有所区别。《国民报》明确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的封建统治，对封建文化却态度暧昧，没有认识到封建文化对民主革命的危害。1902年创刊的《游学译编》，宣传了民主革命思想，同时也发表过改良主义的文章。1906年创刊的《豫报》，主张不推翻清朝的统治，只提倡实行部分的改良。另外，还有《宪政新志》那样的由右翼学生团体所办的刊物。

《宪政新志》是咨议局事务调查会1909年9月在东京创办的刊物，月刊，编辑及发行人为吴冠英。咨议局事务调查会是一右翼留日学生团体，1909年6月在东京成立，设调查、编纂、书记、庶务四科，与清朝统治者关系密切，其成立得到清驻日钦使胡惟德和驻日考察宪政大臣李家驹赞同，载振等清政府要员为名誉赞成员，并得到他们的经济资助。

《宪政新志》的论著栏主要论述中国应怎样建立咨议局、国会；译述栏侧重介绍国外有关立宪理论及外人对于中国立宪的意见；调查栏介绍外国政治、财经、教育等情况；记载栏刊载各省咨议局议案大纲和各省有关立宪活动情况；时评栏有批

驳顽固派反对立宪的文章；文苑发表诗歌。它基本上是为清朝主张立宪的亲贵服务。

留学生所办的刊物，最多的是发表政治方面的文章，在其他方面也发表过很多文章。1905年6月由湖南留日学生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对西方各种学说都有所介绍，除理科、实业之外，还有政法、军事、哲学等。大部分杂志，还设有文学栏，发表大量翻译和创作的文学作品，如《江苏》、《新白话》、《浙江潮》等。在留学生办的刊物中，还有一些涉及各个方面的专门性刊物，主要有：

《新小说》，是中国近代第一种有影响的文学杂志。它对中国古代小说既有继承又有所革新与发扬，思想与创作都比较自由，影响了《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晚清文艺刊物，促进了小说创作繁荣局面的出现。

《政法学报》，1903年4月由《译书汇编》改成，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宣传资产阶级法学思想的刊物。它宣传法制思想，批判君主专制；介绍国际公法，主张外交救国；揭露沙俄侵华，激扬民主正气；重视启蒙宣传，提倡新的道德。

《游学译编》与《新译界》，以翻译为主，设有学术、教育、军事、理财、时事、历史、地理、外论和国际大事、风俗习尚等栏目。

《新白话》杂志，在登载文学作品、介绍科学知识的同时，提倡白话文的运用。它的创刊早于中国现代第一篇短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5年。

《教育》杂志，是教育专业杂志，也是中国较早的教育专业杂志之一。

《武学》，是专门鼓吹尚武精神、研究兵科学问、详议征兵办法、补助军事教育、讨论各国军备、振兴陆军计划的杂志，由学陆军的留学生主办。

《中国新女界杂志》，是宣传妇女解放、主张男女平等的杂志。

《铁路界》，由中国留日铁路专业学生主办，以“研究铁路制度，讨论铁路学术，发展铁路知识，指陈铁路利弊为宗旨。”

清末留学生刊物在日本蜂拥出现，与旅居日本的中国革命派和其他人士在政治上关心、经济上支持分不开。孙中山曾向《国民报》捐赠过1000元印刷费，向《开智录》捐赠过200元印刷费。《直说》的经费主要是向同人筹集，捐款多达100元的是天津人严修。捐助《云南》杂志的，有越、缅华侨和滇籍官吏、商人、留学生等各界爱国人士，杂志社也是在孙中山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孙中山还在《江苏》上登载过《支那保全分割合论》等稿件。在孙中山关怀下成立的杂志还有《河南》。鲁迅留日时在《河南》登载过《摩罗诗力说》等5篇论文和1篇译述。

3. 刊行期数少，发行范围广

清末，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创办杂志数量多，但普遍刊行期数少。这些杂志，都是留学生同人所办，留学生每人留日时间都不很长，再加上清末又处于中国社会风云激荡的时期，留学生创办杂志，都是为眼前的现实服务，这些都决定了留学生所创办的期刊不可能维系很久。但是，很多杂志停刊，又有其各自的原因，其情况主要有：

第一，被日本政府查封。如《湘路警钟》等。

《湘路警钟》是由湖南留日学生组织的留东湖南铁道研究社和留东湖南同乡会铁道部编辑，焦达峰等主编，1909年8月发行。1909年，湖南留日学生掀起了反对“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的斗争，《湘路警钟》以一半的篇幅发表了铸铁的《湘路纪事》，按年月日叙述，并加按语评论，措词激烈，揭露深刻，反对出卖筑路权。《湘路警钟》出版第一期后因日本政府干涉而改名《湘路危言》，移至上海发行。

第二，清政府勾结日本政府查封。如《四川》、《河南》等。

《四川》杂志是以四川全体留日学生名义在东京创办的，1907年底成立，次年初发刊。它一出刊，立刻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第一、二号出版后10余天，又再版发行，各售出4000份。第三号，售出了5000份。

《四川》杂志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爱国反封建，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的思想，鲜明地提出了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主张，因而招致了清政府的迫害。

《四川》刊出第三号后，因经费困难及编选人员毕业归国，至秋初才将四、五号付印。后又因日本印刷所拖延，迟迟未能印出。这时，杂志的编辑兼发行人吴玉章请假期限已过，不得不回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就读，遂将杂志交与四川留日同乡会会长、同盟会员廖希贤接办。

1908年秋，唐绍仪访美经日本，秉承清政府的旨意，要求日本政府查禁《民报》和《四川》。日本警署将廖希贤召去，询问三期以后何以久不继刊，又说，如要再出，必须另具文

件，申请许可。同时，警视厅派人去杂志社，宣布查禁文件，将社内余下的杂志抄没。日本当局指控他们：鼓吹革命；激扬暗杀；煽动日本殖民地反对帝国；反对天皇。又叫廖希贤出庭受审，廖不愿去，最后吴玉章出庭受审。法庭判决查禁杂志，科罚金 100 元，处编辑兼发行人吴玉章有期徒刑半年。又说姑念该人正在求学，准予缓期执行。这样，《四川》杂志仅出 3 期就被扼杀了。

《河南》创刊于 1907 年 12 月，是同盟会河南分会的机关刊物，是革命党人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宣传的一个重要阵地，也是在孙中山的直接关怀下成立的。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认为河南地理位置重要，革命党人力量薄弱，因而极为关切。1906 年，孙中山特派河南留日学生中最早的同盟会会员曾昭文和张继、邹鲁去码头迎候河南首次派赴日本学陆军的 50 名武备学堂学生，后又接见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同年 11 月，河南留日学生集资发刊《豫报》，因主持人成分复杂，常发表不利于革命的文章。同盟会河南分会遂派曾昭文、朱炳麟、刘积学调查，以资金不足为由停办了《豫报》，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河南》。

刘积学为《河南》总编辑，张钟端为发行人。该刊态度鲜明，公然声称“消灭皇帝”，鼓吹罢市示威、抗税运动、暗杀手段，被称为“首屈一指的留学生刊物”。它的政治倾向令清政府痛恨万分。出至第 9 期后，在清驻日公使的要求下，该刊被日本当局查封，发行人张钟端被拘禁数日，释出后被解除了官费留日生的学籍。

第三，因经费问题而停刊。如《云南》等。

《云南》杂志1906年10月15日创刊，至1911年才停刊，是出版持续时间较长的一份留学生刊物，是在孙中山直接关怀下成立的。

1906年1月，孙中山召见云南留学生，指示筹办云南地方刊物已刻不容缓，并指示陶成章、宋教仁等设法帮助。杂志创办后，得到了云南人民群众的拥护，也得到了一部分滇籍官吏、商人的同情和支持，并得到了他们部分资金的援助。

1910年，因经费和人员不足，《云南》杂志被迫与《滇话报》合并，并改为3个月一期。又出4期后，该刊即告停刊。

第四，因编辑人员内部分化而停刊。如《第一晋话报》、《游学译编》等。

《第一晋话报》是山西留日学生同乡会刊物，创办于东京，月刊，设有社说、史地、教育、实业、时评、小说等栏目。它1905年7月创刊，至1906年9月第9期出版后，由于同乡会分裂，不能续出，遂告停刊。关于该刊停刊，景梅久（莫愁）在《罪案》中有一段回忆：“因《第一晋话报》出到第九期，（山西）同乡会分裂（不过几个人闹地方意见，甚么南路、北路、中路的分起来），不能续出，于是我又邀集几个同志，商议另组织一种杂志。大家想名目，我以浙江有《浙江潮》杂志，湖南有《洞庭波》杂志，陕西有《夏声》，四川有《鹃声》，皆就地理、历史命名，想起孟子说的‘晋之乘，楚之梲杌，鲁之春秋’。这《晋乘》与《春秋》并列，亦是一部光荣历史，何妨用这个名称组织起来，大家很赞成。……大家凑了

些钱，出了三期（《晋乘》），因为经济缺乏停刊。”^①

清末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创办杂志的刊行期数情况，可看下表：

清末部分留学生刊物刊行期数表^②

刊名	期数	刊名	期数
云南	23	新小说	24
洞庭波	1	法政杂志(1906年)	6
湘路警钟	1	江苏	10
白话	6	汉帜	2
第一晋话报	9	江西	3
教育	2	天讨	1
湖北学生界	8	醒狮	5
浙江潮	12	游学译编	12
晋乘	2	国民报	4
四川	3	豫报	4

这一时期的留学生杂志，发行十分广泛，除在日本发行以外，还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及国内各地成立代办处或销售处。如：

《云南》杂志，规模壮大时的1908年，在北京、贵阳、云南的九个县城以及缅甸的瓦城设有分社，在全国39个城市有

^①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63页。

^②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1—5集。

报社代表。

《河南》杂志，出版不久，便风行海内外，每期销售达万份以上，其中输入河南一省即占半数以上。

这一时期留学生杂志的发行范围，可见下表：

清末部分留学生刊物发行情况表^①

刊名	发行地及代办处
新小说	日本、上海
江苏	东京、神户、横滨、上海及其他城市
湖北学生界	横滨、武昌、上海、北京、天津、湖南、浙江、江西、四川、江苏、广东、山西、直隶等 30 余处
直说	东京、北京、天津、保定、南京等
译书汇编	日本、上海、北京、天津、河北、安徽、江西、广东、广西、湖北、四川、河南、山西、浙江、江苏、台湾、香港、新加坡
新白话	南昌、赣州、九江、吉安、萍乡等
云南	北京、贵阳、云南、缅甸的瓦城
四川	四川、上海、北京、汉口、西安、贵阳、宜昌、昆明、缅甸的瑞波、法国的巴黎等
教育	国内、香港、南洋、欧美、日本

纵观这一时期的留日学生杂志，还有如下特点：一，以地区命名的同乡刊物多，仅 1903 年就有《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创刊。二，杂志易名频繁，如《秦陇》解散成立

^①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1—5 集。

《关陇》，又改成《夏声》。三、停、复刊频繁。

4. 留学生文化活动的两种作用

张之洞在倡导留学日本之时，同时也倡导翻译日文书籍。他在《劝学篇》中说：“大率商贾市井，英文之用多；公牍条文，法文之用多。至各种西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学西文者，效迟而用博，为少年未仕者计也。译西书者，功近而效速，为中年已仕者计也。若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是故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

1901年，张之洞等人在奏章中再次强调翻译日文书籍：“缘日本言政言学各书，有自创自纂者，有转译西国书者，有就西国书重加删定酌改者，与中国时令、土宜、国势、民风大率相近，且东文东语通晓较易，文理尤长者欲学翻译东书，半年即成，凿凿有据。如此则既精而且速矣。”^①

留日学生也颇赞成翻译日文书籍：“经英文者经五六年始成，其初学成也尚多窒碍，犹未必能读其政治学、资生学、智学、群学等之书也。而学日本文者，数日而小成，数月而大成，日本之学，已尽为我所有矣，天下之事，孰有快于此者？”^②

因而，随着留日运动的发展，大量留学生加入译者队伍，或是组成专门的译书团体，致使日书汉译成倍增加。其情况可

^①《东华录续录》卷一六九。

^②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载《清议报》第10册。

见下表：

中国人译外文书不完全统计表^①

年代	总计	日本 (百分比)	英国 (百分比)	美	法	德	俄	其他
1850—1899	567 种	86 (15.1%)	286 (50.5%)	82	13	29	2	69
1902—1904	533 种	321 (60.2%)	57 (10.7%)	32	17	24	4	78

上表非常明晰地表明，19 世纪末的几年中，中国译自日文的书籍极少；进入 20 世纪后，留日学生大批地译书，情况发生了逆转，中国译自日文的书籍已占到全部译书的 60% 以上。

另据统计，从 1896 年至 1911 年，15 年期间，中国翻译日文书籍至少 1014 种^②，其数量相当巨大。

再以中国人翻译西方文学作品为例。中国近代最早翻译过来的西方文学作品，是刊登在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报刊上的圣经故事，以及篇幅短小的寓言。晚清时代，通过日文转译欧洲和俄国文学作品逐渐占了上风。

俄罗斯文学的第一个中译本，是戢翼翠翻译的《俄国情史》，原作是普希金《上尉的女儿》，日译本是高须治助的《露国奇闻花心蝶思录》。

高尔基作品最早的中译本，是 1907 年出版的《忧患余生》，吴棹译自二叶亭四迷的《犹太人之浮生》，原作是《该隐

^①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 1992 年，第 415 页。

^②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640 页。

和阿尔乔姆》。

通过日文转译西方文学作品的留学生，罗普较有名气。他是戊戌政变后留学日本的，后入早稻田大学，曾参与翻译《佳人奇遇》和《十五小豪杰》。他译的《东欧女豪杰》，是中国最早介绍俄国民粹派苏菲亚等人革命活动的小说，书中那个舍弃了贵族生活深入民间的女革命家的献身精神，“在留学生及流亡者中间颇有影响。”^①

20世纪初至中华民国成立，留日学生创办报刊、出版教材、翻译书籍的文化活动，对中日文化交流史，还起到了两个重要的促进作用，一是改进了中国的印刷出版事业，二是引进了大量外来语，丰富了汉语词汇。

1900年，第一批留日学生唐宝锷和戢翼翬编的日语教科书《东语正规》，不仅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比较科学系统的日语教科书，它还采用了日本式的洋纸和表里两面印刷以及洋式装订，即目前我们所通用的印刷和装订办法，这在中国出版史上是一个创举。此前，中国人印书只印一面，然后对折起来装订成书，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大量书籍也是如此。

1903年，留日学生创办的《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杂志全都采用洋装本。

总之，这一时期留学生在日本出版的书籍、杂志基本是洋装本。这一方法很快影响到了中国国内。1902年8月，上海出版《新世界杂志》，它是中国人在国内第一次采用刊物洋装本的尝试。到1904年，中国出版的新书刊，洋装本已经占了

^①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71页。

优势，从而促进了中国印刷出版与文化事业的进步。

留日学生在译书、出版杂志等文化活动中，给汉语中引入了大量新名词，如交流、独占、断交、动员、解放、说明、最后通牒、治外法权等，这些词，在中国延用至今，促进了中国语言的进步发展。

大量日本词汇的引入，不仅丰富了中国语言的词汇，也促进了中国文章体裁的发展。如当时中国人在文章、著作中，加进了日本式的语气，形成了一种日本化的文体，因梁启超喜欢使用，时人也称之为“启超体”或“新文体”，对中国新文坛和青年读者影响很大。诸宗元在《译书经眼录序例》中说：20世纪初，“日本文译本遂充斥于市肆，推行于学校，几使一时之学术，浸成风尚，而我国文体，亦遂因此稍稍变矣。”^①

^①《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95页。

第 二 篇

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 的发展和风潮 (1912—1930)

第 一 章

辛亥革命后留学日本运动 出现第二个高潮 (1912—1914)

第 一 节

重新走向高潮的留日运动

1. 辛亥革命期间留日学生骤减

1911年7月，清政府学部曾请于北京设立游学日本高等五校预科。旋因辛亥革命爆发，未付实行。至辛亥革命期间，留日学生积极地投身到了这场推翻封建帝制、扭转乾坤的伟大斗争中，一时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骤减，留日人数走向了运动的低谷。

1911年3月，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在同盟会的指引下，召开留学生大会，成立了中国国民会，制定章程，向国内各省派遣代表，进行反清革命策动。

4月，留日学生再召开大会，到会者有2000人，议决再向各省派出代表，并组织军事教育会。

至武汉首义爆发前，已有相当数量的归国留日学生活动在各省，等待摧毁清朝封建统治那一永记史册的时刻到来。

在武昌首义过程中，有留日学生的身影，他们有人甚至在起义中献出了生命。赵启瑞，陕西长安人，早年赴日本，肄业于振武学校，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他立约同学归国参战，成为起义发生后首批返抵国内者之一。他排除各种困难，始抵武昌，即加入汉阳战斗。战到激烈处，他裸上身大呼，冲入敌阵，杀伤多人，力竭而死^①。萧钟英，湖北兴国州（今阳新）人，由武昌道师范毕业赴日本，先肄业宏文学院，继入振武和士官学校，同盟会员。武昌起义发生，立约同学回国参战，10月初抵武汉，时汉阳危在旦夕，他不顾旅途劳顿，即日组织敢死士上前线，直冲敌阵，当者披靡。清军据工事用机枪扫射，萧身中10余弹而死，其所率敢死士无一生还^②。

武昌起义消息传到日本后，留日学生召开盛会庆祝，并一批批地返国，到12月初，多数留日学生返回了国内。

武昌起义前后，连为数并不多的女留日学生，也积极地投入到了革命运动当中。

1911年4月21日，在日本东京牛込高等演艺馆召开有

^{①②}见《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下册，第574页。

2000人参加的留日学生会议上，“广东苏女史约五十岁登台（大拍掌，呼万岁），言曰：予因今日诸君开亡国会，存无限悲痛，特来履会（大拍掌）。诸君为什么开此大会？想来必因见那朝鲜、安南之人受亡国之惨祸，不忍为亡国奴，而始开此大会（大拍掌）。诸君呀，予年已五十了，是不能救国了，诸君皆青年，请速回去救国吧！诸君若实行救国，中国或有一缕之望，若不然，恐中国永远沉于大海了，吾实不忍见亡国之惨呀。言罢以头碰柱，大哭不已。一时会场中人，莫不齐声痛哭。（少顷）女史复言曰：望诸君学葡萄牙人，整起精神，把那一般卖国奴杀尽（此时场中，如同大丧一班）。”^①

还有一位叫吴木兰的女留日学生，参加武昌起义的前夕，组织炸弹队，在法租界被捕，又逃出，她说：我“原名墨兰，现年二十五岁，南城县人，寄居临川。父亲系在四川做烟土生意，将我读了三年书，读至上论为至。于十三岁到省，进葆灵女书院初等班一个学期，又入高等班三个学期。因闻上海好玩，没有毕业，功课分数七八十分，我就往上海跑马厂投入中西学校。师母姓王，九江人。我在那里一个学期，又遇杭州大同〔通〕学校校长秋瑾，要我改名王兴汉。后因徐锡麟的事发生，校内学生四百余名捉去一百二十余名，我那时候略有革命思想，总想男女平权，不受专制，然后自费一人往东京游学。结吉安人刘应昆，介绍入青山实践女子师范学校。原名吴墨兰，三年毕了业，得有文凭。那时候，已二十一岁，后又往美国游学半年。鄙人系光复以前回国，仍到上海。因姓叶托带衣

^①《民立报》1911年5月4日。

箱二只，被上海法捕开视，装得尽系手枪、炸弹，将我拘留。比经陈其美运动开释。由此次附入同盟会。又遇张春山、文宗耀等出资，鄙人出名组织炸弹队。又因造炸弹误作一个，又被法界捕拿，未获，我逃往汉口。正值那时革命倡议起事，为陆军学生最多，八月十九日果然起了事。”^①

后来吴木兰组织了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任会长，确立“练习武学，扶助民国”为宗旨。

武昌起义发生，“自民军占领武汉，东京学界，异常雀跃，女界尤为热心。……现已组织一（东京）赤十字社，前赴交战地带救伤。其第一队，于阳历十月十九日出发，计已抵上海数日。顷闻第二队，亦已整装就道，来月二号即可出发。”^②

以东京女留学生会会长唐群英为首的女留日学生，返抵上海后，“召集女界热心之士，组织女子后援会，开往各处调护民军受伤军士；一面派人至各省筹款，接济饷糈。”^③武昌首义后，各路义军的军资、军饷都是由革命党人自行筹措的，由于军资、军饷不足，严重影响革命军的战斗力。女子后援会，是唐群英联合同盟会女会员张汉英、张昭汉及上海、江浙一些小学校、女学堂的教师于1911年11月间成立的，它的宗旨是“集合女界同志，募集军资义捐金，以为民军后援”^④。唐群英任会长，下设会计、庶务、书记各一人。该会派人赴各省，募集资金数千元；还组织了北伐军救护队，聘得护士60名，其

①《亚细亚报》1914年4月15日。

②《神州日报》1911年11月2日。

③《时报》1911年11月23日。

④《女子后援会简章》、《时报》，1911年12月7日。

中女护士 40 名，随北伐军赴战地救护伤病员。唐群英所组织的女子后援会，成为当时女子募饷团、劝募手工御寒品会、女界协赞会等当时各妇女筹饷团体中成绩最显者。

就这样，中国留日学生纷纷归国，居日本者少，返国者多，使得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急剧下降，留日运动降入低潮。

2. 黄兴等革命党人支持留日运动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革命党人放眼未来之建设需要，极为注重教育。

1912 年 11 月 8 日，黄兴在出席湖南学界召开的欢迎会上，极力鼓励发展湘省的教育，他说：“回忆兄弟初出湖南时，公立、私立之学校尚不过数处。此次归来，公私学校至一百三十余所之多。而革命中之有功者犹复求学不倦，足见湖南教育界之进步。……造成民国者为教育，建设民国者亦为教育。不受教育，于个人尚难自立，况一国乎！20 世纪之文明，为物质的，非有完全科学不能占世界优异之地位。今湖南学校林立，以后若更加扩充，则不独湖南之福，且民国之福也。”^①

同月 15 日，在湘潭各界欢迎会上，黄兴更加明确地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今日最大事件，即为教育、实业两项。”^②

不独普通教育，留学教育，黄兴亦同样重视，并有所行

^①《长沙日报》1912 年 11 月 9 日。

^②《长沙日报》1912 年 11 月 21 日，转引自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 1991 年，第 356 页。

动。

1912年9月中旬^①，黄兴致函湖南省督谭延闿，请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其函云：“民国初建，人才缺乏，急宜选择宏毅之士，资送东西各国留学，储为国用。数月来，各省已次第派遣，尤以粤省人数为多。诚以革命以来，我青年学子皆联袂弃学，牺牲一己，以图民国之成立。其热心毅力，殊堪钦佩。今民国已成，其建功立业者国家皆有稽勋之典，独我不求权利，不求荣誉之志士，犹令其废时失学，甚非奖掖后进、论功赏酬之道。素仰我公矢教育人材之宏愿，当必有以筹谋之者。吾湘同志频年奔走国事，类多留学日本或内地高等专门学校，大都可以直接受教，名单另纸开列。望即饬教育司，就其外国语之程度分送各国。”

黄兴的上述函件，至少表达了下面几层意思：一，为民国建设考虑，宜送人出洋留学；二，所送之人，应是为了民国建立而弃学者，即革命人上；民国建立后半年多时间内，各省已开始了派遣人出洋留学。

对黄兴致函谭延闿，湘省派人留学的结果，李裕有所记述：“辛亥革命后，黄克强（黄兴）先生致函谭延闿，请其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在黄先生敦促下，湖南陆续选送留学生出国。到1913年底止，留日学生达四百七十名；西洋留学生共一百一十一名，计美国六十五名，英国二十九名，德国十名，法国四名，比利时三名。我是1912年赴日留学的，初去时月

^①该函未署时日，1912年9月24日刊于《长沙日报》，毛注青认为该函“9月中旬自北京发出”。见《黄兴年谱长编》，第270页。

领官费三十元，后调整为三十六元，勉可维持个人生活。”^①

可见，民国初开两年时间内，湖南共派出官费留学生 581 名，其中多为留日学生，占总人数 80% 以上。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亦对留日学生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关心，其出发点也是从建设社会这一点上来考虑的。

孙中山认为，民国前留日学生与民国后留日学生之职责不同。1913 年 2 月 23 日，他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中说：“数年前；兄弟屡次到东京，时常蒙学生诸君热心欢迎。但今日诸君之欢迎，与从前之欢迎，其心理上大有不同之点。从前所以欢迎兄弟之心理，都是愤恨满洲政府种种压制，种种腐败，欲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以图推翻满清腐败政府，造成革命事业，以建设完全美满之中华民国，与世界列强对峙。所抱持的纯是一种牺牲的主义，本欢迎革命之精神，推而欢迎兄弟。现在，从前诸君之志愿，已经达到。……今日满清政府既经推倒，革命事业已告成功。民国初基已粗称底定，我国之前途大有希望。但破坏之后必须建设，恢复秩序，巩固邦基。学生诸君必要为中华民国妥筹健全之方法，担负建设的责任。”

孙中山强调，“建设事业，不仅要与破坏时代持同一之牺牲主义，并且要一绝大学问。欲求此种建设的学问，必须假以时期，或十年，或六七年之苦心研究，方能应用。……从前诸君，是求急切的破坏的；今日诸君，是要求急切的建设的。”

在演说中，孙中山又向留日学生提出具体要求：“诸君在

^①李裕：《辛亥时期的片断回忆》，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藏稿，见毛注育编著：《黄兴年谱长编》，第 336—337 页。

此留学，须要认真研究学问，不可同从前留学生一样。从前的留学生，大概分为两派：其一派鉴于祖国之危亡，异族之凭陵，废弃学业，奔走革命；其又一派，既不能与革命诸志士一致进行，又不能研究实学，只想弄一个方法，混一纸文凭，以夸耀乡里。……今日诸君，不可如前日之分为两派。当此建设之始，需才孔急，量才器用，各尽其长。大才有大用，小才有小用，只要有真正学问，不愁没用处的。况且破坏事业已告成功，从前希望均已达到。将来之希望，即是建设事业。正好安心在日本留学，用数年功夫，求数年学问，以为建设之用。”^①

同年3月1日，孙中山在东京的国民党支部、共和党支部和广东同乡会三团体举行的欢迎会上，不仅说“创造民国者，既发源于东京，则巩固民国者，亦要留东诸君担负其责任”，而且呼吁：“今国民党、共和党两党诸君同在东京，有同在一学校者，有同居一旅舍者，互相请益、互相往来之时甚多，比内地各党员联络，适为最好之机会。可以和衷商榷，讲求政党应有之道德，研究政党应用之方针，以为内地政党之模范。”^②

此次日本之行，孙中山还指示：留日学生的东京国民党组织，财政有限；横滨、神户、大阪的国民党组织，商界人才多，财力丰富，须给东京国民党组织以鼎力支持，“请诸君注意此一层，必要联络留日党员，力图进步，方合本党之本

^①《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21—24页。

^②《在东京留日三团体欢迎会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35—38页。

意。”^①

以上足可说明，孙中山十分关心、看重留日运动，也关心留日学生中的国民党组织。

3. 留日运动出现第二次高潮

1911年武昌起义后，受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影响，留日学生大多数弃学归国。辛亥革命之后，留日运动重又趋盛。

对这一时期中国留日人员的概况，小说《留东外史》中有一段形象的描述：1914年间，在日本的中国人，“除了公使馆各职员，及各省经理员外，大约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公费或自费在这里实心求学的；第二种是将着资本在这里经商的；第三种是使着国家公费，在这里也不经商，也不求学，专一讲嫖经，谈食谱的；第四种是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来的。第一种与第二种，每日有一定的功课职业，不能自由行动。第三种既安心虚费着国家公款，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不因不由的有种种风流趣话演了出来。第四种亡命客，就更有趣了。请君须知，此次的亡命客与前清的亡命客，大有分别。前清的亡命客，多是穷苦万状，仗着热心毅力，拼的颈血头颅，以纠合同志，唤起国民。今日的亡命客，则反其事了。凡来在这里的，多半有卷来的款项，人数较前清时又多了几倍。人数既多，就贤愚杂出，每日里丰衣足食。而初次来日本的，不解日语，又强欲出头领略各种新鲜滋味，或分赃起诉，或吃醋挥拳。丑事

^①《在神户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46页。

层见报端，恶声时来耳里。此虽由于少数害群之马，而为首领的有督率之责，亦在咎不容辞。”^①

《留东外史》为平江不肖生（向恺然）所作，计160章，50余万字。作者民国初年在日留学，留学期间写就了这部小说。《留东外史》是一部进行了艺术加工的小说，其中定有创作的成分，也难免有夸张、移植之实，不可以作为历史事实来引证，但是作者本人又属留日者，该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定有写实的成分，至少，他为读者提供了一张虚幻、夸张后的“留日众生图”。

这时期留日人员，有为建设民国未来而留学深造者和不满民国建立后混乱社会状况者，有对民国创立有功者和迫不得已的亡命者。

这时期留日人员，有自费、公费者，还有先是自费赴日，抵日后再争取到公费者。

1913年4月发行的留日共和党机关刊物《说报》称：“民国成立起来，青年好学之士，纷纷自费负笈东渡。”

公费留日生，各省份、各方面也是纷纷派出。如：1914年7月10日，京师大学堂“新派10名官费生留日”^②。

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工商界曾议定派员出国留学之事。民国初年的一次工商会议上，上海总商会代表荣德生提出了《请选派海外实业练习生案》，会议讨论后形成如下决议：“我国工商学识尚在幼稚时代，欲谋工商业之发达，要熟悉各国工

^①不肖生：《留东外史》上册，岳麓书社1988年，第1页。

^②耿申等编：《北京近代教育记事》，第76页。

商情形，输入各国工商知识，则选派学生出洋实习之举，实为振兴工商业当今最要之图。”其议定的办法有两种，一是由国家选派，所派学生“以派至各国工场商场实习练习为宗旨”，“资格以工商业甲种专门学校毕业，或从事工商业至五年以上”者为合格。二是由各工商界选派，方法是：“由工商部通令全国各工场、商会自筹经费选派学生出洋”，由工商部出面派送，并与官派生同样管理^①。

与工商会议不谋而合的是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该会在民国初年的第一次大会上，提出了《出洋学习工商各处创办商学案》，全体代表讨论后，形成了决议：各省商会联合会应设法筹款，“多派商家子弟出洋留学工商，或入本国学堂，精求实业”，“学成归国，崇其学位，不入仕途。”^②

其后，商联会的代表大会仍有有关留学议案提出，如1916年8月召开的第二届大会上，提出了《请选派学生留学案》。

总之，这一时期工商会和商联会所议定的派员留学办法，建议采取商派、官派和官资商派多途进行，确定留学生的选派要根据国内的需要选择学生和学科，学成归来后要合理使用，不能“徒以虚荣为该生之奖励，以致学非所用，人才湮没不障”，而应“各就其专门学问，集资合股组织公司，并令其充当本省实业学校教员，以期教育之普及。”^③

^{①②} 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1—234页。

^③ 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235—236页。

上述议案的提出和实行，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造就了大批的实用人才。

先以自费赴日，抵日后再争取官费的留日学生，大有人在。郭沫若就是这样。1913年底，在长兄郭橙坞的资助下，自费赴日留学。1914年初抵东京后，寄居东京郊区小石川大冢，一面入神田日本語学校补习日语，一面突击基础科学知识，其专心得连引以为友的烟酒都戒绝了，这是他“一生之中最勤勉的一段时期”。经5个月的努力，于同年7月考入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预备班，一年后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取得了官费。取得官费后，郭沫若甚为高兴，欣喜之余，还特意约同乡、高年级学生吴鹿平等人往房州海岸避暑，很开心地玩了一次，因为有了官费，就意味着以后的留日岁月有了生活、学习的依托。

这时期官费生的人数，可见下页表。

从该表可以看出，除“预备”外，学工科和师范的分别为290人和137人，人数排第一、第三，但这两科内涵还比较宽泛，它们本身又可再分出多种科目类别。如此考虑，学医科、法科的人数则显得比较多了，因为这两科所含内容单一，基本可不再划出几种科目类别。除海军一部外，学文科的有9人，学理科的有17人，是人数最少的。

从各地区来看，甘肃、河南人数较少，黑龙江又最少，仅有1人。湖南的人数一枝独秀，遥遥领先，其次才是广东。前面所引黄兴致湖南省督谭延闿信中所谓“数月来，各省已次第派遣（留学生），尤以粤省人数为多”的情况属实，只不过湖南省后来居上罢了。这个人数虽然没有包括自费生，但从官费

1914年至1915年留学日本官费学生统计表

费别 科目	陆军部	海军部	教育部	直隶	奉天	吉林	黑龙江	山东	河南	山西	江苏	安徽	江西	福建	浙江	湖北	湖南	陕西	甘肃	四川	广东	广西	云南	贵州	总
文								1		2	1	1	1	1	1						3				9
理			3	1	1	1							1	1		2		2		2	1			2	17
法			2		8	1		7	2	10	1	1	6	7	3	6	13	18	6	13	4		1	1	110
商			2		2	6		2		4		1	4	7	1	4	9	8		5	1		6		62
医			3	9	1	3		4	1	1	8	3	13	15	20	13	7	9		8	12	3	8	3	144
农						1		9		3	5		2	1	2		5	3		8	4	1	16	1	61
工			9	3	6	9		11	2	7	24	9	18	6	32	11	47	20		28	25	7	10	6	290
师范				4	3	6		10		3	7	2	14	9	13	9	15	6		13	13		8	2	137
陆军	22																								22
海军		1																							1
预备			4	13	12	9	1	14	6	11	11	4	21	7	22	7	27	18	1	12	37	4	10	3	254
总	22	1	23	30	33	36	1	58	11	41	57	20	80	53	94	52	123	84	7	89	100	15	59	18	1107

《中华民国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

生人数这点上来说，黄兴等革命党人支持、鼓励出国留学是颇有实绩的。

这一时期的自费、官费生总人数，各种材料说法不一，差距悬殊。1913年4月《说报》的《日本东京留日学生经理员会议处广告》中说，中国留学生“现在东京者已达二千人以上”，该文说的是1913年的数字，并且仅是东京一地，当时的留日学生虽绝大多数聚集东京，但其他地方也有。松本龟次郎在《中国留学生教育小史》中说：“1913至1914年间，（中国）留学生人数颇多，最少也有五、六千人，仅次于日俄战争（1904年）前后的最盛时期。”另还有的材料称，这时期的人数达到了1万、2万。

实际上，这一时期的留日人数，以下数字当为更趋准确。

1912年至1914年中国留日人数统计表

年 度	文部直辖	公私立	合计
1912年	771 (9)	666 (43)	1437 (52)
1913年	—	—	—
1914年	666 (6)	3130 (89)	3796 (95)

●来源：二见刚史 佐藤尚子：《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关系统计》，载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纪要94集，1978年3月出版。

●（ ）内数字为女留学生数，包括在总数内。

为了进行横向比较，不妨把同期中国人留学美国人数情况也援引如下：

1914年至1915年，留美官费生为510人，而留日官费生为1107人，几近美国的两倍。

1914年至1915年留学美国官费学生统计表

科 目 \ 费 别	外交部	陆军部	海军部	教育部	交通部	奉 天	吉 林	山 东	河 南	江 苏	安 徽	江 西	浙 江	湖 北	湖 南	陕 西	甘 肃	四 川	广 东	广 西	云 南	总 计
文	37			1				1								1		1	7			48
理	38										3								1			42
法	55			1			2	4	1	1	3	1	1	1	5			1	11		2	88
商	10					1	1								2				5			19
医	12									1			1									14
农	20							4				1	1						1		1	28
工	138			1	14	2	3	6				7	4	1	11	6	1	5	11	2	4	216
师范	9																					9
陆军	1	1																				2
海军			17																			17
预备	27																					27
总 计	347	1	17	3	14	3	6	9	2	1	14	7	7	2	18	7	1	7	36	2	7	510

《中华民国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

因此，不论是与此前的纵向比较，还是与同期的横向比较，都可以说：1914年，中国人留日运动达到了有史以来的第二次高潮。

4. 教育部相继公布学生留日规则

民国初建，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中央教育行政进行根本改革，成立教育部。

1914年1月17日，教育部公布了《经理留学日本学生事务暂行规程》，对留日学生的派出、管理、官费给付等做了规定，计32条，如其中对留学生的管理是这样规定的：

留日学生事务，由教育部及各省行政公署分别派员经理之；

经理员除教育部委派一人外，其余各省或每省委派一人，或各省合派一人，由各省查核人数酌量办理；

部委经理员经理属于中央之官费生留学事务，省委经理员经理属于各本省之官费留学生事务；

经理员应办之事务为：官费自费生送学事宜，官费生发费事宜，考核官费生之品行及学业各事宜，考核证明官费生出入留学国境日期及收验官费生证书公文事宜，留学事项应行报告各事宜，教育总长或各省行政长官或驻日公使临时委任各事宜。

同年12月24日，教育部再呈准公布了《管理留日学生事务规程》，同时宣布《经理留学日本学生事务暂行规程》废止。

《管理留日学生事务规程》是民国政府第一个较完备的留学日本的规章，它既有对清末留学制度的继承，也有在此基础

上的变革及发展，它对民初的留日活动进行了各方面的约定，故此，它在清后的留日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管理留日学生事务规程^①

(1914年12月24日呈准)

第一条 留日学生事务，由教育部及各省行政长官分别派员管理之。

第二条 教育部派监督一人，各省派经理员一人或数省合派一人，由各省查核留学生人数酌量办理。

前项部派监督由教育总长呈报大总统备案；省派经理员由各省巡按使咨报教育部及驻日使署备案。

第三条 各省经理员商承部派监督办理本省留学生事务。

第四条 凡留学生事项有关于外交者，由部派监督稟请公使主持。

第五条 凡关于留学生送学事项，在日本文部省直轄之高等专门学校及帝国大学，统由部派监督办理。其他各校，由部派监督或各省经理员分别办理。

第六条 凡关于各省官费生发费事项，由各该省经理员办理。

第七条 凡关于留学生调查等事项，部派监督得囑各省经理员协同办理。

^①《教育法规汇编》第六类专门教育，1919年5月，转引自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489—492页。

第八条 部派监督，每周应召集各省经理员会议一次。如有特别事故，得临时招集。

第九条 各省经理员如有不能称职者，得由部派监督详请教育总长咨行该省行政长官撤换之。

第十条 部派监督于每学期开学两个月内，应将中央及各省官自费生分别学校学科及年级，列表汇报教育部，并作简表分报各本省行政公署。

第十一条 各省经理员于每学期开学一个月内，应将其本省官费自费生分别学校学科及年级，列表汇送部派监督。

第十二条 部派监督应于每年十月内，将明年官费生毕业人数分别调查，详报教育部及各本省行政公署。

第十三条 留日学生毕业回国时，部派监督应将该生毕业学校及成绩汇报教育部，并分报各本省行政公署备案。

第十四条 部派监督及各省经理员对于留学生之成绩高下、功课勤惰、品行优劣，均应分别注意。

第十五条 部派监督或各省经理员于官费学生贻送留学证书请求批明入国或出国日期，应即详加查核，并注明年月日，盖章发还。各省经理员遇有自费学生贻送公文时，应将所报入国日期登记之。

第十六条 留日学生毕业后，应将文凭送请部派监督验明，如果年限成绩查核相符，由部派监督发给证明书。

第十七条 留日学生自入学至毕业历次考列优等或得有学校勤课褒状者，部派监督应详报教育部，或由各省经理员详报本省行政公署备案。

第十八条 官费学生如有不守规则或不名誉之行为，部派

监督及各省经理员应随时劝戒。如屡戒不悛，应详请原派官厅，停止官费。

第十九条 官自费生对于部派监督、各省经理员，如有无理请求、任意滋事等情，得详请各该生本省行政长官，飭其家属勒令回国。

第二十条 官费学生在高等专门以上各学校学年试验继续落第二回者，又因疾病或其他事故认为无毕业之望者，部派监督应陈明教育部或各本省行政公署，停止官费。

第二十一条 凡考入官立高等专门以上各学校之官费学生，不准改入私立学校。违者，停止官费。

第二十二条 官费学生于学校春秋两季始业后，满一个月不到者，除有特别理由，由原派官厅通知外，部派监督或各省经理员应陈明教育部或本省行政公署，停止其学费。

第二十三条 官费学生无故缺席至一个月者，部派监督或各省经理员应详报教育部或本省行政公署，停止其学费。

第二十四条 官费学生毕业后，如有请部派监督送各处实习者，应以留学医农工各科成绩最优之学生，并得各病院及场厂许可者为限。部派监督应先详报教育部或本省行政公署，查核办理。

前项实习期间至多不过一年

第二十五条 官费学生自民国三年起，不得再送选科。

第二十六条 部派监督每月薪俸三百元，办公费二百元，此外电报等费，得核实报部，详请补给。部派监督为佐理庶务，缮写文牒，得延用办事员及录事。其所有薪俸，均由办公费项下开支。

第二十七条 各省经理员之薪公费，由本省自行酌给。

第二十八条 官费学生，其留学日本帝国大学本科者，每月支給日币四十二元。其留学第一至第八高等学校及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千叶医学专门学校者，每月支給日币三十三元。其余官费生，每月支給日币三十六元。

凡津贴生、半费生支給费额，由各省行政官厅自行规定。

第二十九条 官费学生毕业回国川资，定为日币七十元，但边远省份，得由经理员详请各本省行政公署，酌量增给之。

第三十条 凡官费学生除应领学费之外，不得别立名目，要求费用。

第三十一条 官费生如染时疫病症，非入院医治不可者，每日得给与病费日币二元。每年以二星期为限。限内不足之费及限外不能出院，概由其学费内开支。

前项入院学生，须取县病院证明书。其所给之病费，应由部派监督或各省经理员直接交付病院。

第三十二条 官费学生如患肺病、脑病及耳目口鼻咽喉等症，轻者自行出资调治，重者准其退学回国。不得藉口患病，要求医费。凡因病退学、休学回国者，多给一个月学费，作为川资。

第三十三条 官费学生，如遇灾变确有损害者，经部派监督或各省经理员查明属实，得给与恤费日币四十元。

前项规定，自费学生亦得适用之。

第三十四条 凡辍学回国之官费生以三个月为限，逾期不到者，停止官费。其在辍学期内，不得支领学费。

凡因丁忧回国者，准假百日。如逾期不到，亦应停止官

费。

第三十五条 官费学生如有要求预支学费情事，不得允许。

第三十六条 官费学生如有病亡海外者，给与棺殓埋葬费日币二百元，或就地埋葬，或运送归国，各听其便。但不得要求增费。

前项规定，自费学生亦得适用之。

第三十七条 部派监督或省派经理员发给学生学费及其他费用，应将收条汇送教育部或本省行政公署。

第三十八条 各部所派遣之留日官费生，除海陆军学生外，如委托部派监督管理者，应咨明教育部，一切按照本规程办理。

第三十九条 《经理留学日本学生事务暂行规程》，自本规程公布日起即行废止。

第四十条 本规程自呈奉批准日公布施行。

《管理留日学生事务规程》较之已经废止的《经理留学日本学生事务暂行规程》，规定有些变更，比如，将原中央之经理员改为部派监督，这一是更改了派出部门，二是更改了所派出人员的头衔；各省经理员对部派监督为从属关系等等。

除上述两个规章外，这一时期的民国三年一月还公布有《管理留学日本自费生暂行规程》，其中对自费生留日的资格做了如下两条限制：中学以上学校毕业或中学以上之教员。具备这两条，即可自费赴日留学。

第 二 节

创办的新校与恢复的旧校

1. 招收中国学生的学校再度创立

辛亥革命前，随着留日运动次年减弱，原来专门招收中国学生的日本学校相继停办，停办的学校计有：

东斌学堂，1908 年停办；

宏文学院，1909 年停办；

经纬学堂，1910 年停办；

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1910 年停办。

上述停办的学校，都是中国人留日运动过程中很重要的学校。如宏文学院，曾接收中国学生最多，其鼎盛时期，相继办过大家分校、麹町分校、真岛分校、猿乐町分校和巢鸭分校，该校共招收中国学生 7192 人，毕业者有 3810 人；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共开办 6 年，在此肄业或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有 4000 人左右。

至辛亥革命期间，专门招收中国学生的日本学校已所剩无几。随着 1914 年前后留日高潮再次到来，中国学生大举赴日，学校又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这时期，专门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学校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未停办的学校继续招收中国留学生，如高等日语学堂等；

第二，以前停办的学校再度兴学重新招收中国留学生，如东京同文书院等；

第三，新创办的学校开始招收中国留学生，如日华学院、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等。

日华学院是前宏文学院教授松下大三郎创办的。《松本龟次郎传》中这样记述了该校的成立过程：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享受公费的，由于国内政权改变，一时还不能决定是否能再继续享受公费；自费留学生也因局势混乱，汇兑一时不通，经济上遇到困难，因此纷纷回国。日本当时所有为中国留学生办的学校，从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起，就因学生减少而陆续关闭，到这时竟全部停办，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除了家庭就在日本的华侨学生外，已寥寥无几。

民国成立，中国国内秩序逐渐恢复，公费、自费留学生又陆续来到日本。不仅如此，领导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党人，为了培养人才，将过去追随革命领袖们奔走革命的青年也大批送到日本去留学，例如黄兴的部下被送到日本留学的，据说多达六百人左右。这样，在日本又需要有专门教育中国留学生的学校。但当时只有长泽孝享办的高等日语学堂一个班，容纳人数有限，此外又没有一所像这样的学校。所以中国留学生中许多曾在日本住过的，纷纷要求宏文学院等校的老师出来重新设立新的学校。在这种情况下，松下大三郎就于1912年首先应中国留学生的要求，借了神田数理学院的教室，开办了日华学院，从

事留日学生的预备教育^①。

这一时期教育中国留学生的，除一些学校，其他一些带有补习班性质的机构也应运而生，这些补习班有日本人办的，也有中国留学生自己办的。松本龟次郎先生曾在宏文学院任教，1912年前后，他虽然在东京府立第一中学担任语文教师，但业余时间仍在各学校、各补习班中奔走、忙碌，教授中国学生，有关他的传记中这样记载：

中国留日学生当然也知道松本龟次郎过去是专门从事留日学生预备教育的有经验的教师，因此也找到他，要求他出来办学。那时松本正在东京府立第一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当然不能立即答应中国留学生们的要求来创办学校，但松本却每天利用业余时间，即在东京府立一中教完课后，赶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馆为中国留学生办的户塚补习班教授日语；后来又去日本大学去为留学生讲习班上课。当时由中国留学生自己组织起来，在日本大学借了几间教室，自己请教师，利用课余时间给湖南籍的留日学生开了日语讲习班。后来，中国东渡日本的留学生越来越多，日本大学的教室容纳不下，因而又借了附近东洋商业学校四间教室。但教室可以借，而教师的人选却不易解决。当时

^①杨正光 平野日出雄：《松本龟次郎传》，时事出版社1985年，第121—122页。

负责组织的，是一位湖南人老留学生，名叫曾横海，他曾在宏文学院学习过^①。

在各种补习班中，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所办的颇有名望，不仅松本龟次郎应请前去讲课，松下大三郎在创办日华学院以前，也在那里为中国留学生授课。

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又名中华青年会馆。20世纪开始后，美国对日本大力吸引中国留日学生暗生妒忌，于是通过设于上海的中华基督教青年协会派遣赖安博士及张佩之到东京活动争取留日学生。1906年春，东京神田的日本青年会馆中产生了华人青年会，后来改为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1910年，该会脱离日本青年会馆而独立，建会馆于北神保町。

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成立后，对日本各学校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学习状况、生活习惯进行调查，在他们中间发展基督教教友，吸引了很多留学生加入。后来成为留日学生领袖人物之一的王希天留日后即入了基督教。“有一天，他到东京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去，适为礼拜日，会中正在开德育演讲会，高唱《种子撒于朝晚》一歌。这是他第一次听到的赞美歌声，就深深的感动他的心曲，以为宗教聚会是何等圣洁高尚，亲爱愉快，真是人生的安慰者。以后每逢礼拜日，必到青年会听道。久而久之，又觉自身虽有伟大的志愿，但屡为私欲所诱惑，无力抵抗，终难发展。但他此时已经认识宗教的内容，为可以救人脱离罪恶，信仰宗教，是得能力的根源。故于民国5年春，

^①杨正光 平野日出雄：《松本龟次郎传》，第122页。

在东京美以美会领受圣洗，决志为基督徒。他对家人说：‘我信教是为戒除烟酒。’但他自立志为基督徒以后，性情品格，与前判若两人。前之希天，循规蹈矩，平平无奇；后之希天，泛爱众而亲仁，嫉恶如仇，好义若渴，有胆量，有识见。其身心的清洁淡泊，留东同学中罕其匹也。”^①

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多方运动，组织活动，教授留日学生英文、日文，为留日学生提供生活上的便利，因而其会馆逐渐取代清国留学生会馆，成了中国留日学生的大本营。东京大地震后，会馆毁坏，后又重建，内设宿舍、讲堂、洋服店、书店、食堂等，1931年1月8日遭火灾焚毁。

2. 中国留学生向往的一所学校

在留日运动重兴过程中，热爱中国人民、关心中国留学生教育的教育家松本龟次郎先生，于1914年在东京创办了“日华同人共立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这所学校，成了中国留学生向往的一所学校，东京的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在这里学习过，它与清末的宏文学院一样，成了教育中国留学生的著名学校，促进了中国人留日运动的发展。

辛亥革命后中国留学生再大批赴日的时候，松本龟次郎正在东京府立一中教国文，应原宏文学院的中国湖南籍留学生曾横海的要求，利用业余时间为中国留学生上课。曾横海请他辞去一中的公职，办一所专门教授中国留学生的学校。办一所学

^①谢介眉：《王希天君小史》，载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东瀛沉冤》，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37页。

校，符合松本龟次郎的心愿，但他又有所顾虑，在府立一中任职，工作有保障，而办教授中国留学生的学校，风险太大，中国留学生人数极不稳定，他们说走就走，像宏文学院，留学生人多时办了几所分校，人少时说倒闭也就倒闭了。因此，他一直处于犹豫的状态。这期间他仍在给中国留学生上课。

1913年8月，曾横海办的补习班人数又有所增加，在日本大学、东洋商业学校租的教室已不够使用，又在大成馆英语补习学校借了教室，还是容纳不下。这时，松本龟次郎决定办一所学校，辞去府立一中的教职。

松本龟次郎的想法得到了友人杉荣三郎、三矢重松、吉泽嘉寿之丞和加藤定吉等的资助和鼓励，他又拿出自己多年省吃俭用节约下的钱，开始筹备办一所永久性的学校。按他的想法，有了固定的校舍，能延聘到好的教师，能接收更多的中国留学生。

次年正月，他在东京神田猿乐町找到一所房子，正式成立“日华同人共立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他所以称学校为“日华同人共立”，是为了纪念曾横海等人的功劳，不表示有任何经济关系。

学校成立之初，经费十分紧张。凭友人的资助和松本龟次郎个人的积蓄，仅够修建校舍和购置最简单的教具，至于购置一些仪器等，则无能为力。当时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原宏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得知情况，为鼓励松本龟次郎办出一所优秀的专门招收中国留学生的学校，慷慨相助，他把原宏文学院使用的教具、仪器等价值3000元左右的设备无偿借给使用，还把宏文学院的教材也送给他们。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成立时，松本龟次郎、杉荣三郎和吉泽嘉寿之丞担任创办者，松本龟次郎担任校长。学校的课程设置，除教授日语外，还有相当于日本中学的课程，如英语、物理、化学等。

学校运转起来后，松本龟次郎基于一个教育家的职责，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尽心尽力。不久，长泽孝享的高等日语学堂和松下大三郎创办的日华学院也并入进来，进一步充实了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的力量。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创办后，在几次留日运动的波折中都经受住了考验。如在留日学生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中，中国学生很多人返国，有一些学校因此停办，可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凭藉在中国留学生中享有崇高信誉，未受大的影响，始终没有停课。

1918年，日本提出与中国签订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共同出兵西伯利亚。中国留日学生知悉，立刻哗然，群起抗议，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的中国学生也卷入了这场风潮中，上课的学生屈指可数，有的班甚至无一人上课。见此状，松本龟次郎一方面同情中国人民，痛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另一方面又为中国留学生惋惜，劝他们不要消极地罢课和回国，要学成专业，建设国家。松本龟次郎想法设法做中国留学生的工作，终使一批学生很快又回到了课堂。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创办后不断发展，与松本龟次郎的办学方针和方法有关。学校成立时，他就说：“只要有一个中国留学生，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的校门也要开，决不停办。”另外，为吸引中国留学生，给他们创造方便条件，学校还采取了灵活

的教学方法及课程设置，每学科以2至4个月为一期，允许选修，这极大地适应了留学生来去频仍的特点。

学校运转起来后，虽有一些外来的支援，但主要还靠学费来维持。中国学生忽多忽少，学校的经费一直不显宽裕。1915年，在曾担任过驻华公使的友人伊集院彦吉的斡旋下，一些和中国有关的企业家纷纷资助松本龟次郎。1919年，再得门野重九郎的帮助，买下了相邻的神田区中猿乐町六番地的土地，盖了1750平方米的三层楼校舍，使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的办学条件有了飞跃发展。

1920年，学校成立了校董会，正式申请批准改组为财团法人，董事除学校的原创办人松本龟次郎、杉荣三郎和吉泽嘉寿之丞外，又增加了服部宇之吉、饭田邦彦、岩谷孙藏和三矢重松四人，使学校再度有了一个大的发展。

据说，当时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有约三分之二的人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过。1917年周恩来留日后，也在该校补习过日语，学习期间，他还参加了由松本龟次郎及其他教师率领的修学旅行团，到过奈良、京都和箱根等地。

松本龟次郎毅然辞掉府立一中的公职创办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从此走上了专门教育中国留学生之路，这一切都对中国留日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令中国人民永远怀念。

3. 主要招收革命人士的两所学校

武昌首义成功，各地纷起响应，帝制推翻，民国成立，借共和声浪浮泛而起的袁世凯，以“统一”为遮掩而推行集权专制，以暗杀为手段扼杀了余留民主氛围的“政党政治”。血的

事实唤醒了沉溺于种种幻想中的革命党人，他们决心实行武力讨袁，用民主战争来保卫辛亥革命开创的共和制度。全国人心鼎沸，呼吁诛奸讨逆。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毅然举起“二次革命”的旗帜。由于种种原因，短短两个月之内，国民党发动的反袁武装全部瓦解，控制的地盘全部丢失，“二次革命”彻底失败，大批革命党人流亡海外。

1913年8月17日，孙中山开始了两年多的流亡日本的生活。孙中山抵东京后10天，黄兴也流亡到日本。

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流亡日本后，袁世凯政府对他们采取了通缉、暗杀等迫害措施，还要求日本政府引渡。1913年8月14日，袁世凯致函卸任日本公使，要求日本政府将孙中山、黄兴驱逐出境，其中还以容留他们有碍于中国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相胁。其函云：

“伊集院公使决定八月十五日归国，故本使通过坂西向袁世凯转达伊集院公使的口信，说：若有何须向帝国政府转告之传话，可代为转达。同时解释道，孙、黄等的来日，从日中两国友好关系计，实非政府之所愿，故此，事前已电训各地有关领事，应断然阻止之。但他们仍秘密乘般渡日。对此，帝国政府虽颇感困惑，但既已来日，作为立宪国之通义，则不便强其离去。且孙、黄等人在日本民间之友人，多有怜其窘况，欲加庇护者。故其处置方法益加困难。但目下地方官究正力劝其即速离日，其结果虽尚不得而知，但亦正在严加管束；即令暂时逗留在日，亦决不致将

日本成为其再举之策源地。袁世凯亦通过坂西致函伊集院公使，希望他回国后向日本政府当局转达以下意旨：日本国政府为难之处当可推察，对日本国政府对其严加监督之举亦充分谅解。不过，此次叛乱之际，日本国军人原已有所干预，此事诸方报告均一致指出。在中国人中间，不幸都信以为真，非一二张布告所能打消。如今孙、黄又居住日本，中国人对日之疑惑则益加根深蒂固。这非但是中国之不幸，而且在今后日中共同事业方兴未艾之际，带来诸多危害。我政府当局根据日中提携精神，今后本想送留学生赴日，但有人反对说，这样只会培养民国和平的扰乱分子。这并非本意，实出无奈。孙、黄即令不能将日本作为策源地，但只要他们留在日本，日中国民间误解的种子便不会全然除去，所以要设法令其离开日本^①。

由于种种原因，孙、黄二人未遭致日本政府驱逐。二人虽政见不和，并且黄兴还于1914年6月30日离日赴美进行革命活动，但在亡日期间，二人除从事反袁活动外，还创建了两所主要招收中国革命人士的学校，从而壮大了留日运动的力量，丰富了留日运动的内容。

讨袁失败后，国民党人特别是中下级军官追随孙中山、黄兴流亡到日本的颇多，进入学校学习，是对他们最好的安置，

^①日本驻中国公使山座致牧野外务大臣电（1913年8月14日），转引自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第407—408页。

一者可以让他们学知识，二者可以图革命党人尔后进取，培养干部。

1914年2月，黄兴创办浩然庐，主要收容二次革命后流亡日本的革命人士。《黄兴年谱长编》一书记述：“讨袁失败后，……黄兴为图尔后进取，着手培养干部，创办浩然庐于东京郊外大森，作研究军事场所，曾任军职之党人均在此肄业。”^①黄兴为浩然庐亲题匾额曰：汉贼不两立；大盗窃国吾辈之责^②。

浩然庐由日本陆军大学等校的日人教官义务任教，讲课时由翻译即时传译。后因某种原因该校关闭，其学生转到了政法学校。

同在1914年2月，孙中山、黄兴又创办了政法学校。该校由寺尾亨出面主持，租神田区锦町的东京工科学校一部分校舍而办，其赞助者和当事者大都是中日两国的名士。据《政法学校纪要》，该校的赞助人有：孙文、岑春煊、王家襄、张继、王正廷、李烈钧、陆宗舆、仇鳌、头山满、安川敬一郎、小池张造、水野梅晓等人；董事（理事）有：汤化龙、吴景濂、章宗祥、殷汝骊、刘崇杰、孙润宇、犬养毅、林权助、伊集院彦吉、仓知铁吉等；参事有：戴天仇、殷汝耕、钟铠、张定、川崎万藏等。

政法学校的教师由多位日本国立大学博士充任，授课时由翻译传译。其经费初由国民党人士负担，后由中华民国驻日公

^①毛注青：《黄兴年谱长编》，第418页。

^②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351—352页。

使馆人员居间协助，不足之数由寺尾亨向日本企业家募捐。

《黄兴年谱长编》中称：黄兴“创办政法学校于东京神田区三丁目十番地，请日本著名法学博士寺尾亨任校长，先设政治、经济专修科，后增法律、日语两科”^①，为的是在“正科研究之余，复得熟悉日语之便”^②。

对政法学校，黄兴之子黄一欧有所回忆：“东京政法学校，是孙中山先生和先君商请日本法学家寺尾亨博士出面组织的，并得到犬养毅、头山满、宫崎寅藏等人的赞助。开学之日，孙先生亲临主持，先君也到场参加，并与李烈钧负责筹措了学校经费。这所学校办了相当长的时间，最初负责主持的是彭允彝，亡命党人到校听课的有两百多人。此外，以培养军事人才为宗旨而成立的大森浩然庐，由殷汝骊主持，其发起性质，学员成分及经费来源，与政法学校同。”^③

政法学校成立后，本计划要发展成为大学，终因条件不具备，计划未能实现，成立7年后，于1920年停办。

浩然庐与政法学校，由中国人创办，是留日运动史中很独特的现象，其招收的中国学生虽然相对于整个留日运动来说不算多，但其在整个留日运动中亦占有一定的位置。

4. 几次变更的留日官费规定

经费，是留学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自费留学者，经费自

^①毛注青：《黄兴年谱长编》，第418页。

^②政法学校招生广告，载《民国》杂志第1卷第3号。

^③黄一欧：《护国运动见闻杂记》，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藏稿。

然自筹；官费留学者，其经费该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等派出部门付给。

民国之初，曾先后有过两次关于官费的规定，其数额、给付办法等，略有不同。

实际上，所谓的官费，其中的经费不仅仅是指每月所固定给的资金，还应包括一些特殊开销，如患病等。在两次规定中，也涵括了特殊开销的内容。

1914年1月17日，教育部公布的《经理留学日本学生事务暂行规程》，对官费是这样规定的：

留日官费生月给官费分为甲乙两种；

甲种，月给日币42元，限给留学日本帝国大学之学生；

乙种，月给日币36元，给日本帝国大学之外的留日学生；

留日官费生毕业回国，给川资日币70元，边远省份学生由经理员呈请各本省行政公署酌量增给；

官费生除上述所列之学费外，不得别立名目要求费用；

官费生如染时疫病症非入院医治不可，每日给病费日币2元，以二星期为限，限内不足之费及二星期不能出院，概由其学费内开支；

官费生如遇水灾火灾确有损害者，经查明属实，可给予恤费日币40元^①。

1914年12月24日，教育部制定《管理留日学生事务规程》，其中对官费给付的规定有所变化，主要变化是将官费分

^①《教育杂志》第五卷第十二号，参见舒新城编：《近代中国留学史》，第139—140页。

为三等：

留学日本帝国大学本科者，每月给日币 42 元（这一点没变化）；

留学第一至第八高等学校及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千叶医学专门学校等，每月给日币 33 元；

其余官费生，每月给日币 36 元。

另外，《规程》又较《暂行规程》增加了一方面内容，即下述官费生的规定自费生也适用：

留学生如患肺病、脑病及耳目口鼻咽喉等症，轻者自行出资调治，重者准其退学回国，不得藉口患病，要求医费，因病退学者，多给一个月官费，作为川资；

留学生如遇灾变确有损害者，经部派监督或各省经理员查明属实，得给恤费日币 40 元。

下面，不妨结合实例，再看一下官费的情况。杨步伟，1913 年赴日留学，1919 年回国，归国后，她独立创办医院，成为中国第一位医院女院长。其名更彰于世，还因为她后来嫁给了日后成为著名学者的赵元任。

杨步伟在其自传《一个女人的自传》^① 中记述了她赴日后是如何取得了官费的：

1913 年，杨步伟踏上了自费赴日本的旅途。留日前，她已在南京担任了一所学校的校长。赴日费由于是革命党人送给一部分，所以从神户下船，以至去东京，一路上她都仔细地观看与费用有关的情况。路上，她吃一顿饭，“一个好看极了的

^①该书由岳麓书社 1987 年出版。

大碗，有盖子。里面大半碗热饭，上面有炸虾或有炸的素菜，或是鸭蛋加点卤子，碗盖上面有两块黄萝卜，只要三毛五分钱。还有一种冷饭，用海带卷起来，每份六个，二毛五分钱。”“那时，日本的生活每人只三十元一个月连吃带住在内就可以了。”

到达东京，有朋友已给租下房子，她“用了一个（日本）下女，五元一个月，打扫和煮饭”，“又请了一个教日本语文的先生，每天来教四点钟，从一点到五点”。

杨步伟说：因恐钱不足的缘故，我就拼命地学日本语文，争取“可以早点考入女医学校，因为中国政府定的凡考上五大学校的，政府一定给官费的，中国政府在那个时候派的中央监督住在东京，只要入了学，就可以直接去请官费，中央监督申请到教育部，教育部再调查分派各省出钱，归中央驻日监督发给学生。”

得到官费前，她“连吃带用二十五元一个月，六张席子的房间，一切都不管，只念书而已，觉得舒服多了。可是吃的真坏，常常加点鸡蛋吃吃。”

杨步伟从1913年10月学日语字母起，次年4月“就正式考入学校了”，按常规她已具备了申领官费的资格，但是怕驻日公使馆的人记得她在国内时参加了反袁的二次革命，“不敢去请官费，所以换了自己的首饰紧紧的用。”

过了半年，杨步伟的朋友李贯中从中国回来了，“她是一个老日本留学生，音乐家的女儿，以前在日本随她父母住过三四年的，以后又在日本上中学，……她回国去了两年，请到了河北省官费，又回来学医。”

李贯中让杨步伟不要正式上课，先在预科读一年，好两人一同毕业，作为回报，她要包给杨步伟办官费。杨步伟说：有一天李贯中“到中央监督处（监督名言微）领官费就提起我的名字来，问能不能请官费？监督就说可以，她既已入正科了，并且我听说她是一个很有资格的，杨府上祖老太爷我都知道的，你叫她来请好了，安徽省一定可以批准的，叫她请六年的好了。……我当晚就写了请求书前去。”

“两个月以后（九月十四号），官费下来了，并且还补了以前三个月的，每月三十六元，学费归政府给。”

以上就是一个自费生——杨步伟，到日本后申得官费的大致经过。

第 三 节

留日学生在日本的爱情与婚姻

1. 夫妻携手日本行

留日运动兴起后的几十年中，对留学者出国前的婚姻状况未有过限制，加之对留学者年龄亦无严格的限制，故而有相当一些留学生在赴日前已经完婚，成了有家室之人，既有家室就难免有人会偕眷前往。他们有的是为了在日本留学期间不弃家庭生活，有的是为了双双赴日共进学业。然而，凤凰双飞者，其结果却大有差别，有的分离，有的恩爱，有的互勉。

1905年1月，留日的秋瑾回国一行，返绍兴省亲，兼以筹措学费。行前，她在东京遇一蔡姓女同学，被留日的丈夫所弃，无家可归，生活困难，秋瑾顿生怜悯之意，筹款将其带回

了国内。秋瑾在给大哥秋徕续的信中说：“妹因师范尚未开班，大约四月开学，暑假不放，故于近日归家一行。并携一蔡姓女子，因其人为其夫所弃，人复老实无用，非妹援手，实无依靠，故在东京为其筹款归国。凡人做事，必须全始全终，别处妹无立足地，故带至绍地，使其人新开之手工学校，一年后可自食，则择一家嫁之，妹须可卸肩。”^①

蔡姓妇女系不幸者，相反，有的夫妻双飞日本者，却相濡以沫，夫妻恩爱，同甘共苦。后成为中共“六大”代表、中共烈士的毛简青，即是偕妻前往日本留学的。

1913年，22岁的毛简青婉拒了同学要他去考长沙岳麓高等师范的劝告，偕妻子吴淑坤，随同几位同学赴日本自费留学。大约1915年，他考取东京帝大预备校仙台第一高等学校，取得了官费，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

留日期间，毛简青学习刻苦，每晚读书到深夜或鸡叫，天亮又将同学叫醒，一起早读。

毛简青在日本长达9年的留学生活，既注重俭朴，讲究情操，又富有风趣。他有件冬夏两用的日本和服，冬天，填上棉花当棉袍；夏天，取出棉花当夹衣。同学们笑他：“你的经济学真是学到家了，连穿衣也这么讲经济！”他笑着说：“生活上艰难点有好处，把节下来的钱买书，不是更有意义吗？”同他住在一起的同学，开始大家还轮流做饭，上街买菜，后来这些事，包括同学的衣服浆洗，全由他妻子吴淑坤给包了，让同学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他对吴淑坤很好。按照帝国大学的规

^①《新发现的秋瑾书信》，《浙江日报》1962年7月15日。

矩，学生必须剃光头和穿制服。他虽一身东洋学生打扮，但总是和身着中国女装的吴淑坤走在一起，坦然自若，不怕一些日本男女的围观和嘲笑。有人说他“洋学生配小脚女人是奇闻”，而他却说“这有何奇怪？中国人配中国人，穿中国服装，才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伴侣！”有次，他和同学一起去游泳，吴淑坤也去了，但不敢下水，只在海滩边走走。他看淑坤这个样子，笑着说：“中国的小脚妇女，应到东洋的大海中锻炼一下。”话音未落，他一把将淑坤拉入水中，使得淑坤一声惊呼，淹没在海浪之中，还呛了几口海水。当他扶着淑坤走上沙滩时，大声笑着说：“这也是中国妇女的一次革命啊！”^①

双飞赴日，互爱互勉的，廖仲恺与何香凝要算最典型的。

1897年10月，香港豪商之女何香凝与旅美华侨之子廖仲恺在广州结婚了。婚后，他们在“双清楼”过了四五年情好甚笃的生活。忽有一天，廖仲恺对妻子说：国家危险至此，我们岂能坐视，日本留学界朝气蓬勃，志士云集，我也想东渡求学，惟学费无着，奈何？将来满清一定要败亡，一定被新的人起来代之。父母已逝，兄在满清做官，没有人资助，如果我有一千元，就去了。

何香凝慷慨变卖嫁奁，冲破家庭阻力，全力支持。

1901年1月，廖仲恺惜别妻子，先行赴日。两个多月后，何香凝变卖家当，追随丈夫而去。留日期间，二人互相鼓励，携手共进，双双成了坚定的革命者。

到日本后，二人都从补习日语开始，他们不在同一个学校

^①《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六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6页。

学习，也不经常居住在一起，但爱国之心使二人都自觉地参加了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并常一同前往，如参加1903年4月29日在东京锦辉馆举行的留学生拒俄会议，参加广东籍留学生拒俄集会，向军国民教育会捐款。捐款的留学生约500人，多是捐5角、1元、2元的，何香凝捐3元，廖仲恺捐5元。在其后的反对取缔规则运动中，二人态度鲜明，斗争坚决，积极活跃。

二人留日时，孙中山正流亡日本，领导中国革命运动。1903年9月的一个晚上，二人到神田神保町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留学生集会，意外地听到了孙中山在集会上的演说。革命领袖那伟大的气魄，坚定的信念，深深地打动了二人的心，灵魂像被攫住了一般。会后，二人专访孙中山，面听教诲。从此，二人走上了献身民主革命的道路。他们按孙中山的嘱咐，在留学生中进行广泛接触和宣传活动。孙中山离日赴檀香山后，二人遵指示组织留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孙中山说：同盟会成立，他二人“多有力焉”^①。

1905年，孙中山重返日本，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寄居他二人寓所后，为安全计，二人辞退日本女佣，因此，所有的家中事务全都落在了何香凝一人肩上。何香凝回忆说：“我最感困难的，倒是在吃饭上，因为我自己不会烧饭，不用下女，怎么办呢？还有，那时候廖先生乘着暑假又回广东替我弄钱款去了，到外面去弄吃水的事情就没有人能够帮助我——当时日本的东京也尚无自来水呢——这些都使我有觉得为难了。既

^①《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00页

而，我在心里又想：不会烧饭，就马上跟工人学，为了革命，夫人学婢子，也算不了什么。但是，吃水要到外面去弄，自己实在有些儿来不了。我这样想了，就对仲实说：‘另找贷家搬开是可以的。但是仲恺一时不能回来，每天的吃水，倘然不用工人，我自己实在没有办法。’仲实就满口答应着说：‘请你快找好房子搬吧，吃水的事，我来替你弄就是了。’仲实既这样应承，我就叫他回报孙先生，找好了‘贷家’便搬。仲实去后，我就计划搬家的事，第一件大事，是要先学会了烧饭，做小菜！在平常，我是‘饭来张口’，女工人弄些什么，绝不闻问的。现在是不然了，我细心看她淘米，下锅，添水，烧火。米的多少，水的份量，火烧的时间大小，我都在注意。至于做菜呢，日本的法子，简单得多了，看几次便会的。不两天，我就觉得有把握了。工人不懂得我何以忽然对于烧饭这么感兴趣，那知我的用心，是在学了她的手艺便要请她走路呢？……

搬进神田的‘贷家’，我一面要上学，一面要自己料理日常生活，是很觉得忙碌劳苦的。我以前在父母跟前作小姐，是有人服侍我。和廖先生结婚，还陪嫁了两个丫头跟随我；突然过着学生兼女工人生活，总是不惯的。平常，是只顾自己的功课，别的粗笨琐碎事情，都是女工人的。现在可好：每天起来，第一须先收拾铺盖，脸水也得自己预备。下了课回来，买小菜，生炭火——那时日本也尚没有瓦斯可用——，煮饭，做菜，忙了一通，吃过了，还要洗刷收拾起来。那时候，日本也还没有电灯，点的是煤油，擦灯添油，颇为麻烦。尤其不便的是洗衣服，水又是艰难。虽说仲实天天去替我提几桶，但有时用完了，还得我自己跑到井边去弄来。可是，我有一个信念，

就是：我的吃苦，是为中国革命！一想到这里，随便什么罪，我就甘心忍受，乐之不倦了^①”。

1906年至1909年的3年中，廖仲恺三次接受孙中山的委派，中断大学的学业，只身归国从事秘密活动。他先后在广州、天津和吉林等地，进行反清革命活动。时值清王朝临近覆亡的前夕，国内斗争尖锐，局势紧张，潜回国内危险甚大，而他毅然前往，义无反顾。

何香凝对丈夫的壮举，以实际行动大力支持。她要读书，要亲自参加革命活动，还要抚育在日本出生的女儿梦醒和儿子承志。最困难处，她不得不于1908年4月28日忍痛退学，半年后才又入学读书。

1909年夏，廖仲恺最后一次潜回国内前，31岁的何香凝作诗惜别：“国仇未复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取中华史上名。”

1911年2月，二人结束留学，偕一双儿女，双双飞回国内。此后，二人革命弥坚，感情更笃。

说及留日而结姻缘，汪精卫与陈璧君属此中的一对。1904年9月，汪精卫留日，后追随孙中山辗转各地投身革命，1906年在槟榔屿与陈璧君相遇后相爱。1908年，陈璧君赴日留学，二人再相携活动，日后于1912年结婚。可以说，汪、陈结合亦属留日姻缘。

^①《双清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3—214页。

2. 禁止通婚难奏效

异族通婚，两国联姻，是人类社会交流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在一定情形下，这一趋势被遏制，也是常有之事。

在留日运动史中，异族通婚被遏制的情形，也出现过。

大概是为了保证留学生能顺利完成学业，中国政府曾制定过禁止留学生与异族（日本人）通婚的规定。

留日运动发生之初，尽管中国政府为留学生制定过一些政策，但限制通婚问题没有被列入其中，只有当留日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这种规定才应运而生。

留日运动史上，禁止留学生与外族人通婚问题，虽没有列入正式管理规程之中，但明令禁止者却发生过。

第一次：1910年4月24日，禁止官费、自费未毕业生与外国人订婚结婚，限制的方法为毕业时不给证明书，官费生并追缴学费，其理由是：与外国人订婚结婚会废业，是耗资忘国。

这一次，学部的奏章称：“近来东西洋游学生时有与外人结婚之事，此事在寻常侨民，本可不必禁止。惟在游学生则当修业之际，家室之累重，即学问之念轻，一弊也；外洋女子，习尚较奢，而游学生之学费有限，贍养既多所耗费，即学资易致不给，二弊也；游学生既娶外国妇女，易有乐居异域、厌弃祖国之思，则虽造就成材，而不思归国效用，亦复何裨于时艰，三弊也；查东西各国结婚之期，本皆在学成以后，未有学未毕业，先求家室者。况乎中国派往之游学生，尤当刻苦求学，岂容迁就宴安。臣部现拟咨行东西各国出使大臣，嗣后游

学生未毕业时，为禁止其与外国妇女订婚及结婚，违者毕业时不给证明书，官费生并追缴学费，以戒怠荒，而励进修。”^①

第二次：民国七年（1918）二月，规定限制官费生与外族人通婚。

教育部的通咨中云：留学生与外国人结婚一节，于国家于个人均有损无益，嗣后如再有官费生与外国人结婚情事，应即停止官费，以儆怠玩，而肃学风。

第三次：1918年7月31日，对官自费生与外国人通婚皆禁止，对官费生尤严。

教育部的通咨中云：留学生与外国人结婚流弊滋多，其在官费学生，尤属不合；嗣后有身隶学籍，来馆请给证书结婚者，径予巨斥，如在官费学生，并请咨报告本部，一面就近咨照外学生监督，加量惩处，仍有本部训令各学生监督，详察前令申令禁止。以后有官费学生私犯令章者，切实开除，以昭炯戒。

在清末，在民国，禁止留日学生与外国人通婚的规定都有制定，但实际的情况，却是有令难行，有禁难止，其原因何在？恐怕最根本的一条还在于：在一般的情况下，人性是走向世界的通行证，爱情是无国界的大问题。

即使在数次规定之后，中国留学生同日本人结婚者有之，结婚之后留日不归者有之，结婚之后共同回中国者有之。

一份关于四川合江县清末留日学生概况的材料中称：“合江留日学生与日本女子结婚的也有，如当时在东京明治大学求学的陈

^①《大清法规大全》续编，卷17，《教育部·留学生》。

纶（字元畅）便与一位日本女子结婚，后来一道回到中国。”^①

一个合江县在清末便有中国留学生与日本人通婚的事情，在全国、在整个留日运动时期，其情况便可想而知。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人与日本人通婚的情况，虽缺少系统的统计、细致的归纳，其情况也少有人研究，但就从零星可见的材料，还是可以对其进行大略归纳的。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留日学生与日本人通婚（包括实际婚姻，或者称之为婚姻生活）的，其特点可以初步归纳出以下几点：

第一，基本形态呈现为中国男留学生与日本女性的婚姻关系。这不仅是由于中国女留学生历来人数极少，还因为在留日运动史上的每一个阶段，日本都曾以侵略、霸权的形象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中国留学生与日本民族之间总有程度深浅不同的民族隔阂，甚至情绪对立、乃至敌对的状态呈现，这种敌对、对立的情绪在中国方面来说，女留学生表现的更为明显。由此而带来的是女留学生难以适应日本人的生活。

第二，促成中国留学生与日本人结成婚姻关系的主要因素体现为偶然性。赴日的中国留学生，固然有浮泛而去、游玩而往、无所事事者，但留学生的绝大多数，是为学习而去、为掌握本领而往者，他们或专致学习，或立足日本而关注中国未来之发展，其所生活的范围有限，其所活动的圈子较窄。他们在专门招收中国学生的学校中生活，他们在日本的普通学校中苦读，即使一次又一次的社会活动实践，也仅限于中国留学生的圈子范围，因此，他们所较有机会接触的，都是在偶然情况下所遇到的日本女性，

^①廖士元：《清末合江的留日学生概况》，载《合江县文史资料选辑》，第86页。

比如女佣、护士、模特、房主等等。因此，如果与日本女性发生恋情，也多是产生于这个范围。

第三，恋情表现方式为多样性。频送秋波、暗生恋结者还谈不上是婚姻，就是在婚姻（或事实婚姻）中，也有多种表现形式，其最主要的形式不外乎两种，一是名正言顺，随中国留学生归国，过真正的夫妻生活；一是珠胎暗结，露水夫妻。

前一种情况，可不必多言，后一种情况，可以戴季陶情况为例。1996年8月22日至24日，台湾《联合报》连载《千山独行——蒋纬国的人生之旅》，该文是蒋纬国接受记者汪世淳采访的口述传记，当属绝对真实。文中披露：戴季陶留日时，虽然偕元配夫人钮有恒同去，还有了儿子安国，但他仍结识了当地护士重松金子，金子怀孕，于1916年11月11日产下一子。戴季陶知妻子性情暴烈，知道则会闹翻天，便将孩子送与好友蒋中正（介石），蒋视孩子为己出，为之取名纬国。蒋纬国在自己将迈入80大寿之际，首次向世人公布了自己的身世。身世问题，蒋纬国原虽知晓，但因蒋介石与宋美龄待他如亲子，就一直没向外界披露。

留日学生在那种特殊的“情场”上，也有劣话传出，如一本书中载：“北洋某亲日大老之孙，赴日留学，竟与日女同居，传染性病，痛苦不堪，遁回上海。日女追踪而至，叩门以孙少奶奶自居。当事人惧其声张，委托亲友斡旋，敲诈大量贍养费离去。该女回国登报征婚，自称有财产若干，为取信于人，并招待记者，说明存款来源，曾哄传于东瀛。”^① 此类事情虽不很多，但它会促使人们从多角度去看历史。

^①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第400页。

3. 回国厮守到终老

1906年6月，周作人、鲁迅与两个同乡结伴从故乡绍兴出发，经由上海去东京，开始了留学生活。

留日期间，周作人与日本女孩羽太信子结婚，婚后二人在日本大约生活两年，二人回到中国，共同生活50余年，直至信子仙逝中国。

解剖这一个例，或许对释读留日学生在日本的爱情与婚姻问题有所裨益。

第一个问题：羽太信子的身世及二人相识。

日本女孩给周作人以第一次强烈印象的，不是信子。

周作人初到东京的那个傍晚，来到鲁迅寄宿的本乡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鲁迅是离日接周作人来留学的），应声而出一个十五六岁日本少女，她是馆主人的妹子兼作下女工作的乾荣子，女孩的一双赤足在屋内走来走去，使周作人联想起好多，诧异过后，周作人留下了一缕温馨。对这一次的感受，周作人在后来一直忌讳莫深，仅在一些文章中留下蛛丝马迹，有一点则是明确的，30年后他作《日本之再认识》，还津津乐道日本的“赤足之美”。

1908年，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相识。

信子的父亲羽太小泽，是体力劳动者；母亲没有正式的职业；弟弟重久、妹妹芳子和福子都年少——这是一个贫困、勤劳、人口众多的家庭。

冬季，周作人和鲁迅、许寿裳一起住进了西片町十番地丙字19号。有一位脸盘圆圆、做事利索的贫穷姑娘，为住客们办理伙食，她即为羽太信子。过去的一些记载说她是房东的女儿，日本

学者木山英雄在1978年出版的《北京苦住庵记》中否认了上种说法，说信子仅是作为“供应饭食的人”来到那里的^①。

羽太信子时年21岁；周作人23岁，也是三个留学生中最年轻的。信子对周作人似乎特别有好感，二人日益亲近。

第二个问题：结婚及婚后的生活。

周作人向鲁迅表示要与羽太信子结婚，鲁迅同意，并表示在经济上支持他们。1909年春，鲁迅对许寿裳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周作人的字）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②

（一）结婚及入籍。

1909年6月，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结婚，同时，羽太信子脱离日本国籍，加入了中国国籍。当时，因婚嫁而改变国籍，不论是就日本政府还是中国驻日使馆，都很好办理，仅履行下手续即可以。

（二）经济来源及状况。

二人婚后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周作人的官费，二是鲁迅的接济。二人结婚，鲁迅即于8月离日回杭州教书，自此每月都给周作人寄钱。鲁迅的薪水不多，绍兴家里人不敷出，寄给周作人的钱，主要靠变卖家产而来。

靠变卖家产也难以支付周作人在日费用的情况下，鲁迅只好催二弟作人回国。1911年3月7日鲁迅致许寿裳信中说：“起孟来

^①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51页。周作人对婚姻问题所谈甚少，故说法有别；因此，本节参照多种周作人传记、回忆资料及《知堂回想录》等。

^②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三联书店1949年，第36页。

书，谓尚欲略习法文，仆拟即速之返，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鲁迅信催无效，于1911年5月赶到日本，周作人遂偕妻子返回国内。

周作人在日婚后的经济状况，似不甚拮据，《知堂回想录》中录下他1910年写的一没有题目的短文，是难得的一篇涉及在日期间婚后生活的记录，其心情甚佳，文中所提“保坂氏媪”，好像是保姆或女佣。其文如下：

“庚戌秋日，偕内人、内弟重久及保坂氏媪早出，往大隅川钓鱼。经蓬菜町，出驹入病院前，途渐寂静，隘但容车，两旁皆树木杂草，如在山岭间。径尽忽豁朗，出一悬崖上，即是田端。下视田野罗列，草色尚青，屋宇点缀其间，左折循崖而下为大路，夹路流水涓涓然。行未十丈许，雨忽集，以雨具不足，踌躇久之遂决行。前有田家售杂品，拟求竹笠，问之无应者。重久言当冒雨独行，乃分果饵与之使去，而自先归。遂至田端驿，乘电车至巢鸭，欲附马车而待久不至，保坂媪请先行。未几车至即乘之。意媪去未远，留意观之，见前有人折旗负包而行，呼之果媪也。令同乘。至铃本亭前下车，雨已小霁。归家饥甚。发食合取团饭啖之甚旨，其味为未尝有也。未几雨复大至，旁午重久亦返，言至川畔而雨甚，因走至羽太家假伞而归，所持饵壶钓竿，则已弃之矣。是日为月曜，十月顷也。”

二人婚初，仍住西片町十番地丙字19号，但还是出于经济考虑，于1910年11月搬到了留学生极少的麻布区森元町，那里房屋简陋，租金便宜。

（三）结婚对周作人的影响。

他原住的本乡区，是知识阶级聚住的地方，后迁的麻布，是平民住的地方。周作人说，在本乡，似乎是住在二等火车上，各

自摆出绅士的架子，彼此不相接谈；在麻布，大家都像是火车中的三等乘客，看见就打招呼，随便地说话。因此说，周作人婚后更多地从实际生活中了解了日本社会，尤其是下层社会。

周作人的右邻有一个裱糊工的女儿，与后母不和，渐渐流为“不良少女”，每天午后，便有男子吹口哨召她，去附近的公园会合。晚上父亲大嚷大骂，第二天她仍照旧。她对人说：“你不知道在外边玩耍是多么有趣呢！”市井琐事俗事，让周作人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日本社会。

结婚还促使周作人开始注重学习日语。鲁迅在时，涉外事务全担下，走后，周作人不得不事必躬亲，从书本，从生活中，他学习了更多的日本语言。

第三个问题：归国后的生活及结局。

周作人归国，偕信子同行。风雨飘摇几十年，二人相守至终。对此，周作人有个总结。

1961年4月8日，信子病逝于北大医院，享年75岁。半年后，周作人在日记中写下了一段话：“余与信子结婚五十余年，素无反目事。晚年卧病，心情不佳。以余弟兄皆多妻，遂多猜疑，以为甲戌东游时有外遇，冷嘲热骂几如狂易，日记中所记即指此也。及今思之皆成过去，特加说明并致感慨云尔。”^①

对周作人与信子的婚姻关系，周作人的传记作家钱理群有个较全面、中肯的分析、阐释，他这样说：

“周作人在恋爱、家庭生活中是有难言之隐的。在这个问题上，几乎集中了周作人的众多矛盾。一方面，在理论上，他持最

^①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570页。

急进的开放的观点，在中国首先确立‘爱情结合，结了协同关系；爱情分裂，只须离散’的原则。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却认为在女子不能独立的社会里，即使因为无感情，男方提出离异也是不应该的；他从这个观点出发，对于鲁迅及周建人对婚姻关系的处理方式，都持保留与批判的态度。在这一点上，当信子指责周氏兄弟‘皆多妻’，周作人觉得是难以反驳的。但在另一方面，他与信子的关系，虽然并未达到破裂的地步，但却也有不够和谐的地方与时候，他也因此始终不能忘怀年轻时的情人，特别是当年东京留学时伏见馆主人之妹乾荣子，在时隔30多年后仍出现于梦中。但他对于乾荣子确又属于‘单相思’，始终是梦中的爱恋，实难说是真正的情人。因此当信子猜疑甲戌（即1934年）东游时有外遇，周作人虽明白这纯属莫须有，但因为确有对乾荣子的梦恋，又使得周作人在反驳信子时不能做到绝对的理直气壮，这其间的苦衷是非外人所能体会的。再加上周作人性格的软弱与顺和，在与信子相处中，每有矛盾，大都采取忍让态度。他们‘结婚50余年，素无反目’，与此大有关系。周作人却也因此遭到了兄弟乃至母亲的不满与批评。但周作人性格中还有软中有硬的一面。他的忍让也是有限度的。因此，当信子由于性格、心理与生理的原因，无休止地‘发作’时，自会引起周作人的反感，以至产生怨恨。但当一切由于信子的病逝而结束，痛定思痛，周作人又会想起信子生前的种种好处，而产生无限追怀之情”^①。

^①钱理群：《周作人传》，第570—571页。

4. 半路分离情犹在

郭沫若留日期间的婚姻，颇有特点，其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一，相识于偶然，同居前已有妻；二，中日两国间流徙，生出诸多磨难；三，一方遭遗弃，一方有新家。

从郭沫若与安娜的由风雨同舟到各奔东西，可以看出另一番模样的留日学生的爱情与婚姻问题。

他俩的这段情缘可以展示如下：

一、留学期间的生活。

（一）由相识到同居。

郭沫若于1914年初抵日留学，1915年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1916年8月初，郭沫若往东京圣路加病院为一位去世的朋友料理后事，遇在此做护士的佐藤富子。佐藤富子出身于旧时武士之家，父亲是牧师，她的父亲、祖父都到过中国，家中藏有中国古书，因此她从小就喜欢中国。富子毕业于仙台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堂尚纲女校，立志将一生献给慈善事业，不顾父母的反对，到圣路加病院当了看护妇，想学习产科。

富子的同情心，吸引了郭沫若；郭沫若的风度，征服了富子。二人一见钟情，分别后飞鸿不断，每周都有三四封信往来。终于，这一年的12月，郭沫若专程去东京接富子来冈山，二人正式同居了，也即实现了事实上的婚姻。

（二）来自周围的压力。

首先，为这婚姻，二人都有所牺牲。同居前，郭沫若在国内有妻张琼华，婚姻关系并未解除。他的家人极力反对富子出现，直到次年富子生了男孩，紧张关系才稍有解除，家人给予了默认。

富子的家人更是极力反对她的选择，终未予宽恕，断绝了关系。郭沫若给富子起名安娜，二人开始了生活。

其次，1918年间，留日学生中掀起反对《共同防敌协定》斗争，相继罢课，又派代表回国请愿宣传。郭沫若参加了罢课，然而由于妻子是日本人，引起了一些留学生的误解，勒告与妻分离。在以后的留日岁月中，类似情况也难免不出现。

（三）困顿的书生生活。

精神的渴慕代替不了物质的要求。同居后，安娜曾入医学校读书，因经济拮据、有孕在身，复回家中。二人靠留学生官费维系生活，最困难时，郭沫若变卖使用过的教科书，安娜节衣缩食，偶尔会有来自朋友、同学的援助，成仿吾邀二人搬去同住可免去房租时，安娜竟至泪花闪闪。

郭沫若考入九州帝国大学，二人迁往福冈。1921年，郭沫若为与朋友筹办杂志离开福冈，至6月返家时，妻儿已被房主逼出搬入新居，长子和儿蓬头垢面，令郭沫若心酸泪下。

二、返回中国的生活。

（一）安娜第一次中国行——依然困顿的生活。

1923年3月，郭沫若在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断断续续读四年半，终于毕业。4月2日，二人偕在日本出生的三个孩子回到上海。

郭沫若倾注于文学事业，经济依然甚廉，孩子衣食和教育费用难以筹措，为减轻丈夫的负担，安娜决定回日本产科医院实习，然后重来上海。1924年2月17日，安娜带孩子离开中国。

（二）安娜第二次中国行——一人独撑的生活。

1924年11月16日，安娜随已赴日本的郭沫若离开日本，偕三个孩子再折回上海。

此后不久，郭沫若投身革命活动，奔波不止，飘忽不定，安娜则只身带三子，拼命苦撑，艰难地维系家庭。

1927年11月初，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郭沫若，秘密潜回上海，始得全家团聚。

三、流亡日本的生活。

1928年2月27日，郭沫若与先期抵日的安娜、孩子在神户相聚，开始了大革命失败后的10年亡日生活。

抵日后，他们来到千叶县市川市居住。郭沫若亡日，是以“吴诚”的化名入境的。此人入境后便即消失，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从种种线索他们怀疑“吴诚”就是郭沫若。终于有一天，他们逮捕了郭沫若。安娜心急如焚，恳求人斡旋，郭沫若方得释。

释出的郭沫若，生活并不自由，常常有警察跟踪，连同安娜在内，都感到生活中缺少安全感。

四、分离之后的生活。

（一）二人分离。

1937年7月25日凌晨，郭沫若悄然一人离开安娜和孩子，返回国内投入了抗战斗争。

郭沫若回国不久，即又有了新夫人于立群。

郭沫若离开日本，标志他与安娜的夫妻关系即已结束。

安娜在日本带着孩子（和夫、博孙、佛生、淑子、志鸿）在日本苦命度日。为了向日本政府申请去中国，回到丈夫身边，她向当局提出了与郭沫若结婚的申请，获得了膨准。从1947年3月起，她失去了日本国籍。

1948年春，安娜得悉郭沫若的消息，便长途奔波去香港。她见到的除了郭沫若，还有于立群及他们的孩子。安娜知道一切已

都无可挽回。

(二) 安娜定居中国。

1949年，安娜到大连定居，以“郭安娜”的名字加入了中国籍。其子女也被其陆续召来。

1974年春，郭沫若因病入北京医院，郭安娜以80岁之高龄前去探望。这一次，成了他们的诀别。

1994年8月15日，郭安娜病逝上海，享年101岁。

像郭沫若与安娜这样的留学生姻缘，不知是喜，还是悲。

第 二 章

民国前期留学日本运动 风波迭起 (1915—1919)

第 一 节

赴日留学道路上的风风雨雨

1. 反对“二十一条”的英勇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就急于建立在中国的支配地位。1914年下半年，日本一方面夺取德国在胶州湾的租借地，一方面加紧制定全面的对华要求。9月29日，日本元老和大隈内阁开会决定了对华要求的基本内容。此后加藤高明外务大臣指示外务部把军部等各方面的意见综合在一起，三易其稿，

最后归纳为五号二十一条要求。在这基础上，11月11日本内阁会议制定了对华交涉方案。13日，日本驻华大使日置益应召返国述职，拿到了二十一条的文本和实现这些要求的指示。

1915年1月18日晚，日置益拜会袁世凯总统，面递二十一条要求。若满足日本二十一条要求，无疑于是变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但袁世凯为了赢得日本政府对他称帝的支持，与日本政府进行了谈判，就个别条款向日方提出了疑议。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之时，即告袁世凯要保守秘密，日本方面担心其内容会引起其他列强的不满，引起中国人民的抗议。但消息还是很快传开了，该消息在一些报纸披露后，中国人民震惊、气愤，同时也引起了留日学生极大反响。

2月11日，留日学生总会在东京召开大会。关于这次大会的情况，当时的报纸曾有详细报道，转录其一如下：

自日本对我提出要求条件二十一条以来，留学生中因多有所闻，然莫测其真相，顷见京、沪各报露载十余条，莫不引为亡国大痛。昨十一日，日本纪元节放假之日也，因假神田美士代町青年会，开留日全体学生大会，莅会者约三千人。……始由临时主席陈君报告开会原因，略谓本会之开，其详不待赘述，大概人人心目中皆已明之。惟今日开会时间，又遭警察短缩，所有一切进行方法，不能详细讨论，而本会又不能时时招集，势不能不求有效果。本会由筹备会发生之时，已经屡次磋商得办法大纲五条：（一）电政府

力拒日人要求，并请宣布该条件内容；（二）发布印刷物，敬告全国父老；（三）自国民立脚点，对于友邦发表国人所持之态度；（四）派遣代表回沪，组织暂时机关，联络海内外爱国之士，合筹对外方法；（五）筹备全体学生回国之事，以备有事时不致临事张惶。以外，尚有种种细目，兹不详述。如得大众赞成以上各条，再付筹备会继续进行，其细目亦自陆续刊出。随即逐条表决，一一举手赞成，嗣后有多人演说^①。

大会上，公推李大钊为文牒干事，负责起草通电。李大钊用几昼夜的工夫，写成了七千余言的《警告全国父老书》。文章痛陈了甲午战争以来列强瓜分中国的情况：“日人挟其战胜之余威，索我辽东半岛”；“《卡西尼中俄密约》之结果，旅大租于俄，广州租于法，威海租于英，胶州租与德。意大利闻而生心，亦欲据我三门湾。”庚子之后，帝国主义更如争食之饿虎，强行瓜分中国，“英之于西藏及长江流域也，俄之于外蒙、伊犁也，日之于福建、南满也，法之于滇，德之于鲁也。”

李大钊指出：“凡兹条款，任允其一，国已不国”，“此日本乘机并吞中国之由来，吾人所当镌骨铭心，志兹深仇奇辱者也。”^②并呼吁全国人民一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祖国的危亡。

^①《中日交涉中之留日学生大会》，《时报》1915年2月21日。

^②《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5页。

通电写成后，油印散发，流传很广，对反日爱国运动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运动既起，留日学生大批返国，参加于国内的抗议运动。

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5月9日，袁世凯除个别条款外，答应了日本的侵略要求。对此，中国人民表现了极大的愤慨，把5月7日这一天定为国耻日。

当时正在东京一高特设一科读书的郭沫若，就是于5月7日这一天随大批留学生返国的。行前，他折卖了书籍以及锅碗等用具，甚至还做好了参军的准备。只要中日一宣战，他将立即投笔从戎，为此，他写了“哀的美顿书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向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蛟上大堤。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诗中表现了誓死战斗的决心。

杨步伟留日期间，正遇中国留学生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当时她正处于实习期，对袁世凯政府也抱有一定的幻想，她没有回国，但她以亲身的经历记述下了那场斗争：日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以后，“我们中国学生全体罢课（其时留日学生只东京就有七千多人）回国，并组织铁血团谁要不遵守就暗杀他。我那时反对如此办法，我说我们出来留学是为的回国后给国家服务，现在我们政府无准备，革命不久，一般人民对于爱国热情还未彻底，对外就宣战恐无大利。我们现在废学回国也恐无补于国家，我并不是给我们少数要毕业的人争。其时实在因为我和贯中两个人在大考已完了，过后正在三井医院（现在叫泉桥医院）实习治疗病人，和给各科病人试验手术正得法时，若回中国一时绝对没有那么些病人来给我们做试验品。我

何不用日本人来给我们当试验呢？所以我们宣布不到断绝国交时我总打算忍辱含羞暂且不走，多得着一点总是我们的益处。每日大批的学生回国，和给恐吓我们的信，我总等着不动。结果我们一班里走了十一个人，只存了四个，李贯中、我、和冯启亚（就是我丈夫的姨母，我以后认识我丈夫就是从她来的），还有朱徽，她是比我们高两班，因为常回国的缘故，所以同我们一班毕业。医学校门前都有人把着门，一见我们就演说爱国的热忱，我总笑笑的回他们我的热心也不后你们的，将来可以看见的。我们一早就到医院，同学们见了我们也冷笑，问我们为什么不回国、不爱国？我当时忍无可忍，我就反过来说我想嫁日本人，所以不回国了，真有人信呢。晚上回家，就不到学校去，因为那时学校的功课也完了，临床诊断虽然每日有，可是我们在三井医院更多更好，所以我们也不用去了，如此下去，只一个月的工夫，政府方面的交涉也算忍辱保留，学生也陆续的回到日本，等到我们毕业时我们四个人发文凭了，其余再回来的四个人学校不给文凭，非留她们一年级不可，其实她们的理论课都完了，实习的分数和临床照例可花十元补考的，可是学校例外的不准，说你们要爱国就应该牺牲，所以使人更恨他们。（我对于国际上的关系，是这样想，一个人对他本国的爱国举动，就是仇国也应该敬重他的，你可以定他的死罪，你不能说他不好。）因为学校对我们那样，我们恨极了。毕业日没有去拿文凭参加典礼，都是以后他们寄到监督处的^①。”

留学生陆续返回日本，这场反对“二十一条”的反帝斗争

^①杨步伟：《一个女人的自传》，第149—150页。

基本告一段落，但是心中的耻辱与仇恨，不会随之抹去，创伤不会平抚。6月，李大钊再编《国耻纪念录》，在其上发表了《国民之薪胆》，号召国民以卧薪尝胆的精神，努力奋斗，光明“惟待吾民之意志造之”。^①

2. 为护国战争做出重要贡献

“护国战争，再造共和”，不仅是20世纪早期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同留日运动史有联系的一件大事。

以云南起义为标志的护国战争的领导者、参与者、声援者及其他推动者，不少都是留日归国人员或是正在留日的人员。据史学家讲，这场战争是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在孙中山中华革命党和海内外各阶层同胞反袁反帝制斗争的推动下，联合以黄兴为旗帜的国民党人和西南地方实力派唐继尧等共同发动的，其中尤以梁启超和蔡锷起了主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②。如果这一论断是准确的话，黄兴、蔡锷、唐继尧都是留日归国人员，再加上其他留日归国人员以及正在留日的人员，那么，就可以看出，留学生为护国战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护国战争的酝酿阶段，返国的和在日的留学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酝酿阶段，蔡锷是重要人物之一，他回国后从军多年，1911年成功地领导了云南辛亥起义，后在民国初期的政治舞台上几经曲折，终于决计讨袁，成为了护国主将。

^①《李大钊全集》上册，第140页。

^②李新 李宗一：《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下），第852页。

护国战争的酝酿始于袁世凯称帝。有意思的是为助袁世凯称帝策动“请愿君主”风潮的筹安会六君子中，除严复和刘师培，杨度、孙毓筠、李燮和、胡瑛早年都是留日人员。杨度生于1875年，湖南湘潭人，1902年4月留学日本，以自费入宏文学院速成科，黄兴、胡汉民、杨守仁皆是这时的同学。半年后回国。1903年，他以“康梁余党”之嫌，再到东京入法政大学速成科，在坂田町赁屋而居。1904年，他被推为东京中国留学生会会长，他的坂田寓成了留学界的人才荟萃之地，有“留学生俱乐部”和“湖南会馆”之称。孙毓筠是1906年以38岁之身东渡日本的，加入同盟会后回国策动新军起义时被捕。胡瑛于1905年渡日留学，后奉东京同盟会总部命回国策应萍浏醴起义时被捕。李燮和早年参加华兴会和光复会，留学日本后又加入同盟会。由这么一批留日归国人员发起筹安会，为复辟帝制推波助澜，可使人们看到留日归国人员所起的另外一种历史作用，而这种同进步相悖的作用在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也是发人深省的。

筹安会问世之后，袁世凯加紧了帝制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反袁势力积极酝酿，蔡锷于1915年12月19日抵达昆明，策动军事讨袁。

军事讨袁酝酿的同时，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广为筹款，多方鼓动，精心筹划，切实布置，策动各地武装进行讨袁斗争。也是留日学生出身的程潜等欧事研究会成员，在日本积极活动，布置回国发动讨袁斗争。

反袁斗争或明或暗紧锣密鼓进行之际，在日本的留学生利用各种形式遥相呼应。1915年10月10日，留日各界发起国庆

纪念会，他们在“启示”中痛切地说：“十月十日实我共和国武装首义之期，而前参议院议决国庆纪念之日也。方今国事阴霾，魑魅尽现，邪言恣吠，显行叛逆。呜呼！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行见与帝制啗衲之国庆纪念，必不复为若辈所容。……十余年间，捐弃生命者，趾踵相接；书报号召者，手腕欲僵。追念往迹，余痛犹多。……不谓托国非人，以暴易暴，变本加厉，四载于兹。国会横被取消，约法任意涂改；正士端人，悉遭屠杀；鸡鸣狗盗，尽作腹心；对外则辱国丧权，对内则头会箕敛；庸逾石晋，诈过新莽；爪牙遍布，谬说流传；假托筹安，实图僭号；视国家之危亡，若秦越人之不关痛痒，而惟妄冀一家为万世一系之帝王，不惜举国为环球列强之奴隶。呜呼！共和何辜，遭此夭折；民族何罪，供彼牺牲，至于此极也！同人等……订于是日自午后一时起，假东京曲町区大手町一丁目日本私立卫生会（即大手町停车场侧），开国庆纪念大会。凡我侨日各界爱国同胞，务祈届期早临，同襄盛典，充举行庆祝之心，励保障共和之志。”^①

同月，在日本神田举行的留学生侨属演说会上，李根源发表演说，主张“非革命不可。”^②

1915年12月，留日学生联合会发表反对帝制之决议，首先就表明：我留东学生全体认为，帝制问题危害国家，决心反对。其中指出：“顷者留日同学频得父老来书谓，当道对于国

^①《留日各界发起国庆纪念会启事》（1915年10月10日），《中华新报》1915年10月11日。

^②《申报》1915年10月19日。

体问题之选举，纯系利诱威劫，敢怒而不敢言。”最后说：“欲防患于未然，避危于无形，其必自取消帝制，始可断言也。”^①联合会“并代筹军饷”，^②开展宣传活动。

在护国战争的爆发阶段，留日学生进一步发挥了推动作用。

12月23日，云南发出反帝制电报，请取消帝制，惩办元凶，并限时答复。25日，云南宣告独立。27日，蔡锷发表讨袁告示。1916年1月1日，唐继尧、蔡锷联合发表讨袁檄文。护国战争爆发。

护国战争爆发后，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发表长篇对外宣言书，向世界人民揭露袁世凯的专制本质，呼吁各国理解和公正对待护国义举。宣言书说：“自海通以来，欧亚文明互相接触，益感旧式政制之不宜，非根本改革不足以巩固国基。少数先觉倡之于先，一般有识应之于后。二十年来民暗日开，根本改革之心理殆已普遍。所谓根本改革者，无他，即推翻君主专制而改建民主立宪制也。”“袁世凯自为总统以来，益利用其权力以图自私，弁髦国法，蹂躏人权，国体虽为共和，政体仍属专制。”“今则大多数之人皆已饱尝其恶辣之手段，而有所觉悟也。由此观之，袁氏不惟不能维持吾国之平和，反足以扰乱之；不惟为吾国之国贼，实世界之公敌也。”“今者维持共和之军，应国民之要求首义于云、贵、川、广，名正言顺，上气发

^①《留日学生联合会反对帝制之决议》，载《护国文献》下，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51页。

^②《李大钊传》编写组：《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页。

扬，吾人确信必能于短小之期间内得全国之响应，推翻袁氏之恶政府而建设真正之民主立宪制。”“综上所述，吾国人确信立国于今日，非顺世界之潮流，依多数民意，遵守真正之民主立宪，不足以巩固国基，而与我友邦周旋揖让于平和之中。而袁世凯其人者，实民主立宪惟一之障害。故袁氏之存亡，直接为吾国盛衰之所分，间接为世界休戚之所系。”^①

1916年1月，云南留日全体学生也发出长篇“通告全国父老兄弟书”，其中历数袁贼四大罪状曰：“今袁氏用人，排斥异己，专挠国栋，害我邦家，其罪一也。盗我四万万人之国家，为其一家一姓之私产，专制淫威，见于行政，而蔑有敢言者矣。其罪二也。博取帝名，葬送国土，较之刘豫、石敬瑭、张邦昌辈，犹不逮矣。其罪三也。减教育费以愚吾民，设筹安会以速帝制，只知以天下奉一人，不顾以一人害天下。虽不必率兽食人，而吾民已无衣食之资，虽不必焚书坑儒，而吾民已无求学之费。其罪四也。”^②最后呼吁道：“今滇军起义，川、黔、粤西、相继响应，誓杀袁贼，以拥护共和，保存民国。凡我各省同胞，海外志士，允宜闻风兴起，力为前驱，不可意怀观望，坐失机宜。”^③

1916年，蔡锷率护国军第一军主力与袁世凯的北洋军在川南广战累月，终于迫使袁世凯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存在83天的洪宪王朝即行垮台。但袁氏不甘退出历史舞台，

^①《留日中国学生总会对外宣言书》，载《护国文献》下，第952—956页。

^②《云南留日学生通告全国父老兄弟书》，载《护国文献》下，第957—958页。

^③《云南留日学生通告全国父老兄弟书》，载《护国文献》下，第957页。

企图威胁护国军停战议和，未得逞，于6月6日忧惧而死。其后，反袁势力迫使段祺瑞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从而使护国战争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

护国军出征期间讨袁斗争的一系列重要环节中，如取消帝制、停战议和、逼袁退位等等，留日学生亦采取了相应的斗争方式，从而有力地声援和推动了护国讨袁斗争的进展。1916年3月，留日学生总会发出“迫袁世凯退位电”，在全国一致迫袁退位的怒潮中，又增添了留日学生的一个浪头，电文全文如下：“袁氏谋逆，罪不容诛，乃复故逞狡谋，阴图恋栈，四邻腾笑，万众蒙羞。彼昏纵极厚颜，吾氓应尚有耻。况欧战终结，列强势力必将集矢亚东，内忧不除，外侮曷御？今设优容姑息，留此祸根，他日弄志复萌，危及国本，养痍貽患，罪将谁归？诸公保障共和，纯忠素著，尚乞力持正义，彻底澄清，迫袁解职，置之刑典。愿除恶而务尽，勿滋蔓以难图。临电不胜迫切之至。”^①4月，留日学生又针对袁世凯起用段祺瑞来谋和的伎俩，发出反对议和电，主张把讨袁斗争进行到底。电文全文如下：“滇、黔、桂、粤四省都督、总司令鉴：诸公仗义，率先威震全国。逖听之下，莫名钦佩。惟公等欲以和平解决，予袁贼调停余地，卒至将老士倦，锐气渐消。近闻段祺瑞又要求停战一月，窥其用意，无非施其奇计，阻我义师，以为调军队、借外柄之豫备。而冯国璋且联络长江上下，操纵南北之间，实行辛亥袁逆攫取总统之故智。此岂诸公举义之初心与国

^①《留日学生总会迫袁世凯退位电》（1916年3月），载《护国文献》下，第960页。

民响望之至意？万望诸公，速提义师，大张挞伐，毋信袁贼之议和，毋误奸党之调停，坚持到底，始终一致，则不独吾民之幸；抑国家之幸，惟诸公其实图利之。留日学生沈鹏、路程、陈楷、邓柏年等同叩。”^①可以说，“坚持到底、始终一致”，反映了广大留日学生对于护国讨袁斗争的共同心愿和呼声。

3. 留学生的进步团体与学习政治

这一时期，留学生的社团活动，基本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政治运动中应运而生的临时性团组，这样的团组影响大，人员多，活动对象性明确，目的单纯，如1918年间在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定时成立的留日学生救国团，该团是在东京各校留日学生同学会和各省同乡会联席代表会议上商定成立的，成立后，进行了各种反对中日军事密约的活动，其影响及于日本与中国，声势搞得颇大。二是留学生中的同人组织，这种组织参加的人员少，无须制定纲领与章程，只是在他们的兴之所至搞一些活动，其中以政治学习活动为多。因此，这种组织的影响小。

总的看，留日学生中的同人团体组织在这一时期成立的少。他们组织或参与的有建设者同盟、夏社、留日同学读书会、新中学会等。

建设者同盟是当时日本社会活跃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1919年前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日本的思想界比较活跃，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广泛地传播，研究和宣传十月革命和

^①《留日学生反对议和电》（1916年4月），载《护国文献》下，第960页。

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团体陆续出现。1919年4月1日以后，日本政府为了内外政策的需要，颁布了新的大学法令，对思想舆论的控制有所放松，大学里研究社会主义的群众组织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杂志不断出现。早稻田大学“是著名的私立大学，有不少进步教师，素有关心政治的传统，对新思潮非常敏感。早在1917年底就有了工人学生协会的组织，后来又有了‘人民联盟’，1919年9月18日，早就对社会主义感兴趣的学生组织了‘建设者同盟’。”^①

早稻田大学学生组织的建设者同盟成立不久，中国留日学生彭湃、杨嗣震、李春涛等人即加入进去，参与他们的活动。

建设者同盟的成员多来自农村，与农民联系密切，熟悉农民的困苦，重视对农民问题的研究，他们希望通过学习和研究，找出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的措施，在大学期间为毕业后的活动做好准备，最终建立一个合理的新社会。建设者同盟学习和讨论过工联主义、无政府主义、行会社会主义、苏维埃研究等种种问题。“他们重视实践，强调从事实际的农民运动。建设者同盟支持过佃农反对地主的斗争，要求减租，保证耕种权利，而且还对佃农纠纷进行过实际考察。”^②

彭湃于1917年赴日留学，1918年9月30日进入早稻田大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三年制）学习，1919年加入建设者同盟之前，他已两度回国参加学生运动，一是1918年反对“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一是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彭湃是个对新生事物敏感的人，“及至1919年以后，日本社会主义

^{①②}《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三卷，第8页。

思想渐次普遍发达，彭湃思想又大受影响。”^① 留日期间，彭湃一度笃信基督教，很欣赏基督教的博爱思想，“认为基督教也可以救国”^②。但是，在新思潮冲击下，他认为基督教并不能解决社会问题，遂一心研究社会主义诸家学说。

另外一位参加建设者同盟的留学生杨嗣震，1895年3月2日出生于湖北黄梅县，1917年6月中旬赴日留学，先寓居东京“松叶馆”，补习日文。行前，写诗以铭志，诗云：“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1918年9月，他与彭湃、李春涛等人同时考入早稻田大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

李春涛，1897年出生于广东潮州，留日进入早稻田大学后，与彭湃成了莫逆之交的朋友。

彭湃、杨嗣震、李春涛等留学生加入建设者同盟后，对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感兴趣，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很赞赏，在诸种社会思想中徜徉。但这段时期彭湃有一种收获是确实的，即建设者同盟注重农民问题，对他日后回海丰搞农民运动有所裨益。

对建设者同盟，李春涛在1923年的文章中回忆说：“彭湃与一二友人同入早大学生组织建设者同盟，研究劳动运动诸派别及其学说。……后来，建设者同盟改组为晓民会。”^③

再以后的1920年，他们认为有必要组织进步团体，学习

^{①②} 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晨光》第二卷第一号。

^③ 彭泽：《对彭湃烈士的点滴回忆》，未刊稿，原件存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

俄国革命的经验，于是，彭湃、杨嗣震、李春涛、林孔昭、王鼎新、李孝则、陈卓凡、彭泽、林泉、洪达等10名留日学生共同组建赤心社。赤心社成立后，学习过《共产党宣言》和河上肇的《社会主义问题研究》等著作，分析国内和国际形势，传达及研究日本社会主义的一般概况等，出版不定期的油印刊物《赤心》。后因彭湃、杨嗣震、李春涛相继毕业回国，赤心社在东京的活动随之停止^①。

夏社是受五四运动影响而成立的留学生团体。1919年6月，郭沫若与留日学生夏禹鼎、钱潮、陈君哲、徐诵明、刘先登等聚会商议，议定组织一个义务通信社，搜集、翻译日本报刊所载侵略中国的言论和消息，同时撰述一些反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字，油印之后投寄国内各学校和报馆，以进行反日爱国宣传。

成立之时，因为议定时间是在夏天，结社地点是在夏禹鼎家里，留日学生又是华夏子孙，他们便取名曰夏社。

夏社确定的主要活动是搜集信息，撰译文章，但其他成员都是学医的，不长于作文，因而郭沫若这位文学才子便担当起了主要工作。他们捐款买了一架油印机和纸张、油墨，夏社便算正式成立了。夏社的活动，颇有收获，郭沫若撰的《同文同种辨》、《抵制日货之究竟》被上海《黑潮》杂志刊登，后者还被《时事新报》作为社论发表。

留日同学读书会，是杨闇公参与组织的一个留学生团体。杨闇公，又名杨尚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四川地

^①《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八卷，第338—339页。

方委员会书记，1927年牺牲。他于1898年3月10日出生在四川潼南县，因其二哥杨衡石在日本明治大学攻读经济，1917年，19岁的他便赴日本留学。杨闾公先入成城学校，次年转入士官学校。在成城学校期间，他参与组织了留日同学读书会。读书会成立后，“日本警视厅以读书会未经学校当局批准为借口，拘留了杨闾公。几天后，以无罪释放。”^①

从以上数例便可看出，这一时期的留学生团体（包括参与的团体）基本是以学习读书、探讨问题为主，其影响不大，这样说，并不等于说它们意义不大，像上述团体中的很多留学生，在这种团体的活动中，思想变化很大，乃至影响他们日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4. “大江歌罢掉头东”

在这一时期里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中，有一位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就是周恩来。

留学日本，是周恩来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1917年6月，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后，为了亲眼看看日本为什么在明治维新后会突然富强起来，并探讨中国今后应走什么路，在友人资助下，于9月东渡日本。临行前夕，写下了著名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到了日本，周恩来先在东京神田区一家家具店的二楼，同一个早住在这里的陈姓中国留学生住在一起，以后为了寻找更

^①《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五卷，第88页。

便宜的房屋，几次搬居。

周恩来最初所住的家具店二层，其主人叫金岛市太郎，有人叫他建市君。这一阶段，常给周恩来送衣服的长岛英雄后来回忆说：“我在金岛装修店的二楼几次见过周恩来。我家在筑土町，走到山吹町不足 15 分钟，我妈主要干帮助中国留学生找房子和替他们洗脏衣服的工作。每当我把洗好的衣服送到建市君家时，当父亲的市太郎总是和我打招呼道：‘你太辛苦了！’”

爬上里面的楼梯，左右两边各有一间屋子，左边 6 榻榻米的屋子就是周恩来租的，墙角边摆着一张椅子，屋中央有火炉，周恩来总是坐在火炉前读书。

拉开隔门，穿着黑色立领制服的周恩来一边同我打招呼，一边把自己的座垫让给我，虽然语言不通，但看得出来他是一位很有礼貌的人。我们洗的大都是棉布衬衣和中国式的睡衣，都是些很朴素、很普通的衣服。

记得他的目光很敏锐，后来感觉就不明显了。但有一点令人难以忘怀，每次给周恩来送衣服时，他总是从口袋里掏出两毛钱带着不好意思的表情交给我。两毛钱作为小孩的跑腿钱在当时是不少了。我在回家路上从二毛钱中拿出一分买两个豆馅年糕吃着回家，有时也买过点心。周恩来总是一个人呆在屋里，我回去时说声‘谢谢！’，他还很不好意思^①。”

在东京，周恩来遇见了好多南开的同学，有同班同学王朴

^①梶谷善久：《留学日本时的青年周恩来》，载《日本人心目中的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第 302—303 页。

山，还有童启彦（冠贤）、陈钢（铁卿）、张鸿诰、张瑞峰、高仁山、吴瀚涛、刘东美、杨伯安等，东京还有南开同学会的组织，周恩来抵日不久还被选为评议员。有这么多朋友，他很欣慰。

周恩来先入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和其他课程，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想考取官费，若没有官费，凭家庭的经济条件他将很难完成学业，所以，一到日本，他就认真地开始学习。

考期越来越近，令人焦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想我现在已经来四个多月了，日文日语一点儿长进还没有，眼见着高师考试快到了，要再不抓紧用功，不要（说）没有丝毫取的望，就是下场的望恐怕也没了。”^①这时，家境愈窘，使他忧虑，他说：“我现在惟有将家里这样的事情天天放在心中，时时刻刻去用功。今年果真要考上官费，那时候心就安多了，……如今我搬到这个贷间来，用度既省，地方又清静，正好是我埋头用功的日子。”^②

时间紧，压力大，需下很大功夫去学习，让他痛苦的是，他还不想去死啃书本，想从实际生活中去学习更多的知识。此种心情，他在日记中表述道：“无处不可以求学问，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儿叫做求学呢？我自从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

^①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1月29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23页。

^②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1月11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23页。

学的人都应该注意。”^①

到日本后，周恩来很快对军国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在国内时，模糊地认为“军国”也是拯救中国的一条出路。在日本，他看出：“日本也是行军国主义的国，军国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的。……而且军国主义必定是扩张领土为最要紧的事”，“军国主义在二十世纪上我看是绝对不能存留了。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②

到日本后的第一个春节，周恩来给自己定了新的一年的方针：“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③

就在周恩来对社会有了比较深刻认识的时候，陈独秀办的《新青年》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从国内带去的和到日本后别人送的几本《新青年》深深地吸引了他，“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于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④对照《新青年》的文章，他很好地反省自己，表示：“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

^①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2月6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23页。

^②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1月20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24页。

^③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2月17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25页。

^④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2月15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25页。

个新纪元才好呢!”^①就在周恩来呼吸新思想、新知识的时候，留日学生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斗争开始了，周恩来积极投入到这场爱国运动中。1918年5月，中日签订军事协定的消息传来，周恩来参加各种集会，散发爱国传单，揭露中国政府的卖国行径。5月19日，又参加了留日学生中的爱国团体——新中学生会。

《周恩来传》中是这样记述新中学生会及周恩来在会中活动的：“新中学生会以在日本的天津南开学校和天津法政学校毕业生为主体，中心人物童启彦（冠贤）、高仁山等是比周恩来早到日本半年的南开同学，同他都很熟识。他们在国外求学，亲眼看到日本军国主义者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而国内的军阀政客却醉生梦死，只知卖国求荣，不顾人民死活，从而深感民族危机的严重。他们相逢在一起，就谈论国家大事，悲愤异常。童启彦、高仁山提议组织这个团体，借以敦品励学，积极救国，并用复兴意大利的三杰的故事以自励。新中学生的《会章》规定：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所谓‘刷新中国’，也就是改造中国。至于怎么改造中国？他们的答案还是笼统的，大体上还是科学救国，实业救国这些主张。他们吸收会员很慎重，看重的是个人品行是否纯正、同其他会员是否相知有素、感情笃厚。学会规定以‘赤心’为会徽，表示赤胆忠心为国为民，同时也含有热烈、勇敢和会员间赤诚相见的意义。”“新中学生会的一个重要特

^①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2月15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28页。

点是注重会员的集体生活。他们在东京早稻田租定一处会址，有十七八间房子，题为‘新中寄庐’。每星期日上午，举行会员座谈会。讨论的题目，有时是国家大事，如凡尔赛会议有关中国的问题等；有时是个人学习心得。准时开会，准时散会，不许无故迟到早退。无故迟到的只能自觉地站在旁边，等主席招呼后方能入座。会员除确有困难者外，都搬到‘新中寄庐’的宿舍中集体居住。宿舍内所有烧饭、洗碗、采买、看门、清洁卫生等工作，由会员轮流担任。各人所有的现款一律交公存储，大家按需要支用，不许浪费。经济比较宽裕的会员还一次或分次缴付互济金，帮助有困难的会员的学膳等费。这一年，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和天津水产学校校长孙子文等访美回国路过东京时，曾到‘新中寄庐’参观并进午餐。这顿午餐，便是由周恩来和会员马洗凡、李峰等做的。张伯苓等很称赞这种集体生活，认为是新中国、新社会的开始。”^①

1918年3月4日至6日，周恩来参加了东京高等师范的招生考试，共考日语、数学、地理、历史、英语、物理、化学、博物八科，另加口试。结果，他没有被录取。此后，他再准备下次考试，其日记中这样写道：“我自从考完了师范后，心里头非常的着急，以为七月里考第一高等，功课若不预备好了，定然没有考取的希望。要打算取上，非从现在起起首用功，断然没有把握。”^② 为此他定了计划：每天读书13小时半，休息

^①金冲及：《周恩来传》，第31—33页。

^②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3月10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30页。

和其他事 3 小时半，睡眠 7 小时。

7 月 2 日至 3 日，周恩来参加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由于此前更多的时间用在参加学生运动上了，日文、日语考的不好，又没被录取。他很懊丧，便于 7 月 28 日回天津探亲，9 月 4 日再回东京。

到东京，他住在东京神田区三崎町南开同学王朴山家的楼上，有一个与他共住一个多月的留学生说，当时的周恩来，沉着，冷静，不爱说笑话，谈论问题时，总是讲些国家的大事，民族的前途，青年一代应该怎样学习；生活朴素，学习刻苦，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记忆力强，条理清晰；外出散步，从不在马路上蹓跹，走得很快。

一位叫元木省吾的日本人这时同周恩来有一面之交。他回忆说：“1918 年 7 月 29 日，我在去四国香川县途中，乘东海道线去下关的特快列车上遇见了中国留学生周恩来。这事是我整理过去的日记时偶然发现的，里面还夹着‘周恩来’的石印名片，日记是这样写的：和坐在前座的中国留学生周恩来聊起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他是去年来日本的，日语相当不错，也有不明白的地方，就改用英语交谈，甚至用笔在纸上写着交流，我也说了很多。他谈了他回天津休假的事、中国时文、中国辞书，最后涉及中日亲善。我同周恩来交换了名片，他的名片颜色相当黄。周恩来用铅笔在名片的右上角添上了‘东京神田区高等预备学校’，在左下方印有‘翔宇’字号。算起来，当时

我是 26 岁，周恩来 20 岁。”^①

1919 年初，他的母校南开学校要创办大学部的消息传来。这时，他在日本已生活一年多，对日本社会暴露出的社会问题有所认识，对日本社会越来越失望。于是他决定，既然没考上官费，那就回国学习。

1919 年 3 月，周恩来离开东京，结束了留学日本的生活。

在日留学期间，周恩来阅读了日本刊物介绍苏俄的文章，初步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想，阅读了日本著名进步思想家河上肇、幸德秋水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著作，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为他以后投身革命事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 二 节

留日学生生活的足迹

1. 教育部公布《选派留学外国学生规程》

这一时期，中国政府留学政策相继有新规定，从而对留日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6 年 10 月 18 日，教育部公布了《选派留学外国学生规程》，对留学生的选派、费用、管理和毕业后的去向等做了规定，比如，其中规定，选派官费留学生的考试分为两次，第一次由各省主持进行，第二次由教育部主持。同时规定，大学及

^①梶谷善久：《留学日本时的青年周恩来》，载《日本人心目中的周恩来》，第 303 页。

专门学校有一定教学年限的教师，及国外大学和专门学校的毕业生可以免试。

《选派留学外国学生规程》，不仅适于留日，也适于留学其他国家，因此，它是整个中国留学史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法规。现将其引录如下：

选派留学外国学生规程^①

第一条 教育总长认为必要时，得就下列各项人员中选派留学外国学生，研究必须留学外国之学术技艺：

- 一、曾任本国大学教授或助教授继续至二年以上者；
- 二、曾任本国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教授继续至二年以上者；
- 三、曾经留学外国大学、高等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本科毕业生；
- 四、本国大学本科毕业生；
- 五、本国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本科毕业生。

前项留学生以检定试验选拔之，但有前项第一、第二、第三各款资格者，得免试验之全部或一部。

第二条 前条试验分第一试、第二试：

第一试由各省行政长官行之，其试验科目如下：

- 一、国文
- 二、外国文

^①《教育法规汇编》第六类专门教育，1919年5月，转引自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第498—502页。

第二试由教育部在京行之，试验科目如下：

- 一、国文
- 二、外国文
- 三、调验成绩
- 四、口试

国文、外国文之试验，视其派赴留学地方及研究科目，酌量命题。

成绩之调验，以历年研究之著述及一切学业状证为据。

口试就其所学及志愿发问。

第一试不及格者，不得与第二试。其第一试合格之试卷，由省行政长官咨送教育部复核。

第三条 每届选派学生，先期由教育部议定应派名数、留学地方、留学年限、研究科目，及各省应送备选学生名数，并第二试在京举行日期，列表公布。

教育部议定前项应派名数，即以民国三年六月以后各省咨报教育部有案之核定留学名额为范围。

每届选派学生，应就前项定额内所出缺额议定名数；但留学日本名数，应先尽每年考入特约学校各生充补缺额后，就所余缺额议定之。

每届议定名数时，应先期咨询各部院、各省需要人材，折衷配定。

第四条 留学生由教育部特派监督管理之。

留学生遇须实习等各种请求事项，应呈由监督核办。

监督遇有留学生事务关系外交者，应商承驻外公使办理。

第五条 留学生应支治装费往返川资及每月学费数目，定

如下表：

留学国	治 装 费	出国川资	每月学费	回国川资
英 国	本国币 200 元	本国币 500 元	英国币 16 镑	英国币 50 镑
法 国	同	同	法国币 400 法郎	法国币 1250 法郎
德 国	同	同	德国币 320 马克	德国币 1000 马克
比 国	同	同	比国币 400 法郎	比国币 1250 法郎
奥 国	同	同	奥国币 400 法郎	奥国币 1250 法郎
意 国	同	同	意国币 400 法郎	意国币 1250 法郎
瑞士国	同	同	瑞士国币 400 法郎	瑞士国币 1250 法郎
俄 国	同	同	俄国币 135 卢布	俄国币 450 卢布
美 国	同	同	美国币 80 圆	美国币 250 圆
日本国	本国币 100 元	本国币 70 元	日本国币 46 圆	日本国币 70 圆

治装费及出国川资，由教育部在京发给。

每月学费，由监督查明各该生行抵留学国之日起算，按月发给，不得预领。

回国川资，由监督于填发证明书时发给之。

留学生因研究学术，必须巡历地方，或经指定转学他国等特别情形时，得另酌给旅费。但应先具预算书，呈由监督呈部

核准。

留学中罹疾确有医证者，于学费之外，得酌给医药费。但通留学期内，不得过国币三百圆之数，并应将医药各收据，呈送监督核验。

留学中罹疾至四个月尚未痊愈者，得免其留学，酌给回国川资。但不得超过表定数目。

留学中死亡者，得由监督设法就地殡葬。殡葬之费不得超过表定回国川资数之一倍。其家属愿自费运柩回国者听。

第六条 选拔合格之学生，须于揭晓后一个月內，连同最近半身像片三纸，缴具留学愿书，呈部领凭出国。

留学生行抵留学国时，应将在部所领凭证，缴由监督汇送教育部。

第七条 留学生自出国之日起，至归抵本国之日止，每月应将留学日记呈部，或转由监督送部考核。其有取得学位之论文或他项著述及考察报告，并应随时送部考核。

前项留学日记除特别名称外，应用本国文字按日记载，毋得间断，尤应特重所学事项。

前项留学日记及著述、报告等，应由部摘要编印成书，分送各部院各省参考。

留学生有成绩特优者，应由部给予褒状，并得酌奖书籍费。

第八条 留学生除亲丧外，不得请假回国。其请假期限不得逾一年。

前项请假回国，得支表定川资十分之三。

第九条 留学生留学毕业后，应将学业凭证送请监督验

明。如果年限、成绩查核相符，方许发给留学毕业证书。

留学生取得前项证明书后，应即依限回国，连同证明书送部验凭注册。

留学生归国后，有听从教育总长指派职务，或各部院咨调任用之义务。

前项义务年限，视其留学期间之久暂酌定之。

第十条 留学生有违背教育总长命令，旷误学业，或其他不端行为时，得免其留学。其情节过重者，应由部撤销其已往资格之全部或一部。归国后不服指派职务者同。

附则：

本规程自公布日施行。其民国三年教育部颁行之《各省留学官费生缺额选补规程》，即行废止。

本规程公布以前所派留学生及日本特约学校按约录取各生，应准仍照《管理留欧学生事务规程》、《管理留学日本学生事务规程》，即其他部定办法，分别办理。

前经教育部根据前项选补规程准予存记有案各生，一律准与本规程第二条第二项之试验。其在本规程公布以前已入外国大学者，应由部调取各该生最近成绩，择优准免试验，一并指派。但此项学生，不给出国川资。其学费应自训令监督文到之日起算。

民国成立初期，仍沿袭清末的做法，即官费留学生主要由各省派遣。《选派外国留学学生规程》中规定官费留学生先由各省统一考试，之后将名单上报教育部，最终由教育部审议决定。按此规程似教育部为选派留学生的真正决定机关，但实际

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教育部作为最终的决定机关已无实际意义，决策权掌握在各省手中。这样做，一般地说，各省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需要选派留学生。按需而派，避免了因国家统一派遣而忽略了各地区需要的盲目性。

2. 《留日官自费生奖励章程》公布而未实施

1916年公布的《选派留学外国学生规程》中规定，留日的官费生给出国治装费100元中国币，出国川资70元中国币，每月学费46元日本币，回国川资70元日本币。这一规定，显然已比数年前有所提高。

1918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物价上涨，原来所规定的费用已不够开销。《王希天君小史》一书中记述了这一情况，书中说：“民国六七年的时候，日本因受欧战影响，生活程度日高，留东官费生都主张请求政府加费。他（按指王希天）不甚附和其事，常于同学会中演说：‘吾等此时既得官费，国家之对吾等不为不厚，即有不敷，吾等终应自求撙节。祖国财政拮据已极，政府腐败，剥削民膏，吾等要求加费，政府则仍取诸民，使同胞担负加重，岂是吾等所忍出此。’其爱国热诚有如此，听者大受感动。故当时学生中对于加费问题，分作两派，一为赞成派，一为反对派。”^①

1918年5月12日，教育部通咨各省官费留日生每人每月增给日币4元，数月后再增2元，即每月达到了52元，再后，

^①谢介眉：《王希天君小史》，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转引自《东瀛沉冤》，第37—38页。

又有增加，达到了每月 70 元^①。这是教育部的规定。在实行过程中，有的省份另立了自行的规定，基本是略高于教育部的规定，如教育部规定每月 70 元的时候，浙江省的标准已达到 76 元。

另外，进入民国时期，留学生官费的出处已有所改变。清代，这笔费用由所指定的税收等费中拨出，进入民国后，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各省，都专拨款项作为教育经费。留学生所用之官费，都从教育经费中拨出，隶属教育部所派的官费生，其费用从教育部经费中拨出，各省派的官费生，其费用从各省的教育经费中拨出。教育经费作为单独一项专列出来，是教育制度的一大改革，在留学史中也具有相当的意义。

清末已产生了对留学毕业生通过考试进行奖励的办法。进入民国后，1915 年，中国政府组织了一次留学毕业生的考试，择优进行奖励。此种考试举行一次即停止了。

1918 年 11 月 4 日，教育部为了鼓励留日学生学习，修正了《留日官自费生奖励章程》。在本章程里，自费生基本享受了官费生同样的奖励待遇。该章程如下：

留日官自费生奖励章程

一、勤学奖励

第一条 留日高专以上各校官费生一学年内不欠席并学年试验及第者。

第二条 留日高专以上各校官费生毕业时合计三学年不欠

^①舒新城：《中国近代留学史》，第 143 页。

席者。

二、成绩奖励

第三条 留日高专以上各校官费生学年试验考列最优秀者。

第四条 留日高专以上各校官费生毕业考验考列最优秀者。

第五条 准第三条及第四条之规定，凡各学校之成绩报告如以分数为标准者，应以八十分以上为最优秀；以甲乙丙丁分等级者，以甲等为最优秀，其余标准得准此类推之。

第六条 留日高专以上各校自费生有与本章程第一条及第三条之规定相符者，得给予补助费。

留日高专以上各校自费生有与本章程第二条及第四条相符者得给予奖励金。

三、奖励金之标准

第七条 合于本章程第一条之规定者给予二十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之奖励金。

第八条 合于本章程第二条之规定者给予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之奖励金。

第九条 合于本章程第三条之规定者给予二十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之奖励金。

第十条 合于本章程第四条之规定者给予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之奖励金。

第十一条 官费生得奖励金时监督得指定其用途。

第十二条 官费生于同一年内得两项奖励时，就最多额以上，合并额以下酌定其奖励金额。

第十三条 官费生如不遵照定章呈送留学日记者，虽合于本章程各条之规定亦不得给予奖励金。

第十四条 第六条所定之补助费每年不得超过三百元。

第十五条 本章程自民国七年九月十一日施行^①。

教育部制定这个章程，是欲对留学者进行鼓励，当然其中也有笼络留学生不问世事的因素。章程规定得具体，遗憾的是，尽管章程所规定的奖励金很少，后来也没有真正实行。在国内局势很不稳定的情况下，有的官费生连应得的官费都难以保证及时得到，何况对自费生与官费生的奖励怎能照章行事呢。这个奖励的措施，仅是作为愿望存在过。

3. 留日学生打工的经历

在留日运动最初的年代中，中国学生打工的现象较少，有些留学生即使是留学经费出现困难，也仅是靠写文章、译书等方式挣钱补贴费用。这样说，不等于不存在打工的现象，由于各种原因，也有的留学生不得不通过打工来解决留学的费用。

白薇在留日期间就多次打工，用打工的收入，来支付在日期间的费用。

她打工，有的阶段是因为无人为她出资留学，有的阶段是因为有病而失去了官费。

白薇，1894年2月5日出生，原名黄彰，留学日本后改名白薇。

1918年，白薇逃婚离开家乡湖南，先到上海，住在同学

^①《教育法规汇编》，《专门教育》，第442—443页。

魏文夔母亲陈夫人家中。陈的丈夫原答应资助白薇 80 元钱，让她去日本留学。由于陈夫人刚生了小孩，只给了她 5 元，白薇自己还有 5 元，仍不够买去日本的船票。陈夫人又从自己的生活费中挤出 7 元，她才买了一张到横滨的四等舱票。到了横滨，她只剩两角日币，写了一封信给东京的熟人，就一点钱也没有了。

所谓的东京熟人，是湖南留日的两个女学生。在日本，她只认识这两个人，再就举目无亲。在两个大姐处住两天，她就开始了打工生活。

白薇先被介绍到一个在东京的英国传教士家里当佣工。她每天须干的活是：打扫教堂、客厅及所有的房间，在花园里剪草、培花，管理上架的葡萄，喂养兔子，洗菜、烧饭、刷靴、洗尿布，教女主人学中文，晚上要缝制军衣。

有些在东京的中国人，看到一个衣单、瘦削的中国女子穿梭般忙碌，互相传说：“有个湖南女子流落在东京。”

女主人看她身体实在太虚弱，不仅深夜缝制军衣时打瞌睡，白天也常把活儿掉在地上，索性辞退了她。牧师要给她三分之一的工钱，她一气之下没拿钱就走了。

这是白薇第一次打工的经历。

幸而她的母校——长沙第一女师范马校长来了信，寄给一些钱，救了急。马校长告她：已给你父亲写信，让他寄钱给你，如果不寄，就叫他放弃父女关系，我另呈交湖南省教育厅负担你的留学费用。

不久，她父亲怕丢面子，只好让步，寄了 70 元中国币。有了一点钱，白薇进入东亚学校补习日语。学习结束后，她考

入东京御茶の水高等女子师范，学生物科。

“考取女高师，是有官费的，……由于应享受官费的人颇多，她是读到三年级才得到的。在这之前，仍然靠自己课余劳动维持生活，有时做家庭女佣，有时在街上卖水，最多的时候是‘挑码头’。”^①

挑码头又称挑江，就是从驳船上挑货物上岸。东京每天都有很多轮船入港，每天都有货可挑，还和船主没有纠纷，那是一种计件工作，挑一担领一块牌子，最后按牌子算工钱。她从下课后挑到晚上，大约可挑4小时，80件，所得可供三四天生活开支。

得到官费后，有了固定的生活来源，但不幸的是，她却“因病留级，停了官费。”^②这是白薇第一次因病停官费。有了病她没有返国，继续留在东京，这就须再打工维持生活。

日中联谊会通使和东京中国基督教青年会马干事介绍她到美国牧师司坦勒家做工，当了“下女”。“司坦勒太太大约三十七八岁，说的一口河南开封话。家里有四个孩子，一位客人，共七口。七口人的家务事并不轻松，每人一张床，每张床上薄薄的毯子、被子有六七件，要一张张一件件叠整齐，要擦地板、家具和门窗，这就占去一个上午的大半时间；然后去买菜、寄信、送信……每个孩子一天换下几套衣服要洗，要熨烫平整，直到晚上，累得昏头昏脑，每根神经都紧绷绷的。这些活儿，本来要雇用两个女佣，可是另一位老不来上工，而她为

^①白舒荣 何由：《白薇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8页。

^②白舒荣 何由：《白薇评传》，第48页。

着多挣几个钱还债，所以就全担当了起来，这一来，原想半工半读就办不到了。她要求主人减少工作量，让她能上实验课，再借同学的笔记回来抄。司徒勒太太见她工作做得好，只好同意。”^①

上了学，她恢复了官费。又可以不打工了。

大约 1925 年前后，弟弟黄健一到日本留学，一到日本就患了重病，父亲正和儿子呕气，不肯多给接济，一切都得靠白薇帮助。

白薇忍痛卖光了所有的书籍、仪器、衣物，弄点钱供弟弟住院手术用，她还买鸡、鱼、肉等好菜给弟弟补充营养。

弟弟病愈出院，入了学，与她再没有什么来往。

这一段时间，白薇经济拮据，营养不良，又要赶功课，结果，又病了，“一病逾年，官费停发了。”^② 这是她第二次因病休学而停官费。

失去官费的白薇，又陷入了困顿的状态。她曾说，这个期间，曾“到市区警察署领‘贫病无依皈’的证书，进腥秽的贫民医院受人怜恤。”^③

再次找地方打工。她自己找过，又托朋友找过，断断续续也找到过打工的机会。

在东京郊外，有一个教会办的慈善机构，叫妇人公寓，为旅日的异国单身职业妇女或留学生服务，那里备有各国饭菜，

^①白舒荣 何由《白薇评传》，第 49 页。

^②白舒荣 何由：《白薇评传》，第 58 页。

^③《琴声泪影》，转引自白舒荣 何由：《白薇评传》，第 58 页。

还可以学习音乐、歌舞。白薇在留日期间，曾去过那里居住，得到过一定帮助。但是妇女公寓虽是教会所办，也是要收费的，失去官费期间，白薇就搬出了那里。

由于不断做工，继续学习，白薇又补上了官费，可继续在日本学习。

1926年初冬，国内革命浪潮汹涌，白薇渴望回国参加革命，便毅然放弃官费，中断学业，回到了中国，奔赴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投身于革命事业。

留日期间，白薇克服各种困难，主修生物学，续学历史、教育及心理学，在日本期间，便开始文学创作，有多篇作品在国内发表。归国后，她的文学创作成果斐然，30年代寥寥无几的女作家中，她是引人注目的一位。

4. 日本人对中国学生的戒备与歧视

中国学生赴日本留学，必定要与日本的学校、学生以及其他各方人等发生联系，进行交往，两种文化、两个国籍的人们在一起，除交流之外还会有摩擦、误会、矛盾，甚至敌视，别的方面不说，单就日本人对中国学生的戒备与歧视的心理和言行，在几代中国留日学生中都印象深刻。

在这方面，湖南留日学生李裕有深切的感受。

李裕，1888年出生于湖南桂阳，1912年公费赴日留学。他留学日本也与黄兴的作用分不开。辛亥革命后，黄兴致函湖南都督谭延闿，以民国初建，人才缺乏，急宜选择宏毅之士出洋留学，储为国用。1912年11月，黄兴回到长沙，接见民国政府工商部派遣查办汉冶萍公司委员余焕东，告以湖南实业之

兴办，开矿为第一要着，对于采矿，应计划清楚，筹集资金，努力进行。黄兴还率人往萍乡、安源、湘潭等地调查矿务，计划作大规模的发展。在这种重视矿业的情况下，李裕等人被送往日本留学。

李裕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习采矿、冶金。李裕回忆说：“大阪高工当时在日本是较有名气的高等学府，主要课程有：采矿学、矿政法规、测量学、普通冶金学、电气冶金学、水银冶金学、金属组织学、火药学、合金学等。除课堂学习外，并赴矿山测量，到工厂参观试验。教师无论在课堂讲授或赴野外指导实习，都很认真。”一次实习前，后藤科长特意嘱咐他们3名中国学生，好好实习。李裕当年的日记这样记载：后藤科长于行前“并语余等，卒业归国立于社会，自当于欧美留学生竞争，倘不能获胜，不仅君等之羞，亦日本与本校之耻也。君等务必尽力实修，潜心研究科学，以求必胜。”

李裕等人在实习过程中，体会出了日本人对中国留学生的戒备心理。李裕说：回忆在大阪高工求学期间，日本当局对中国留学生防范极严。1917年2月16日，李裕在日记中记载：“同班日友赴火药工场参观。余以外国人故，不能入场。当此战乱之时，恐余等知其秘密也。”3月2日，他在日记中记载：“同班日人赴陆军炮兵工场，余以外人见斥。”^①

1917年3月，李裕等三人从大阪高工毕业。毕业前，李裕要带走自己实习期间所绘的测量图，以备日后作参考。后藤

^①李裕：《辛亥时期的片断回忆》，见《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1978年印，第53页。

科长答应了，而米泽教授“有吝不欲与之心，及既与之后，则曰：‘此图无发还之理，以科长交代，实不得已也。’”^①

这一时期留学日本学医的杨步伟对日本人歧视中国留学生的行为也深有体会，她并且由此而认为，正是日本人的所作所为，使得绝大多数留学生回国后都痛恨日本，厌恶日本，不像留学欧美的那些中国留学生那样对欧美有亲近感。杨步伟在学医期间，须经常参加实习，上解剖课。她回忆上解剖课时，气愤地这样说：“有一样最欺人的地方，就是在解剖派班的时候，一个尸体归四五个人解剖，找筋肉神经血管等等，归同班领头人派，他不给中国人照日本字母派，给中国人全体派到最后。近暑假了，臭的不得了再给我们来做这种工作。尸体都是死后两天的人给解剖，不是像美国有些用药泡过了以后才给解剖的。有时还给我们颗粒结核性的尸体用。我们一班共十四个人中国人分五班，每班三个中国人一个日本人。怎么我们知道这种弊病的呢？就是从这个上面得来的理由。因为每次派到了，那个日本人总吵，为何派他在我一道？并且危险的很，这种结核性的尸体不应拿来做生理解剖用的。而且解剖时这个日本人总不动手在旁边看着。问这个问那个的，。一次两次我们动起疑心了，想日本人向来对事不让人的，就是臭味他们也是做的，为何这几个人如此呢？并且我们把神经血管找到时，他拿一本书用一个钳子夹着来慢慢和书上对，一下工夫就去洗一次手消毒。我们就觉得为什么这样呢？起初还以为他们派不中用

^①李裕：《辛亥时期的片断回忆》，见《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1978年印，第53页。

的日本人和我们在一道，等到有一次他们又不按字母派一个高丽姓许的来，事情才闹穿了。原来这个姓许的是住在日本人宿舍里的，和中国一个姓许的认本家，两个人非常的好，同用书同玩，一同进出。日本同学都妒忌他们。那次给他加入了，他大闹，一直闹到监学那儿，监学是校长的丈夫，叫吉冈次太郎，他出来说公平话了，给班长叫来骂一顿（他也管学校事的，其实尸体也从他们派来的，实在他知道我也不敢一定断定），我们才知道用尸体做生理解剖是犯法的。……凡留日学生开学生会时每次总有几件不平的事报告出来。大家在一道，也总是恨恨的骂，希望一天打倒小鬼。好学生他们妒嫉，坏学生他们看不起。还有一种就是受他们骗骗玩，上学的功课由他们包办，到考时背背好了，其余的时间他们陪着玩，无所不来。所以日本留学生回国分两部，一部极恨日本，一部做汉奸卖国，都是从这种因果上得来的。不像从英美回国的学生都愿谈和那国亲善（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归根一句话，日本人做事和行为上都是小器‘促掐’，而也专在小事上招人恨。做化学试验组织学标本等等时候，也是一到分派到我们中国人上头，种种材料不是这样分量缺乏，就是那样材料没有了。但是收我们中国人的实习费则不少，只有多。”^①

以上发生的那些事情，是当事人的回忆，不会失实。至于杨步伟由此而总结出中国留日学生恨极日本和做汉奸卖国都缘于此，这个结论未必十分恰当。留日学生的爱国和卖国是一个由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不仅仅是由留学生活中的这些事情就

^①杨步伟：《一个女人的自传》，第145—147页。

会决定得了的。但是，杨步伟这样总结，毕竟也反映了一个留学亲历者的一种看法、一种心声。

在回忆中，杨步伟还说，像上述那些大大小小的刺激事情，在日本是天天的家常便饭。

第 三 节

五四爱国运动中的留日学生

1. 留日归来的新文化运动主将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这个历史的转折中，留日学生起了重要作用。

从1915年到1921年，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在中国的大地上掀起了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这场启蒙运动持续时间之久，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在这场运动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这场新文化运动主要是以归国的留日学生为骨干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八人，除胡适、刘半农之外全都是不同时期留日的归国学生。新文化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归来的留日学生。

新文化运动是陈独秀于1915年发动的。在这之前，他曾5度赴日，其中有4次是去日本留学。留学期间又数次返回国内从事政治活动。他是中国近代较早的留日学生，又是新文化运动主将中最早留日的。

陈独秀第一次留学日本，是在1901年11月（光绪二十七

年十月)。这时中国近代留日运动刚刚开始兴起，截止1901年底，中国留日学生总共才有280人。他以自费生的身份先入高等师范学堂速成科学习日语和普通课程，之后入东京学校（即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①。同年底，他加入励志会，后由于这一团体内部发生分裂，促使陈独秀很快脱离了该组织。次年春离开日本回到安庆。

去日本留学之前，陈独秀受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侵华的刺激，已经开始考虑国家的命运问题，他在回忆中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也不过是念念文章。……哪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人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外国，查看一番。”^②陈独秀到日本时，正是留学生办《译书汇编》杂志通过译书极力宣传西方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时候，留学生秦力山等人也创办了《国民报》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与排满思想。新的知识、新的思想对陈独秀有巨大的吸引力，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思想已经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由

^①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3页。陈独秀所入学校一般有人宏文学院、早稻田大学、东京高等学校速成科三种说法。可参阅唐宝林 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页。

^②三爰：《说国家》，《安徽俗话报》第五期，1904年6月4日。

“康党”转为“乱党”^①。

1902年春天，陈独秀归国到安庆。为了集合群力、启发民智，联合了潘赞化、葛温仲、何春台、张伯寅、柏文蔚等青年创设藏书楼，发起演说会，传播新思想，进行宣传革命思想的活动。因此被当局通缉^②，被迫与潘赞化离开安庆赴日本。

1902年9月，陈独秀第二次赴日本留学。到日本后，入成城学校学习陆军。同年冬，陈独秀与张继、蒋百里、潘赞化、苏曼殊、秦力山等数十人组织了“青年会”。该会“以民主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是具有明显革命性质的留学生团体。1903年3月，陈独秀与邹容、张继、翁浩、王孝缜5名留学生剪了留学生们所愤恨的清政府派的留学生监督姚煜的辫子，陈独秀与邹容、张继3人于4月被日本政府强行遣送归国。可见，从1901年到1903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陈独秀两次在日本留学，并开始走上了启发民智，宣传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道路。

陈独秀归国后，马上进行了发动安庆地区拒俄运动的宣传工作，并“成长为一位坚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士。”^③

1906年暑期，陈独秀第3次赴日本，同苏曼殊东游于处暑后返回国内^④。

①唐宝林 林茂生：《陈独秀年谱》，第19页。

②唐宝林 林茂生：《陈独秀年谱》，第21页。

③任建树：《陈独秀传》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9页。

④柳亚子：《曼殊全集》第一册，第331页，转引自唐宝林 林茂生：《陈独秀年谱》，第42页。

1907年春，陈独秀因进行革命活动被人告发^①，被迫第4次东渡日本，也是第3次赴日留学，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同年4月，加入章太炎、刘师培、苏曼殊及日本人幸德秋水、印度人钵罗·保什等人发起的“亚洲和亲会”^②，该会宗旨“在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在此次留日前，陈独秀在国内编辑过《国民日报》和《安徽俗话报》，参加过反清的暗杀团与岳王会，这次留日加入“亚洲和亲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909年9月返回，结束了第3次留日生活。

辛亥革命爆发后，陈独秀经受了革命的洗礼。袁世凯篡夺革命领导权后，陈独秀又于1914年7月第4次赴日留学，入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文。其间，参加了欧事研究会，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认为民权的价值高于一切，大力提倡资产阶级民主，在这篇文章中已经孕育了后来《新青年》的科学民主的思想。

就在陈独秀第4次在日留学期间，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主将李大钊也来到日本留学。1913年冬，李大钊得到友人的资助，东渡日本留学。到东京后，住基督教青年会中国留学生宿舍，1914年春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后来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说：“毕业后，我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③

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期间，与5名留学生组成了经济学

①②唐宝林 林茂生：《陈独秀年谱》，第43页。

③张静如等：《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页。

会^①。1914年，发起组织了神州学会，进行反对袁世凯的活动^②。1915年1月底，联络留日学生成立了留日学生总会。李大钊到日本后，即表现出了对社会问题的异常关心，并开始研究与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接触了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使他的爱国主义与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有了较快的发展。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家幸德秋水的著作也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使他进一步认清了袁世凯的卖国主义行径。他在1914年11月发表于《甲寅杂志》上的《国情》一文，是爱国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文章从袁世凯的“临时约法”谈起，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袁世凯勾结帝国主义分子，大谈“新约法”，只不过是为其称帝做准备。《国情》一文是李大钊一针见血地揭露中外反动派进行政治勾结的一篇重要檄文。该文告诫人们不应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欧美人之言，岂可尽恃哉！求国情于外人，窃恐此憾终难弥耳。”^③

1915年，是留日学生掀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运动的重要一年，也是李大钊留日期间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一年。这一年1月，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消息传开后，留日学生总会开会讨论进行爱国反帝斗争，推举李大钊为文牍干事。他出于对帝国主义的义愤，连夜起草了《警告全国父老书》，6月编印《国耻纪念录》，发表《国民之薪胆》，深刻揭露了日本在甲午之战后对中国的侵略，指出：“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

^①《李大钊年谱》，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页。

^②张静如：《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10页。

^③《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3页。

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①号召国人发扬“卧薪尝胆”的精神，保卫“锦绣之江山”。李大钊的这几篇文章影响很大，尤其是《警告全国父老书》，油印后传遍留日学生界与全国，在反对“二十一条”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

1916年1月底，李大钊为了联系反袁斗争一事离开了日本^②。2月初到上海，两周后又返回日本，编辑留日学生总会的刊物《民彝》，发表了署名文章《青春》。1916年5月发表《民彝与政治》。后一篇文章集中反映了李大钊反对封建与礼教，主张民主与科学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提倡新文化与新思想，表示对旧的思想要“无所姑息，不稍优容，永绝其萌。”^③5月上旬“为了拯救国家，毅然决然丢下学业，甚至拿不到大学毕业文凭也毫不顾惜，不等学期终了，就在1916年上半年返回祖国，做社会革命运动。”^④

李大钊回国的时候，先于他留日归国的陈独秀已于1915年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候，正是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领导权，加紧准备复辟帝制的时候。为了取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袁世凯不惜连续出卖国家主权，日本也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一个封建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革命果实却被袁世凯搞得丧失殆尽，中华民族不

^①《李大钊选集》（上），第123页。

^②《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页。

^③《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5页。

^④高一涵：《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载《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39页。

但没有走上革命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所期待的富强之路，相反，又一次面临着被帝国主义所蹂躏的危险。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还在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但也是屡受挫折。在这种内外优惠的形势下，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接受了西方新思想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认为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还需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而旧文化旧思想严重阻碍着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阻碍民族意识的觉醒，于是他们高高地举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

陈独秀于1915年6月从日本回到上海，9月创办了《青年杂志》（1916年9月的第二卷第一号起，为了与其他杂志名称相区别而改称《新青年》）^①。《青年杂志》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的开端，播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战鼓。陈独秀在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中，对青年寄予了厚望，并向青年人提出了6项希望：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②。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已得到了初步阐述。以此为开端，新文化运动愈演愈烈。

1917年，陈独秀被蔡元培请入北京大学。1918年起，《新青年》变成了李大钊、沈尹默、高一涵等八人的同人刊物。这之前，《新青年》一直由陈独秀一人执笔编辑，钱玄同、高一涵、鲁迅等归国留学生的加入，壮大了新文化运动的队伍。其他几位留日学生的情况如下：

^①唐宝林 林茂生：《陈独秀年谱》，第72页。

^②《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3—9页。

高一涵，安徽人，民国初年留学日本，参加神州学会进行反对袁世凯的活动，为《民彝》的主要撰稿人。

沈尹默，浙江人，早年留学日本。

钱玄同，1906年9月赴日本留学，考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科，1910年5月从日本归国，1913年入北大。

新文化运动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鲁迅，是1902年赴日本留学的。留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哲学、文化与自然科学的书籍，经常考虑革命的问题，认为要革命就要反清，就要唤醒愚昧落后的群众。他注意研究中国“国民性”问题，1903年作《自题小像》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表现了深深的忧国之情。鲁迅还通过译《斯巴达之魂》等文学作品，表现了强烈的反对侵略、反对压迫的爱国之情。1904年，他参加革命团体光复会，同年9月离开东京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鲁迅怀着拯救中国人的愿望学医，又因医学并不能根治中国人的顽疾而放弃了医学，1906年他决定弃医从文。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留学生界反清情绪高涨，革命形势如风雷激荡，鲁迅同著名的革命派人物秋瑾、徐锡麟、陶成章等人关系密切，深受他们的影响，因家庭需要人照顾，鲁迅于1909年6月回到了家乡。“鲁迅在日本的七年，积极参加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开始形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是他一生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时期。”^① 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以其杂文、随感录及一篇《狂人日记》为新文化运动增添了重要的实绩。

^①林志浩：《鲁迅传》，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59页。

新文化运动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吴虞。1905年，吴虞以33岁之龄留学日本，入日本法政大学，学习宪法、民法、刑法、政治学、经济学等课程。1907年归国，1916年开始为《新青年》写文章从而名声大噪，被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英雄”，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以上所述几位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都是归国的留日学生。他们在留学日本期间，就广泛地受到了民主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在日本时已参加过革命运动。正是由于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到进步思想影响，为日后回国发动或参加新文化运动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2. 留日学生为五四运动做了重要准备

1918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发动了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斗争。这场斗争首先是由在东京的留日学生发动起来的，继而又影响到了国内，演成了中国学生第一次大规模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的斗争。

1918年5月，中日两国代表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与《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协定》规定：“凡在军事行动区域之内，中国地方官吏，对于该区域内之日本军队，须尽力协助，使不生军事上之窒碍”，“中国境外派遣军队时，若有必要，两国协同派遣之”，“军事行动区域之内，设置谍报机关，并互相交换军事所需之地地图及情报”，共同

行动时，中国军队“应入日本军司令指挥之下”^①。按此规定，实际是使中国军队成为日本的仆从军。

协定还没正式签订时，中国留日学生即获知了中日政府间关于协定进行接触的事。广大爱国学生对日本侵略中国主权和段祺瑞政府勾结日本的卖国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一知道消息就进行了集会和散发传单的活动，酝酿进行一场大的斗争。5月6日，各省各校留日学生代表在东京神田区的中国饭馆“维新号”召开秘密会议，会议代表共46人，其中有3名女学生。所以选择饭馆开会是为了避人耳目。当时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行动极为注意，为使不被人注意，才以吃饭为名来举行这次会议。会议开始前已有10名留学生整装待发，俟会议结束立即返国把消息传回国内。

《东游挥汗录》对这次会议做了详细记载。会议于晚上7点左右开始，会议主席首先致辞指出：

“……此次日本借口共同出兵提出二十条条件，迫我政府承认，看秘约的内容，凡军政、财政、警政的主权以及矿山采掘权，铁路电信敷设权都要送给他。什么‘条约’，简直是一张全行拍卖的契纸罢了。……前晚各省同乡会、各校同窗会的联合会议，将留学生全体归国的问题已经一致通过了。昨晚的联合会议，又将组织救国的大纲决定了。什么本部设在上海，支部设在北京啦；宗旨一致对外，毫不干涉内政啦，……所以每省每校各举先发队四人，赶程分赴上海、北京，马上通电台具

^①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三联书店1981年，第253-255页。

呈反对，……到上海首先联络报界，为文字之鼓吹；同时电恳政府否认密约，通电各省长官，请政府力争，并联络绅商、学界主要人物，一面电政府力争，一面召集国民大会为政府的后盾。……往北京的则哀恳政府不予签字为主，除效秦廷七日之哭，如唤醒国民联络各界等事也可去做。……只要人民齐心对外，此项亡国条件是不难拒绝的……。”^①另外，会议还对留学生归国的旅费、归国后为不废学业而兴办学校等事宜进行了筹划。

会议正在进行，忽然有人报警，会议停止，学生们开始吃饭。紧接着有数十名警察“执械明炬，闯入室内，不问情由，将在座诸人乱打，刀斫足踢，掀桌倒椅，壁上所挂之学生制帽、草帽亦一一收去，室内狼藉不堪。”^②学生被警察一阵拳打脚踢之后，全被带至警察署。路上中国留学生看见留学生代表被抓，扬帽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努力前进，勿忘今夕之耻！”场面蔚为壮观。待第二天被抓的学生释放出来时，有很多留学生在大门口守候，高呼“万岁”。学生代表被污辱，更加激起了留学生的愤慨。

在这次大逮捕之后，“日方又玩弄花招，改变其高压态度，派便衣警察到处监视，有会必到，意欲使这一运动逐渐缓和下来，复由各校个别教师找有关学生谈话，劝其安心求学，并谓日本政府决不因此对中国留学生有所歧视。但这种反帝救国的

^①王拱璧：《东游挥汗录》，载《五四爱国运动》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78页。

^②王拱璧：《东游挥汗录》，载《五四爱国运动》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79页。

正义斗争，在大家的思想意识中具有深刻的历史性的政治基础，因为他们未出国前早就深深地了解到日本对华的侵略和压迫，而在留学期间，目睹其侵华政策的日益加剧，积愤更多，所以决不是他们一些花言巧语所能欺骗得了的。尽管极其个别的人愿意投向敌人，在那种高度的反帝救国气氛所笼罩的环境下，也无从施其鬼蜮伎俩，同时还有自动组织起来诛汉奸会、纠察队之类，日方企图缓和的阴谋终未得逞。”^①

为反对日本政府的暴行，唤起国人救亡图存，留学生们纷纷罢课，组成了“留日学生救国团”，“在留日学生总会会长阮湘、王洪宾领导下，全体罢课归国。”^②这次留日学生辍学归国，当然不是一开始就是全体一致的，有少数人不同意，还是认为留学要紧，学成再说，有的人主张由各校同学会和各省同乡会分别举派代表，组成代表团，回国与国内津沪各地联合，共同行动，但不必全体辍学归国。还有一部分人由于暑期快到，即将毕业，不愿牺牲那张文凭。有一次在中国青年会开会时，一个湘籍学生李言怒斥那些留恋一张文凭的人，把他刚在岩仓铁道学校领到的文凭，当众撕毁，说他不希罕这东西，大家受到很大的鼓舞，对他肃然表示敬意。

从5月到8月，在日本东京和其他地区的中国留学生大部分返国。留日学生回国一去上海，一去北京，一回本省，相继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活动。1902年赴日本留学的李汉俊和1917

^①王兆荣：《关于1918年我国留日学生反帝救国的留日学生救国团的回忆》，载《秀山文史资料》第一辑，1984年印，第57—58页。

^②胡俊：《记五四运动前后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载《五四运动回忆录》（续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57页。

年赴日留学的黄日葵也于此次回国。

回到上海的留日学生，以救国团副总干事长张有桐等人为主，他们到上海后，立即展开联系和宣传工作。首先向沪上各报发表文件，阐述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反帝救国运动的重要意义，同时派出代表到各校去联系和宣传。救国团派出宣传人员分别在人群比较集中的场所，或热闹的马路上，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真实情况，以及段祺瑞政权甘心卖国的罪恶行径，希望大家认识清楚，一致反对。团中劳动部派出人员，拿些有关反帝救国的书刊和一些日用必需品，沿街叫卖。救国团团员张民权，还自制了些幻灯片，到处放映，宣传拒约救国。回到上海的留日学生，绝大部分都留沪不久，即回乡省亲，后仍复先后东渡，以求完成学业，但仍有一部分人坚决留在上海。

回到北京的留学生以阮湘、龚德伯、王希天等人为主，李达也是回北京的留学生主要领导人之一。这次在日本留学，是李达第2次留学日本。1913年，李达怀着“实业救国”的目的考取了湖南的留日官费生，赴日1年即学会了日语，后来又学习了英文和德文，1914年因用功过度患病辍学归国。为了实现理想，1917年春李达再次赴日本留学，考入了日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理科。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实业救国”的理想逐渐破灭，深深地为国家被欺凌、人民受污辱而痛苦，努力寻找一条新的救国之路。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李达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从此积极地投入到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中。回国的留学生代表李达、龚德伯、王希天、阮湘等人于5月中旬到北京，立即和北京大学的爱国积极分子邓中夏、许德珩等人进

行联系。5月20日晚，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大会，有北大学生及其他各校代表参加。留日学生代表在会议上痛陈了他们在东京遭受种种屈辱的事件，号召国内学生进行斗争，废除卖国协定。国内学生当场表示会同留日学生共同进行斗争。会议决定第二天进行请愿。由留日学生发起的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斗争就这样影响到了北京学生，他们在国内共同开辟了一个战场。

1918年5月21日，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工业学校、北京法文专门馆等校2000多学生，集合在新华门大总统府门前，要求取消“中日共同军事协定”。各校派出包括北大许德珩、易克嶷、段锡朋在内的8名学生代表，捧着请愿书去见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冯国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斗争。

在学生的强大压力下，冯国璋被迫接见了学生代表。由于学生们缺乏斗争经验，此次又是一次单纯的学生运动，他们没有演说，也没有标语和旗帜，甚至北京市民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学生们在冯国璋一番花言巧语的欺骗和恐吓下，各自返回学校，第二天就恢复了上课。

请愿事件发生后，北洋军阀政府为了破坏学生的爱国运动，发布训令要“严加取缔”学生的游行请愿活动，并限令留日学生早日返回日本，“违者以干涉政治之嫌，开除学籍。”^①但这一切都是无济于事的。留日学生回国的时候大部分集中在

^①陈家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转引自于学仁：《中国现代学生运动史长编》上册，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8页。

上海，他们在上海设立了留日学生救国团本部，在北京设分部，其他各省设支部。他们在全国各地展开了爱国宣传和联络活动。有的学生疾呼：“我同胞乎，速起来反对密约。头可断，血可溅，此约不可认也。士农工商，其各奋起协力。”^①

在这场学生运动中，也涌现了一些爱国斗争的先进分子，如彭湃。他于1917年夏赴日本留学，先住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跟朋友学习日语，后入成城学校学习。在日期间，闻讯中国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爱国心极强的彭湃邀留日同学黄霖生、陆精治合影一张并在照片上题词为：“民七年中国军事亡国协定被迫签订之日，特摄此‘国丧纪念’照片，以示国仇之不忘。”^② 1918年5月6日，彭湃等人被日本警察打伤，5月12日被释归国。^③他先是到上海参加了《救国日报》的工作，不久去广东与广东籍的留日学生一同建立了“救国团”广州分团事务所，发出《留日广东学生同乡会宣言书》，又到海丰发动成立了以“废约救亡”为中心的反日爱国宣传活动。在上海、广州、海丰进行了大量活动之后，迫于北京政府的压力，只得于1918年6月中旬重渡日本再去留学，同年秋季考入早稻田大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

这场由留日学生最先发动起来的爱国运动，虽然只进行了一天的正式请愿，但它却震动了北京政府的统治者。1918年7月22日，《内务部取缔留日学生抗议中日军事协定回国组织救

^①上海《民国日报》1918年5月25日，转引自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6页。

^{②③}蔡洛等：《彭湃传》，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页。

国团爱国会咨稿》中称：“留日学生代表阮湘等，前因抗议中日军事协定条件，废学归国，业经本总长多方开导谕令克日东渡，继续就学。乃顷闻该生等出京之后，有仍在天津以救国团、爱国会名义招引各校生徒集会、结社，并将遍设支会、分会于各地方等事。”^①翌年即爆发了规模巨大波及全国各地的五四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在五四运动爆发前，留日学生就对巴黎和会的情况十分注意。身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十分敏感，他们的信息又比较灵通。五四运动爆发前，巴黎和会事态与国内局势成为爱国的留日学生议论的中心。随着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情况的困难，留日学生对章宗祥等卖国贼更加愤恨。1919年4月11日，以彭湃为领导的留日学生狠狠地教训了将从日本归国的章宗祥一顿。4月11日晚，驻日公使章宗祥带着他的日本老婆请假回国，日本政界要人及其他国家驻日官员多人为他在东京车站送行。从中国驻日公使馆一位同情学生爱国运动的官员口中探听到了这个消息的彭湃约了黄霖生、陆精治、谢介眉等300多名中国留学生，早已赶至火车站挤进了站台。待章宗祥正欲上车之时，“早已站在旁边的彭湃原地挥拳一击，打在章的背上”，^②留学生们“大叫卖国贼，把上面写了‘卖国贼’、‘矿山铁道尽断送外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地向车中掷去。”将章宗祥的老婆吓哭，他本人也惊骇万状。这是

^①《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53页。

^②《彭湃传》，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20页。

留日学生与卖国贼一次面对面的交锋。^①

五四运动发生前夕，已有留日学生返回中国，积极参加国内反对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主权的民主主义运动^②。5月4日，留日学生救国团分电南北两政府：“山东青岛系我生死，日使强争由中日解决，国命危在旦夕。乞电专使严拒签字，决裂宁勿屈，生等誓死为后盾。”^③同时又通电全国：“各省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各团体、各报馆均鉴：我国自对德宣战以后，所有从前与德国订立条约，当然归于消灭：凡青岛及胶济铁路，均应由我向德直接索回；斯乃至当不易之理。乃日人恃强横行，妄思占领，乘意大利退出和会之际，要求以山东问题，归中日自行解决；否则步意后尘。列强为所要挟，竟已允其要求。幸我国专使，尚未签字。警电传来，薄海震惊。外交失败，国势愈危，凡我国民，应同悲愤；共图挽救，此正其时。查日人所以必欲要求将山东问题归中日自行解决者，一则欲以此为列强承认东亚门罗主义之证，因以显其特殊势力之权威。二则便彼提出严酷条件，要挟于我；不遂则为永远占领之计。野心昭然，中外共晓。假令鲁省竟为所得，从此凭借为军事上经济上之根据地，以与彼之关外势力相呼应，纵横北部而恣所欲为，黄河以北，恐非我所有矣。一隅丧失，全局危亡，生死关头，岂容让步，矧山东为孔子降生之圣地，尤应力为保存。专使既抗争于外，国民宜响应于内，全国一致，誓死力

^①《每周评论》第十八号，1919年4月20日，转引自李新主编：《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9页。

^②餐盒：《学界风潮纪》，载《五四爱国运动》（上册），第379页。

^③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59页。

争。宁可退出和会决不签字承认。并望各省召集国民大会，讨论办法，电告政府，始终坚持。庶凭民气，以挽主权。呼吸存亡，千钧一发。迫切陈词，无任企盼。留日学生救国团同人泣叩。”^①

留日学生救国团又致电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巴黎陆顾王胡施五代表公鉴：山东问题失败，举国同深愤慨，祈勿签字，速退和会。宁为攘夺，毋自断送，否则咎有所归，恐难为公等恕也。”^②又向南京李秀山督军、武昌王子春督军、衡州吴子玉师长等发电，企望他们致电政府力争主权，勿遽签字。

总之，留日的中国学生在五四运动爆发前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和呼吁，为推动北京的爱国学生走上中国政治舞台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从而为五四运动的发生作了重要准备。

3. 留日学生在国内参加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这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又是一场唤起民族觉醒的思想文化运动。运动以北京与上海为中心，波及到了全国，规模之大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从5月4日北京学生声势浩大的游行到6月28日斗争胜利结束，五四爱国运动以6月3日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北京为中心，主要是学生运动；后一阶段以上海为中心，

^① 督盘：《学界风潮纪》，载《五四爱国运动》（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01～402页。

^② 督盘：《学界风潮纪》，载《五四爱国运动》（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02页。

工人阶级加入运动当中并成为运动的主导力量。在运动中，青年学生起了先锋带头作用。而留日学生自始至终直接或间接参加了这场伟大的运动，并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对运动的发生、发展与胜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归国的留日学生直接参加了5月4日的游行准备及大游行。5月1日北京报纸透露出了中国在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5月3日晚，1918年归国的留日学生黄日葵参加了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的学生大会。会议有北大及北京其他各校学生代表共1000多人参加。会议决定第二天下午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在会上有人提议，留日学生可以那样对付章宗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他们三个（曹章陆）来一下？就是说，要把旗子送到他们家里去，大家一致同意，准备行动。”^①

5月4日下午，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集中在天安门广场，手持的旗子上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保我主权”等。黄日葵站在北大的学生队伍里参加了这一天的游行。下午4时半，游行队伍走到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纵火烧了曹宅，痛打了请假归国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当天31名学生和1名市民被捕。

北京5月4日大游行后，学生运动进一步发展，归国的留日学生为运动向纵深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5月5日起，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总罢课，并很快影响到上海。5月9日，上海的各个学校和学生团体举行了有20000人参加的国耻纪念日

^①杨晦：《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载《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23页。

大会，留日学生救国团干事长王宏实报告了开会宗旨。会议决定，致电和会代表，拒绝签字，要求严惩卖国贼，会后进行了大游行。于是，上海的学生运动开始与北京的学生运动相呼应、相配合而共同发展。在各方面的强大压力下，政府于5月7日释放了被捕的学生，但斗争还在继续发展。5月19日，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5月21日，在东京进行5月7日斗争后返回的部分留学生代表到达国内，他们与原已在国内的留日学生携起手共同投入正深入发展的五四爱国运动中。

留学生归国后，除与国内学生共同参加学生运动外，又以留学生代表的身份吁请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惩办卖国贼。

留日学生代表归国后主要集中在北京与上海，同时他们又写信鼓动各地学生投身运动。奉天籍留日代表归国后，向沈阳的学校写信做宣传鼓动工作^①。王若飞这时也回到上海，做抗日宣传工作^②。他是1918年3月赴日本留学的，当时他入了明治大学。不过他实际上只是在学校挂名领取官费，并未去过课堂，而是利用充裕的时间大量阅读进步书籍。后来积极投身到爱国运动之中。

5月31日，留日学生参加了上海悼念烈士郭钦光的大会。北大学生郭钦光在5月4日游行中，见军警逮捕爱国学生，气愤呕血而死。为了宣传烈士的爱国精神，激励人们的斗志，留日学生代表与上海学生及北京、天津等地学生代表于下午在西

^①刘立凯：《五四一六三爱国运动大事目录》，载《五四爱国运动》（下册），第509～510页。

^②马连儒 袁钟秀：《王若飞传》，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页。

门外公共体育场召开了悼念大会。留日学生凌炳登台讲演，列举了日本对于中国人民犯下的种种罪行，呼吁人们要把斗争进行到底。参加会议的有10000余人，会场周围“校旗林立，灵幡飞舞，会场中设烈士遗像，环以花圈，两旁分布军乐队……”^①实际上这次追悼烈士的大会，已成了上海“六三”运动的一次动员大会，预示着一场更大规模斗争的展开。

借各地学生代表来上海之机，留日学生与各地学生代表举行了非正式会议，出于长远考虑，拟研究成立全国学生统一领导组织。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于6月16日下午在上海大东旅社成立，留日学生代表廖方新、王之祯、凌炳、邹卫、刘振群、盛世才等6人参加了成立大会，并在大会上进行了演说。全国学联的成立，有效地指导了全国学生运动的发展，为五四运动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六三”运动是五四运动的里程碑，工人阶级直接参加了爱国运动。留日学生在“六三”运动后，仍对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6月3日、4日，北京政府逮捕了数百名演讲的学生。6日，留学生代表王俊、陈定远、卢复、罗振帮、张景铭、庄善昶、荆巨佛、张瑞峰、邹敬芳、彭玉伟等人前去慰问被捕学生，并致慰问书：“山东问题，稍纵即逝，誓死力争，责无旁贷。君等露天演讲，唤醒同胞，为国宣劳，至为钦佩。乃以非罪，竟被羁留。齐钺加于前而不惊，军警临于后而不惧，浩气所充，洵寒贼胆。代表等愤于外祸之日亟，痛国事之摧残，无涕可挥，欲言不尽。代表我留东五千学生，慰问诸君

^①彭明：《五四运动史》，第330页。

……”^①

以“六三”北京学生被捕为契机，上海开展了罢工、罢课、罢市的运动。留日学生直接参加了推动“三罢”实现的工作。

“六三”运动前，上海商界已有罢市的考虑，6月4日听到北京学生大批被捕的消息，更使人义愤。此时，归国的留学生黄日葵，作为北京学生代表和上海学生联合会会长何葆仁等，与上海商业学会会长们进行了接触。经过学生们的艰苦努力，再加上社会各界的支持，上海的三罢斗争终于在6月5日冲破了反动政府设置的重重障碍实现了。

6月10日，“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后，出于斗争的长期性考虑，居上海的中国留日学生在上海的半淞园开了一次谈话会，有50多人参加，会议发表了两种宣言：1. 公告日本国民，此次学生斗争不是与日本人民为仇，是因日本政府侵略中国人民主权引起的。2. 公告仍留在日本的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不必急于返回参加国内的斗争，应在日本向日本人民说明此次学生斗争，其咎在日本政府。如此做事之收效将高出留学生全体归国的举动^②。

6月21日，留日学生代表参加了上海学界和商界召开的会议，代表在会上发言，批驳了北京政府所列的在和约上签字的种种理由，强烈反对在和约上签字。

6月27日，和会签约时间已届，各地纷纷进行请愿活动。

^① 督龠：《学界风潮纪》，载《五四爱国运动》上册，第384页。

^② 督龠：《学界风潮纪》，载《五四爱国运动》上册，第388-389页。

这一日，在北京的留日学生代表参加了北京各界的联合请愿。参加请愿的共有五六百人。下午1点左右聚集在新华门，要求总统徐世昌接见，并表明对和约的态度，徐世昌不见；请愿的人们一夜没散，第二天上午徐世昌才出来相见，表示拒签和约等事，政府将竭力进行。

在上海的留日学生代表，于6月27日也参加了上海各界10余万人拒签和约的集会和游行。集会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举行，留日学生应邀在大会上做了讲演，反对在和约上签字，要求废除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大会给和会的专使和国内各团体发了电报。

除北京、上海之外，在国内其他地区的归国留日学生，也在同时进行的爱国运动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天津，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留日归国学生的贡献尤为突出。

1918年4月，周恩来因为在日留学期间参加政治活动过多，报考新的学校未果，转而回国到了天津参加实际革命斗争。这时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夕。五四运动期间，周恩来参加了天津学联的斗争活动，五四运动结束后，继续在天津进行革命活动。

在各界斗争的压力下，6月28日，中国专使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全国人民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五四爱国运动也至此结束。

4. 留日学生在日本声援五四运动

1918年反对“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时未归国的留日学生和归国后再返回日本的留日学生，他们虽未能亲身参加五四这

场爱国运动，但他们在日本同样热血沸腾，以积极的行动声援了国内的五四运动。

5月6日，日本东京的报纸透露，5月4日在北京发生了大规模学生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并有众多学生被捕之事。此消息一传开，立刻引起了留学生界的重视。当日在东京神田区中国青年会召开了全体留学生大会，决定5月7日下午进行请愿活动。他们四处联系会场，都因为日本警察的干预而没有成功，于是决定改在中国驻日使馆内开会，并派人与驻日代公使庄景珂联系，代公使未加可否。留学生制订了开会时的数条规则：“须持稳静态度严守秩序；对馆员示相当敬礼；须听职员指挥；禁衣倭服，不得轻与日警计较。”^①6日晚，留学生派出代表赴公使馆外探视，见使馆内外大布兵警。7日晨，公使馆请求日本政府派人警戒，赤坂宪兵队派出了五六十名骑马宪兵，连表町、麹町各警察分局也派出大批警官^②。见既定计划难以实现，留日学生临时决定分两大组，一组从葵桥下车，在旁边的小公园内集合；一组从三宅坂下车，在德国使馆前集合。每组分五小队，每队设队长一人，交涉员一人，掌旗二人。向各公使馆递交外交问题意见书。

下午两点后，每组都集中了1000多人。向三宅坂去的一组，行到各公使馆，即打出写有“打倒军国主义”、“保持永久和平”、“直接收回青岛”、“五七国耻纪念会”的白旗。行到德

^①王拱璧：《东游挥汗录》，载《五四爱国运动》（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85页。

^②实藤惠秀：《留日学生的两大贡献》，载《中日文化与交流》（1），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第25页。

国使馆巷口时，日本警察向学生挥刀乱砍，马队也冲入学生队伍，不少学生受伤和被捕。学生整顿了队伍又继续向前，到英法大使馆，学生面谒大使。到了大手町，大批警察来抢夺学生的旗帜，又有学生被捕。行至马场先门，有更多的警察来夺学生的旗帜，有一个学生抓住旗帜不放，被众多拥来的警察打倒在地。学生们回到中国青年会时，已有很多人受伤。

向葵桥方面的一组，行到中国公使馆附近，受到了大批日本警察的阻拦。学生代表上前解释并无闹事之意，警察不容分说，向学生发起了猛烈的冲击。执国旗的学生被警察打倒，抢走了国旗，又把人抓走。对于回返的学生，警察不许乘车并乱打。学生最后分散回到了中国青年会内。

学生们在这场请愿行动中，受到了中国驻日公使馆勾结的日本警察的污辱和毒打，并有 29 人受伤，有包括彭湃在内的 36 人被拘捕。被拘捕的学生一部分于第二天放出。

在这次请愿活动中，有 7 名中国留学生被东京法院判刑：

杜中、陈祚荫、石子云各被判徒刑 3 个月。

黄杰、刘国澍各被判徒刑 4 个月。

上述 5 人缓期 3 年执行。

赵云章被判 6 个月。

胡俊被判 10 个月。

5 月 7 日东京的这场留学生爱国运动，就这样被残酷地镇压了。除东京之外，在其他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也有所活动。5 月 7 日下午，大阪留学生在川口宾日俱乐部开国耻纪念会，医科大学和高工学校特别生，全都参加了大会。

北京的五四运动发生后，留日学生救国团又向全国发回致

电：“全国各学校、各报馆、省议会、教育会公鉴：山东问题失败，国人无不痛愤。比接京电，北京学界激于大义，聚众数千，游行街市，为国民的示威运动。国贼曹汝霖居宅被焚，章宗祥受伤毙命，举国称快，咸谓此举足以寒奸人之胆，作国民之气。不意政府横肆淫威，竟将被逮学生拟处死刑，悍然解散北京大学。似此专制之举，实属违背民意。夫外交失败，群情愤激，示威运动，各国恒有，偶越范围，情有可恕。矧章贼宗祥，国人指目。卖国之罪，事实昭然。被殴致死，深快人心。处学生以死刑，已大反于公理。甚至将 20 年经营举国称赞之国立大学，无理解散，是诚何心。因袒庇奸人而摧残士气，独不虑腾笑文明各国耶。诸公主持公道，对兹谬举，宁能坐视。望速电政府，表示反对。以拯可爱之青年，而培仅存之正气。不胜祷盼之至。留日学生救国团同人谨叩。”^① 留日学生在日本进行的斗争，有力地声援了国内的学生运动。5 月 7 日以后，留日学生派出代表返回国内直接参加国内的爱国运动。

随着国内学生运动的发展，没有归国的留日学生更积极在国外声援国内的学生运动。5 月 29 日，云南留学生发回公电：“上海各报馆暨学商各界公鉴：山东问题日趋危险，从此日人将扼我咽喉掣我生命，若国人再事徘徊、袖手观望，则亡国惨祸，立可实现。同人等惊惶万状，难安于学。誓死以从国人，挽此既倒之狂澜。顾时机危急，间不容发，祈贵报激烈鼓吹，唤起舆论一面力导国人，排斥日货；一面后援当局，收回主权，骨可碎，身可粉，孔孟圣域，决不可使日人稍有侵犯。庶

^①大中华国民编：《章宗祥》，载《五四爱国运动》下册，第 416 页。

我锦绣河山，得永保无渝也。临电迫切，不知所云。”^①

在日的中国留学生对国内五四运动的有力声援，与归国参加五四运动的留日学生一样，他们都被写入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史册。

总之，留日的爱国学生在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中，以其勇敢的探索和无畏的斗争精神，写下了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的光辉一页。

^①刘立凯辑：《五四—六三爱国运动大事目录》，载《五四爱国运动》（下册），第512—513页。

第 三 章

现代留学日本运动的新阶段 (1920—1930)

第 一 节

留日运动迈出重要的一步

1. 日本各界反省接收留学生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物价飞涨，留学生所需费用增加，尽管中国方面一次次增加官费数额，官费生的生活水准也呈下降趋势。官费生如此，自费生在经济上的压力就更大了。官费生解决经济困难的办法之一是回国请款。如：1920年4月15日，“东京中国官费留学生因物价腾贵举出代表三名归国

向本国政府陈述困难实状”^①；1925年12月29日，“留日官费生代表来京请款”。^②

中国各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因而，有的官费生失去了官费来源，自费生缺钱接济。

这一时期留日的陈新宪在《留东杂忆》中记述留日学生的生活状况时说：这时期的留日学生大体分三类，一类是官费生，一类是自费生，一类是政治流亡者，“官费生分两种，一是南北政府和各省政府派遣的，每人每月可领八十五日元；一是考得庚子赔款的，每人每月可领七十日元；有的省如湖南还补助庚子赔款生每人每月十五日元。私费生也分两种，一是自己家庭出钱，一是大军阀、大官僚为培养个人势力选派一些人去日本留学”，“流亡到日本的留学生在没有考取官费之前，大都靠社会关系借贷度日。就是在国民革命军当过团长的李涛、彭梦庚二同志，在总政治部任过主任的李一氓同志，生活也是艰苦的。……文艺界流亡到日本的生活更苦。与我在成城同班学日语的广东青年作家冯润章、冯宪章兄弟，有时两人一天共吃一个面包。我在头两年也常常得到湖南同乡人的帮助，特别是熊桓、范湖、曹修懋、龚成毅等人的支援比较多，还有刘裴、冯宏国、林滌非也是我的债主。大岗山的中国料理店，我们穷学生也多欠有伙食钱未清。”^③

1919年爆发了旨在反对卖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五四

^①耿申等：《北京近代教育记事》，第126页。

^②同上，第185页。

^③陈新宪：《留东杂忆》，见《邵阳文史资料》第七辑，1987年印，第176—177页。

运动。运动发生后，留学生返国参加斗争，运动过后有人没有再折回日本。

各种因素的作用，使这一时期留日学生人数基本呈下降趋势。为了便于看清留学生人数的变化情况，把几年中留日生人数列于下面：

1915年至1921年留日人数统计表

年 度	人 数		
	教育部直辖	公私立	合计
1915年	778 (17)	2333 (60)	3111 (77)
1916年	814 (18)	1976 (73)	2790 (91)
1917年	816 (12)	2075 (60)	2891 (72)
1918年	912 (12)	2812 (70)	3724 (82)
1919年	959 (19)	2496 (63)	3455 (82)
1920年	1015 -	2236 (44)	3251 -
1921年	1171 -	948 (36)	2119 -

●资料来源：二见刚史 佐藤尚子：《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关系系统计》。

●（ ）内数字为女留学生数，包括在总数内。

1914年的留日学生人数为3796名，自此到1921年，虽有所波动，但基本是呈下降趋势。

而在同一时期，中国人留美、留法的人数却不断上升，其势如潮。1912年，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吴玉章等人组织了留法俭学会。1917年起，中国先后成立数所留法勤工俭学的预备学校。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有17批共1670人赴法留学。特别是这一时期，中国教会学生数有较大增长，其人数如下表：

中国教会学生人数表^①

年份	1889	1906	1912	1916	1919	1920
人数	16836	57683	138937	184646	212819	245049

教会大学毕业生很多都出国留学。据对1920年到1925年统计，有89.4%是去美国。美国把庚子赔款的一半用于资助中国留学生，1909年庚子赔款留学生首次赴美，1911年成立清华学校，1917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1170人，其中官费生约200人，自费生约600人，庚款生370人。

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减少，中国人留学欧美热潮兴起，留学日本的学生对日本充满敌对情绪，引起了日本一些政治家的注意。在1918年的第40届国会上，高桥本吉等议员提出了《有关中国人教育的建议案》，留日学生的教育以政治问题第一次提到了国会上。高桥本吉说：“（本建议案的）另一精神是希望日本能改变对留日学生的待遇。1906、1907年之际，东京周围约有中国留日学生一万人以上。那时，我刚从美国留学返国，

^①陈元晖：《中国现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81页。

我以过来人的身份看到中国留日学生的遭遇，不得不对他们寄予深切同情。虽然东京到处都贴有‘空房待租’的招纸，而且也有表明欢迎中国人租用的，但欢迎的方式却不敢恭维。日本的私立学校，虽也收容不少中国学生，这不过是为了增加学校的收入而已，其教育方法也不敢恭维。我与宪政会的关君等同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博士门下受教育，校长对我们说了以下的一番话，谓：‘你们回国以后，若为人道和人类的幸福而努力，将会比在美洲的学生有更大的效果。’……亦即是说美国的教育是以对人道作出贡献为目的的教育。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教育果有这样高尚的理想吗？我相信不得不要大加研究一番。（拍掌声）假如有所谓为日本的利益而教育中国人，中国人是不会对此感谢的。我相信只有为中国人的利益而教育，才真正有利于东洋和平。”^①

这个议案还说，不要迫使中国留学生住在低级的公寓，也不要让他们过不三不四的生活，可能的话，应为他们开办宿舍或其他适当的设施。

此后，1921年的第44届国会，以及1922年的第45届国会上，都有议员提出有关中国留学生问题的议案，其主旨是要求政府改变对中国留学生的态度，为他们创造某些方便条件。第44届国会一份《关于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教育之建议案》中，就提出希望政府实行以下事项：

1. 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提供各种经济上援助。

^①实藤惠秀著，谭汝谦 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96页。

2. 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开放各种学校的门户，不必计较烦琐呆板的规定，简化其入学手续。
3. 对专为中华民国留日学生而设、提供以日本語为主之中等程度的预备教育，其成绩昭著的私立学校，予以相当保护，充实其设备，以收完全教育的效果。
4. 我国文部省与中华民国教育部之间，曾协议每年派遣定额官费留日学生入学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及千叶医学专门学校。此协议在1922年度将届期满。政府与中国当局，应坦诚交涉，订立永久之协定，且尽可能增加官费留日学生名额，又除上述四校以外，亦应订立广泛收容计划。
5. 应研究中国留日学生之实况，予以善导，使其了解我国真实国情，以达成原有之教育宗旨，使无感遗憾，故当设立中国留日学生教育调查会之类的机关，而以精通中国事情之朝野人士组织之^①。

总之，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兴起已有20余年的留日运动，已开始从日本方面进行反省。

2. 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实施经济援助

1922年3月14日，在日本各界人士的强烈要求下，日本

^①实藤惠秀著，谭汝谦 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99页。

第45届国会通过了关于中国留学生的建议案，其内容主要为：

一、中国留学生特约教育的5校协定于1922年期满后，日本政府将应中国政府要求继续延长协定。

二、对每年数百名成绩优秀的留学生给予相应的学费补助。

三、为了达到留学教育的目的，对留学生基础教育的预备学校，由国库补助相当数额的经费。

至此，日本政府把在经济上援助留学生，扶持中国留日运动发展，作为国策确定下来。

日本政府决定在经济上援助中国留学生，一是视中国学生远日而转向欧美“为一可忧的现象”，二是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想重塑自己的形象。其出发点姑且不议，其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却是意义重大，从此，日本政府一改对中国人从清末留学日本以来的冷漠态度，开始重视中国人的留学教育，这也是20世纪初期留日运动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问题。

在第45届国会前后，日本政府为扶持中国留学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做了几件有益的工作。

第一，1921年，日本政府补助日华学会15万元，用以经营中国留日学生宿舍，这是日本政府首次资助民办的中国留日学生教育事业，也使日华学会成了与留日学生教育有关系的一个重要机构。日华学会成立于1918年5月，是统筹留日学生事务的半官方机构，它是用辛亥革命爆发之际日本实业家组成

的“留学生同情会”为留学生筹集的十几万元创建的。这笔钱清政府教育部归还日方后，日方觉得无法处理，于是用这笔钱组建了日华学会。学会的方针是：为中国留学生稍尽微力，以减少其远客异乡之不便，兼为来日视察、观光者提供方便。1921年日本政府向日华学会提供援助，是日本政府首次资助非官办的留日学生教育事业，使日华学会成了经营留学生宿舍，介绍与指导留日学生的一个为留学生服务的重要机构。

第二，继向日华学会提供资助后，外务省于1924年成立对华文化事业部，用以推动对中国的教育文化往来。该部确定利用庚子赔款资助下列事项：1. 关于在中国应办之教育、学艺、卫生、救恤及其他发展文化之事业；2. 对居住日本之中国人士推展前项所述之事业；3. 在日本进行有关中国学术研究之事业。日本政府推出上述政策后，遭到了留日学生的反对，认为此举具有文化侵略的企图。1923年6月26日，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发表宣言进行抗议。当时留日学生刊行的一本小册子这样说：“日本最近又抛出对华文化事业，图在昔日中日友好的招牌上涂抹新姿，满以为借此就可以责怪中国人忘恩和不友好，这又是个大错。日本对华文化事业不容中国人参加意见，只为日本帝国利益打算，全不计及中国人本身的利益。这分明是日本在中国大陆上实施殖民政策的前驱或附属的事业而已。这是何等奇妙的现象！假使日本真要为中国人谋求利益，但同时在另一面却又用残忍苛刻的二十一条来迫中国人。这种做法，与在中元节赠物他人，而又夺取其家产以至宅地作为交换的情况，丝毫没有差异。像这样的恩惠或友好，我们无论如

何不能接受。”^① 中国国内各方面对日本政府上述的具体实施办法也提出了各种疑议。最终结果，日本利用庚子赔款援助了320名留日学生，每人每月补助70日元。

第三，日本政府取消了收取留日学生委托费。以往，从清末中国人留学日本开始，日本政府对留学生教育经费就不予补助，留学费用全靠中国这一方面支付。1908年清朝驻日公使与日本文部省之间有“特约五校”（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之约定，考上这5所学校的每名留学生，清政府支付200至250元作为委托费，由日本文部省转拨给5所受托的学校，作为教育留学生的费用。由留学生派出国向留学生接收国交付留学生教育费用，这无异于留学生派出国自己培养学生，此种现象当时在世界上只存在于日本。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向经济发达的国家交付留学生费用，也有损于日本的国家形象。在日本各界的非议下，日本政府于1919年至1920年间开始谢绝中国政府的留学生委托费，改为由日本政府从国家预算中拨款来进行留学生教育。日本政府把留学生教育正式列入国家预算，走出了关心留学生教育事业的重要一步。

3. 留学生帮助华工成立共济会

这一时期，留日学生与旅日华工发生了较多的联系，其表现之一是帮助华工成立自治组织共济会，从各个方面为华工解

^①《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关于排日问题之宣言》，转引自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101页。

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一战期间至战后初期，日本经济发展，就业机会增多，很多中国的普通劳动者赴日寻找生机。据日本学者山胁启造在其《近代日本的外国人劳动者问题》一书的资料，1923年8月底，中国工人在日人数为7349名。这一数字，不包括已定居日本或长期居留的旅日华侨，都是一战前后流入日本的华工商贩，他们或运国内产品去日贩卖，或充临时性的苦力。在他国异乡，华工生活艰难困苦，还处处遭受欺凌与侮辱。

从1920年起，日本发生经济危机，随后开始排挤华工，日本政府还照会中国驻日公使，“希望中国能自动审查赴日之侨民，其原因近来无职业及不正当之华人，渡日者人数过多，该国已受极大之损害，故不得不出此云。”^①

安徽留日学生王兆澄，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读书期间，发现名古屋有许多流动性很大的华工，引起好奇心，开始留意，他发现华工们生活很困苦，不由生出怜爱之心，想为他们做些事情。他想尽种种办法，为华工办了一个“共济号”，带有寄宿舍性质，他也在那里与华工们同住。后来他知道，像这样漂流在日本的华工，不仅名古屋有，其他地方也有，东京更多。

由此，王兆澄等留日学生开始考虑怎样更多地帮助华工的问题。“民国十年六月六日（1921年7月10日），留日青年会召集留学生领袖，在箱根郊外开讨论会，讨论留学生生活问题。在此会中，遂由（王）希天、（王）兆澄两位提议，决定

^①《申报》1923年3月4日。

以后对于华工加以特别注意。同年七月下旬，青年会在大原海岸举行夏令会，希天为会中执行干事，又讨议此事，拟设法防止华工的困难，并谋其福利。当时，有日本最著名之社会服务家救世军大佐山室军平氏在会，希天以救济华工问题与之讨论，甚得其指导。约于九月在东京竭力谋划办法，没想到未及九月，在八月下旬，日政府即下追放华工回国命令。当时幸赖留日学生总会、青年会、圣公会，各方面奔走运动，这逐客令遂得缓和。至九月五日，希天邀集此三团体之代表，到华工所住的地方大岛町视察情形，由希天提议，为此等救济事业，若不与日本宗教团体一同来办，恐怕不易生效；救世军大佐山室氏，在大原时曾有情愿协助之语，最好先与商洽办法。经全体赞成其议，希天遂访山室氏，得其同情并为介绍一位从事于劳动事业 17 年、富有经验之青木中校帮助一切。希天又同青木中校，再往大岛详细视察，耳闻目睹，苦不堪言，深感有为华工设立事务所、组织华工团体之必要。经希天与日本警视厅、中国公使馆、留日各团体领袖磋商讨论之结果，第一步的办法：为在东京大岛町华工最多之处，设立一事务所，便于华工接洽一切事务。第二步的办法，则为华工组织一团体，定名曰‘共济会’。遂于民国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大岛町共济会之事务所内开成立大会。是日，工商代表者 80 余人，公使馆江秘书致训词，救世军青木中校、留日学生总会彭干事长、青年会蒋干事，均有极诚挚之演说，激励会众，当场公举委员 20 人为共济会之委员，希天被举为委员长，这是共济会最初的时

代。于是，数千华工商始有所依系。”^①

共济会的章程共有 5 条：

第一条 本会定名为中华民国侨日共济会；

第二条 本会由侨日华工与行商及热心改善工商事业者组织之；

第三条 本会以培植德行、户牖知识、联络感情、互相帮助为宗旨；

第四条 本会本部会址设于东京，但在日本国内各处有会员 50 人以上，且有一定会所，经总理事之认可者，皆得设立支部；

第五条 本会为达到第三条之宗旨，故励行下列内外两部之事业：（甲）内部：一、改善会员之卫生状况；二、禁绝会员之不正行为；三、扶助会员之失业病灾；四、提倡会员之补习教员。（乙）外部：一、代会员介绍职业；二、代会员缔结契约；三、代会员交涉一切；四、代会员谋图利益^②。

共济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筹款，如从民国十一年（1922）九月至民国十二年五月，王希天在神户、横滨、大阪诸华侨中募得 1965 日元。二是会员捐助，曾参加共济会的温州朱有典回忆：“共济会会员主要是温州人、青田人，其他地方的华工也有参加，……共济会的经费，我们华工都有捐助，每人每天捐献一分钱。因为共济会经济困难，又在共济会

^①谢介眉：《王希天君小史》，转引自《东瀛沉冤》，第 41—42 页。

^②见《申报》1923 年 5 月 8 日。

机关门口设一间冰棍店，抓点收入补充。”^①

共济会设总部于东京后，相继又在名古屋、京都、大阪等地设立支部。据《申报》报道，1923年5月中旬，共济会“会员不下3000余人，其中除少数行商外，大部分均系工人，工商兼营者亦不少。”东京大岛町方面1300余人，三河岛分会800人左右，横滨附近200余人，名古屋支部400人，岐阜100人左右，大阪支部200人，散处其他各地者约千人。

日本政府驱逐华工，大概以他们住所不洁、行为不正为口实，故此，共济会成立之初，即为华工订了以下之约：

一、不正行为罚则：

1. 凡设赌抽头及吸食鸦片者，一经查出，初犯者罚金5元；再犯者送警察惩治；三犯者呈请总领事会同日本警察追放归国。

2. 凡工头、栈房等，如贪本会规定以上之渔利时，一经查出，初犯者罚金惩戒；再犯者不准其包工或关闭其栈房。

3. 其他一切有辱国体行为者，如经本会查出，严惩不贷。

二、合宿所规约：

1. 一叠至多只得住一人。

2. 寄宿者之宿费，一律每人每月暂定4元8角，每日照算。

3. 屋内家具须安置整齐，不得任意乱扔乱放。

4. 屋子每日最少须扫一次。

^①章志诚先生调查笔录，见仓心言（章志诚）：《爱国志士王希天与共济会》，载《东瀛沉冤》，第17页。

5. 凡寄宿者，每人每月须缴会费 3 角，由本会特认之维持员随时代收。

6. 本会职员得随时纠察会员之收据，如有过月不缴会费者，罚金一倍。

7. 15 叠以上合宿所之管理者，每半年须缴会费 5 元；15 叠以下合宿所之管理者，每半年须缴会费 3 元^①。

共济会成立后，仍时有欺凌、限制华工之事发生，如名古屋、千叶等地禁止他们打工，东京大岛町华工开设栈房被勒令停止。王希天认识到，共济会应吸纳有影响的人物成立董事会，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团体。民国十二年（1923）三月，王希天“召集共济会本支部联席会议于箱根，讨论共济会改组办法。决定请我国留日之有力机关团结一处，即为共济会组织一强有力的董事会，请驻日公使总领事及领事、商会会长、青年会干事、圣公会牧师、留学生领袖、有功于共济会者、其他团体及素孚众望者为董事。回京以后，董事部如议成立，公使江子因秘书被举为董事长，长福总领事为司库，吴汉涛干事长为书记。陈延龄委员、俞显庭牧师、马伯援干事为董事。又由董事部投票公举马伯援君为共济会会长，但马君坚辞不就，故会长职仍请希天担任。”^②

共济会成立后，为华工主要做了如下事项：

第一，设立治疗部和施药局。王希天先委托友人孙绍唐医师调查华工卫生、疾病状况。治疗部设立后，凡华工发生疾

^①谢介眉：《王希天君小史》，转引自《东瀛沉冤》，第 43—44 页。

^②谢介眉：《王希天君小史》，转引自《东瀛沉冤》，第 43 页。

病，均可享受免费治疗。

第二，设立教育部。赴日的华工，大都从小失去了教育，到了日本困难重重。1923年2月10日，“共济会假中国青年会开会，希天报告华工的教育情形，为大岛一方面，虽有一千余劳动者，而受过普通知识的，亦不过渺渺数人，甚至目不识丁者有之。论到日语，更不用说了。照这样的情况看起来，华工在日，当然没有立足的地位了。当时就感动在座的男女学胞，约有20余人决意为华工设立教育部，所以就在大岛町办起一个华工夜学校来。这学校的宗旨，就是要灌注华工都有普通的知识，而特别注重学日语，每日自午后6时到8时半，分两处授课”^①，以提高华工在日本谋生的适应能力。

第三，设立慰问部。慰问部内有8名男女留日学生主持部务，他们轮流前往华工客栈访问，向华工示以如何讲卫生，如何禁赌，对特别整洁者，发给奖品以鼓励。

第四，维护华工权益。王希天带领共济会成员，对日本工头、资本家及日本当局进行了讨债（无理拖欠华工工资）、被殴（野蛮殴打华工）、禁工（不准华工做工）等方面的交涉。责令日本工头不得克扣工资；要求日本当局处理工头殴打华工的野蛮行为，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呼吁日本各界进步人士、中国驻日公使馆官员出面与日本当局交涉，促使取消禁工令，以保证华工在千叶、名古屋、东京、大岛町等地做工和行商。

^①谢介眉：《王希天君小史》，转引自《东瀛沉冤》，第45页。

4. 以留学生身份从事革命活动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各地纷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为共产党诞生奠定了基石。在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小组中，即有以留日学生施存统、周佛海为代表的东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共产党成立，周佛海以东京小组代表身份参加了大会。从这时开始，留日学生一批批地去而又归，但共产党在日本从事活动却未间断。参加活动的这些共产党人，基本是以留学生身份出现在日本的。

以留学生身份活动在日本的共产党人，其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的作用却不可低估。在日本期间，他们的活动主要有两种，一是组织广大留日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一是带领留日学生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以留学生身份活动在日本的共产党人，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留日之前已是共产党员，一是留日期间加入共产党组织。

赴日前已是共产党员的留学生，有的是奉党组织之命去日本在留学生中间从事革命活动的，有的是由于个人的原因而赴日，到日本后进行革命活动的。

王步文是奉中共党组织之命留学日本的。1925年6月，中共为了加强对海外革命工作的领导，派他赴日留学^①，任中共旅日总支委员，并任国民党驻日总支政治部常委，1926年夏，始任国民党东京总支书记。留学期间，王步文积极从事革

^①《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二十六卷，第162页。

命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进步留学生与华侨，团结国民党左派人士。

王步文留日期间，多次组织政治活动。1926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事先通知在东京的国民党总支部选派一名代表回国参加会议。代表选举会召开时，王步文阐明选举代表回国开会的意义，揭露了以汤志先、王先强等留日学生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说他们言论虽为革命，实是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背叛。他的发言，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使西山会议派陷入了孤立。败坏已极的汤志先、王先强等人在会场大打出手，制造混乱。汤志先手持短刀，突然向王步文刺去，被人挡开逞凶未成。最后，王步文被选为代表回国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6年冬，蒋介石加紧叛变革命的活动，为争取日本的支持，派戴季陶去日活动。在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王步文团结进步力量，对国民党不惜出卖主权的活动进行了有力的斗争。在“欢迎会”上，他以国民党东京总支部的名义，向戴季陶提出两项建议：一，在日本政府没有和国民党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以前，不得与日本当局谈判、借款、购买军械或订立密约，以致影响团结，破坏北伐；二，与日本朝野人士接触的内容和结果，必须随时通知驻日总支部，必要时向国内外发表公报。否则，中国旅日各界将采取一致行动，坚决反对^①。王步文还对住在东京帝国饭店的戴季陶以“招待”为名进行监视，终使国民党策划的这次活动没有得逞。

^①《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二十六卷，第163页。

1927年2月，王步文奉调回国，去上海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同时也结束了留学日本的生活。

江隆基主要是出于个人的原因赴日留学的。1927年6月，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江隆基加入了共产党。同年暑假，长兄江裕基在日本已考取官费，叫他也往日本去考官费生。1927年9月，江隆基赴日留学，次年3月考入了明治大学。去日本不久，他即参加中共东京支部活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与长兄译出《新经济学大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批判者的批判》等革命书籍。他还担任明治大学中华校友会主任，组织留日学生进行革命活动。“一九二八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先后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和‘济南惨案’；一九二九年，又进一步加紧了武装侵略中国的部署。为了抗议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一九二九年九月，在中共东京支部领导下，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闹市区——银座，举行抗议示威活动。江隆基参加了这次活动的组织工作。那天，二百多名留日学生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时间来到银座，相继发表演说，诉说‘皇姑屯事件’、‘济南惨案’的经过，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还向日本民众散发了传单。会后，举行游行示威时，江隆基走在队伍的前列高呼口号。当游行队伍刚刚行进不远的时候，日本警察汹涌而来，抡起棍棒向学生乱打，江隆基和二十多个学生被抓走，投入监狱。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当局将江隆基等五六个人驱逐出境押送回中国。当他们到达天津码头时，受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学联代表的

热烈欢迎。”^①

黄松龄与童长荣都是在留学日本期间加入共产党的。

1924年初，黄松龄赴日留学，进明治大学当研究生。同年夏，中华留日学生会总干事马哲民介绍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随青年团组织集体转入留日学生地下党”^②。此后，他除了完成一年一篇的研究生论文外，将全部精力都投入了革命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大连市委书记、东满特委书记的童长荣，1925年前后在安庆积极组织学生运动，当地军阀为使他不继续“肇事”，便公费送他赴日留学。1925年7月，童长荣与王步文、余大化等人东渡留学。留日伊始，他即积极参加学生活动，成为学生运动先锋和领导骨干。1925年下半年，加入了共产党。从此，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更积极地投身于学生运动。反对汤志先等西山会议派留学生的斗争，反对戴季陶赴日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即是他同王步文等人所领导的。

1926年春，童长荣当选为中共东京特支领导人之一。1928年5月，日军枪杀济南军民5000多人，制造了“济南惨案”。留日学生闻讯而起，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童长荣等人领导组织了“中国留日各界反日出兵大同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斗争。他们一面向日本当局提抗议，一面联合日本各种进步力量，争取国际友人声援。他们还组织“留日学生归国团”，准

^①《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二十一卷，第193页。

^②《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三十六卷，第218页。

备沿途进行宣传鼓动。童长荣的活动，惹恼了中日两国有关当局。他的官费被取消，又被日本当局逮捕关进监狱，最后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被驱逐出境^①。

这时期以留学生身份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的共产党人，由于国内的国共第一次合作等原因，他们有人同时又身兼国民党东京支部中的职务。这时期以留学生身份在日本进行政治活动中的人中，只属国民党成员的也大有人在。20年代，日本东京有两个国民党支部，一个是左派的组织：孙中山直接领导的国民党中央海外部直属驻日总支部；一个是右派的组织：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国民党支部^②。夏衍留日期间，参加了国民党，以留学生的身份在前一个支部之下从事了大量革命活动。

夏衍于1920年9月赴日本留学。到日本后，教学严格的明治专门学校招收9名中国留学生，夏衍即在录取之列。在明治学习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各方面书籍，同时积极参加日本进步学生的活动。1923年，他认真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并结识了“解放运动之父”松本治一郎和民主主义思想家、政治家大山郁夫，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夏衍投身于社会活动，参加了日本进步学生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并开始接触一些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他与孙中山还有过一次令人难忘的接触。1924年年底，在孙中山亲自安排下，夏衍加入了改组不

^①《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六卷，第324—325页。

^②会林 绍武：《夏衍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第36页。

久的中国国民党。1926年夏衍从明专毕业之后，于4月考入九州帝国大学工业部冶金学科。不久，他到东京担任了国民党左派直属驻日总支部的党务委员兼组织部长，主要做留学生和华侨的组织工作，同时开始与日本共产党、劳农党领导人接触，结识了日共书记渡边政之辅。1926年冬，他出席了东京的中日两国革命团体联谊会。在日本留学的后期，夏衍只是把进入九州大学作为领取官费以维持生计的条件，实际已是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活动中，大学课程几乎一门也没有修完。1927年5月，“夏衍由于在日本的革命活动，受到当局的威胁无法存身，由何兆芳等同志安排携带着日本华侨中的国民党员名单及党证被迫回国。”^①“留学七年，在人生道路上给夏衍留下的最重要的印迹是：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而急迫地追求。”^②

第 二 节

关东大地震前后的留日运动

1. 留学生中政派林立

留日学生，有一部分是大军阀、大官僚所派遣，以期培养成个人的势力，像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张学良、李宗仁、谭延闿以及各省军阀，像四川各派军阀刘湘、刘存厚、杨森、邓锡侯、刘文辉等，他们不论在野，还是在朝，

^①会林 绍武：《夏衍传》，第41页。

^②同上，第30页。

都曾往派学生留日，军阀、官僚或以集团的名义公费派遣，或以个人的名义资助前往。他们所派出的留日学生，学政法等专业的少，学军事的多。

以湖南唐生智来说，他在1927年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湖南省主席时，第一批派出留日学生18名，其中黄克虎、王昌烈、李九思、徐恕、蒋太衡、杨哲、谭咏幽、李振亚八人是长沙三分校六期学员中选优考试录取的；吴渠轩、刘建义、范湖、唐天德、凌铁铮、熊桓、吕节、陈蔚森、龚成毅、何长五等十人是唐生智本人及其部下吴尚、龚浩、熊震、刘建绪等人的亲属。从1928年至1930年，18人分3批，每批6人，分别进入士官学校第21、22、23期。第二批又派席雍等人，进入了第24期。

对这些留学生，唐生智很是关心，每月给每人70日元，还专派一位经理员负责管理这批留学生。

再以奉系军阀为例。早在张作霖就任奉天督军兼省长之后，当局于1916年夏对留日学生情况进行调查，据20个县所填调查表可知，其时留日的官费生21名，津贴生13名，自费生34名，共计68名。此后，奉系当局对派遣留日重视有加，人数也不断上升，到1918年时已达到150余人。奉系当局重视的办法之一是加强管理，确立制度，制定奖励办法。相继制定的有《奉天省管理留日学生暂行规则》、《奖励自费留日学生办法》等。

进入20年代，奉系当局对留学活动的重视有增无减。1921年10月，教育部发出通知，对自费留学生因偶然事件、汇兑不通、学费断绝等不能继续就学者，可借费遣送回国。张

作霖对此置之不理，他说：“凡国家要想富强，哪有不注重教育与实业会能成功的呢？……现在急就的法子，就是凡本省自费出洋的，都由省政府酌量予以救济，不使他们失学。近来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有数千人，以本省官费断绝流离失所，衣食不给。国家送出这些学生，到外国陷入这种穷苦的样子，成何体统，国家的颜面何存；我着实可怜这些呼救无门的学生，所以前几天我拿自己的钱，给他们汇去 10 万元，稍解他们目前之急。他们这些人都是外省，南北东西都有，我是不分畛域的待遇，因为他们都是国家的人材，何必分什么你我。”^①

1923 年，奉系当局再制定奖励自费生的办法，规定凡能考入奉省所指定之日本大学和指定学科的本省自费生，按等分别奖励 600、500、400 日元，这一奖励标准，已远远高出教育部于此前所公布的有关奖励标准。

1923 年奉省指定奖励的日本学校有 40 多个，专业有 30 多个，其详情如下：

预计奉天奖励留日学生之学校

预定科目	调查预定学校
理科	帝国大学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①1921 年 12 月 5 日张作霖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孟禄的谈话，转引自孙景悦 董慧云 张秀春：《张学良与辽宁教育》，香港同泽出版社 1993 年，第 258—259 页。

造兵	帝国大学
机械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大阪高等工业学校 明治专门学校
应用化学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大阪高等工业学校 明治专门学校
电气工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大阪高等工业学校 明治专门学校
探矿冶金	西京帝国大学 大阪高等工业学校 早稻田大学采矿冶金科 秋田矿山专门学校
土木工	北海道帝国大学 东京帝国大学 仙台高等工业学校
船用机关	大阪高等工业学校
电气化学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明治专门学校
图案	东京高等工艺学校 京都高等工艺学校
窑业	东京高等工艺学校
纺织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

色染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
建筑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早稻田大学工学部建筑科
酿造	大阪高等工业学校
蚕丝	上田蚕丝学校 东京高等蚕丝学校
火药	帝国大学
农科	东京帝国大学 北海道帝国大学 盛冈高等农林学校
林科	东京帝国大学 北海道帝国大学 盛冈高等农林学校
水产科	北海道水产专门学校 制造科渔捞科 东京水产讲习所
医科	千叶医学专门学校
药科	千叶医学专门学校 富山药学专门学校
兽医科	帝国大学实科 盛冈农林学校
商船	东京商船学校 神户高等商船学校
文科	帝国大学

教育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帝国大学
法律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帝国大学
政治	帝国大学
经济	帝国大学
商科	东京商科大学 神户高等商业学校

已指定之学校

东京帝国大学	西京帝国大学
九州帝国大学	北海道帝国大学
东北帝国大学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大阪高等工业学校
仙台高等工业学校	千叶医学专门学校
东京商科大学	秋田矿山专门学校

拟指定之学校

明治专门学校	早稻田大学建筑科采矿冶金科
东京高等工艺学校	京都高等工艺学校
名古屋高等工艺学校	盛冈高等农林学校
东京高等蚕业学校	上田蚕丝学校
北海道水产专门学校	东京水产讲习所
富山药学校	东京商船学校

神户高等商船学校 神户高等商业学校^①

奉系当局向日本派遣军事留学生，有一个发展过程。早在清末，最初中国政府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每年派遣的100名留学生中，奉天省占4名，以后逐有增加，其经费由练兵处和奉天省各承担一半。奉系军事集团形成初期，不重视军事学术和教育训练，致使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不战而溃。1923年，奉军成立陆军整理处，张学良、郭松龄倡导选送留日学生，当年秋即行选送，入日本陆军大学的有徐祖诒、郭鹏乔、高胜岳等6人，入步兵专门学校（千叶县）的有张学成、张廷枢等5人，入骑兵专门学校（习志野原）的有郭希鹏、徐英等5人，入炮兵专门学校（四街道）的有刘翰东等3人，入工兵专门学校（江户川）的有郭尔珍、李得志两人，这些人以张学良、郭松龄所直属的军队为多。

1926年初，张学良又选派一批军人留日。据此次随留学生赴日主管财务的荆有岩回忆：“经日本顾问坂西利八郎联系，并有大仓喜八郎支持，为时不久即得日本陆军省同意。这次办理手续快而且未限名额，原因是一方想扩大日本的影响，一方在增强中国军阀内讧的力量。当时全国各军阀，均有遣送到日本的留学生。这次派送日本留学，完全由张亲自部署；一部分是指定的，一部分是部队长保荐，经张允许的；一部分是经部队长推荐，经过考试录取的；也有一部分文学生经有关人士推荐于张的。人员确定，先在沈阳大西边门外（山东庙）学日

^①孙景悦 董慧云 张秀春：《张学良与辽宁教育》，第259—262页。

语，不到两个月，大仓建议去东京学日语，因为到外国学的快。于是在1926年4月下旬，将二十八人组织起来，称为东北留日将校委员会。以栾云奎为委员长（专职），高胜岳副之（陆大在学），荆有岩主管财务，组成即行东渡。不久，栾云奎调回国，又增加荆有岩、王握前、乔方为副委员长。在临行前，每人给治装费日金一百元；到日本之月起，每人就学津贴每月日金一百三十元。我们于五月初到东京，路上均由大仓组接待。……1926年5月，我们这一批入牛込区成城学校，特开一班专学日语，由精通中文的服部先生为指导。一年后，即1927年暑假后，由日本陆军省分别派人指定学校。计陆军大学：王握前、董芝芳、齐家桢、贺奎四人。步兵专门学校：陈家桢、王维藩、窦希哲、王肇治、于澄、马镇夷、张学铭、宁向南、王树屏、常经武、杜长龄十一人。骑兵专门学校：张庆第、张守经二人。炮兵专门学校：乔方、吴克仁、何宏远、陈昶新、刘佩韦、金镇、赵济民、刘墨林八人。工兵专门学校：杜维纲、周振功、荣子恒三人。航空专门学校：孙炎、姚东焕、张在善、李笑天四人。陆军士官学校：秦诚至、齐常升、蔡宝濂、赵云飞、王化兴、朱式勤、孙铭九、高胜仑、杨国栋、何震东、赵维周、徐涛庸、袭振宇、谢如川、周文章、何竞华、汲绍刚、赵石羽、曹瑞麟十九人。陆军经理学校甲种班：荆有岩、温润芳、熊毅烈三人。北京陆军部派送而归东北救济费用者：张乃恒、李树元、郑文学三人；帝大经济系：靳敬箴、曹树章、墨林翰三人；陆军军医学校：任作楫、陈国

瑞、雍世勋三人。”^①

各地军阀、官僚争相往日本派遣留学生，其结果之一是使留日学生中派系林立。据说，“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分为三大派系：第一，以同泽俱乐部为代表的奉系军政及自费留学生，比较团结。其次为蒋介石所属国民党派系，以东京神田区的中国青年会为聚点，人数较多，但很分散。第三为冯玉祥国民军派系。”^②各派系之间有争斗，如士官第21、22期的齐常升、蔡宗濂、赵云飞、徐涛庸、曹瑞麟、赵石羽等人，虽属东北籍，但他们原为冯玉祥国民军所派，后来归附了奉系。北京陆军部派的陆军经理学校生，及由该校甲种班转入帝大经济系的共六人，因陆军部困窘，无力支給费用，转而由张学良补助费用，只是没有强求他们在东北军工作。各派系与其他留日学生也有斗争，如当时追随蒋介石的东京黄埔同学会，“对留学生各派反蒋势力进行破坏，对各军事学校的留学生进行政治拉拢”；“1930年秋，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竟与日本政府进行勾结，对我国留日学生、进步人士采取大肆搜捕，一夜之间密捕四百多人，其中有十余人竟被日本政府强令归国，抵上海后即下落不明。”^③

对于持各种不同政治观点、不同派系留学生之间的分歧、斗争情况，1928年秋赴日留学的陈新宪有所记述，他说：“由

^①荆有岩：《奉军派遣军事留学生简介》，载《辽宁文史资料》第六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3—85页。

^②荆有岩：《奉军派遣军事留学生简介》，载《辽宁文史资料》第六辑，第84页。

^③陈新宪：《留东杂忆》，载《邵阳文史资料》第七辑，第183页。

于留日学生在政治上有各种派别，如：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有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有信仰工团主义或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有奉社会民主党主张的，有信仰托洛斯基主义的，有奉行第三党主张的，有奉行革命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左派，有拥护蒋介石的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戴季陶主义者，有拥护汪精卫的国民党改组派，还有拥护地方军阀的杂七杂八的政治集团等。因此，各种集会常因争夺领导权和意见分歧，多以争论斗殴而散会。我在东京几年参加的各种集会，除欢迎梅兰芳京剧团（梅兰芳于1930年应美国总统威尔逊夫人的邀请赴美，路过东京），欢迎第九届远东运动会（日本叫第九回极东运动会）中华代表团团长张伯苓（当时南开大学校长），欢迎印度诗人泰戈尔几次会议太平无事外，其他不论一年一度的‘三二九’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四一’、‘五一’、‘五四’、‘五九’、‘五卅’、‘六三’济南惨案、‘九七’辛丑条约纪念、双十节……总是以争吵或斗殴散场。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各派政治势力方形成团结一致举行反日游行。当时留日学生在各大学也有同学会的组织，特别是几个名牌私立大学，如早稻田、庆应、明治等校留学生比较多的，各派的斗争也比较激烈，同学会一年一度的改选，每每是通过激烈的较量，有的如早稻田大学有连续两年（1929—1930）改选无结果。”^①

上述那些所谓的留学生之间的分歧和斗争，表明留日运动本身不仅是留学活动，它还是一场政治活动，只不过这种政治有时表现强些，有时表现弱些，其强弱基本是随国内政治斗争

^①陈新宪：《留东杂忆》，载《邵阳文史资料》第七辑，第182—183页。

强弱而跳动。

2. 大地震后留学生的灾难

1922年的日本第45届国会给留日运动带来了一片曙光，但是，随之不久的关东大地震发生，其后所发生的情况，给留日运动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

1923年9月1日中午11时58分45秒，关东大地震发生，震级达7.9—8.2级，大小震动达1029次，持续近6昼夜，其中大震三四次，震中地区，有山崩、海啸发生，土地裂开，铁轨弯曲。据说这是60年来日本最大的一次震灾，受害人口达340万，其中死伤30余万，财产损失达百亿日元。

地震发生后，东京、横滨火烧3日不熄，东京受到的损失最大，市街被烧毁约三分之二左右，留日学生集中居住的神田、本乡和下谷等地区，正是地震灾区中心。这场自然灾害给留日学生带来的灾难是巨大的，多年来招收中国留学生的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商科大学、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明治大学等高等院校被烧毁；中国公使馆，留日学生监督处、中华青年会馆、日华学会、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等与留学生关系密切的机构与学校也被烧毁；留学生居住的房屋多被烧毁，留学生的书籍及物品损毁得荡然无存。大火过后，东京全市停业，一切停顿，一片狼藉，受灾的学校付之一炬，侥幸没受灾的学校也都停办，举目无亲的留学生，生活、学习无着落，极为困难，大量被自然灾害洗劫一空的留学生只好返回中国，即使留在日本的，也是勉强生存。

这次地震，还使 40 多名中国留学生丧生^①。

地震发生后，留日学生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采取了一些自救措施。震后次日，中华青年会在小石川指谷町之中华圣公会内为留学生设临时避难所，聚到这里的一部分留学生商议，这次地震又加之大火，留学生受难的很多，应谋划想什么办法救助他们。商议后认为，应联合公使馆、留学生总会、教会青年会等团体，组织救济会。因市内交通断绝，难以立刻实施。

关东大地震给中国留日生带来的灾难，不仅有大自然不可抗拒的因素，还有人为的因素。震后，有谣言传出，称有朝鲜暴徒闹事，日本政府下达关东戒严令，日本各地青年团追赶朝鲜人，或杀或打，参与暴行的还有日本军人、警察。这同时，中国侨民、留学生亦遭劫难，据统计，当场致死 622 人，失踪（实则被杀）11 人，负伤 83 人^②。

震后，留日学生归国团 380 人在一份《回国罹难留日生报告书》^③中陈述了一部分留学生在日本被难的情况：“当 9 月 1 号地忽大震，屋宇动摇，居民兽奔鸟窜，各自逃生，父子不能相顾。继而屋舍溃倒，火灾四起，哀声震地。同人等之幸全者，类皆仅以身免，徬徨街路，四顾无归，辗转于颓垣灰烟之下，赤身露宿风雨中，有三日不得一食者。时地震不已，恐怖万状，以饥寒零落身，一任自然之威逼凌虐，盖已预计为最后一日矣。不但此也，其时东京及附近各县，谣传朝鲜人有放

^①杨正光 平野日出雄：《松本龟次郎传》，第 131 页；武田胜彦：《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2 年，第 303 页。

^②《东瀛沉冤》，第 322 页。

^③该文载于《民国日报》1923 年 10 月 19 日。

火下毒者，于是竭军警、青年团、市民村民之全力，大索鲜人，无老幼男妇恣惨杀。其极可怖者，为朝鲜人支那人（日人呼中国人为支那人）往往同提并论，中国人遂因而罹滔火之奇祸，被故意杀害殴辱者，不可胜数，刀棒拳足虽然交加，殆不以人类相待。浙籍韩潮初（神户高商）、沈诵坟（高师）、蔡径德（高工）、陈倬诸人，曾经多方证明确为中国人，亦不免毒打几毙，并且声言支那人亦应打。安徽王德建被铁棒打伤垂毙，经三次注射久之始苏。粤人林贤宇赁居东京之下户塚附近，日人素知其为中国人也，乃青年团竟排门入室扭掷户外，且行且打驱至警署，以大铁棍当头一棒，林遂昏倒，幸戴草帽未至殒命。王兆澄、石小川被打头部重伤。桂籍李真（女生，15岁）与友人居东京下谷区，适汲水外出，被青年团持棒追击，李生狂奔昏倒，足部被打重伤。江苏人蒋健吾等6人避暑大森海岸（东京横滨间），赁居日人家中，灾后家主拔刀拍案曰：‘今日要杀支那人’。后经几许哀求始免于死。共济会长王希天办理华工事务素为日警所深嫉，曾屡被拘殴打，地震后被警察拘于龟户至今失踪。类此者十余人。此外被打、监禁侮辱者，如王紫渊（高师）、曾济实、高克让、彭春海、刘立政、向余、秦学渊、黎德昭、彭丰根、李雅琴、林明梯、陈祖尧、杨绅等不下数百人。”

韩潮初、沈诵坟、陈倬陈述被打的过程是：9月4日下午1时，他们由巢鸭第五中学回中华寄宿舍的途中，被自警团扣留检查行李，自警团说他们是朝鲜人，群起欲打，韩潮初等人拿出学校身份证明，示明是中国留学生，自警团未予理睬，三四十人刀棍并举，包围喊打，致使三人均受重伤。

部分中国留学生被伤害情况表

姓名	年龄	原籍	灾前住所	被害时间	被害场所	加害者	被害情形
韩潮初		浙江	第2中华学会	9月4日	本乡肴町追分町 间	自警团	铁棍打伤刀伤
沈涌坎		浙江	同上		同上	同上	棍棒打伤
陈倬		浙江	同上	9月4日	同上	同上	同上
王德健	27	安徽合肥	神田猿乐町17 池田半次郎方			青年团	殴打
王兆澄		安徽			东京		头部重伤
李真		广西			东京		足部重伤
林贤宇		广东			东京		腿部重伤
刘笃敬		山西			东京		头部、足部重伤
张杞		山西			东京		被打

1923年12月7日，中国驻日公使馆在“中华民国侨日被伤害调查报告”中，列举了部分留学生被伤害的情况，其情况见上页表。

留日学生归国团在报告书中还陈述了留学生归国等其他一些情况。震后，中国驻日代公使张元节既不向日本政府警告旅日华人所出现的灾难，也不谋求收容保护之方。当蒋健吾等留学生被难后路遇张元节，大呼公使救命，公使置之未理。有学生赴使馆求救，公使说使馆只帮助华工，留学生之事全归日本政府办理。

再后，日本政府委托日华学会专办保护留学生之事，借第一高等明寮寄宿舍为收容所，先后收纳200余人，发给每人带有“日华学会”四字的襟章，始能在戒严中有所活动。留学生生活困难，有一部分则靠做工拉车等度日。

后来，日华学会组织部分留学生归国，第一批送回300余人，第二批送回130余人，第三批送回30余人。每位归国者得到路费50元。日本人说这钱是日本政府发给，中国公使馆说是中国发给，留学生们也不知道究竟是谁给的。

留学生归国，日本政府给予了一定的帮助。日本外务省官员冈部、守岛等人殷勤照顾，又派专员水野、高桥、大机、山井等人沿途照料。其他各界对中国留学生也有所帮助，如神户川崎造船所以汽车迎送，赠以慰问袋，餐以盛筵；神户华侨赠以钱款及衣物。遗憾的事情也有，留学生在归国之时，中国驻日公使馆及神户领事馆的官员皆未露面。

留日学生归国抵上海码头，义赈会、留日同学会、广肇公所、粤商联合会、福建同乡会、浙江各处同乡会等团体对留学

生欢迎招待。留学生陆行回乡者，交通部给予免票乘车。

依然留在日本的中国学生，日子十分艰难，所幸除日本方面给予一些帮助外，中国方面也给了一些帮助。这些帮助一是专向留学生的，如上海各团体派出救助留学生专员林骥、江庸等，携巨款络绎东渡；二是中国各方面给日本支援了大批救灾物资。

3. 王希天被杀的冤案

王希天是共济会会长，在华工及留日学生中有很高的威望，关东大地震，他被日本军人无辜地杀害。王希天“失踪”后，留日学生及华工多方寻找他，中国政府和各界也向日方提出抗议和交涉，日本当局“为了维护军方声誉”，千方百计隐讳这一冤案的真相，直到1975年有几份材料披露，其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地震发生时，王希天寄宿于神田基督教青年会寄宿舍二楼，幸免于难。当天下午和晚上，余震未止，他即奔走各处，探视与帮助众多的留学生。9日上午，外面道路情况稍好，他就骑上一辆自行车，去大岛町共济会事务所，想去帮助遇难的华工。当晚没有回家，他的好友王兆澄等留学生相继出去寻找，从所得到的零星材料看，王希天是遇害了。这些材料是这样的：

共济会事务所对面的邻居10日晨说：王希天昨日来过这里。

一丁目日本工头佐藤说：9日上午11时，在午之桥地方见王希天从龟户警察署方向走来，佐藤对同行的友人说，这位

就是共济会的头头。

共济会事务所房主人远山君说，9日上午12时，王希天来过，走时说要到兵营去看中国劳动者。

华工王耀明说：9日下午4时，他从鹤见到东京，在大岛二丁目被日本宪兵抓去，送到龟户宪兵司令部，见王希天也拘押在那。王希天手中有11元钱，要打电报回中国，宪兵不准，并将钱拿去，10日晨，王耀明被押走时，王希天还在那里。

华商伍铭钟说，10日上午10时，他被宪兵抓到龟户宪兵司令部，下午5时见王希天也被押在那里，二人曾有过对话，次日二人共吃早餐，下午其他华工被送往千叶，王希天被留下。

华工周敏书说，12日凌晨3时，他见两个士兵押王希天出警署。

随后几日，有几个日本人分别对华工说出了类似这样的话：你们的头头死啦，好惨呀！

各种材料已可判断出，王希天是被日本人杀害了，只是其详情不得而知。

留学生王兆澄，原任共济会总务干事，震灾前一天，因王希天已决定去美国留学，他刚接任共济会会长。王希天“失踪”后，他四出调查真相，引起了日本当局的注意，受到严密监视。他知道自己已失去自由，无法查明惨案的真相，决定先回国，在归国的华工中再调查。他几次试图混入遣返华工的轮船都没有成功，后来扮成工人的模样，才乘上“山城号”回到上海。

王兆澄回上海，向各界披露了日本暴徒的罪行，引起了各

界人士的愤慨，上海及全国的报刊接连刊载消息，引发了全国的抗议浪潮，众多的团体向日方通电交涉，北京政府外长顾维钧也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和交涉，并派王正廷、沈其昌等人赴日调查交涉。

王正廷曾任国务总理、外交总长，在外交界颇有名气。他是12月7日率调查团抵达东京的。随行的沈其昌，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外交部候补参事；刘彦，早稻田大学毕业，众议院议员，另外还有9名随员。他们赴日途经上海时，会见了王兆澄等人，搜集了较充分的材料。抵日后，王正廷率人频繁与日本各部门及各界人士接触，进行调查取证。仅12月13日一天，他即有如下的行踪：

“13日上午10时，王正廷偕随员8名，至贵族院，10多分钟辞出，坐汽车转到小石川区白山御殿町中华女子寄宿舍后，又去本乡区驹込千驮木町日本医专附属医院，看望地震中被伤害的留日学生韩潮初，听取了当时情况。然后到驹込神明町三二七吉野作造家，商量调查方法。零时50分回旅馆一次，即去众议院，约10分钟。与夫人共进午餐后，于下午2时，同去早稻田大隈会馆，出席浙江省留日学生主办的欢迎会。3时20分散会。接着在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举行演讲会。对2000名学生，用英语演说，至4时结束。4时20分回旅馆。5时正，偕随员2名出发，逐一拜访了藏相、法相及贵众两院的议长。9时30分回旅馆^①。”

^①仁富美子著，顾颉译：《大地震时的中国人大屠杀》，转引自《东瀛沉冤》，第231页。

在东京期间，王正廷会见了山本总理、后藤内相、平沼法相，要求日本政府对王希天及其他华人被害事件做出公正的调查、审讯和处理。日总理、内相、法相的答复是，地震时通讯、交通断绝，秩序混乱，要明确当时的情况是极端困难的。王正廷还以“至今3个多月，还不明真相，真是不可理解。”

12月27日，王正廷一行离日。此行虽没调查出真相，但更可以断定王希天确实是遇害了。

尽管中国各界乃至政府都做出了强烈的反应，终因政府无能，日本当局极力掩饰，这一惨案终于不了了之。

但是在国内，人们却没有忘记王希天，人们用各种方式缅怀他。在他的追悼会上，众多的团体送去了挽联，其中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的挽联为：

社会革新夙称健者结局如斯凡国人无不闻之坠泪
三岛小儿莫容先生公理自在问同辈若何雪此奇冤

黑龙江留日学生同乡会的挽联为：

为救同胞遭残害杀身成仁遗恨千古
务除异种慰冤魂复仇雪耻共誓一心^①

湖南、北京等各地相继为王希天罹难召开追悼会，留日学

^①王大德：《一高同学时代之希天》，转引自《东瀛沉冤》，第68页。

生集体为他编史，归国的温州籍华工为他立碑。

王希天在国内时的同学孙宗尧决定创建“希天医院”，以表永远的纪念。孙宗尧于1919年入日本东京私立医科大学读书，在日本期间，曾负责共济会医务所工作，与王希天共同为维护华工利益而奔忙。孙宗尧回国后，在众多朋友的帮助下，向吉林省教育厅长于慕忱借款，于1924年4月20日，也就是王希天被害后7个多月，在吉林市尚义街7号建成开业“希天医院”。医院建成，除社会各界的帮助，还与孙宗尧的夫人支持分不开。他的夫人孙紫书，原名藤本玉子，她曾在东京养育院当护士，孙宗尧到养育院实习时，二人相识，藤本玉子对共济会医疗部的工作也给了很多帮助。后来她不顾父母反对，随孙宗尧来到中国，加入了中国籍。医院成立后，历经磨难，不断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孙宗尧将医院的固定资产交给了国家，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吉林市妇婴保健院，1954年以后更名为吉林市儿童医院，一直到今天仍沿用此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们仍没忘记王希天。王希天留日时的好友周恩来总理在60年代初专门委托人查找王希天的遗属，得知下落后，周恩来和邓颖超专程看望了王希天之子王振圻及家属，一起合影，关怀备至。1973年7月，国务院批准追认王希天为革命烈士。

1975年8月，日本报界公开发表了涉及杀害王希天真相的《久保野日记》，此后又相继有有关文章与书籍发表和出版，从而使王希天被害真相为人知晓。

《久保野日记》中，10月18日记载：“有一天，我在税务署的卫兵处，听说王希天已被当官的杀了。他骑来的那辆半新

旧的自行车，被我们六中队作为战利品占用着，那辆车就归本中队所有了。”19日又记载：“我听某人详尽地说过，以中队长为首，诱骗王希天说：‘你的同胞在骚乱，你去训诫训诫吧！’说着把他带了出去，来到逆井桥边的铁桥处，伺候在那里的垣内中尉来了，他问六中队的长官们：‘你们往哪儿去，休息一下吧！’说时迟，那时快，从王希天背后齐肩一刀斩去，然后将面部、手、脚都斩碎，烧了衣服，掠走了身上的10元7角钱和自来水笔。”

后来公布的《远藤日记》中记载：“王希天是江东区中国人的领袖，为野重第七连队所逮捕，寄押于龟户署。他因当地居民对鲜（朝鲜）支（中国）人进行迫害，曾请求龟户署加以保护，终因人数太多而未得收容。我与戒严司令部联系后，决定收容于习志野兵营。不料在未送去之前，佐佐木兵吉大尉得金子旅团长的许可，将王希天一人要了来，在中川堤坝上，被K（即垣内——编者注）中尉斩了首，尸体抛入中川河流去。”^①

至此，王希天被害真相大白于天下了。

王希天之所以被害，无非是他在各个方面关心华工，维护华工的正当权益，从而招致了日本当局的忌恨，趁震后混乱之际向他下了毒手。人们也可以看出，王希天被害，不是偶然事件，完全是日本警界当局一手蓄谋策划的。

可以告慰一点的是，自70年代以后，直至90年代，相继有一些正义之日本人，缅怀王希天，帮助中国人在温州再立了

^①苏虹：《揭开王希天“失踪”之谜》，载《东瀛沉冤》，第74—76页。

一块王希天纪念碑。

4. 留学生的大学生活及学位

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学业轨迹基本可以这样描述：1. 补习日语；2. 进入初等学校；3. 进入特约五校那样的高等学校；4. 进研究院修硕士学业；5. 进大学院修博士学业。

从清末留日运动出现以来，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修业等级呈逐渐提高的特点。最初，有相当一批留学生仅仅是学习日语，再进一步的，是习速成教育；再后，有很多进入了高等学校学习。从高等学校毕业，要学习硕士学业，须进研究院修业3年；若学习博士学业，须在取得硕士学位后，进入大学院修业若干年。

日本各大学对学生学业管理有两个特点，一是管理制度松，平时上课与否也不检查；二是学科考试严，毕业考试更难。就是说，要想获得较高等级的学位，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说日本大学的管理制度松，可以用夏衍的学业经历来说明。1923年12月1日，孙中山从上海北行，应发动“北京事变”的冯玉祥之邀共商国事，途经日本的门司港，夏衍作为明治专门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代表，与其他几校的左派留学生专门到门司，登船谒见孙中山，表示对他的支持与敬意。孙中山得知夏衍是留学生中的领袖人物之一时，问他：“你是不是国民党员？”夏衍回答：“不是”。孙中山又问：“为什么不入？”回答：“没有地方去入。”孙中山当即指示陪侍身边的李烈钧作介绍人，让夏衍加入了国民党组织。夏衍回学校不久，国民党东

京总支部派来一个人，问他毕业后怎样打算。夏衍说：如果不回国，毕业后就没有官费了，生活没法维持。来人给他出主意：再考一个大学，要具有研究生性质的，可以不上课，还能享受官费，然后在经济有保障的前提下去搞革命工作。1926年3月，夏衍从明治专门学校毕业，获得了毕业证书及工学学士学位，然后经中国留日学生监督处推荐，并通过考试，于4月进入了位于博多的九州帝国大学工学部冶金学科继续学业。直到次年5月回国，夏衍所有的时间都用在革命活动上了，一门功课也没修完。

留日运动的这一时期，尽管可以说中国留学生的修业水平有所提高，但所谓的提高，仅是指修完普通高等学校学业的人数有所增加，而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人数极少。据有人说，中国留学生在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从清末到本世纪30年代初，不过几个人而已。”^① 这种说法，我们不敢说绝对准确，但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少是可以肯定的事实。

日本高学位之难得从下面这个事例中可以得到说明。湖南衡山有一位叫曹襄国的留学生，在早稻田政治经济科学习18年，也未考得到博士学位。1929年春，他儿子也考入了早稻田大学，父子同科。“一·二八”战争后，父子双双回国。

中国留学生即使在日本攻读研究生学位，他们也会受到各种各样问题的困扰。比如经济即是问题之一。像20年代末期到日本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姚咏平，留日期间，一直在为经费问

^①陈新光：《留东杂忆》，载《邵阳文史资料》第七辑，第181页。

题而困扰。1927年，姚咏平与徐玉文结婚后，二人都有留学日本的愿望，他们经常在《生活周刊》等报刊上看到留学生经济困难的文章，但他们认为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便决定赴日留学。他们向江苏省教育厅申请办理自费留学日本，获得批准。姚咏平因已在学校任职达10年以上，故得到每月补助金30元（当时值日币20多元），先行一次付给6个月补助金，总额计180元。这个补助标准，是低于当时官费标准许多的，不够支付在日本留学的全部开销。徐玉文不够享受补助金的资格，友人借款200元给她。二人于1928年渡日留学。

渡日后，姚咏平由他昔日在国内的学生金焰介绍入东京帝国大学水产系，因水产系教授上谦吉博士是金焰的老师，姚咏平便做了上谦吉博士的研究生。为解决费用问题，姚咏平以徐玉文名字写一篇文章给上海的《生活周刊》，并附一封信，邹韬奋接文见信后聘他俩为《生活周刊》驻日通讯员，周刊每期登他们一篇文章，稿费收入每月约有50多元。接着，姚咏平写《水泳》一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写《日语会话》一册，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二书共得稿费300余元。他们还向国内其他报刊供稿，以得到稿酬。二人直到1931年归国，3年多的时间，主要是靠稿酬维系留学费用。^①

由于有留学生取得学位中国国内方面给予奖励的规定，因此出现了中国留学生并非正式取得研究生学位，而是向教授个人通融取得的个别情况。中国方面得悉这一情况后，有的地方

^①姚咏平：《我留学日本见闻的回忆》，载《吴县文史资料》第一辑，1984年印，第77—78页。

对此做出了相应的限制措施。如 1930 年辽宁省教育厅拟定的奖励留日研究生规程中就含有这样的限制措施，该规程经省政府委员会批准后施行。这一年 6 月辽宁省教育厅在给省政府的呈文中说：“近年来研究生日渐增多，尤感有订专章之必要，兹由职厅拟定本省奖励留日研究生规程一份。关于研究生入学资格限制较严，而尤重在考核论文著述，……此次规定章程之主要精神，即在矫正旧弊，兼寓造就真才昌明学术之意。”

辽宁省的这个章程规定，留日学生入大学院研究，希望得到本省奖金者，要具备以下条件：须入指定学校大学院；须由指定大学本科毕业成绩确系优良者；须经大学部教授会之许可入学，由学部长出具在学证明者；须与日本语文以外，兼通其他外国文一种以上者。研究生有奖期限以一年为限，但学校原定研究时期在一年以上以及研究期间，成绩确系优良者，得取具证明，由本省留日学生经理员转请教育厅展期一年。其奖金数目定为每年日金 720 元，分两期平均发给；在有奖期间内，研究生每年要分两期呈送研究著述或报告书，以凭稽核，其著作内容应本诸研究心得，不准抄袭或请人代作，并须由日文译成中文。如过期不送或所送著作经教育厅考核认为成绩低劣者，即停发或酬减本期奖金。研究生有博士学位者，其论文应译送到教育厅，发给印刷补助费 200 日元^①。

^①孙景悦 董慧云 张秀春：《张学良与辽宁教育》，第 268—269 页。

第 三 节

终生从事中国留学生教育 的松本龟次郎先生

1. 走上教育中国留学生之路

在中国人留日运动史中，热心于中国留学生教育的日本教育家，以及普通的日本教师不乏其人，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位，莫过于松本龟次郎先生了。

1903年，松本龟次郎先生受聘于宏文学院担任教职，成为中国留学生专门教育工作者，从此走上了教育中国留学生之路，并且毕生从事中国留学生教育事业。

松本龟次郎于1866年出生于静冈县小笠郡土方村岭向（现大东町）一个普通农家，祖父、父母均只有私塾不及的学历。他7岁入宗源庵寺子屋学习，后由于学制改革，入岭小学。1884年进私塾二松学舍学习，接受汉学、数学和教育学教育，后就学于静冈师范学校，以优异成绩毕业。

毕业之后的15年中，松本龟次郎一直在公立学校中任职，或作为教师，或作为校长。这期间他的就职情况大致如下：

1888年，22岁，静冈县高等小学校训导；

1890年，24岁，静冈县高等小学校东部分校首席训导；

1892年，26岁，静冈县有渡郡东有渡高等小学校校长；

1894年，28岁，静冈县川崎高等小学校校长；

1897年，31岁，静冈县师范学校助教谕，取得中学教员证书；

1898年，32岁，三重县师范学校教谕；

1900年，34岁，佐贺县师范学校教谕。

1903年，正在贺佐县师范学校工作的松本龟次郎因编撰《佐贺县方言辞典》而受到当时担任文部省专门学务局长和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教授的上田万年的赏识。当时中国学生渡日者日多，宏文学院扩充需要补充师资，校长嘉纳治五郎委托上田万年介绍人选。上田万年也是一个热心于中国留学生教育的人，他极力主张日本教育界要尽全力来帮助中国留学生，使他们在日本接受良好的教育。上田万年向嘉纳治五郎推荐了松本龟次郎。在这以前，高等师范的福富教授已向嘉纳推荐过了松本龟次郎。

1903年8月14日，松本龟次郎辞掉了公立学校职务到宏文学院任职。

到宏文学院这所私立学校任职，意味着要失去很多东西。当时在日本的公立学校任教职，任教教龄累计计算，满15年教龄，同日本政府中的官吏一样，可以领取恩给。松本龟次郎辞退公立教职时，教龄恰好达到了15年。他到宏文学院，既不能累计教龄，也不能享受日本官吏同样的待遇。因此他毅然到宏文学院任职，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更换。

对于松本龟次郎这次的工作转换，日本的研究者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其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一种认为他的职业本来就是教师，从公立学校转到私立学校，教师的职业没有改变，所以去宏文学院任职也是无所谓的事；二是认为他是崇拜时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日本国家训练师资最高学府负责人嘉纳治五郎个人而去；三是认为由于私立学校薪俸高于公立学校的

吸引等等^①。

松本龟次郎的传记作家武田胜彦是这样分析的：松本龟次郎“从小就喜爱汉文，很早就想上这个唐国去看看的年轻时代的梦想，在念《四书》、《五经》时就盘旋在脑中。尽管对中国知道得不多，这几年来一般人又都看不起中国，可是龟次郎总觉得自己的知识，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日本能有今天，应该说是从古以来就得到中国的帮助，因此不应该眼睁睁地看中国人被欺侮，尤其是日本更不应这样，要帮助中国，使能和日本一样抵御西欧国家的侵略。就是在这种爱慕和报恩思想支配下，他决定上东京去当宏文学院教师，去教中国留学生日语。”^② 武田胜彦是日本著名传记文学作家，他的这一分析，虽带有文学色彩，但应该说还是比较中肯的。

宏文学院是招收中国留学生最多的一所学校，它的普通科的班级用中国各省的省名来命名，这一省的学生都在这一班；速成科用学科的名称来命名，如速成师范班，速成警务班等，有的班名也被冠上省名，如四川速成师范班等。松本龟次郎教授普通科的四川班和浙江班。在浙江班中，就有后来成名的周树人与周作人兄弟，尤其是周树人（鲁迅）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30年代末期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回忆：我教过的普通班浙江班的学生中，我还能记起的有几年前去世、中国有名的文豪鲁迅，就是周树人兄弟，和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驻德大使的陈介等人。我教他们时，因为他们已经学过一段时

^①杨正光 平野日出雄：《松本龟次郎传》，第101—102页。

^②武田胜彦：《桥》，第268页。

间的日语，所以都有相当的水平了。开始我给他们讲日语语法时，用相同意义的汉语来作说明。有一次讲到日语助词“に”译为什么汉语最合适时，我在黑板上写了“于”、和“於”两个汉字，说这相当于日语助词的“に”。当时有一个叫厉家福的学生（后来在金泽医科大学毕业，回国后在三十年代曾以中国医学代表团团长身份参加在日本举行的日华医师联合会）站起来指出说：“用不着两个字，“于”或“於”用一个就可以，因为“于”与“於”通，两字同义。我当时的确不知道这一点。厉说完，鲁迅（周树人）站起来说：“于”、“於”两字，一般情况下是作同样用的，但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完全相同，不过在“に”译成中文时，用哪一个都可以，在这时两者是同音同义的。他们两人的话，给我印象很深，至今还能记起。因为那时我觉得，对于汉字的用法、汉语的区别，还得请教汉字祖国的中国人，单靠书本上的知识是不够的。那时候周树人、厉家福都不满二十岁，但他们在汉文方面的水平已很高^①。

从1904年起，由于留学生增加，清国留学生会馆也设立了日语班，松本龟次郎在业余时间还应聘到那里讲课，在这里听课的秋瑾，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30年，他到中国考察教育50天，归国后写成《中华五十日游记》，其中记述在杭州的情况时，有一段回忆秋瑾的文字：“离苏小小墓不远处，有一座立着〈鉴湖秋女侠之墓〉的墓碑，这就是秋瑾女士之

^①松本龟次郎：《邻邦留学生教育的回顾和将来》，载《教育》（东京）1939年第七卷四号。

墓。女士以一个女性而作为革命的先锋，因受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一案所牵连，为浙江清朝官府逮捕，虽遭百般逼供、拷问，但她除写下‘秋风秋雨愁杀人’七个字以外，什么也没有说而从容就义了。墓前有一座为纪念她的悲壮史迹而建立的风雨亭。秋瑾女士是我在明治三十八年（一九〇五年）教过的学生，那时我在神田骏河台留学生会馆中兼职，教留学生日语。秋瑾女士就是那里的学生。我记得她脸色白皙，柳眉修长，经常穿着黑条的日本式女上衣，下身穿着当时流行的紫色日本式裙裤，缠足，梳一个日本式发髻。每天莲步姗姗地上学，从不缺席。对我的提问，回答得很迅速。她提问题很尖锐。真想不到她这样一个人竟是壮烈的革命先驱。今天我亲自到她墓前凭吊的时候，二十六七年前的事，不禁一幕一幕地在我脑海浮起，女士的风采，仿佛仍在我的眼前。”

1908年4月，松本龟次郎受北京京师法政学堂之聘到中国任教习，虽暂时离开了教育中国留学生的岗位，但仍属从事中国人的教育。

2. 参加救援中国留学生的活动

1912年4月，松本龟次郎在京师法政学堂的聘期已满，由于辛亥革命爆发，大批日本教习回国，京师法政学堂也将并入京师大学堂，松本龟次郎就结束了在中国的教习生涯，回到了日本。

回日本后，他先由服部宇之吉博士介绍到东京府立第一中学担任国文教师，次年创办了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专门招收中国留学生，由此再次开始了专门教育中国留学生的工作。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创立后，在几个有关于中国留学生的重要时刻，松本龟次郎都挺身而出，积极努力，参与救援中国留学生的活动。

松本龟次郎救助中国留学生的活动，最主要表现在两件事情上，一是呼吁日本国会转变对中国留学生的态度，给予经济援助；二是关东大地震发生后救助留学生，然后又重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继续招收中国留学生入学。

1922年，日本的第45届国会做出决定，从数个方面对中国留学生进行经济上的援助。这个决定表明日本社会上层人物开始转变对中国留学生的冷漠态度，而这一转变，其中就有松本龟次郎坚韧努力的功劳。

松本龟次郎长期从事中国留学生的教育，凭经验他感觉到，中国留学生在日期间和回国以后从事反日活动，其责任在日本方面；中国学生在日本留学，也理应得到日本政府的关照，他进而认为，日本政府必须改变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继第40、43、44届国会上有识之士相继提出有关中国留学生的议案后，1922年，松本龟次郎联合成城学校的服部操、横滨志成学校的越石乙次郎和丸山船太郎，在友人的介绍下，向日本的第45届国会提出了《关于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教育之请愿书》。这四位直接从事中国留学生教育人士的强烈呼吁，引起了反响，正是在这届国会上，产生了援助中国留学生的议案。

虽然这次的议案没有为中国留学生带来很大的实际益处，但它毕竟改变了日本朝野对中国留学生的态度。从这一点上说，松本龟次郎是功不可没的。

另外，随后不久关东大地震发生后，松本龟次郎更是对中

国留学生做了救援工作，并且这一次的救援，其意义是重要的。

1923年9月1日，地震发生。震灾当天，松本龟次郎回乡探视母亲正在挂川驿等着乘东海道线回东京。火车行到静冈，已不能再行驶，他只好在静冈住一晚。这时，东京震后大部分房屋被毁的消息陆续传来，他到电信局想发电报和打电话，可是通讯线路皆已中断，得不到任何确切的消息。9月6日，静冈县组织救护队由清水港从海路前往东京慰问、救灾，恰好救护队团长峰田龟太郎是松本龟次郎的旧友，在峰田的帮助下，他得以船长家属的名义搭乘船只回了东京。

8日清晨，松本龟次郎从芝浦上岸，乘坐人力车到了市内。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正处于毁坏最严重的神田区，过去宏伟壮丽的三层楼校舍住宅，全部震坍烧光，一片废墟。他在日后的回忆中说：“在街道两旁，只见穿着一件破单衣，不戴帽子，面容十分憔悴的人，不分老少都站在旁边，队伍之长可达数里，他们都向品川方面走去。这些人都是丧失了房屋、家人和工作，无衣无食，留在东京不免成饿殍，因而忍痛含泪离开东京回乡的。此外在人行道上，还排列着长达数里的人群，他们都手拿小包或包袱，等待政府方面发给每人每天三四合救济米的。看到这些情况，真是惨不忍睹。我乘坐的人力车，走走停停，而且也像走不动似的，一问才知道拉车的人，也是靠市政府每天施舍的糙米，煮些粥来充饥，加上衣服不够，所以肠胃受到损害下痢，没有力气拉车走较长的路。真可怜万分。车，一路上都避开人多的大路，由小路从爱宕町经三宅坂、半藏门而到九段坂上。远望神田、日本桥、小石川、本乡方向，一周

前我离开时还是极尽繁华壮丽的街道和住家，现在已化为乌有，有的还留下了砖瓦和钢筋的垂垣颓壁，烧焦了的树干，仍树立在那里。到处都是这样，哪里还能找到一丝一毫昔日景象。下了九段坂，去看一下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的痕迹。原来校舍所在地，只留下铁栅和石门，过去称夸四邻的三千多平米的三楼建筑物，现在已全部成为灰土，玻璃熔化成胶状物，铁柱、钢筋弯曲得跟橡皮管似的。从这一片废墟的样子看来，可以想象到当时的火力是如何的强猛。见到之后，惆怅万分，徘徊再三而不忍离去，但留下也是徒然，最后还在不忍中离开^①。”

回东京后，松本龟次郎首先与日华学会一起，参加救援中国留学生的活动。日华学会是灾后救援中国留学生的主要团体，由于日华学会的干部和职员对松本龟次郎一向很尊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又是招收中国留学生的重要学校，所以日华学会救援中国留学生的活动都和他商量，而后由日华学会出面进行救援活动。灾后，日华学会共收容了千名左右中国留学生，发给他们粮食衣物，还帮助了大批中国留学生回国。

然后，松本龟次郎很快即投入到了重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的活动中，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要再续中国留日学生的教育事业。

松本龟次郎在东京府泷川町租了房屋作为临时办事处，又找来了原学校的牧野和栗原两位职员，三人在猿乐町原学校的废墟原址上清理出一块空地，搭起一所木屋作为办公室兼教

^①武田胜彦：《桥》，第306—307页。

室。他们又用简单的工具把瓦砾碴土一点点地运走，在校址周围打上桩子，拉上铁丝。10月5日，一所临时校舍基本完成。他们贴出布告，10月10日开学。

灾后的第40天，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即开学。校舍虽简单，但它却迈出了学校复兴的第一步，它也是东京复课最早的一所学校^①。

复课的第一天，来校的中国留学生仅10人左右。随后人数不断增加，不到两个月，已达到了100名。

震后第二年，中国留学生陆续来到日本，很多人慕名而进入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校重建的简单校舍已明显不够用，须再建新校舍。因资金所限，松本龟次郎只好向日本政府申请补助。

当时日本的外务大臣，是伊集院彦吉，他是松本龟次郎任北京京师法政学堂教习时的驻京公使，也是松本龟次郎的朋友。松本龟次郎向他提出了对外国留学生教育经费给予补助的申请。松本龟次郎的为人以及精神，使他很快得到了外务省3万日元的补助。《松本龟次郎传》中详细记载了他去外务省申请补助的经过：“当第二天早晨松本到霞关外务大臣官邸拜访时，正值外务大臣要上班已出了大门，为了听取松本的申请，他特意不坐车，和松本边走边谈。他们从官邸走到外务省，伊集院彦吉大臣患腿神经痛，行走不便，拖着一条腿，一路上一瘸一拐地听着松本的陈述。……外务大臣听完松本的请求后，像往常一样殷勤郑重的态度说：‘昨天已看到申请书了，补助

^①杨正光 平野日出雄：《松本龟次郎传》，第134页。

是有困难的，尽量把你的希望和外交次官商量以后答复。’”^①

有了政府3万日元的补助，松本龟次郎就在原来的地基上建造了一所1100平方米面积の木结构新校舍，新校舍于1924年7月20日落成，这时仅是地震后10个月。

建这样的一所新校舍，光靠政府补助的3万日元是肯定不够的，为此，有人推断：“很可能松本龟次郎将他出版日语教科书等所得稿费和私人财产也投入了相当数量。”^②

震后松本龟次郎迅速使学校初建和重建，无疑极大地给中国留学生提供了学习的条件。

3.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与日华学会合并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重建后，松本龟次郎完成了一件心事，对中国留学生来说也是一个福音。

然而此时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与过去相比，情况却起了变化。过去，学校因为是私办的，只招收中国学生，所收的学费不能像日本普通私立学校那么多，因此仅靠学费的收入来源是不能维持学校正常运转的。那时，依靠捐款是维持学校进项的一个重要途径，松本龟次郎还把个人的钱款充入到学校的经费中。当时有人向他建议，把学校与为同一目的而设立の日华学会合并，就不会为办学经费而操心了，因为日华学会是一个有固定经费的半官方团体。可松本龟次郎认为，还是办成真正的私立学校好，省得沾官方的便宜，他宁可把自己可观的稿费搭进去，他宁可四处奔波筹措经费，也没有把学校与日华学会

^{①②}杨正光 平野日出雄：《松本龟次郎传》，第137页。

合并。

学校重建后的情况则不同了。他的稿费用进去了，几位热心朋友的私产也因地震而损失大半，难以再给他帮助，所以学校重新开学后经费就发生了困难。

在经费困难之际，又有人提出合办之事。为了让学校能够长久地存在下去，同时也为了把筹措经费的时间用在研究教学和撰写供中国人使用的日语书上，他和校董事们多次商谈之后，决定同意将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与日华学会合并。

日华学会是1918年5月成立的，是一个半官方的组织。原在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之际，中国留日学生大批返回中国。可是由于留日学生公费断绝，汇兑又一时不通，许多学生因缺乏旅费而陷入困境。这次返国潮与留学生对日感情无关，便引得了日本一些实业家的同情。在三井物产公司的山本条太郎和日清汽船公司的白岩龙平的倡导下，一些和中国有关的实业家组织了一个“留学生同情会”，筹集了十几万日元，由中国公使馆和日本文部省经手贷给了中国留学生。后来，中国教育部归还了这笔款项，日本方面感到这笔钱无法处理，最后决定仍用在中国留学生身上。他们用此款成立了日华学会，由担任过日本文部大臣的小松原荣太郎任会长，一批中日方面的知名人士任顾问和理事。日华学会成立时提出的方针是：“为中国留学生稍尽微力，以减少其远客异乡之不便，兼为来日视察、观光者提供便利。”日华学会成立后，经营留学生宿舍，介绍与指导留日学生活动，成了一个为中国留学生服务的重要机构。

地震时，日华学会也完全被毁，外务省拨款资助它重又建立了起来。外务省也认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与日华学会都是

为中国留学生提供便利，都进行日语的预备教育，二者有共同之处，如果二者合并，力量集中，节约人力与物力。

在各方都有愿望的情况下，松本龟次郎与日华学会谈妥了合并方案，又经外务省和文部省批准，从1925年起，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正式并入了日华学会。

并入后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校名不改，所有事业、人事及财产全部由日华学会接管，日华学会会长细川护立任校长。校长下设学监一人负责行政事务，人选由文部省推荐；学校还设评议会，由外务省、文部省的高级官员和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派员兼任。

从此，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的性质已改，不再是私立学校，而是半官办的了。

合并后，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进行了一系列改组，比如在学制方面，比过去有了扩大，增设专修科一门，原来的本科和预科则照旧。预科专修日语，半年毕业，是专为中国留学生到日本后学习语言而设；本科一年毕业，毕业后可免试升入日本公立高等学校和专科学校；专修科是选修性质，没什么限制，像其中的特别预科，是根据报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需要设置，如设步兵操典、法制常识等课。

再如，合并后的学校，从1928年4月新学年开始，本科分设甲、乙两种班级授课。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南北方学制不同，学生的程度相差悬殊，如只将他们视为中国留学生而同班授课，必不相宜。为此，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特于1927年派学监三轮田率几名教师到中国实地考察学制情况，回来后学校适应中国的情况而进行了重组。

1928年，地震后所建的木结构校舍不能适应学校发展的需要，遂由日本复兴局拨款，在原址改建了一座钢筋水泥的三层大楼。

从以上的学制和校舍等方面的情况看，合并后，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的实力与设施都有所加强，这种加强如果仅靠松本龟次郎一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办得到的。

1935年4月，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改名为东亚学校，增设晚班，延长本科和专修科的学习年限，其目的是要把该校逐步改变成一所与日本高等学校同等的学校。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留学生纷纷返国，东京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学校相继停办，只剩东亚学校与成城仍在上课。后来日本政府委托东亚学校办了几期“宣抚人员训练班”，企图利用东亚学校为其培养侵略中国的人员，因而遭到了以松本龟次郎为首的一批正直教育家的指责和抵制，几期之后即停办了。

二战即将结束之际，东京遭到盟军轰炸，东亚学校也在爆炸声中成为了废墟，以至这所条件优越，教学认真，存在时间长，培养中国留学生多的学校一点遗迹都没有留下。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与日华学会合并后，松本龟次郎本人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合并之初，他同意由原来的校长降为教头（相当于教务长），负责学校的日常校务。这一变更，使他从学校许多繁琐的事务，如筹措经费等方面抽出身，而专心致力于教育工作。从这一点来说，对他无疑是一件好事。刚合并的一二年里，他的工作仍很繁重，除决定教务上的工作外，还担任两个班级的教学工作；学校刚合并，新加入的领导成员对中国留学生教育没经验，重要的事情便都由他提供意见和做

出决定。待学校的一切工作都走上正轨后，他的担子才稍有轻松。

1930年，松本龟次郎受学校所派赴中国考察教育，归国后将观感向日本外务省和文部省提出了报告，并写成《中华五十日游记》出版，虽然限于环境无法直言，他还是委婉地表达出了批判日本侵华政策之意，因此为当局所不容，很快他就被迫离开讲坛退休了，只是由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给了他一个名誉教头的头衔。

退休后，松本龟次郎仍关心着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他每星期都要到学校去一次，还经常与中国留学生往来。他的传记《桥》中这样记述他这一阶段的生活：“除了从事写作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友人们往来以外，龟次郎也把接见和继续指导中国留学生作为他退休后生活的一部分内容。尽管他已经从讲坛上退下来，可是他仍每星期要上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去一次，东看看西问问，和过去一样；教师和学生也欢迎他来，不时地向他请教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不过更多的是学生们上他家去请教。那时他住的地方，离省线（市内小火车）阿佐之谷站较远，而离银色公共汽车站极近；所以他总告诉学生们，在中野车站换乘银色公共汽车，到伊势森林站下车。这站本来很少有人下车，龟次郎退休以后才多些。因此慢慢的，公共汽车上卖票的小姑娘都知道，要到伊势森林站的，一定是去看松本先生的，所以一到站，她们就会亲切地告诉你：‘松本先生家，下车后往回走三十米，右手那门就是。’”^①

^①武田胜彦：《桥》，第370页。

1945年9月12日，松本龟次郎以79岁高龄病逝于静冈县大东町的故乡。

4. 为中国留学生撰写日语著作

松本龟次郎对中国留学生教育的贡献，不仅只在于任职教书、创办学校，还在于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以及于他编撰供中国人学习使用的日语著作。对此，有的研究者指出：“松本龟次郎在前期中国留日教育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松本之所以能在中国留日学生中有崇高威望，固然在其本身的人格和孜孜不倦的教学精神，但也不能不承认松本在日语教科书的著作方面的贡献。松本的日本语文方面的著作，在前期中国留日学生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读过，影响之广，恐怕比他执教的范围要大多少倍。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松本在日本语文方面的著作，不但出版最早，而且销行范围也很广，时间也最长，所以贡献也是不可忽视的。”^①这一对松本龟次郎在日本语文方面为中国留日学生所起作用的评价，确实是很精当的。他作为日本近代一位教育家，并且是专门从事中国留学生教育的教育家，他不仅直接教育中国留学生，而且还通过日语的著作间接地教育中国留学生。从这一点上说，他对中国留学生教育活动的功劳更是不可抹没的。

松本龟次郎最初编撰日本语文方面的著作，是他到宏文学院任教的第二年，即1904年。他于这一年出版的《言文对照汉译日本文典》，原来是他授课时编写的讲义，经过改编之后，

^①杨正光 平野日出雄：《松本龟次郎传》，第113页。

才成了供中国人学习日本语用的著作。其时，日本文部省决定禁止民间出版机构编辑发行教科书，而由国家统一出版发行文部省编纂的固定教科书。这是由于在1902年至1903年间，日本教育界发生了所谓“教科书疑狱”事件。早在1886年，日本政府规定，各县中学采用的教科书，由各县自行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以后，统一应用。各出版家为了推行教科书，采用了行贿等不正当手段。事情被揭露后，从1903年起加以审理，结果有116名各地方教育方面的领导者，包括4名县长和多数督学、校长等被判有罪。因此教科书改由国家统一出版发行。

国家统一出版教科书，致使原来靠教科书盈利的出版商不得不另谋出路。著名的金港堂投资中国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成立编译所，后来获利颇丰。另一家出版商日本中外图书公司，欲以中国人为对象，出版学习日语的书籍，公司经理铃木充美找到宏文学院，要求帮忙。在教务长三泽力太郎的怂恿和支持下，松本龟次郎将讲义整理后交给了出版商。几天后，一部450多页的《言文对照汉译日本文典》就印了出来。该书是用中文写的，日文词语旁边还注假名，极为适合中国人学习日本语使用。铃木充美经理拿样本到中国推销时，很受欢迎，成了当时的畅销书。该书以后又多次印刷，共再版40次。

初次写书的成功，促使松本龟次郎以后又有多部此类书问世，武田胜彦甚至说：“他在日本语文方面著作的影响，恐怕要比他在教坛上的影响要深、广。”^①

继《言文对照汉译日本文典》出版以后，松本龟次郎又编

^①武田胜彦：《桥》，第272页。

写出版了《改订日本语教科书》、《汉译日本语会话教科书》和《汉译日本口语语法教科书》等，这几种书都是松本龟次郎根据其在宏文学院、北京京师法政学堂时的讲义改编的。他的讲义都是根据实践而写成。在多年教授中国留学生及其他中国学生的过程中，他不断研究，不断积累。在教授日本语的时候，用中国话来解释，难免出现错误，受教的中国学生指出来，他就认真地记录下来。久而久之，松本龟次郎的讲义非常适合中国学生，由其改编的教材也十分畅销。

创办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后，松本龟次郎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学校的经营与管理上，尽管内心中有强烈的愿望，仍是无暇编写专供中国学生使用的日语教材。

友人劝他将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同日华学会合并，并且他后来也同意了合并，除了其他方面的因素外，还有一点就是为了抽出时间再编写日语教材。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与日华学会合并后，尤其是他从教职上退下来以后，他有更多的时间可用于写作，以继续为中国人学习日本语文做贡献。他在《译解日语肯綮大全》序文中有几句话很能表达他此时的心情，他说：“自问对于华生之教育，视为无上之至乐，终身之天职；功名富贵，淡若浮云。兀兀穷年，以迄今日，而不知老之将至焉。”

松本龟次郎最后一本供中国人用的日本语著作《华译日本语会话教典》，内中倾注了他更多的心血，但由于当时中日之间战事紧张，纸张要配给，出版、发行都有统制组织，不经政府批准，印刷厂不能承印，发行部门也不接受。因此这本书写出半年以后才问世，印数也不多，没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松本龟次郎一生为中国人写就日语著作 6 部，其详情如下^①：

书 名	初版发行时间	再版次数
《言文对照汉译日本文典》	1904 年	40 次
《改订日本語教科书》	1906 年	16 次
《汉译日本語会话教科书》	1914 年	17 次
《汉译日本口语文法教科书》	1919 年	24 次
《译解日语肯綮大全》	1934 年	13 次
《华译日本語会话教典》	1940 年	2 次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松本龟次郎所著之日语教材，除最后一部因当时的社会因素外，其余的再版次数都很多，虽然当时每一版印数不一定很多，但其发行总量无疑是十分可观的，总量约 20 万册以上，这表明中国读者、尤其是留日学生非常喜欢他所编撰的著作。自 20 世纪初中国学生大批留日之后，社会上出版的日本語著作甚多，仅有据可查、并且至今还能见到的，1905 年出版有 10 种之多，1906 年激增到 20 种，这其中不乏粗制滥造、东拼西凑者，即使一些优秀的著作，其也仅仅是就日本語来讲解日本語，其受欢迎程度远不及松本龟次郎的著作。

有专家们指出，松本龟次郎的著作所以甚受欢迎，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①杨正光 平野日出雄：《松本龟次郎传》，第 146—147 页。

第一，他的著作经常增补修改，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他的著作每一次再版，都进行相应的增补和修改，以至于每次出版后的著作，都有新的知识补入，完全能适应当时的需要。

第二，他的著作是根据长期教学中得到的经验，进行总结后写出的。他经常拿自己的文稿请中国留学生们提出修改意见，他说：“我的著作，实际上是你们和我合作写成的，你们经常告诉我现在学生们需要什么，想什么，所以我写的书总能跟着需要走，永不落伍。”正是由于紧紧地配合留学生的需要，结合实用，再将日语文法、会话和精读课文科学地安排，从而使他的著作理论与经验合理地融为了一体。

第三，他的著作中贯穿着学习日本语的方法、途径等知识，甚至还包含有日本社会的知识，使读者在学习语言的同时，还学到了在其他日本语教材中所学不到的东西^①。

由此可见，松本龟次郎对中国留学生教育的贡献，乃至他在中国留学生中间有崇高的声誉，还在于他为中国留学生编撰出了最优秀的日语教科书。

松本龟次郎先生为中国留学生教育，为中日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的名字常为中国人所提起。尤其是1979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率团访日，特意在中国驻日大使馆会见了松本龟次郎的后裔神谷孝平，代表已去世的周恩来总理转达了对早年留日时受教的教师松本龟次郎的怀念和感谢之情。中国人的怀念引起了日本人的共鸣，1982年春，他的家乡静冈设立了松本纪念馆以示怀念。

^①杨正光 平野日出雄：《松本龟次郎传》，第147—149页。

第 三 篇

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 的曲折和回潮 (1931—1945)

第 一 章

“九一八”事变后留学 日本运动的反复 (1931—1934)

第 一 节

为了救亡图存而出国留学

1. “九一八”后留日学生的“归国潮”

随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富国强民意识的深入人心、国民政府留学政策的不断改进，以及邻国日本的飞速发展，知识青年留学日本的人数迅速增多，据日华学会 1931 年 5 月调查，当时中国的留日生人数是 2972 人。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制造柳条湖事件，迈出了侵略中国的重要一步，中国面临着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吞的危险。次

日，富有爱国热情的留日学生全体宣布罢课。9月23日，大冈山（关东大地震以后成为留学生密集之区）的东京工业大学的全体中国留日学生，首先倡议一致归国。归国运动的浪潮随即波及高等师范和池袋的铁路教习所。9月26日，东京都内17所学校的全体中国留学生代表在神田青年会馆举行集会，决定采取一致行动。9月29日，大阪、京都、仙台、名古屋、长崎等地的留学生也参加了集会。各地学生一致决议，组成中华留日学生会，并当即采取一致行动，全体留日学生2000多人赴中华民国政府驻日公使馆请愿。要求：使馆下旗归国；政府对日绝交；中国对日宣战；发给全体留日学生归国船票。然而，南京政府教育部却电令留日学生：“此际宜顾虑学生身份，自尊自重，安心向学。”留日学生气愤至极，10月1日，再度赴公使馆请愿，伫立雨中，达10小时之久。最后商议，推选代表20人，先行返国，直接向南京政府请愿，并呼吁国内各界援助全体留日学生归国。10月9日，留日学生宣布成立“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抗日救国会”，并发表告国内同胞书。在留日学生的强烈要求下，留日学生监督处被迫发给部分留日学生归国船票。与此同时，其他留日学生也将平日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购票归国。归国时，留日学生拒乘日本船只，改搭他国的轮船。至10月底，留日学生几乎全部返国，留下来的不过20余人，其中多是无家可归的东北学生或无川资的贫寒学生。体现了这次留日学生罢课归国行动的坚决性和一致性。他们迫切感到事关祖国存亡，没有因顾虑学业而迁延观望。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近300人，同仇敌忾，全体退学，并发表退学宣言说：“同人等留学敌邦，仰教他人，深知谋我者不

惠我，制人者常骄人，已觉非留其地，学有难成。窃念吾辈武学生，职在捍国，当此国家濒危之时，正吾辈摒弃生命杀敌救亡之日，何能缄默笔砚间，与敌人讲武纸上乎？”

新落成不久的成城学校留学生部，到了10月，教室和宿舍空寂无人。

曾平静一时而专心学业的留日学生，又再次因上海的“一·二八”战火，相聚于留学生监督处，请求发给归国旅费。监督处得教育部的指令，将预备金中的19000元充当归国旅费，支付660名学生每人20至24日元。这次留学生归国，不像“九一八”事变时的激昂，只是悄然踏上归国还乡之途。从而完成了现代史中，中国留日学生归国的第一个高潮。

留日学生回国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向当局请愿。1931年10月17日，回国留日学生代表向南京政府及其教育部请愿，但都未得到圆满的答复。1931年10月26日，中华留日学生会再次派出全权代表进行第二次请愿。两次请愿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反对不抵抗主义，立即对日宣战；反对压迫民众的抗日救国运动；促进和平统一；严惩主持东北独立运动的卖国贼；从速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实行强硬外交等。从请愿内容可以看出，留日归国学生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推行不抵抗政策的政府当局，这仍然是五四运动中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延续。

归国留日学生的第二个行动，是向国内民众宣传抗日，启迪救国意识。“九一八”事变时，国内民众对敌我形势，尤其是国破家亡的险峻前景认识不足，漠不关心、随遇而安、冷漠视之的心态较为普遍。现实使留日归国学生意识到，向底层民

众宣传，唤醒其觉悟比向当局请愿更重要。因而，他们在归国之际，即发表告各界同胞书，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满蒙的阴谋，唤醒全国民众，团结起来，抵抗外敌入侵。以往的爱国救亡学生运动大多集中在平津沪等几个大城市，宣传对象以国内学生和市民为主。而此次留日归国学生的工作中心则注意向农村、农民转移，留日学生以自己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备、实力以及民情士气的耳闻目睹，向农民宣传抗日救国之必要。归国留日学生的农村宣传队的切中时弊、针对性强的抗日救国宣传，不仅提高了农民的民族意识，也改变了留学生自身的行为方式。留学生深入农村，目睹底层农民的生活惨状，认识到中国农村的愚昧落后，对多出生于殷富之家的留学生自身是一次大的促动，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消除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之间的隔膜，从而得到民众的广泛理解和支持。

归国留日学生的第三个行动，是从学术上探讨救国之策。他们组织了日本研究会，研究会分设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等五个部，并出版《暴露》三日刊。将各种研究所得公开发表，将日本对华政策及其各种阴谋等方面的信息，提供“贡献国人以作参考”。留日学生的学术研究成果不仅有其学术价值，更对危难中的国家的内外政策的制定具有现实参考价值和实用价值。

此次 2000 多名留日学生牺牲学业、历尽艰辛毅然回国，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救国宣传，得到了国内各界人士的同情和响应，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对提高国内民众的民族意识，增强爱国之心，无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拉开了抗日救亡的序幕。

2. “一·二八”后留日学生的“返日潮”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使留日学生返国之势不可遏止，有人以为他们不会再返日本。可是，当上海的战火停熄后，他们又零零星星地重渡日本，重返原来就读的学校复课（但须留级），其中也加入了一些新来的留日学生。留日人数情况，可以从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留学生数量变化中看出。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在1932年4月时，中国学生只有7人；5月有13人，6月有19人，9月增至72人。从1932年4月到9月的不到半年的时间，中国留日学生增了10余倍。到1933年12月，中国留日学生多达1059名，是1年之前的1932年9月的近15倍，可见其增势迅猛。

1934年，中国学生赴日留学人数持续保持上升趋势，仅仅9—10月的两个月间，初次赴日留学者就多达七八百名。

正当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侵华之际，中国学生反而群趋日本留学，其原因是复杂的：

其一，是中国兴起“日本研究热”所致。“九一八”事变以来，各方对日本的注意忽然加强了，其他亚洲诸国及远在西洋的国家均派学生留学日本，因而“日语热”一时成为世界性趋势。

《读卖新闻》1934年12月28日曾登载米村耿二撰写的《日语万岁！》一文，记有：

学日语！学日语！若说举世之中，研究日本的热潮正处于蓬勃之际，亦非过言。

特别是自“新兴满洲国”诞生以来，以华北停战协定之缔订为转机，中国年轻人掀起学习日语的狂热，的确是教人惊喜的事。

“先学好日语，精通日文书，才好谈论中日问题！”，这是最近中国青年人的呼声。

现在，“教授日语”的广告在上海有增无已。同时，曾经雷厉风行的抵制日货浪潮，似亦一去不复返。约值300万圆那么大量的日文书籍，光是上海一地，在一年间就销售净尽。——这是上海四川路日本书店店主内山氏所说的话，不会有错……

学日语！去日本！去日本！学日语！这种呼声响遍全中国。

今年以来，中日关系逐渐恢复正常状态。曾高唱抗日救国的中国，特别是以彻底排日而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亦迅速抹掉排日的色彩而转为亲日。今年4月，清华大学派出学生访日团一行70余人，由日语主任讲师钱稻孙率领，出发访日。又，中国首都南京市政府选派熊冲氏等12名中学校长联袂来日考察教育文化，此事已见前报。

然而，最能如实反映这新趋向的，是群集我国为学日语而来的留日学生。今春4月，新学年开始以前，据警视厅外事部亚洲科的调查，中华民国学生有1200名，“满洲国”学生有300名，早已突破事变前1403名的纪录。4月底，此数更见激增，形势大好，仿佛明治末年（1905—1911）中国学生留日全盛时代

的再现。秋季以后，他们更将蜂拥而至。……

其二，留学生本身的特质所致。举国震惊的“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战火，使当时的青年学生迫切感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必要，为了抗日救国，需要深入了解日本。于是负笈东渡者络绎不绝。

其三，中日货币汇率变化所致。“九一八”事变之后，金价暴跌，银价上涨，引起日中货币汇率的变化。1926年以后，中国银元对日元汇率的变化如下表^①所示：

中国〔银元〕100元对日本〔金元〕换算表

年月	日元	年月	日元	年月	日元	年月	日元	年月	日元	年月	日元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	123	1	93	1	99	1	102	1	74	1	46
2	118	2	94	2	97	2	99	2	72	2	42
3	117	3	90	3	97	3	102	3	69	3	46
4	110	4	93	4	95	4	99	4	69	4	46
5	112	5	96	5	103	5	97	5	67	5	44
6	112	6	99	6	103	6	96	6	54	6	44
7	112	7	95	7	103	7	93	7	54	7	46
8	105	8	94	8	104	8	90	8	56	8	44
9	102	9	94	9	102	9	87	9	58	9	46
10	90	10	95	10	100	10	84	10	57	10	48
11	87	11	99	11	99	11	81	11	56	11	51
12	87	12	101	12	99	12	79	12	52	12	49

^①1926年1月起至1936年6月止的统计数字，是据大藏省理财局的《金融事项参考书》；其后的数字则据《东洋经济年鉴》。个位以下的计算用四舍五入法。

续表

年月	日元	年月	日元	年月	日元	年月	日元	年月	日元	年月	日元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	69	1	98	1	115	1	125	1	105	1	105
2	...	2	98	2	117	2	130	2	105	2	105
3	79	3	100	3	117	3	139	3	105	3	105
4	73	4	97	4	115	4	140	4	105	4	105
5	72	5	103	5	109	5	146	5	104	5	104
6	74	6	102	6	112	6	142	6	104	6	104
7	81	7	103	7	115	7	136	7	104	7	103
8	93	8	104	8	117	8	128	8	104		
9	97	9	109	9	121	9	132	9	104		
10	95	10	107	10	123	10	128	10	104		
11	105	11	109	11	117	11	105	11	105		
12	99	12	110	12	120	12	105	12	104		

据上表，1926年以后，银价一直下跌。到1931年2月，跌至银元100元换42日元。但其后银价回升；1934年10月，银元100元换123日元，为1931年银元最低价时的3倍。因此，在中国国内“游学”远不及国外“留学”便宜。

1934年11月5日的《申报》刊登《留日学生激增——汇兑低落最大原因》一文写道：

中华民国负笈东渡留学之学生数目，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原已渐见锐减。唯去年秋季，陆续东渡者，则颇不乏人。至今春以来，其人数忽倍增。尤以九十月间，中国与东北地区之留日学生一举而增加千人，实为近年来之新纪录。将来尚有激增之势。但究其东渡留学之理由，盖前因“九一八”事变之关系

一时未便东渡，而近顷则中日感情已渐趋和缓之故。唯最大之理由，实为汇兑之关系。二三年前，日币100元须以中国国币200—300元方能兑换，最近则可以70—80元兑日币100元。其差甚远，故在上海攻读，反不如东渡留学为合算，盖较之二三年前，消费力减少3倍之故。

1934年的统计表明，官费、公费、补给、选拔、特选生共计707名，自费生有1115名，不明及其他有538名。可见，自费生人数是具有官费性质人数的1.58倍。

其四，留学政策的改进所致。1933年，国民政府公布了《国外留学规程》，对留学生的资格、考选、管理和回国效力等作了全面详尽的规定，鼓励学生赴国外学习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以应用于国内建设的需要。并在日、美、英等国设有留学生专门管理机构。为有志青年坚持走“科学救国”、艺术兴邦的道路提供了机缘。

1934年3月8日，著名影星王莹不甘陶醉于功成名就的现状，怀着对田汉、夏衍、欧阳予倩、叶沉等留日先生在戏剧方面的精深造诣的敬慕，以及对真才实学的强烈渴望，放弃了“明星”的优越生活，毅然东渡日本开始了“艰苦”而“孤寂”的留学生活。1934年东京《朝日新闻》曾以《支那影坛的佳人——潜心于日本文学研究的王莹小姐渴望成为作家文杰》为题，报道了王莹在日本留学的情况，文中称王莹“三年前，她一举跃为大家所公认的电影明星，与同影片公司的胡蝶女士并驾齐驱，在《女性的呐喊》、《铁板红泪录》等影片中扮演了可

爱的女主角，显示了她的表演才能，但是王莹小姐认为，要想开拓自己的表演技巧，有必要学习日本的现代文学。”称赞王莹是“光彩夺目的、吸引了全国影迷的影星。”认为她“可望成为女流作家的影坛丽人，不远万里来到东京，目前正在为学习日语而全力以赴。”^①

来自中国大陆的各行业、各阶层、各年龄段的留日学生汇成了“一·二八”之后的大规模的“返日潮”。

3. 来自东北的留学生

日本的学制，对于暑假的规定时间较长（从7月10日至9月10日），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有刚到日本的，有正在归日途中的，有仍逗留国内的。事出仓猝，留学生们义愤填膺，在政治立场上，不能再与日本人论师论友，只认定日本人是共戴天的敌人。无论是在日本的或是在国内的留日学生，多数都想废学从戎，参加抗日，收复自己的国土。但也有些留学生存在诸多困难，难以立即离日返国：（1）各省官费生有等候学费，还有学费已积压半年以上，典质皆空，现时生活都无法维持下去的。（2）各省自费生的学费来源，有出于亲族义助，加以爱人劳动的工资而寒窗苦读的，如果半途而止，对不起热肠的亲族，也对不起流汗的亲人。所以非到断绝邦交，使馆下旗回国的时候，决不动身。（3）高年级生，眼看只剩半年就要毕业，不愿意“功亏一篑”，中日战争不是半年能解决的，抱着毕业后再参战也不算晚的思想。（4）有的留日学生国

^①李润新：《洁白的明星——王莹》，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第96页。

内消息比较灵通，深知蒋介石专念内战，不能抗日复土，轻率归国是把一生仅有的青春光阴徒做无谓牺牲。

究竟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还是“一动不如一静”？在当时的情况下，谁也未能肯定下来。结果是各行其是，走的占居多数，滞留日本的是少数，留日学生于是呈现出空前未有的“辰星寥落”的局面。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留日学生除受到日人的寻衅、威胁之外，还存在着独特的严重问题，即东三省沦陷后，省、县首脑易人，或无人负责，关于留日生的省费、县费、旗费等一律停汇，影响到官费生的食、宿、学费等方面；又因为交通军用，或被破坏，邮电阻断，消息不通，家有金山，难解燃眉，自费生的食、宿、学费也极为困窘。留日学生遥念家园不堪回首，身处敌国，危机四伏，天寒岁尽，日暮途穷，饥寒交迫，相继患病，决计打破愁城的途径。

留日东北学生先后推举代表向中国公使馆陈情，请求救济，公使馆却推诿于留日学生监督处。留日学生与监督处商洽，又多方搪塞，加以拒绝。为维持最后的生存，留日的东北学生历访日本文部省、外务省、文化机关和文化团体等，才得到持有现在学证明通过学校暂时予以通融，一到费用即陆续归还的结果，并获得学费缓期缴纳的许可。

1932年2月，正值日本预备校生报考正式学校，以往需由留日监督处发给介绍书，才能得以报名。不料此番留日监督处却不肯发出介绍书，理由如监督刘燧昌所说：“东北已宣布脱离中央（指蒋政权），我不管东北留日学生的事情了。”使关外留日学生求学遇阻，虽后经与日本文部省专门学务局反复磋

商，使留日东北学生的报考问题得以解决，但此时仍是自有留日学生以来最凄凉落寞的阶段，留日学生的入学、升级，人数和毕业的成绩，都较前期显著下降。

傀儡剧开幕日（1932年3月1日），东京各机关、商店和居民都悬旗志庆，独有留学生默然神伤。各校悬挂“满洲国”学生放假一日的招牌，但是，关外留日学生都未离校，照常上课，深感国耻。

国联调查团李顿卿等恰在东京，想通过外务省召开东北留日学生茶话会，被外务省拒绝。东北留日学生曾多方设法投给国联调查团几封信，引起了东京警视厅对关外东北留日学生的注意，使关外留日学生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

此外，伪满政府对于由东北旧政权派遣的各种留日学生不摸底，并认为“都受过反日的教育，且参加过抗日的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又有些归国留学生加入了抗日的人民团体和武装组织，因此，伪满政府对留日学生最初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留日各种官费生虽屡次请伪国务院补发积欠的和今后继续的学费，伪满政府一概不予答复。直到暑假时才由伪奉天省公署和伪吉林省公署分别公布：从前的各种官费生限于1932年9月10日前到东京向办理留学事务机关报到，学费照发，逾期即取消官费资格。于是关外官费生纷纷东渡，而自费生为完成学业及候补官费生计，也纷纷返校。又因为长春迤南所谓南满地区的交通秩序逐渐恢复，伪吏、富商、地主的子女自费新生也先后来到东京。1932年10月，伪文教部次长许汝棻到东京视察留学生状况时，东北的留学生已达200人左右。这是“伪中央”不负责，而仍由各伪省负留学生责任的过渡时期，也是

伪满政府对旧政权选派的留日学生的考验时期。

伪满政府为抓留日学生思想和刷新留学教育，伪文教部总务司长西山政猪、学务司长上村哲弥等，前后接踵，屡至东京进行调查研究，并与有关机关商洽，打算选送一批“部费”留学生，以培养新生力量。“部费”留学生之名，有别于“省费”、“县费”的留学生，以表明“新国家”选送的留学生有别于旧政权派遣的留学生。同时通令各省停派新的“省费”、“县费”留学生，并指示从前“省费”、“县费”留日学生的“费籍”，没有驻在东京办理学务机关加具的“该生思想纯正”的考语（鉴定）和出具“连带负责”的证明，是不能发给学费的。如果现在“省费”、“县费”出有空额，可以在东京自费生中精选“思想纯正”、成绩优秀者顶补。

“部费”留日生须经考试合格方能录用。

首次“部试”揭晓，录取了80余名留日学生，这些留日生于1934年春季先后到东京报到，由办理学务机关按照指定学校，分别给予考校报名介绍信，报名应试，合格者入校学习。这是留日学生旧的“省费”、“县费”同新的“部费”共存的时期，也是留日学生由旧的省、县分别派遣转入伪文教部统一考送的过渡时期。

1934年5月，新的“旗费”留日学生22名集体与“部费”留日学生先后到达东京。同时，自费留日学生也如潮涌至。伪“宫内府”出费派来的载楫、毓英等8名留日学生也已抵达东京。以上众多留日的东北学生都由东京成城学校教务长继化少将负责安置食宿，引导入校。

蒙古民族的桑布札杰等数名留学生，由善邻协会支付学

费，会同该会和玉川学园校长小原等分别帮助安置就学。

“庚子赔款特选生”张维毓等一批研究医学的留学生和自愿入名古屋飞行学校的卜兆凤等，都经过曲折的手续，各达预期的目的。

1932年东北留日学生包括各种官费、公费、自费生的人数为200名，时至1934年，东北留日人数上升为700余名，较之2年前增加了两倍半。是留日学生“返日潮”的继续^①。

东北留日学生特殊的处境，使他们多数选择日本东京的名牌学校，埋头读书，以期通过勤奋的学习，获取专业知识和技能，以便回国后发挥一技之长。然而，他们的留学生涯却难顺利。“九一八”事变之后，留日学生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国民政府派驻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监督处，纷纷询问对日外交方针和留日学生的今后行止。留学生监督处的刘燧昌答复如下：“已电请中央，还未奉到指示。”几天后，经留学生再次催问结果，刘燧昌的回答依旧。

留学生赶赴中国驻日公使馆请示。9月22日（事变的第5天），公使蒋作宾抵达东京，接见留日学生，宣称：中央采取“联合国际力量，收复东北国土，暂不抵抗”的外交方针。关于留学生问题，已由教育部电令留日学生监督处负责处理、照料。

这时，东北留日学生前往监督处、公使馆陈述东北地区的特殊情形，去则无家可归，留则生活无着，请求予以救济。对

^①赵卜谦：《留日学生记略》，载《吉林文史资料》第26辑，1988年印，第195—200页。

此，留日学生监督处和中国驻日公使馆互相推诿，使东北留日学生徒劳奔波，得不到丝毫的结果，暴露出蒋介石对于留日学生饥寒不闻、死生不问的冷漠态度。

一周之后，日本各报都发表关于蒋介石外交部长王正廷因外交失败被学生殴打致伤的消息。同时，由公使馆工作人员口中透露传闻：殴打王正廷的学生中有留学生，蒋介石大为震怒，电令公使馆监督处严加监视，以免不稳分子（指共产党）捣乱。

10月初，监督处发表蒋介石阻止留学生归国的电报。当然，此时的留日学生已有3/4已经归国，滞留于日本全国各校的仅剩500来人。归国者还是络绎不绝，并未阻止得住。

这时候，日本的决策机关放弃了对于中国东北的“吞并论”，代之而采取“建设满蒙新国家”的国策。日本政府的“喉舌”《朝日新闻》曾登载过：“关于国体，文治派主张共和制，武力派主张帝制；关于国号，文治派拟为‘中和’，武力派拟为‘明光’，尚在相持未决中。”这条消息，给东北的留日学生向监督处商洽事件增加了不利因素。原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方实力派先后对蒋介石政权宣告独立时，监督处已认为不应再管东北留学生的事。发展到建立伪满洲国，监督处更认为东北留日学生的事务，已不在其办理的范畴内。

直到1932年1月28日的松沪事件，战事紧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日侨纷纷回国，日本的上海同文书院的学生将全部撤回国内的时候，驻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监督处才发留日学生的回国费用，公开准许中国留日学生归国。然而东北的留日学生却被打入另册，自然也得不到回国所需的经费。

日本制造的伪满洲国出现后，日本各地的学校就把中国留日学生分为中国留学生和伪满留学生两部分，并填表列案。

原籍是关内的留学生有自填为伪满留学生的；原籍是东北的留学生有自填为中国留学生的。填列的目的各不相同。关内留学生填列伪满国籍的目的是：在国际关系中，日、“满”较之中、日更为密切，而且认为东北的留学人数比关内少，容易得到官费。东北籍学生填列中国国籍的理由是：当初东渡时是中国留学生，自己并未申请变更国籍，因此，不承认强加在自己头上的伪满国籍。但从日本学校的角度来看：关内学生自动填列为满洲国籍的是思想良好的表现；东北留学生填列中国国籍的是思想不良的集中体现。于是，思想不良成为一时的突出问题，引起了日本警察、宪兵、特务的注意，伪满驻日公使丁士源也主张：“鼎革之际，人心思旧，惩一警百，以正学风。”借以处罚心怀“中国”的留日学生。加之，蒋介石政权的中国留日学生监督处的百般推拒，不准东北的留日学生姓“中”，致使东北的留日学生为保全自己的学籍、费籍，不得已成了伪满洲国的留日学生^①。

4. 持续上升的留学人数

1931年，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的留日学生渐少，但是，随着中日局势的平稳，赴日留学生又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详见下表：

^①赵卜谦：《“九一八”后蒋介石对留日学生的态度和东北留日学生的国籍问题》，载《吉林文史资料》第26辑，1988年印，第212—214页。

留日学生人数一览表^①
(1931—1934)

时 间 学 校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帝国大学	184	157	156	252
高 大	33	25	20	25
医 大	27	25	23	19
工 大	98	90	99	111
高等农业	232	194	138	155
高等商业	14	8	6	3
高等工业	85	62	38	40
外语美术音乐	16	10	9	16
高等学校	103	88	88	106
其他官公立	186	103	99	169
陆军学校	378	50	67	80
私立大学	961	435	284	620
私立专门	104	74	160	119
女子私立	97	37	52	81
一般预备	532	20	119	456
实 习	30	12	28	20

^①沈云龙：《中华民国二十五年—日本昭和十一年留日学生名簿》，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17页。表中“×”处，为原书印刷不清者。

续表

时 间 学 校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中等学校	x	x	x	x
合 计	3126	1421	1417	2340

第 二 节

留学中的斗争与斗争中的留学

1. 补习日语与讲授汉语

中国留学生踏上日本国土之后首先要学习日语，渡过语言关。虽然中国国内已有专门学习日语、为留学做准备的学校，尤其是东北三省在“九一八”事变后，日语已成为学生必修语种，但是，就全国而言，传授日语的学校数量仍很有限，绝大多数人留学之前享受不到这种受教育的机会。即使是在国内已很有地位的学者、名流，到日本后也需要过语言关。

这一时期，中国留学生为加快日语学习的进度，提高日语的运用能力，除了各类日语补习学校学习日语外，还纷纷租住日本民宅，制造语言环境，把日常生活和日语学习结合起来，了解了日本的风土人情、民风民俗，又掌握了纯正地道的日语。如女明星王莹，就曾在1934年初到东京时，租住了长崎街东街的一间价钱低廉的公寓。为了练习口语，她和一个名叫草野美沙子的日本姑娘合住在一起。白天在东亚补习学校

学习日语，晚上和草野芙沙子姑娘练习日语，王莹很快便能灵活自如地用日语表情达意，即而升入东京大学艺术系，学习专业课。

在赴日的留学生中，有很多人文化程度较高，有很好的语言修养，有的在国内就已经著书立说。因此，东渡日本后，为提高日语表达能力，更多地了解日本各阶层人士，以及维持留学生活所需经费，一些留日学生在学习日语的同时，又向日本人传授汉语知识。

作为诗人、文学家的胡风，从东亚日语学校结业后，又于1930年1月到本乡区的由奥平定世创办的补习学校日语补习班继续深造。这所补习学校，还专为日本人开办了一个“支那语补习班”。胡风和奥平定世相识后，奥平定世就请胡风为该班讲授汉语课。为帮助胡风维持生活，奥平定世又将自己在横滨私立商业专门学校每周两小时的汉语课也让给了胡风去教。胡风用买来的普罗期刊中的工农通信作教材，一方面帮助日本学生学习汉语，一方面起到了宣传普罗文学的作用，从而引起了一部分日本学生的兴趣。

著名影星王莹在向同住的日本姑娘学习日语时，也不失时机地向其传授汉语知识，介绍中国现状。使双方互相学习对方国家的语言，各自收获匪浅。

通过进入日语补习学校、与日本居民同吃同住、阅读日文期刊等多种渠道并举，使中国留日学生的日语水平迅速提高。许多留日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就能通过语言关，升入日本各类大学学习深造。

中国留学生在向日本人民传授汉语的过程中，增进了中日

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加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①

2. 学习文化与学习政治

中国留学生在日本闯过了语言关之后，纷纷升入自己理想的高等学校、专科学校就读，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学科门类的繁多，为中国留日学生的进修深造创造了条件，开阔了中国留学生的知识视野。

胡风在掌握了日语后，升入东京庆应大学英文科；王莹进入东京大学艺术系学习音乐、戏剧和文学。

中国留日学生不仅学习常见学科，有的还涉猎新兴学科和应用科学。如1934年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法科政治经济系的青年贾秉仁，在面临毕业就是失业、又难筹集赴欧美巨额学费的前提下，选择了赴日留学的人生道路。从日语补习学校结业后，进入东京明治大学研究院，学习市政学。后经指导教授弓家七郎博士介绍，加入了专门研究市政的学术团体——东京市政调查会，成了名誉研究员，并以市政学“专家”的身份考察了东京、大阪、京都各市，将学术上的研究与具体情况相结合，撰写出了颇有见地的学术著作，受到日方的赏识。

此时中国留日学生研究科目之广、钻研程度之深是前所未有的。具体情况可见下表^②：

^①马蹄疾：《胡风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2页。

^②沈云龙：《中华民国二十五年—日本昭和十一年留日学生名簿》，台湾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20页。

留日学生研究科目一览表
(1931—1934)

时 间 科 目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合计
法 经	889	435	408	581	2313
医	142	117	119	171	549
工	332	172	167	193	864
文	248	147	130	206	731
理	154	127	140	146	567
农	74	58	77	85	294
商	100	81	29	94	304
艺 术	55	19	19	35	128
陆 军	378	50	67	80	575
警 务	29	27	30	31	117
铁 道	153	71	87	146	457
特 预			13	68	81
预 备	532	20	119	456	1127
其 他	45	97	12	48	202
合 计	3096	1421	1417	2340	8274

中国留日学生除了学习日语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外，还耳濡目染，深受日本浓郁的文化习俗、生活习俗的感染，了解了佛文化、茶文化的影响及风俗习惯和待人处世的原则，如日本人对知识的崇尚、对知识分子的尊敬，日本人对欧亚文化

的兼收并蓄，日本人的道德观念和时间观念，日本和学校制度等等，都与中国很不相同，使中国留学生受到了全新体验。

当时的中国留日学生主要可分两类：一为“镀金”，一为求知。“镀金”者，是一些富家小姐少爷，只求“留学生”的金字招牌，无意学习知识，影院舞场是他们每日必到的活动场所，但这类留学生毕竟是少数。多数的留日学生赴日是因家境贫寒，无法支付欧美留学及国内学习的学费；有的深感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白色恐怖的窒息，无法呼吸到自由的空气；有的因国内高等教育水准的低下、世风的污浊而东渡。身感日本科学学术氛围的浓郁轻松、政治、政党活动的频繁，尤其是政治气氛的相对宽松，使留日学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积极投身到进步的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之中，投身到积极进步的政治理论的学习中，以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后来成为文艺理论家、诗人的胡风在庆应大学读书时，阅读了大量日本出版的普罗（无产阶级）文学的书籍、报刊和苏联文学作品。他当时在庆应大学学的虽然是英文科，但是他的主要兴趣和精力，是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投入日本的普罗文学运动。日本普罗文学运动的蓬勃开展和与日本普罗作家的广泛接触，加深了胡风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了解和对中国新文学中以鲁迅精神为主导的革命传统的理解，并借助日本的开放窗口，了望到了广阔的世界。

经日本同窗泉充的介绍，胡风参加了日本普罗文化联盟下属的普罗科学研究所的艺术学研究会，每周去参加一次活动，

讨论文艺理论问题，也研究各国革命文学运动情况^①。

后来成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的张化宇参加了1932—1933年北平的反帝爱国学生运动。同学纷纷被捕入狱，宪兵第三团逮捕学生日益紧迫，自身安全受到威胁。1933年底回到原籍河南省确山县暂避。1934年下半年，不甘庸碌无为的生活，与同乡结伴，考入东京明治大学，并参加了留日进步学生组织的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世界编译社等组织。这些组织后期由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领导。成员每星期以读书会的名义聚会一次，学习革命理论，进行时事政治座谈，参加一些政治活动，为抗战募捐。在中华东京留日学生联合会领导下与中国留学生中的右翼势力作斗争等^②。

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开阔了中国留学生的知识视野，为他们日后在科学领域的求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丰富多彩的政治活动，推动了进步的中国留学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追求和探索，培养了留日学生对祖国前途、民族命运、人民痛苦的关注。正是这种异国的进步思想的熏陶，使众多的中国留日学生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斗争中，成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特殊的生力军。

拥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头衔的中国现代史上的胸怀世界、学贯古今、精通医学、掌握三门外语，又深通经史与格律的奇才

^①胡风：《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8页。

^②张化宇：《回忆参加留日学生训练班的前后》，载《河南文史资料》第28辑，第153页。

——沈其震先生便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日本的科学文化思想熏陶。20世纪20年代末，国民政府对学生运动的血腥镇压，使沈其震东渡日本，去完成自己的革命家、医学家之梦。他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攻读，三年后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在他的日本导师中，有发现出血性黄疸病原体的稻田，有第一个从米糠中提取维生素B₁的岛园。在日本著名的帝国大学医学院攻读时，他对日本导师、教授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日本重视教育、重视科学研究的经验印象深刻，十分敬佩，但对日本军人恣意横行、耀武扬威则极为不满。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毕露，沈其震毅然离开日本，回归祖国。

日本侵占东北三省之后，又对华北虎视眈眈，而蒋介石却在反复进攻“苏区”。沈其震认识到“科学救国”犹如远水不解近渴，此时迫切需要对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有所作为。于是利用医学专长开办了“沈其震诊所”。既行救死扶伤之事，又兼为共产党地下组织刺探日军的侵略意图、传递秘密函件，甚至为地下党组织提供活动经费。沈其震用自己精深的医学知识和崇高的思想品德修养，为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新中国医学科学的研究与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①。此类英才不胜枚举。

3. 向日本介绍中国与向中国介绍日本

中国留日学生的特殊身份和独特阅历，自然就肩负了历史

^①周桐：《不应被遗忘的开国功臣——兼有老革命家传奇经历与新中国医学科研事业奠基人业绩的奇才沈其震》，《华声报》1994年11月29日。

和时代赋予的使命——向日本介绍中国，向中国介绍日本，使中日思想、文化、科学等方面得到相互的交流与渗透。

中国现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胡风，以其思想的进步、文学素养的精深，加入了日本普罗文化联盟下属的普罗科学研究所的艺术学研究会。胡风的特殊身份，使他成为交流中日左翼文化最理想的使者。他在日本的杂志或文学座谈会上介绍中国的左翼文化运动，曾为艺术学研究会出版的《艺术学研究》季刊撰写了关于中国反战文学情况的文章，介绍中国新近作家的揭露国民党轰炸江西中共中央苏区的小说。他还以“谷非”的笔名，为普罗作家同盟的《普罗文学讲座》写了一篇介绍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情况的文章。

1932年夏季的一个炎热的下午，胡风拜访了日本著名的普罗作家同盟委员会委员长江口涣，恰逢日本著名的左翼作家领袖小林多喜二、秋田雨雀、藤枝丈夫、大宅壮一等人在此召开创作座谈会。胡风被邀请参加了这个座谈会。会上，除了讨论日本左翼作家的一篇作品外，特请胡风向大家介绍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情况。以“支那通”自命的藤枝丈夫在发言中，极力吹捧“太阳社”的作家钱杏邨，抹煞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对此，胡风用翔实的事例反驳了藤枝丈夫的错误观点，阐明了自己对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认识和看法，受到在座者，尤其是小林多喜二的称赞。包括胡风在内的中国进步留学生的活动，加强了中日两国左翼文化的交流^①。

胡风在向日本读者介绍中国的同时，也不断地向中国的读

^①马蹄疾：《胡风传》，第47页。

者介绍日本及其日本的无产阶级（普罗）文学。胡风还从普罗诗人远地编辑的《普罗歌人集》中选译了两位日本女工写的诗，一首是京山爱子的《给妹妹》，一首是东园满智子的《妈妈》。把这些具有鲜明、浓郁的普罗色彩的文艺作品推荐给中国的读者，无疑对推动中国左翼文艺的发展起积极作用^①。

著名影星王莹也是活跃于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使者。受日本进步、革命的戏剧运动所吸引，她主动拜访日本左翼戏剧的旗手秋田雨雀、方土与志和村山知义等戏剧家，与他们交流日本新剧运动的发展趋势及中日两国戏剧运动的经验、教训。秋田雨雀对王莹悉心研究日本戏剧，刻苦攻读日本文学的强烈求知欲和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十分赞赏，对王莹的表演艺术给予很高的评价。

王莹不仅向日本艺术界展示中国戏剧发展的现状，还将自己在日本的学习与实践所得，以及日本的艺术成就介绍给中国的艺术界和中国观众^②。

在此期间的中日科学文化的交流中，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

一为个人交流。这是促进中日文化发展、科技进步、思想交流的主要方法和途径。许多留日的中国学生以自己所学专业为契合点，研究中日两国在该领域中发展的异同、优劣，撰写论文，发表见解，将日本先进的医学、文学、社会学、民俗社、法政学、经济学、军事学、市政学等学科的前沿发展情况

^①胡风：《胡风回忆录》，第9页。

^②李润新：《洁白的明星》，第94—95页。

通报给国内同行，无疑促进和加快了我国各学科发展的进程。中国留日学生在同日本的学术界的交往和交流中，也将我国该学科的发展现状以及我国社会的现状介绍给日本同行和日本人民，使日本人民与日本的知识界对我国及中国人民有了明晰、正确的认识，促进了中日人民的友好往来和学术交流。

二为官方交流。在中日两国的科学文化交往中，两国政府也积极地提供方便，创造条件。分别组织互访交流，师资培训，短期进修，通信通邮，使两国的科学文化艺术不断交融、互补。如1931年日本文化事业部在上海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日本的东京《朝日新闻》多次发表留日学生的学术研究情况和研究成果。中国政府也为中日文学艺术的交流作出了积极的努力。1934年6月，中国政府驻日本东京的留学生监督处在上野美术馆主办了中华民国留学生美术展览会，将中国留学生的艺术探索和艺术成就展示给日本的美术界和日本人民。使日本人民对博大精深的中国美术艺术有了直观、真切的了解。

4. 组织联谊与联谊组织

“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加剧，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恶化，留日学生的处境也更加艰难。日本当局将中国留学生分成“满洲国”留学生和中华民国留学生，监视他们相互往来，刺探他们的行动，私拆他们的信件，私闯他们的住室，偷翻他们的文稿日记等，使留日学生义愤填膺。当时的《申报》报道：“我国留日学生遭受残酷痛苦，时常受日本当局无故逮捕，横加迫害，致人心惶惶，无心向学。”在日本法西斯的魔爪下，读书尚且不易，抗日活动更为困难。稍有

不慎，就有被逮捕或被遣送回国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公开的抗日斗争是不可能的，因此，1932年以后，留日学生由慷慨激昂的公开的抗日救亡活动，转而采取诸如成立社团、出版报刊、组织学术研究等合法形式，从事切实的救国活动。

据《留东日报》1卷4期的记载，留日学生中各式各样的团体多达90个。较有影响的留日学生团体有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世界编译社、社会科学座谈会、文化座谈会、现代问题座谈会、拉丁文化座谈会、戏剧协会、留东妇女会、东流、质文等。这些组织后期又形成了中华东京留日学生联合会，主要由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领导，与中国留学生中的右翼势力作斗争^①。

中国留日学生社团，从表面上看，都是联谊、学术团体，没有一个冠以“抗日”二字，但实际上，是以联谊、学术团体的形式，从事对敌情和国情的研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以熊唯知、张持平、冯基民、姚耐、黄一寰、李肇嘉为发起人组织的“社会科学座谈会”成立后，每星期以读书、座谈的名义聚会一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进行时事政治座谈，引导留日学生积极从事抗日救亡的活动，为抗战募捐。凡愿意参加这个团体的人，只要是可靠的进步的中国留日学生都欢迎。不必填表，不举行仪式，随时发展会员。这个组织，对中国学生是公开的，对日本人（尤其是警察）是秘密的。由于团体的宗旨积极，吸引了众多留日中国学生，卓如、林启

^①张化宇：《回忆参加留日学生训练班的前后》，载《河南文史资料》第28辑，第153—154页。

镗、丁日初、黄维英（黄薇，女）、梁其英（女）等二三十人都是该社会科学座谈会的骨干分子。至于一般成员，则很不固定。你喜欢讨论什么问题，就可以随时参加，因此，参加人次很难统计。其好处是，形式上很松散，实际上志同道合，自觉自愿。

除“社会科学座谈会”外，以梁成林为首的“文化座谈会”，裘进（周平）为首的“现代问题座谈会”，丁克组织的“拉丁文化座谈会”，叶文津组织的“戏剧协会”，董启翔、鲁沙白、梁其英、吴素霞等组织的“留东妇女会”等社团，往往因人、因地、因时而异，一般有几十人，或更多些。这些组织大都属于左翼的，虽然没有公开自己的宗旨，但是都主张抗日救国，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团体都各自团结了一批积极分子，团结了一批留日学生。团体间可以相互往来，参加学习讨论，交流读书心得。这些团体的骨干表面上是某某大学的学生，取得留学生的合法身份，实际上在做抗日救亡工作，这样，就可以在日本住下去，在经济上也可以得到家庭的支持。

中国留日学生联谊、文化社团组织者思想各异，错综复杂。虽多数是左翼进步学生组织，也有由心怀叵测之人发起组织的学生团体。国民党留日学生监督处陈治溥和东京国民党头目陈固亭也组织了一个“留日同学总会”（简称“学总会”）的右翼学生社团，与左翼学生组织相对抗，阻挠左翼留日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

孔祥熙、马伯援创办的“中华留日青年会”和熙洽创办的“满洲国留日学生俱乐部”等组织，则是一些官僚、买办为自己培养后备力量，别有用心地将青年学生的热情、才干“为我

所用”的典范。

“满洲国留日学生俱乐部”是爱新觉罗·熙洽任伪吉林省省长兼伪财政部总长时，出私囊办理的。发起、组织者为陆军中校、日本陆军大学“在学”王维藩、文学学士耿熙钧二人，1932年夏季，“满洲国留日学生俱乐部”在东京牛込区辨天町竖起招牌。名为方便客居他乡的伪满洲国留日学生的日常生活，提供集会娱乐的场所，为留学生谋福利。但是，入部留日学生需填写一张“入部志愿书”。“满洲国留日学生俱乐部”向所有伪满洲国留日学生开放，入部学生多多益善。连在日本贵族学校“学习院”留学的溥杰、润麒（溥杰的三妹夫），也成了俱乐部的名誉干事长和名誉干事。

熙洽出资该俱乐部的目的在于为自己树碑立传，培养自己所需要的政治干部、技术干部和财经干部，捞取政治资本。

与俱乐部同时并存的伪满驻日外交机关，无论是以鲍观澄为首的伪代表部，还是以丁士源为首的伪公使馆，都想把俱乐部抓到自己手里。把俱乐部作为外围组织，并想利用这个组织，为自己延誉，为自己宣传。然而，在日寇统治东北之时，凡属于伪满的任何组织，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没有日本人的参与操纵是不行的。所谓知识分子集团的留日学生俱乐部，更引起日本当局的注目。因此，东京与伪新京之间取得了某种共识，订出新的计划，由政府拨款代替了个人投资，用法立案代替了自发的存在，以伪满洲国留日学生会馆代替了伪满洲国留日学生俱乐部。该会馆的骨干领导是日本人平田少将，下设主事若干名（内有“满系”一名），听其指挥，分执各务。

新会馆设施齐备，食宿、娱乐、学习条件上乘，但是，却缺少了左翼留学生组织的自由活跃的空气，更不允许有进步思想的交流。

伪满洲国留日学生会馆从抓组织，进一步来抓思想；从提供生活条件，来灌输“建国精神”；从强调集体纪律，来剥夺意志自由^①。

伪满洲国留日学生会馆成了伪满政府及日本当局对留日学生进行奴化教育的“合法”组织，成了培养忠顺奴仆的园地。束缚了留日学生对民族解放途径的探索，阻碍了留日学生对真理的渴望和追求。

第 三 节

反战运动中的中国留学生

1. 日本反战同盟中的中国留学生

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公开侵略中国，蓄谋已久。自1931年7月起，屡挑事端，并把大批侵略军调入东北，增强驻扎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实力，战争一触即发。接着，日本关东军把南满铁路柳条湖一段的路轨炸毁，却以中国军队破坏铁路为借口，于9月18日夜挑起战火，一夜间占领了沈阳，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

“九一八”事变不仅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也引起

^①赵卜谦：《熙洽与伪“满洲国留日学生俱乐部”》，载《吉林文史资料》第26辑，第207—211页。

了世界各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谴责，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尤其是东三省人民）的同情。以罗曼·罗兰为主席、巴比塞为副主席的世界反战同盟于1932年8月27日至29日，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举行世界反战大会。在此之际，日本共产党、日本进步人士站在人道主义、国际主义立场上，冷静分析国际形势，不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成立了日本反战同盟，与世界各国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人民一道抵制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在日本反战同盟中，也活跃着中国留日学生，胡风就是其中优秀的代表。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胡风在日本的政治活动和文学活动十分活跃，他对政治活动的热情，又回到了“五卅运动”和大革命时期。1931年底，胡风和留日学生方天一、王承志参加了日本的反战同盟，成为中国小组的成员。同时，胡风又和方天一加入了日本共产党《赤旗报》的读者小组。后来，根据日本共产党中央的通知，这个小组被批准为日共党员小组，从而集体加入了日本共产党。不久，胡风和谢冰莹等三人一起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支盟。

1932年3月，胡风和方天一邀集中国留日学生聂绀弩、周颖、邢桐华、王承志发起成立了“新兴文化研究会”下设“社会科学研究会”和“文学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由方天一、王承志负责，文学研究会由胡风负责。

新兴文化研究会的文学研究会，曾由胡风主持召开过三四次学术讨论会，研究国内刊物的创作倾向，讨论国际反战文学的现状以及中国反战文学的情况。胡风曾在《艺术学研究》杂志上撰写介绍反战文学（如孙席珍的反战小说等）。

胡风不仅在文学研究和创作中，坚持反对战争的立场，而且身体力行，直接参与日本反战同盟的具体工作。

1933年2月22日，日本著名的反战进步作家小林多喜二被日本法西斯当局逮捕，当天夜里被日本警察刑讯逼供，暴死狱中。消息传开，日本普罗作家联盟发动了向日本法西斯当局抗议的追悼小林多喜二的示威运动。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出版了追悼小林多喜二专号，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反动当局的法西斯暴行，日本反动当局为了镇压人民的抗议活动，派出便衣密探，四处搜捕《赤旗报》读者小组成员、反战同盟盟员和日共党员。在追捕最危急时，日本反战同盟负责人池田寿夫，曾在胡风的寓所过夜避难。为了声援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池田寿夫要胡风以“中国左翼文化总盟”的名义，拟一唁电，向英雄的小林多喜二致敬，并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胡风的一系列活动，早被日本警察发觉。另外，作为日本反战同盟成员的胡风、方天一、王承志以及聂绀弩、周颖等留日学生编印的《文化斗争》，曾发表过揭露日本当局侵略中国的阴谋的文章。聂绀弩和周颖夫妇二人的寓居早成馆也早被日本警察所监视。聂绀弩夫妇外出时，警察由房东带领，在聂绀弩夫妇的卧室，搜查到《赤旗报》和《文化斗争》等反战、进步刊物。聂绀弩夫妇不幸被捕。与聂绀弩交往密切的胡风也遭监禁。在关押于四谷警察署的最初半个月，不提不审。半个月后，接连两天对胡风进行闪电式的拷打审问，让胡风招供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终因查无实据，胡风又坚决否认，胡风、聂绀弩和周颖被免于起诉。

1933年6月，关押了三个多月的胡风，在中野警察署被

宣布驱逐出境，并由警察押送到庆应大学办理退学手续。聂绀弩、周颖同时被宣布驱逐出境。

方天一和王承志被日本警方抓获后，因《赤旗报》追悼小林多喜二的专号上有他们两人的文章，暴露了与日共的关系，因此，方天一和王承志被日本当局起诉判刑。至此，日本反战同盟中的中国小组成员一一暴露，无法再在日本从事反战运动。

20世纪30年代日本反战同盟中的中国留学生，人数虽少，影响却极大。他们在反战同盟的活动中显现了如下特点：

首先是双重领导。中国留日学生的特殊身份，就使反战同盟中的中国留学生既要受日本反战同盟、日本共产党及《赤旗报》读书会的领导；同时，中国留学生还要接受中国左翼文化联盟总会的领导。

其次是双重任务。中国留学生既要完成学业，从事学术、文艺研究，进行反战理论的研究和探索；同时，还要以行动积极投身到实际的反战爱国运动中去。

所幸，日本反战同盟中的中国留学生虽因反战活动而失去自由，但也在反战运动中受到了锻炼和启发，为他们最终成为共产主义的战士，世界和平的追求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胡风等人，回到祖国后，又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左翼文化艺术家联盟的组织领导以及维护鲁迅战斗精神的斗争中去，成为我国现代史上著名的革命家、文艺理论家^①。

聂绀弩和周颖夫妇二人被驱逐回国后，继续从事进步的文

^①马蹄疾：《胡风传》，第52—61页。

化运动，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成为反战抗日的积极分子。

2. 强烈声讨殖民侵略的诗篇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也激起了身在敌国的留学生的愤慨。许多留日的中国学生、学者，纷纷著文，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表明爱国主义的立场。如郭沫若、胡风等人，将自己的愤怒倾注笔端，将文学笔锋指向黑暗现实，开了文学创作之新风气，爱国主义成了此时留学生文学界的显著特色。

1931年10月29日，在日本东北郊区中新井村，胡风以十二万分的愤慨，写出了强烈声讨和控拆日本侵略者的强盗行径，充满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仇敌的祭礼》，寄给了住在上海的左联成员韩起。韩起将此诗送到李剑华办的刊物《真理》上发表了。

《仇敌的祭礼》中，作者站在国际主义的高度，不是以狭隘的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对立，来解释这场战争，而是以正义和非正义的对立，以军国主义统治者、卖国贼和人民群众的对立来解释这场战争：

大炮轰破了满洲黑夜的天空，
是的，在愤怒里我读到了这消息，
谁是屠伯，
是“贵国”的人干的，
也是“敝国”的人干的。
而死的是，

生在海那边的我们底兄弟，

生在海这边的我们底兄弟。

——《野花与箭·仇敌的祭礼》

诗人以清醒的头脑，明快的语言指出，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这次事变“贵国”和“敝国”的两个祸根，真正遭殃的，是“海那边”的中国和“海这边”的日本的同胞兄弟。诗人将侵略者和卖国贼与两国的人民，构成这场战争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从国际主义的高度概括了这场事变的性质。

胡风在诗中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向日本人民提出的“为了祖国”的口号，完全是谎言，完全是为了掩盖他们“这场把戏”的欺骗实质，掩盖他们“可耻的流血”。日本军国主义对战死者的“最后敬礼”，是对战死者的“第二次强奸”，是对于尚未成为炮灰者的日本人民的“无言的诱惑和威吓”。诗人清醒地告诫日本人民，警告那些“从农村来，从工厂来，从街头巷尾来”的所谓“叱咤三军”，不要上日本军国主义者和那些战争狂人的当，不要受他们的欺骗，因为他们所要屠杀的，正是自己的兄弟。充满哲理的诗句和充满正义的呼号，对分化敌人，瓦解敌人，启迪人民，团结人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胡风在诗的结尾，以国际主义的博大精神，以解放全人类的宽广胸怀，坚定地抱着正义必胜、真理必胜的信念高唱：

在海这边每个农村每个工厂里，

在海那边每个农村每个工厂里，

在陈腐的全世界上每个农村每个工厂里，
将要吹起进军的喇叭，
高唱着我们底进行曲。
那不是什么“××代”，
也不是什么“××歌”，
那是新人类的诞生诗。
我们兄弟自己共作的——
起来呵，海这边的奴隶！
起来呵，海那边的奴隶！
起来呵，全世界的奴隶！
挣脱你们头上的锁链，
争取我们自由平等的“祖国”，
它的名字叫做“大地”。

——《野花与箭·仇敌的祭礼》

胡风的诗与此前留日学生及中国青年文学家们的创作相比，无论从内容、语调、语言，还是思想内容都迥然不同。它跳出了个人蜗牛庐舍似的生活小圈子，而走向社会，走向民众，走向了革命的激流。

侵略者的行径，中华民族的危亡，使中国留日学生中的文学青年摆脱了以往作品中的缠绵凄迷、哀婉纤细的抒情韵味，跳出了象牙之塔，迈向广阔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写出了一篇篇声讨侵略者罪行的檄文，写出了一首首爱国主义的诗篇^①。

^①马蹄疾：《胡风传》，第48—52页。

留日学生不仅用笔去抒发爱国之情、亡国之恨，更以卓有成效的工作，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斗争中去。

留日学生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以学术团体的形式，开展经常性的活动，从事对敌情和国情等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的问题的研究。仅据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留东学报》为例，该刊研究日本的文章占50%以上，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至社会文化，均有涉猎。其研究面之广，研究问题之专可以概见。倘若不是置身日本，深入虎穴，是难以作出的。这些研究和介绍，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之时，无疑非常切实。正如留日学生所宣称的那样：“在这严重的时机，我们要知己知彼，然后才能了然于这次国难的意义，然后才能设计必要而有效的应付策略”。

在悲愤沉毅的抗战前夕，留日学生在忍辱负重地学习救国知识的同时，艰难而切实地从事着救国工作。他们把耳闻目睹和研究所得通过书籍、报刊、信件、传单等媒介传入国内，对提高国民的救国常识和抗日意识，对政府当局制定内外政策，都起过一定的作用，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在国内外文化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3. 筹备“远东泛太平洋反战大会”

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沈阳，挑起侵略战火以后，世界战争的局势更加严峻。以罗曼·罗兰为主席、巴比塞为副主席的世界反战同盟，于1932年8月27日至29日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举行集会，全世界400多个进步团体、上千名代表参加了这次反战和平大会。会议决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准备举

行一次“远东泛太平洋反战大会”，预定在1933年7月或8月召开。日本反战同盟，为了执行阿姆斯特丹世界反战大会的决议，准备邀集远东国家派代表到日本参加一次筹备会，以决定反战大会的时间、地点和议事日程。为了与中国方面取得联系，又决定派中国留日学生、日本反战同盟中国小组成员胡风作为特使，去上海联系。

与此同时，中国左翼文化总盟的领导人冯雪峰，也希望胡风回上海，参加“左联”总盟的组织工作。因此，胡风接受了反战同盟特使的任务。担此重任的还有两位日本反战同盟中国小组的成员，即方天一和王承志两位留日学生。

在胡风、方天一和王承志受命从日本启程前，日本反战同盟的负责人约他们三人在东京百货公司白木屋楼上的大众食堂会面，向他们传达这次去上海的任务。为了安全，这位负责人没有介绍自己的身份和姓名，谈完话后，吃了一顿客饭就分手了。胡风立即启程回中国上海。

胡风到上海后，寄住在静安寺路大鵬坊韩起的寓所。冯雪峰由韩起陪同，与胡风会晤。胡风把日本反战同盟要求中国派代表去日本参加“远东泛太平洋反战大会”筹备会的事转达冯雪峰。在交谈中，冯雪峰提出，希望胡风留在上海担任“左联”总盟的组织工作。胡风以自己无论是从资历和学历上，都没有担任文总组织工作的条件为由，婉言拒绝。冯雪峰又请胡风担任左联的宣传部长。胡风鉴于上海文坛情况和左联内部潜伏着的人事矛盾，竭力推辞。在文总没有最后确定参加远东泛太平洋反战大会筹备会议的代表期间，胡风会见了当时左联的部分领导人，并参加了左联的部分活动。除了与冯雪峰有多次

交谈外，曾由叶以群引见了当时左联行政书记丁玲，并参加了一次由丁玲主持的左联会议。胡风还接受丁玲的委托，说服左联成员丘东平，不要去日本，要他留在上海工作，但被丘东平拒绝。受周扬之邀，胡风为《文学月报》（周扬主编）杂志撰写了一篇批判“第三种人”的文章《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在此期间，胡风还会见了左联所属的中国诗歌会的负责人蒲风 and 穆木天等人，并为中国诗歌会作了一次讲演。通过短期的接触，胡风发现左联内部在人际关系上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决定仍回日本留学，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水平，以免陷入宗派纠纷之中。

胡风是1932年11月中旬受命日本反战同盟回上海联系远东泛太平洋反战大会筹备会事宜的，12月初，中国左翼文化总盟确定楼适夷为参加远东泛太平洋反战大会筹备会议的代表，并决定楼适夷于12月中旬与胡风同船赴日本。当时正值淞沪战争之后，中日交通线上日本警察戒备森严，旅途上随时有被搜查的可能。加之楼适夷随身带了参加反战大会筹备会议的密写文件，因此，组织决定，胡风、楼适夷两人订好各自的座位，分别登船，座位相隔一定距离，互相装作不认识，又能彼此关照，以免一个人出了问题，牵连另一个人，而另一个人又可以暗中了解情况，决定对策。

胡风和楼适夷为了便于互相照看，乘的是最低层的通舱，四周旅客交错席地而卧。上船不久，船上的日本警察就来检查。轮到检查楼适夷时，警察让楼适夷打开旅行包。楼适夷携带的秘密文件，都是用美农纸写的，裁成小片，裹作一团，分别用陈皮梅包装纸包起来，与原来的真物混在一起。狡猾的警

警察非要楼适夷打开检查，站在一边的胡风为他捏了一把汗。楼适夷毕竟是从事地下工作的老手，他不慌不忙地打开一盒，拿出一颗陈皮梅塞到警察的嘴边，一定要警察尝一尝。警察边吃边说：“乌美以，乌美以！”（美味的意思），就这样蒙混过关了。

船到长崎，胡风与楼适夷一起登上开往东京的火车。楼适夷由日本反战同盟中国小组成员方天一和王承志接到预先租定的一家公寓里住下。第二天，四人共同商定与日本反战同盟方面领导人会见的问题。

远东泛太平洋反战大会筹备会，原邀请参加的还有菲律宾、印度、朝鲜和中国北方的代表，但是，有的代表因为办不到出入境手续，没有按时到达。原定的会议时间已过，只到了一个中国代表楼适夷，反战同盟只好改变计划，把会议改为预备会。1932年12月底的一天，远东泛太平洋反战大会的预备会，在东京郊外东吉祥寺井之头公园内的一家卖甜豆汤的小吃店开会。出席会议的有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反战同盟的负责人池田寿夫，反战同盟领导人、中国代表楼适夷，还有一位朝鲜代表，胡风、方天一和王承志以日本反战同盟中国小组成员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会议是在一边喝甜豆汤，一边研究问题中进行的。最后研究决定，用预备会议的名义，向世界反战大同盟提议召开一个正式的远东反战会议，地点在中国上海，时间是1933年9月。

远东泛太平洋反战大会筹备会在中共、日共、中日反战同盟有关人员的努力下完成预期任务，为1933年9月30日在上海举行的反战秘密大会做了充分的准备。

中国反战同盟的成员为亚太地区以及全世界的反战斗争做出了贡献。

中国反战同盟的代表楼适夷在完成了筹备会之后，应邀到日共中央委员、日本普罗文化联盟领导人江口涣家做客。江口涣同时还邀请了胡风及江马修等日本左翼作家参加。楼适夷介绍了中国苏区军事斗争的形势和“一·二八”上海战争中上海人民反日救国运动的情况。谈话在反战、团结的共识下愉快结束。1933年1月29日，楼适夷圆满地完成了使命，回到上海^①，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4. 被迫退学，驱逐出境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一·二八”战火的燃起，伪满洲国的成立，中国大好河山的被蚕食，使留日学生不再简单地去实施科学救国、教育兴国的空洞想法了，许多留日学生开始了对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深刻思索，开始了救国图存、救民于水火的途径的探索。许多留日学生参加各类学术、艺术团体的学习和讨论，通过对中日文化的对比、中日近代改革步伐的对比，探讨中国的图强、昌盛、独立之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中日战争局势及世界和平进程等时事政治的讨论，使他们的活动更富有针对性。

许多留日学生已不满足于口头讨论，还撰文阐述，从多角度、多侧面地进行分析、论证，为国民政府出谋划策，提供救国建议和依据。

^①马蹄疾：《胡风传》，第54—58页。

留日学生身体力行，从事直接的救亡工作。有的学生加入左翼文化联盟，有的加入日本共产党，有的加入国民党，有的加入中国共产党。留日学生的反战爱国行动，引起日本警察的注意，便衣密探四处监视、搜捕爱国学生。其间 30 多名中国留日学生因为从事抗日宣传，被日本警察逮捕、判刑，有的被迫退学，驱逐出境。

聂绀弩是湖北京山人，毕业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九一八”事变前为南京中央通讯社编辑，事变后，因在所编刊物上经常发表抗日文章，为南京当局所不容，无法立足，就赴日本投奔正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求学的妻子周颖。周颖是河北南宫人，与聂绀弩结婚后，以聂的工资自费留学日本，是胡风在神田区东亚日语学校的同学。聂绀弩到东京后，经周颖介绍认识胡风，三人成为终生挚友。他们三人与其他留日学生创办了“新兴文化研究会”，不定期出版油印刊物《文化斗争》（后改名《文化之光》），刊物的印刷和发行地址在聂绀弩、周颖的寓所“早成馆”。每期由胡风集稿编辑，胡风、聂绀弩、周颖、邢桐华等会员撰稿。每期印完，均分赠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

由于胡风是《赤旗报》读者小组成员、反战同盟盟员和日共党员，与日共联系密切，被日本警方发觉。另外，他们编印的《文化斗争》，曾发表过揭露日本当局侵略中国的阴谋的文章，聂绀弩夫妇的寓所——“早成馆”也早被日本警察监视。1933年3月下旬的一天，聂绀弩夫妇外出时，警察由房东带领，在聂绀弩夫妇的卧室，搜查到《赤旗报》和《文化斗争》等进步刊物，聂绀弩夫妇被捕。关押了四个多月，因警察只从

他们寓所里搜出了《赤旗报》追悼日本进步作家小林多喜二的专号，还有分发剩余的《文化斗争》等刊物，别无其他罪证，于是被日本当局宣布驱逐出境。周颖是中国留日学生中唯一的一位因从事抗日宣传而被驱逐的女性。回国后，周颖夫妇仍继续从事抗日爱国活动。

与聂绀弩夫妇同时被驱逐出境的胡风，还被警察押送到庆应大学办理了退学手续。

反战同盟成员、共产党员方天一、王承志被捕后，因《赤旗》报追悼小林多喜二的专号上有他们的文章，暴露了他们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使他们被日本当局起诉判刑。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他们又经历了异国的铁窗苦刑。

1933年7月初，胡风、聂绀弩、周颖等36名被日方驱逐出境的留日学生，被警察押往车厢，乘火车，由警察押送到长崎。押解留学生们的列车在东京车站启动时，胡风把头伸出窗外，高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胡风等36名爱国留日学生在高昂愤怒的口号声中，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回到国内继续从事爱国革命活动^①。

^①马蹄疾：《胡风传》，第52—62页。

第 二 章

留学日本运动出现第三个高潮 (1935—1937)

第 一 节

1935 年成了留学日本的“高峰年”

1. 留日学生突见增加

“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战争，使留日学生掀起了回国抗日的“归国潮”。但是，当上海的战火停熄后，留日学生又零零星星地重渡日本。从 1934 年开始，留日人数急剧增加。有的资料称，1935、1936、1937 三年，每年都在 6000 人左右。于是，成为继 1905 至 1906 年、1913 至 1914 年以来的第三次鼎盛时期。

这种盛况，1935 年 9 月《留东新闻》有文描述：“最近两

个月，由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出发渡日者更突见增加。10日前，浅间丸由广州经香港、上海来日，传闻中国留日学生乘该船者多达396人，更有谓500余人。同时，又据日方之消息，某日本汽船由天津经大连抵日港口，同船实有华人600余名。由此可见最近离国留日者之踊跃。同时，东亚学校一周内招收新生达1000名左右。故据日方之推测，本月底新旧留日学生必在6000与6500之间。”^①

在此期间，赴日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众多，成分庞杂，有国家官费，有省官费、旗费；有富家子弟，有寒门学子；有公职人员，有失业、待业青年学生；有崭露头角的名人、学者，有初出校门的无名小卒。经历、出身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留学心态和留学生涯，由此也导致了不同的留学结局。一些有志的留学生，学有所成，学有所为，成为各专业的专门人才；一些留日学生接受了日本左翼新思想的影响，成了日后拯救国家危亡的主力；个别纨绔子弟，为“镀金”而来，醉生梦死，无所事事而去。而在所有留日学生中，还有一批英才，不再空喊科学救国、教育兴国的口号，而是用行动去唤醒麻木的心灵，用行动去唤醒沉睡的巨龙。这些英才的反战反日爱国行动，自然激怒了日本反动当局。一些中国留日学生中的优秀分子被驱逐、遭迫害，构成了中国近代留日学生高潮中的一个小插曲。

解放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的乔冠华，赴日留学期间，积极从事进步活动，与朝鲜的共济会等左翼团体联系密

^①沈殿忠：《中日交流史中的华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45页。

切，为援助受难同志而被日本警察拘留两星期，后被驱逐出境。

尽管留日学习生涯艰辛、困苦，随时面对敌国、敌人的迫害和镇压，但是，对真理追求的强烈渴望，仍使中国学生义无反顾，东渡扶桑。

2. 大批青年东渡日本的缘由

1935年至1937年，正值日本加紧侵华之际，中国青年学生却群趋日本，这种现象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索。

其实，在国难当头，青年学生赴敌国留学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是政治缘由。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急，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但在政治上，日本当局为了保持一点虚假的民主自由，各种进步书刊仍准许出版发行，连苏联出版或经过日译出版的马列主义著作也还在书店公开出售。这就吸引了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满于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有的青年知识分子因为从事进步活动，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追捕，于是纷纷东渡日本，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截至“七七”卢沟桥事变前，从平津、沪粤、武汉等地云集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众多。

著名音乐家聂耳就是这一时期留学日本的。1932年，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文艺的“文化围剿”，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电影战线。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1933年初，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而更加勤奋地创作时代音乐，反映

劳苦大众的心声。从 1933 年至 1935 年，短短两年的时间，聂耳就创作了《大路歌》、《毕业歌》、《卖报歌》、《义勇军进行曲》等 30 多首歌曲。这些歌曲，通过电影、戏剧的演出，立即在大江南北广泛传唱，振奋了人们的精神，鼓舞了斗争中的人民。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当时已经成为动员全国人民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最响亮的号角。

由于聂耳充满战斗激情的歌曲，蓬勃高涨的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惧，反动当局不许演唱和播放聂耳的革命歌曲，把聂耳的名字列入准备逮捕的“黑名单”中。中共党组织出于对聂耳的关怀和爱护，批准他到日本留学深造。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酷统治，令青年学生感到窒息和压抑，而日本政治空气的相对宽松，就成了中国进步青年的理想处所。以致于“1935 年的秋季，东京神田区神保町一带，下课时全是中国学生”，此话并非虚言。青年学生学习日本，研究日本，是为了收回国土，振兴中华民族。因此，1935 年以后，中日关系愈趋紧张，中国留学生涌入日本的愈多^①。

其二是经济缘由。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在经济上积聚侵华资金，采取了日元贬值的措施，大量输出商品。从而使 30 年代初中国货币对日元汇价大幅度上升。1931 年 2 月，100 银元可换 42 日元，1935 年 5 月则可换 146 日元，中国银元升值几近 2.5 倍。这就出现

^①古子坚：《东京“文化座谈会”的诞生及其生活》，载《文史资料选辑》37 册，第 122 页。

了留学日本省钱的现象，用在国内上学所花销的费用，就足够在日本度过留学生涯中所需的各项支出。并且赴日本留学，较之赴欧美留学路途近、费用低，因此，赴日留学已不再是富家子弟的专利，达官显贵的特权，赴日留学对于平民阶层的青年学生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许多青年学生在公费、官费留学无望，又无充足的资金赴欧美留学时，自然选择东渡扶桑自费求学之路。众所周知的留学生胡风、王莹、聂耳等均是自费留学。

由于日本物价的低廉、中国学生学习热情的高涨，使留日学生中，自费生多于公费、官费生。

1934年的一份统计表明，官费、公费、补给、选拔、特选生共有707人，自费生有1115人，不明费别及其他情况者538人。可见，自费留学生的人数是具有官费性质的留学生人数的1.58倍^①。

自费生在1935年之后增加迅猛。仅以1936年各种费别情况为例，即可窥见一斑。

1936年留日中国学生费别情况统计表^②

学 校	官费	自费	不明	合计
帝国大学	169	423		592
商 大	23	31		54

^①沈云龙：《中华民国廿五年 日本昭和十一年留日学生名簿》，第21页。

^②沈云龙：《中华民国廿五年 日本昭和十一年留日学生名簿》，第22页。此表中的官费，包括除自费、不明以外的官费、公费及书中印刷不清者。

续表

学 校	官费	自费	不明	合计
医 大	13	6		19
工 大	61	65		126
文理大高师	99	95		194
高等农业	12	28		40
高等商业	45	99		144
高等学校	55	58		113
高等工业	14	29		43
外语美术音乐	6	27		33
商船水产	9	1		10
其他官公立	48	212		260
陆军学校	4	97		101
私立大学	82	2314	108	2504
私立专门	15	328		343
女子私立	42	159		208
一般预备	22	994		1016
实 习	2	30		32
中等学校	21	63		84
合 计	742	5059	108	5909

上表说明，姑且将情况不明的 108 名算入自费以外的类别中，自费生仍是其他类别总人数的近 6 倍，占留学生总人数的近 86%。

其三是手续简便。

日本当局为吸引外国留学生（主要是中国留学生），增加

外汇收入，采取了简化入境手续等方法。中国学生去日本，非常方便。不需要护照，学校给轮船公司开一封介绍信，就可以买到去日本的船票，无需去日本领事馆办任何手续。船到日本后，可自行选择日语补习学校，先过语言关。经过一段时间的日语学习，由中国驻日本留学生监督处出具证明，即可报考自己理想的大学，选学理想的专业。日本政府简化留学生入学手续、入境手续的政策，为广大中国立志求学的青年学生大开了方便之门。

1935年前后兴起的赴日留学高峰，离不开上述的基本条件。此外，由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战争，日本帝国主义成了世界各国人们关注的对象，日语成了当时青年学习的主要外语，致使日本更加吸引外国留学生。

基于以上几点，1935年至1937年这一非常历史时期，众多青年学生满怀爱国之情、报国壮志，满怀学习日本、战胜日本的雄心壮志，掀起了中国近代以来第三次赴日留学的高峰。

3. 中华民国留学生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在教育方面颁布了许多法令，对国内学生出国留学也作了相应的规定。1929年开始，结束了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在留学政策上的放任状态，具有了国民党政权的特点。1929年，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发给留学证书规程》，提高留学资格。1933年公布了《国外留学规程》，对留学生的资格、考选、管理和回国效力等作了全面详尽的规定。鼓励学生报考公费留学，更提倡青年学生自费留学，回国后，由教育部统筹分配，报效国家。

国民政府的留学政策，无疑成了留学高峰形成的推动力。此外，东北沦陷，淞沪抗战失败，日本步步进逼，华北危急，许多有血气的青年学生纷纷奋起抗战，救亡图存。

国内爱国学生发起了“一二·九”运动，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国民政府抗日。但是，国民党的政策依然是“攘外必先安内”，对爱国青年的抗日救亡运动采取镇压政策。许多青年学生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和迫害，只好暂栖近邻，以图东山再起，报效祖国。

加之，随着日军的步步入侵，国内环境的混乱，青年学生在国内，毕业就意味着失业。于是，青年学生选择了东渡日本去学习。北平、天津、上海、广州等地的学生尤其多。1936年，中国留日学生仅广东一个省就有五六百人。

在中华民国的留日学生中，真正的右翼分子是少数，亲日分子更是极少数，大多数人处于中间状态。其中也有不少人，想读点书，将来好找事做。这些人中，大多数是自费生，也有公费生（靠庚子赔款支付的），还有个别的官费生。官费生中，多是国民党军政人员，因争权夺利受到排挤，给他们一笔钱去东洋留学，有些人还想学一点本领，有些人则在日本混日子，他们志不在读书而在镀金，把好多时间消磨在咖啡馆、舞场里。当时中华民国的留日学生，情况复杂，人数众多，但是，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他们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为祖国的安危而奔走呼号^①。

^①张持平：《东京文化救亡运动片段》，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7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97页。

4. 伪满洲国留学生

“九一八”事变的直接恶果，是日本帝国主义又在中国东北炮制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在这块富庶的土地上，进行了长达 14 年的政治迫害、军事镇压、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给东北人民带来了一场深重的民族灾难。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进行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还进行教育侵略。

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傀儡政权，制定并推行了一条典型的殖民主义教育方针。随着日伪统治的加强，伪“满洲国”在日本侵略者的授意下，逐步建立起殖民地的学校体系。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师道教育等普通教育之外，还设立了特别教育，开办了留日学生预备校，专门招收中等学校毕业程度欲升入日本高等专门以上学校的青年学生，修业年限为一年。该校直接隶属于满洲国文教部，旨在培养“日满两帝国之不动摇的结合分子”，将来“成为日满合并的先锋队”。1936年5月，伪“满洲国”文教部公布《留学生预备校规程》。1937年3月，文教部在充实、修改的基础上，公布了《留学生预备校官制》，使即将赴日学习的留学预备教育更趋规范化、制度化，吸引了众多青年学生^①。

在此期间，伪满洲国为加强“日满亲善”，向日本派遣了

^①武强：《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第一辑，吉林教育出版社，第2—5页。

大批留学生。详情可见下表^①：

伪满洲国留日学生调查表

学 校 名	留学生数			本部补助生			其他补助 及自费生		
	奉	吉	黑	奉	吉	黑	奉	吉	黑
东京帝国大学	3	1			1		3		
京都帝国大学	9	3			3		9		
东北帝国大学	1						1		
九州帝国大学	1	1		1	1				
北海道帝国大学	5						5		
东京工业大学	4	1	4	2		2	2	1	2
神户商业大学	4						4		
东京商科大学	4	1	1	3			1	1	1
早稻田大学	7	1					7	1	
法政大学	1						1		
大政大学	1						1		
明治大学	5	1	1			1	5	1	
日本大学	3						3		
东京慈惠会医科大学	1	1					1	1	
日本女子大学	2	2		1	1		1	1	
庆应义塾大学	1						1		
东京文理科大学	1	1					1	1	
广岛文理科大学	3						3		

^①武强：《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第一辑，第108—110页。

续表

学 校 名	留学生数			本部补助生			其他补助 及自费生		
	奉	吉	黑	奉	吉	黑	奉	吉	黑
东京女子医科专门学校	2	1			1		2		
东洋女子齿科医学专门学校	1						1		
第一高等学校	13	5		3			8		
第二高等学校	1	1			1		1		
第三高等学校	8	1	1	4	1		4		1
第六高等学校	1	1			1		1		
第八高等学校	4	1		3	1		1		
第一早稻田高等学校	2						2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	15	12	2	5			10	12	2
仙台高等工业学校	5			4			1		
明治专门学校	2	2					2	1	
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	4			4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9	3	1	2	1	1	7	2	
广岛高等师范学校	1	1	2	1	1	1			1
大分高等商业学校	1						1		
上田蚕丝专门学校	1						1		
东京武藏野音乐学校	1						1		
山口高等商业学校	2	2	7	2	1	7		1	
同志社大学	1						1		
女子高等专门学校		1						1	
福岛高等商业学校	1						1		
立命馆大学	2						2		
东京农业大学		1						1	

续表

学 校 名	留学生数			本部补助生			其他补助及自费生		
	奉	吉	黑	奉	吉	黑	奉	吉	黑
成城学校	4	3					4	3	
铁道省所属机关实习学校	4						4		
大崎明电舍实习学校	4						4		
东京医学专门学校	1	1					1	1	
陆军上官学校		8						8	
物理学校		1	2					1	2
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1						1
东京高等师范特设预科	4			4					
长崎高等商业学校			3			3			
专修大学专门部			1						1
东京铁道专门部			4			4			
大阪药学专门学校			1			1			
东京铁道教习所	11	4	6				11	4	6
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2						2		
共 计	163	61	37	41	18	20	122	44	17

一、本表根据大同二年七月驻日满洲国公使报告满洲国留日学生一览表而造。

二、本表其他补助栏包括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补助及自费等。

伪“满洲国”青年学生，在大敌当前、受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残酷迫害下，为何又纷纷涌向敌国？伪“满洲国”留日学生赴日留学的原因是复杂的：

一是政治原因。伪“满洲国”建立后，伪政府为维护傀儡

统治，培养奴化政策的后备力量，于1932年初，在“驻日满洲国大使馆”设立“学务处”，办理留日学生的“指导监督”工作。1933年3月，开始统一派遣留日学生，并制定、公布了一系列留日学习政策。提出留日的基本方针是：使纯朴活泼的青少年，在日本国通过风俗人情等多方面的感染，以期收到从生活上到精神上的同化目的，使下一代成为日满两帝国之不动摇的结合分子。为此，对留日学生的条件，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及其辅助措施。例如，1936年9月21日，伪满文教部颁发了《留学生规程》，该规程如下：

第一章 通 则

第一条 留学生志愿者须具备下列各款资格：

一、思想坚实、性质良善、身体强健者。

二、高级中学校或同等程度以上之学校卒业者，或于该年度有卒业希望者，或主管部大臣认为有同等以上学历者。

三、在满洲国内（包括关东州）有住所三年以上者。

第二条 留学生志愿者，应缮具留学生认可呈请书（第一号表格式），并附下列文件呈经管辖住所地之省长或特别市长转呈文教部大臣或蒙政部大臣，但在关东州内有住所者，应径呈文教部大臣。

一、履历书（第二号表格式）。

二、卒业证明书或卒业预定证明书（第三号表格式）。

三、学业成绩证明书（第四号表格式）。

四、住所地县长、旗长、特别市长、市长、住在关东州内者日本国警察署长之身元调查书（第五号表格式）。

五、留学誓约书（第六号表格式）。

六、最近三个月内摄照之脱帽四寸像片三张（背面自书摄影年月日及姓名）。

第三条 留学誓约书所需保证人以具有下列资格者为限：

一、正保证人留学生之家长，但本人为家长时，亲族中之年长者。

二、副保证人与留学生在同一省、特别市或关东州内有住所之现任官吏或纳国税十圆以上者。

第四条 留学生志愿者，须依文教部大臣或蒙政部大臣之所定，受日本语之试验，但自费留学生毕业于日本之中等学校或文教部设置之留学生预备校课程者，免除试验。

留学学费困难欲领受政府之留学补助费者，除前项日本语试验外，应受下列之试验及身体检查：

一、笔记试验：国民道德（国民精神）、国文（解释、作文）、数学（代数、几何）。

前列各款之外，文教部大臣或蒙政部大臣每届指定之学科。

二、口头试验。

第五条 前条之试验日期及地点，由文教部大臣或蒙政部大臣于政府公报公告之。

第六条 文教部大臣或蒙政部大臣对于第四条之试验合格者，或毕业于日本中等学校及文教部设置之留学生预备校者，发给留学认可证。

第七条 留学生拟退学、转校或转科时，应缮具保证人连署之愿书，并附在学之校长之意见书，呈请文教部大臣或蒙政

部大臣许可。

第八条 文教部大臣或蒙政部大臣依第六条认可留学、依第九条取消认可留学、依第十八条中止发给留学补助费时，于政府公报公告之。

第九条 该当下列各款之一者，文教部大臣或蒙政部大臣得取消其认可留学：

- 一、关于转校或转科违背第七条之规定者。
- 二、因学业成绩不良被留原级或超过所定之修业年限者。
- 三、身体虚弱无学成之希望者。
- 四、有不正当之行为者。

第十条 留日学生呈文教部大臣或蒙政部大臣之文书，应经驻日大使馆转送。

第十一条 留日学生到达留学地后，应速将留学认可证呈送驻日大使馆，请求发给留学生证明书。

第十二条 在满洲医科大学、旅顺工科大学及南满洲工业专门学校之留学生，适用本令。

第二章 补助费留学生

第十三条 对于补助费留学生，依照另表发给留学补助费，但由特别市、县、旗、市其他自治团体或日本国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受学费之补给时，于其所受限度减补助费额。

该当前项书之规定，受学费之补给时，应报告于文教部大臣或蒙政部大臣。

第十四条 文教部大臣或蒙政部大臣将补助费留学生之留学地、入学之校、学科及留学年限指定之。

受前项指定后，不能于所定期间内考入指定学校者，不发

给留学补助费。

第十五条 留学补助费之发给，以考入文教部大臣或蒙政部大臣所指定学校之月为始，至其毕业或退学之月为止，但由自费生而成为补助费留学生者，以其决定成为补助费留学生之月为始。

入学之际，应立即缮具留学补助费呈请书（第七号表格式）呈文教部大臣或蒙政部大臣。

前项呈请书，应附在学之校长之在学证明书（注明入学年月日）并最近三个月内摄照之脱帽四寸像片二张（背面自书摄影年月日及姓名）。

第十六条 补助费留学生将为一个年之休学时，应缮具休学理由（学）并附在学之校长之意见书，呈请文教部大臣或蒙政部大臣许可。

前项休学期间内，停发留学补助费。

第十七条 补助费留学生除疾病外，将继续为一个月以上之缺席时，应先呈请文教部大臣或蒙政部大臣许可。

未奉前项许可而缺席达一个月时，其缺席期间内不发给留学补助费。

第十八条 该当下列各款之一者，文教部大臣或蒙政部大臣中止发给留学补助费。

一、关于转校或转科违背第七条之规定者。

二、关于学费之补给违背第十三条第二项之规定者。

三、无正当理由或未奉前条第一项之许可而继续缺席达二个月者。

第十九条 补助费留学生毕业后将就职时，应先呈奉文教

部大臣或蒙政部大臣之承认。

补助费留学生毕业后，照其留学年限之二分之一期间，经文教部大臣或蒙政部大臣命其从事特定之职务时，有遵奉之义务。

第二十条 补助费留学生受第九条及第十八条之处分，或违背前条时，得令缴还其已领留学补助费之全部或一部。

附 则

本令自康德三年九月十七日施行。

康德三年文教部令第一号文教部留学生规程，废止之。

(各号表格式略)^①

1937年2月1日，伪满文教部又推出《留学生须知》，该须知如下：

留日学生应自觉为国家将来之中坚分子，而具有日满一体关键之本分，进而履行关于留学生之各种规定，敦品行，重体面，精励于身心之修练、学术之钻研，以勿负国家之期望。

其一 修学手续

第一，介绍入学：

一、凡受留学认可者，当到达留学地后，应立即缮具呈请发给入学介绍书文（第一号表格式）并附留学认可证及像片两张（最近摄照之四寸像片，背面自书姓名、生年月日及留学认可证号数），呈送驻日大使馆（东京市麻布区樱田町五〇番

^①辽宁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辽宁教育史志资料》，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68—670页。

地)，请予发给本人所希望入学学校之入学介绍书。

二、入学介绍书必须附具入学愿书。

第二，留日学生证明书：

一、受留学认可者，于入学后，应立即缮具呈请发给留日学生证明书文（第二号表格式）并附在学证明书，呈送大使馆，以便领受留日学生证明书。

二、留日学生证明书必须时常携带身旁。

第三，留学生登录：

一、凡发给留日学生证明书之学生，由大使馆登录之。

二、大使馆对于已经登录之留学生，给与留学中种种方便。

第四，休学、缺席、退学、转校或转科：

一、留学生因疾病或其他事故拟休学三个月以上时，应从速缮具体学呈报书（第三号表格式）并附学校校长意见书，呈送大使馆。但其系疾病者，应附医师之诊断书。

二、留学生因疾病或其他事故拟继续缺席一个月以上时，应从速缮具缺席呈报书（第三号表格式）呈送大使馆。但其系疾病者，与前项同。

三、留学生拟退学、转校或转科时，应从速备具保证人连署之呈请书（第四号表格式），呈送大使馆请求许可。

第五，试验：

一、留学生必须受在学学校所定之试验。

二、留学生于学年试验完毕成绩发表后，应立即将学校成绩证明书呈送大使馆。

第六，就职之斡旋：

留学生欲向政府请求斡旋就职时，须于其毕业前缮具愿书（第五号表格式）并附履历书（第六号表格式）、家族调查书（第七号表格式）、有毕业希望之证明书、毕业成绩证明书及像片两张（最近摄照四寸像片，背面自书姓名、生年月日），呈送大使馆。

第七，毕业登录：

一、留学生毕业时，应于三个月以内将毕业证明书并附学业成绩证明书及像片两张（最近摄照四寸像片，背面自书姓名及生年月日）呈送大使馆，请予毕业登录。

二、凡未经毕业登录者，政府对于其就职等事不与以任何便利。

其二 监 督

第一，留日学生会：

一、驻日大使令留日学生全体组织留日学生会而监督之。

二、留日学生会以使学生体会实践建国精神、自律自肃、切磋琢磨、互相提携、达成在日本国留学之目的为宗旨，其规定另定之。

三、留日学生必须为留日学生会会员关于其所属之组须负连带责任。

第二，身份：

一、留学生如改姓、改名或关于其他身份上有所变更时，须立即缮具变更呈报书（第八号表格式）呈送大使馆。

二、向大使馆呈送关于身份之文书时，须于姓名外载明次章。

三、补助费留学生拟从事有报酬之职务时，须受大使馆之许可。

第三，住所：

一、留学生到达留学地后，应立即缮具住所呈报书（第九号表格式）呈送大使馆。

二、留学生变更住所时，应立即缮具住所变更呈报书（第九号表格式）呈送大使馆。

三、凡归省转地疗养入院或一星期以上之旅行时，应立即将其目的地及期间呈报大使馆，不得迟缓。

四、大使馆认为有必要时，得指定留学生之住所。

第四，服装：

一、留学生于赴校或参列会式之场所时，必须穿制服、戴制帽。

二、穿便服时，务以质朴为主，不可流为轻佻奢华之留学生。

第五，集会、结社：

留学生关于集会、结社等，除遵守留学国之法规外，并须遵照下列各项：

一、留学生拟集会时，或拟出席其他集会时，须受大使馆之许可（第十号表格式）。

二、留学生拟组织团体或拟加入团体时，须受大使馆之许可（第十一号表格式）。

三、留学生拟发行杂志或其他印刷物时，或拟发布之时，须受大使馆之许可（第十二号表格式）。

四、以特定之目的拟向留学生中求署名时或拟募款时，须受大使馆之许可（第十三号表格式）。

其三 惩 戒

第一，留学生违背关于留学生各种法规及本须知，或有不

正当行为时，按其情况惩戒之。

第二，惩戒之种类如下：

- 一、谴责。驻日特命全权大使行之。
- 二、停发或取消补助费。文教部大臣或蒙政部大臣行之。
- 三、取消留学认可。文教部大臣或蒙政部大臣行之。
- 四、勒令归国。文教部大臣或蒙政部大臣行之。

(各号表格式略)^①

1937年4月9日伪满修正留学生规程，修正后的规程如下：

伪满修正留学生规程

(伪康德四年九月)

第一章 通 则

第一条 欲为留学生者，须为思想坚实、身体强健而合于下列各款之一之满洲国人。

一、国民高等学校及女子国民高等学校程度以上之教育施設毕业生，或于该年度有毕业希望者。

二、国民高等学校或女子国民高等学校毕业，程度学历檢定合格者。

三、在日本国居住者之家族。

四、前列各款之外，民生部大臣认为有特别事情者。

第二条 欲为留学生者，应繕具留学生认可呈请书（第一号表格式）并附下列文件，呈经管辖住所地之省长或特别市长

^①辽宁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辽宁教育史志资料》，第670—672页。

转呈民生部大臣。但其合于前条第三款者，应经由驻日满洲国大使馆，其在关东州内居住者，应径呈民生部大臣。

一、履历书（第二号表格式）。

二、毕业证明书或毕业预定证明书（第三号表格式）。

三、学业成绩证明书（第四号表格式）。

四、住所地县长、旗长、特别市长、市长；在日本国居住者驻日满洲国大使；在关东州内居住者日本国警察署长之身元调查书（第五号表格式）。

五、留学誓约书（第六号表格式）。

六、在呈请前三个月内，摄照脱帽四寸像片三张（背面自书摄影年月及姓名）。

第二条 留学誓约书内署名之保证人，以具有下列资格者为限：

一、正保证人为留学生之家长，但本人为家长时，亲族中之年长者。

二、副保证人与留学生在同一省、特别市或关东州内居住之现在官吏，或纳国税十元以上者。

第四条 民生部大臣对于留学生认可试验合格者，或毕业于其所指定之留学生预备教育施設者，发给留学生认可证。

第五条 欲受留学生认可试验者，应缴纳受験手续费二元。

前项之手续费，应以收入印纸缴纳之，但住在满洲国以外之地者或其家族，不妨缴纳现金。

第六条 留学生认可试验为笔试、口试及身体检查，但合于第一条第三款及第四款者，为口试及身体检查。

笔试就下列科目施行之：

一、国民道德。二、国语（日语及满语，或日语及蒙古语之解释作文）。三、数学（代数及几何）。

前列各款之外，民生部大臣每届指定之科目。

第七条 留学生认可试验日期及地点，由民生部大臣于政府公报公告之。

第八条 留学生之留学地、应入之教育施設、学习学科及留学年限，由民生部大臣指定之。

受前项之指定后，不能于民生部大臣所指定期间内办竣入学手续时，则留学认可证失其效力。

第九条 留学生拟退学、转校或转科时，应缮具保证人连署之愿书并附在学之教育施設代表者之意见书，呈请民生部大臣许可。

第十条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民生部大臣得取消其留学之认可：

- 一、关于转校或转科违背第九条之规定者。
- 二、因学业成绩不良被留原级或超过所定之修业年限者。
- 三、身体虚弱，无学成之希望者。
- 四、有悖留学之本分或玷辱留学生体面之行为者。
- 五、前列各款之外，有违背本令之规定者。

第十一条 留日学生呈民生部大臣之文书，应经驻日大使馆转递。

第十二条 留日学生到达留学地后，应速将留学认可证呈送驻日大使馆，请求发给入学介绍书。

第十三条 对于在满洲国内（包含关东州）之外国教育施設留学之学生，以在其高等专门以上之教育施設留学者为限，

适用本令。

第二章 留学补助费

第十四条 民生部大臣就发给留学认可证者之中，对于认可试验或留学中之成绩特别优秀而家境贫困者，支給留学补助费。

第十五条 对于留学日本国之教育施設者之留学补助费額，依照另表之规定。但留学补助费額决定后，由本国内之自治团体或民间团体或日本国政府、自治团体或民间团体受学资之补给时，按其所受限度减其留学补助费額。

由本国内之自治团体或民间团体或日本国政府、自治团体或民间团体受学资之补给时，应立即报告民生部大臣。

第十六条 留学补助费之支給，以入民生部大臣所指定之教育施設之月为始，至其毕业或退学之月为止。

受支給留学补助费之决定者，于入前项之教育施設后，应立即繕具留学补助费支給请求书（第七号表格式），呈民生部大臣。

前项请求书，应附其在学之教育施設代表者发给之在学证明书（注明入学年月日），并在请求前三个月内所摄之脱帽四寸像片二张（背面自书摄影年月日及姓名）。

第十七条 受留学补助费之支給者，欲休学时，应先繕具体学理由书，并附其在学之教育施設代表者之意见书，呈请民生部大臣许可。

第十八条 受留学补助费之支給者，除疾病外，欲继续为一个月以上之缺席时，应先呈请民生部大臣许可。

第十九条 受留学补助费之支給者，休学时或违背前条之规定而继续缺席达一个月以上时，其休学期间内或超过一个月之缺席期间内，不支給留学补助费。

第二十条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中止支給留学补助费：

- 一、关于转校或转科违背第九条之规定者。
- 二、违背第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者。
- 三、违背第十七条或第十八条之规定者。

第二十一条 民生部大臣对于受留学补助费支給之留学生毕业后，得命其从事特定之职务。

受前项之命令者，毕业后，合于其受补助费支給期间，负有从事职务之义务。

第二十二条 对于受第十条或第二十条之处分者，或不履行前条之义务者，得令缴还其已领留学补助费之全部或一部。

附 则

本令自公布之日施行。

本令施行之际，现已受官之认可而留学者，其现所支领之留学补助费额，如在另表之额以上时，不拘第十五条之规定，仍照其现所支领之额发给留学补助费。

(另表)

区 分	留 学 补 助 费 月 额		
	甲地方	乙地方	丙地方
大学本科	55元以下	50元以下	30元以下
专门学校并大学附属专门部	45元以下	40元以下	20元以下
高等学校特设高等科 大学预科及预备部	40元以下	35元以下	20元以下
特 设 预 科	35元以下	30元以下	

备考 甲地方系指东京、大阪、京都、横滨及神户而言，乙地方系指甲地方以外日本国内而言，丙地方系指满洲而言。限于在甲、乙地方留学之理、医、工、农及家政等科学生，每月得各增给补助费五元。

(各号表格式略)^①

以上规程及须知，对留日学生的基本条件、留学生所应享受的补助待遇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为提高留日学生素质，伪满洲国还为留日学生预备校制定了相应的法令，各省、市、县也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事项，对留日学生预备校的学生条件、招收方法作了明确规定，例如，1937年奉天公署颁布了如下训令。

伪满奉天省公署训令奉天市长、各县长关于
文教部留学生预备校招生考试事

(伪康德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为令遵事，案奉文教部训令第五三号关于标题之件，附招募学生及施行试验要纲，飭遵照办理，等因奉此，合令该市、县就管内用适当方法公告，俾志愿投考者知照为要，此令。

附要纲一份

文教部留学生预备学校在奉天招生要项

第一、招募学生

一、趣旨：留学生预备校以对于欲留学日本国者施行日本语及其他留学所必需教育为目的。

^①辽宁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辽宁教育史志资料》，第674—677页。

二、募集人员：二百名（男子）。

三、修业期间：六个月（仅限于康德四年度）。

四、应募资格：高级中学校程度以上之学校卒业者，或有同等以上之学历者。

五、应募手续：缮具入学志愿书（别表书式），并附下列文件，限于六月十日前呈送省公署教育厅：（一）最终学校长证明之卒業证明书（别表书式）；（二）最终学校长证明之学业成绩证明书及人物考查书（别表书式）；（三）四寸像片二张。

第二、施行试验

一、试验地：奉天第一工科高级中学校（奉天市大西关）。

二、试验科目：（一）国民道德、日本語、数学（代数、几何）；（二）口试、身体检查。

三、试验日期：六月十四日、十五日。

试验日期时间照下表施行：

六月十四日	午前九时 ~ 十一时	十一时十分 ~ 十二时十分	午后一时 ~ 三时
	日 本 语	国民道德	数 学
六月十五日	午前九时 ~ 十二时	午后一时 ~ 四时	
	口 试	身体检查	

四、成绩发表：合格者由校长分别通知。

第三、其他

一、特典：修了留学生预备校之课程者，免受自费留学生

试验。

二、校址：新京北大街四四号。

三、在学中各种费用概算：（一）授业费每月二元；（二）寄宿舍费每月约十二元；（三）文具杂费若干元。

别记如有疑点，向省公署教育厅询问可也。

（别表格式略）^①

伪满洲政府提倡鼓励青年学生赴日学习，是伪满时期东北三省留学人数剧增的主要政治因素。同时，一些东北爱国青年，不满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法西斯统治，不满于其奴化教育，憎恶伪满洲国的投降卖国行径，以及对学运动的镇压，于是一些爱国青年纷纷寻找机会赴日留学。

二是经济原因。为吸引众多青年学生赴日本留学，伪满洲国文教部制定了一系列解决赴日留学经费问题的具体措施，发动各省、县积极支持学生留学，于是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官费留学生，如“部费”、“省费”、“县费”、“旗费”等等。后来，为统一管理、预算，伪满洲国文教部将从前的“省费”、“县费”、“旗费”等留学生，一律定为“部费”留学生。并将学费的名称区分为“部补助费”和“部管旗补助费”两种。学费的金额，与以前无异。每月由伪文教部汇往驻日办理学务机关转发领取，收据汇报伪满洲政府文教部备查^②。伪满洲国政府对留日生的补助人数因省而有别，详情可见下表：

^①辽宁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辽宁教育史志资料》，第673——674页。

^②赵卜谦：《留日学生记略》，载《吉林文史资料》第26辑，第200—201页。

留学生补助费自费别^①

省别		奉天省	吉林省	滨江省	龙江省	锦州省	安东省	黑河省	热河省	新京特别市	关东州	计	
国内留学	补助费生	70	24	4	2	2	1	/	/	2	6	111	
	自费生	/	/	/	/	/	/	/	/	/	/	/	
外国留学	日本	补助费生	138	45	4	33	3	3	1	10	5	6	248
		自费生	/	/	/	/	/	/	/	/	/	/	/
	欧美	补助费生	/	1	/	/	/	/	/	/	/	/	1
		自费生	/	/	/	/	/	/	/	/	/	/	/
计		208	70	8	35	5	4	1	10	7	12	360	

此外，伪满洲国对来自各省的留学生发放的经费也各不相同，详情如下表所示：

留学生经费^② (康德二年度)

省(特市)别	国内留学	外国留学		计
		日本	欧美	
奉天省	9,660	36,570		6,230

①武强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72页。

②武强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第373页。

第三篇 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的曲折和回潮

续表

省(特市)别	国内留学	外国留学		计
		日本	欧美	
吉林省	4,020	11,460	1,200	16,680
滨江省	480	930		1,410
龙江省	240	8,280		8,520
锦州省	240	630		870
安东省	120	810		930
黑河省		270		270
热河省		2,520		2,520
新京特别市	240	1,110		1,350
关东州	720	1,590		2,310
计	15,720	64,170	1,200	81,090

派遣赴日教员留学生数并经费 (康德二年十二月)

省(特区)别	学 生 数	补 助 费
奉天省	6	760
吉林省	4	440
龙江省	3	360
滨江省	3	380
锦州省	4	600
热河省	2	300
安东省	4	460
间岛省	1	240
北满特别区	3	380
计	30	3,920

当然，能获取各种官费留学的学生，多为在职官吏、达官显贵之子弟，有限的官费生名额，难以满足广大青年求学的渴望。所以，自费留学生在短期内剧增。据有关方面的记载，1935年至1937年，自费留日学生占伪满洲国的各种官费生总和的数倍。加之伪满洲国制定了一系列有关自费留学、以及选拔补助费留学的细则和办法，对家境贫寒的学子无疑是一种激励。

三是手续简便，回国后的就业率高。

伪满洲国选送各种官费留学生的唯一条件，就是“思想坚实”，忠于伪满，忠于溥仪，不从事反满抗日的活动。自费留日学习的条件更宽泛。虽然1936年伪满洲国建立了《留日学生制度》，实行为学历优秀、身体强健、深透“建国精神”、能完成留学使命的学生颁发“留学许可证”，但是，在实际的办理留学手续中，远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凡欲留学日本的学生，只需原所在学校开介绍信，就可购买赴日本的车船票。到达日本后，闯过了日语关，到满洲国驻日公使馆学务处申报欲报考的日本大学，获取了学务处的证明，即可参加日本高校的统一考试，升入理想的学校和专业。

简化留学手续，减少中间环节，为急于出国深造或避难的青年提供了方便。而毕业后，满洲国负责安置就业，则是伪满洲国青年赴日留学人数日增的又一原因。

国家的混乱、政治的腐败、经济的衰退，使众多的东北学生高中或大学毕业后就意味着失学、失业，难以维持生计。但由于伪满洲国的亲日投降媚外的政策，以及日本高等应用教育和应用技术的独到和先进，弥补了伪满洲国高等学校应用专业

欠缺的不足，伪满洲国的建设和发展，亟需各类人才，尤其是土木工程等专业的留日学生。因此，东北的留日学生，毕业回国后的就职率几近于100%。据1935年8月20日《文教月刊》第1号记载，当年文教部曾将毕业预定者名单分别送到各部、局，结果，对这些留日学生竟求大于供，这些留日学生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①。

据载：伪满洲国1935年赴日留学生为1280人；1936年为1590人；1937年为1837人。形成了东三省留日学习的高潮。

第 二 节

留日学生转向更高级课程的学习

1. 留日学生大部分进入专科以上学校

1933年，国民政府公布了《国外留学规程》，其中对学生的资格、考选、管理和回国效力等作了全面详尽的规定。尤其对留学生的留学资格作了修正和补充。强调公费留学必须通过考试选拔。报考资格为：

(1) 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继续研究所习学科或任与所学科相关的技术职务2年以上，并有专门著作或其他成绩者。

(2) 大学或独立学院毕业成绩优良者。

(3) 自费留学生必须是专科以上学校毕业或高级职业学校毕业，曾任技术职务2年以上者。

与此同时，伪满洲国制定的《修正留学生规程》（1936年

^①辽宁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辽宁教育史志资料》，第665—666页。

颁布)，也要求欲留学者，必须是国民高等学校及女子国民高等学校程度以上的毕业生，方可申请出国留学。

30年代，留学资格的提高，表明国内中等和高等教育都已有了相当的规模。同时，留学生资格的提高，也必然使留学生在留学期间，所受教育的程度得到提高。留学生不再满足于学习语言，也不必再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中多浪费时间。1935年至1937年的留日学生，因自身素质较好，文化程度较高，所以，大部分留学生直接进入专科以上学校学习。据1935年统计，除专门接收中国留学生补习外语及基础课程的东亚学校等之外的193所学校，留日学生共有3731名。这些学校包括大学、专科学校与接收中国学生的教育机构，如文部省体育研究所、大众保病院。与本年度留日学生总数6500名比较，只有2769名留学生是在东亚学校等专门为中国人开设的初等学校中学习，其余的均在大专以上的学校就读。据对1936年间日本的189所大专以上学校统计，留学生共有3951名，与同年度留日学生总数的5909名相比，只有1944名中国留学生在初等学校中学习。1935年间，中国留日学生入专科以上学校学习的人数，占本年度中国留学生总数的57.4%，1936年占69.8%，1936年比1935年增加了12.4%。这组数字说明，更多的留学生已经从学习基础课程，转向了更高一级课程的学习^①。

1935—1937年的中国留日学生（含伪满洲国留学生）赴日后，往往有实力考入日本的大学，许多留日学生还考入了日本

^①沈云龙：《中华民国廿五年 日本昭和十一年留日学生名簿》，第5—16页。

久负盛名的名牌大学。如以 1936 年为例：

1936 年留日学生就读部分大学情况表^①

校名	生源 性别	中华		满洲		合计
		男	女	男	女	
北海道帝国大学		23	0	15	0	38
东京帝国大学		0	0	1	0	1
东京商科大学		29	0	16	0	45
神户商业大学		5	0	4	0	9
千叶医科大学		8	0	0	0	8
新潟医科大学		1	0	0	0	1
名古屋医科大学		2	0	0	0	2
东京工业大学		89	0	37	0	126
东京文理科大学		6	9	0	1	16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30	0	57	0	87
广岛文理科大学		7	0	1	0	8
广岛高等师范学校		8	0	49	0	57
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0	4	0	5	9
奈良女子师范学校		0	13	0	5	18
山口高等商业学校		1	0	83	0	84
长崎高等商业学校		26	0	29	0	55
第一高等学校		67	0	41	0	108
明治专门学校		15	0	6	0	21

^①沈云龙：《中华民国廿五年 日本昭和十一年留日学生名簿》，第 38—180 页。

续表

校名	生源 性别		中华		满洲		合计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	2	0	2	0	2	0	4
神户高等工业学校	2	0	2	0	2	0	4
东京美术学校	12	0	4	0	4	0	16
东京高等商船学校	0	0	8	0	8	0	8
东京高等齿科学学校	6	0	0	0	0	0	6
大阪商科大学	3	0	2	0	2	0	5
警察讲习所 1	15	0	30	0	30	0	45
东京铁道局教习所	93	0	97	0	97	0	190
横滨高等工业学校	1	0	0	0	0	0	1
京都高等工艺学校	4	0	0	0	0	0	4
东京外国语学校	4	0	1	0	1	0	5
女子学习院	0	0	0	2	0	2	2
横滨商业专门学校	0	0	2	0	2	0	2
陆军大学	1	0	2	1	2	1	4
陆军士官学校	72	0	22	0	22	0	94
陆军经理学校	0	0	4	0	4	0	4
早稻田第二高等学院	5	0	7	0	7	0	12
早稻田国际学学院	2	1	2	0	2	0	5
明治大学	394	12	142	1	142	1	549
明治大学预科	5	0	42	0	42	0	47
明治大学女子部	0	30	0	11	0	11	41
法政大学	478	32	77	2	77	2	589
中央大学	212	0	16	0	16	0	228

续表

校名	生源		中华		满洲		合计
	性别		男	女	男	女	
专修大学	101	8	32	0	141		
立教大学	3	0	2	0	5		
同志社大学	0	0	1	0	1		
驹泽大学	0	0	1	0	1		
大正大学	1	0	0	0	1		
上智大学	2	0	0	0	2		
东京慈惠会医科大学	10	10	4	0	24		
东京农业大学	43	0	22	0	65		
东洋大学	1	0	1	0	2		
武藏高等学校	1	0	2	0	3		
成城高等学校	1	0	2	0	3		
青山学院	1	0	0	0	1		
东京医学专门学校	13	0	11	0	24		
东京齿科医学专门学校	22	0	1	0	23		
日本齿科专门学校	1	0	1	0	2		
横滨专门学校	1	0	0	0	1		
明治药学专门学校	4	0	0	0	4		
大阪高等医学专门学校	0	3	0	0	3		
岩手医学专门学校	7	0	0	0	7		
九州医学专门学校	6	0	4	0	10		
东京高等兽医学校	8	0	5	0	13		
麻布兽医专门学校	7	0	6	0	13		
东京物理学校	14	0	13	0	27		

续表

校名	生源		性别		合计
	中华		满洲		
	男	女	男	女	
武藏高等工科学校	10	0	5	0	15
东京高等工科学校	65	0	33	0	98
文化学院	0	2	1	0	3
日本美术学校	2	0	3	0	5
名古屋飞行学校	22	0	2	0	24
日本自动车学校	15	1	0	0	16
亚细亚航空学校	0	0	3	0	3
岩仓铁道学校	4	0	2	0	6
电机学校	8	0	0	0	8
武藏野音乐学校	2	0	1	2	5
东京高等音乐学院	0	0	0	3	3
日本体育会体操学校	2	0	3	0	5
东京针灸医学校	1	0	0	0	1
久连国民高等学校	1	0	0	0	1
日本女子大学	0	3	0	20	23
同志社女子专门学校	0	1	0	2	3
东京女子医学专门学校	0	35	0	13	48
东京女子药学专门学校	0	1	0	0	1
东京女子医学药学专门学校	0	9	0	3	12
日本女子齿科医学专门学校	0	3	0	3	6
东洋女子齿科医学专门学校	0	25	0	15	40
东京药学专门学校女子部	0	3	0	0	3
大阪女子高等医学专门学校	0	2	0	1	3

续表

校名	生源		满洲		合计	
	性别		男	女		
女子美术专门学校		0	6	0	6	12
共立女子职业学校		0	1	0	3	4
帝国女子专门学校		0	1	0	3	4
京都女子专门学校		0	0	0	1	1
女子经济专门学校		0	2	0	0	2
日本女子体育专门学校		0	1	0	0	1
东京家政学院		0	5	0	0	5
东京家政专门学校		0	0	0	1	1
日本女子高等商校		0	0	0	1	1
东洋音乐学校		0	7	0	0	7
东京高等女子学校		0	0	0	1	1
研数学馆		39	0	32	0	71
文部省体育研究所		1	0	0	0	1
理化学研究所		2	0	0	0	2
传染病研究所		3	0	0	0	3
茨城水产试验场		1	0	0	0	1
青森师范学校		0	0	7	0	7
秋田师范学校		0	0	2	0	2
新潟师范学校		0	0	2	0	2
高田师范学校		0	0	2	0	2
日田林工学校		0	0	4	0	4
长冈工业学校		0	0	1	0	1
北阳商业学校		0	0	1	0	1

续表

校名	生源		中华		满洲		合计
	性别		男	女	男	女	
空知农业学校			0	0	2	0	2
长冈女子师范学校			0	0	0	3	3
日本大学			401	19	26	0	427

上表所示，虽然不是中国留学生就读的高等学校的全部，但是也可以从中窥见一斑，即中国留学生，已不只局限于学习日语及初等教育知识，而是向大学、大专等高等教育进军。

留日学生就读学校层次的上升，也标志着中国留日运动的成熟，标志着留日学生知识水平的提高。

2. 重文轻理现象有所改观

中国自 1896 年开始，留日学生多学习社会科学，比如 1906 年，湖北留日学生入日本高等以上学校者共有 96 人，其中学法政、高等师范、高等商业的有 89 人，学习实业专科的只有 7 人。到了 30 年代，国民政府在国际舞台风云变幻的格局中，感受到了仅有古老的文化文明已远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必须有高度发达的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作后盾，国家才能富强。据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档案 722—1404 页记载，国民政府认为：“当兹训政伊始，建设事业经纬万端，实用人才尤为需要。”为此，

1930年4月，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会上通过了《改进全国教育方针》，其中留学教育方面提出了六条改革措施。会议决议：“以后选派国外留学生，应注重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以应用国内建设的需要，并储备专科学校及大学理农工医等学院的师资。公费留学生应视国家建设上的特殊需要，斟酌派遣，每次属于理农工医的，至少应占全额十分之七。自费留学生得依本人志愿，肄业任何学科，但学理农工医者，应尽量先叙补公费或津贴；学文哲政治艺术等科者，非至大学毕业入研究院时，不得受公家补助。

此前，学习理工科的留日学生，回国后，空有报国之志，却难寻报国之门。致使学习理工科的留学生颇少。随着国民政府在留学政策上对理农工医及其他应用学科的倾斜，留学生（特别是公费留学生）在选学科目上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学理工科的学生与学文科的学生人数比例差距有所减小。据1931年至1936年的统计，学法律、文学、经济、美术的共有5746人；学医学、工业、物理（化学）、农业等科的共有3686人。较之最初中国留日学生中的文理科的悬殊比例，显出了长足的进步。这说明，留学生中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已不再是空洞的标语口号，而成了留学生救国富民的实际行动；说明了留学生对民族振兴的深刻认识。

1935—1936年留日中国
学生学科分类统计表^①

时间 学科	1935年	1936年	合计
法 经	1057	1926	2983
医	263	409	672
工	236	382	618
文	260	383	643
理	181	200	381
农	166	277	443
商	188	328	516
美 术	44	96	140
陆 军	93	101	194
警 务	36	45	81
铁 道	191	203	394
特 预	129	213	342
预 备	827	1016	1843
其 他	110	330	440
合 计	3781	5909	9690

上表中，姑且将特预、预备和其他栏目划出不算，计理科留学生为 2783 人，文科留学生为 3282 人，虽然学习理科的人数仍然不及学习文科的留学人数，但是，已经明显地显示出中国留学生对与科学技术有关的课程有了更大的兴趣，显示出中

^①沈云龙：《中华民国廿五年 日本昭和十一年留日学生名簿》，第 20 页。

国留学生救国图存的务实趋向。

3. 遍布 59 所学校的留日女学生

进入 30 年代，女子留学日本趋盛，留学人数显著增加。这一时期，女子留学人数缺乏完整记载，目前还无法得知其确数。但 1930 年至 1931 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曾对女子留学地域作过一次统计，其中 28.6% 留美，18.1% 留欧，53.3% 留日。如此看来，在留学国别上，留学日本的中国女学生占有明显的优势。

另外，这一时期的留日女学生，与早期的留日女学生相比，不再局限于学家政、学艺术，而是向纵深层次发展，许多留日女学生考上了日本的大学或专科学校，使女子留学不仅在数量上有飞跃，而且在质量上有提高。女子留日学生的学习情况、就读学校可参见下表：

1936 年日本各校中国
女留学生人数一览表^①

学 校	人数	学 校	人数
东京帝国大学	7	××大学医学部	1
京都帝国大学	1	早稻田大学	14
东北帝国大学	4	早稻田国际学学院	1
九州帝国大学	15	明治大学	13
东京文理科大学	10	明治大学女子部	41

^①沈云龙：《中华民国廿五年 日本昭和十一年留日学生名簿》，第 25—190 页。表中“×”处为原书印刷不清者。

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

续表

学 校	人数	学 校	人数
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9	法政大学	34
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18	专修大学	8
东京高等蚕丝学校	2	大阪高等医学专门学校	3
上田蚕丝专门学校	1	文化学院	2
女子学习院	2	日本自动车学校	1
陆军大学	1	武藏野音乐学院	2
东京高等音乐学院	3	日本女子体育专门学校	1
日本体育会体操学校	2	东京家政学院	5
东京高等××学校	1	××女学院	8
东京针灸医学校	1	××病院	1
久连国民高等学校	1	长冈女子师范学校	3
日本女子大学	23	××高等女子师范学校	1
同志社女子专门学校	3	女子经济专门学校	2
东京女子医学专门学校	48	东京家政专门学校	1
东京女子药学专门学校	1	日本女子高等商业学校	1
东京女子医学药学专门学校	12	东洋音乐学校	7
日本女子齿科医学专门学校	6	文化××女学校	5
东洋女子齿科医学专门学校	40	日本体育会体操学校女子部	8
东京药学专门学校女子部	3	东亚学校	102
大阪女子高等医学专门学校	3	成城学校留学生部	1
女子美术专门学校	12	日本第一外国语学校	1
共立女子职业学校	4	玉川学园	2
帝国女子专门学校	4	××慈善病院	3
京都女子专门学校	1	××高等女学校	4
日本大学	19	合计	483

1936年中国女子留学生分布于日本的59所学校中，共有483名，占此时留日学生总人数的8.53%。这一比例，比清末有了较大的发展。留日运动第一个高峰之后的1907年，东京地区只有女留学生百余人，整个日本中国留学女生总人数达不到200名。1936年女留学生已是1907年时的数倍。1936年女留学生分布的特点是，在大学的少，在专门学校和专门学校以下的人数多。日渐增多的女子留学生，为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谱写了绚丽多彩的一章。

4. 钻研学问，争取地位

随着中华民国和伪满洲国留学制度的不断改进，对留学生的资格作了调整，尤其是公费出国留学，必须在思想方面合格的前提下参加文化知识的考试，笔试、口试合格，才能获取留学资格。

留学机会的难遇、对知识的渴望，使许多留学生赴日后，就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钻研所学的专业知识。

在日本良好的学风下，在浓厚的学术研究的氛围中，中国留学生的治学严谨之风盛行。中国留学生不再满足于中等教育，不再满足于“镀金”，而注重向深层次的知识进军，向高深的理论挺进，向宽阔的学海中遨游。

青年柳步青在东京齿科毕业后，又考进了东京帝国大学本科。医学理论功底深厚，使他日后成为了名医。

太原学生贾克明，凭着刻苦努力的求学精神，考入东京大学医学部，以优异的成绩受到日本导师的称赞。最终成为中国著名肝病医学专家。

留日学习仅一年的王莹，学习自觉刻苦，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甚至在吃饭时、洗衣时仍然不离书本，很快进入东京大学艺术系学习戏剧、音乐和文学。以至成为艺术的多面手，演戏、写作于一身，成为“一代最有才华的女作家和演员”。回国后，王莹主演过《芦沟桥》、《台儿庄之战》等剧目，宣传抗日精神。写过多篇散文、影评，还与夏衍等人合写了《台儿庄之战》的剧本，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扬和重视，她的代表作有自传体的长篇小说《宝姑》。小说《宝姑》集中了王莹作品的主要写作风格。文学评论家何镇邦说：王莹严格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从生活出发进行创作。《宝姑》所展示出的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既忠实于生活，表现出生活中的复杂性，又比生活集中，更典型更美。

处在1935—1937年之间的中国留学生，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努力探索所学专业的高深知识及其前沿发展。但是，国家的前途、民族的灾难，又使他们无法全身心地投入故纸堆中，搞纯学术研究。在求学之余，他们更关注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并积极从事救国救民、唤起人民觉醒、民族振兴的活动。进步的留学生学术团体在东京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社会科学座谈会”、“文化座谈会”、“留东妇女会”、“世界语协会”、“世界编译社”等中国留日学生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活动。

当时日本警视厅对中国留学生的思想控制很严，据说每两个留学生中就有一个便衣特务在监视着。日本当局不准十人以上聚会，不准留学生开展集体的政治活动。日本警察还常常突然闯入留学生的房间，四处观望，问留学生在看什么书，与什

么人来往等。

日本当局的监视、控制，右翼势力的破坏，并没有阻止进步的留日学生为争取民主、争取地位的斗争。他们以学术座谈为名义，进行时事讨论；以文艺刊物为阵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以示威游行为方式，争取社会地位、人身自由。使中国留日学生运动轰轰烈烈，既声援了国内民众的抗日力量，也争得了应有的地位和权利。

第 三 节

“七七”事变前后留日运动的起伏

1. 精心策划绿川英子访华

正当赴日留学又达到高峰之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步步紧逼。强占了东北，蚕食了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国人的愤怒，“一·二八”的抗击、“一二·九”的学生爱国运动，抗日义勇军的崛起，奏响了中国人民反击日本侵略的庄重序曲。

身处敌国的中国留学生，更深地体验到寄人篱下之苦、亡国无家之恨。留日学生自发地组织起来，开展救国救民大讨论，组织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声援国内抗日武装，为国人抗日积极募捐，为国民政府抗击日军侵略献计献策。

许多留日学生的爱国热情，直接转化为投身报国的实际行动中。留日学生不惜放弃学业、返回参战。

来自伪满洲国的留学生刘仁（又名刘砥方），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优越的教学条件、安稳平和的学习生活，

仍然难以压抑爱国主义情感。日本侵略者的凶狠残暴，伪满政府的懦弱投降，更激起了刘仁强烈的愤慨。为摆脱亡国奴的地位，为挽救民族危亡，1937年3月，刘仁借了一张关内同学的学生证，更换了照片，混过日本警察的检查，毅然回到中国的上海，投入到了抗日救亡文化宣传中。

刘仁的妻子是世界语学家长谷川照子（在中国时的笔名叫绿川英子）。绿川英子于1932年在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习时，因为参加左翼文化活动被捕，受到退学处分。绿川英子是日本世界语协会的积极分子，她致力于世界语的传播与推广，倡导国际主义精神，同情中国人民的痛苦，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1936年，绿川英子与伪满留日学生刘仁相爱结婚。

刘仁先期回抵上海后，为寻找丈夫，更为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绿川英子决定赴上海访华。绿川英子的想法，得到了中华留日世界语者学会的支持。

中华留日世界语者协会与日本世界语者中垣虎儿郎、绿川英子等人极为熟悉。为帮助绿川英子秘密来华，中华留日世界语者协会负责人丁克亲自筹划。1937年4月，将绿川英子装扮成中国留学生的家属，随同一位中国留日学生登上了路过横滨港的美国“××皇后号”邮船上。临行时，丁克嘱咐绿川英子装成哑巴，不要说话。直等到日本特高便衣警察下船以后，丁克才放心下船，在码头上与绿川英子挥手告别。绿川英子顺利到达上海，开始了她人生的新里程。

绿川英子出走五六天以后，日本警方才发现她已不在东京，曾四处侦察。丁克因是中华留日世界语者协会负责人、明治大学中华留日学生会的负责人，兼与绿川英子交往频繁，尤

其是与绿川英子的出走有密切关系，于1937年6月被日本警方逮捕。直到“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以后，丁克才被允许回国^①。

绿川英子到上海后，不久，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绿川英子到武汉，参加了国民党党部宣传处所属的汉口广播电台工作，利用自己的日语特长，从事对日本人的反战宣传，武汉沦陷后转到重庆，继续广播。

1938年11月1日，日本的《都新闻报》曾报道，中国对日本人的反战宣传，并说播音员是一个名叫长谷川照子的日本妇女，恶毒地谩骂她是“卖国贼”。对此，绿川英子坦然地说：“好啊，他们骂我是‘卖国贼’，我倒很幸运呢，因为和那些侵略成性的民族败类、那些惨无人道的暴徒属于同一国家，我感到可耻！”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这场战争中，中国的胜利意味着中华民族的解放，也意味着日本和远东一切受压迫人民的解放。”

日本投降后，刘仁和绿川英子夫妇从重庆转移到东北，经过国民党军队控制下的沈阳、长春、吉林等地，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解放区哈尔滨。他们夫妻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但是，他们看清了企图把战祸重新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蒋介石的本性，认识到要使东北真正回到人民手中，只有到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和那里的人民并肩战斗。正如绿川英子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最初我是准备回日本的，后来我认识到能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献身是光荣的。”

^①黄乃：《记留日世界语者的活动》，载《文史资料选辑》109辑，第113页。

为了这对夫妻能够顺利到达哈尔滨，东北地区的党组织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作了周密的安排。1946年夏，刘仁和绿川英子来到佳木斯，任“东北社会调查研究所”的研究员。1947年1月10日，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因人工流产手术失败而去世。

绿川英子作为国际主义战士，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这一切，又都与中华留日世界语者协会丁克等留日学生的帮助，秘密逃出日本密不可分^①。

由此可见，中华留日学生不仅座谈、讨论抗日救亡的理论，而且也身体力行，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2. 抗日救亡，再掀“归国潮”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留日学生立即组织了救亡斗争。据当时任中共东京特别支部的代理支部书记张持平回忆：“在海滨休假时，收到日本某新闻社转载延安中共中央8日电讯，中共中央号召开展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于是我们几个进步同学讨论了抗战局势后，决定要我立即赶回东京，准备召集各进步文化团体开会，动员全体留日同学回国参加抗战。”“我一回到东京，立即找到王重英，我们的看法完全一致。于是，和东京各地文化团体的负责人开紧急会议，大家认为，动员全体留日同学回国抗战是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但必须解

^①横川次郎：《我走过的崎岖山路——横川次郎回忆录》，新世界出版社1990年，第121—122页。

决同学们最关心的对形势看法的问题：即这次‘七七’事变，会不会是‘一·二八’事变的重演，如果再出现中途妥协，又要重来日本求学，该怎么办？我们根据党中央关于抗战宣言的精神，指出：①自从中央发出号召，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抗日救国的群众运动已经在全国形成；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进国共合作的局面，为团结抗战创造了前提条件；③日本帝国主义决心灭亡中国，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各文化学生团体的核心人物只有带头，才能促进留日同学回国。当时许多同学都在海滨，美丽的日本浴场，确很迷人，我们就提出，我们是爱日本的海水，还是更爱祖国的自由？大家经过讨论，终于统一了认识，毅然决定回国。要回国就要有船费，由于时间紧急，大家缺乏经济准备。于是大家互相帮助，还卖掉留学的一切用具，包括最不值钱的火盆，决心和祖国人民在一起，不打败日本鬼子决不再来。”①

张持平的回忆，真切地反映了留日学生的实际。正是这些留日学生的中坚、骨干的带动，以及留日学生对祖国的真挚的爱，使留日学生在国难当头，纷纷辍学归国。抗日前夕，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总数达6000余人。中日战端一开，留日学生即首途归国，其势如潮，不绝于途。不到2个月的时间，留日学生回国者近4000人。到10月下旬，留日学生几乎全部返国。掀起了中国近现代留学史上最大的一次回国热潮，留日学

①张持平：《东京文化救亡运动片断》，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09辑，第103—104页。

生用归国的实际行动书写了正义、爱国的光辉诗篇。

留日学生伴着“七七”芦沟桥抗日的号角，纷纷辍学回国，去为国家为民族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3. 抗日战场上的留日学生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反对外国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正义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中华民族得到空前的觉醒。

在这场战争中，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达到了新的高峰。对于留日学生不是8年抗战，而是长达14年。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留日学生就走上了抗日战场，英勇杀敌，浴血奋战，壮怀激烈，可歌可泣。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东北地区的人民切感亡国之痛，纷纷走上抗日救亡、力复失地的斗争道路。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留日归国的学生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的斗争有两个战场，一个是在东北沦陷地区组织抗日爱国武装，同侵略者进行直接的战斗。如留日学生张显铭，目睹了“九一八”事变的凄惨景象后，回到家乡——辽宁省新宾县，联络同乡旧友，力陈救国大义，拉起了百余人的抗日队伍。并与其他抗日队伍一同组成“血盟救国军”，在“鏖战竟日，弹如雨发”的战场上，英勇战斗，给敌伪军以沉重打击。张显铭后来担任了这支抗日武装的总参议，在东北地区的抗日救亡的战场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时救亡斗争的另一个战场是在关内各地。“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不少人背井离乡，流亡关内，继续进行抗日斗争，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其中的一些留日学生

成为救国会的骨干力量。例如，当时担任上海东北同乡抗日救国联合会会长的刘芝明，早年留学日本，1929年归国后即参加了革命活动，后来还担任了上海反日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及中国领土保障大同盟党团书记等。

辽宁的留日学生杜重远，回国后，一直从事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他被选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常务委员和政治部副部长，在争取国内外人士援助救亡运动中做了大量工作。1931年底，杜重远在上海和其他爱国人士一起，发动群众，给率众抗日的马占山部募捐。此后，他又在长江流域的5省、10余市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发表60余次讲演，激励同胞抵御外侮。

1933年，日本关东军进一步侵略毗邻东北的热河省及长城要塞。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的长城抗战。在此期间，杜重远曾率救国会政治部的部分人员和学生宣传大队，赶赴前线，深入军队，宣传鼓动，推进救亡。长城抗战失利后，冯玉祥将军于1933年5月26日，在张家口通电宣告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以“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

在冯玉祥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中，留日归国学生宣侠父任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常委、中共抗日同盟军前线委员会委员，并任第二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五师师长，参加了收复多伦等地的战斗。1934年，宣侠父又与南汉辰、吉鸿昌等筹备成立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斗争。

早年留日归国的张曙时，也曾积极帮助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并任冯玉祥司令部顾问和方振武军的高级顾问。同盟军失败后，张曙时到四川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在淞沪抗战中，留日学生也做出了贡献。1937年8月13日，驻守淞沪的中国军队英勇奋战，给予日军严重杀伤，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并为中国沿海工业内迁赢得时间。当时开赴淞沪前线的中国军队第4军第90师第540团上校团长官惠民，即是一位于“九一八”事变后毅然罢读归国的留日学生。他在南翔线阵地一带的争夺战中，率部同日军进行了多次恶战。9月27日的一次战斗中，他亲自率领残部300余人向日军发起反冲锋，同日军展开白刃血搏，终于守住阵地。10月中旬，他因功升任270旅少将旅长。之后，在嘉定县的一次战斗中，他到前线一掩蔽部组织部队反击，不幸以身殉国。

“七七”事变发生后，在日本留学的数千名中国学生，接到留日学生监督处通知“撤离敌国，回国参战”的命令后，立即整装回国。

1937年8月，最先回到上海的留日学生组织成立了“中国归国留日同学抗敌救亡会”，作为上海救国会领导下的一个抗日团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救亡会各部部长是：总务部长叶文津、组织部长黄乃、宣传部长裘进、交际部长李肇嘉、社会服务部长郝丁，公开的领导人是郭沫若。

中国归国留日同学抗敌救亡会先后组织归国留日学生到部队、工厂、农村、街头进行宣传，街头募捐，慰劳伤员，救济难民，组织歌咏演出，请郭沫若讲演，欢迎“七君子”出狱等活动。

“八一三”事变后，救国会决定及时把归国留日学生的救亡活动扩大到各地去。于是在张持平、姚耐、李肇嘉等人带领下，160余名归国留日学生从上海去南京，参加救亡会中的河南省同

学组织的“河南归国留日同学救亡团”，北上开封，开展救亡活动。救亡团团团长卢耀武，秘书吴砚农。到达开封后，在中共河南省委的领导下，救亡团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

数千名归国留日学生，除少数学业未竟的学生入国内学校续读外，多数参加了战时服务。其中主要从事宣传、教育、研究和技术工作。他们留日日久，熟悉敌情，而且日文娴熟，所以，在抗日宣传方面一展所长。尤其是抗战初期，文艺演出、创办刊物，发表论文，举办各种讲演、讲座，分析日本侵华的原因、战略和策略，介绍日本的政治、经济、军备以至民情。

借用文学艺术形式从事救国宣传是国之所需，而学习军、工、理、医等专业的留学生在国难期间尤为各方所急需。他们不仅专业功底深，而且有的早在国外留学时，已注意研习与战争相关的学科，如军事工程、战时利器、战时医药卫生和战时燃料等。因此，回国后，在科研设备和原料奇缺的情况下，仍做出了相当的成绩。

归国留日学生不仅在抗日宣传、理论研究中取得骄人业绩，而且，许多归国留日学生还投身疆场，亲身参加抗日战争，用鲜血和生命抒写了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

归国留日的国民党 117 师副师长吴克仁，1933 年曾率部参加了长城抗战。1937 年 9 月，作为第 67 军军长的吴克仁又率军在华北子牙河一带孤军顽强抗敌，阻滞了日军的攻势，迫使日军付出了巨大代价。1937 年 10 月，吴克仁率部开往淞沪作战。在黄浦江北岸的防守战中，他亲临前线督战。后在指挥部转移时中弹殉国。

日军由河北入侵山西时，第 33 军 69 师 203 旅少将旅长、

归国留日生梁鉴堂奉命率部进入茹越口阵地阻击。他慷慨激励部下说：“为国杀敌，效命疆场，乃军人之天职，死何足惜！茹越口关系至钜，我惟有立于此，至死为止。”在这次战役中，他率部鏖战，壮烈牺牲。

国民党著名爱国将军，1929年赴日学习过军事的钟毅，留学期间，“认真了解日本的军事装备情况，研究日本军队的战略战术”。抗日战争开始，他任第31军138师414旅少将旅长，率军北上抗日，担任津浦路南段的守备任务。1938年初，南京保卫战后，他率部多次打退日军进攻。1938年夏，武汉保卫战开始后，他在鄂东阻击日军，以战功晋升173师中将师长。1939年夏，在随枣会战中，他因战功荣获军事委员会颁发的陆、海、空甲等奖章。1940年，在枣宜会战中，钟毅将军率部突围，弹尽粮绝，宁死不屈，自戕殉国。

归国留日学生不仅在抗日的正面战场功勋卓著，而且在敌后的抗日战场也创下伟绩。如朱程是1934年赴日的留学生，1937年回国后，在河北民军中任职，1939年率部投奔八路军，任华北抗日军司令员，后任华北抗日民军第一旅旅长，兼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冀鲁豫五分区司令员。1943年9月28日，在山东曹县反“扫荡”中英勇牺牲。

新四军中曾受到叶挺军长表扬的陈子谷，是泰国首都曼谷的大富商陈峥嵘的孙子。1934年陈子谷到日本留学，参加了东京的左翼作家联盟。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他直奔延安陕北公学，毕业后，在新四军2支队担任敌工干事。他经常到各连队教战士喊日语口号，以瓦解敌军。他工作认真，作战勇敢，1939年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陈子谷又是诗人，在日本参

加左联活动中，写有诗集《宇宙之歌》，深受郭沫若的好评。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陈子谷仍然经常写诗。其中豪迈高昂的战斗诗篇《我们战斗在茅山下》，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广为流传，鼓舞着新四军战士勇往直前。

生逢抗日之时，身处救亡之中，许多归国留日学生忧民族之危亡，怀报国之志向，舍生忘死，前仆后继，为抗日斗争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女留日归国学生黄薇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黄薇原侨居新加坡，抗战以前留学日本，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她怀着抗日救国的热情，回到烽烟弥漫的祖国。作为《星洲日报》的特派记者，她去过徐州前线，访问了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主席曾多次接见她。黄薇本想留在延安学习，毛泽东以为当记者的作用更大。随后，黄薇就到华北敌人后方进行采访，后来又到重庆，向海外侨胞报道了祖国人民英勇抗日的事迹。

归国留日学生在民族危难之际，牺牲个人私利，愤然返国，以热血和生命维护民族的尊严，呼唤、拯救苦难无助的民众，书写中华民族不屈的丰碑，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4. 留日学生训练班

1937年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上海守军燃起了举国瞩目的“八一三”战火。归国的留日学生日渐增多。为更好地引导、使用归国留日学生，国民政府在上海、武汉、广州、重庆、西安等城市，设立归国留日学生招待所。

1937年10月，600多名留日学生到南京紫金山参加中央政治学校留日归国学生训练班集训。

中央政治学校留日归国学生训练班起初设在南京，不久，上海、太原陷落，南京告急，训练班学员每人领步枪一支，子弹20发，转移到庐山。1938年4月，又转移到武汉。

最初，训练班声称，要学习军事知识，武装留学生的思想，三个月结业，到抗战前线。终因战局的复杂、混乱，使这些归国留日学生在接受了8个月的军事训练、思想引导后，才告结束。

当时训练班的归国留日学生有600人，其中有少量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员。留学生的素质差别较大。一些人是为镀金才去日本留学的。留学生中还混有中统、军统派赴日本刺探情况或拉拢学生的特务。但是，大多数留日学生是学有所成、热心报国的有为青年。

国民党军政当局极想笼络和利用这些留日归国学生。在训练班成立之初，由于“全国抗战力量要在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之下”，因此，蒋介石自然就兼任了训练班的主任。此外，中华民国教育部长张道藩受陈立夫之命任训练班的班主任。日军侵犯，南京告急，训练班迁到江西庐山海会寺，总队长先是郝鹏举担任，后来，国民党十三太保之一的军统头目康泽乘机将训练班领导权夺去。南京沦陷，训练班迁入湖北江陵，易名为“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留日学生训练班”。

留日训练班的留日归国学生，大多数是长期读书，不懂政治的青年。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对这样一批知识分子，当然极为重视。

蒋介石在宁、沪陷落后的1938年春，到留日归国学生训练班视察，召集全体学员讲话，表明自己拉笼青年、排除异己

的叵测之心，他说：“……不但上海、南京失守，就是武汉、长沙也要被日军占领，可是我们一定能亲眼看到日本鬼子被打败，中国的困难不是在抗日战争，而困难是在抗战胜利以后……。”

抗日战争初期，身任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和国民参政会会长的汪精卫，也不甘落后地来到训练班，并信誓旦旦地说：“吾以必死的决心，求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以此笼络、蒙蔽爱国留日学生。

国民党总政治部部长陈诚是蒋介石的心腹。他对这批归国留日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是不遗余力地拉拢和劝诱。陈诚曾多次约请留日归国学生会的主任委员王振纲深夜谈心、交流，联络感情，希望在留日归国学生中颇有声望和感召力的王振纲为自己效力，有意让王振纲在办公厅做其私人秘书。王振纲言明：“面临伟大的民族救亡运动正在蓬勃兴起，我愿献身到实际抗战中去，到部队中去。我懂日语，如审问日俘，向日军写宣传品，前沿喊话等，能发挥我的专长，做些有实效的工作。”委婉谢绝陈诚的意愿。

归国留日生也是中国共产党争取、团结的对象。1938年4月，特训班全体学员到武汉卫戍司令部大礼堂参加了“联合纪念周”活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等高级将领出席。陈诚领读“总理遗嘱”后，把周恩来介绍给学员认识。全场立正，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周恩来谈笑风生地作了3个小时的讲话，他那亲切精辟的言辞使学员们增强了“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力量，受到了莫大的鼓舞”。此后，周恩来还不时和夫人邓颖超到留学生驻地，与特训班的留学生

亲切交谈、关切询问，关心这些青年的进步，启发诱导特训班的留日学生走革命的道路^①。

留日学生训练班迁至江陵县不久，康泽加强了法西斯教育，集训时间原定3个月结业，他宣布实行“后期教育”，结业无期，弄得留学生们晕头转向。随着时间的推移，留学生们深感抗战无门，悲观失望情绪日增。而康泽对学生的管束也愈来愈严格，每星期只准学生外出半天。留日学生们要求结束训练到前线抗战，酝酿罢操罢课，被康泽和训练班副主任杨文琏察觉。1939年1月19日黎明，雨雪交加，康泽命令全体训练班学生在江陵县大操场集合，操场四周架起了机枪，岗哨林立。康泽、杨文琏杀气腾腾，向全体学生宣布训练班改组，原陈立夫派来的总队长、大队长、中队长、区队长及全体官佐一律撤换，说他们都“赤化”了，改派中央军校特训班官佐任之。并将发给学生的枪弹收回。散会后，有些留日学生带上自己的行李愤然离队。而康泽早已在江陵县四个城门加派岗哨，截捕离队者。留日归国学生李肇嘉（李林）、陈甲子、杨明等在江陵中学主持召开留日同学大会，要求康泽收回成命，释放被捕同学，结束训练，分派学生到抗日战场，并要求康泽向全体归国留日训练班的学生道歉。

康泽非但不理睬，还逮捕了李肇嘉、陈甲子、杨明等留日学生。无奈，一些留日学生分头化装潜赴武汉，据实向军事委员会控诉。蒋介石认为康泽此举失策，命令陈诚将训练班由江

^①王振纲：《留日归国学生训练拾零》，载《安徽省南陵县文史资料》第4辑，1985年印，第39—42页。

陵迁往武汉，纳入其中央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中^①。

当时，国民党各派系活动频繁，每日夜晚，均有若干小团伙秘密串联。有部分学生被拉到了中统、军统中去了。大多数学生被分配到各军、师政治部、军委政治部、后方医院、战地服务团等处。

1938年5月举行毕业典礼，由陈诚讲话，并给学生授剑和颁发毕业证书。该班绝大多数学员由军委会政治部派往各军、师政治部担任秘书、科长、科员、团指导员等职务，部分女学员分配到行营、战区政治部政工大队工作。由宋美龄管辖、陈逸云负责的中国妇女战时服务团也吸收了一些女学生担任职务。少数学生分别留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三青团中央党部、中央教育部、军委会政治部第3厅等部门。也有一些学生在分配工作中，不愿留在国民党军队或机关工作，就离开武汉到延安学习。这些留日学生到达延安后，大多被送入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等革命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各个抗日根据地，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权的骨干力量。

留日学生训练班作为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国共合作的特殊产物，为抗日战场输送了大批政治干部和抗日中坚，毕业生中的许多人在抗战中都走上了抗日前线和抗日的工作岗位，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和成绩^②。

^①张化宇：《回忆参加留日学生训练班的前后》，载《河南文史资料》第28辑，1988年印，第154-157页。

^②曾瑞炎：《华侨与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71页。

第三章

留学日本运动进入萧条期 (1938—1945)

第一节

萧条时期的伪满洲国留日生

1. 伪满洲国留日学生增多

抗日战争爆发，一方面在海外的留学生纷纷归国，另一方面出国留学人数锐减。但是，在伪满洲国，赴日本留学却呈现了新的景观。尽管控制赴日留学人数的法令制度日呈繁密，但在东京留学的人数，并未立见减少。日本文部省为留日学生在各大专学校中划出学籍来分别容纳。东北留学生与关内留学生，在划出学籍中总的比例约为21:3。“七七”事变后，关内留学生的人数急剧下降。伪满政府乘机与日本文部省协商，达

成按现实人数重新计划学籍的协议。1938年春，考入日本正式学校时，东北留学生人数的比例有所上升。

伪满统治14年间，留学于日本高专、大学及中等学校的情况如下：

1932年为330人；1933年为500人；1934年为900人；1935年为1280人；1936年为1590人；1937年为1837人；1938年为1519；1939年为1182人；1940年为1234人；1941年为1255人；1942年为1310人；1943年为1004人；1944年为933人。^①

上述数字表明，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留学日本运动的萧条时期，伪满洲国的留日学生，不仅无减，而且有明显的上升。

随着留日学生的增加，日伪统治当局对留学生工作更为重视。1936年9月，勒令公布“关于留学生之件”，部令公布“留学生规程”；1937年2月，以训令公布“留学生须知”。就留日学生的管理、认可、给费生等问题均作了具体规定。

留学生的管理，在“九一八”事变前，由各省管理。从1933年起由伪文教部统管。至于在日本，1935年2月，为专门负责指导监督留日学生，特在驻日满洲国大使馆设学务处。为加强对留学生的监督，1936年9月公布“关于留学生之件”的同时，废止了学务处，留学生由伪满驻日大使馆直接掌管。鉴于“我国建国前……5年由政府选拔，资送东西两洋者，为数颇多，而以自费前往，不受政府资助者，其人尤众。政府对

^①《中日文化交流事典》，第745页。

人数，既无限制，学科已极庞杂，而地点尤无规定。以致建国之后，学非所用，往往与政府方针不合者有之，甚且与政府方针，背道而驰。思想相左者有之，比如政府所需之材为理工，而学成归来者适为文法。政府盛唱反共，而毕业生适来自莫斯科。”^① 因此对留学生的管理尤为严格，不仅要具体指定留学地点、所入学校、所学学科，而且对其思想行为也严加管束。“有悖留学生之本分者”，依照 1937 年 2 月伪文教部会同伪满洲国驻日大使馆联合公布的“留学生须知”，取消其留学资格。

为鼓励学业优良的青年赴日留学，提高留学生的基本素质，伪满洲国公布了《关于留学生之件》，对赴日留学生实行“认可”的制度。无论公费、自费都要经过认可。每年举行一次认可考试。“认可”过程大体如下：凡是“思想坚实，身体强健”，具有国民高等学校毕业的学历，欲出国留学，先填写“留学生认可呈请书”，连同履历书、毕业证书、学业成绩证明书、誓约书、县、市长对学生的身份调查书等附件报告省长、特别市长；省长、特别市长认为合格，再“径呈”伪民生部大臣。誓约书中要有 2 名保人署名，正保人必须是家长或家族中的长者，副保人必须是同省的现任官吏或纳国税 10 元以上者。其次，进行认可试验，分笔试、口试、身体检查。但家住日本国，或伪民生部大臣特许，可免去笔试。笔试内容包括国民道德、国语、数学，理科另考物理、化学、博物；文科另考英语和日本历史。最后，试验合格，由民生部发“留学生认

^①谷次亨：《告留学生诸生书》，载谢廷秀：《满洲国学生日本留学 10 周年史》，第 78—80 页。

可证”，学生持此证到伪满驻日大使馆换“入学介绍信”，再按被指定的日本学校规定，接受入学试验。为使更多的伪满青年学生赴日留学，1938年4月，经“日本文部省的谅解”及所谓有关方面的协助，决定实行“学席制”，即在指定的学校每年都给留学生留有固定名额。“不言而喻，设置学席的留学生，就意味着不经试验即可入学”，但不属于“学席”范围内的，还要经过入学试验^①。

据《满洲国学生留学日本10周年史》所载，设置“学席”的学校，高等学校及大学预科3所，大学8所，工业专门学校16所，农业专门学校9所，商业专门学校4所，高等师范学校及女子高等师范学校3所，专门学校7所。其中文、法、商科占30%，理、工、医、农占70%。设置“学席”，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殖民地政策的需要。当时50所学校共设“学席”175名，后来，每年均在200名左右。

此外，伪满洲国还从初等中等教育教师中选拔“优秀人才”，派赴日本留学一年，使之“受日本学校教育之实地训练，并以补益日满亲善”。此项留学制度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至1937年“随着国内师道训练机关的整備”而废止，前后共5期，共派111名。但是，从1940年开始，又实行教官留学制度，派遣初等、中等、高等学校教师去日本留学。1940年30名，1941年50名，1942年33名，1943年47名，1944年28名，1945年28名，“学习教师之必要的学术技能，深刻体会日本精神，有助于我国的文化建设”。实质是为推行

^①《满洲年鉴》1944年印，第215—252页。

奴化教育培养骨干教师。

派遣教师赴日情况可见下表：

伪满洲国派遣教员留学生统计表^①

学校 别	东京 工业 大学	东京帝 国大学	熊本高 等工业	东京高 等工艺	共立女 子职业	东京高 等师范	广岛高 等师范	玉川 学园	日本 女子 大学	计 9校
科 别	文科				1	7	7	5	1	21
	理科	6	5	4	1					16
性 别	男	6	5	4	1	7	7	5		35
	女				1				1	2
省 区 别	奉天	2	4	2	1	1	3	2	1	16
	吉林	1		1			1	1	2	7
	龙江	1		1			1	2		5
	热河	1	1							2
	兴安			1			1	1		3
	北满 特别 区	2					1		1	4
备考										

尽管日满当局派遣留日的目的不可告人，但是，所采取的相对公平、合理的考试制度，以及向东北青年倾斜的留学政策，自然引导救国无门、求学无路的东北学生纷纷涌向日本，形成中国近代史上留日学习萧条期的局部兴盛和高潮。

^①武强：《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23页。

为鼓励青年学生赴日本留学，伪满洲国实行自费和公费并举。给一些青年学生适当经济帮助。享受公费的学生称为给费生或补助费生。留学生补助费分两种：一是伪满政府补助，一是“国内之自治团体或民间团体或日本国政府、自治团体”给予学资补助。受伪满政府补助者，须“缮具留学补助费支給请求书”，并附就读学校所发的在学证明书（注明入学年月日），“呈报”伪民生部大臣，然后由入学时开始直至毕业为止，发给补助费。凡是享受补助费的学生，毕业后必须从事伪民生部大臣特定的职务。享受补助费的条件，按规定应是“成绩特别优秀而家境贫困者”。留学生补助费分地分等，其情况如下表^①：

留学生补助费月額

区 分	甲 地 方	乙 地 方
大 学 本 科	55 元以下	50 元以下
专门学校及大学附属专门部	45 元以下	40 元以下
高等学校特设高等科大学 预科及预备部	40 元以下	35 元以下
特 设 预 科	35 元以下	30 元以下

甲地方是指东京、大阪、京都、横滨及神户。乙地方指甲地方以外的日本国内。

当然，能够享受到伪满洲国补助费的留学生较少。据

^①王野平：《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第 151 页。

1938年4月统计，留日学生中，公费262名，自费1275名。公费生仅占留学生总数的22.1%。

2. 伪满洲国留日学生会

“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在日本东京设立“同泽俱乐部”，作为东北四省留日学生的活动场所。“九一八”事变发生，大部分东北留学生回国，“同泽俱乐部”也就封闭了。到日伪时期，留日学生增加，于是在“同泽俱乐部”旧址设立“满洲国留日学生俱乐部”。后经“公使馆、协和会、陆军省、文部省、外务省、关东军”几方面策划。于1935年6月17日召开“满洲国留日学生会馆设立第1届委员会”。出席会议的有大使馆、陆军省、协和会、会馆4个单位7个人，其中5名日本人。研究了4个问题：“（1）满洲国留学生会馆捐赠行为草案；（2）满洲国留学生会规约草案；（3）满洲国留日学生俱乐部改组；（4）学生会馆及学生会预算案。”会上通过了第（3）个问题，另3个问题拟再议。根据这次会议的规定，1935年6月20日，把“俱乐部”改称“会馆”，馆长为日本人平田幸弘。就第1次会议未议定的问题，又于同年7月2日，举行了第2次会议。会上决定了5个问题：“（1）学生会本部设在学生会馆内；（2）满系大使馆参事官学务处长担任会长；（3）学生会馆馆长担任副会长；（4）留日学生所在学校设学生会支部、支部长；（5）学生会经费由财团法人学生会馆支付。”而“会馆”的经费是由伪“满洲国政府补助”，花的还是中国东北人民的血汗钱。会后，于1936年1月发表学生会创立宣言书。在一切筹备就绪后，拟定数月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大隈纪念

讲堂，开留日学生会成立大会。

为便于对伪满留日学生的管理，日满当局于1936年6月27日举行伪满洲国“留日学生会”成立大会，与会者约千余人。策划并参与“九一八”事变的战犯日本陆军大将本庄繁、伪满驻日大使汉奸谢介石出席了会议。会上选出既定的正副会长。会长是大使馆参事官于静远，副会长是学生会馆理事长平田幸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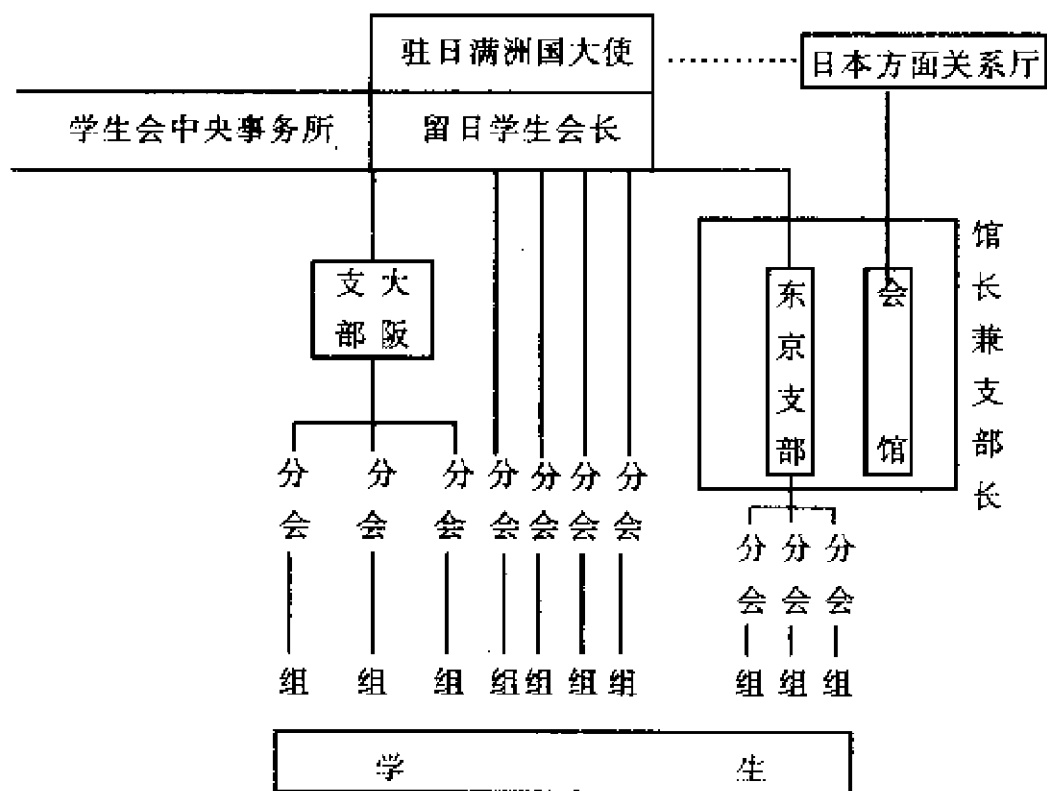
为使留日学生会同伪满大使馆一元化，1941年1月，日满当局又将留日学生会本部改称中央事务所，设在大使馆内。会长级别升格，由伪满大使担任，事务所长由大使馆参事官充任，职员也由大使馆职员兼作。加强了大使馆对留日学生的“指导监督”，以期达到派遣学生留学之目的。

“留日学生会”属于群众团体，为什么伪满驻日大使馆、协和会、日本陆军省、文部省、外务省、关东军等重要机关的要员们也积极参与呢？目的很清楚，日本当局就是要把留日学生会变成日伪在日本代其监督留日学生的官方机构，并让它起官方机构要起而起不到的作用。伪满政府也希望留日学生“在亲邦国土气候风俗人情环境内历身生活，与日本青少年互相切磋切磨，体会日本真精神，互相提携，于次代成为日满两帝国之不动摇的结合分子”。“满洲国留日学生会规程”则明文规定：“本会宗旨是使学生结合所在学校的教育，相互切磋切磨，体会实践日本精神，坚信我国的建国精神，以达到来日本留学的目的。”上述文字略有不同，但意思完全一样，可见留日学生会是为贯彻日伪意图而设的。这一点，从所谓留学生代表在留日学生会成立大会上朗读的“宣誓书”中可以进一步得到证

明。“宣誓书”内容大体如下：我等满洲国留日学生，深感肩负着将来国家中坚工作的职责，今天应同心协力严守留学生的本分，仰体日满两国一德一心的圣旨，坚持满洲建国精神，达到留学的目的，为此组织满洲国留日学生会，并遵守如下纲领：

- (1) 我们决心永远坚信国家的精神；
- (2) 我们决心永远坚持日满两国一体精神；
- (3) 我们决心永远体现民族协和精神；
- (4) 我们决心永远发扬牺牲奉公精神；
- (5) 我们决心永远养成团体精神；
- (6) 我们决心永远涵养勤劳的精神。

上段所谓的誓言和伪满留学生预备校的教育纲领，何其相似乃尔，简直一模一样。可见“誓言”绝非留学生的意愿，而是日伪统治当局的阴谋目的。从“留日学生指导组织”也可以看出，留日学生会完全置于日伪监督、控制之下。如图：



留日学生会为实现既定的目的，组织留日的满洲国学生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

夏期锻炼活动。夏季主要到田园、山岳、海滨去活动。每期活动约6天左右；每项活动组织1期，或2、3期，或更多一些。每项每期活动参加的人数少则几名，多则40—50名。上述活动每年都举行，每项活动都由日本人监督指导。例如，1937年夏期田园锻炼：场所在日本茨城县友部国民高等学校；自7月11日始至7月17日止，参加学生16名；指导员是纪井一志、西泽馨。1938年夏期海滨锻炼：场所在日本千叶县高浦海岸；期间自7月11日始至8月29日止，共办6期；参加学生前后共154名，指导员共15名。1940年夏期山岳锻炼：场所在山梨县；期间自7月11日至8月10日，办3期；参加学生前后共93名；指导员16名，其中1名伪满洲国人。此外，还有冬期锻炼活动，国内（指伪满洲国）锻炼活动。

留学生会还经常组织学生参观和参加讲演会。讲演会多半请日本、伪满洲国各重要部门的要官或某方面的“教授”讲演，主要内容有“满洲国建国的意义”、“民族斗争和民族协和”、“世界大势和日满支”、“满洲国的五年计划”、“建设东亚新秩序”等，借以灌输奴化思想。为使留学生“体会”日本精神，还利用学校暇余时间，组织学生到会社工厂、“模范村”参观，毕业前一年，还到日本的所谓圣迹旅行。还创办学生会会报，召开学生会分会长恳谈会。

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围绕留学生“切磋琢磨，体会实践日本精神”进行的，企图使留学生首先日本化——奴化，成为汉奸中的“中坚”——骨干分子。

在当时的日本，伪满除了设有留日学生会外，还有和留学生有关系的一些团体。如“财团法人满洲国留日学生会馆”、“日满帝国妇人会”、“东亚育英会”、“财团法人众善会”、“广岛兴亚亲善协会”、“志学会”等。这些所谓团体，名称不同，活动范围不同，既定目的也可能多元化，但是，在对“满洲国留日学生”这个问题上，其“志趣”却和“满洲国留日学生会”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从不同角度开展活动罢了^①。

3. 伪满洲国留日学生的特点

1938年—1945年，中华民国与日本处于敌对状态，断绝了外交关系，撤回了大使馆，关闭了留日学生监督处。至此，中华民国不再有赴日留学的官费生。

日本政府为加强对中国东北的统治，增加外汇收入，就将招收伪满洲国的留学生作为重点。于是在日本的各个大学，到处充斥着伪满洲国的留学生。非常时期的伪满洲国留学生呈现如下特点：

(1) 女子留学生增多

伪满洲国的女留学生最多的时候达到150名左右，男女留日学生的比例是6:1，而其他各国的男女比例多为10:1弱。伪满女子留学人数的增加，其原因之一是，伪满只有一所专门的女子学校——高师女子部，其中所设科目又不符合女学生的要求。她们东渡后，考入东京女子大学、日本女子大学、帝国女

^①王野平：《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54—158页。

专、东京女子医专、大森女子齿科、明大女子部法科、东京女子美专、京都女专、奈良女子高师等校，也有女学生经过特别许可进入广岛文理科大学以及其他大学研究院。她们毕业后，或能独立开业，或拥有较好的社会地位，使女子国高（女中）的毕业生啧啧称羨，纷纷仿效留日。而在此期间，夫妇留学的很多，既节省费用，又可互相扶助。男留学生的日渐增多，女留学生也随之增多，这是导致女子留学生人众的又一原因。

(2) “变则通留学生”增多

正规留学生以外的留学生称之为“变则通留学生”，这是伪满洲国的“特产”。“变则通留学生”往往是经过权衡而派往日本，无需在国内考试；经过预先洽商而集体入学，无需在日本考试；“变则通留学生”全是官费而无自费。派送机关不是统一的而是多元的。伪文教部曾由现职初等、中等教师（后来扩大到大、专教师）中权衡优秀的派送多批教员留学生。伪民政部曾由伪警正、警佐中选拔可靠的派送多批警官留学生。伪司法部曾由伪法官中（包括伪刑务官和伪司狱官等）遴选可靠的选派多批法官留学生。此外，还有派送到东京气象台技术官养成所的技士留学生，派送到京都各大寺院的僧侣留学生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变则通留学生”的留学期限不确定，有半年的，1年的，最长的2年。每批人数的多少无定，有几人、10几人，最多不超过30人。

(3) 夭折的少年留学生

伪满政府为加快日满亲善的进程，使伪满洲国的少年“同日本的少年男女，少小相近，感情相亲，陶冶成为结合日满两国精神的坚固锁链。从与日本少年互相切磋琢磨中，体会到日

本生活和日本精神；从互相提携中，奠定第二代日满不可动摇关系的基础。”（见于招考少年留学生要项）。于是伪满洲国异想天开地由国民优级学校（高小）的12岁左右的优秀男女毕业生中选取，送入日本中学程度的青年学校、农业学校和女子务实学校学习。然而，伪满洲国文教部的异想天开，并没有得到日本主子的嘉许，反而因日本中等男女学校当局难以照料未成年的留学生而生发出怨艾、讽刺的论调：“日本在古代派往隋、唐，在近代派往欧、美的留学生都不是少年。伪满洲国真是早熟的国度。”

派往日本的少年留学生共约200人。当太平洋战事逼近日本本土时，有的少年留学生偷着搭乘日本邮船“昆仑丸”回国，但在下关、釜山之间的朝鲜海峡中，船被击沉，搭乘的少年留学生葬身鱼腹了。

（4）安置各异的留学生

伪满洲国对于留日学生学成回国后的安置不同，待遇各异。

因对“九一八”事变之前各省派遣的留学生心存芥蒂，因此，对“九一八”事变之前出国的留学生的毕业后的工作分配问题，多用托词、官腔来应付。伪满洲国对留学生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使相当一部分“九一八”事变前赴日的留学生，无奈之余，遥赴关内，而不愿回东北。当然，也有此间的留学生因家长的请托、亲友的援引而被任命职务，分配工作的。

伪满洲国文教部考送的留日学生毕业后，不必为生计、工作忧虑，一律由伪满政府安置、分配。起码的待遇是低级伪“属官”、“教官”或与此相等的三等技士。凡是从日本的大、

专科学校毕业的，“月俸”（工资）是由70元到80元不等。所有冬季、僻地、家族等等的津贴，及每年6月、12月两次的赏与金（每次金额相当于“月俸”的2—3倍），与一般旧伪官吏受同等的待遇。

一般的留日毕业生，有从伪官厅向特殊会社发展的倾向。因为会社各种待遇优越、生活福利多，既解决了实际的经济问题，又可摆脱伪官的可憎、可耻的头衔，所以，毕业生往往乐而从之。

4. 日本士官学校的留学生

伪满洲国建立以后，几乎每年都要向日本士官学校派遣一批学生。

伪满洲国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派遣生，都是由日本侵占区的部队、机关和学校中选拔出来的。其中包括汉、蒙、达斡尔、朝鲜等民族。其级别有上尉、中尉、少尉；其兵科有步、骑、炮、宪和空军。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以后，一律学习步兵科。

派遣生的选拔方法如下：

首先，在兴安陆军军官学校集训选拔。伪兴安军区的东、西、南、北警备军和兴安陆军军官学校各派2—3名军官，到兴安陆军军官学校集训，作为日本士官学校派遣生的候补生。分期集训，分期派遣，每期约20余人，大多是青年军官。

在兴安陆军军官学校的学习内容有军事训练（包括军事理论、军事操练、刺枪术、剑术和柔道）、日语、数学、历史、地理和有关日满关系的政治课。学习时间为2个月，学习完

毕，经过考试，录取 10 名学员到中央军训处集训。

其次，经过初步选拔的满洲国派遣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青年军官（候补生），聚集到沈阳中央陆军训练处（地址在沈阳东陵）进行训练。派遣候补生队队长和区队长都由日本人担任，在中央陆军训练处指导下，直接对派遣生进行教育。教育的内容与兴安陆军军官学校相似。经过学习，进行再次考试，被录取者，就算完成了队副候补生的资格。

所谓队副候补生，就是在进入日本士官学校之前，首先要到日本军队体验生活。

派遣生都是在日本驻伪满洲国的各个日本军队中体验生活，为期 1 个月。每天除了简单的术科以外，别无所为，也别无所获。中午饭在将校集合所与将校们一起就餐。

派遣生的队副候补生的生活结束后，即被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开始接受预备教育。

日本士官学校里专设了伪满洲国生徒队。其教育计划和进度与日本士官学校完全一致。除了一般军事课程和术科外，增加一门日语课^①。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坐落在日本东京郊外 60 华里的相模川平原。分南北两个大院，北院较大，四周长约 3 华里，南院较小，四周长约 2 华里，士官学校院内的西侧，设有游泳池，游泳和船运演习在院内。汽车、摩托车、小型坦克等的驾驶演习，一般也都在院内。连着校园的北门，就是相模的练兵场，

^① 鄂嫩日图：《我所知道的伪满日本士官学校派遣生》，载《内蒙古文史资料》第 34 集，第 69—71 页。

占地面积很大，有各种自然地形，适合军事演习。

1931年，“九一八”侵华战争以前，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在东京市内，是预科，规模较小。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士官学校的学生人数急骤增加，扩大了学校的规模，陆军学校成为本科。校舍也就移到了相模川平原。全校除了大礼堂是水泥结构以外，整个校舍全是木结构的。大礼堂可容3000多人。

1938年至1945年间，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中国人主要有伪满洲国留学生、内蒙古留学生和汪伪政府派遣的新中华留学生。其中，1939年，伪满洲国派遣了33名留学生，伪蒙疆派遣了4名留学生。1940年，伪满洲国派遣留学生29名，1941年，汪伪政权派遣新中华留学生30名。

在士官学校，一般教育和训练时，伪满洲国和伪蒙疆生徒队单独进行；中队以上教育和训练时，则和4中队合并进行。在合并演习中，绝不让伪满的学生演习中队长或小队指挥员。在他们看来，日本人是优等民族，劣等民族是无权指挥优等民族的。

1940年伪满洲国派遣的留学生，是由国内军官学校毕业后2年，参加数次考试派遣的。食宿单列，单独一个讲堂，排以下的教练由伪满洲国学生充当，连、团的演习借用日本骑兵师团的士官。除伪满洲国的留学生外，日本军队严格禁止外国留学生使用（指挥）他们的军队。

1941年，汪精卫伪政府派去的中华留学生队30名学生，在南院，不与日本学生队在一起。

在军事理论课的细节问题和作战的实例分析上，对伪满洲国学生，尤其是“中华队”，有保留。因为他们战斗的对象是

中国，所以他们在作战中的阴险毒辣手段和对中国人的残忍政策，自然是要保守秘密的。

1941年秋季，在55期学生毕业典礼的讲话中，日本陆军中的重要人物均参加了。当马渊报道部长（宣传部）谈到对中国作战的形势，对中国作战的战略上不利之处和评论汉奸汪精卫时，下边有人提醒说：“有外国学生在场”，于是，校方立即命令伪满洲国和新中华的学生退场。

日本人对中国和各国留学生的用意深远，他们以为在日本留过学的学生，在未来的政变中，都会成为他们的帮凶和爪牙。尽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向中国留学生，尤其是伪满洲国的留学生传授基本的军事知识和技能，并极尽拉拢分裂中国留学生，但是，多数的中国留学生（包括伪满洲国留学生）是爱国的，是有正义感的，他们最终回到祖国的怀抱，走向抗日的战场。

第 二 节

萧条时期赴日留学的不同道路

1. 来自伪内蒙古自治政府的留日生

继1931年“九一八”侵占了中国东北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又于1935年用机械化部队侵占了中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和河北的张北县，开始向华北全面进攻。

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所侵占的地区，利用亲日派人物建立傀儡政府。先后在东北建立了由朝鲜、汉、蒙古、满等民族组成的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在华北南部建立了伪南察哈尔政府；

在内蒙古西部建立了以德穆楚克栋鲁晋为首的伪蒙古自治政府。

伪蒙古自治政府的行政区划包括：旧察哈尔的 8 个旗，锡林郭勒的 10 个旗，巴音塔拉的察哈尔西部 4 旗和土默旗等。日本帝国主义还建立了由河北省张北县和包括张北县、乌兰察布盟的商都县、锡林郭勒的多伦等组成的傀儡政府。

日本侵略者派“军管”到这些傀儡政府中充当顾问，进行特务活动，同时还掌握政权和经济命脉。

为达到长期统治，永久奴役、践踏之目的，日本侵略者还在他们所占领的地方建立学校，进行强制性的奴化教育，灌输殖民主义思想，宣扬日、满、蒙亲善。在文化教育上，蒙古族学校，每周只安排 2 课时蒙古语课，其余课程全部用日语讲授，强迫蒙古族学生学习日语。师生的日常用语也必须使用日语，企图用日语同化蒙古，最终达到灭绝蒙古的目的。

为培养日、蒙亲善的走卒、爪牙，日本侵略者极为重视所占领区域内的蒙古人的教育，定期选派蒙古族学生到日本留学。

日本侵略者为使选派留日学生制度化，成效大，还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建立了蒙古留日预备学校，其经费来源是：（1）由日本派往边疆地区的兴西委员会的兴西院蒙疆联络部出部分经费，每人每月 100 日元；（2）由蒙疆政府兴蒙委员会出部分经费，每人每月 95 日元；（3）曾担任过蒙疆政府事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吴鹤龄建立后援会，向王公、贵族和军官集资，支援留日预备学校，每人每月 90 日元。蒙古学生必须在留日预备学校学习 2 年，成绩合格后才能被批准赴日留学。据初步统计，

从留日预备学校到日本学习的蒙古族学生先后共有 83 名。1941 年 18 名，1942 年 25 名，1943 年 20 名，1944 年 20 名。赴日学习的学生，首先必须在日本早稻田学校学习整整 2 年，成绩合格后，才能选择自己所喜欢的学校学习^①。

从留日预备学校到日本学习的学生多出生于蒙古的“豪门望族”，如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岸门布和（乌古廷的弟弟）、吴鹏龄（吴鹤龄的弟弟）、仓都固令、乌云额德尼、鄂嫩日图等。

作为翁牛特旗右旗王爷的后裔，鲍洪举也加入了赴日留学的行列。

伪满洲国初期，蒙汉杂居的地方实行的是“旗县并存，蒙汉分治”的政策，本来在辛亥革命后，关外的蒙古王公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政权，但是，这些贵族仍握着土地和奴隶占有的特权。而在伪满洲国中期，赤峰又改县为翁牛特右旗，把王爷或其后代请出来当旗长。翁牛特右旗最后一代“世袭罔替”的王爷色旺札布，身后无子，伪满当局只好物色王爷本族近支来接替旗长职务，然而，没有合适的，只好选了王爷远支的年龄相当的小公爷斯琴朝格图（杨修纯）暂时充当翁牛特右旗旗长。远支不如近支更合适。鲍洪举家是色旺札布王爷的近支，于是就受到了日本人的关注。

鲍家的祖先是老王爷的二弟，鲍家居住在王爷迁居牛家营子王府之后留给族人住的地方，称为“老府”。鲍洪举的祖父

^①额力敦络：《赴日学习前后片段记》，载《苏尼特右旗文史资料》，1987 年印，第 78—79 页。

鲍国荣，排行第4，主持家务。鲍洪举的父亲鲍文德，有两个哥哥，无子。鲍洪举是鲍家12口人中的独生子。14岁的鲍洪举成了未来旗长的合适人选。加之，从1940年开始，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巩固他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削弱蒙古王公的封建特权，在蒙旗地区推行所谓的“土地奉上”，即蒙古王公把土地献给皇帝，租佃户把地买下，蒙民裕生会用租佃户买地的钱为蒙民办社会福利事业，如给蒙民开医院、办学校，送蒙民子女到日本留学等。

14岁的鲍洪举，送到日本培养几年，回来之后正好接替祖业，于是在日本侵略者的授意下，在蒙民裕生会的资助下，鲍洪举被送往日本本州静港县的田方郡开始了留日学习生涯。因为小学刚毕业，无法入日本的高等学校，所以，鲍洪举先被安排在田方郡的下野小学，读两年高小课程。1942年3月，鲍洪举升入了静港县田方郡鸠山高等学校。学制5年，相当于我国的高中或中专。学校设5个年级，每年级有4个班，每班学生40人。大部分学生是日本人，但是，各年级也都有些从日本殖民地来的外国人，如朝鲜的、伪满洲国的，台湾的留学生。

伪蒙古自治政府派遣的留学生在学期间，与日本学生一样，学习修身、国文（日文）、数学、地理、历史、物理、化学、生物、英语和汉语（日本读法的古汉语）。这些课程都排成课表，由专科老师讲授，每天上6节课，每节课40分钟，其余时间由学生在宿舍自习。课余时间也搞些文、体活动。每学期期中、期末各举行一次考试，公布成绩，重在给学生打好文化基础，准备升入大学深造，成为上层统治人才。

日本学校对学生（包括蒙古留学生）的教育，主要靠校长、学务、老师的教导和学校校规的要求来实现，强调礼仪、遵从、自立、自强、忠君、报国的武士道精神，凡是重大节日和天皇寿诞都要举行集会，遥拜皇宫或参拜神社，届时还要大讲“大东亚圣战”和“武士道精神”。贯彻校规校纪严明，违者必惩。通过“修身”课，系统地进行纲常伦理、孝悌忠信等教育。

伪蒙古自治政府派遣的留学生的经济来源，由蒙民裕生会寄钱给日本东京的满洲大使馆，再由大使馆转交本人，每半年1次，每次100日元。除去食、宿、学费等开销，便所剩无几。

伪蒙古自治政府选送的留学生，因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较少参加政治活动和联谊活动，与其他中国留学生接触较少。

在整个学习期间，日本人除了向蒙古留学生灌输殖民主义思想之外，还经常挑拨蒙汉民族关系，千方百计挑起蒙汉学生之间的仇恨和不和，引起激烈纷争，以便坐山观斗“虎”斗，坐收“渔人”之利，由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蚕食中国的狼子野心。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在日本学习的蒙古族学生也纷纷回国，投入到祖国的怀抱，为国家的兴盛、民族的发展贡献力量^①。

^①鲍洪举：《我到日本留学始末》，载《内蒙古赤峰市郊文史资料选集》第1集，1988年印，第66—70页。

2. 来自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留日生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中国东北后，又立即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华北。

当年华北包括冀、察、绥、晋、鲁5省和平津2市地区，在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特别是这一地区的丰富物产资源和广阔市场，早已为日寇所垂涎。1933年初，日本关东军以四个师团兵力加上伪军共10万人，发动了对华北的侵略战争。1月3日，日军占领了山海关，2月底至3月初，又武装占领热河省。接着，日军越过长城，侵入河北省冀东地区。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国民党政府实行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使战争一败涂地。1933年5月，日军进一步威胁平津。国民党政府为图苟安，竟然放弃抵抗，请求停战，并于5月31日，与日本关东军签订了《塘沽协定》。默许了日本侵占东北、热河的合法化，而且使日本获得了长城以南地区的支配地位。使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与华北连接的咽喉地带置下了有力的据点，使华北门户大开，随时可进占冀察，夺取平津。

《塘沽协定》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因当时与英、美、苏之间矛盾的加剧、东北统治不稳固、日本的战争物资准备不足等内外交困的矛盾，侵华策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此以前，日本对东北、热河等地的侵略都是武装军事占领；而在此以后对华北的侵略，则变成了以“政治谋略”为主，即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借以分裂中国，侵吞华北。

1935年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在日本特务机关的一手策

划、导演下，于通县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是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关内扶植建立的第一个傀儡政权。从此，冀东的通县、怀柔、顺义、昌平、平谷、三河、香河、宝坻、宁河、蓟县、玉田、丰润、滦县、遵化、迁安、卢龙、昌黎、乐亭、抚宁、临榆、兴隆、密云等 22 县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冀东伪政权统治长达 10 年之久。

伪政权在冀东地区的文化教育政策，是和它的军事、政治进攻密切配合的。在冀东统治地区，日伪政权推行奴化教育和反共以及各种欺骗宣传，企图达到其“掌握民心”的政治目的。在冀东的教育行政机构和各类学校中，教育大权都控制在日本“顾问”的手中，使教育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在各级各类学校，日语被列为必修课，经书和“修身”是主要课程，历史、地理等课本被肆意篡改歪曲，凡有爱国思想的内容全被删掉。用奴化教育，来宣扬封建主义的奴隶道德，磨灭学生和民众的反抗意识，使其甘当日本统治下的“顺民”。日本侵略者还提倡“尊孔”、“祀孔”的活动，打着“复古”的旗号，来欺骗和毒化人民群众。

为加速与日本的同化，促进所谓“东亚”文化之发展繁荣，冀东日伪政权硬性规定中小學生必须学习日语，以期达到普及。为此，1938 年 1 月，日伪政权还专门创立了“冀东日语教员养成所”培养日语教员，推广日语应用。

冀东日伪政权的奴化教育从中小学抓起，同时，为加速殖民化人才的培养，还将青年学生选送日本留学深造。

1938 年 1 月，冀东教育厅下发了《选派留日官费学生办

法及招生简章》。

冀东政府选派留日官费学生办法

(1) 考试机关：冀东政府教育厅先举行考试选派之。

(2) 选派名额：12名。

(3) 投考资格：凡高级中学以上学校毕业而有冀东籍之学生及冀东公务员之子弟。

(4) 选派科目及人数之支配：

A. 农科3人。

B. 矿科2人。

C. 医科1人。

D. 工科2人（机械1人，土木1人）。

E. 商科1人（银行）。

F. 师范3人。

投考生于报名时须注明愿习何科，一经录取选派后不得中途改科。

(5) 考试科目：分国文、英文、几何、三角、大代数、物理、化学、生物及试体格检查。

(6) 指定之肄业学校：凡日本官立专门学校、各大学专门部及教育厅选定之私立大学本科。

(7) 预备期间：自1938年3月至1939年3月止为预备期间，被选派者须在日本东京预备日语及补习其他重要科目，并应于1939年春季按照第6条所指

定各学校招收新生时受各该校之入学试验。

(8) 官费数目：选派之学生出国时每名给川资国币百元，服装费百元，预备期间每月给国币 50 元，入学后给国币 60 元，每年分 4 期汇发。

如已逾预备期间而尚未考入指定学校者，得以自费再继续预备一年，经指定学校录取后仍得照补官费。

(9) 留学年限：以指定学校规定之肄业年限为标准。

(10) 招生简章另定之。

(11) 本办法自呈准之日施行。

冀东政府选派留日官费学生招生简章

(1) 名额：男生 12 名。

(2) 资格：凡高级中学以上学校毕业而有冀东籍之学生及冀东公务员之子弟。

(3) 年龄：自 18 岁至 25 岁。

(4) 选派科别及人数之支配：

A. 农科 3 人。

B. 矿科 2 人。

C. 医科 1 人。

D. 工科 2 人（机械 1 人，土木 1 人）。

E. 商科 1 人（银行）。

F. 师范 3 人。

报考学生于报名时须注明愿习何科，一经录取选派后不得中途改科。

(5) 指定之肄业学校：凡日本官立各专门学校各大学专门部及教育厅选派确定之私立大学。

(6) 预备期间：自 1938 年 3 月至 1939 年 3 月止为预备期间，选派之学生须在日本东京预备日语及补习其他重要科目，并应于 1939 年春季按照第 5 条所指定各学校招收新生时，受各该校之入学试验。

(7) 官费数目：选派之学生出国时每名给川资百元，服装费百元，预备期间每月给国币 50 元，入学后给国币 60 元，每年分 4 期汇发。

如已逾预备期间而尚未考入指定学校者，得以自费再继续预备一年，经指定学校录取后仍得照补官费。

(8) 留学年限：以指定之学校所规定肄业年为标准。

(9) 报名手续：在籍学生向各该籍县政府报名，寄居者向所在地县政府报名，公务员向该机关报名，并各备具文凭、本人单身 4 寸照片 2 张、服务证明履历书、志愿书、保证书，缴由报名机关，于 2 月 20 日以前汇报送教育厅。

(10) 报名时间：自即日起至 2 月 23 日止。

(11) 考试科目：分国文、英文、几何、三角、大代数、物理、化学、生物及口试体格检查。

(12) 考试日期：

2月23日体格检查。

2月26日上午：国文；下午：英文

2月27日上午：数学（几何、大代数、
三角）

下午：生物

2月28日上午：物理、化学

下午：口试

(13) 考试地点：唐山冀东教育厅^①。

冀东日伪政权为实施奴化教育的宗旨，鼓励支持青年学生赴日本学习，而断绝了赴欧、美留学的后路。使冀东的青年学生在毕业就意味着失业，深造又无国可去，且已被逼掌握了日语的前提下，只能赴日本留学，以获取谋生之本、报国之机。

随着冀东日伪政权派出的留学生的增多，冀东伪政权又于1941年10月31日颁布了《华北各省市考送留日公费生办法纲要》：

第1条 各省市考送留日公费生均依照本纲要之规定办理之。

第2条 各省市考送留日公费生必须思想坚定身体健康并籍隶本省市者。

第3条 各省市考送留日公费生须有下列资格之

^①南开大学历史系、唐山市档案馆合编：《冀东日伪政权》，档案出版社1992年，第540—565页。

一者：

(1) 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

(2) 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级中学校或同等学校毕业生。

(3) 省市各机关现任人员年在35岁以下曾服务2年以上成绩优良，经由各该机关推荐者。

第4条 各省市考送留日公费生报名时具有前第1、2两项资格之一者，须呈缴毕业证书成绩证明书履历书保证书最近2寸半身像片，其具有第3项资格者并须呈缴服务证明书及推荐机关成绩证明书。

第5条 各省市留日公费生考取后，应规定限期办理出国手续，并依照公布发给留日公费生留学证书暂行条例请发留学证书。

第6条 留日公费生修习学科年限及所入学校，得由各省市就实际需要情形临时规定之。

第7条 留日公费生经选送到达日本后，应即向驻日办理留学事务机关请求注册，并请发给入学介绍书。

第8条 驻日办理留学事务机关关于留日公费生入学后，应将校名校址学习科目并每学期修业成绩证明书分别呈报。

第9条 留日公费生应发公费数目，由各省市按照下列各项并参酌各该省市财政现状自行规定之。

第10条 留日公费生如有品行不端成绩不良等情事，得停止支給留学费，其情节重大者应即取消留

学资格，勒令回国，并得追缴已领各费。

第 11 条 各省市考送日公费生，考试科目暨本纲要本之施行细则，由各省市拟订报送由教育总署审定后实施。

第 12 条 本纲要自呈准公布之日施行。

在抗日战争时期，处于冀东伪政权下的冀东青年学生，既无法到欧、美留学深造，也无法到国统区去升学进修，唯一的求学之路，只有赴日本留学，这既可以暂时摆脱亡国奴的窘境，又可以到科学的王国自由地遨游，还可以借日伪政府提供的经费完成学业、并领略异国风情，这无疑对冀东的青年学生，尤其是出身平民阶层的青年学生有较大的吸引力。许多青年学生竞相争考赴日公费生，以完成出国留学的宿愿。

但是，公费的赴日留学名额毕竟有限。报考条件和要求又极苛刻，众多冀东青年只能“望洋兴叹”。冀东留日学生由于处于防共、反共、联日的白色恐怖氛围中，因此，多数冀东学生埋头书本，不问政治。刻苦求知，使他们受益匪浅，成为后来祖国建设和发展的难得人才。也有的冀东留日学生，难忘国耻，积极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之中，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3. 来自山西沦陷区的留日生

日本侵略者侵入山西后，为确保其占领区，在政治上实行“以华制华”政策，大力扶植傀儡政权，把伪军当做殖民统治的工具；在经济上，实行“以战养战”，对沦陷区进行疯狂的

经济掠夺和压榨，以供其长期侵略战争的需要；在思想文化方面，加强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以摧毁中国人的民族意识。

沦陷区山西的思想文化教育完全由日本政府的“兴亚院”和在华联络部控制。他们全力排斥任何有中国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的文化教育和宣传，极力进行“中日亲善”、“反共防共”、“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思想灌输，并利用中国封建伦理道德来加强奴化教育，甚至采取开办各种师资培训班、派遣日籍教师来华以及选派中国青年赴日“留学”等办法，严格控制学校和中国青年的思想。

1938年6月27日，日本侵略者一手扶植、炮制的傀儡政权“山西省公署”成立。省公署秉承其主子——日本侵略者的旨意，在恢复中小学教育、实行奴化教育方针告一段落后，作为推行奴化教育的重要一环，选派留日学生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

1939年，伪山西省公署拟定了“山西省选送留日学生办法”，并经省公署会议通过，决定自1940年起，每年选送公费留日学生10名。

“选送留日学生办法”中，对留日学生的考试、选取、待遇及管理事项均做了具体规定。有关留日学生的选送事宜由教育厅负责承办。

选送留日学生的目的是“造就专门学术人才”。该项办法中规定：凡山西籍的高中毕业生，年满19周岁的男女均可报考，并分文、理两科，可根据个人志愿报考。国文、日语、数学为必考科目；报考文科者，加试历史、地理；报考理科者，加试物理、化学。考试时间为每年暑假期间。办法中还规定：

经考试合格者，由省公署发给留日公费生证明。到达日本后，可凭此证明，向华北教育总署驻日专员办事处报到，并按期向办事处领取公费津贴。

每年的七八月，临近考期，就由教育厅负责，组成“考选委员会”，由伪省长担任主任委员，教育厅长任副主任委员，并聘请所谓学术界名流负责命题和评卷。考场设在伪省署自省堂内，仪式仍沿袭清末、民初的一套习俗。伪省长任主考官，披红戴花，对考生逐一点名，然后进入考场，以示隆重。至于命题官，考试之前都得“入闱”，不得再和外界接触。出榜时，在鞭炮声中，将榜高悬于伪省署大门前的照壁上，并将喜报送到中考学生的家中。

1940年—1943年间，伪山西省公署先后选派了4批公费留日学生。

1940年选派的有阮培、吴宝田、吉晋生、陆稚存、苏士铭、苏昂、吉自殷、柳玉亭、阎昌令、赵顺生等10人。

1941年选派的有武晋焯、王瑜、李兆勃、罗漾明、裴敬、田维成、王运昌、贾滨、张子义、张庸伍等10人。

1942年选派的有刘大鹗、宋蓬莱、杨名时、崔汉明、崔长风、续健源、梁崇仁、杨昆玉、高佩琚等9人。

1943年选派的有李宜潞、白灵之、郭瑾琦、乔鸿、史振心、孙凤翔、石青山、杨允丰、吉人善、何长青、吉周凯等12人。

以上共计41人。此外，还有由伪华北教育总署派出去的贾克明等7人，自费去的白驹等2人。1943年度，还从在职人员中选派了俞钟灵、车湘岚等四五个人。

当时，大同、阳高等雁北 13 县在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辖区内，也派出了数名留日学生。

公费赴日留学的名额毕竟有限，很难满足山西青年学生的留学愿望，于是，自费留学应运而生，许多家境殷实的青年以自费的形式，圆了赴日留学之梦；也有的青年不愿受政府派遣留学生的各种限制，甘愿自费留学，以求自由。因此，自费生成为留日生中不可忽视的一族。

为了加强学生的留日预备教育，从 1942 年开始，山西省公署特别在太原日本中学内设立了留日学生预备班，即留日特设班。在校期间，留学生单设一班，主要课程是报考日本高等学校的应试科目。教师全部由日本中学教师用日语讲授。课外活动都和日本学生在一起。如“东方遥拜”、“参拜神社”、“勤劳奉仕”、“精神训话”以及“军事训练”等一些对日本学生的军国主义教育，也加到了留学生身上。留日学生在接受奴化教育的同时，又蒙上了一层法西斯教育的色彩。在留日学生预备班，经过 3 个月的短期培训，再赴日应试。

临行前，伪省长要设宴欢送，并邀请日本顾问、军司令官等参加，给予指示。留学生也要回拜辞行，表示“感谢”。

山西留日学生的赴日路线是乘坐火车，经北京，出山海关，进入伪满洲国，跨过鸭绿江，到达朝鲜境内，再经平壤、汉城，抵达朝鲜南端的釜山。在釜山换乘轮船东渡，于日本的下关登陆。然后再换乘火车，直达东京。

在日本，对留学生的管理主要是由伪华北教育总署驻日专员办事处负责，专员为方纪生。但是，实际上，有关留学生的住宿、学习及日常生活均归学生自理，“办事处”主要承担办

理学籍及发放津贴。至于对学校的选择，完全根据个人的志愿和水平报名应试。当时，山西省派遣的公费、自费学生都抱着“镀银”（时称学生去欧美留学为“镀金”，去日本留学为“镀银”）的思想，一些学生考进了日本名牌大学，如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工业大学等；一些学生考进了早稻田大学、法政大学、庆应大学、奈良师范学校、横滨高等工业学校、东京高等兽医学校等。大部分学生留在东京，部分学生去了外地。

1943年，伪山西省公署还以“日晋会”的名义在东京涩谷区购置了一座小楼，起名“日晋寮”供部分山西省留学生住宿。先后由中山茂、山内正树负责。在此期间，“日晋会”还召集山西留学生举办过几次宴会、游园及参观等活动。“日晋会”是由伪山西省公署顾问甲斐拉拢一些在山西工作过的日本高级官员组成的。名为联谊，实际上是企图扩充势力，便于勾结和加强对山西的统治。“日晋会”对留学生的一些活动，一方面拉拢留学生，以使他们效忠于日本；另一方面，以照顾留学生为名，在日本购置财产，据为己有。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留在日本的山西学生，曾找过甲斐，提出“日晋寮”的产权问题，甲斐推说并非伪山西省公署出资购置，而当时国民党驻日机构也未予置否，一直是悬而未决。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山西省伪教育厅为了使本省留日学生“认识时局，保持镇静，安心求学”，发表了告本省留学生书。但是，当时日本国内日益陷入困境，吃、用都实行配给制。特别是进入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尾声，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节节败退，渐进穷途末路，日本本土连续遭到美军空军的轰炸，东京到处是硝烟、火

海，日本国内人心惶惶，留学生也几无宁日，无处安身，更难继续求学，只得相继回国。当时仅有6人留在日本未归，其余的山西留学生均回到山西。由于返国后的留日生都不属于“学业有成，荣归故里”之类，再加上山西的日伪政权也已惶惶不可终日，自顾不暇，对留日归国学生没有给予任何安排。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条件投降，日伪政权的瓦解，留日归国的山西籍学生，也渐渐找到了用武之地，在各行各业，为祖国建设和发展各显其能，发挥了巨大作用。如山西籍的留日生贾克明成为著名医学专家；崔汉明在日语教学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此类人才不胜枚举^①。

山西的留日学生多数都成为山西省，乃至全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中的佼佼者。这是伪山西政府派遣留日生的初衷所不曾设想的。

4. 来自汪伪统治区的留日生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

汪伪政权建立后，每年都派遣青年学生赴日留学。留日学生主要从中国青年模范团干部培训班、中央青年干部学校等院校招收。经文化考试和身体检查，确定录取人员。每年为10余人。

以1943年为例，中国青年模范团第3联队留日青年队由12名学生组成，其中从中国青年模范团干部培训班选拔4人，

^①崔汉明：《沦陷期间的山西留日学生》，载《山西文史资料》第56辑，第142—145页。

从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武汉分校选拔 8 人。队长是宋超，20 岁左右。顾问是日本人佳藤匠，25 岁。

日本帝国主义接收汪伪的“新中华”留学生，并不是要培养高级科技人才或文化教育工作者，而是培养直接服务于日本的劳动者和驯服工具，尤其是农业生产人员。因此，留学生出国之前，首先被安排到黄陂滢口的一个农业专科学校实习。这个学校的教师全是日本人，他们给即将赴日的留学生灌输的都是“王道乐土”、“武运长久”等军国主义思想，另外也讲授一些农业知识，安排学生到大田劳作，熟悉各种农活。实习 1 个月，在日本顾问的带领下，留学生从汉口出发，经南京、天津、沈阳等城市，转道朝鲜，从釜山乘海轮，经过 8 个小时的航行，到达日本的下关港，转乘火车至东京，再到目的地内原。

汪伪政府派遣的公费留日生就读的学校主要在日本国民高等学校。校址在茨城县的内原。

日本国民高等学校设有 4 个部：少年部、青年部、女子部、研究生部。学生按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分到各部学习。汪伪政府派遣的留日生全部在青年部学习。学校除了进行奴化教育以外，大部分讲授农业知识，如作物栽培、农场管理、防治病虫害等。所发教材是日文，教师授课全用日语。

日本当局无意培养高级农艺师或高级管理人才，因此，农业基础理论讲授极少，大部分时间都是安排留学生参加劳动，整田、开沟、施肥、播种、酱油制作、豆腐制作、榨油等方法。让留学生从事简单而繁重的体力劳动，留学生成了廉价的劳动机器。

汪伪派遣的公费留日生的居住、饮食条件极差。由于连年战乱，日本境内，粮食、物资严重短缺，留日学生只能吃到低劣的配餐，而且还常常吃不饱。

汪伪政权派遣的留日生是“中日亲善”的产物，按理应该受到礼遇，然而，恰恰相反，这些留日生却事事、处处都受到歧视和欺侮，尝尽了苦涩的亡国奴滋味。

由于日本人在政治上歧视，在生活中欺侮，使汪伪政府派遣的第3批赴日留学生无法正常地学习和生活，经留学生的强烈要求，于1944年冬退学回国，无功而返^①。在此之前，汪伪政权派遣的留日生学业有成的甚少。

与汪伪政权派遣的公费留学生相比，自费留日学生，所受的局限要少一些。就学的院校、所学的专业可以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学有所成者居多。

江苏省靖江就有多人赴日学习。张云和赴日前，曾任无锡师范、常州中学美术教师，赴日后，入东京高等工艺美术学校图案系学习，专攻工艺图案。就教于宫下孝雄、杉山丰吉等教授，成绩优异，受到好评。

商启迪毕业于苏州美专西画系，素描、油画颇具功力。赴日留学后，他重点学习油画，兼学工艺美术。他勤奋好学，图案画作品深得日本教授的赏识。

毕业于上海法政大学、获得法学士学位的陈湘，赴日后，进入日本大学研究刑法，并刻苦攻读俄语、德语、法语，以便

^①张崢：《留日琐记》，载《应城文史资料》第2辑，1988年印，第120-126页。

研究其他各国的法制。

陈湘的上海法政大学同学、法学学士盛仁东，东渡后，进入日本大学研究地方自治，对所学专业有独到的见解。

无锡竞志女中教员刘亚钟赴日后，进入日本专修大学学习政治。

上海春申大学毕业的商发尼，进入明治大学，专攻法律。

苏州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毕业的毛文瀚，考入日本大学高等专科专攻教育，获教育学士学位。

学习绘画的张云和留日回国后，曾在常州中学、江苏师范学院任教，出席过全国工会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58年，任南京艺术学院染织教研室主任，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丝绸、棉布、印花、织花的图案设计人才。

盛仁东回国后，即参加抗日战争，1949年以后做行政领导工作和统战工作。

刘荣森曾任河北省石家庄市棉纺七厂厂长，总工程师，为发展纺织工业作出了贡献。现任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第 三 节

萧条时期赴日留学的不同归宿

1. 追求崇高的革命家、外交家

1938年—1945年，是中国现代赴日留学的萧条期，也是日本侵略中国尤甚、中国人民抗战最烈的时期。

赴日留学的特殊背景，世界格局的几番变迁，求学期间的

各种真切感受，使萧条时期的留日学生，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自然也有了各不相同的人生归宿。

早年留学日本的东京大学哲学系高材生乔冠华，因为组织、参加中华留日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被日本当局驱逐出境。回国后，乔冠华的救国济民精神始终不悔，继续从事反战爱国运动，关注世界形势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内著名的政治家和活动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的身份活跃于外交战线上，成为国际舞台的风云人物。

从上海同济大学赴日留学的赵安博，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即东京帝国大学预备班。学习期间就参加“中华同学会”组织的爱国进步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不惜学业前途，满怀爱国热情，与郭沫若等爱国者同船归国。回国后，看透了蒋介石国民党假抗日真内战的实质，于是参加了八路军120师359旅，与王震共赴抗日疆场。在对日作战中，发挥自己日语好的优势，从事对日军士兵的反战宣传工作，并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任副校长，改造、教育日本军队的俘虏。日本工农学校毕业的日军俘虏，日后成了抗日战争中一支独特的反战队伍，成了中日和平的桥梁和使者。赵安博以自己的能力和卓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屡建奇功，全国解放后曾任中联部副部长^①。

出生于广东的陈辛仁，1933年夏天，考入北平中国大学英文系，受进步文化思想的引导，陈辛仁参加了北平左翼联盟文艺研究部工作。后因“九一八”事变爆发，北平的左联组织

^①钟少华：《早年留日者谈日本》，第34—37页。

遭破坏，陈辛仁的组织关系断了，并受到宪兵的监视。了解到东京的中国左翼文化联盟仍在开展活动，陈辛仁又有良好的日语基础，老同学又愿慷慨解囊支付费用，陈辛仁便来到了日本政治文化的中心——东京。继续从事左联的文化宣传工作。主办左联刊物《质文》，先后发表过郭沫若、鲁迅、田汉、茅盾以及日本作家秋田雨雀的文章，对当时的文艺现状、文学理论的发展、国内外政治形式进行分析探讨。陈辛仁等还与郭沫若、鲁迅等左翼文化战士将日本、苏联等国的进步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翻译成汉语，向国内介绍宣传。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的步步蚕食，国内抗日救亡运动急切需要更多的志士去奋斗，鉴于此，经左联的批准，陈辛仁等人离日归国，直接到新四军军部做政治工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陈辛仁任福建省政府副主席、驻外四国大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以自己渊博的学识、进步的思想，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①。

孙平化也是那个特殊时代成长起来的政治家、外交家。孙平化是1939年进入东京工业大学预科留学的。入学不久，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救亡途径，他完全放弃了学校的课程，将全部力量投入到阅读社会科学的日文书刊，即所谓的左翼禁书。接受了抗日进步思想，受其感召，于1943年从东京工业大学本科退学返国，参加抗日战争，走上了与所学工业专业截然不同的革命道路。

^①钟少华：《早年留日者谈日本》，第34—36页。

从这个时期一些留日学生身上可以发现，特殊的历史背景，形成了留日学生特殊的人生历程；马列主义思想的引导、进步文化的启迪，决定了留日学生人生的道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忧民的品质使中国的抗日队伍又多了一批精英，使中国政治舞台又多了一分华彩，使中国的外交战线又多了一支“奇兵”。

2. 学而有成的导师、学者

许多战乱时期的留日学生纷纷就读于各种师范学校，他们回国后，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师资匮乏的局面。抗战爆发后，不仅是学习师范专业的留日生从事教育工作，而且，学习其他学科的留日学生回国后，进入教育界的人也不少。据载，在留日归国学生中，从事教育者占总数的40%以上，居各种职业之首。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从全国公私立专科学校校长的学历统计中发现，留日归国者居多^①。

留日学生的大批归国，充实了困难期间的高校师资队伍，使战时的中国教育在大后方弦歌不绝。

据1931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统计，此时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有教职员10300人，其中留学出身者占39.8%。1936年10月，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总数上升为11400人，其中具有留学资格者5004人，约占总数的44%。1941年至1947年，国民党教育部对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教员作了资格审

^①孙石月：《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年，第324—327页。

查，审查合格的教员共 8227 人，其中，1941 年 2 月—1944 年 3 月间审查合格的教授、副教授为 2448 人。根据《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名册》（1、2 册），将 2448 人中留学出身的比例列表如下：

科别	教授	副教授	合计	留学人数及其所占比例	
文	351	130	481	259	53.8%
理	412	120	532	431	81%
法	254	85	339	300	88.5%
教	144	55	199	154	77.4%
农	179	77	256	232	90.6%
工	250	75	325	252	77.5%
商	80	37	117	96	82%
医药	134	57	191	152	79.6%
艺术	25	23	48	37	77%

从上表可知，就各科留学出身的实际人数而言，理科最多，法科（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四个系）次之；就各科留学出身所占比例而言，农科最高，法科次之。理科留学生回国无用武之地，只好从教；农科留学生不愿下基层，留恋都市生活，因此也群集高校；法科留学生因仕途拥挤，只好退而从教。各科之中，以文科教授副教授中的留学比例最低。文科中有关外国文史哲方面的师资多从留学生中产生，而有关“国

学”方面的师资，则不少是未曾留学而富有国学功底的大师，如梁漱溟、钱穆等均是。所以，文科留学出身的比例要相对低一些。总计各科教授副教授中留学出身的平均比例，为78.6%。留学生对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而在这些留学人员中，就有相当一批是留日学生。

留日归国学生中，除大部分将自己的知识无私奉献于新一代学子身上外，还有一部分留日归国学生从事科学研究，且卓有成效。

山西省太原市的青年学生贾克明，父亲是早年的留日学生，母亲是从小就生活在日本的华侨，后来考入东京女子大学。贾克明的两个舅舅，各自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和医科。贾克明的父亲在民国初年，由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回到山西省太原市教书。家庭环境和父母的教育，使贾克明有良好的日语基础，高中毕业后，抗日战争爆发，太原无升学之所，报考了北平的燕京大学，录取的专业又不遂心愿。无奈，到北京西城“教育总署”办理了自费留学手续。1939年进入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部，埋头学习知识，钻研医学业务，以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得到东京大学医学部田宫等教授的赞誉。

在著名医学家、日本临床杂志《内科》的创始人冲中教授、日本医学杂志《医学之进步》的创始人绪方教授等人的渊博的知识、严谨的学风、高尚的医德的培养教育下，在医学救国，为民解除病痛的崇高精神鞭策下，贾克明满载收获，于1945年2月回国，投身祖国的医学研究中，成为肝病学专家，为我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努力。现虽已年逾古稀，仍救病不止，研究不辍，工作在北京军区总医院，任内科主任，肝病研

究所所长^①。

中国著名的民俗学家钟敬文，早年即从事中国民俗及亚洲风俗的研究，1930年热心主持“中国民俗学会”的工作，1933年始，与日本的民俗学家松村武雄教授等进行学术交流，并在日本的民俗学刊物上发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为扩展民俗学知识面，于1934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做了人类学家西村真次教授的研究生。与日本民俗学界的权威进行学习、切磋。回国后，历任中山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民俗学会主席，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泰斗。为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为中日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②。

一批批的留日学生归国后，成为了专家，成为了学者。他们，为中国的留日运动增添了重要的实绩。

3. 异彩纷呈的留日学生作家群

留日学生成为作家的人数较多，他们在文学领域里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在留日运动的这一时期，同样也有一批作家涌现。

现代作家、诗人林林，在30年代赴日留学期间就常在东京的左翼联盟主办的杂志《质文》、《东流》、《诗歌》上发表诗歌、评论、散文。翻译海涅的诗、高尔基的文学论文，1949年之后，从事文化宣传、组织工作，曾任中国驻印度使馆文化

^①钟少华：《早年留日者谈日本》，山东画报出版社1996年，第128—137页。

^②钟少华：《早年留日者谈日本》，第24—34页。

参赞，出版诗集《印度诗稿》，并曾任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中日友协副会长等。

颜一烟在抗战爆发回国参战后，写了一系列的作品。两幕话剧《黄花岗》是她写的第一个剧本。抗日战争时期，写作的《秋瑾》在“三八”节首场演出时，邓颖超亲自出席观看，并给予较高评价和鼓励。由她改编的3幕17场秧歌剧《血泪仇》，在解放战争中，很好地配合了当时的土地改革和动员参军运动。优秀影片《中华儿女》是颜一烟在东北电影制片厂任编剧时创作的，在“文代会”上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高度称赞。颜一烟是留日学生作家群中，直接以文艺作品从事反帝反封建宣传的重要作家。她以文学为武器，为正义的斗争擂鼓助威，大造舆论，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坚定了信念。

在留日学生作家群中，忧民族之危亡，怀报国之志向，舍生忘死，为各地抗日战争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代表人物，堪称黄薇。作为新加坡华侨赴日留学生，是留学生中左翼团体的领导成员。抗战爆发后，她在祖国和南洋各国之间，报道祖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事迹。

太平洋战争期间，她在菲律宾主编抗日地下报纸《华侨导报》。整个编发过程是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镇压时期秘密进行的。1942年10月，《华侨导报》几经辗转，在马尼拉郊区建立了秘密工作机关，黄薇负责编辑工作。“导报”的发行网不断扩大，发行份数日渐增多，从第1期的100份，增加到2000多份。导报内容积极，报道求实，引导得体，“许多读者表示读了这张地下小报，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提高了对敌斗争的勇气。”1944年11月，报纸的发行站遭到破坏，编辑部采取

了转移的应急措施，坚持办报。一直到1945年2月，美军进入马尼拉后，《华侨导报》才开始公开出版，由周刊改为日报，由油印改为铅印，为推动进步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①。

纵览这一时期归国留日学生的文学创作，可以发现，他们的文学作品，都有一个最根本、最重要的特征，即反抗侵略，讴歌人民的正义战争。

4. 留日学生的左翼文化运动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国学生留日活动有一个突出特征，即在广大爱国留学生的参与和推动下，中国留日学生的左翼文化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这一文化运动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广大留学生走上救亡道路，而且把数十年里持续发展的留学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在左翼文化运动兴起过程中，留日的中国学生陆续建立了不少具有进步倾向的文化团体。但在30年代以前，这种文化团体数量少，组织的活动少，社会影响不大。

1916年6月，正在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读书的郭沫若，与8个留日学生组织了夏社，搜集日本报纸的侵华言论，出版刊物，进行反帝爱国的宣传活动。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记载，1923年10月间，他在明治专门学校读书时，参加了九州帝国大学的一个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被指定为读的第一本书。1929年夏，为养病而旅居日本的蒋光慈，与留日学生冯宪章等人于9月组

^①黄薇：《回到抗战中的祖国》，新华出版社1987年，271—277页。

组织了太阳社东京分社。参加的人员还有伍劲峰、古公尧、胡晓春、任钧、楼适夷等人。太阳社是主张革命文学的进步团体，东京分社成立后，组织了进步的文化活动。他们研究国内文坛情况，也涉及到日本文艺界现状，与日本进步文艺家藏源惟人、藤枝丈夫接触，探讨革命文学的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掀起了左翼文化运动，组成了很多进步团体，比较活跃的有 30 个左右。^①其中主要的有如下一些：

东京“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930 年成立后，很快在日本组织了东京“左联”。“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左联”的留学生绝大部分返回中国，活动即告停止。1933 年林焕平到东京后，于 1934 年春恢复了东京“左联”的活动，参加的成员还有林为梁、陈一言及后来归国成为烈士的邱东平等人。

社会科学研究会。是在“读书会”基础上由东京的留学生于 1935 年上半年成立的，成员有解树椿、程明升、雷任民、杨章武等 40 余人。“社研会”是学术研究团体，但它拥护中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

留日世界语者协会。黄乃、丁克、李佩呈等人于 1935 年在东京成立。

东京“文化座谈会”。1935 年由“左联”成员林为梁（林基路）联络官亦民、梁为林、魏猛克、侯甸、陈一言等留日学生组织成立，参加者共有 100 多人。

马克思主义读书会。裘进、周平、潘宗周、薛涛（潘莫

^①《文史资料选辑》第 109 辑，第 128 页。

奇) 4人 1935年成立于东京。他们先后把“读书会”改为“反帝反法西斯同盟”和“现代问题座谈会”，参加者达百人。

新兴自然科学者同盟。1935年下半年由早稻田大学学电工、化学、建筑的程明升、王闾西(原名王之坎)、赵冬日3人发起成立于东京。

社会科学座谈会。1935年7月由张廉光、熊唯知、冯基民(冯肇源)、姚耐等留日学生发起成立。

世界编译社。1936年1月由社会科学座谈会的熊唯知、解树椿、王孔昭等人发起成立，社员有五六十人，郭沫若是名誉社员。

留东妇女会。1936年成立于东京华学会。它是中国留日女学生公开的进步组织“留东妇女社会科学座谈会”与“留东妇女问题座谈会”合并成的，主要成员有李玉如、丁晓林、董启翔、毛掬、裴曼娜等人，会员有四五十人。

中国留日戏剧协会。是1936年春由中华同学新剧公演会、中华戏剧座谈会、中华国际戏剧协会合并成的。干事会成员先后有林林、杜宣、吴天、任白戈、李月轩、陈北鸥和叶文津、颜一烟、张水华、蒋新民等人。

留学生的左翼文化团体还有现代问题座谈会、拉丁化座谈会，日本问题座谈会等。

留学生的左翼文化团体，举办了大量活动，这些活动都明显地具有抗日救亡性质，其活动主要有：

第一，创办刊物，出版书籍。东京“左联”先后办有《东流》、《杂文》、《诗歌》3个刊物。旅居日本的郭沫若积极支持《东流》的发行工作，茅盾还为《东流》的第1期在上海发表

评论进行介绍。《杂文》主要是发表战斗性较强的文章，郭沫若曾在《杂文》上发表《孔夫子吃饭》、《孟夫子出妻》、《秦始皇之死》等文。《杂文》还发表过鲁迅从国内寄来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论第三种人》等文章，加强了《杂文》的战斗性。文化座谈会先后办有《未名庄》、《文艺科学》等杂志。通过办杂志，团结了众多的具有进步思想的留学生。新兴自然科学者同盟还开辟了国内的文化战场，他们在河南开封的《民国日报》上主办《自然科学》副刊。曾翻译《数学论》、《马克思主义与微分学》、《唯物辩证法》、《自然科学》等，后因抗战爆发未全部译完。东京的世界编译社成立后，又成立了北平世界编译社作为分社，出版了张友渔的《日本新闻发展史》、阮均石译的《科学的自然观》等著作。留东妇女会在《留东新闻》周刊上办了《留东妇女》副刊。留学生通过这些公开出版发行的杂志与书籍，扩大了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宣传了进步的文化思想。

第二，举办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与读书活动。有的左翼文化团体是在原来的各种读书会基础上成立的，这些团体成立后，又结合本团体的特点，举办各种类型的座谈与读书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讨论文化与政治问题，提高对社会与自我的认识。社会科学研究会会有计划地组织会员举办座谈会，团结更多的留日学生参加革命斗争。留日世界语者协会表面上是学习世界语的团体，实际是通过世界语的学习，启发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世界语的学习形式多样，有时请日本的世界语学者讲授，有时按地区划分小组进行，由世界语水平较高些的人辅导低些的人。采用的教材是中垣虎儿郎编写的《普罗世界语讲座》，

书中的内容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其中介绍了“五一”劳动节和“三八”妇女节，介绍马克思、列宁、十月革命、巴黎公社，介绍了中国的广州暴动和海陆丰苏维埃政权，还有《共产党宣言》的片断。这是一本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启蒙书，通过它的学习，人们可以了解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使参加世界语者协会的会员，都具有很高的革命觉悟。文化座谈会是根据东京“左联”更多地组织团结留日学生参加抗日救国斗争的意愿建立的，其目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理论骨干，团结进步的留日学生，反对国民党的卖国、独裁、内战方针。他们先后组织座谈了：无产阶级文化的战斗作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中国文学界“革命文学”与“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争问题，西安事变问题等。这些活动都是结合国内革命运动进行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现实性。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组织成员学习过季米特洛夫在第三国际的报告《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反帝统一战线》、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主张全民族统一抗战。新兴自然科学者同盟的“宗旨是团结与组织左翼自然科学者，进行马列主义自然科学理论研究，从事革命的和自然科学的实践，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而奋斗。”^①这个“同盟”成立之初，他们每两周举行一次学习讨论会，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苏联的新兴自然科学论文集。世界编译社更多的是座谈和研究国内和国际共

^①王闾西 赵冬日 胡育德：《关于新兴自然科学者同盟的情况》，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09辑，第129页。

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国内群众革命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

第三，戏剧演出活动。为了更广泛地宣传进步文化思想，左翼文化团体组织爱好戏剧的留学生搞了多次戏剧公演活动，中华留日戏剧协会的活动最为突出。演出情况如下表：

中国留日学生戏剧演出活动一览表

演出团体	编剧人	剧目名称	时间	地点
中华国际 戏剧协会	袁牧之	一个女人 和一条狗	1935年 11月6— 7日	筑地小剧场
	马彦祥	打渔杀家		
	久米正雄	牧场兄弟		
中华国际 戏剧协会	格雷歌里	月亮上升	1936年4月 18—19日	筑地小剧场
	斐琴	夜明		
中华戏剧 座谈会	吴天	决堤	1935年11月 19—20日	筑地小剧场
	果戈理	视察专员（据 《钦差大臣》改）		
中华留日 戏剧协会	田汉	洪水	1936年5月 9—11日	神田一桥 讲堂
	白薇	姨娘		
中华留日 戏剧协会	高尔基	孩子们		
中华留日 戏剧协会	田汉改编	复活	1937年1月 11—13日	一桥讲堂
中华留日 戏剧协会	易卜生	娜拉	1937年1月 29—31日	筑地小剧场
中华国际 戏剧协会	曹禺	日出	1937年3月 19—21日	一桥讲堂

第四，公开集会活动。留学生的左翼文化活动以小团体活动为主，公开集会情况少，但有两次集会活动却在留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是郭沫若的讲演活动。1935年10月5日，几个左翼留学生文化团体，邀请避难于日本的郭沫若作了《中日文化的交流》的演讲，地点在东京神田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郭沫若回顾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发出了：“我希望我们中国人，利用我们的优秀的头脑，批判地接受既成文化的精华，努力创造出更高一级的新的文化”号召。^①活动是在日本警察的监视下进行的，右翼学生向台上扔苹果等进行捣乱。郭沫若冒着坐牢的危险为留学生作演讲，极大地鼓舞了学生们的斗志，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二是悼念鲁迅的活动。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的消息传到日本后，留学生们无限悲痛。他们以东流文艺社、质文社、中华戏剧协会、文海文艺社、中华留日世界语者协会等团体的名义，于11月3日在日华学堂举行追悼鲁迅的大会。受留学生之邀，郭沫若再次冒险赶来进行了演说。他满怀激情地说：“呜乎鲁迅，鲁迅鲁迅，鲁迅之前，既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呜乎鲁迅，鲁迅鲁迅。”^②郭沫若的演说受到了留日学生的热烈欢迎。这次公开集会活动，有700多中日文艺界人士参加，再一次给左翼文化运动注入了巨大的力量。

第五，参加进步的斗争活动，1935年日本进犯华北时，社会科学研究会组织群众散发传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①龚济民 方仁念：《郭沫若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64页。

^②天鹄：《留日学生追悼鲁迅》，《新民报》1936年11月12日。

罪行，激励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留东妇女会在进行文化活动的同时，组织会员学习救护知识，准备战争时做战地救护工作。

留学生的左翼文化活动，具有如下特点：

一、从自发到自觉的组织过程。留学生的文化团体，开始多是自发地建起来的，组织比较松散。但是成立起来后，又多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或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东京“左联”直接受上海“左联”领导，社会科学研究会后来由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领导。

二、从公开到秘密的活动方式。为了活动的方便，各种文化团体有公开、半公开与秘密之分。社会科学座谈会是个半公开的文化团体，即对中国学生公开，对日本人保密。中华留日戏剧协会举行活动时，常常以“××同学结婚”、“为××同学庆寿”等名义举行，以躲过日本警方的耳目。社会科学研究会向日本政府登记，取得合法权利，进行的则是秘密活动。留学生在活动时，往往以聚餐、游玩等方式，或者是分散个别活动。文化座谈会活动时，他们分组进行，每两周活动一次。暑假，他们多是自由组合后去海滨，成立文艺之家、戏剧之家、音乐之家、美术之家、社会科学之家等，组成临时团体进行活动，丰富了活动内容。

三、从分散到统一的发展过程。留日中国学生各文化团体成立之初，基本是各自组织活动。为了协调领导，更好地组织活动，1936年，解树椿等人发起成立了左翼文化团体秘密核心领导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同盟”。1936年秋，东京各大学的左翼学生在学生会的基础上，推举代表成立了“中华留日学生

联合会”，使留学生的左翼文化运动逐渐走上了团结一致、共同进步的道路。

四、从监视到冲突的斗争过程。日本政府对留学生的各种活动极为敏感，很多活动是在日本警察的监视下进行的。尽管学生们的活动方式多以其他事情作掩护或秘密进行，但仍有很多进步留学生被日本当局拘捕、拷打甚至驱逐出境。受国民党支持的右翼留学生势力也对左翼学生的活动进行破坏。1936年“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成立后，为争夺学生运动的领导权，两派势力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左翼留学生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进行了请愿斗争。

总之，这一时期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发起的左翼文化运动，为留学运动史写下了一笔光辉的记录，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

第 四 篇

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的
持续和低潮
(1946—1976)

第 一 章

“战后”留学日本运动的 波 动 (1946—1969)

第 一 节

没有完全中断的赴日留学运动

1. “战后”仍在日本求学的中国留学生

1945年，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在内的世界法西斯势力已是穷途末路，日薄西山，直至走向了彻底覆亡。日本无条件投降，标志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以胜利宣告结束，“二战”也宣告结束。“战后”初期，仍有一少部分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求学。学业结束后，他们或停留于日本，或辗转返回中国，或转往其

他国家和地区。

初庆芝就是“战后”初期仍在日本求学的少数中国留学生之一。初庆芝于1920年出生于吉林省公主岭市一个偏僻的农村，后因家乡常受土匪骚扰，全家迁往新京（今长春）。1934年，初庆芝考入新京国民高等学校，学习家政。1934年冬，经考试筛选，她被公派到日本奈良女子大学留学。在日本，她先学两年日文，后攻读史地。1943年9月，她到广岛，入国立广岛文理科大学（今广岛大学前身）学习世界史。

“战后”的1946年9月，初庆芝从广岛文理科大学毕业，其后，她先后在广岛、横滨等地几所学校任教。1950年，她在当地一家报纸上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她欣喜若狂，立刻申请回国，历经周折，她终于回到中国，结束了在日本13年的留学、居留生活。回到中国后，初庆芝先到山东师范大学任助教，1963年春，到吉林大学当教师，直到1984年退休后，她一直生活在长春。

“二战”结束前后，留学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尽管他们想安下心来学习文化知识，但处在那种动乱的时代，生活在帝国主义肆虐的空间里，他们肯定会遭受到由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而带来的袭扰。这种袭扰，可能会有轻有重，但对于初庆芝来说，她却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几乎使她丧生的劫难，那就是美国为迫使日本投降而在广岛投掷原子弹的时候。

广岛被炸前，共有21名中国留学生，他们认为广岛是商业港，没有军事设施，不会遭到美国的空袭。可是有一天，一架美军飞机在广岛上空扔下一颗炸弹，正好落在广岛大学校园里，当即有一名日本女学生被炸死。中国留学生们感到了恐

惧，感觉广岛也不安全。于是，有 10 名中国留学生相继离开广岛，广岛只剩下了包括初庆芝在内的 11 名中国留学生没有走。

1945 年 8 月 6 日早上，初庆芝和其他同学准时来到学校。警报响声过后，一道淡红色的亮光在窗外闪过，然后是一阵排山倒海般的轰鸣，学校阅览室的窗户玻璃被震得粉碎，正在阅览室的初庆芝被身后倒下的书架砸倒了。初庆芝后来回忆说，她所在的阅览室是广岛当时钢筋水泥建筑的二层楼房，因此没有倒塌，广岛其他木质结构的房子，全部倒塌了。

初庆芝挣扎着从书架和书堆中站了起来，跑到楼外一看，简直惊呆了。原来晴朗的天空变得异常灰暗，烟雾弥漫，火光四起，街上的人被烧得狂蹦乱跳，低头一看自己的白上衣也布满了血迹，这时她才感到左胳膊不能动弹了。面对如此惨状，初庆芝简直吓傻了，不知道去哪里好，听说前面有个救护所，她便随人流往前跑，跑到一个大空房子前，进去一看，里面的人不是缺胳膊少腿，就是被烧得血肉模糊，她算是轻伤了。等了好久，才轮到给她看“病”，医生在她左臂两侧打了夹板把她脱位的胳膊复了位。医生说，幸亏你穿白上衣，又在冲击波和辐射光过后才出楼，方幸免于难。后来，他们被转移到广岛市郊，那里受到的原子弹破坏相对小些。经检查，初庆芝的白细胞和血小板都很低，身体免疫力下降，身体异常虚弱，伤风、感冒总是存在，这是幸存者的普遍症状，当时医生也不知怎么办，只是每天给他们注射葡萄糖液，年轻、身强力壮的人就挺过来了，年老体弱的人，虽没被烧死、炸死、砸死，但过一段时间也相继死去。初庆芝的身体直到 1949 年才逐渐恢复

到正常状态。

初庆芝回忆说，在原子弹爆炸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不知道扔下的是原子弹，都以为是美军扔下了大量的炸弹，才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当时日本新闻媒介也只说：“美军扔下的是一种新式炸弹。”一周后，人们才知道美军扔下的是原子弹，至于死亡的人数，当时更没有准确的说法^①。

在广岛那九死一生的经历，初庆芝终生难忘。1986年，初庆芝应日本广岛方面的邀请，到日本访问。1995年6月，她又接到广岛市长平冈敬的邀请信，参加了8月6日广岛市祭奠原子弹死难者祭奠仪式及祈祝和平仪式。

“战后”初期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即使没有初庆芝那样的特殊经历，但处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留学日本，他们除了学习之外也还会有很多其他别的方面的感受。

2. “战后”国民党政府对留日学生甄审与召回

“战后”，鉴于有留日学生归国，国民党政府对他们实行了甄审办法。

1947年1月8日，国民党政府公布《抗战期间留日学生甄审办法》，其全文如下：

一、抗战期间在日留学学生之甄审依本办法办理之。

二、教育部设留日学生资格甄审委员会主持留日

^①刘池明：《在广岛原爆中幸存的中国女人》，《周末》1995年8月12日。

学生甄审事宜。

三、召回之留日学生及在抗战期间赴日留学业已回国学生，均应从三十六年（1947年） 月 日起至 月 日止向南京教育部申请登记，登记时须呈缴下列各件：（1）登记表。（2）保证书。（3）学历证件。（4）自传。

四、前条登记学生，其曾在日本专门以上学校毕业者，应即研读国父遗教（包括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中国之命运，并在书内加以圈点，另作读书报告一份，于三十六年（1947） 月 日以前呈送留日学生甄审委员会审查，合格者由部按其原毕业学校性质程度，分别发给证明书。

五、召回之留日学生，曾在中等以上学校肄业，经审查合格而欲继续求学者，得由部给予证明书，自行投考相当学校。

六、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公布甄审办法的同日，国民党政府又公布了《留日学生召回办法》，其全文如下：

一、留日学生之召回依本办法办理之。

二、留日学生具有左（下）列事情之一者召回之。（1）学业已告完成或已告一段落者。（2）无力自行继续留学者。（3）其他特殊原因者。

三、应行召回之留日学生，由日返国之交通工

具，由教育部统筹之，其无法自筹川资者，得申请教育部予以补助。

四、应行召回之留日学生，在未返国前，因汇兑不通或津贴不足，所需之生活费经查属实者，依照实在情形，按月核给救济费，救济期限至各该生离日返国时止。

五、应行召回之留日学生不遵照本办法之规定返国者，停止核发其救济费，遇必要时，得勒令返国。

六、应行召回之留日学生，须填具留日学生调查表，送由我驻日军事代表团转教育部备核。

七、应行召回之留日学生离日前，须向我国驻日军事代表团领取证明文件，于返国后向教育部报到，并依留日学生学业处理办法之规定，办理各项甄审手续。

八、经核准继续在日留学之学生，仍应比照留日学生学业处理办法之规定办理。

九、本办法自呈准备案之日起施行。

(附)

留日学生调查表

贴
相
片
处

姓 名	别 号	年 龄		
性 别	籍 贯	党 籍	党证号数	

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

学 历	国 内	中学或大学	校 名	肄业年月日	是否毕业或学位	证件
	国 外					

出国日期 _____ 返国日期 _____

是否公费或自费 _____ 何机关或何人供给 _____

与供给者之关系 _____ 每人供给之数额 _____

供给期限 _____

留日期内担任何项有给职务 _____ 每月待遇若干 _____

_____ 任务及感想 _____

留学期内主要教师姓名及简历（至少填四人）

1. _____
2. _____
3. _____
4. _____

1. 就业 _____ 工作范围 1. _____ 2. _____ 3. _____ 就业地点 _____

志愿

2. 升学 _____ 科系 _____

审查意见 _____

备 注 _____

1947年6月12日，留日学生资格甄审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其会议记录如下：

时间：三十六年6月12日

地点：本部会议室

出席委员：陈大齐 梁 希 刘英士 程其保 周鸿经
陈裕光 赵士卿 汤吉禾

列席：钟键

主席：陈主任委员大齐

记录：林子勋

讨论事项：

一、留日学生甄审登记日期拟定于7月1日开始至9月30日截止，请公决案。

议决：通过

二、参加登记学生，应缴登记表（2份）保证书学历证件照片（4张）及自传，其曾在日本专门以上学校毕业者，应同时呈缴研读国父遗教（包括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中国之命运之读书报告，暨圈点之原书，是否可行，请公决案。

议决：应于“圈点之原书”下加“其不能同时呈缴者应于9月30日以前补缴”等字样，修正通过。

三、自传及读书报告评阅人员，应如何聘请，请公决案。

议决：由会草拟名单，经由主任委员核阅后，请部聘请。

四、本会登记审核两组工作人员，请部从速调派，以利工作进行，请公决案。

议决：通过。

五、本会一般公文，拟仍由高等教育司及国际文化教育事业管理处分别办理，请公决案。

议决：通过。

六、拟定登记表格式及保证书格式请审核案。

议决：保证书依照原拟格式，惟将“并无其他附逆行为”一句改为“并无附逆行为”，并须加列“保证人须现任庶任人员或专科以上学校教员二人”一项附注，修正通过。

七、甄审合格学生证书格式读议定原则案。

议决：甄审合格证书格式内容为：“学生○○○系○○省○○县人现年○岁曾在日本学校○○科或大学○○学部毕业，参加抗战期间留日学生资格甄审合格，特予证明”。

八、北平区教职员甄审委员会，移送本会登记留日学生181人表件论文及读书报告等，应如何办理，请公决案。

议决：该生等所缴论文勿须审核，概以发还，如尚缺缴其他各项有关表件者，仍须依照规定补缴。

散会^①

国民党政府对留日学生实行甄审与召回办法，是由于在抗战期间内，各伪政权陆续派出中国学生留学日本，还有自费留学生从沦陷区、国统区以及解放区留学日本，一旦日本投降，国民党政府自然要将停留敌国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召回。为召回留日学生，国民党政府给他们提供了旅费等等条件。国民党政府对归国的留日学生实行甄审的办法，其意还在于笼络人心，网罗人才，巩固统治。

需特别指出的是，国民党政府在《留日学生召回办法》中

^①教育部公报十九卷第8期（1947年8月31日）。

规定，有的留日学生“经核准”后还可“继续”在日本留学。这一条规定的实施，使国民党政府在“召回”留日学生的同时，还仍有一少部分中国学生继续在日本留学。

国民党政权退据台湾前后，继续又对返台的留日学生进行了几次甄审。如1949年8月，国民党政权“教育部”委托台湾省“政府”代办留日学生甄审，凡于抗战期间留日学生未经参加甄审者均可申请参加。此次甄审103人，合格者65人。

1951年3月，台湾“教育部”再次补办抗战时期留日学生甄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召唤留学生回归祖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掀起了一场召唤海外留学生回归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

早在40年代后半期，中国共产党人便开始注意吸引海外留学生回国，并多方与海外留学生建立联系。这一时期，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及后来的南京局、上海局和香港分局，都十分关注海外留学生的回归问题，他们后来通过进步科学家的团体、“世界科协”成员“中国科协”与海外留学生建立联系，并陆续成立了“留美科协”、“留英科协”、“留法科协”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这些组织安排了很多留学生回到中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年12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与有关的部门和群众团体共15个单位组成了“政务院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专门负责联系和接待由世界各地回国的留学生、学者，大力争取在西方各

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回国。委员会还设立了招待所。12月2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向国内外广播，号召在国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伟大的建设工作。周恩来总理代表党和人民政府郑重地邀请在世界各国的海外学子回国参加建设。不久，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致函留欧中国同学，由衷地表示：解放后的新中国欢迎学有专长的留学生都回到祖国来，参加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国内的革命战争已近尾声，全面的恢复建设已在逐渐地开展，需要大量人才。

中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第四处主持日常工作的“政务院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为了摸清情况，打破西方国家政府和台湾当局的阻挠，制定了两份相应的文件，一是《中国留学生调查表》，二是《欢迎回国证》。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将调查表转发到国外，由志愿回国的同学填写履历、拟返国日期、回国后志向等项目。然后寄回国内，再换领《欢迎回国证》。留学生们可凭此证向所在国政府交涉，办理回国手续。

海外留学生归国，以留欧美学生最为热烈，他们的热烈情绪，也影响到了留日学生。

为推动留学生回国，留学欧美的学生纷纷成立团体。1950年4月，“留美中国学生回国服务社”成立，服务社当时工作的简讯中写道：“旧金山留美中国学生回国服务社成立以来，深得各地同学的热烈赞助，而该社工作正积极开展中，该社所出旬刊第二期已于4月20日出版，其中重要消息如下：（一）香港签证：香港过境签证问题，曾经口头和书面向旧金山领事馆交涉，答复是：‘对于领受（中国）政务院旅费回国的同学们，港英当局正在会商一切可能的办法，其他的同学最好直接

到中国，因为香港过分拥挤。’（服务社）又曾于3月20日函请北京政务院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转请政府向港英当局直接交涉，4月3日又托4位同学趁回天津之便，当面向政府陈述情况，请求帮助。（二）联络：该社联络组有专人经常与外地同学及已经到旧金山候船的同学联络，外埠各地同学来信，将囑办事项办妥后，即分别函复。”^①

这一时期在美国活动最多、规模最大的留学生群众团体北美中国基督教学生会通常采取寓教育于活动之中的方式，通过举办夏令营、冬令营、舞会、营火晚会等活动，将同学们聚集在一起，畅谈归国设想，使一些原来对回国犹豫彷徨的同学坚定了回国的信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召唤的时刻，留日学生归国的热情也十分高涨，有人见到“约300份中国留日同学会复制的《中国留学生调查表》，从表中填写的情况不难看出，绝大多数人都希望回国服务，而且心情十分急迫。如贺德昌同学毕业于日本盛冈农林专门学校农艺化学科，他这样写道：‘在这里只能消磨时光，不如及早归国，使学有所用。（归国后）若可能时，想在农业试验所当一个助手，同时想在10数年内使中国农民知道如何用化肥。’”^②

从1949年起，一批批留日学生与世界各国的大批中国留学生一样，陆续踏上了归国的艰难路程，这种归国潮，一直持

^①许珑：《奔向光明的时刻——记建国前后的留学生回国潮》，载留学生丛书编委会编：《中国留学史萃》，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第102—103页。

^②同上，第104页。

续到 50 年代上半期。

“据当时政务院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 1951 年的一份《关于争取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回国参加工作的总结》记载：1949 年中央教育部初步调查，中国在资本主义各国的留学生 5000 人，三年来陆续回国的约 2000 人。但同时从印尼、马来西亚、香港、台湾等地又有一部分中国学生到英、法、美、日等国去学习。”^① 这就是说，虽然一些留日学生陆续归国，但同时，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海外的中国人，又有人接连踏上留学日本的道路。正是由于他们留学日本，致使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保持未断，只不过这一时期的留日规模较之过去要小很多，以至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人的留日运动都处在持续和低潮期。

4. 日蒋条约为台湾留日活动奠定基础

“战后”的 50 年代初期，日本当局与台湾蒋介石当局签订日蒋条约，为“战后”台湾的留日活动奠定了基础。由此可以看出，50 年代开始的台湾地区留日活动，是“战后”特有的政治关系的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占据中国领土台湾。日本占领时期，推行奴化教育，使台湾蒙上了浓厚的殖民地色彩。在那个时期，台湾地区的中国人多有留日，而日本当局甚至不把来自台湾的学生看成是外国留学生，因为他

^①许琰：《奔向光明的时刻——记建国前后的留学生回国潮》，载留学生丛书编委会编：《中国留学史萃》，第 106 页。

们将台湾视作日本的殖民地。这个时期，蒋介石集团居于中国大陆，因日本侵华，中国断绝了向日本正式派遣留学生的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际政治格局重组，使得台湾地区的留日活动重现，也是由于国际政治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停止了向日本派遣留学生。

日本投降后，美国对日本实行单独占领。美国从确立自身在远东和整个世界霸权地位的目的出发，极力想把日本变为美国在远东的反共战略基地。为此，美国迫不急待地实行片面对日媾和。根据战时国际协议，战后应由有关国家缔结全面的对日和约。1951年7月20日，美国政府发出了片面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通知，8月又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定本”。美国破坏了1945年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确定的美、英、苏、中四国一致的原则。旧金山会议前，美国主张邀请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参加媾和会议，英国主张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结果，没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也没邀请蒋介石的代表。

美国在“对日和约草案定本”中，声称中国的台湾等岛屿要留待英苏中美四国决定，如条约生效后一年不能做出决定，则由“联合国大会决定”。其实质是美国企图长期霸占台湾。

1951年9月4日至8日，美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在旧金山召开了由它一手操纵的对日媾和会议，签订了由其炮制的对日“和约”，同时，日美两国又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等一系列协定。

旧金山片面媾和之后，美国加紧策划和强迫日本与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缔结“和约”。经美国多次施加压力，日本政府全面接受了美国的意见。1952年2月，日本吉田政府派代表赴

台湾与蒋介石的代表谈判。4月28日，日本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签订了《日本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和平条约》（即“日蒋条约”），双方还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

中国政府强烈反对美国片面炮制的“对日和约”和在美国策划下日蒋签订的“和约”。周恩来外长于1951年9月18日和1952年5月5日两次发表声明，庄严宣布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和绝不承认非法的片面的对日“和约”和敌视中国人民的日蒋“和约”。

台湾国民党当局同日本签订“和约”，以此为起点，表明台湾地区已出现了留日活动的可能性。

第 二 节

台湾地区再建中国人留日运动新格局

1. 台湾当局第一次修订留学规程

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败退台湾后，中国人留日运动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从50年代初开始，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人留学日本呈现出了一种多元化的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未与日本建立互换留学生的关系；极少数中国大陆公民辗转其他国家和地区以自费方式去日留学，香港和澳门地区的中国人赴日留学，海外华人赴日留学。但是，上述这几种情况，人数少，且都是以单个人的身份前往，他们的留学生活，缺少作为留学运动的整体特征。而在同一时期，台湾地区的留日活动逐渐形成，并有所发展，从而成了这一时期中国人留学日本活动的最主要一个方面。所以，本书将对这一时期台湾地区中国人

的留日活动进行评述。

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由于外汇艰难，在一段时期内，对公费留学严加限制。

1954年7月14日，台湾当局颁布第一个修订留学规程，该规程对留学活动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约定。规程中，将留学生分为三种：（1）留学费用全部由台“教育部”或其他教育当局供给，或依国际交换学生办法由留学国政府或文化机关供给者，为公费留学生；（2）留学费用由私人自筹，由私人或私人供给者，为自费留学生；（3）由留学国学校或文化机关给予个人奖学金者，为奖学金留学生。

该规程共有20条，其要点如下：

第三条 留学生留学前均应经台“教育部”考试并且及格，考试办法由“教育部”分别种类制订并公布。

第四条 各地方考选公费留学生应先拟定办法送请“教育部”备案公告，考选之初试由各地方自行办理，复试由“教育部”办理。

第五条 凡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学独立学院或专科学校毕业（其规定有服务年限之学校毕业生并须服务期满）或高等考试及格者，经“教育部”指定之医院检验体格合格，得应公费或自费或奖学金留学考试。考试者须先得有国外大学入学许可证。

第六条 凡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级中等学校毕业者（其规定有服务年限之学校毕业生并须服务期满），经“教育部”指定之医院检验体格合格，得应公费或奖学金留学考试。奖学金留学考试者须先得有国外大学入学许可证暨足敷一年以上之全

部留学费用之奖学金证明文件。

第七条 留学考试科目如下：

依第五条规定资格留学者：（一）普通科目：三民主义、中国史地、国文、留学国语文或英文；（二）专门科目：公费留学生二种或三种，自费或奖学金留学生得审查其在校成绩予以免试。

依第六条规定资格出国者：三民主义、中国史地、国文、留学国语文或英文。

第八条 为举办留学考试，“教育部”应组织“留学考试委员会”，其委员由“教育部部长”就学术界有声誉者聘任之。

第九条 留学考试及格学生除女生即准留学外，其男生如曾服兵役或受预备军官或预备军士教育期满得有证书并已纳入在乡军人组织者，准予即行留学，其余男生应施以适当之军事训练，于训练期满纳入在乡军人组织后始准留学。

第十条 留学生应于留学前觅具保证人，出具保证书，保证事项如下：（1）保证遵守留学规程之规定事项。（2）如系自费及奖学金留学生，保证其如在国外留学费用发生困难，由保证人负责供给。（3）如系男生确切保证其在国外留学期间如受当局动员应召即行遵令返台服役，不稍迟误。

第十一条 留学考试及格而合于第九条规定，并办竣第十条规定手续者，由“教育部”发给留学证书，自行向有关机关办理手续，于6个月内出岛，必要时得声叙理由，准请“教育部”延长6个月。

第十二条 国外留学期间，公费生之依第五条规定资格留学者，以2年为限；依第六条规定资格留学者，以4年为限，

自费及奖学金留学生以4年为限，但于必要时均得声叙理由准请“教育部”延长1年至2年。

第十三条 留学生在到达留学国时，即应向当局驻在该国之“使领馆”凭留学证书办理登记手续。该项登记可以通信方式行之。

第十四条 公费留学生非经申请“教育部”核准，不得变更其研究科目或留学国，违者取消公费。

第十五条 留学生毕业或得学位后，应即报告“使领馆”转报“教育部”备查。

第十六条 留学生于留学期限届满时，应即回台，不得迟延。

第十七条 公费留学生学成归台后应从事当局所指派之工作，其期限为3年。

第十八条 留学生返台后应即检同毕业证书及研究证件申请“教育部”备查，各地方公费留学生并应向各该地当局报到。

台湾当局制定的上述留学规程，是一个重要的留学规程，台湾当局即是依该规程的规定开始从事留学活动的。其后，台湾的留学规程虽多次修订，但其主要内容还仍以该规程作为框架。

2. 公费自费留学考试接连举行

依据台湾当局1954年修订留学章程的规定，公费、自费留学都须经过考试。于是，台湾接连举行了留学的考试。

台湾历年自费留学考试情况如下：

年 别	报考人数	录取人数
1953 年	295 人	233 人
1954 年	569 人	483 人
1955 年	853 人	462 人
1956 年	576 人	395 人
1957 年	1442 人	843 人
1958 年	1677 人	1063 人
1959 年	549 人	547 人
1960 年	3655 人	883 人
1961 年	6478 人	1596 人
1962 年	7010 人	1225 人
1963 年	6083 人	1927 人
1964 年	4523 人	1196 人
1965 年	5012 人	1112 人
1966 年	4630 人	779 人
1967 年	4306 人	1139 人
1968 年	4941 人	1131 人
1969 年	6284 人	1167 人
1970 年	5880 人	1872 人
1971 年	6425 人	1233 人

1972年	6401人	1353人
1973年	7242人	1517人
1974年	6770人	1620人
1975年	6291人	1622人

以上为大专毕业自费留学生考试的情况，其中包括极少数奖学金留学生。从1953年至1975年的23年间，台湾共录取自费留学生25398人，其报考人数为97890人，录取的比例为25.95%，其总的趋势是：报考人数和录取人数逐年增加，但是其间也有回降的情况。

台湾高中毕业留学考试共举行7次，其情况如下：

年 别	报考人数	录取人数
1950年	33人	29人
1951年	42人	30人
1952年	76人	62人
1953年	143人	109人
1954年	233人	190人
1955年	567人	180人
1956年	586人	235人

从1950年起，台湾教育当局决定，凡高中毕业，并获有

国外大学四年全部奖学金（包括全部学费及膳宿费）之学生，须经考试及格，始准出国留学。上述 7 次考试，共录取 835 人，其录取比例，明显高于大专生自费留学考试录取的比例。

1955 年，台湾当局首次举行公费留学考试，举行一次后随即停止。1960 年起，台湾当局正式将公费留学编入预算，到 1977 年，录取公费学生情况如下：

年 别	报考人数	录取人数
1955 年	791 人	18 人
1960 年	189 人	5 人
1961 年		8 人
1962 年		7 人
1963 年	173 人	6 人
1964 年	133 人	6 人
1965 年	116 人	8 人
1966 年	226 人	8 人
1967 年	279 人	10 人
1968 年	316 人	8 人
1969 年	308 人	10 人
1970 年	605 人	13 人
1971 年	811 人	13 人

1972年	564人	11人
1973年	549人	13人
1974年	424人	11人
1975年		12人
1976年		61人
1977年		33人

以上19年，共录取公费留学生261人，其中从1976年起取消自费留学考试，相应地增加了公费留学生名额，使这一年公费留学生名额达到61人，在此之前，每年的人数都在10人左右，而19年中，14年的报考人数合计达到5484人，同时期录取人数为140人，录取比例为2.55%。可见，公费留学生的考试竞争是相当激烈的。

以上自费和公费留学考试被录取者，皆有赴日留学的。如公费留学考试共录取261人，其中1958、1969、1970年各有一人放弃留学，实际出国留学人数为258人。这258人，以留学美国者居多，其余则是赴英、德、法、日、加拿大、土耳其、黎巴嫩、泰国等。

下面是几年中公费留学考试录取的赴日留学人员的情况：

1963年，朱阿荣，台北市人，海洋专科学校驾驶科毕业，留学日本学海洋学；

1964年，黄清连，留学日本学钢铁冶金；

1973年，郑胜文，台南人，海洋学院造船工程系毕业，

留学日本学习造船工程；

1975年，陈长钮，彰化人，成功大学造船系毕业，留学日本学造船工程学。

以上仅为随意举出的几个例子，实际情况远不止于此。

3. 各种奖学金生纷沓留学日本

从1954年开始，日本政府为台湾学生提供留日奖学金，各年提供的人数不等。其情况如下：

1954年，2名

1955年，2名

1957年，4名

1958年，4名

1959年，4名

1960年，4名

1961年，4名

1962年，4名

1963年，6名

1964年，10名

1965年，15名

1966年，16名

1967年，15名

1968年，13名

从1969年始，日本方面为台湾学生提供奖学金的，除日本政府外，又有日本团体。其情况如下：

1969年，日本政府奖学金17名，日本帝人留日研究奖学

金 2 名；

1970 年，日本政府奖学金 20 名；

1971 年，日本政府奖学金 23 名，日本帝人留日研究奖学金 2 名，日本东电化留日研究奖学金 2 名；

1972 年，日本政府奖学金 21 名，日本帝人留日研究奖学金 2 名，日本东电化留日研究奖学金 2 名；

1973 年，日本交流协会奖学金 10 名，日本帝人留日研究奖学金 3 名，日本东电化留日研究奖学金 2 名；

1974 年，日本东电化留日研究奖学金 2 名；

1975 年，日本东电化留日研究奖学金 2 名；

1976 年，日本交流协会奖学金 11 名，日本东电化留日研究奖学金 2 名。

日本政府和团体的奖学金，原则上是由台湾教育当局公开甄选，即组织专门考试考选。1954 年日本政府第一次给台湾学生奖学金时，由于时间紧迫，不及单独举办留学考试，便由当年高中毕业留学考试录取留日学生中选拔，最后日本政府决定录取了陈长秀和颜惠臣二人。其后，便为此举行单独考试，如 1955 年，日本政府奖学金留学考试报考者，初选 4 名，最后日本政府选定了郑信力、张仁德二人。

另外一些年度日本政府和团体奖学金录取情况如下：

1961 年，日本政府奖学金录取四人：张鸿喜，药学专业；周英明，电机专业；杨文勋，医学专业；林荣原，化学专业。

1971 年，日本帝人留日研究奖学金录取二人：陈静滨、郭建志；日本东电化留日研究奖学金录取二人：林守仁、赖耀文。

1972年，日本帝人留日研究奖学金录取二人：李荣枝、谢哲学；日本东电化留日研究奖学金录取二人：王泰山、陈耿明。

1973年，日本帝人留日研究奖学金录取三人：陈国诚、邱显堂、郭东瀛；日本东电化留日研究奖学金录取二人：詹前锋、黄明彰。

1974年，日本东电化留日研究奖学金录取二人：刘明勋、黄德勇。

1975年，日本东电化留日研究奖学金录取二人：詹益家、杨光洋。

纵观以上所列日本政府奖学金和团体奖学金，其人数基本呈逐年增加之势。

自费留日、公费留日和以日本政府、日本团体奖学金留日，构成了“战后”台湾人留学日本的三股人流。

关于台湾留日学生的情况，1962年台湾当局驻日“大使馆文化参事处”有一个调查。这一年，留日学生总数在800人以上，有确数可查者为531人，他们的情况为：

(1) 籍贯：台湾466人，东北9省16人，广东10人，福建7人，江苏、浙江各8人，河北5人，湖北、江西、湖南各2人，安徽、山西、山东、甘肃、四川各1人。

(2) 在日学习科目：人文31人，教育10人，艺术27人，法律29人，社会科学130人，自然科学57人，工程39人，医药129人，农业30人，其他48人。

(3) 在日本分布：东京51校403人，东京以外关东地区12校49人，关西地区13校31人，九州地区5校21人，北海

道及其他地区 37 人。

(4) 在日身份：公费生；日本政府奖学金学生；自费留学考试及格者；其他（包括应聘探亲出国及侨居）。

从以上情况可以知道，1962 年时，台湾留日学生，籍贯属台湾者人最多，分布于东京地区者人最多。

4. 留日学生的人数、学科及其管理

台湾留日学生的人数，总的看，是呈逐渐增加之态，但是中间也有减少的情况。其详情见表。

1950—1963 年台湾留学生统计表

人 数 项 目	一 九 五 〇 年	一 九 五 一 年	一 九 五 二 年	一 九 五 三 年	一 九 五 四 年	一 九 五 五 年	一 九 五 六 年	一 九 五 七 年	一 九 五 八 年	一 九 五 九 年	一 九 六 〇 年	一 九 六 一 年	一 九 六 二 年	一 九 六 三 年
日本	1			2	18	97	21	40	68	77	90	186	273	225
韩国								1	9			1	1	2
菲律宾			7		2	3		2	2		1		1	2
泰国											1			1
加拿大	2	7	7	3	14	15	33	18	9	13	10	15	78	129
美国	213	332	360	120	355	626	410	400	570	521	531	733	1387	1685
奥地利											1			3
比利时								1		3	1	3	3	4
法国			2	1	1			2	1	3	3	8	14	15
西德						6	3	13	11	4	2	23	43	33
希腊											1			
意大利		1								1	2	1		4
西班牙			1		9	13	51		1			2	9	10
瑞典														
瑞士													4	
英国													8	4
澳大利亚							1	2		2		2	2	2
新西兰														
其他国家									3	1	1	3	3	6
合计	216	340	377	126	399	760	519	479	674	625	643	978	1833	2125

1964—1976年台湾留学生统计表

人 数 项 目	年 度													合 计
	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五年	一九六六年	一九六七年	一九六八年	一九六九年	一九七〇年	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二年	一九七三年	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五年	一九七六年	
日本	267	281	220	167	199	122	68	78	84	74	73	112	156	2999
约旦					2	1		2	1	5	2	4	7	32
韩国	2		1	4	1	11	10	9	3	1	8	15	5	84
菲律宾	8	1	3	4	1	6	3	5	3	3	6	6	2	71
泰国		1	3	9	17	16	32	32	30	33	33	25	17	249
加拿大	125	111	164	144	107	58	35	14	16	30	43	139	111	1450
美国	2026	1843	1696	2047	2272	3015	1825	2289	1867	1650	1992	1824	3173	35762
奥地利	5	2	3	7	3	22	4	9	8	12	5	2	7	93
比利时	6	9	3	6	10	12	7	4	3	4	1	2	1	83
法国	12	14	30	21	27	66	24	30	46	48	28	34	27	457
西德	34	39	24	29	31	54	21	28	37	42	37	68	70	652
希腊					1			4	2	2	2			12
意大利	2	6	9	6	1	1	1	2	2	1		3	3	46
西班牙	2	2	6	8	17	36	12	31	29	25	17	26	10	317
瑞典				1	1	1	1	1	1					6
瑞士	7	9	9	7	3	7	6	5	2	3	6	1	5	74
英国	7	9	5	5	3	7	1	10	8	11	14	26	31	149
澳大利亚	5	3	9	1	7	4	1	2	5	8	9	6	6	77
新西兰									1	1			1	3
其他国家	6	9	4	6	8	5	5	3	1	13	9	8	9	103
合计	2514	2339	2189	2472	2711	3444	2056	2558	2149	1966	2285	2301	3641	42719

从表中可以看出，1950年至1976年的27年间，台湾留日学生共有2999人，占同时期台湾留学总人数42719人的7.02%，在留学国别中位于美国之后排在第二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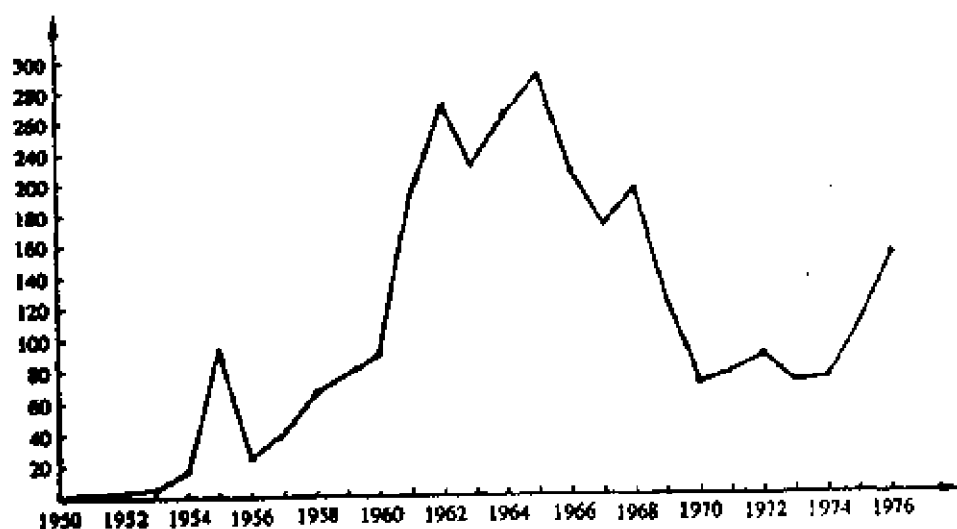
27年中，1965年留日人数最多，达281人，1950年留日人数最少，只有1人。

如果将27年间台湾留日学生人数制成图，则如下页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台湾留日学生人数，从1956年开始逐渐增加，1965年留日学生人数达到最高一个峰值，以后几年间呈下降之势，到1976年，又出现了一个高数值，但其人数也较27年中最多的1965年少125人。

从以上表中可以看出，1950年至1976年的27年间，台湾留日学生共有2999人，占同时期台湾留学总人数42719人的7.02%，在留学国别中位于美国之后排在第二位。

如果将27年间台湾留日学生人数制成图，则如下：



1950~1963年留日学生人数图

关于台湾留日学生的学习科目情况，可见下表：

1950—1963年台湾留学生学科统计表

人 数 项 目	年 度	一九五〇年	一九五一年	一九五二年	一九五三年	一九五四年	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六年	一九五七年	一九五八年	一九五九年	一九六〇年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一九六三年
		计	216	340	377	126	399	760	519	479	674	625	643	978	1833
总计	男	132	247	257	79	253	554	406	359	487	478	497	785	1371	1541
	女	84	93	120	47	146	206	113	120	187	147	146	193	462	584

续表

项目	年度	年数													
		一九五〇年	一九五一年	一九五二年	一九五三年	一九五四年	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六年	一九五七年	一九五八年	一九五九年	一九六〇年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一九六三年
人文	男	28	32	20	6	13	43	32	46	46	48	47	79	120	113
	女			26	19	19	26	22	42	62	56	49	71	159	161
教育	男	15	20	1	1	2	13	1	4	4	6	7	13	32	29
	女			19	3	3	1	1	6	8	6	1	4	12	26
艺术	男			11	1	2	4	3	1	6	7	13	17	26	31
	女			4	1	1		2	5	8	6	13	8	12	25
法律	男			5	1	4	13	11	10	15	15	28	44	75	48
	女						4	1	6	6	10	4	13	10	22
社会科学	男	36	67	55	14	47	78	69	61	84	69	64	109	226	239
	女			20	7	9	7	7	13	28	25	16	35	80	159
自然科学	男	27	29	31	13	35	31	26	31	27	22	42	80	160	187
	女			10	8	6	7	12	16	12	10	18	29	69	78
工程	男	18	45	75	36	95	131	166	161	219	234	227	333	549	656
	女			4	1	7	5	12	14	25	12	12	6	26	37
医药	男	18	42	24	1	3	19		1	2	5	4	10	12	38
	女			21	3	1	105			1	4	6	10	30	18
农业	男	6	25	21	5	24	37	44	35	67	58	63	95	163	192
	女			5	5	10	7	16	15	34	16	26	17	62	58
其他	男	68	80	14	1	28	185	54	9	17	14	2	5	8	8
	女			11		90	44	40	3	3	2	1		2	

1964—1976年台湾留学生学科统计表

人 数 项 目	年 度	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五年	一九六六年	一九六七年	一九六八年	一九六九年	一九七〇年	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二年	一九七三年	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五年	一九七六年	合 计
		计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计	计	2514	2339	2189	2472	2711	3444	2056	2558	2149	1966	2285	2301	3641	42719
	男	1782	1535	1426	1604	1727	2213	1351	1666	1242	1211	1391	1348	2229	28171
	女	732	804	763	868	984	1231	705	892	907	755	894	953	1412	14548
人文	男	134	124	124	94	164	213	83	126	71	77	68	74	129	5768
	女	220	259	212	208	230	267	157	203	189	177	169	251	360	
教育	男	36	35	31	41	32	37	9	18	14	20	18	13	27	872
	女	37	37	36	35	28	21	14	15	9	9	14	19	29	
艺术	男	30	30	30	19	52	104	35	51	60	42	25	51	56	1085
	女	22	24	18	18	29	34	15	23	19	18	12	28	33	
法律	男	70	55	38	35	59	44	17	28	28	33	29	34	43	1092
	女	14	21	16	22	18	25	10	15	13	10	26	21	23	
社会科学	男	330	276	207	227	260	312	153	203	198	145	187	164	311	8198
	女	211	225	238	256	295	416	165	297	275	205	255	284	479	
自然科学	男	214	204	262	309	375	523	333	474	308	343	397	382	600	7874
	女	101	111	110	120	202	218	182	151	224	159	199	155	202	
工程	男	693	535	501	605	554	687	526	567	409	401	534	507	875	10868
	女	22	18	20	28	22	30	27	40	30	24	34	21	52	
医药	男	43	61	66	63	60	75	56	55	52	55	43	49	80	1717
	女	40	33	41	48	44	41	30	24	36	42	55	47	100	
农业	男	226	207	165	203	171	218	139	144	102	95	90	74	108	4527
	女	65	74	69	133	116	179	105	124	112	111	130	127	134	
其他	男	6	8	2	8										718
	女		2	3											

上表虽系台湾全部留学生的分科统计表，但留日学生的学科情况当与此无大迥异。从上表可以看出，按各学科留学生人数多少计，从高到低依次为工程、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农业、法律、艺术、教育。另外前述 1962 年台湾留日学生分科情况，按人数多少计，依次为社会科学（130 人）、医药（129 人）、自然科学（57 人）、工程（39 人）、人文（31 人）、农业（30 人）、法律（29 人）、艺术（27 人）、教育（10 人）。再参照上表，基本可以作出结论：留日学生学工程、社会科学科目的人较多，学艺术和教育科目的人较少。

另外，从上述表格中可以看出，在台湾的留学生中，女留学生亦占有相当的比例，她们的总人数虽不及男留学生多，但也占到了留学生总人数的 34.06%，达到了 14548 人。

对于留日学生的管理，台湾当局一直比较重视。国民党政权逃台初期，台湾当局责成所谓“驻外使领馆”代为管理当地之留学生。从 1957 年起，台湾当局在“驻日使馆”内设了“文化参事处”，成了管理留日学生的专责机构。同时，台湾教育当局还不同程度地介入了各种台湾留日学生团体之中，将其作为约束留学生的辅助性手段。据台湾“教育部”1971 年统计，台湾留学生在日同学会共有 9 个，如“中华民国留日同学会”，会址设于东京千代田区四谷的中华学校，凡留日学生缴纳会费即为当然会员。该会由 17 位委员分理会务，委员由全体会员投票选出。台湾留日学生的团体，还有以在台母校为组成对象的校友会，如“师大旅日校友会”、“台大同学会日本分会”等。这些团体除有自助性质外，有的还带有程度不一的政治色彩。

第 三 节

台湾地区留日活动的拓展与延伸

1. 留学规程几次修订改变

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于1954年公布了修订留学规程，其后，多次对留学规程进行修订。修订后的留学规程虽仍以1954年的规程为基本框架，但其中也有一些变动。

台湾当局对留学规程的修订情况如下：

1962年7月20日，台湾当局修订留学规程。规程第二条规定，凡赴国外进修，研究专门学术或实习技术学科者，均为留学生。该次修订的规程还有如下新条款：

第十四条 公费留学生留学期限届满应回台服务，公费期满愿以自费继续研究者得呈“教育部”延长1年至2年，其未经准许在外逗留者，“教育部”得视其情节，追缴其已领公费全部或一部。

第十六条 自费及奖学金留学生留学期限为4年，必要时得声叙理由，呈请“教育部”延长之。

第十九条 留学生学成后由“政府”辅导其回台服务，辅导办法另定之。

另外，此次修订的规程，最重要的变化在于规定了免试留学的条件。对这一点，本书将在以后专门介绍。

1964年5月18日，台湾当局再公布修订的留学规程。修订后的留学规程，将留学生留学费用之来源区分为以下6种：

(1) 留学费用全部由“教育部”和各地方教育行政当局供

给者；

(2) 依国际交换留学生办法由留学国政府或文化机关供给费用者；

(3) “政府”因业务需要而拨款考选者；

(4) 留学费用由私人自筹者；

(5) 由留学国学校或文化机关给予个人奖学金者；

(6) 由个人或团体捐助之奖学金经“教育部接受捐助奖学金管理委员会”审核授予者。

规程中并且规定，以上前三者为公费留学生，第四者为自费留学生，后两者为奖学金留学生。

1969年12月1日，台湾当局再公布修订的留学规程，并同时公布留学甄试办法。这次修订的留学规程，有如下一些重要条款：

第三条 凡留学者，均应先经“教育部”留学考试及格。

第四条 留学考试之方式分为以下三种：(1) 笔试。(2) 甄试。(3) 口试。除本规程另有规定外，凡应公自费及奖学金留学考试者，均应参加笔试，公费生并应参加口试，其考试办法由“教育部”分别种类制定之。该规程还规定，“教育部”必要时得审查留学生在校学行成绩或在职服务成绩，作为考试成绩之一部分。

第十四条 公费留学生留学期限，视当局需要情况分别制定，最高不得超过4年。

第十五条 公费留学生留学期限届满，应即行回台服务，如逾期不归，由“教育部”追究其保证人并追还其已领公费。

这次修订后的留学规程，最重要之处在于第六条，该条款

为：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愿自费出国者，其考试得以甄试之方式行之：

(1) 岛内大学或独立学院毕业生，获有攻读博士或硕士学位之国外大学奖学金，其金额足敷该校全年学费者。

(2) 岛内专科学校毕业生，获有国外大学修读同性质科系一年之全部奖学金者。

(3) 已在岛内得有硕士学位，而欲前往国外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者。

(4) 已在岛内大专学校毕业，服役期满，继续留营服役二年以上，或在“外岛”服役期满者。

(5) 在校成绩优良，每学年学业与操行成绩平均各在 85 分以上者。

1970 年 5 月 19 日，台湾教育当局又修订了留学甄试办法。

1972 年 8 月 18 日，台湾当局对留学规程中的两个条款进行修订，规定：考试及格或甄试合格之学生，除女生及依法免役或已列管为后备军人及“国民兵”之男生即准留学外，其余男生应施以适当之军事训练列管后，始准出岛留学。

1976 年 2 月 25 日，台湾当局再修订留学规程，该次修订后的留学规程，“为求公平化、合理化、简单化”，规定取消了自费留学生之考试。

至此，连同 1970 年 1 月 14 日公布的“认可就读之美国大学名单”在内，台湾当局对留学规程共作了八次修订，其中涉及到留学生选派办法、留学期限、回台服务以及留学前的军训、担保等等。台湾当局多次修订留学规程，无非是根据经济

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才的需求、教育的水平、留学生的状况等因素而进行的，正如留学规程中多次所声明的那样：为配合岛内建设及学术研究发展之需要。但其多次修订留学规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即“反共救国”。

2. 一部分人得以免试出国留学

1954年7月14日，台湾当局在第一个修订留学规程中规定：留学生出国前均应经“教育部”考试及格。这就是说，不论是谁，又不论以何种资格，只要去外国留学，就必须参加台湾教育当局所举行的考试，并且及格。

1962年7月20日，台湾当局在公布的第二个修订留学规程中，第三条规定：赴国外留学之学生，除合于本规程第八条各款规定之情形者外，均应先经“教育部”考试及格。这即表明，从该时间以后，将有一部分人可以不经过留学考试，直接出岛留学，即免试。

这次修订留学规程第八条这样规定：自费或奖学金留学生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请“教育部”免试出国留学：

(1) 岛内大学或独立学院毕业学生获有攻读博士或硕士学位之国外大学助教奖学金或研究所全部奖学金者。

(2) 岛内大学或独立学院毕业学生获得设有授予博士或硕士学位研究所之国外大学奖学金，其金额足敷该校全年学费者。

(3) 在岛内大学研究期满得有硕士证书者。

(4) 在岛内大学或独立学院任助教职务二年以上或在专科学校任助教职务三年以上者。

(5) 在岛内高级中等学校任正式专任教员三年以上，成绩优良，获得设有研究所之国外大学奖学金，其金额足敷该校全年学费，经地方教育行政当局推荐者。

(6) 岛内大学或独立学院毕业或考试及格，在行政机关或公营事业机构任职三年以上，或专科学校毕业在行政机关或公营事业机构任职五年以上，成绩优良者。

(7) 岛内大学独立学院或专科学校毕业，服务期满，继续留营服役二年以上者。

从以上可以看出，台湾当局这次确定可以免试的对象，基本是已有或将攻读较高学位者和一部分在职人员，包括教师、行政机关或公营事业机构职员，以及服役期满者。

该修订留学规程公布的同时，台湾“教育部长”黄季陆对免试情况作了补充说明，他说：

第一，修订留学规程新增第八条（即免试之条款），乃为自费或奖学金留学生向“教育部”申请免试出国留学而订立，其中第一、二两款规定岛内大学或独立学院毕业学生，须获有攻读博士或硕士学位之国外大学助教奖学金或研究所全部奖学金，或获得授予博士或硕士学位研究所之国外大学奖学金，其金额足敷该校全年学费者。获得上述两项奖学金者，虽可获准免试出国留学，但若非在校成绩优异，则此类奖学金实不易获得。

第二，专科学校原属技术及职业教育之范畴，为造就实用建设人才而设立，故对专科学校毕业生之出国留学，除参加留学考试外，不得不重视其在岛内服役之年资或成绩，以维职业教育之精神。高考及格人员，亦本以纳入各种建设工作为正

途，所以也有先行在台服务三年之节制。

黄季陆同时还说：修正留学规程第八条的七项规定，其立意虽各不同，但无不以配合当局政策，适应当前需要为前提，此一修正条文，几经妥慎研酌，始作最后决定^①。

继此次修订留学规程之后，台湾当局又于1964年5月28日通过了第三次修订留学规程，其中的免试条款，变动不大，只不过将免试对象又增加了两类，即：

岛内大学或独立学院或专科学校毕业，参加“教育部欧洲语文训练中心”结业，成绩优良而有志赴所修语文之国家深造者；

岛内大学或独立学院或专科学校毕业，成绩优良有志赴非洲近东各国或当局指定之学习科目深造者。

台湾当局关于免试出国留学的规定，为一部分人留学创造了方便条件，对留学人数的增加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3. 特殊人才进修得到优先照顾

一些特殊学科，因岛内师资、设备有限，难应需要，对这些特殊学科的人才要求出国进修者，若按留学规程办理，他们将受到诸多限制，台湾当局于是对某些特殊学科、特殊人才制定了优惠政策，减少了对他们的限制。如对艺术学科，台湾当局就采取了这种办法。

1962年9月3日，台湾教育当局公布了办理艺术科目资赋优异学生申请出国进修办法。该进修办法如下：

^①王焕琛：《留学教育》，台湾国立编译馆1980年版，第2214—2215页。

第一条 凡对音乐、美术二科资赋优异已有成绩表现之学生年龄在 15 岁左右无兵役义务者，申请出国进修得依据本办法办理之。

第二条 申请人应检具下列证件，办理申请手续。

- (1) 在台演奏展览之有关资料
- (2) 学历证件
- (3) 国外该专长科目之学校入学许可证及奖学金证明
- (4) 该专长科目之全岛性团体推荐书
- (5) 户籍本

第三条 经审查合于规定由“教育部”邀请各该科目之专家组成甄试委员会予以术科甄试后由各甄试委员的无记名投票决定之。

前项票决以全体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员三分之二以上之多数决定后，送由“教育部”办理。

第四条 术科甄试合格者再由“教育部”予以国文及留学国语文之学科测验。

该办法实施后，依此办法出国留学的艺术科目留学生情况如下：

1962 年：戴珏英（钢琴）

1963 年：苏绿萍（钢琴）、陈绿绮（钢琴）、李美梵（声乐）、高为量（声乐）

1964 年：诸其明（钢琴）、刘渝（钢琴）、陈尚义（钢琴）、王义夫（小提琴）

1965 年：谢英姬（声乐）、萧凌云（声乐）、陈郁秀（钢琴）、许鸿玉（钢琴）、林惠玲（钢琴）、陈泰成（钢琴）

1966年：王雪真（小提琴）、王羽修（钢琴）、简名彦（小提琴）、刘安娜（钢琴）

1967年：汪露萍（钢琴）、张瑟瑟（钢琴）

1968年：谢中平（小提琴）、胡善真（钢琴）

1969年：秦慰慈（钢琴）、徐雅颂（钢琴）

1970年：陈太一（小提琴）、薛岭宁（钢琴）、陈淑贞（钢琴）、王爱梅（钢琴）、吴纯菁（钢琴）、彭淑惠（钢琴）、林娴（钢琴）、章念慈（钢琴）

1971年：刘航安（钢琴）、李秀玲（钢琴）、陈主安（钢琴）、高慧生（小提琴）、曾淑华（钢琴）、庄郁芬（钢琴）、叶绿娜（钢琴）、顾晓霞（长笛）

以上10年间，共有41名艺术人才依据艺术科目资赋优异学生申请出国进修办法出国留学。

该项办法实施后，其效果被人充分肯定，但也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即有人并非以留学为目的，而是以单纯的离台为目的，造成了人才外流，因而1973年1月6日，台湾教育当局废止了该项办法。

4. 公布教员及科技人员进修办法

教员与科技人员作为社会的特殊人才，对他们出国进修，台湾当局制定了专门政策。

1956年1月，台湾教育当局公布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出国讲学、研究或进修办法。该办法对教员出国进修等做了如下规定：

第一条 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出国讲学、研究或进修者，依

本文之规定办理。

第二条 出国讲学人员，须具有审查合格之教授或副教授资格；出国研究或进修人员，须具有审查合格之讲师以上资格。

第三条 出国讲学、研究或进修者，其原任课务须有适当人员担任，经原学校同意并填具申请书，检具被约文件、公立医院体格检查表及资历成绩等证明文件，送由原学校呈报“教育部”核定。

第四条 出国人员如兼有学校重要行政职务者，须有适当之代理人员，并报教育行政机关核备。

第五条 各校每年出国讲学、研究或进修人员，每学系科同时不得超过二人，每学院不得同时超过五人。有特殊需要超过前项名额时，各校应专案报请“教育部”核办。

第六条 出国讲学、研究期间以一年为限，出国进修期间以二年为限，如必要延长时，应呈请“教育部”核定。

第七条 凡在校连续任教三年以上，而申请出国讲学、研究或进修者，得保留原职，并照支薪金一年。

第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申请借眷出国。(1) 出国讲学在6个月以上者。(2) 出国研究或进修在一年以上者。

1962年7月20日，台湾当局公布修订留学规程，其中规定在岛内大学或独立学院任助教职务2年以上者，在专科学校任助教职务3年以上者，可申请免试出国留学。从此以后，将一般教员出国进修列入了免试留学人员项内办理。

同时，为了发展科技，台湾当局还从1959年始，有计划地派出科技人员出国进修。台湾这种基于吸收西方发达工业国

家的科学技术成果，提高台湾科技水平的出国进修，选派的对象是各大专院校及研究机构的现职优秀科学研究人员，选派人员的执行单位为台湾“教育部”联合“中央研究院”组成的“‘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后该会改组为“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出国进修依性质不同分为三种，一是一般性的短期进修，增进某方面的知识或技能；二是修读博士学位；三是修读硕士学位。进修期限自3个月至3年不等。出国进修人员的往返旅费、学杂费、生活费等都给予补贴，但进修人员出国之前须签约，承诺进修完后返台工作。这种进修，随着台湾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研究所数量的增加及其水平逐步提高，从1975年后，开始减少，台湾当局始注重选派科技人员在本岛有关大学研究所进修学习。

台湾派科技人员出国进修情况，可参见下表（见下页）。

从1961年至1973年，到日本进修的台湾科技人员共119人，占同时期台湾派往各国进修总人数770人的15.45%，在美国之后居第二位，比位居第三位的英国超出92人，其人数是英国的4.41倍。

台湾实行教员和科技人员出国进修的办法，对岛内教育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961至1973年台湾科技人员出国进修情况统计表

组别	年度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一九六三年	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五年	一九六六年	一九六七年	一九六八年	一九六九年	一九七〇年	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二年	一九七三年	总计
组别	自然科学	12	11	10	14	12	11	10	11	22	26	33	31	26	229
		10	19	19	27	24	22	121							
	生物医学	6	8	8	7	7	9	9	12	23	32	43	38	34	236
	农科学	5	6	6	4	6	8	7	14	20	29	22	23	20	170
	人文社会科学								4	7				3	14
进修国家	美国	16	20	16	15	20	24	17	38	69	86	99	91	86	597
	英国		3	1	1		2	3	4	2	1	2	2	6	27
	法国	1		2											3
	日本	6	1	4	7	5	1	5	7	17	14	20	21	11	119
	西德荷加澳		1	1	2		1	1	2	3	5	4	2	2	24
合计		46	50	48	50	50	56	52	102	182	212	250	232	210	1540

第 二 章

留日学生与 20 世纪 前半期中国的发展

第 一 节

留日学生与 20 世纪前半期 中国的政治发展

1. 留日学生与中国国民党

留日运动史、特别是 20 世纪以来的留日运动史，同中国近、现代政治的发展，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留日学生对于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政治发展的作用，主要表现之一为，它造就了中国国民党领袖集团中一大批最为重要的人物，对于国民党的产生和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国民党是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最先产生的具有近代政党特征的政党，是 20 世纪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政党，也是在 20 世纪前半期走完了从兴盛到腐败全过程的政党。

中国国民党在 20 世纪前半期的历史，是由孙中山先生生前和身后两个不同阶段所组成的历史。孙中山先生生前时期国民党的历史，包括从兴中会产生到同盟会成立这一段中国国民党的前史在内，它同留日学生有特殊的关系。

这里所要讨论的是中国国民党改组之后的历史，主要是曾经留学日本的国民党人，在改组之后的国民党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着重以这一时期中国国民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为线索来讨论问题。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始终为实现民主共和国方案而努力奋斗，“并且从讨袁斗争和两次护法运动的失败中深刻认识到：中国封建专制政治根深蒂固，维护民主和法制异常艰难，单纯利用一个军阀去打倒另一个军阀，是一条惨痛的失败道路。”^①这就促使孙中山思想转变，积极进行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准备工作。1923 年 10 月 25 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会议宣布廖仲恺、胡汉民、林森，邓泽如、杨庶堪、陈树人、谭平山、孙科、吴铁城九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汪精卫、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智 5 人为候补执行委员，

^①肖效钦：《中国国民党史》，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第 113 页。

组成新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负责筹备国民党全面改组工作的中央机关。从这个中央机关中可以看到，除少数几人外，多数都是曾经留学日本的留学生。其中，除廖仲恺、李大钊以及汪精卫外，其他人简况如下：

胡汉民，1879年12月9日生于广东番禺县（今广州）。1902年东渡日本入东京宏文学院师范科学习。1904年冬再次赴日留学，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学习。1905年秋，与廖仲恺同时加入同盟会，任评议部议员，后任书记部书记。11月担任《民报》编辑，在《民报》发表一些政论文章，宣传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与保皇派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任一系列要职，后在护法军政府中任交通部长，国民党改组后再次进入核心领导班子，以后还担任过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立法院院长，1935年任国民党中央常会主席。

陈树人，广东番禺人，生于1883年，1905年赴日本学画，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回国。讨袁失败后再赴日本留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23年后，任一系列要职：国民党中央常务部长、国民政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海外部长，抗战胜利后辞职。

古应芬，广东番禺人，生于1873年，1904年留学日本，次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后归国，曾参与讨袁、护法，1927年任南京政府常务委员兼财政部长，国府文官长。

许崇智，广东番禺人，生于1887年，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1905年加入同盟会，曾参加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

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24年国共合作后，任建国粤军总司令，1925年7月任国民党政府广东省省长兼军事厅长，曾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

以上是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一些留日人员简况。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孙中山任大会主席，主持了大会的全部活动。在这次大会主席团5人成员中，留日归国人员有3人，即胡汉民、汪精卫、谢持；宣言审查委员会9人中，留日归国人员有胡汉民、戴季陶、于树德、茅祖权4人；党章审查委员会19人中，留日归国人员有：谢持、丁惟汾、廖仲恺、茅祖权、朱霁青、汪精卫、戴季陶、居正、于右任9人；大会选举的25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留日归国人员有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丁惟汾、邹鲁、覃振、石青阳、熊克武、于右任、于树德13人，占总数近60%。中央监察委员5人，其中留日归国人员有：吴稚晖、张继、谢持3人。国民党一大闭幕后，于1924年1月31日至2月6日，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召开了一届一中全会。全会主要内容之一是，推定中央执行委员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为常委，处理日常事务，其中廖仲恺、戴季陶2人为留日归国人员。戴季陶，原籍浙江吴兴，1890年生于四川广汉，1905年秋赴日本，入师范学校，1907年秋升入东京大学法科，任该校中国留日学生同学会会长，1909年夏回国。在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被推定为中央常委兼中宣部长，后任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

留日归国人员在国民党发展中，有的起了促进作用，有的则起了促退作用。例如西山会议就是如此。这个会议是一次公开进行分裂国民党，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活动。西山会议派的主要人物谢持、邹鲁、张继等人都是留日归国的。出席西山会议的国民党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留日归国人员有：邹鲁、居正、覃振、石青阳、沈定一、茅祖权。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给国民党带来危机。为坚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1926年1月1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严肃处理西山会议派问题。大会主席团6名成员中留日归国人员有：汪精卫、丁惟芬等人。1926年1月22日至25日，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二届第一次中央全会，会议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9人，其中留日归国人员有：蒋介石、汪精卫、林祖涵、胡汉民等。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5人，其中留日归国人员有：古应芬，陈璧君等。

1929年3月15日至27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大会主席团9人中，留日归国人员有：蒋介石、胡汉民、古应芬、于右任（未到）。蒋介石作党务报告，何应钦（也是留日学生）作军事报告。国民党三全大会后，于3月28日至4月8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三届一中全会。会议推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9人；其中留日归国人员有：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于右任、丁惟汾等5人。

丁惟芬生于1874年，1904年留学日本，次年加入同盟会，后与人创办《晨钟》周刊，1907年回国。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历任国民党北京办事处主任、青年部长、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中央执行委员会

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任中央宣传部长、监察院副院长等。

1931年12月22日到29日，国民党宁、粤、沪三方中央执、监委员在南京联合召开四届一中全会，宣布党的统一，并改组南京国民政府，推选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这时被称为国民党三巨头的全部是留日归国人员。

1935年11月12日到23日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中央党部召开。12月2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监委员会宣誓就职，同时举行五届一中全会，会议推选9人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其中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丁惟芬、邹鲁等5人是留日归国的。在这次中全会上首次任常委的邹鲁，1885年生于广东大埔县，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4月参加广州起义，1913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二次革命”以后，他被迫流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1914年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任东京《民国》杂志编辑。1917年，孙中山在广东组织护法军政府，邹鲁任财政部次长，后任广东省财政厅长，自国民党五大被选为中央常委后，六大仍续选为中央常委。另外，张继在国民党五大上代表中央监察委员会作了党务报告，并在五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他生于1882年，河北沧县人，1899年赴日留学，先学于东京善邻书院，后入早稻田专门学校。1902年他参加东京留学生青年会，同年由秦力山介绍在横滨得识孙中山。1903年与邹容等剪去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发辫，被逐回国。1904年与黄兴等一同被拘于上海，获释后再赴日本，被推为留学生会总干事。

1905年8月张继在东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同盟会本部司法部判事，任《民报》编辑人兼发行人。1913年4月，第一届国会成立，被选为参议院议长，1921年任国民党宣传部长，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5年11月参与组织西山会议派。

1938年4月6日，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会议选举了15人为中央常务委员，其中丁惟汾、居正、于右任、戴季陶、阎锡山、邹鲁、何应钦等为留日归国人员。在这次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常委的居正，是西山会议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生于1876年，1905年赴日留学时加入同盟会，任同盟会机关报《中兴报》编辑。1908年赴南洋从事革命活动，1910年返日本后与宋教仁等筹建中部同盟会，谋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后归国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任内务部次长，1922年任广州护法军政府内务总长，后长期担任司法院院长等职。同在五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常委的阎锡山，生于1883年，山西五台人，1902年考入山西武备学堂^①。1904年他被清政府选送日本留学，先入振武学校，后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期间他结识了孙中山，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1905年10月加入在军人中成立的铁血丈夫团。1909年毕业回国后，参加陆军部举办的留日归国学生会试，考列上等（分优上中三等）。^②辛亥革命后，任山西都督，长期盘踞山西，国

^①荣鸿胪、李志舆：《太原解放前山西历届军事学校概况》，载《民国人物传》第四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90页。

^②《晋阳公报》1909年11月8日，载《民国人物传》第四卷，第90页。

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垮台前夕，曾任广州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另外也是在这次中全会上被选为常委的何应钦，是贵州兴义人，生于1890年。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6年回国后曾参加护法之役，在国民党改组后，长期担任军事要职，1949年还任过一段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

在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为了坚持一党专政，准备内战，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接着，5月28日到31日，在重庆召开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会议推选了25人为中央执行常务委员，其中有于右任、居正、戴季陶、何应钦、邹鲁、丁惟汾、程潜等人。上述诸人均是留日归国人员。程潜是湖南醴陵县人，生于1881年，1906年留学日本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他曾任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广东大本营军政部部长等一系列要职。北伐战争时期，他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抗战胜利后，任武汉行辕主任。1948年他参加副总统竞选失败后，任长沙绥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1949年8月他以国民党元老资格在长沙宣布起义。

2. 留日学生与中国共产党

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政治发展史，是中国国民党走上政治舞台的历史，更是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最终主导了中国政治发展方向和道路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曾有一大批自日本留学归来的有志之士，参加到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来。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曾经起了显著的、重要

的作用。例如，中国共产党早期最主要的两位领袖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自日本留学归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内，曾有很多人是在国外旅居过的。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人名词典》^① 中 1113 人作统计分析，发现其中曾旅居国外的有 270 人，占总数的 24.3%。

他们在各个国家的分布可见下表：

中国共产党人旅居国外情况一览表^②

类 别 分 布	人 数	在旅居国外总 人数中的比重 %	在抽样总人数 中的比重 %
日本	70	25.9	6.3
苏联	115	42.6	10.3
美国	12	4.4	1.1
法国	47	17.4	4.2
德国	12	4.4	1.1
英国	8	3.0	0.7
印尼	1	0.4	0.1
新加坡	1	0.4	0.1
马来亚	1	0.4	0.1
南洋	1	0.4	0.1
加拿大	1	0.4	0.1
菲律宾	1	0.4	0.1
欧洲	1	0.4	0.1
合计	270	100	24.3

注：1. 表中指的旅居国外，包括留学、流亡、工作等，不包含临时出国开会、办公务的人。

2. 以上统计的是旅居国外的人次，一人旅居多国作分次统计。

^①徐为民编：《中国共产党人名词典》，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8 年。

^②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人名词典》，统计总数：1113 人。

上表说明，在我们的统计对象中，旅居国外的人员占较大比重。其实在整个中国共产党内，旅居国外的人达不到这么大的比例。但由于列入“词典”的均属“名人”，因而比例就显得大一些。而在全部旅居国外的中国共产党人中，以去苏联的比重最高，达115人，占旅外总人数的42.6%。其次就是旅居日本的，共70人，占旅外总人数的25.9%。就是说在统计对象中，中国共产党内曾旅居日本的人员达到1/4略强的程度。这一点对于认识留日学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根据，因为所谓旅居日本的多数是留学生。

留日人员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作用，始于共产党早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在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国内外的共产主义小组共有8个，即国内6个：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国外2个：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和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在上述共产主义小组中，除长沙、济南、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外，其他共产主义小组中都有留日人员参加，其中尤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留日人员最多。现对各小组中留日人员情况简介如下：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有15名成员，其中有7人曾经留学日本，他们是：

陈独秀，他的留日经历在本书“五四”运动一节中有专门介绍，这里不再重复。他回国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成为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李汉俊，生于1890年，湖北省潜江县人，1902年留学日本，1918年回国。1920年他和陈独秀共同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负责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工作，并参加《新青年》

杂志的编辑工作。1921年他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后脱党。

陈望道，生于1890年，浙江省义乌县人，1915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后来，长期从事党所领导的文化教育及救亡工作。

李达，生于1890年，湖南零陵人，1913年赴日本留学。1918年为抗议《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他同黄日葵等人回国，与邓中夏、许德珩等人共同发动向北京段祺瑞政府示威请愿运动。失败后他再赴日本，放弃理科学习，专攻马列主义。1920年回国，同陈独秀等人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2月，他代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主持筹备中共一大工作，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宣传局主任。1922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1923年因与陈独秀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发生争执，脱离中国共产党。后来，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工作。

邵力子，生于1882年，浙江省绍兴县人，1906年赴日本学习新闻，并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归国后致力于革命思想的宣传工作。1920年在上海参加共产主义小组，1926年退出中共后，在国民党内任一系列要职，一生被人誉为“和平老人”。

林伯渠，生于1886年，原名祖涵，湖南省临沅县人，1904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赴苏联学习和任教。1932年回国，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

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和财政部部长等职，参加了长征。1936年西安事变后，从事统战工作。1937年冬至1948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沈泽民，生于1902年，浙江桐乡人，1920年赴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半工半读，参加少年中国学会。1921年回国，4月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31年初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5月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鄂豫皖省委书记。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委员。

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有12人，现仅知其发起人和领导人李大钊是留日学生。他于1916年回国后，和陈独秀一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1920年9月，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李大钊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武汉的共产主义小组有7人，其中有3人曾留学日本，他们是董必武、张国恩、刘伯垂。

董必武，生于1886年，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到日本大学攻读法律，不久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关于这一段留日情况，他后来回忆道：“癸丑失败以后，我同我们同邑的张眉宣先生一路跑到日本去，当时中山先生得廖仲恺、胡展堂（即胡汉民）、陈英士（即陈其美）、谢慧生（即谢持），居觉生（即居正）诸先生等之助，在日本东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入党的党员要宣誓服从总理，要打指模。有很多的同盟会员不愿意这样干。实际上，也有很多的老革命党员在新的严重失败后，不愿意继续再干革命，借口拒绝宣誓和打指模而不入党。我同张眉

宣先生经居觉生先生的介绍谒见中山先生。先生着现在所谓中山装的青衣服，容貌美秀而文静，如我们平素所看的像片一样。先生辩才无碍，指示中国的出路，惟有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特别鼓励我们失败后不要灰心短气，要再接再厉地努力去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要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想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先生对于那些悲观失望的老革命党员，深致惋惜。我和张眉宣先生在谒见先生后，都成为中山先生的信徒。先生这几句训示，永远活跃在我的脑海中。”^① 1915年董必武回国参加反袁斗争，曾两度被捕。后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1920年秋，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张国恩寓所秘密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武汉支部。1921年董必武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武汉区委执行委员，中共武汉地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委员。

张国恩，“生卒年不详，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他曾与董必武一起投身辛亥革命，加入同盟会，1914年又同赴日本留学，并加入中华革命党，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成立时，他是成员之一，但不久脱离小组。”^②

刘伯垂，生年不详，湖北省鄂城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曾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1920年在上海被陈独秀吸收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员，不久受陈独秀委

^①董必武：《回忆第一次谒见中山先生》，载《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39页。

^②董必武：《回忆第一次谒见中山先生》，载《董必武选集》，第39页。

托，到武汉帮助筹建武汉共产党组织，成为武汉支部的重要发起人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曾任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书记长。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托洛茨基派组织无产者社。

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施存统，一个是周佛海。

施存统，生于1890年，浙江省金华县人，是上海共产党组织最早的成员之一。他回忆说：“1920年6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等也参加了。当时，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主张成立党。由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无名）五人，起草纲领十余条。陈公培抄了一份到法国，我抄了一份到日本。”^①“我于1920年6月20日去东京，与周佛海取得联系，成立日本小组，陈独秀来信，指定我为负责人。”^②“1921年7月1日第一次党代会时，日本小组还只有两个人，即我和周佛海。我们二人互推担任党代会的代表，最后由周出席（因为周已多年未回国）。1921年7月后，东京小组发展到十来个人，其中有澎湃同志，还有一个好像叫杨嗣震，其余的名字已忘。该小组由我负责，小组成员多数是留学预备生。开过二三次小组会，会议内容已记不清。1921年底，共产国际在伊尔库茨克开会，反对华盛顿会议。第三国际派张太雷去日本，通知东京小组代表参加会议（因当时日苏没有邦交，不便派苏联人去

^①《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781页。

^②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载《共产主义小组》（下），第787页。

日本)。同年12月，我与几个日本共产党员一起被捕。当时东京小组与日本共产党没有组织上的联系，我个人与日本共产党员堺利彦、山川均等有联系。1922年1月我回国。后东京小组情况就不清楚了。”^① 施存统回国后，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部书记，后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革命失败后，脱离中共党组织。后从事理论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旅法共产主义小组中周恩来此前曾是留日学生。他于1917年赴日本求学，1919年回国后在天津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至1924年在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称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参加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工作。后来他长期在党中央主要领导岗位工作。

总的看，国内外各共产主义小组，计约有59人，其中14人是留日成员，占总数的近四分之一。这一事实表明留日人员在中国共产党建立过程中确实具有重要作用。

进一步看，不少留日归国人员在中国共产党发展过程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的历次代表大会上，被选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例如：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沈泽民、林伯渠、董必武、周恩来，彭湃、王若飞、吴玉章、杨匏安、邓子恢、廖承志等人，都是党的一大到七大之间的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

此外，还有一大批留日人员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曾在党中

^①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载《共产主义小组》（下），第785页。

央各部门作过重要工作，或在中共各地方组织中从事过重要工作，或在中共领导的各种专业部门工作，并且卓有成绩。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与留日学生确有密切关系。那些曾留学日本的一大批人，利用在国外的条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回国后走上了革命道路，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中英勇奋斗，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尽管有些人后来离开了中国共产党，导致不同归宿。但是中共党内大部分留日归国人员，始终没有改变革命的初衷，没有改变光明的选择，在这条道路上一直奋斗了毕生，从而为 20 世纪前半期留日学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写下了重要的一章。

3. 留日学生与中国的民主党派

留日学生与中国民主党派的关系，是留日学生与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政治发展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留日运动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政党林立，派系纵横。据史学家讲，这一时期中国的民主党派共有 18 个，即：“持续存在到今天的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盟 8 个民主党派；经历了长期发展，于 1949 年 9 月参加了中国人民政协，但由于各种原因而于同年底宣布结束或与其他党派合并了的民主党派有 3 个：中国人民救国会（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促）；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但早已结束或与其他民主党派融合了的民主党派有 5 个：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民权同盟）、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民族大同盟）、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旅

美联盟)、职教社派、乡村建设派”^①，以及中国青年党（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国社党，后改为民社党）。

上述民主党派大都与留日学生有程度不等的关系，下面分别予以说明。

第三党。1928年3月中华革命党成立，它是中国革命史上最早建立起来的一个民主党派，即第三党的前身。它于1930年8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5年11月又改组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2月再次改组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革命党成立时，推选邓演达、谭平山、章伯钧、季方、郑太朴、朱蕴山、黄慕颜、邓初民、张申府、李世璋、马哲民、王枕心、张曙时等为中央领导机构成员^②。其中张曙时是留日归国人员。他生于1884年，江苏省睢宁县人，1906年留学日本，1907年回国，1909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他任临时政府司法筹备处秘书等职，1913年参加反袁护法运动，接着加入中华革命党。后任中华革命党南京支部长，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次年，成为第三党（中华革命党）的中央领导成员之一。

当时，参加中华革命党筹备与建立的还有郭冠杰、高一涵、张资平等，他们也是留日归国人员。郭冠杰生于1892年，广东梅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第三党后，他任中山大学法学院法律学系主任、法学院院长。1949年作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代表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高一涵1916年毕业于

^①廖益隆为张军民著《中国民主党派史》作序，华夏出版社1989年。

^②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第49页。

明治大学政治科，旋即回国。1927年后，历任几年大学教授及国民党政府监察院委员、两湖监察使等职。张资平生于1893年，广东梅县人，1911年入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学习。1921年7月，他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次年回国。1924年以后在大学任教时参加第三党。1940年3月参加汪南京政府，任“技正”职，专管技术人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受到法律追究。

在第三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时期，中央领导机构25名干事中，郭冠杰、陈豹隐等为留日归国人员。陈豹隐生于1886年，四川中江人，1907年赴日本留学。1916年发起组织了丙辰学社（中华学艺社的前身），创办《学艺》杂志，宣传各种新思潮。1918年毕业回国。

在第三党改组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时期，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19名中央委员中，留日归国人员郭冠杰任总务委员会书记。为筹备改组工作，郭冠杰等去日本，漆琪生等回上海，与各方面联系进行筹建组织活动。漆琪生在参加第三党之前，曾于1923年赴日留学，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回国后脱党，在大学任教。

第三党改组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时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有25人，其中包括前已介绍的留日归国人员郭冠杰。

中国致公党。1925年10月10日，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它是以海外华侨、归侨为主要成分的政党，其前身为洪门致公堂。大会选举此时正在香港当寓公的唐继尧为副总理，（唐继尧是留日学生）他一年多后于昆明病死。1947年5月1日至10日，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香港举行，会议选举李济深为中央主席，陈其尤为副主席，他们两人都是留日归国人员。陈其尤生于1892年，广东海丰人，辛亥革命后到日本留学，1916年在日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回国后在政府任职。1931年他加入中国致公党，并参加了在香港召开的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负责人之一。

1935年7月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也叫“民族革命大同盟”或“大同盟”）在香港成立，1937年10月在南京结束。该组织中央委员中李济深、翁照垣等为留日归国人员。翁照垣，广东潮州人，1929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1931年任十九路军一五六旅旅长。“大同盟”就是在福建事变失败后，由十九路军的主要将领联合其他国民党民主派，建立起来的一个政治组织。

1936年5月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在上海博物院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会议室举行成立大会。大会选出的常务委员有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孙晓村、曹孟君、何伟、张申府、刘清杨等15人。其中何香凝、沈钧儒等为留日归国人员。“救国会”在民主党派历史上是一个存在时间相当长，而且有较大影响的大党派，也是组建“民盟”的“三党三派”的一大政治派别。它是以上海文化界及其他各界救国联合会为核心的全国性救亡组织，成立后曾发动和领导了全国性的救亡运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著名的“救国会派”。1941年救国会参加发起民主同盟，1945年12月该会改组为中国人民救国会，投入了争取和平民主的斗

争。1949年9月参加新政协，是年底宣告结束，其成员大部分加入民盟或保留盟籍。下面对其主要领导人沈钧儒的留日情况作一简介。

沈钧儒生于1875年，浙江嘉兴人。1905年9月，沈钧儒在留日运动的高潮中，辞去京官不做，去日本学习。他进的是东京私立法政大学速成科。50年代日本学者平野义太郎曾说：“沈钧儒在入法政大学速成科以前，便已在中国考取了进士，故虽然是短期，但其成绩却是意外的良好，比三年制的正科更为优异。”^①沈钧儒到日本后，思想从传统的封闭模式中解放出来，对政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很快投身于救国运动。1907年秋，沈钧儒从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毕业回国，先从事立宪运动，后转向革命。“九一八事变”后，从事抗日救亡斗争，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为“七君子”之一。

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正式建立。它是国共以外的各抗日党派的政治联合体，是抗日民主运动中一支有生力量。1944年9月，该盟改称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主同盟或民盟。1947年11月，民盟总部曾被迫宣布解散。1948年1月召开了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恢复了民盟总部，并确定了新的政治路线。民盟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建立新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成立大会上选举黄炎培、张澜、左舜生、张君勱、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李璜、江向渔、冷商、杨庚陶、丘哲、林可玘为中央执行委员。其中张澜、张君勱等为留日归国人员。民盟初由黄炎培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不久

^①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50页。

黄炎培辞职，由张澜任主席。

张澜是民盟的最主要领导人，自民盟成立后不久任主席，一直到1955年逝世为止，一直担任民盟主席职务。他生于1872年，四川南充人，“1903年以学习成绩优异，被选送日本留学，入东京宏文学院师范科学习。这时，他政治上倾向君主立宪。1904年在东京中华留日学生会上，他提出西太后退朝，还政于光绪的主张，被清政府驻日公使派人押送回国。”^①回国后，参加立宪运动和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后，一直在中国民主运动的最前线英勇奋斗。

在民盟的发展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有不少留日归国人员参加了各种争取民主的活动，并担任了一定的负责工作。现举例如下：

张君勱，生于1887年，上海宝山人，“1906年得宝山县公费派送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同时选修德语。在日期间，结识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次年9月，加入梁启超在东京组织的‘政闻社’。1908年政闻社总社迁上海，张君勱主持东京的社务。他曾致函梁启超力主加入官场，广占势力。1909年6月，张与关贯因等在东京设立‘咨议局事务调查会’，8月，创刊《宪政新志》，宣传君主立宪。1910年夏天毕业回国，参加清政府鉴定留学生的考试，被授翰林院庶吉士。”^②1933年，与张东荪组织国家社会党。抗战期间，参与

^①宗志文：《张澜》，载《民国人物传》第三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66页。

^②江绍贞：《张君勱》，载《民国人物传》第二卷，中华书局1980年，第409页。

组织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国社党与民主党合并为中国民主社会党，张君勱任主席。

张东荪，生于1886年，浙江省杭县（今余杭县）人，早年留日，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在大学任教，1921年曾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会议，后参加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1934年与张君勱等组织国家社会党，任中央总务委员，1946年退出。后参加民盟，任中央常委。

周鲸文，生于1908年，辽宁锦县人，张作相外甥。早年毕业于北京江文中学。先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密执根州立大学、英国伦敦大学留学，攻政治学。1937年回国，后成为民盟桂林核心小组成员。

何公敢，生于1889年，福建福州人，早年赴日留学，参加民盟后曾任中央委员及民盟重庆和南京市支部长等职。

另外，民盟成立时“三党三派”之一的青年党，其主要领导人曾琦也是留日归国人员。

曾琦，生于1892年，四川隆昌人，1916年春，赴日留学，入东京中央大学学习宪法与行政法。1918年中国留日学生因反对中日军事密约罢学归国，曾琦先到北京，与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赴法留学，1923年12月2日纠集李璜、何鲁三等人创立中国青年党，被推为党务主任。在1926年七八月间召开的青年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38年，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日本投降后，在青年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青年党主席。

1945年12月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会）正式成立。它是

以民族工商业家及与其相联系的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政治组织。民建领导成员中，李烛尘、施复亮（施存统）、杨卫玉等都是留日归国人员。

李烛尘，生于1881年，湖南永顺人，原名华搢，土家族，秀才出身，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电气化学科毕业。1918年回国后，任久大精盐公司技师和厂长、永利制碱公司副总经理。“七七”事变后，将厂撤至四川。1943年任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参加创办中国经济事业促进会、中国工业协进会。抗战胜利后，参加发起组织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曾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以社会贤达身份代表产业界参加旧政协会议。1949年代表工商界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建国后，曾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食品工业部部长、轻工业部部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委、民建中央副主委和代理主委、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1968年10月7日在北京病逝。

杨卫玉，生于1888年，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尚贤堂书院理科，后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辛亥革命后曾在江苏办学，推行新教育。1924年后参加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长期任该社副理事长。1945年参加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任轻工业部副部长、民建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病逝。

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会）在上海成立。它是以文化教育及出版界的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工商界的爱国主义士为主要成分的政治组织。1946年1月4日，民进

会第一届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组成中央领导机构。一致推选马叙伦、陈已生、王绍鳌为本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其中王绍鳌等有留日经历。

王绍鳌，生于1888年，江苏省吴江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11年毕业回国，“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救亡斗争，抗战胜利后，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与马叙伦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

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成立大会在重庆青年大厦举行。它的前身是民主科学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由时事座谈会和自然科学座谈会在再次兴起的宪政运动中联合组成。九三学社的历届领导人中，留学欧美的人较多，但也有留日的人员。如九三学社成立时，被选为理事的褚辅成和吴藻溪、被选为监事的梁希都是留日归国人员。褚辅成生于1871年，浙江嘉兴人，日本东洋大学高等警政科毕业。吴藻溪生于1904年，湖北崇阳人，日本帝国大学农学部毕业。梁希生于1883年，浙江吴兴人。抗战胜利后，他参加发起创建九三学社。

1948年1月1日，在香港坚尼地道52号正式召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简称民革）。李济深主持了大会，大会选举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选举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陈其瑗、陈劭先、王葆真、朱蕴山、何公敢、张文、郭春涛、朱学范、邓初民、李章达、李民欣为中央常务委员。选举柳亚子、李锡九、陈汝棠等18人为中央监

察委员^①。其中李济深、何香凝、王葆真、何公敢、邓初民等都为留日归国人员。

李济深，生于1885年，原籍江苏，生于广西苍梧，早年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曾留学日本。王葆真，生于1899年，河北深泽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

何公敢，1889年生，福建福州人，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任福建学院院长等职。邓初民，1889年生，湖北石首人，1913年留学日本，1917年回国。

何香凝，原籍广东省南海县棉村乡，1879年生于香港，1897年与廖仲恺在广州结婚，1902年他们相继东渡日本留学。有关在日本的情况，何香凝1961年在《我的回忆》中有详细介绍，现转述如下：1903年初，何香凝入东京目白女子大学。入学之后，她觉得日文程度不够，听课有困难，当时的日本女子大学校长成濑寅藏，就请人帮助她学日语文。这个时候，何香凝除了每日在寄宿舍加紧学习日语文之外，有时也和廖仲恺一起参加中国留学生的各项活动。1903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们到神田神保町的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留学生的聚会，在会场上初次看见了孙中山先生，几天以后，他们又拜访孙先生。孙先生指示他们先在日本留学生中物色有志之士，广为结交。此后，他们积极在留日同学中进行联络宣传工作。1904年初，何香凝回香港分娩生下梦醒后，恐怕在日本照顾小孩不方便，于是独自返回日本。1905年孙先生在日本筹组同盟会，要在她家开会及收信。何香凝十分赞成，为了保守秘密，还特

^①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第615页。

意去找一间合适的房子。几天以后，由本乡搬到神田，连女佣也没有雇，每天下课以后亲自操持家务。自此以后，她家就成为通讯联络站和集会场所，孙先生每星期召集同志在这里开会两三次，经常在这里计议和筹划各种革命工作。1906年秋天，她结束了女子师范预科的学习，再考入目白女子大学博物科攻读。1908年生下了承志之后，改入本乡女子美术学校高等科学绘画，同时也是日本帝室画师田中赖章的学生，画老虎、狮子就是跟田中赖章先生学的。这一段时期，她一面学习美术，一面一直都为孙先生照料秘密集会和通讯联络机关。筹划起义的很多准备工作都是在她家里部署的。起义部队所用的旗帜符号，有一些就是她在孙先生的指导下描绘和刺绣缝制的。她在留学日本而又进行革命的整个期间，生活清苦，娘家给的钱统统都花用在这上面了。1911年春，她已在本乡女子美术学校毕业，回到香港娘家居住。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们再次亡命日本，在东京千驮谷安下家来。何香凝过去一向在日本留学生中做宣传联络的工作，这些年虽然已经结束了留学生的生活，但是为了护国讨袁的事业，她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集会上还演讲过几次^①。国民党改组后，何香凝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1925年，孙中山临终口授遗嘱，她是当时在场的证明人之一。1928年国民党二大上，她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续任妇女部长。以后，一直为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志而斗争。抗战时期，她积极发起筹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终于在1948年，

^①何香凝：《我的回忆》，载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06—920页。

和其他人士一起组成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李济深之后，她接任了民革中央主席。

从何香凝的留日经历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体会到，在中国民主党派的发展过程中，那些留日归国的一大批有志之士和有识之士，为中国现代民主运动发展，作出了多么重要的贡献。

4. 留日学生与中国的汉奸集团

在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政治发展中，接连有一批汉奸人物出现，及至形成汉奸集团。汉奸集团中的首要人物，多为留日归国人员。他们留日归国后，最终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门下，甘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走上了背叛中国人民的道路。因此说，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汉奸集团，与某些留日人员有着重要的联系。不认识到这一点，就看不清留日学生与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政治发展关系的全貌。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随着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对外侵略的野心也日益膨胀，而中国始终是他们打算劫掠的对象。1894 年的甲午战争，是他们侵略中国活动的一次预演，战争中日本打败俄国，其对外扩张的狂潮更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给了日本一个难得的机会来打破列强在中国的均势。20 年代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思想更加明目张胆。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再发动华北事变，开始了大规模侵略中国的行径，再后，其侵略的魔爪向中国的广大腹地延伸。日本帝国主义在势之所及，纷纷扶植伪政权，收买中国人作汉奸。

日本侵略势力在中国建立伪政权的思想，可推及到甲午战争时期。甲午一战，日本虽然打败俄国，但由于当时国际政治格局久已形成，日本一时还无法实现独占中国东北的计划，因此一些军国主义分子纷纷提出了对满洲实行委任统治的主张。日本帝国大学法学博士户水宽人，在其所著《亚细亚东部之霸权》一书中提出：“名义上归还满洲于支那，而事实上以为日本之领土，一旦支那内地有乱，我日本驻屯满洲军直可以蹂躏支那。”有贺长雄认为由日本独占满洲是难以行得通的，霸占满洲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局部保护权”，其办法有三：（一）代理统治主义，即满洲仍属中国主权，但由日本天皇受中国之委任而实际统治；（二）联合行政主义，即日本与中国共行主权于满洲；（三）监督行政主义，即满洲事务由中国自行，日本立于监督者地位。

有贺长雄等人的这种“委任统治论”，在日本侵略中国后果然得到了实行。

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后，先后扶植了许多汉奸政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植了伪满洲国、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等。“七七”事变后，日本又先后扶植了伪“蒙疆联合委员会”、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等。

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935年11月在河北通县（今属北京）成立，公开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

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是伪“察南自治政府”、伪“晋北自治政府”和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拼凑而成的。伪“察南自治政府”于1937年9月4日成立，辖区是察南地区沦陷的

万金、怀安、阳原、蔚县、涿鹿、宣化、怀来、延庆、龙关、赤城等县，首府设于张家口。伪“晋北自治政府”于1937年10月15日成立，辖区为山西晋北13个县。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于1937年10月27日成立。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7年12月14日成立，是华北的汉奸政权。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38年3月28日成立，是华中的汉奸政权。

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1940年3月30日成立，首府设于南京。

上述大大小小的汉奸政权，有大有小。小的如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它是继伪“满洲国”之后日本扶植的第二个汉奸政权，其首脑人物为殷汝耕。殷汝耕，1885年生，浙江平阳人，早年赴日留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归国后在各军阀之间进行政治投机，后投靠国民党亲日派黄郛，1927年以国民党政府驻日代表名义，代表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联系，“九一八”事变后参加签订《淞沪停战协定》，1933年参加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在其他的汉奸政权中，也多有归国的留日人员参加，如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中，总务厅长陶克陶肄业于日本大学，财政部长吉尔嘎朗毕业于长崎高等商业学校。再如成立于1938年1月1日的南京自治委员会，共10名委员，其中5人曾经留学日本：会长陶锡三、秘书长王仲调、委员赵威叔是日本政法大学毕业生，委员赵公瑾为长崎医科大学学生，委员王春生为日本警察专科学校毕业生。

在众多的汉奸政权中，汪精卫所组织的伪政权是影响最大

的，而在汪精卫所组织的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和伪政权中，一些重要人物，如汪精卫、褚民谊、李圣五、董道宁、周佛海、曾仲鸣、陈群、傅式说、徐良、杨揆一等人都是留日归国学生。汪精卫汉奸集团为了削弱人民群众的抵抗感情，严格模仿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组织形式、机构设置、政治程序和法律规章建立起来，并继续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以冒充国民党政权的法统和思想道统的真正体现者。

汉奸政权不仅自己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还拉人下水，如在北平，先后有张心沛、徐祖正、周作人、何其巩、张水洪、陶尚铭、韩秋圃、赵祖钦、钱稻荪、齐元模、石志泉、鲍鉴清、阮白介、郑款敬、张秉辉、王伯庸等归国留日学生受到威胁，被迫参加了伪政府的教育机构，担任或挂名沦陷区高校的校长、学院院长等职。

在汉奸政权统辖区内，还出现了大大小小、名目繁多的“民众团体”，如“亚洲黎明会”、“中华佛教会”、“报国爱民会”、“中日联谊会”、“日华农学会”、“东亚文教协议会”、“新民会”、“大民会”等等，这些“团体”或多或少都有为汉奸政权及日本帝国主义而鼓噪的色彩，最明显的是，汤尔和、曹汝霖、朱深、王揖唐等归国留日学生组织的“中国留日同学会”、“中华留日同学会”，为汉奸和卖国贼鼓噪的论调就更多了。

在伪“满洲国”，留日归国人员充当政要的情况同样存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汉奸伪政权彻底覆亡，汉奸人物也多受到正义的制裁。但是他们近10年间的政治经历，却为留日学生与20世纪前半期中国政治发展的关系写下了令人遗憾而深思的一章。

第 二 节

留日学生与 20 世纪前半期 中国的社会发展

1. 留日学生回国从事金融商业活动

留日学生归国后，有些人在经济界中活动，从而对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比如在金融和商业领域，都有他们的贡献。

在金融领域，有不少留日归国的人士，相继崭露头角，在中国近现代一些重要银行中担任要职，为推动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发挥了比较显著的作用。例如，曾任交通银行董事长的钱之新，就是其一。他是浙江吴兴人，生于 1886 年，清末，他在北洋大学未毕业，即往日本，入神户高等商业学校学习。毕业返国后，在南京高等商业学堂教书。二次革命时，与友人组织捷运公司，经营轮船运输业务。1907 年他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从此进入了银行界。1921 年，他在上海经营交通分行，业务较有进步。1922 年 6 月钱之新为江浙交通银行协理，操实权于手，奠定了他在银行界的地位。1925 年钱之新一度被排挤出交通银行。1928 年，南京政府改组交通银行，他再为常务董事。1938 年 8 月，他在重庆担任了交通银行董事长，重掌实权。

再如，曾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张嘉敖也是留日归国人士。他于 1889 年生于江苏宝山（今属上海），早年留学日本入庆应大学，醉心于明治维新日本财政金融的兴革事宜，并想模仿以

建立中国的新型银行。1909年毕业回国。1914年，他出任上海中国银行副经理，会同总经理宋汉章，拒绝袁世凯停兑令，在上海金融界的帮助下，照常兑付，以保持中行的信誉。1917年改任中行副总裁。1918年，中行商股增加，成立股东会，他被选为董事。1928年中行改总裁制为总经理制，张嘉敖当上了总经理。1929年，他赴欧美日本考察近代银行制度，并在伦敦、纽约、大阪成立中行分支机构。回国后，他致力于选拔人才和改革，健全会计制度，建立经济情报机构，促使银行存款大幅度增加，营业额逐步上升，为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再如金城银行的创办人周作民也是留日归国人士。他是江苏淮安人，早年留学日本，在帝国大学专攻经济。辛亥革命后归国，先在北洋政府的财政部担任过库藏司司长，又在代理国库的交通银行总行担任稽核课主任。后来，他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创办金城银行。该行的“资本积累逐步增加，业务发展也非常迅速，存款一度在全国商业银行中居于首位。它在华北一带，曾和中国、交通、盐业三大银行并驾齐驱。”^①

其他在金融界起了一定作用的旅日归国人士还有：唐有壬，他是唐才常之次子，1919年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理财科，回国后任湖北省银行行长、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调查部主任。陈朵如是浙江肖山人，1907年去日本留学，1912年辍学回国后在金融界任职，曾任上海分行副经理，浙江实业银行常务董

^①许家骏：《我所知道的金城银行》，载《文史资料选辑》第88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80页。

事。1945年他任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拨款支持中共地下组织。吴鼎昌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回国后任江西大清银行监督、上海大清银行监督。1912年后，任中国银行监督，1920年任盐业银行总理。冯耿光是广东省中山县人，日本士官学校第二期毕业，1918年3月到中国银行担任总裁算，1928年前曾两度担任总裁，以后一直专任常务董事，新华银行董事长。

在经商领域里也有不少旅日归国人士，其中著名人物之一是包达三。他1884年4月28日生于浙江镇海，1906年考上公费留学，东渡日本，先学商科，后转入明治大学学习法律。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回国到上海，1917年遂弃政从商。“包达三经商目光敏锐，颇具魄力。他先在开封开设开封制蛋厂，经营蛋品出口业务。不久，又在上海创办黄海渔船公司，购置机动渔船数十条，雇员出海捕鱼，获利甚丰。在商业活动中，他结交了沪上知名工商界人士虞洽卿、张澹如、盛不华、方椒伯等。1920年，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成立，包为创办人之一，当选为常务理事。此后包又在苏北一带办理盐垦，围垦盐碱地数千亩。”^①1927年“包达三等人根据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设想上海建立新市区的遗愿，倡议在江湾建设新上海中心地区，辟引翔港，谋取代上海租界为中心的旧上海。包为此集资开办地产公司，收购附近大量地产，经营房地产业务。在当地筹建引翔港跑马厅，自任董事长；并建造远东新村等住宅区，

^①汪仁泽：《包达三》载《民国人物传》第五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210页。

市面逐渐形成。……包遂成为上海著名的房地产资本家，任上海宁商总会理事等职。”^① 1941年，包先后在沪创办永达药厂、雷石化学公司，制造咖啡因等药品，自任经理职务。

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政局动荡，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很多归国的留日学生即使有抱负也是难展其才华，同样，他们在金融、商业领域也是难有大的作为，像上述那几位留日归国人员，也只能说他们在所居的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功，对这一时期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奉献。

2. 留日学生归国参加实业建设活动

20世纪前半期，有一些留日学生归国后，以令人钦佩的创业精神和救国激情，投身于中国实业建设的活动中。这是一项历史性的事业，是一项艰难的事业，是一项意义重大的事业。社会的发展终究是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根本标志。虽然在旧的生产关系没有变革以前，社会生产力不可能彻底解放出来，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社会发展所做的任何贡献，人民都是不会忘记的。

在中国20世纪前半期的历史上，归国的留日学生在实业建设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下面择其要者而述之。

在化学工业建设上，有一位自日本归来的人，曾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就是范旭东。

范旭东是中国化学工业的奠基人，原籍湖南湘阴，生于公

^①汪仁泽：《包达三》载《民国人物传》第五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211页。

元1883年10月24日（清光绪九年，癸未，九月二十四日）。据说湘阴范氏是范仲淹的后裔^①。世居长沙东乡。范旭东的哥哥范静生是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高足。早年东渡留学，参加了革命党人的活动后“恐累及胞弟，乃携旭东同行，匿居舱下，离湘经鄂，再次东渡。”^②范旭东1901年到日本，先入清华学校学日语。1902年末，《游学译编》创刊，范旭东参与编辑地理一栏。同时，因学习费用受到梁启超的帮助，曾向《清议报》投稿。1905年毕业于和歌山中学，同年考入冈山第六高等学堂学医，1908年进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学应用化学，“从近重真澄求学。近重真澄对古代合金的研究造诣很深，范旭东也搜集我国汉、唐钱币及金属器皿进行研究，尤其对中国冶金术探源的研究，别具见解，颇得近重真澄好评。”^③1910年在东京帝大毕业后，曾留校任专科助教。

1912年范旭东学成回国，先在财政部任职。不久，投身于实业建设，接连创办企业，在中国化工工业史上写下了重要的篇章。1914年他以改革盐政为目的，着手改良盐质的工作，创办久大精盐公司，一方面抵制洋货，一方面改善人民食盐卫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为解决国人剩盐缺碱之苦，首创工业用碱，成立永利制碱公司，1922年成立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1922年与青岛、济南实业家合办永裕盐业公司，经营出口盐业，1934年改组永利硫酸氨厂，到1937年2月正式

①任可毅：《纪念范旭东先生》，《化学工程》16卷，1949年3、4期。

②李杜川 陈敬文：《祖国事业科学人才——纪念实业家范旭东诞生一百周年》，载《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二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1页。

③同上，第2页。

开工投产。”^① 20多年来，范旭东由盐到碱，由碱到氨、酸，历尽艰难曲折，吃遍千辛万苦，终于使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

范旭东在实业建设中，周围曾聚集了一批自日本归来的创业者，他们同甘共苦，同舟共济，一同为中国化工工业的发展而努力奋斗。其中的一位重要合作者就是李烛尘。他是湖南永顺县人，清末秀才，1912年，李烛尘去日本留学。在日经过一段时间初习，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后称工业大学），攻电气化学。1918年，李烛尘毕业后回国，本来要受美孚油公司之聘去当买办，可是同范旭东通过几封信后，他深受这个以“实业救国”为毕生志愿的穷学生感染，一同走上了在荒凉苦寒的塘沽盐田创业的道路。“1919年初，他奉派去四川自流井调查井盐，费时数月，掌握了不少资料，为久大后来在川开拓盐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1920年范旭东等筹划以盐制碱，创设永利制碱公司，他遂去永利任职。1921年他去内蒙古伊克昭盟等地考察天然碱资源。”^② 回厂后与范旭东商议设立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聘请留美化工博士孙学悟主持其事。从此，举世闻名的久大、永利、黄海集团企业形成，由范旭东总理其事。李烛尘负起经理责任，在范旭东，侯德榜之下，位列第三，成为富有创业精神的老管家。他知人善用，使每人都感到自己是企业中不可缺少的人；他利用副产品生产牙粉、牙膏、漱口水，打开了新产品的产销之路；他预筹全国代销商号

^①李祉川 陈散文：《祖国事业科学人才——纪念实业家范旭东诞生一百周年》，载《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二辑，第2页。

^②张帆：《李烛尘生平简记》，载《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83页。

的点和钱，并在重点地区设立试验场，即后来设立的中央农业试验所的前身。总之，李烛尘与范旭东等人密切合作，共同奋斗，苦干20年，使盐田由渤海到黄海，并延伸到东海之滨；使盐产量由年产3万担，增至300万吨；使他们所谓的基本化工碱酸两翼，终于羽毛丰满，振翅起飞了。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中国，范旭东辛苦经营20多年的沿海各厂，尽陷敌手，但他并不灰心，振奋精神，迅速转移人才、物资，积极西迁，在四川自流井和五通桥重建永利、久大和黄海。1943年范旭东忧愤致疾，遽尔逝世。他的死引起重庆各界爱国人士巨大反响，1945年10月21日联合召开了追悼大会，毛泽东同志送了挽联：“工业先导，功在中华”，^①周恩来、王若飞两同志的挽联是“奋斗垂三十年、独创永利久大，遗恨渤海留残业；和平正开始，方期协力建设，深痛中国失先生”。^②新华日报的挽联是：“绩业早惊寰宇内；壮怀时在化工中。”^③

在纺织工业建设上，也有一批旅日归国的有志之士，为推动中国纺织业的发展而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自日本归国致力于纺织业建设的人士中，当首推禹之谟。

禹之谟是清朝末期流亡日本的革命者队伍中著名成员之

^①知峰：《范旭东——我国化学工业的拓荒者》，载《中国科技史料》1980年第2期，第2页。

^②张洪元：《我所知道的范旭东先生》，载《科学》28卷，1946年5期，第234页。

^③《遗恨渤海留残业，陪都各界追悼范旭东》，载《新华日报》（重庆）1945年10月22日。

一，走了一条从革命家到实业家的奋斗道路。他是湖南湘乡青树坪（今属双峰县）人，生于1866年。1894年他随湘军参加中日甲午战争，战后到上海，从事研究事业。1900年在汉口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他鉴于“空言不足求”救国^①，“遂至大阪、千代田等学习纺织工艺和应用化学。两年后，之谟业成归国，开始致力创办实业、兴学育才和革命活动。”^②1903年，他在湘潭设立湖南第一家近代纺织工业——湘利黔织布厂。1904年湘利黔织布厂迁长沙后规模扩大，改称“湘利乾织造有限公司”，并附设工艺传习所。“在禹之谟的示范和直接帮助下，宁乡、常德、湘乡等地均开设机织厂，湖南近代纺织业由此发轫。”^③他的才智和贡献受到了湖南商界的拥戴，被推举为湖南商会会董。1907年，禹之谟逝世。

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中，还有不少留学日本后归国的人，他们一同为纺织业的发展而作出了各自的努力。例如浙江鄞县人张方佐，1919年赴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纺织科留学。1926年回国后，相继在无锡振新纱厂、浙江萧山通惠公纱厂、南通大生纺厂、上海申新二厂、上海新裕二厂任工程师、厂长，并曾任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工务处长。可见，他和很多留学生一样，走的完全是一条学成归国参加实业建设的道路。

特别要指出的是，如同在其他各个实业建设领域里一样，

^①颜昌：《禹君墓碑》，转引自《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三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6页。

^{②③}刘强伦：《禹之谟》，转引自《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三卷，第146页。

在纺织业发展中奋斗的留日归国人士，他们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有些人令人痛惜地失败了，从而在历史上留下了发人深省的一页。例如，刘逸行、刘季五兄弟创办震寰纺织厂就是这样。他们兄弟俩自日本留学归来，积极致力于发展民族棉纺织工业，于1919年着手筹办震寰纺织厂。该厂“设于武昌上新河，1922年5月开工，共有纱锭26336枚，布机250台。资本共计洋例银122万两，1933年废两改元，以694的比例折合银元为1756800元，分为12200股，每股144元。”^①但是一开始就受帝国主义的欺骗、敲诈、盘剥，造成未开厂先负债的被动局面，种下了先天不足的根子，错过了中国纺织工业繁荣的短暂时机，终于在天灾人祸、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迫使震寰纺织厂在1933年5月23日宣告停工。

在留日后归国参加实业建设的人们中，有的人是一生都投身于工商业活动，有的则是著名的革命者，一生献身于“救国”大业。但他们仍不放过各种机会，也曾为中国的实业发展作出不少直接贡献。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杜重远。

杜重远生于1899年，在奉天省立两级师范附属中学毕业后，于1917年“考取官费留日，抱着‘提倡实业以救中国的愿望’负笈东渡，进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窑业科。他认为要想振业实业，可效法日人的‘创造和努力精神’，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他常于课后参观、实习，期望‘就实地工作获得真切

^①刘寿生、刘梅生：《震寰纱厂遭受帝国主义掠夺记》，载《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第76页。

的经验。’^① 1923年春，杜重远毕业归国，决心经营瓷业，以实现实业救国的夙愿。他求亲告友，凑集了六千元，在沈阳大北门外买地盖房，掘井筑窑，开始办起了小型砖厂。经过三年奋斗，他创办的肇兴窑业公司成为奉天省第一个新式砖窑。杜重远是一位精明干练的实业家，他不满足于已经获得的成功，继续借资、筹款，准备扩大企业。1927年，他借资30万元，在原有砖瓦厂的基础上又建成瓷器厂。他从大连等地聘请技师和技术工人，共同研究改进技术；从外国购置新式机器，采用新法烧制陶瓷。该厂出产的瓷器色泽优美，花纹新颖，销路遍于东北各地。到1930年，该厂职工已达600余人，年产各种陶瓷器约600万件，价值40万元。在沈阳，它是中国人自己经营的一个规模最大的窑业工厂。”^② 后来，杜重远献身于抗日救亡事业，以其英勇的业绩而名垂青史。

总之，在留日后归国参加实业建设的人士中，他们在人生的旅途上都走了各自不同的道路，但在他们的人生跑道上，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通过实业建设，为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从而使人们进一步认识了留日学生与祖国的密切关系。

3. 留日学生学成回国致力技术活动

技术进步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20世纪前半期学成归国的留日学生，曾有很多人在中国的各种技术领

^①杜重远：《狱中杂感》，第293页。

^②陈宁生：《杜重远》，载《民国人物传》第二卷，第311—312页。

域里工作，并在技术进步过程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

在中国蚕丝技术的发展中，费达生的贡献是很突出的。她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姐姐，1903年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同里镇，1921年“考入东京高等蚕丝学校制丝妇女养成科，以学习制丝技术为主。学习两年，看到日本以蚕丝兴国，在国际市场上稳操左券，夺取了我国的利权；学习中又受到日本人的鄙视与歧视，更激发图强的决心”。^①1923年夏天，她从日本学校毕业回到苏州母校。由于学校还没有设丝科，先搞蚕种工作。1924年春天，她来到临近太湖的开弦弓村，设立养蚕改进社，传授科学养蚕方法。当年改进社的春蚕丰收，各户收入成倍增加。第二年费达生任推广部主任，在农村成立指导所，实地巡回指导，成绩显著。1929年，开弦弓丝厂建成，这是中国农民自己创办的第一个小丝厂，费达生教授工人工序技术。1935年，改装立缫丝车。1930年女蚕校设立制丝科，费达生任制丝科主任，并为学校设计了一个小型的制丝实习工场。1933年底，费达生以女蚕校推广部主任身份到玉祁制丝所驻厂当经理，玉祁生产的“金猫牌”高级生丝，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好评。后在抗战期间成立乐山实验区，使当地栽桑、养蚕、制丝得以配合进行。抗战胜利后，继续从事蚕丝技术的发展工作。

在中国茶业技术的发展中，吴觉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对茶叶发生兴趣，很希望能为振兴我国茶业

^①费达生口述、余广彤整理：《解放前从事蚕丝业改革的回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0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177页。

贡献自己的力量。“1919年浙江省教育厅招考去日本的专科留学生，其中恰好有研究茶叶的名额。吴觉农参加考试后被录取了。同年到日本，入日本农林水产省的茶业试验场学习。当时日本的茶业虽然还不很发达，但已运用了一些新的科学方法，如茶树的栽培和茶叶的制造，有的也已利用了机械。”吴觉农回忆道：“我在日本学习的三年间，除在茶业试验场参加种植和制造茶叶等工作外，曾先后到各地的一些制茶工厂参观，并和他们一道进行实验，也了解到各个厂的生产情况。同时还从他们所收集到的有关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茶叶资料中，学到了各个国家的茶叶产、制、运、销方面的工作过程。”^① 1922年吴觉农毕业回国。在“家乡上虞办过一个种茶场，从日本引进了制茶机械，从事茶叶制造的改进，但因资金不足，经验不够，做了之后，失败了。”^② 后来吴觉农在上海商检局从事茶叶工作，主要活动有：1. 进行调查工作。2. 设立茶叶试验机构。当时曾拟订出茶叶种植和产制的试验计划，先后在浙江、安徽、江西设立了以试验红绿茶为主的平水茶叶改良场和以试验红茶为主的祁门和宁州茶叶改良场。祁门茶叶改良场成立以后，运用科学方法所制成的祁门红茶，其品质是足以与世界著名的印、锡的高级红茶媲美的。3. 办理产地检验。4. 培养茶叶专业人才。吴觉农提出了公开招考、择优录取的办法，在各期所招考录取的人员中，很多人都已培养成为茶叶专家。

^①吴觉农：《我在上海商检局搞茶叶工作的回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88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149页。

^②同上，第150页。

在中国林业技术的发展中，梁希的贡献是比较突出的。他于1883年12月28日（清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浙江吴兴县双林镇（今属湖州市郊区）。1906年被咨送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海军。后“改入东京帝国大学林科学习，并从此爱上了林业，立志引进先进的林业科学技术，为建设祖国而勤奋学习。在河合钵太郎、本多静六、川濑善太郎、右田半四郎和三浦伊八郎诸教授指导下，先生对林产制造学和森林利用学饶有兴趣。由于他悉心钻研，学习成绩超群，深受导师们的赞誉。1948年，先生在台湾八仙山见到河合、本多、川濑、右田手植的杉树，曾赋诗三绝，缅怀先师，其中一首是：‘一别师门三十春，前景如梦复如尘，侯生^①头白梁生老，何况当年传道人。’足见先生尊师重道的深情挚意。”^② 1916年，梁希从日本学成归国，初往奉天安东（今辽宁丹东）中日合办的鸭绿江采木公司任技师。由于日方滥伐无度，梁老无力制止，忿然离去。同年应聘在北京农业专科学校林科任教。该校是我国最早设置林科的高等学校之一，为我国培育出了一大批早期的林业人才。1923年他自费前往德国求学进修历时4年。1927年他回国，受聘国立北京农业大学任教兼森林系主任。1928年他南下杭州，受聘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主任，并一度参加中华农学会与德商爱礼司化肥公司合作在上海筹办的农业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工作。1929年梁希应邀任浙江省建设厅技

^①侯生：指当年留日同窗侯过先生。

^②张楚宝：《林业界的一代师表》，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1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105—106页。

正，负责调查全省山林概况。“他自夏至冬，踏遍杭、湖、宁、绍、台各州县的山山水水，先后发表了《两浙看山记》、《对于浙江旧泉唐道属创设林场之管见》、《西湖可以无森林乎》等调查报告和文章，对浙江的林业建设和杭州西湖的造林绿化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① 1932年8月梁希“应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邹树文之聘，在森林系任教，从此为创建和苦心经营中大森林化学室经历16个春秋，先后培育了一大批林业专门人才。”^②

在中国很多技术领域（如农林、地质、医药、建筑等等）的发展中，都可以看到留日归国人士的重要作用，现简单例述如下。丁颖1913年赴日本留学，1924年回国后在中山大学农学院任教。朱凤美曾于1918年和1927年两次到日本，先后就学于鹿儿岛高等农业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兼病虫害系主任等职。朱新予曾在日本东京国立蚕桑试验场学习三年，1925年回国后在杭州、上海等地从事蚕桑改良推广工作。汤惠荪1917年冬赴日留学，学习农业，1921年毕业回国，在浙江、江苏、安徽、北京等地从事农业科研和教学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曾主持滇南垦区工作，任云南大学农学院院长、中国地政研究所所长等职。陈凤桐1929年到日本留学，“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后任晋察冀边区政府农林局长等职。于铎，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后入日本国农林省林业试验场从事研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

^①张楚宝：《林业界的一代师表》，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13辑，第106页。

^②同上，第107页。

国，曾在湖北、南京等地任教，1941年2月在四川万县首先发现水杉这一古老树种。秦东滨，1938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农业大学，回国后从事林业工作。王颖，1913年赴日本留学，1924年回国后在中山大学农学院任教。章鸿钊，1908年入日本京都高等学校，毕业后又进东京帝国大学学习，1911年回国后，曾任北京农林部技正，地质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特约研究员等职。马廷英，留学日本时获博士学位，1936年回国后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曾主持东沙、南沙群岛珊瑚的调查研究，抗日战争期间曾在福建等地调查战略资源，绘制东南沿海地形图。杨步伟，1913年去日本留学，专攻医学，1919年回国后，在北京创立森仁医院，1925年曾在北京设生产限制诊所。杨述祖，1919年赴日本留学，获东京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31年回国，任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多所医学院教授，1933年到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留学，后回国在北大医学院、西北联合医学院、西安医学院任教。刘敦桢，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回国后长期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科学研究和教育工作。特别是中国当代杰出的地质学家丁文江，早年留学日本、英国，1911年回国后“创办并主持地质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有作为的地质工作者。后协助北大校长蔡元培创办地质系，并介绍美国著名地质学家葛利普和青年地质学家李四光到北大任教。1922年与翁文灏等发起组织中国地质学会”^①，后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①王金语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轨迹》，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46页。

和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6年在地质考察中死于湖南。他一生著述甚丰，在测制全国地质图，调查矿产岩石，研究古生物、土壤、燃料、地震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

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前半期学成回国的留日学生中，有不少人是从事应用技术工作的，他们的活动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起了最直接的作用。在各方面突出的是，在范旭东实业集团中，以范旭东为首的一批学成回国的留日学生，在数十年的创业历程中，以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为推动技术进步、并通过技术进步直接推动实业建设，而作出了令人钦佩的贡献。首先看一下范旭东本人在技术进步中的功绩。他在1914年创办久大精盐公司时，既是久大的经理，又是公司内唯一的技师。在久大精盐公司开张营业时，他就着手建立久大研究室，进行海盐综合利用的研究。当时，各国制碱工业严格垄断，既不能从国外购得整套技术设备，也得不到完整的技术资料，全靠自己摸索。“创立永利之后，范旭东认为，如果不用科学方法来提高效益，将会因成本过高、技术落后而在竞争中被洋货淘汰。为此，1922年他决定在原久大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从事精盐副产品的研究，并对永利的原料分析、成品检查、分析规程的确定、工艺操作指标的规定、新技术的研究与采用，做了很多的工作。”^①

有人说，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的起家，是依靠该厂的两位“圣人”。一名“东圣”，系指留日学生傅冰芝厂长，他精通业

^①李杜川、陈歆文：《祖国事业科学人才——纪念实业家范旭东诞生一百周年》，载《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二辑，第10页。

务而又善于管理；一名“西圣”，指的是日本、美国留学生，曾参加辛亥革命而又精通化工业务的黄海化学工业社长孙颖川。傅冰芝是与范旭东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后入东大造船工学科，有真学问，回国后几经挫折，后被范旭东请来当厂长。孙颖川早年留学日本，后留学美国，回国后参加范旭东企业集团，和范旭东共同写出了黄海化工社的“宣言”。其中说：“中国广土众民，本不应患贫患弱，所以贫弱全由于不学。这个病根，最容易被人忽略。却支配了中国命运。……中国如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来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就产不出新的生命。”^①于是他们同侯德榜咬着牙共同建立了有与美国同等水平的试验室。从征服细菌开始，以后是征服空气（制氨），征服海水（炼矿），还搞过制造原子弹的原料试验，在20年代初期，孙颖川就喊出要有那么一班人，在科技工作中“沉下心来，不趁热，不惮烦，不为功名富贵所惑，要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他们的试验都一切顺适国情，向各种人学习，“有人向做粉条有经验的老师傅学习，有人从诗书二经对酒的描写中发掘原始资料，还有人找道士庙探索古代炼丹的过程，目的是找出古今中外驯化及使用细菌的方式方法及过程，提高到现代科学水平加以研究。”^②孙颖川的一生正像侯德榜在他的追悼会上说的：“‘西圣’到死一直是一位无名英雄，但他的学生们都会继承他的事业。”^③

是的，当年学成归国的留日学生们所献身的技术进步事

^{①②③}转引自《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二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49页。

业，所创造的技术进步成就，都会被后人所继承下来的，并在推动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发扬光大。

4. 留日学生播布不同倾向社会思潮

社会思潮作为社会生活内容的一部分，它对社会的发展必然起到这样或那样的作用。中国学生留学日本，他们不仅吸纳日本的社会思想，而且还吸纳舶入日本的外来思想。中国人的留日运动汹涌澎湃，留学生吸纳的思想也五花八门，随之他们又把吸纳的思想播布向国内。20世纪前半期，中国人正处于寻求真理、探寻道路的时期，也是一个除旧布新的时期。留日学生所带入的社会思想，在中国社会拨起了阵阵涟漪。

留日学生中的反清思潮、改良思潮及革命思潮等，本书在前面的不同章节已有所论述，这里仅就其他的几种思潮作一简略的阐述。

西方社会主义学说和理想最早传入中国是19世纪末的事。1899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将英国社会学家企德的《社会进化》一书节译为《大同学》，在《万国公报》第121—124册上连载发表。书中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这是中文报刊上最早出现的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介绍。中国人在自己的著述中最早提到马克思名字的是梁启超。1902年9月，他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颀德之学说》一文，介绍了马克思。中国人接触和接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热潮始于本世纪初的赴日留学运动之中。当时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声势正盛，这对负笈日本求知若渴的中国学子造成极大冲击，很快在留学生中也兴起了一股学习和翻译社会主义著作的热潮，其

中包含有关马克思及其著作、学说的内容。如，由留学生创办的《译书汇编》杂志，大力翻译介绍日本流行的新思潮，其中社会主义占相当比重，从第一期起至第三期，就刊登了日本社会主义者有贺长雄编著的《近世政治史》，全面介绍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并提到马克思，称其“倡均贫富之说”。《社会主义神髓》是幸德秋水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优秀著作，颇受中国学子欢迎。日本1903年7月首版后仅2个月，留学生就译成中文出版，三年后又两次重新翻译出版。在研究翻译日本社会主义著作的过程中，留学生还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认识并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看法。如1903年2月，马君武在《译书汇编》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指出：“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之人也。马氏尝倡，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文章还给出一个马克思著作书目，包括《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马君武在《大陆报》第二期发表《唯物论二巨子学说》，主张“大倡唯物论”，宣传达尔文、马克思的学说，并认为马克思高于达尔文。可以看出，20世纪初年中国人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主要来自赴日留学生。赴日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和中国之间架起了一条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桥梁。留学生接触和译介日本社会主义著作的过程，就是中国思想界、舆论界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过程。

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一度非常流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益广泛深入，逐步成为新思潮的主流。其主渠道还是日本。因为以往中俄文化交往较少，精通俄语的人才不

多，翻译力量不足，加之十月革命前后俄国陷入战乱，交通不便，人员往来不多，同时，中国军阀政府又非常害怕苏俄革命，万般阻遏“过激”主义对中国的渗透，致使经苏俄流入中国的原文著作和材料很少。相比之下，中日距离较近，人员往来方便，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介绍已做了大量工作，中国人对之比较熟悉。于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人们还是大量地从日本转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吸收日本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做这一传播工作的，主要还是留日学生。如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李达、李汉俊、周恩来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及戴季陶、胡汉民等国民党人都曾是留日学生。李大钊、陈独秀在“五四”前后主办刊物、发表文章、成立团体，成为马克思主义宣传运动的核心人物。陈望道、李达、李汉俊、周恩来等人受十月革命的冲击，思想上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积极开展十月革命的宣传活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

20世纪初，日本是无政府主义的东方策源地，当时亚洲各国的政治流亡者和留学生云集东京，中国、俄国、印度、越南、朝鲜等国的许多革命志士在这里朝夕相处，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斗争。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等人对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尤大。留学生中最早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是社会主义讲习会，这个讲习会开办于1907年，是在幸德秋水等人影响下组织起来的。早在1904年前后，幸德秋水、大杉荣等人就在东京锦辉馆举办社会主义演说会，有不少留学生经常去听他们演说。他们所办的《平民新闻》也备受留学生欢迎。景梅九回忆：“这时，他们组织了一个《平民新闻》，出版后，很受社会欢迎，社会小说、纪事、

述评，莫一样不精彩的……（他们）自己看，并且劝大家朋友看，看来看去，都有一点平民思想。我和小友越发走过迷信的程度，把雇的下女，都传染成了社会党，也随着痛骂他们的政府，轻蔑他们的天皇，仇视他们的资本家。”社会主义讲习会的发起人是刘师培、张继、何震。张继，1899年留学日本，1903年根据幸德秋水的日文译本翻译了意大利人马拉叠斯达所著的《无政府主义》，1907年又翻译出版了德国人罗列所写的《总同盟罢工》，是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的系统理论家。

辛亥革命之后，随着留学生的纷纷归国宣传，无政府主义流入国内。民国初年无政府主义的著名宣传家是师复。师复，1884年生，广东香山人，原名刘绍彬，因立志反满，光复故国，改名刘思复。信仰无政府主义后，又废姓，改名师复。1904年留学日本，次年加入同盟会，1906年归国。1907年谋杀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炸弹突然爆炸，左手被截去，后被清政府判归香山监禁。晦鸣学舍是师复在广州建立的以宣传和实行无政府主义为目标的组织。在师复看来，这个学舍就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的雏形：大家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生活，互相协助，人人平等。师复心目中的理想境界是“人人自由，人人自治，以独立之精神，行互助之大道”，是“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①师复还具体规划了新社会的经济生活，他主张把一切

^①《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载《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页。

生产要素如工地、矿山、工厂、耕具、机器等收归公有，废除财产私有权和货币，所有人都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自由取用劳动成果。男女自由结合，所生子女由公共养育院哺养，儿童从6岁至20岁入学校接受教育，毕业后从事生产，50岁以后入公共养老院安度晚年。师复过着非常清苦的生活，两餐不保，能有两小块烧饼，或一小碗白水面，或以酱油拌的饭充饥，就算不错的了。1918年春，师复生了肺病，无钱治疗，医生以其身体衰弱，建议吃一点牛肉汁、牛奶、鸡蛋，但他不肯，宁死不食。1915年3月27日，师复病逝于医院。

三无主义是民国初无政府主义思潮中的又一个流派，它的提出者是江亢虎。江亢虎，1883年生，江西弋阳人。1901年东渡日本半年，1902年再次留日二年，归国后任刑部主事和京师大学堂日文教习。1905年，他利用北京宣武门外自己的房子创办“京师女学传习所”。1910年，25岁的江亢虎把女校交给学部，取道日本和俄国游学欧洲。江亢虎游学日本和欧洲之行，接触了各种新思潮，大大地开阔了视野，逐渐形成了三无主义的思想观念。三无主义反对家庭、宗教和国家。江亢虎憎恨世俗的遗产继承制，认为它决定了人们政治经济地位先天的不平等。要打破这种不平等，必须废除家庭。废除家庭必须首先废除婚姻，取消人们稳定的血缘继承关系，在两性生活上实行“自由而不结婚”。人们无法确认谁是自己的亲身子女，也就不会去计较遗产归谁所有，这就为财产归公创造了条件。江亢虎把国家区分为国家政治和人民政治。他认为国家的军备、赋税、刑罚等等功能属于国家政治，又称为官治。这种官治是强权的表现，他主张逐步削弱这种强权。

建设无政府主义新村，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个重要主张。曾是留日学生领袖的吴稚晖最早对新村进行了宣传。他于1908年5月写了《谈无政府之闲天》一文，提出在建设新村的时候，必须拆毁现今所有城市、村庄、庙宇、坟堆等建筑物，每隔三五里建造一个居宿处。居宿处一律造平房或一层楼，分卧睡、饮食、学习、工作等不同场所。人们吃饭、休息、工作均来去自由，没有限制。全世界废除地名，把居宿处统一编号以资识别。居宿处之间以街道相连接，路面铺设橡皮垫，下面由机器操纵，自动传送。有了这种设备，人们在居宿处之间往来，也不费举步之劳。1908年6月，吴稚晖参观了法国和比利时两国交界处的“鹰山共产村”。这是法国无政府主义者亨利·孚岱于1903年创办的无政府新村。当时村中有十几个人，建有楼房一座，印刷所一座，养了一匹马、一头奶牛、一只奶羊、数尾野兔、20只鸡。村外面环以野林，其密如织，舍南舍北，园疏杂植，芳美之瓜菜，四时不断。吴稚晖特别欣赏新村村民的学习精神，赞扬新村6年时间印刷了30余万册小册子，几乎抵上海一埠之印刷物。

日向新村是日本学者武者小路笃实创办的。日向新村位于日本九州，建于1918年，新村中有40多亩地，修了3所房子，22个人共同劳动，共同生活。1919年4月和7月，留日归国的周作人两次赴日参观了新村，归国之后连续写了《访日本新村记》、《日本的新村》、《新村的理想与实际》、《新村的精神》、《新村运动的解说》等进行宣传。周作人对新村的介绍，糅合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迎合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崇尚互助精神的基调。他相信新村生活的可贵之处就

在于实行了人的生活，符合人性的要求。新村主义在相当广泛的范围里得到传播。

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前后，一大批留日归来人员掀起民主与科学的思潮。这一问题，本书其他章节已有涉猎，这里不再赘述。

以上仅是留日学生播布而来的社会思潮的一部分。这些思潮兴起后，或自行消亡，或发展衍化。但是，它们在中国 20 世纪前半期的社会发展历史中起过这样或那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第 三 节

留日学生与 20 世纪前半期

中国的文化发展

1. 留日学生与中国文化社团的发展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文化发展，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是中国从传统文化过渡到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时期。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是艰难的，这种艰难不仅是文化发展自身的矛盾所造成的，还因为这种文化发展是在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政治、经济等因素构成的大气候中进行的，而这又是一种风云多变、雷雨交加的大气候。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容是丰富的，这种丰富不仅是文化发展自身的展开所带来的，还因为这种文化发展是在极其广阔背景下，反映了同一时期里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

进步，反映了正在阵痛中崛起的中华民族的脉搏。

在推动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有留日归来人的一份贡献。这份功绩和贡献，不仅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留日学生文化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它与留日学生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在这一时期留日归来的中国人，推动了文化社团的发展，加强了文化人才的培养，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建设。

这里主要讨论留日归来的学子，是如何推动文化社团发展的。

一批批留日学生归来后在自己的祖国，在 20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大地上，相继组织了很多文化社团。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下面依不同的专业，作一分门别类的介绍。

首先是美术。从辛亥革命到 40 年代，中国美术领域出现了众多的社团，甚至一个美术学校里就同时存在近 10 个美术团体。多数社团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其中由留日归来的人主办的主要有：1911 年李叔同发起的“文美会”；1915 年汪亚尘、陈抱一组织的“东方画会”；1920 年刘海粟、汪亚尘组织的“天马会”；1921 年陈抱一等组织的“晨光美术会”；1927 年朱屺瞻等组织的“艺苑”；1931 年倪貽德等组织的“决澜社”；1936 年汪亚尘、朱屺瞻、陈抱一组织的“默社”等等。

发起文美会的李叔同，是中国介绍现代艺术的第一人。他 1905 年留学日本，参与了春柳社的创建。1910 年归国，在浙江、南京等地做绘画、音乐教员，成为著名的艺术教育家。他的门生丰子恺说：“欧化东渐的时候，第一个出国去学习西洋

绘画、西洋音乐和戏剧的，是李叔同先生。第一个把油画、钢琴、音乐和话剧介绍到中国来的是李叔同先生。”他“首先把西洋艺术介绍到中国来，在中国美术史、音乐史、戏剧史上都开辟了一个新纪元。”^①

高剑父，1906年赴日留学专攻绘画，喜山水画与花鸟画。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后来致力于推动中国画运动。他与同是曾赴日留学的高奇峰、陈树人共创具有社团性质的“岭南画派”，三人被称为“岭南三杰”。高剑父认为绘画要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反对有门户之见，他广采中外绘画之长处，形成了“求真”、“写实”的岭南画风。郑振铎说高剑父：“很好地并大胆地融合了中国古老传统和西洋画法而创立了自己的新风格。”

“决澜社”是倪貽德与友人成立的美术团体。倪貽德于1922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参加过创造社，后来赴日本留学。他是中国现代画坛上集艺术理论家和画家为一身的人物。在他起草的“决澜社”宣言中，就表现出了企望在中国画坛上出现崭新气象的信仰与追求。他的眼光放在了西方现代画派上，以他的艺术素质和艺术观点，向中国人民展示出了西方现代派绘画的面貌。从引进西方现代派绘画这一点上，他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对中国现代绘画的贡献，还在于他出版了《水彩画概论》、《艺术漫谈》、《西洋画研究》、《现代绘画概论》、《西画论丛》等大量的艺术论著，为中国现代绘画理论的百花园增添了一枝奇葩。

除以上所述外，还有许幸之等人1930年成立的“时代美

^①《回忆李叔同先生》，载《天津日报》1956年10月6日。

术社”，他们公开倡导革命艺术，“左翼美术家联盟”成立后，许幸之担任主席，推动了革命美术的发展。

其次是音乐。20世纪以来的中国音乐方面的团体出现的不是很多。由曾留学日本的中国人所组织的，规模较大的是丰子恺等人于1919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华美育会。1920年暑假该会举办了音乐讲习会等活动，1919年到1922年出版了作为会刊的《美育》杂志，这个团体的成员大多是各地中小学音乐、美术教师。它的成立推动了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在普及音乐教育上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从其组成情况来看，它不是由专家学者组成的，也不是由几位同人组成，而是由散居各地、不同行业的普通工作者组成。

第三是文学和戏剧。曾经留学日本的中国人，对20世纪前半期中国文学影响巨大，他们成立了众多的社团，宣传各种文学思潮，进行文学创作，活跃了文坛。

早期，有任天知于1907年10月组织的春阳社。任天知曾是在日本成立的春柳社的成员。春阳社是国内第一个职业化的新剧剧团，致力于话剧的活动，对我国早期话剧具有开拓作用。

著名的南社成立于1909年，会员最多发展到一千多人，骨干分子多是同盟会会员。他们进行诗歌、散文、小说等各方面的创作，其中主要作家有苏曼殊、马君武等人。苏曼殊生于日本，归国后于1898年返回日本留学。马君武，1901年留日，1906年归国。

创造社是留日人员所组建的影响最大，也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大的文学社团之一。它成立于1921年7月，发起人有郭沫

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他们都是留日学生。创造社的成立，在当时沉闷的文坛吹起了一股清新之风。郭沫若充满激情的爱国主义《女神》式的诗作，郁达夫表现现代青年精神苦闷的《沉沦》式的小说，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效应。创造社到1929年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为止，前后历时8年，前期鼓吹浪漫主义，强调要表现“内心的要求”；后期，彭康、朱镜我、冯乃超、李初梨等人由日本归国，促使创造社向鼓吹“革命文学”转化。他们连同早期的创造社成员，共同举起了“革命文学”的大旗。创造社建有出版部，还出版《创造》丛书，创办过《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10余种刊物。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大都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

在20年代蜂拥出现的文学社团中，第一个成立的是文学研究会。它是由周作人和后来成为著名军事理论家的蒋百里等12人创建的，提倡为人生而艺术，鼓吹写实主义，与创造社遥相呼应，共同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较大的两个文学社团。

1932年9月成立的中国诗歌会，发起人有穆木天、杨骚、蒲风等，主要成员全是归国的留日学生。他们继承了中国现代新诗的光荣传统，提倡“大众歌调”。他们进行创作，也进行理论研究，不但注重诗歌的内容，对诗歌的形式方面也有过有益的研究和探索。出版有《新诗歌》旬刊和“国防诗歌丛书”。在提倡诗歌大众化方面，中国诗歌会是20世纪前半期最重要的一个诗歌团体，推动了革命诗歌运动的发展。该会的主要人物，也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当中。

第四是综合性文艺社团。1930年3月2日成立的左联，是

适应中国革命形势的需要，在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广泛的作家革命联盟，团结了众多不同政治思想、不同艺术观点的艺术家，使文艺更直接地为革命实际斗争服务。左联从成立到1936年初宣布解散，归国的留日学生一直处于这一团体的领导地位。刚成立时的7人委员会中，夏衍、冯乃超、鲁迅、田汉、郑伯奇等5人是留日学生。稍后，又有周扬从日本归国走上了左联的领导岗位。值得一提的是，左联从筹划成立到最后解散，鲁迅一直参与了重大决策。左联的活动，配合了革命运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创作和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方面，获得了丰硕成果。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于武汉，这也是一个综合性的文艺社团。成立时，45人被选为理事，其中留日归国的有郭沫若、茅盾、田汉、胡风、胡秋原、冯乃超、郁达夫、成仿吾、夏衍等人。1940年11月，郭沫若组织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留日归国的杜国庠、田汉等人参加。

第五是体育。中国的近代体育主要是由留学生从日本引入的。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共约有近百人到日本学校学习体育专业，这些人回国后，促进了中国体育的近代化。中国留学生学习体育一是在普通学校兼习体育，一是在日本军事学校或体育专门学校学习。

1903年5月，陈独秀组织“爱国会”，下设体操会。1905年徐锡麟创建“绍兴体育会”。1906年，秋瑾组织“城北体育会”。这些体育组织都是以健身、尚武、爱国为宗旨，他们往往利用体育团体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

1911年，黄兴之子黄一欧从日本归国，在湖南明德学堂

组织了一个野球（棒球）会，后因有革命嫌疑被取缔。

第六是科学。1915年，留美学生任鸿隽、赵元任等9人成立了中国科学社，人员以留美学生为主，在以后发展的社员中，留日归国的马君武被选为特社员。特社员，只有在学术上有建树的社员才可当选。

留日人员较多的科学团体是丙辰学社。它于1916年12月在日本成立，发起人是留日学生陈启修、王兆荣、周寿昌等人，1923年改为中华学艺社。到1933年，社员由最初的130多人发展到700余人。作为会员和名誉会员的有杜国庠、张资平、吴虞、郭沫若、欧阳予倩、夏丏尊、梁启超、范源濂等留日归来人员。总社在全国10余个城市设立干事，还在日本、美国、德国、法国等国设干事。学艺社以“研究真理、昌明学艺、交换知识、促进文化”为宗旨，所办的《学艺》杂志上辟有撰著、译丛、评论、杂俎、通信等栏目，广泛介绍政治、军事、外交、文学、哲学、农林、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知识。学艺社还编辑出版过《学艺论文集》、《学艺丛书》、《学艺汇刊》、《文艺丛书》、《学艺文库》等数十种丛书和刊物。1925年创办学术大学，1933年办学艺中学。学艺社不只是囿于在国内开展学术活动，他们还把目光射向国际学术领域，开展多项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学艺社参加日本的学术会议，参加历届泛太平洋学术会议和万国工业会议，1925年起，又坚持每年组织学术考察团出国考察自然科学。

学艺社作为一个较大的科学社团，参加的人数多，存在的时间长，影响遍及全国，为中国现代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做了有益的工作。

第七是医药。在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医学、卫生方面的社团数量是有限的。清末以后，有些中国留学生赴日本学习医学，归国后陆续组建了一些医学团体，传播西方现代医学理论。也有人归国后采用现代医学科学知识研究中国医药理论，弘扬祖国的医学文化遗产。

1907 年，中国留日学生王文焕等人在东京发起中华药学会，1911 年改为中华民国药学会，1942 年改为中国药学会，1937 年时，会员达到了 137 人，是一个存在时间久，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医药学社团。

总之，各种文化社团的建立，为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文化发展提供了一股具有凝聚性的推进力。

2. 留日学生与中国文化事业的建设

20 世纪前半期，留日归国的人员所建立的各种文化社团，使中国的文化事业建设逐渐进入到一种有组织的状态之中。组织是一种有序的表现，而有序性是任何一种建设必不可少的，文化事业也不例外。正是在这种条件下，20 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建设才取得了不少成果。

清末，有志于艺术事业的中国青年赴日本留学的时候，在西方画坛上已拥有了塞尚、康定斯基、毕加索等一批震聋发聩的现代艺术大师了，那时的西方现代绘画，对于中国人来说，还如同天外之物一般。陈抱一就曾主张学生要以实物写生为初学之入门，刘海粟却主张学生要依照片或世界名画印刷品来临摹，二人为此发生过激烈争论。这足以证明，搞艺术的人当时对西方现代艺术也是极为陌生的。

20世纪以来，有很多青年赴日学习美术。关良1917年入东京太平洋美术学校；吴大羽也早年留日；陈之佛1918年入东京美术学校；朱屺瞻赴日学油画；丁衍镛1920年入东京美术学校；倪貽德1927年入东京川端绘画学校；许幸之1927年入东京美术学校；谢海燕1929年入东京帝国美术学校；方人定1929年入日本美术学校研究部；商启迪、李桦、钱瘦铁、卫天霖也赴日学习绘画。他们归国之后，在美术界都卓有成就。成就之一就是向中国画坛引入了油画、水粉和水彩画等新画种，打破了以水墨画为主的中国传统绘画的单一状况；初步引进了西方现代绘画的美学思想，繁荣了中国的绘画文化理论。初期的留日青年，对中国画坛只是起到了启蒙作用，后期的留日青年，则是在简单模仿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促进了中国现代绘画文化事业的发展。他们归来后，建社团、创学校、办刊物、撰著作、搞展览，从他们从事的活动中，人们知道了希腊、罗马、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学院派等等外面的世界。

留日学画青年归国后，基本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传播西方绘画理论为天职，进行油画等的创作；一种是归国后，经过对西方绘画的研习，最后又回归到热衷于中国传统绘画的鼓吹和创作上。后者以朱屺瞻、陈之佛、傅抱石等为代表。这两种人的同时存在，推动了中国绘画事业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在更多的旅日归来学生热衷于油画、水彩等画种的同时，也有人进行木刻、漫画等美术画种的引进和创作，其代表是鲁迅和丰子恺。

20世纪前半期，中国音乐事业一方面是中国传统音乐得

到了继承和发扬，一方面是西方现代音乐艺术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成为音乐事业的一部分。在这两个方面，留日归国人员的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

20世纪初，留日归国人员使学堂乐歌成为了学校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推动了美育教育的发展。在学堂乐歌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唱歌和演奏风琴、钢琴、提琴等各种艺术形式也得到了初步介绍，五线谱和简谱这两种记谱方法也在当时的音乐出版物中有所介绍。各种音乐形式的出现，和五线谱、简谱的介绍以及其他西方音乐的引进，揭开了中国现代音乐发展的序幕，对中国音乐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人最早的音乐刊物，出自归国的留日学生之手。1905年冬，李叔同一人编辑出版了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尽管只出版了一期，但它却开创了中国人办音乐杂志的先河。在现代音乐的普及过程中，丰子恺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他曾根据外国通俗音乐论著编辑出版过《音乐的常识》（1925年）、《音乐入门》（1926年）、《生活与音乐》（1929年）、《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1931年）、《音乐的听法》（1930年）等10余种，受到人民的喜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音乐论著出版方面，萧友梅也出版过《普通乐学》（1927年）、《和声学纲要》等。

彭湃在海陆丰农民革命运动中，根据当地的民歌、童谣写了许多革命歌曲。

20世纪前半期，仅是归国的留日学生，就基本上可以写成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他们的文学创作活动无论哪一种形式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文学史上的历次思想斗争和争论，他们也都充当了先锋。

五四运动以后的文坛，正如郭沫若所说：“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创造社的主要作家都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的也是一样。此外有些从欧美回来的彗星和国内奋起的新人，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建树，总还是没有前两派的势力的浩大，而且多是受了前两派的影响。”^①这并不夸张。留日归国人员对文学事业的贡献还体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是鲁迅1918年5月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是张资平于1922年出版的；最重要的第一篇报告文学《包身工》，是夏衍1936年发表的；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两位文学巨人，一是鲁迅，一是郭沫若，都是留日归来的。另外张资平的小说发表后，使得文坛出现了写“殉情”文学热；郁达夫的小说发表后，出现了青年乘火车去外地购书的现象。

总之，留日归来人员创作丰富。鲁迅有大量的杂文、小说、散文；郭沫若有诗歌、小说、戏剧；田汉、夏衍等人有戏剧；田间有诗歌。

留日归来人员对中国语言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他们在各种出版物中，部分地使用了当时正在逐渐改变的日本文学的文体，这对中国文体的改革，对于白话文逐渐盛行以至最后代替文言文，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另外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活动中，也把大量的日语词汇带入中国。1915年彭祖文著一小书为《盲人瞎马之新名词》，极力

^①麦克昂（郭沫若）：《桌子的跳舞》，《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1928年5月1日。

攻击汉语的日本化。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汉语日本化现象确已达到了泛滥的程度。这一现象的发生，固然有其走向极端的方面，但从人类文化交流方面看，又有其历史进步性。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汉语语言，有很多词汇都是由日本引入的，如体操、活跃、取缔、革命、投资、权威、法人、破产、评价、品位、人格、人权、人选、上水道等等。据对《汉语外来语辞典》^①统计，古今外来词一万余条中，源于日本的有844个。这还不包括词典中没直接标来源而互注的词，就是说，在本词典中收入的来源于日本语的词条要多于844个。另外，本词典还没有收入专业性较强的比较冷僻的词条。实际上，源于日本语的汉语外来词要远远超出844个。如此庞大的日本语词汇进入中国的时间、介质已不可能详考，其中留日归来人员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总的看，20世纪初以及其后逐渐进入的大量日本词汇，很多已经慢慢地为中国人民所接受，与汉语言融合在一起，丰富了汉语言词汇，成为中外交流的有力工具。

20世纪以来，在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中，留日归国人员涌现出很多热爱体育事业的活动家。徐一冰因对体育事业的杰出贡献，1914年6月获北洋政府教育部一等嘉乐奖章、“教恩无穷”匾额及江苏巡抚按七等嘉乐奖章一枚。孙中山的卫士杜心五，曾留学日本，是著名的武术家，热心提倡国术，1929年在杭州国术游艺大会及其他一些全国武术大会上担任过裁判，在国内外很有影响。另外，留日归国人员还创办杂志，撰写文章，推进现代体育事业的建设。毕业于日本关西大学的体

^①刘正埭、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出版。

育研究生阮蔚村，曾在1933年10月创刊的《勤奋体育月报》上连载《体育基础生理解剖学》，介绍现代体育科学理论。留日归国人员还把一些现代体育竞赛项目引入国内，使其在国内逐渐普及起来。棒球队的出现即是一例。1910年留日学生回湖南组织棒球队，是国内最早的棒球队。

在中国报刊事业的发展中，留日归国人员也作出了杰出贡献。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1918年12月、1919年2月，归国的留日人员参与创办了《每周评论》、《国民》；1919年2月李大钊任《晨报》副刊编辑；1926年留学生革新《大公报》；1932年施复亮负责《文化战线》的编辑工作。据统计，鲁迅700余万字的著作和译作大部是在报刊上发表的，他一生支持、投稿的报刊约有120种，主编或参加编务的有20种以上。^①

20世纪以来，留日归国人员在国内出版的著书、译书数量多得难以计数。在新闻、出版文化事业中，他们的贡献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古装书籍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有的，也是全用统一的句号。到了近代，中国才将新式标点符号引入出版物中。《新青年》比较早地采用了新式标点符号。《新青年》发行量大，它的这一举动，影响广泛。到了1920年，商务印书馆编印《新法教科书》时，全部采用了新式标点。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一件事，是一场文化革命。二是，中文书籍由传统的线装改为西洋书籍印刷和装订方

^①许焕盛：《中国现代新闻史简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6页。

法，首先开始于留日学生在日本办的报刊。此方法 20 世纪初传入国内，有部分书刊仿效，最后逐渐为全国接受。随着书刊装订方法的变革，报刊的版面编排、页码编制等也相应地起了变化。

总之，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文化事业建设中的很多重大成就与进步，都同留日归国人员有不同程度的密切关系。

3. 留日学生与中国文化人才的培养

留日归国的中国人，与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的教育事业，在 20 世纪前半期受到从世界上不同角度所来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就是日本。而这种影响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一批又一批留日人员归国后，相继进入中国的各种教育领域，在人才培养上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文化人才培养上，获得了显著成就。

在清末，中国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一个直接原因就是，苦于当时全国新式学堂蜂起，而缺乏能够胜任新式学堂教育任务的教师。因此，才产生了大量的留日速成生和留日师范生。留日学生归国后，很多人逐渐承担起教育工作的重任。

留日归国人员与中国教育事业的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个文化领域的专业教育，二是普通学校的一般教育。下面，首先着重介绍一下文化领域的专业教育与留日归国人员的密切关系。

留日学美术的中国留学生归国后，基本上都是以在学校教授美术为主要职业。在美术领域，第一个将西方现代美术介绍

到中国的李叔同，留学时在日本上野美术学校学油画，民国成立后，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美术、音乐教员，培养出了丰子恺、潘天寿、吴梦非、李鸿梁等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著名的美术家。岭南派的顶梁人物高剑父，留日归国后，创办《真相画报》、“审美画馆”、“春睡画院”、“南中美术院”。抗战前，任中山大学国画教授、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国画教授，抗战后任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美术团体“决澜社”发起人之一倪貽德，留日归国后，相继任武昌艺术专科学校、上海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抗战开始后，又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特别需要提及的是美术大师张大千。他1917年赴日留学四年，学习纺织与美术，归国后，任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系教授。著名美术家徐悲鸿担任的美术教育工作，在著名的美术家中可谓最多。他1917年留学日本研究美术，后又毕业于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归国后，1927年任南京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系教授，1928年兼任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1929年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1946年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

与上述美术家主要以学校作为阵地进行美术教育、培养美术人才有所不同的是，中国现代文化巨人鲁迅一生都与美术结下了深厚的缘分。他在留学时就爱上了美术活动，回国后，不但自己从事美术创作，在他周围有一批热爱美术的青年，在他的指导下从事美术活动。鲁迅一生指导进步美术青年的信件有200余封。1931年夏，鲁迅举办了木刻讲习会，聘请内山嘉吉讲授木刻技法。在鲁迅大力提倡木刻的影响下，上海、北京等地一些进步青年开始了木刻创作。鲁迅为了开拓他们的视野，增强艺术欣赏能力，举办了3次外国原拓木刻作品展览会。在

从事木刻活动的青年人眼里，鲁迅成了他们学习木刻的美术师长。由于鲁迅的影响和指导，木刻这一濒临衰亡的艺术又焕发出新的生气。鲁迅的名字，与木刻联系在一起，与指导青年进行木刻创作联系在一起。

20世纪初期的文化领域中，留日归国人员对音乐的贡献莫过于把学堂乐歌引进中国。引进学堂乐歌是20世纪初期中国学校美育教育的一件大事，使中国的学校教育向现代化教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最初，留日的中国知识分子首先在日本成立了音乐团体，其中有梁启超等人在东京的大同学校成立有留学生参加的“大同音乐会”，留日学生沈心工、曾志忞在东京办的“音乐讲习会”，他们进行歌曲的创作、演唱活动。在他们的影响下，从1904年左右开始，国内出现了音乐书籍，新学堂也逐渐普遍开设了乐歌课。乐歌的普及，又促使留学生赴日专门学习音乐。“学堂乐歌的发展，标志着我国民主主义新文化在音乐领域里已吐露了新的幼芽，它不仅在思想启蒙方面给予当时的青少年学生以深刻的影响，而且还使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即群众集体唱歌的形式，在我国得以确立和发展，为后来我国的军歌、工农革命歌曲以及群众歌曲体裁的发展的先河。”^①李叔同留日归国后，先后在天津、上海、杭州、南京等地从事音乐教育工作。萧友梅从事音乐教育工作的时间则更长。他1901年留日学习教育和钢琴，后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音乐科、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科等处任教，筹建了上海国立音乐院（后改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①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第18—19页。

校)。他毕生致力于音乐教育工作，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著有《普通乐学》、《和声学纲要》、《新学制唱歌教科书》、《钢琴教科书》、《小提琴教科书》、《风琴教科书》、《古今中西音阶概说》、《中国历代音乐沿革概略》、《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等多种书，并创作有 100 余首歌曲和乐曲。萧友梅的音乐创作，已脱出了中国最初引进的学堂乐歌的框式，在学堂乐歌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中国特点的现代音乐，推动了中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

20 世纪以来中国体育文化与留日归国人员的关系也很密切。中国留日学生不但在振武等军事学校受过严格的体操训练，连宏文学院等普通学校也重视体育教育，回国后在学校任教的有这些学校的毕业生，还有日本大森体育学校的毕业生。大森体育学校开设的课程有体育学、教育学、解剖学、生理学、音乐、徒手体操、器械体操（单杠、木马、平台、天桥、木棒、哑铃、球杆）、兵式体操等。这些都由留日学生带回国内，从而确立了中国现代体育文化教育的基本内容。他们回国后，成为学校体育师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民国以前体育师资奇缺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黄兴在日本留学时，注重军事训练，1903 年回国后，在湖南明德学堂兼任体操教员，并通过体育活动，联络同志，发展会党。

留日归国人员所办的体育学校和体育专业数量多，有的还是 20 世纪以来中国著名的体育学校与体育专业。1905 年至 1908 年，共出现了 17 所体育专门学校与设有体育专业的学校，其中以留日学生创办的中国体操学校和中国女子体操学校最为著名。不是归国留日学生创办的，也多聘请留日学生担任教

师。归国的留日学生创办的主要学校有：大通师范学堂（1905年）、江苏两级师范体操专修科（1905年）、云南体操专修科（1906年）、四川体育专门学堂（1906年）、河南体操专科学堂（1906年）、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体操专修科（1907年）、奉天师范学堂体操专修科（1907年）、中国女子体操学校（1910年）、东亚体育专科学校（1918年）、中山体育专科学校（1923年）^①。另外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柳伯英在1921年至1926年，曾任苏州私立中华体育专门学校校长。

留日归国人员也有成为传播新体育思想的著名体育教育家和体育活动家的，例如徐一冰。他1905年赴日留学，入大森体操学校。当时，大森学校对中国学生教学保守，徐一冰排除种种障碍学习体育科学，1907年归国教授体育，1908年与友人同办中国体操学校，并编有我国近代最早的体育史讲义及《徐氏体育学》、《体育原理》等专著。中国体操学校是中国第一所体育专科学校，教授的学科有：伦理学、教育学、体育学、兵学、国文、生理、急救法、音乐；术科有：兵式教练，器械教练、哑铃、球竿、棍棒、木环、应用操、游技、教授法、射击术、拳术、武器；运动器材有：天桥、吊环、单双杠、哑铃、大棒、沙球、篮球、棒球、网球等。

1910年创办的中国女子体操学校，教务主任汤剑娥也是早年留学日本的。

上述两所学校为中国现代体育事业培养了众多的体育人才。中国体操学校从1908年建校到1927年停办共有36届毕业

^①参见沈阳体育学院：《中国体育史》，内部版，第85页。

生，约 1500 余人；中国女子体操学校毕业生共 46 届，1750 人。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学校的普通教育受留日归国人员的影响十分明显。他们的教育思想丰富，参与的教育活动全面，对中国近代普通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919 年，黄日葵等倡导平民教育；1921 年，范源濂等人创立中华教育改进社；1922 年，李大钊、陈独秀、吴虞、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发起收回教育权运动；1925 年后，夏丏尊、丰子恺等人参加立达学会的教育活动，提倡教育救国。以上的一切，都足以表明留日归国人员对中国教育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4. 留日学生与中国科学文化的进步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强化教育，引进技术，其在经济实力强大的背后，有先进的科学文化在推动。

从中国留日运动诞生那一天起，中国的留学生们就担负起向日本学习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重任。

留日运动之初，中国学生多学政法、军事、师范等科，有部分人学习科技，如工业、农业、医学等。1903 年和 1904 年间，清政府颁布一系列鼓励发展实业的政策，如《奖励公司章程》等，留日学生中学习科学技术的明显增多，如经济闭塞的江西，省农工商矿局筹措经费，一次就选派 10 名学生赴日学习农工商各科；在广东，仅潮汕铁路总办一处就派遣 30 人赴日本学习铁道工程学；1904 年 7 月，广东选送 20 人赴日学习农学，12 月又招 24 人赴日留学，其中学工科 9 人，学商科 5 人，学农科 10 人。据统计，到光绪末年，中国学习铁路的留

学生，留日者 568 人，留比利时者 80 余人，留美者 60 余人，留英者仅数人。由此可见，在某些科技学科，留日人数很多。在 20 世纪前半期的留日运动史中，留日学生所学的专业遍及工、农、林、医、蚕、化学等所有的科技学科。另据不完全统计，1901 年至 1939 年，留日学科技的毕业生人数为：工业 18 校 979 人，商业 9 校 342 人，医学 23 校 414 人，农业 11 校 333 人；1924 年至 1929 年，获日本著名大学博士学位的留日学生共 20 人，其中医学博士 18 人。

学习科技的留日学生回国后，成为推动中国科学文化进步的重要力量，其中又以创办科技报刊和推广实业教育为最有实效。

学习科技的留学生，在留学期间耳闻目睹外面的世界，充分认识到了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有多么的重要，他们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与国力强盛，必须有科学这个推进剂，科学的进步必须有科技知识的普及，创办科技报刊，是普及科学知识最有效的途径。据统计，1937 年以前，中国留日学生共创办 100 余种杂志，其中有 10 余种是属于科技方面的杂志，如《医药学报》、《中国蚕丝业会报》、《科学一斑》、《学海》、《中国商业杂志》、《中国商业研究会月报》、《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工学》、《学术界》等。众多科技杂志的创办，对中国科学进步是一大福音。

推广实业教育，也是留日学生推进科学进步的一个重要办法。留日学生归国后，从事教育活动的甚多，他们或投身于教育事业，或创办学校推行教育。在留日学生所创办的众多类学校中，即有实业教育的学校；在留日学生所从事的教育活动

中，即有实业教育。留日学生苏乐群受聘广西官立蚕业学堂，因成绩突出，被誉为“广西教育界第一人”。仇亮在北平创立垦殖学校，文经纬创办富训商业学校。在实业学校极少的当时，留日学生创办这一类学校，就更显示出了其重要性。

另外，在一些科学领域，留日学生们也做出了骄人的业绩，从中同样可以看出留日学生对推动中国科学进步所起的重要作用。

在留日归国人员中，科学成就最大的当属李四光。他生于1889年，湖北黄冈县人。关于留学日本的情况，他的夫人许淑彬回忆道：“仲揆去日本是1902年春天。因为旅费有限，他买了一点简便的行装和一张统舱船票，就出国了。……仲揆在日本时就认识了孙中山先生，1905年在东京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有一次孙先生曾摸着仲揆的头说，‘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因为他年纪小，只分派了一些贴标语的工作给他做，但在他稚嫩的心灵中，已经播下了革命的火种。1910年春，仲揆从日本回国，开始在上海一个兵工厂里任工程师，以后又到武昌工业学校任教师。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了，仲揆毅然参加了革命行列。”^① 在20世纪前半期，李四光除为开拓中国的地质事业而不懈努力之外，在地质科学上也作出重大贡献，突出的成果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发现了中国第四纪冰川。

20世纪前半期，中国人旅居国外学医学以去欧美的为多，去日本的也大有人在，他们归国后，为中国的医学、医药事业

^①许淑彬、李林：《石迹耿千秋》，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第3—5页。

做出了很大贡献。20年代后，一些留日归国人员开始运用自然科学知识研究中国传统医学，对中国医学走向科学化起到了促进作用。另外他们在对医学理论研究和医学实践基础上，撰写了很多医学著作，出版了很多医学杂志，丰富了中国医学理论宝库。余岩1908年入大阪医科大学，任过商务印书馆编辑，1939年主编《中华医药》杂志。中国现代生药学奠基人赵燏黄1907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药科，专门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著有《现代本草——生药学》（上册，1935年）、《新本草图志》第一集（1932年）、第二集（1934年）、《忻州药志》（1936年）、《华北药材实地之考察》（1937年）和巨著《本草新诠》等。

科学文化，是人类文化最重要的方面，它的程度，标志着人类文化发展的状况，同时，它也是推动其他文化发展的动力。20世纪前半期，一批批的留日归国人员，投身于诸多领域的科学事业中，他们的努力和奋斗，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丰富了留日学生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内容。

第 三 章

留学日本运动的多元化格局

(1970—1976)

第 一 节

留日学生促进中日关系发展

1. 留日学生与中日文化交流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中日关系在艰难中起步。到1972年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这20余年时间，活跃在中日友好运动战线上的，主要是一批各个不同时期归来的留日学生，如周恩来、郭沫若、廖承志、赵安博、孙平化、肖向前等人。

中日文化交流，作为促进中日友好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中日关系正常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日文化交流，主



要是由人员往来和开展活动来推动的。

1954年10月30日，中国卫生部部长、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率领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一行10人，由香港乘英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达东京羽田机场。这次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在日本进行了12天的友好访问，共参加了19次各界、各团体和各地方代表的国民欢迎大会和各种座谈会，17次宴会和茶话会，并举行了13次记者招待会、播音和电视广播，对日本社会的各阶层诚恳地、详细地表达了中国和中国人民关于中日友好的主张和愿望。代表团在两周的时间里访问了东京、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等城市，在各地受到了各界各阶层人士的热烈欢迎。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访问日本的代表团。代表团所表明的中国主张和愿望，在日本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良好的反应和强烈的共鸣。通过这次访问，不仅使中日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和友谊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且使中日两国人民对增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都受到鼓舞，增强了保卫和平的勇气和信心，为以后两国人民加强往来开辟了宽广的道路，对发展战后中日友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5年12月1日，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访日学术考察团访问日本。20余天时间里，代表团先后访问了东京、千叶、市川、仙台、名古屋、丰桥、京都、大阪、冈山、广岛、福冈、下关、八幡、别府等城市。抵福冈的第二天，郭沫若就开始探询他的恩师中山平次郎博士的近况。中山先生是郭沫若在九大读书时讲授病理学的一位教授。当郭沫若听说中山先生已经85岁高龄，而且健康状况不佳时，便想马上前去看

望。但由于日程安排得很紧，未能如愿。12月19日，也就是在福冈访问的最后一天上午，郭沫若终于得以抽空带着水果去看望中山先生。访日期间，郭沫若还于12月17日回到了他留日时的母校——九州大学，在母校进行了讲演。

归国后，郭沫若总结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访日科学代表团受日本学术会议的邀请，从1955年12月1日到达东京至25日离开下关为止，在日本进行了为时20余日的访问。这次访问的最大收获，是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学术界和日本学术界之间的接触和联系，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和友谊。这次访问生动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有深厚的传统的，而恢复和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①

自此以后，中日文化交流一度出现活跃的情景，如60年代初。1960年6月，濑越宪作九段为团长的围棋代表团访华，1961年，坂田荣男九段为团长的代表团访华。1961年7月以中国体育总会副主席李梦华为团长、孙平化为副团长的围棋代表团应邀第一次访问日本，以后几乎每年都进行围棋交流。1964年3月18日，中国排球代表队首次访问日本。1960年9月，以村山知义为团长的日本话剧团来中国演出。1964年，以中国京剧院四团杨秋玲、刘长瑜等青年演员组成的中国青年京剧团应日本演出公司邀请，到日本访问演出。1961年11月，在中日友好月活动高潮中，日本还举办中国电影节。

进入70年代，中日面临恢复关系正常化，中日间文化交

^①郭沫若：《访日之行》，《人民日报》1956年1月13日。

流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如1972年8月16日，中国上海舞剧团圆满结束在日本的友好访问演出，在团长孙平化率领下，包乘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本航空公司的两架飞机回到上海，这是建国以来日本的航空公司飞机首次由日本直飞中国。陪送舞剧团回国并应邀来中国访问的有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等；由朝田静夫总经理率领的日本航空公司代表团，由若狭得治总经理率领的全日本航空公司代表团以及为采访上海舞剧团返回中国的13名日本记者，同机到达上海。舞剧团是7月10日出国访问的。8月15日，舞剧团在东京举行盛大告别酒会，答谢日本各界朋友热情接待和巨大帮助。18日，日本航空公司代表团、全日本航空公司代表团到达北京。以此为开端，中日航线实质上被打开了。在这次访问中任团长的孙平化，是辽宁人，1939年入东京工业大学预科留学，1943年夏从该校本科退学，回国参加抗日革命工作。

2. 留日学生与中日经济交往

中日两国之间进行贸易交往，是战后中日友好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中日两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日本吉田内阁在美国的压力下，奉行“两个中国”政策，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道，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1950年3月，在日本人民强烈要求下，美国政府被迫答应日本可以同中国进行贸易。1950年4月29日，日本参议院通过了《关于促进日中贸易的决议》，中日贸易的局面开始出现。日本向中国出口钢材、电动机、泵等商品，中国向日本出口大豆、煤炭、铁矿石、食盐等商品。美国发动侵朝

战争后，根据所谓巴黎统筹委员会的规定，命令日本政府对中
国实行全面禁运，致使中日贸易一度全面中断。

1952年6月1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同日本方面签
订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第一个民间贸易协议使中日经
济关系走上了初步发展的阶段，为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作出了
贡献。1953年10月29日，中日签订第二次民间贸易协定。

1955年3月29日，中国贸易代表团到达东京，这是继中
国红十字代表团之后第二个中国访日的代表团，此行是谈判签
订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代表团以李焯尘为副团长，孙平
化为副秘书长。5月4日，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签订。这
次活动，中日双方代表团负责人是以政府和人民团体的双重身
份参加谈判的，虽然协定还不是双方正式协定，但已经得到了
双方政府的支持。双方约定将尽早互设享有外交官待遇的常驻
商务代表机构，这是中日经济贸易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开
端。协定提出，双方努力促请本国政府尽早就中日贸易问题举
行两国政府间的谈判，并签订协定。

上述几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及其执行，是特殊时期中日间
贸易独特的方式，对中日经济交往的发展起了重要铺垫和促进
作用，而每一次签订协定，都有留日归来者参与。不仅如此，
就是在同时期的其他经济交往活动中，也有留日归来者在起作
用。如在战后中日经济交往中占有相当地位的1955年中日民
间渔业谈判，中方谈判代表除水产部水产公司等有关单位人员
外，还有赵安博等人。赵安博于1934年9月赴日留学，次年3
月考入东京一高，1937年归国后参加八路军抗日。

后来，由于日本岸介信政府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中日经

济交往一度被迫停止。

60年代，中日经济交往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贸易备忘录》的签订。1962年10月26日，高碕达之助率42人的大型代表团到北京，同中国方面进行扩大发展贸易的谈判，廖承志、赵安博、孙平化、肖向前等人参加了谈判。廖承志是20年代赴日本留学的。1925年，17岁的廖承志在父亲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暗杀后不久，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校留学，这是他第4次在日本生活。1908年，他出生于日本东京。其父母廖仲恺、何香凝当时在日本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运动。后来他回忆说：“我是在大久保出生，又是靠日本女性的乳汁长大的。我儿童时代的一半血液是日本女性赐给的。”^①他3岁时随母亲离日到香港定居。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又随父母赴日本东京千驮谷安家。1915年，入东京晓星小学读书，次年再次随父母回国。他的童年基本是在日本度过的，这一段时间给了他美好的回忆：“我记得在我满五岁的时候，母亲替我穿上深蓝色的带萨摩式花纹的小外褂及和服，穿上小木屐。那时千驮谷还是一片水上，我尽情地像蝙蝠那样狂舞起来。不过，当时对我来说，最有吸引力的是浅草及十二层高的展望台。展望台是相当高的建筑物，但是其内容对五岁孩童来说太难了。还是动物园更有趣。不过，最有吸引力的是玩具店，母亲买给我一把长柄刀，当然是在浅草的玩具店。我不禁欣喜若狂，不顾地方就把刀舞

^①廖承志：《我的童年》，载中国新闻社编：《廖公在人间》，三联书店1984年，第249页。

起来。”童年时代的奶妈叶姨、朋友小梅、女佣鹤姨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回忆中他说：“我的童年时代是在日本度过的。叶姨、小梅、鹤姨在我的童年记忆中铭刻了终生难忘的馨郁香花。”^① 1918年至1919年，廖承志第3次去日本生活了一年。1925年，廖承志留学日本后，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尤其是1927年，国共两党斗争激烈，在日本留学生中的国民党分子，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反对进步力量。这时廖承志加入了中共“东京特支”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并成为研究社的积极分子。1928年3月12日，“东京特支”为了打击右翼学生势力的反共气焰，揭露他们的反动阴谋，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与《告士官生书》，准备在右翼学生组织的一次集会上散发。廖承志勇敢地参加了散发传单的活动。会议上趁关灯的机会，他“把传单雪片似地撒到人们身旁”。1927年3月18日，“东京特支”组织巴黎公社纪念会，一个来监视的士官生“拔刀就要砍会议的主持人”，廖承志与其他进步学生共同把那个士官生“拦腰抱住”^②。同年5月，廖承志参加了“东京特支”组织的反日大同盟，开展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他又是广东留学生同乡会的骨干，“多次在广东留学生会及其他进步团体组办的集会上，国民党反动派纵使反动学生进行的破坏活动中，为保护进步学生而受到反动派的殴打。”^③

^①廖承志：《我的童年》，载中国新闻社编：《廖公在人间》，三联书店1984年，第250~253页。

^②黄鼎臣：《廖公的青年时代》，载中国新闻社编：《廖公在人间》，第21页。

^③司徒惠敏：《我心中不灭的长明灯》，载中国新闻社编：《廖公在人间》，第35页。

1927年，廖承志因积极参加反日大同盟等革命活动，两次被日本政府逮捕，1928年被日本政府再一次拘捕并驱逐出境，归国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62年11月9日，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在《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上签字。这就是《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贸易备忘录》。双方一致确认：两国政府要对由日本厂商同中国有关贸易公司签订的商业合同予以保证。为处理备忘录贸易事宜，中方成立廖承志办事处，日方成立高碕事务所。它们虽说是民间贸易机构，但其有明显的半官方性质。

《备忘录》签订后，按双方约定，廖承志办事处派驻日本的办事机构为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事务所。1964年8月，驻东京联络处人员到达日本；在东京的纪尾井町农研大楼设立“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联络处除联络备忘录贸易有关事宜外，还参加同中国建交的友好国家驻东京使团的一些活动，举办国庆招待会，接待国内访日的代表团组、文艺体育团体，同许多日本对华友好团体、各党派政界朋友、科学家、律师、学者、文化人、艺术家等密切来往，成为不叫大使馆的“小型使馆”。

《备忘录》的签订，不仅开辟了两国间新的贸易途径，而且按规定互设常驻机构，在中日关系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备忘录》签订后，中日间的贸易在曲折中不断前进。1971年4月，美国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随之日本对中国的贸易出现兴旺的局面。在中日贸易形势趋转的形势下，1972年7月3日，中国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首席代表肖向前在东

京到任，继续推进中日贸易的发展。肖向前是辽宁人，1938年至1942年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文理科大学留学，中途退学后回国参加了抗日革命工作。

应该指出的是，“中日贸易能够在曲折中发展，同周总理重视中日关系，亲自领导这项工作分不开。60年代发生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曾经影响了对外关系，也影响了中日贸易。在‘文革’期间中方贸促团体发表的共同声明等类文件，过多地使用了‘文革’词句，乃至提出要反对‘四个敌人’（指美帝、苏修、日修、日本反动派）。对此，周总理在会见日本朋友时明确表示：不要提‘四个敌人’，应当只提出一个最主要的斗争对象，例如美帝国主义，才能团结更多的人。他还经常研究如何发展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派经济贸易代表团访问日本。正是在他的亲自领导下，这个时期的中日关系，包括经济贸易关系能够克服干扰在曲折中发展，为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及中日关系正常化后两国经济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①

3. 留日学生与中日关系正常化

1963年10月3日，由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等19个民间团体发起，在北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礼堂，召开了中日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中日友好协会成立时，其主要人物很多为留日归来者，如名誉会长郭沫若，会长廖承志，秘书长赵安博，副秘书长林林、孙平化，常务理事肖向前等人，123位理事中的田汉、夏

^①林代昭：《战后中日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85—186页。

循等人。其中任副秘书长的林林，是福建人，1933年6月赴日留学，1936年回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任报社编辑和大学教授。

中日友好协会作为从事中日友好事业的专门机构，成立后，其确定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强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尽早促使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

进入70年代，中日两国人民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呼声日益高涨，日本及国际形势也向有利于中日友好的方面转化。中日友好协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加强了同日本各界的交流活动，并先后与日本社会党代表团、公明党代表团、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恢复日中邦交国民议会等团体发表了关于恢复中日邦交的联合声明。1972年4月13日，中日友好协会与来访的民社党代表团发表联合声明，提出了著名的中日复交三项原则。其要点是：（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坚决反对任何“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等荒谬的主张；（2）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归还中国。台湾问题纯属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坚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和策划“台湾独立”的阴谋；（3）“日蒋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复交三原则”是对多年来中日各方面会谈的内容的概括，它在日本获得了包括首相田中角荣在内的广泛理解，为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的前一刻，不仅周恩来、廖承志起了决策或参与决策的作用，孙平化、肖向前还起了直接的推

动作用。孙平化对此回忆说：1972年7月10日，我被指派为中国上海芭蕾舞剧团团长，率领由208名团员组成的大型文艺演出团赴日本访问和公演。在我们抵日不久，当时的亚洲司日本处陈抗处长随农业代表团访日，来到了东京。他在临行前参加了周总理召集的会议，亲耳聆听了周总理的重要指示。到日本以后，在我们驻东京备忘录贸易办事处——“孙平化宿舍”里，他向我和肖向前以及有关同志作了传达。他说周总理是这样说的：“我讲田中内阁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值得欢迎，是因为毛主席对我说，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毛主席的思想和战略部署我们要紧跟。（对方）能来谈就好，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这回不能再叫‘旋风’了，要落地。孙平化嘛，就是要万丈高楼平地起，肖向前是继续前进的意思，这两个人就是要把这件事落实才行。”听到周总理高屋建瓴的指示和用生动比喻交待给我们的任务，心里无比激动和兴奋，并深深感到责任之重大，决心全力以赴，贯彻落实，很好地完成周总理交给的光荣任务。我们遂即进行了热烈讨论，先吃透精神，领会周总理重要指示的含意。我理解“平地起高楼”和“继续向前”就是要我们在已有的基础上通过广泛积极的接触和细致的工作，推动田中继续采取行动，实现访华，举行两国总理会谈，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同时，我也感到，完不成这项重大任务，回国后无颜见总理，交不了账。所以，后来我就把工作的重点转到这上面来。我和赴任不久的驻东京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首席代表肖向前一起拜访了各友好团体的负责人以及财界、政界、新闻等各界的朋友和人士，同时还应邀出席了三菱、三井、芙蓉、住友、三和、第一

劝业银行等日本六大财团和《朝日》、《读卖》、《每日》、《日经》等各大报社、广播电视台负责人的欢迎会和宴请活动，就中日关系问题进行恳谈，并与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深入的交谈。每天不论多晚，活动结束后我们立即向国内打电话汇报与请示，就这样度过了一段迄今没有经历过的紧张而有意义的时日。接触过程中的话题中心归纳起来也很简单，就是中日两国恢复邦交。

孙平化还回忆说：7月20日，为欢迎我访日和肖向前来东京赴任，藤山爱一郎在东京新日本饭店举行前所未有的盛大酒会，大平外相特地前来参加，向我们表示了良好的祝愿。过了几天，小坂善太郎告诉我说，大平外相准备正式会见我和肖向前，具体时间、地点将由外务省中国课长桥本恕同我们联系。7月22日，大平外相在新大谷饭店会见了我和肖向前。根据双方事前的商定，双方用日语直接交谈，各带记录一人。大平外相对我们说：“我和田中首相是一心同体的盟友，他委托我全权负责处理外交事务。田中首相和我都认为，当前日本政府首脑访华、解决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对此，我们也根据国内指示热情地表示，中国方面欢迎田中首相到北京直接同周恩来总理会谈，只要田中首相去北京，一切问题都好商量，中国方面决不会让田中首相为难。接着我们还表示，希望能够有机会见到田中首相。我作为中国上海芭蕾舞剧团的团长和中国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一起正式会见田中内阁的大平外相，进一步引起了新闻记者的注目。“田中首相将访华，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一时成为日本报纸、电视的热门话题和评论的中心。8月11日，大平外相

在东京大仓饭店再次会见我和肖向前，正式向我们转达田中首相将访问中国，首相本人将在舞剧团回国前一天安排时间会见我们。8月15日，下午4点半，田中角荣首相在东京帝国饭店接见了我和肖向前，同我们进行了友好、亲切的谈话。日本现任首相正式会见中国访日代表团团长和我常驻日本联络处的首席代表，这还是战后历届内阁的第一次。陪同田中首相会见的还有二阶堂官房长官。我们按预定时间到达帝国饭店，从饭店大门口到高楼上的会见厅长长的通道两侧站满了新闻记者和警卫工作人员。一间不小的会客室中间用屏风间隔开来，半面作为提供记者照相的地方，另一半作为会见、谈话用。记者退席后，我们就到屏风另一侧，开始交谈。根据事前的商定，对方谈话不通过翻译，我方谈话为了慎重和准确、充分表达要表示的意思和感情，还是通过翻译。因此，联络处的许宗茂和舞剧团的唐家璇、江培柱参加了这次会见。对方出席的还有外务省中国课长桥本恕和田中首相的秘书官木内昭胤、小长启一、畠中笃。我们正式地直接转达了周恩来总理的邀请，田中首相感谢周总理的厚意，表示他已决定访问中国。他认为解决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但需要处理好党内各种意见，作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暂不过早公布具体时间，希望通过访华，取得丰硕成果，使两国关系能顺利进展。这次接见的消息一发表，不仅在中日两国反应强烈，而且成为引起全世界注目的一大新闻。因为田中首相访问中国，就意味着中日两国人民盼望已久的邦交正常化将成为现实，意味着在中日两国之间长达半个世纪左右的不愉快的历史宣告结束，中日两国将在全新基础上建立真正的睦邻友好关系，这也标志着中日两国人民将谱写中日友好关

系新的乐章，为两国的和平友好和亚洲、世界局势的稳定做出自己的贡献^①。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一批留日归国者，为中日关系正常化，为中日友好事业的发展，起了切实而重要的推动作用。

4. 留日学生的作用被弱化

战后，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分布于各个不同领域里的归国留日学生，他们顺应时代潮流，在中日两国人民要求和平友好的呼声中，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经济交往，以及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发挥自身的优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在中日友好运动的潮流中，还会看到另外一种现象，即由于特殊时期的特殊国情，他们这种促进中日关系发展进步的作用又有被弱化、受到抑制的时候。这种被弱化、受抑制，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几个重大历史时期，都曾出现过。

50年代，耕耘中日交流事业的人，稍有不慎，就会受到怀疑，尤其是反右扩大化以后。中日关系史专家汪向荣先生，1940年到日本留学，1942年回国，后又赴日，1944年回国。他对留学日本回忆说：“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知道日本是帝国主义者，东洋小鬼，他侵略我土地，杀害我同胞；我国弱，暂时没有力量和他较量，但要发愤图强，积蓄力量，好有朝一日打败日本。因此，我们有‘国耻纪念日’，用抵制日货以抗日、排日，我第一次参加的群众运动，就是进中学后，抗议‘九一八’日军占领东北的示威游行。在这种教育薰陶下，我

^①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第86—95页。

幼小的心目中，只知道日本是列强中最坏的一个。但在家里，我曾听到祖父在闲谈中说过，日本有坏人，也有好人。光绪末年，中国要兴新法建立学校时，就有许多日本先生来帮助过，那时我曾祖父在北京署理京师法政学堂总教习时，就和许多日本先生共过事。据我祖父回忆，曾祖父说过，那些日本先生都是品学很好的，可惜他们很快被调走，离开北京，没能有更多接触的机缘。”“傀儡政权成立后，手伸到了大学中，连在上海租界也无法安心求学了，所以当时学生中很多人弃学离沪。我也曾考虑过与其在上海虚度年华，不如他去的事。但到哪里去呢，很久以来就成我脑海中盘旋而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最后我想，中日两大民族真永远摆脱不了世代相仇的局面，日本人民究竟怎样想，怎样生活的呢？得亲自去看看，万一不如我想象的，再回来也不晚。”^①

留日期间，松本龟次郎先生向汪向荣介绍了从事中日交流研究的实藤惠秀先生，从此二人频繁交往，切磋学问，成了好朋友。但是，50年代后，二人的交往长时间地受到了阻隔。汪向荣说：

实藤先生在50年代来中国时，我已经是右派了，不让他见我。他带给我的东西，本来要旅行社转交给我，旅行社不肯办。他聪明，就到新侨饭店邮局寄给我了。可是他送给我他的著作《中国人日本留学史》，

^①汪向荣：《回忆松本师》，载杨正光、平野日出雄：《松本龟次郎传》，第176、178页。

寄了三次，头两次我都没有收到，第三次寄是1979年了，我才收到了。头两次没收到，单位里还要我做检讨，责问我：“为什么不顾国格，找日本人要东西？”我说：“没有呀！”他说：“没有要？为什么日本人给你寄书来！”还有，不知道是谁寄一本《高丽》杂志给我，结果上面说是反动杂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人家怎么会寄给你？”我一再检讨也通不过，总说我肯定知道，里面有阴谋。

实藤先生很长时间没有办法同我联系，他曾有一封信写给我的爱人，上面写道：“听说汪先生出了点事，所以信写给你，到以后汪先生能够收到信时，请给我来封信，汪先生知道我的地址。”可见他的心情。到1978年，《人民日报》有人来找我写文章，我说我还没有摘右派帽子，编辑说：“你早就摘了帽子，你不知道。”我说：“不告诉我，我怎么会知道？”他就说：“你写一篇千把字的文章，我们给你发表。”我就把实藤惠秀和第三个儿子到埼玉县找黄遵宪笔谈冢碑的照片和其事写了，发表了。《人民日报》的确有用，不到半个月，日本方面来了七八封信，其中包括实藤惠秀先生的。他在信上说：“我以为你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没有再给你写信。现在看见你的文章和照片，知道一定是你本人写的，相片只有你有。请你告诉我你的近况。”那时环境宽了一点，我就写了回信，把我的大概情况告诉他。这样我也才搞清楚，是他前两次寄书来，要不然我的检讨也白费了。他又再寄第

三次，还有一本《中日非友好历史》新书给我。

后来香港中文大学谭汝谦博士主持召开第一次“中日关系史学术会议”，实藤先生是贵宾，他提出要请我去参加会，谭博士说，知道汪先生，可是不知道他现在什么情况？实藤先生告诉他，我在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谭博士就用中国文化研究所陈所长名义，写信到中国社科院，邀请我去开会。那时社科院一些人还左得厉害呀，尽管胡乔木说：“可以去，没什么不可以去的。”可是到世界史所又把我卡住了。

实藤先生也说抱歉。我就问他能不能来中国？他说可以。我就让周雷请吉林社科院以《社会科学战线》的名义发函邀请他来中国，三上次男当团长，实藤当顾问。这一次，有人又同我打招呼，说你不通过×××那一关，谁也不行。结果又把实藤先生卡住了。怎么卡的呢？他们告诉实藤先生，说你到北京的话，也不能见到汪向荣先生。实藤先生就说：“不能见面的话，我去北京干什么？”他就没有来。以后就没有机会了。”^①

特殊时期特有的原因造成的阻隔，使汪向荣与实藤惠秀交往的机缘一次次地失去，使中日两国学者之间的交流减少了不少佳话。

“文革”期间，或由于有留学的经历，或由于有海外联系，

^①钟少华：《早年留日者谈日本》，第172—174页。

或由于其他的原因，一批批的留日归来者受到了迫害。如中国著名影星、曾是留日学生的王莹，1955年春被安排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作编剧工作，后因她的丈夫谢和赓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送往北大荒劳动改造而受到沉重打击，心境凄凉，健康每况愈下，便在香山狼见沟找了一栋农舍，过着隐居式的写作生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在有关会议上多次点王莹的名，说“王莹坏得很”。王莹被冠以“30年代的黑线人物”、“黑明星”、“老吸血鬼”等罪名，不得不拖着病弱的身体，每天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接受批判，遭受红卫兵的辱骂、抽打。1966年7月1日谢和赓被捕。不久王莹也被关押进监狱，被江青一伙定为“死囚”，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并于1974年3月3日凌晨含冤谢世。

曾经直接从事中日友好运动的留日归来者，很多人也不得不离开心爱的事业。多年从事中日友好工作的孙平化回忆说：“我们驻东京联络处没有自己的办公场所和宿舍，总感到还没有定居。从1966年起我们就在筹划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买地盖房子。得到国内批准并拿到预算以后，在东京华侨总会陈焜旺（当时是副会长）和日本朋友的积极协助下，连日奔波，反复比较，总算在港区惠比寿物色到一块地皮。那是‘三菱矿业’的‘寮’（宿舍）要出售，面积约五六百坪（每坪3.3平方米），我们下决心买下这块地皮，盖一所办公楼、一所宿舍楼，留一个小院，可供举行中、小型招待会。从法律上说，驻东京联络处这个机构本身没有资格买地盖房子，变通办法是用孙平化个人名义买，作为孙平化盖宿舍来申请建筑许可。当然尽人皆知，孙平化不可能在日本拥有房产、地产，也

不可能拥有这么大一笔资金（地皮、建筑当时共需用二亿日元），实际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财产。……正当施工期间，我在日本停留又满一年了，就于1967年4月18日回到北京。离开东京时，我是准备休假一个月再回东京工作的，但回到北京后遇到的情况却是事先没有料到、没有思想准备的。该如何参加这场‘文化大革命’，茫然不知所从。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看那声势和架势，我对于能否重返日本任职，很快就断念了。因此，当楼房竣工的时候，我只能‘望洋兴叹’了。于是，惠比寿这个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的新居就成了‘没有孙平化的孙平化宿舍’。当我亲眼看到这幢建筑并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午休时，已是事隔五年之后、率中国上海舞剧团访日的1972年7月了。这五年空白，是我不用脑子、浪费时光的五年。在‘五七’干校劳动之余，只是从报纸上、《参考消息》上看到一些中日交往的报道，了解一点情况，但是看不到廖公的名字和活动消息了，只知道敬爱的周总理还在主管外交工作，廖公的中日友好协会会长职务还没有被拿掉，备忘录贸易这条线还没有完全断。……《人民日报》的字里行间又可以找到廖公的名字了。我的处境也逐渐好转。听说周总理在打听，原来在廖公领导下做中日友好工作的孙某人现在哪里，这就成为我重新出来工作的原动力。第二年，1972年夏天，我率上海舞剧团访日，孙平化终于看到了孙平化宿舍。”^①

就是到1972年中日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以后，由于十年“文革”还未结束，一些留日归来者在从事中日友好事业时还

^①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第84—86页。

心有余悸，做事不得不谨慎小心，或者说是过分谨慎小心。米国钧的经历最具有这方面的典型性。他是辽宁盖平人，1935年赴日留学，入东京工业大学，1942年回国。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他于1973年去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日临时代办。他说：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我奉命在1973年1月28日赴日本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的新大使馆，作为临时代办，……陈楚大使在3月到任后，我在4月初到母校东工大拜会了加藤占美大学长和导师林茂助教授（时年91岁），感谢母校对我培养之情。结果到4月中旬，藏前工业会的事物局长远藤疆特来使馆，他说：因为相互隔绝很久，他们从藏前工业会员名簿上查到我的名字和学科。藏前工业会老一代都是今天日本财经界的巨头，会长大久保谦是三菱电机公司的会长，理事长土光敏夫是东芝电气公司的会长，又是现任经联团的会长。他们要求藏前工业会准备米国钧学友来日本的欢迎会，要我考虑好时间通知他，以便准备。我用外交辞令回答：藏前工业会的先辈学友们对我的友情非常感谢。为我的欢迎会不要搞了，大家都很忙，不必给你们添麻烦了。请转达我对大久保和土光敏夫会长的感谢！远藤急了，他说：不行不行，欢迎会一定要搞，大久保和土光敏夫会长交办的事情我一定得办好，否则我交不了差。我等待你回答日期。远藤告辞了，我的心可就七上八下了。

1973年国内的“文革”运动，江青等“四人帮”在垂死挣扎，气焰嚣张。他们要整周恩来总理和周总理所领导的外交部。而在那个时代每个干部都要交代自己的社会关系，特别是海外关系。但我从来没有交代过我是藏前工业会的会员。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毕业，自然就是藏前工业会的会员。其他的大学也是如此。如同中国的黄埔军校毕业就是黄埔同学会的会员一样。我毕业就离开日本，没考虑这些问题，现在这些忌讳又都找上门来。好不容易在“文革”里挨斗挨整的大难过去了，现在大难又要临头？心里不安，在嘀咕如何处理：如果要报上去，就公开化了，我早年参加了外国团体，又对组织长期“隐瞒”，在“四人帮”看来是罪大恶极了，也是他们难找到的好猎物。有可能被调回，又要到农村长期改造了。我决定对这个欢迎会一定要辞掉。可是远藤先生很热情，每隔一周左右总要来电话催促，他还斩钉截铁说：“大久保谦和土光敏夫会长表示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老学友的友谊，一定要办好欢迎会，等候我的答复。”我真的傻了眼了，再也拖不下去了。五月初一个夜晚，我找到陈楚大使，讲了我为难的情绪。他讲：“同日本学友、财界的友好之谊，还是原原本本地报告外交部，由国内来决定吧。”他还逗趣地说：“要调回斗的话，那么再挨几次斗吧。我想有周总理和姬外长是不会的。”没有出5天，国内答复：应该应邀参加日本财经界的藏前工业会的欢迎会。我如释重负。

这是周总理和外交部的正确决定。

在5月27日晚6时，我请秘书陪伴参加了藏前工业会在东京都品川区高轮的三菱财团的迎宾馆“开东阁”举行的欢迎会。日方有80多人，都是日本股票二级上市公司的大公司的董事成员、日本财经界的巨首。会上加藤占美大学长、大久保会长、土光会长等都讲了话，我也作了带有“文革”气味的“八股”答辞。在会上互相进行了学友间的亲切友好的交谈，互相交换了名片，藏前工业会赠送了东工大老前辈日本艺术院奖获得者工艺家各务三以其亲手雕刻的水晶花瓶。会上气氛热情友好，态度是同学的友谊诚恳。宇部兴业公司的中安闲一对我说：“中日邦交恢复了，这是很重要的。今后中国需要经济建设，要建设没有技术人才不行，中国现在不是技术人才多了，而是缺乏技术人才。你在东京搞一段后，还是早点回国发挥技术力量，更为重要。其次，在大规模经济建设过程中，中国应避免日本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弊端，本来可以避免的，希望不要重演。”

在我临告别时，桌前堆满了这些大老板的名片，都是学友，都是大公司的巨首，我一想到“文革”抄家的行动，心有余悸，下意识地未敢把这些名片拿回来。尽管这是友谊，而且是对国家有用的，当时我脑子里一闪，这是“勾结外国的罪证！”我就忍痛放在桌上而离去。

回来后几天心里没有平静，一是这些同窗友谊难

忘，二是翌日日本大报刊又登载了有关欢迎会的报道。第五天日本财界刊物《财界》的封面上刊出我的大幅照片，报道了欢迎会的盛况。这又一度引起了我的不安。后来国内来人告诉我：“老米，行动要注意，使馆有人写你的黑信报告到政治部。”当时“四人帮”的爪牙，就是这样干扰，使你无法正常地开展友好工作！”^①

一批批留日归国者在各个时期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他们在工作中受到限制，使得他们本应发挥出的促进中日友好事业的作用受到了削弱，这一点，对于中日友好事业来说，不能不算是个损失。

第 二 节

台湾地区留日活动的变化

1. 留学甄试办法的实施及废止

70年代，台湾的留学活动发生了一些变化，其变化首先表现在留学政策上。

从70年代初开始，台湾的留学活动中实行了甄试办法。

1969年12月1日，台湾教育当局公布了留学甄试办法，该办法的主要条款为：

第二条 凡合于留学规程第六条（即岛内大学或独立学院

^①钟少华：《早年留日者谈日本》，第109—111页。

毕业生，获有攻读博士或硕士学位之国外大学奖学金，其金额足付该校全年学费者；岛内专科学校毕业生，获有国外大学修读同性质科系一年之全部奖学金者；已在岛内得有硕士学位，而欲前往国外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者；已在岛内大专学校毕业，服役期满，继续留营服役二年以上，或在外岛服役期满者；在校成绩优良，每学年学业与操行成绩平均各在 85 分以上者）各条款之一而申请出国留学者，均照本办法甄试之。

第三条 申请甄试者应缴验下列文件：（1）国外大学许可或奖学金证明。（2）大专院校或研究所毕业证书。（3）留学国语文成绩证明。（4）已服完兵役之证明。（5）户籍本。

第四条 甄试之准则如下：（1）前往进修之外国大学为“教育部”所认可者。（2）留学国语文成绩在 70 分以上者。（3）奖学金或助教酬金确系该校或基金会所赠予者。（4）入学许可证明具有办理出国手续之时效者。（5）认真参加出国留学生之讲习者。

第五条 甄试之程序如下：（1）填写申请书及留学生资料卡。（2）缴验应备文件。（3）审核。（4）约谈。（5）领取自费留学证书。（6）参加留学生讲习。

第六条 申请甄试者，如系定有服务年限之大专院校毕业生，除系本办法第三条应缴之文件外，并应缴验服务期满之证明文件。

第七条 凡合于留学规程第六条第四款或第五款而申请甄试者，除依本办法第三条应缴之文件之外，并应另缴服役外岛不克参加留学考试证明或在校各学年之学业及操行成绩单。

第八条 申请甄试之男生，体位列为丙、戊等者，须另缴

验参加出国留学学生军训结业证书。

该次公布的留学甄试办法，是针对自费留学生而制定的，其最大变化，是将原来留学规程中的免试条款取消了，代之以甄试。甄试的办法，是一种全面考核的办法，它不像是考试，只注意一份试卷，在甄试办法中，申请留学者所有学习成绩及品行等都被列入了考察的范畴之内。由此看来，它是对申请留学者一种全面、严格考察的办法。

留学甄试办法的实施，有其积极的方面，但它同时也将留学者截然分成了两部分，并且两部分人处在了不公平竞争的地位上。甄试尽管从出现的那一天起就是以替代免试出现的，但它并不是考试，只能算是考核。与甄试办法并行的时期，台湾还实行“教育部”所举办的自费留学考试，二者显然是不公平竞争。因此到1976年，台湾当局在公布的修订《国外留学规程》中，将留学甄试办法和自费留学考试全都废止。其后，凡符合修订后留学规程各项条款者，都有资格申请到海外留学，不必经过统一考试。从此，台湾的自费留学人数逐年增加。

2. 公费留学政策具体而严格

1976年，台湾当局公布了多个关于留学的规程、章程和办法等，从而为其后留学活动的发展起到了制约、引导的作用。

1976年2月25日，台湾“教育部”公布“国外留学规程”，取消了延续已久的自费出国留学的考试。另外，其如下两项规定同样引人注意：

第一，将留学生分为两种，一为自费留学生，二为公费留

学生；公费留学生又分为三类，其一为一般公费留学，其二为岛内研究所学生公费出国留学，其三为专题研究公费留学。

第二，规定了留学返台后再出国留学的条件：（1）公费留学生依照规定服务期满者。（2）外国政府或文化机构或私人团体之奖学金留学生，经“教育部”核定出国留学，返台后依规定服务期满者。（3）自费留学生依台湾当局规定有服务之义务，已服务完毕者。（4）自费留学生回台时接受台当局旅费补助或回台后经当局分发工作，服务满一年者。（5）自费留学生无服务之义务者。

显然，上一个规定是因为留学返台者渐多，其中有的人有再出国留学的要求而制定的。

自费留学考试取消后，台湾教育当局为指导自费留学，制定、公布了“申请办理自费出国留学应行注意事项”。另外，台湾教育当局还分别为三种类型的公费留学制定了考试简章。

“一般公费留学考试简章”中，对应考资格、报名日期、报名地点、报名手续、考试项目、考试日期、考试地点、录取名额等都作了详细规定，比如，应考者须未曾出国留学，年龄在35岁以下；考试科目中规定，考试分笔试和口试两部分。

台湾教育当局在公布的1976年公费各学门应考专门科目及毕业系科中规定，报考日本的国际市场学学科公费留学生，须考市场学与国际贸易课程，报考者应为经济学系、财政学系、商学院各相关学系毕业生；报考日本的环境卫生学科公费留学生，须考环境卫生、废弃物处理（包括污染处理、污水处理、废气处理）课程，报考者应为医学院各相关学系、卫生教育学系毕业生；报考日本的核子医学学科公费留学生，须考病

理学、放射线物理学课程，报考者应为医学院各相关学系、医学工程学系毕业生；报考日本的农业机械学科公费留学生，须考农业机械、农机设计课程，报考者应为农业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轮机工程学系、工业工程学系、农业机械学系毕业生。另外，还对报考日本的造船工程、船舶机械等学科公费留学生的报考者条件及考试科目分别作了规定。

“一般公费留学生须知”中规定，赴日公费留学生留学期限为两年。须知中其他规定如下：

（一）待遇：（1）生活费每人每月 250 美元。（2）学费检据核实报支。（3）书籍每人每学年 300 美元，须检附购书发票（或凭证）核实报支。（4）硕（博）士论文印缮费 300 美元，检据核实报支。（5）在校健康保险费，由“教育部”与被保人各半分担，检据核实报支。（6）往返机票由“教育部”购发。

（二）回台服务：公费留学期满后，必须即依规定回台，由“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分发或推介工作，服务期限为 2 年至 3 年（即依所领公费待遇之年限定之）。

（三）限制：（1）公费留学生出国留学期间，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请其眷属出国探亲，或依亲生活。（2）留学期满后，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请延长公费或自费留学期限。（3）不得改变留学国别及学门。

岛内研究所学生留学考试简章和教育行政专题研究留学考试简章也都对报考者条件、报名、考试、录取等作了详细规定，其他待遇、回台服务、限制等条款与一般留学生无大差别。

从以上可以看出，进入 70 年代后，台湾对留学活动的各

个方面规定得很是详细、具体，有的方面甚至很严格，比如留学期满回台服务等。台湾当局力图通过留学活动，培养各方面的高级人才；通过留学生学成返台，促进岛内文化教育、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发展，而实际情况也表明，在留学活动中，一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学业卓有成就。如1958年，台湾留日学生谢世辉荣获了日本读卖端川奖学金，成了台湾留日学生中的明星人物；1970年，台湾旅日学人黄庆荣博士获得了日本化学年会奖，成了日本科学界的一大佳话。学有所成的留日学生回台湾，对台湾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3. 台湾留学生结业后的不同流向

留学生出国留学，同时也就有了学成返回的问题。台湾当局在所有的留学规程中，都有返台服务的规定，但实际情况是，由于各种原因，返回的总是比出去的少。随着留学人数的逐渐增加，留学生学成不归的问题日益严重，造成岛内大量人才外流。这一问题，多年来引起了台湾各有关当局及社会各界的重视。

1964年8月28日，为吸引留学生学成返台，台湾“行政院”公布对海外学人回台讲学等活动简化出入境手续。

1967年11月16日，“教育部长”阎振兴在“九届五中全会”报告中提出：改进留学方法，减少人才外流。

1968年1月6日，吴大猷在“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讲话中宣称：台湾科学发展10年规划已拟定，在此目标下应积极培养高级人才，改善岛内的研究环境与设备，改善学人待遇，争取人才回流。

1970年7月29日，台湾“教育部”颁发《爱国建国教育纲领》共18项，其中一项是鼓励学人回台任教。

1970年9月17日，台湾“行政院”国科会制定吸引海外学人回台服务措施：(1)了解海外学人志向。(2)把握时机发出邀请。(3)提供良好服务和生活、工作环境。

1979年3月3日，台湾“行政院”核定《海外学人回台服务办法》，“青辅会”、“教育部”、“中研院”等单位配合，先从约聘做起，然后安排合适工作，承认海外的学术成就。

1981年4月23日，台湾“行政院”答复“立委”质询时称，当局对回台工作者，只求学人一技之长，而不问政治背景如何。

从以上列举情况看得出，台湾当局对留学生归台工作十分重视。

70年代以前，台湾当局已做了很多有关吸引留学生返台的工作。

1950年，台湾当局拟定了“教育部”洽介留学生返台服务办法，函请有关当局办理，同时分函各公司厂矿，查询需要何种人才，列表后进行物色。同年底，“教育部”拟定辅导国外留学生回台服务办法，规定凡在专科以上学校毕业或工厂、农场实习研究期满之留学生，志愿回台服务者，皆得经“教育部”审核后，给代办入境证，抵台后按其专长及志愿分配工作，并采取一些补助办法。

1951年7月23日，“行政院”核定安置返台服务留学生办法五项，其措施具体而明确。

1955年5月，“行政院”成立“辅导留学生回台服务委员

会”，进行各机关学校人才调查、返台留学生工作分发、返台留学生生活辅导的工作。

进入 70 年代后，台湾当局吸引留学生返台的工作有了很大发展。

1971 年 7 月，台湾当局责成“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专事协助留学生归台服务，并先后拟定了协助留学生回台服务实施要点。其要点如下：

第一，回台服务申请手续。

在国外大学院校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者；在国外专业学校结业，获有证明书者；在国外从事专门研究一年以上，著有成绩，持有证明书者；在国外工厂、农场、医院研究实习一年以上，持有证明书者，愿回台服务一年以上，填写留学生返台服务申请登记表，未取得其他公私机构资助回台旅费者，可向“青辅会”申请回台旅费补助。除留学生本人外，与其同行的配偶、子女同样享受旅费补助。补助标准视路途远近有别，如从日本返台，每人补助标准为 120 美元，儿童酌减。

留学生返台入境前，如能将抵达台湾松山机场时间函告“青辅会”，“青辅会”将派员前往照料，协助办理入境手续，并致零用金及膳费新台币 1000 元以应临时需用；入境前未通知“青辅会”去机场照料，零用金及膳费后行补送。

第二，推介与分发工作。

“青辅会”接到留学生的回台服务申请登记表及学历、成绩证件后，即依照本人所填志愿，并参照岛内需要情形，向有关机构推介，推介函发出的同时，将推介情形函告申请人。

未办理留学考试前出国留学者和经“教育部”批准出国留

学者，若能适合有关机构需要，“青辅会”则对他们分发工作，分发范围限于当局机关、公营事业及公营金融机构。

已推介或分发工作者，不得申请改行推介或再分发。

第三，回台创业。

留学生有志回台自创业者，“青辅会”给予协助，协助范围包括以下各项：

(一) 创业贷款。每人可申请低息贷款 50 万元新台币。四人合伙创办同一事业最高可申贷 200 万元新台币，如创业计划有特殊需要，将专案予以协助。

(二) 厂地厂房。在岛内设厂如需购买土地、兴建厂房，可协助寻觅。同时，“青辅会”还置有一部分土地和厂房，专供海外学人及留学生购置。

(三) 对回台创业设厂等其他问题，提供咨询服务。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70 年代后，台湾当局明显加大了吸引留学生返台的措施，无论是回台过程，还是回台后的安置，都提供了很多方便、优惠的条件。

台湾当局的努力，也确实收到了显著的效果。留学生返台的情况，可见下表：

历年回台湾工作的留学生人数统计表

年份	合计	行政机关	公民营企业 与金融 机构	大专 院校	中等学校 或 研究机构	医院	新闻 界	其他
1950	6	3	—	2	—	—	—	1
1951	17	7	—	5	1	1	—	3

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

续表

年份	合计	行政机关	公民营企业 与金融 机构	大专 院校	中等学校 或 研究机构	医院	新闻 界	其他
1952	16	6	2	5	—	—	—	3
1953	16	4	—	3	—	2	1	6
1954	21	6	8	2	—	—	1	4
1955	34	8	5	5	1	4	—	10
1956	67	22	5	14	3	7	3	13
1957	62	20	14	16	—	5	—	7
1958	91	18	17	13	—	14	6	23
1959	70	12	17	14	—	3	1	23
1960	47	14	9	15	—	4	1	4
1961	52	10	8	14	—	1	1	18
1962	63	13	17	11	1	1	3	17
1963	95	18	13	25	1	2	5	31
1964	96	16	17	25	—	—	5	33
1965	120	25	13	42	1	2	5	33
1966	136	29	21	35	2	3	2	44
1967	153	40	8	29	1	—	—	75
1968	184	38	20	48	2	3	1	72
1969	226	65	49	88	1	3	1	19
1970	407	69	70	215	6	2	1	44
1971	362	77	91	133	4	9	1	47
1972	355	78	69	130	3	5	—	70
1973	445	76	121	189	5	12	8	34
1974	486	84	124	199	9	5	8	57

续表

年份	合计	行政 机关	公民营企 业与金 融机构	大专 院校	中等学校 或 研究机构	医院	新闻 界	其他
1975	569	82	127	258	3	12	6	81
1976	722	81	123	298	5	15	20	180
1977	624	42	96	289	—	23	17	157
1978	580	48	102	218	1	16	16	179
1979	478	104	99	177	8	11	5	74
1980	640	71	72	162	35	10	45	244
1981	937	132	341	229	58	24	5	148
1982	1106	109	212	266	4	26	12	477
1983	1257	161	387	361	130	25	9	184
1984	1329	124	441	441	108	39	12	164
1985	1350	164	357	448	133	48	13	187
1986	1583	191	437	466	180	65	15	229
1987	1920	214	577	513	241	76	15	284
1988	2296	258	696	578	298	83	18	365
1989	2464	279	728	614	327	46	27	443
1990	2863	325	855	691	388	65	33	506

从上表可看出，返台的留学生人数基本是逐年增加。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出，仍有很多留学生停留国外未归。因为上表显示，从1950年至1976年，返台的留学生共有4918人，而前面的另外一份表显示，同时期台湾出国留学生共有42719人，如果抛开一些细节问题不计，姑且将这两个数字作直接比较，就可以说，从1950年至1976年，台湾的出国留学生有

37801人未归，返台的留学生仅占出国留学学生总人数的11.51%。因此从整体上看，其归返人数的比例还是十分低的。

没有返台的留学生，他们做了多种选择，或停留在留学国，或转往他国。在未返台的留学生中，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即他们回到了中国大陆。如1980年8月21日，新华社的一则消息透露：自1978年6月以来，一共有34名台湾赴国外留学生回大陆定居，并有不少人回大陆从事短期工作^①。

回归大陆的台湾留学生，尽管与台湾赴国外留学的总人数相比尚属不多，但它表示了台湾留学生的一种流向，而这种流向又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一种现象。

4. 经济问题对台湾留日活动的影响

台湾的留日活动，从实质上说，与台湾同日本的经济往来有重要关系。

1951年，日本与台湾蒋介石集团签订了所谓日台条约，日本政府从1953年起对台湾进行资本输出和私人投资。日本在对台湾进行经济扩张的同时，为牵制台湾，从各个方面对台湾进行渗透，其中便包括接收台湾留日学生，甚至政府直接出面，给台湾留学生以日本政府奖学金。

进入70年代后，台湾留日学生的增加幅度明显加大，这也同台湾与日本的经济往来有直接的关系。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发表，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联

^①张山克编著：《台湾问题大事记》，华文出版社1988年，第565页。

合声明发表前的会谈中，中国坚持认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日台条约是非法的，必须废除，而日本政府虽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又以日本遵守其签订的条约为由，不愿意在联合声明上宣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和废除日台条约。为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中国政府在会谈中既坚持原则，又采取适当灵活的方法解决分歧。三次会谈后，这个问题得到了完满解决。

关于台湾问题，日本在联合声明的前言中写上“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又在声明的第二条中写上“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第三条中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对于废除日台条约问题，决定在签署联合声明后由大平外相声明的方式宣布开罗宣言规定台湾归还中国，而日本接受了承继上述宣言的《波茨坦公告》。鉴于这一原委日本政府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的立场是理所当然的，“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台）条约宣告结束”，日台间的“外交关系”也不能维持，驻台湾的原日本大使馆在处理善后事宜后将予关闭。

1972年9月，《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后，日本与台湾当局断绝了外交关系，只能维持民间和地方性的往来。12月，日本与台湾互设了民间联络机构“交流协会”和“东亚关系协会”，双方可以发放签证。可是不久，日台之间的“实质关系”

有所发展，不仅官方人员往来频繁，而且在经济往来上发展得更快。在贸易方面，1972年日台贸易为14.2亿美元，1980年上升到75亿美元，1986年达128亿美元。在投资方面，70年代至8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台湾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吸引，日本企业的大量投资倾注台湾，急剧地增强了台湾的经济力量。1982年，日本对台湾直接投资额为1.52亿美元，到1984年增至4亿美元。截至1983年底为止，约有500家日本企业在台湾合资或独资经营了478家企业。这500家日本企业中约有30%多是股票上市的大企业。

日台之间经济关系的密切，助长了日本右翼努力进一步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阴谋。其表现在留学活动上，就是制造台湾与大陆在留日活动上直接摩擦，如“光华寮”事件。

光华寮坐落在日本京都市左京区北白川西町，占地992.58平方米，原系京都大学二次大战后期为中国留学生租用的学生宿舍。1950年，前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用变卖侵华日军从中国大陆掠夺物资所取得的公款购置。1961年，台湾当局“驻日大使馆”以所谓“中华民国”名义办理了该房产的产权登记手续。但该寮一直由光华寮自治委员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财产进行自主管理使用，台湾当局从未参与过该寮的管理工作。

1967年，台湾当局以“驻日大使”的名义，向京都地方法院对居住在光华寮的留日学生于炳寰等8人提出起诉，要求他们退出该寮。诉讼期间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日本政府断绝了同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京都地方法院于1977年9月16

日作出判决，驳回起诉，认定光华寮“从其资金来源和使用目的看，系中国为在日中国留学生继续作为宿舍设施使用而买下来的公有、公共用财产”，既然我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则属于中国之公有之本案财产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已转移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京都地方法院的判决，原告不服，于1977年10月上诉大阪高等法院。1982年4月14日，大阪高等法院以“中华民国”仍是“没有被承认的事实上的政府”，因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实际上不完全继承旧中国政府在外国的财产等为由，撤销原判，将此案发回京都地方法院重审。1986年2月4日，京都地方法院推翻1977年判决，将光华寮改判为台湾当局所有，从而严重损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利益。1987年2月26日，大阪高等法院无视被告提出的上诉，竟维持原审判决。

大阪高等法院维持原审判决的当天，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述卿紧急约见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对日本司法当局对中国国家财产光华寮问题作出的错误判决进行了严正交涉，并提出了中国外交部的照会，指出：大阪高等法院就光华寮问题作出的判决违反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无视国际法准则的非法行为，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中国政府从维护中日友好大局出发，郑重提请日本政府认真严肃对待这一问题，尽快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合法妥善处理，不要因此而影响两国友好关系。

光华寮问题久拖未决，反映了日本国内主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势力仍顽强地活动，另一方面，它也为未来台湾留日活动，为中国人的留日活动设下了一个阴影。

因此可以说，台湾与日本经济往来增加，促进了台湾留日活动的发展，同时它也难免为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岸间的关系发展，为所有中国人的留日活动设置出屏障。

第 三 节

中国大陆留日运动的复苏

1. “文革”前的中国大陆留学运动走向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快就开始了向外派遣留学生的活动，只不过这时期的留学活动出现了“一面倒”的走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派遣留学生工作开始于1950年，首批是派往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5国，学习所在国语言、史地的25名留学生，以及赴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学习工程的10名留学生，他们分别于当年9月与12月赴留学国家。1951年，中国首批派往苏联的留学生共375名（其中包括研究生136名）。1950—1966年，中国先后向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波兰、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蒙古、缅甸、锡兰（现名斯里兰卡）、柬埔寨、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印度、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英国、法国、挪威、芬兰、瑞士、丹麦、加拿大、古巴29个国家派出留学人员10678人。其详情如下：^①

^①《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9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第16页。

时间	派出人数	回国人数
1950年	35	
1951年	380	
1952年	231	
1953年	675	16
1954年	1518	22
1955年	2093	104
1956年	2401	258
1957年	529	347
1958年	415	670
1959年	576	1380
1960年	441	2217
1961年	124	1403
1962年	114	980
1963年	62	426
1964年	650	191
1965年	454	199

以上 10678 人，系为国家教育部派出者。而同时期，还有其他经济业务部门选派的留学生、实习人员，这个时期留学生和实习人员总数约 1.2 万多人。根据当时国内建设的需要，主要是培养造就一批高校教师和科学研究工作者，同时也为工业、农业和业务部门培养高水平的管理专家。

在教育部派出的 10678 人中，8310 人是去苏联留学，约占派出留学生总数的 78%。当时，中国主要是向苏联和东欧国

家派遣留学生，而以苏联为主。“这一点是由于当时国内和国际环境两个方面因素决定的。从国内看，建国之初不得不‘一面倒’的情况下，只能向苏联学习，因此留学生派遣的主要走向也必然是苏联。另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政府援建了我国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为了学习和掌握这些建设项目的技术，我们也要派人去苏联学习，以便使这些重点建设项目尽快上马，发挥效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建设，很自然以学习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为主。向苏联、东欧派遣留学生是由当时所处的国际形势决定的。从当时国际环境看，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对新中国严酷地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封锁和包围，以至发动朝鲜战争，妄图把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根本不可能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当然人民政府也采取各种措施，努力争取大批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工作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回国服务。所以，向苏联派遣留学生是因为受到当时国际因素的制约。同时，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总之，五六十年代的出国留学教育就是在这些背景下进行的。”^①这一时期中国留学活动的走向，完全是受中国政治状况、国际政治形势而制约、控制的。尽管这种趋向性一致的留学走向是当时一种无奈、也是必然的选择，但过分受政治形势所驱使的留学活

^①关键：《中国留学教育史的新篇章——谈谈五六十年代的出国留学》，载留学生丛书编委会编：《中国留学史萃》，第112—113页。

动，必然会表现出一定的缺陷性，其具体反映就是留学生流向过于集中，缺少辐射性与广泛性，留学活动的功能不能全面、完整地实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大陆留学运动的链条上，缺少了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日本的这个环节。及至中国大陆从1966年起发生10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大陆的留学活动一度全面停止，留学活动中断，出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留学活动中令人遗憾的一幕。

2. 中日民间人士呼唤留学活动复苏

留学活动，是留学生派出国教育、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留学生派出国与留学生接受国文化交流的桥梁。从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看，一般的情况下，国与国之间的互派留学生的活动，不可能长时间地断流。1949年后，国际政治格局的构成，中日两国的关系状况，导致中国大陆留学日本活动中断了一个时期。但即使是在中断的时期之内，也并不等于两国间就没有了关于留学活动的呼声和愿望。

1960年7月底，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来中国访问，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陈翰笙就中日两国民间文化交流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决定：一、中国对外文化协会和有关文化团体邀请日本学术代表团、日本文学家代表团、日本电影剧作家代表团、日本漫画家代表团、日本美术家代表团、日本字画家代表团、日本青年文化活动家代表团、日本摄影家代表团以及个别文化界人士来中国访问；邀请日本合唱团来中国演出。日中文

文化交流协会和有关文化团体在适当时机邀请中国文化代表团或艺术表演团到日本进行访问或演出。二、双方互办展览会：在日本举办中国工农画展览会、中国漫画版画展览会、中国儿童画展览会、中国摄影展览会、中国字画展览会；在中国举办日本美术展览会、日本摄影展览会、日本字画展览会。三、有关其他文化、艺术、学术、体育的交流和友好访问，双方将继续进行密切的联系和协商，经双方同意后付诸实施。

1961年6月24日，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常任理事田中稔男、长谷川敏三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来华访问。双方讨论了过去一年来各项文化交流的成绩，协商了今后一年间的文化交流计划。7月2日双方签订了《关于1962年度中日两国人民间文化交流计划的议定书》，规定了各项文化交流计划：一、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和中国各有关团体将分别邀请日中关系团体职员代表团、日本中国友好协会青年和学生代表团、第四次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第五次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日本中国友好协会地方文化代表团、保卫民主主义者及研究者代表团、日本中国友好协会农民代表团访问中国；二、日本中国友好协会同日本各有关团体，根据需要，随时与中国有关人民团体代表协商同意后，邀请中国人民团体的代表访问日本；三、双方将继续交换各项展览会展品、电影和各种文化资料；四、其他有关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今后双方将继续联系和协商，并根据双方的同意，付诸实施。

这一时期，是1949年以来中日两国间文化交流活动有较大发展的时期，这种发展基本还处于民间交往的阶段。在民间交往增多的情况下，1963年8月31日，中国的陈翰笙，朝鲜

的李升基、金锡亨，日本的古屋贞雄、安藤彦太郎等学术界知名人士在北京发表《关于促进学术文化交流的共同声明》。该声明全文如下：

(一)

在亚洲各国中，尤其是中国、朝鲜和日本，有着几千年悠久的文化交流传统，并保持着具有共同特点和世界闻名的文化遗产。

但是，目前，中国、朝鲜和日本之间的正常学术文化交流受到美帝国主义侵略亚洲政策的严重阻挠。

美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疯狂地进行扩充军备和准备侵略战争。在日本，占领了冲绳和小笠原，在日本全国布满了军事基地网，逐步地把日本全土变为核战争基地；十八年来一直占领着南朝鲜，分割了朝鲜，阻挠朝鲜自主的和平统一；并继续占领着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加紧了亚洲的紧张局势。

特别是在最近，美帝国主义为了驱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充当其侵略亚洲的急先锋，正急于促使“日韩会谈”达成协议，企图拼凑侵略性的“东北亚军事联盟”，而且为了推行肯尼迪的所谓“遏制中国”的政策，正在进一步加紧阴谋活动。

日本军国主义在美帝国主义扶植下正在复活，一面协助美帝国主义侵略亚洲，同时也想趁机实现其向外扩张的侵略野心，为此他们正加紧进行日本的核武装，积极为再度侵略南朝鲜开路。美帝国主义和与它

相勾结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就这样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继续采取露骨的敌视政策，并蹂躏日本人民要求同中朝两国建立正常关系和实现自由来往的正当愿望。

(二)

美帝国主义正在远东不断加强其侵略力量，即使在学术文化的领域里，现在也在推行恶毒的阴谋，企图让日本政府破坏中国、朝鲜和日本之间的历史传统。日本政府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追随着美帝国主义，禁止日本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学术文化交流，也大大妨碍了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术文化交流的发展。

美帝国主义还对日本学术文化界施行怀柔政策，企图让他们站在新殖民主义的立场上从事对亚洲的研究工作。为此，美帝国主义给日本学术研究团体提供研究资金，以及使用其他各种狡猾的欺骗手段，对日本学术文化界进行渗透，想把他们置于美帝国主义的影响之下。

美国驻日本大使赖肖尔所策划的上述一系列阴谋活动，就是美帝国主义在日本推行着所谓“赖肖尔路线”的文化侵略政策的表现。

自1960年秋以来，美帝国主义便把日本、南朝鲜和蒋介石的一小撮学者拉拢在一起，而且由同一的美国财团向这三方面提供资金，以求这些研究成果有助其统治远东。这也就是“东北亚军事同盟”的文化

版。

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通过各种阴谋方法和恶毒手段，把腐朽的反动的文化和所谓“美国生活方式”散布到亚洲各地，麻痹人民的健康思想和斗争意志，以确立他们对亚洲的文化统治体制。如今天，在南朝鲜对有良心的学者、文化界和热心追求真理的青年学生强行镇压，故意使学术、文化、艺术等陷入极端的颓废、堕落和社会道德的败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些事实表明，美帝国主义在学术文化的领域里，也是中、朝、日三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在中国、朝鲜、日本之间，人为地制造了现在这样不正常的关系和学术文化交流上的障碍，其原因就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日本政府的反动政策。

(三)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发展中、朝、日三国的学术文化交流，保卫具有共同特点的文化遗产，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创造新的文化，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对美帝国主义展开坚决的斗争。尤其是中、朝、日三国的学者、研究人员、知识界，为了向共同敌人作斗争，达到共同的目的，必须进一步加强团结，结集力量。中、朝、日三国学者、研究人员、知识界，以三国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所建立起来的战斗友谊为基础，紧密合作、共同斗争，这将对于亚洲各民族的独立、和平以及友好运动作出重大的贡

献。

目前，日本的学者、研究人员、知识界为反对美日反动势力的文化侵略，保卫学术的纯洁性而正在顽强地斗争着。这是十分正确的。

过去，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侵略过中国和朝鲜，这不仅妨碍了中国和朝鲜的学术文化的发展，而且也歪曲了日本本身的学术文化。目前在日本学术文化上，旧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方法、观点和态度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肃清。日本有良心的学者、研究人员、知识界深深地反省这一历史事实，并决心不让这种情况重演。

今天，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正在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彻底揭露其假“和平”政策和帝国主义的本质，大力发展科学和民族文化艺术。这项斗争，同日本有远见的学者、研究人员、知识界目前所进行的反对所谓“赖肖尔路线”的斗争，是紧密相关的，是有共同性的。

(四)

为了进一步有效地组织这种共同斗争，今后，中、朝、日三国学者、研究人员、知识界的研究工作，有必要进一步加深相互了解，为共同目标，紧密合作。

学术文化交流应该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在满足各自国家人民的独自的要求的同时，也必须符合对方的利益和要求。

相互交换学术文献，学者、研究人员、知识界的相互自由往来，互派留学生，以及有关同一主题的共同研究等等，是当前三国有关人士应该共同争取实现的课题。

日本同中、朝两国的正常关系未建立以前的过渡时期，三国的学术文化界的合作是十分必要的。应该通过共同的努力，运用一切方法和手段，逐步地创造实现正常交流的条件。特别是日本的学者、研究人员、知识界必须加强团结，必须同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和日本政府的反动政策进行斗争，排除日本同中、朝两国间学术文化交流的障碍，同时，必须和三国人民争取友好、和平的崇高斗争密切结合；为建立健全的学术研究基础而积极努力。

朝鲜人民的千里马运动与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中国贯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精神，对日本都有很大的教益，而且也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同时，中国、朝鲜方面，对日本学者、研究人员和知识界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复杂狡猾的欺骗阴谋，而不受其迷惑，并在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以来，一向积极参加反对美国核潜艇停泊日本和“日韩会谈”等群众斗争的行列，表示敬意并给予支持和鼓励。

中、朝、日三国的学者、研究人员、知识界，为学术文化交流的正常发展所作的努力，为排除各种阻挠所进行的斗争，不仅对本国的学术文化的独立发展

起着很大作用，而且对于人民群众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整个斗争和保卫世界和平，特别是对于保卫亚洲的和平和安全，也将会作出很大的贡献。

我们确信，中、朝、日三国的学术文化界的共同斗争，一定会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一定会取得辉煌的成就。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陈翰笙
教授、工学博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
院士 李升基（金锡亨代签）
教授、历史学博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
社会科学部门委员会委员长 金锡亨
日本朝鲜研究所理事长、日本中国友好协会顾问
古屋贞雄
中国研究所理事日本朝鲜研究所副所长 安藤彦
太郎

1963年8月31日于北京^①

上述声明，这里所以全文引述，不在于它是一个一般的关于文化交流的声明，而在于该声明中明确提出了中日（当然也包括朝鲜）间应互派留学生的问题。在中国大陆留学日本活动停止的时期，该声明至少表明了中日两国民间人士对恢复留学活动的盼望。所谓的民间人士，在中国来说，实际已是代表了官方，这在当时的人们来说也都是理解的。因此说，这个声

^①《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五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43—45页。

明，对于中国大陆的留日活动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它既表明了民间人士的呼声，也透露出了官方的意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该声明可以被看成是中国大陆留日活动复苏的前奏。至于又过10年之后中国大陆留日活动才复苏，只能理解成与中日间官方关系的进展，以及中国“文革”对中外文化交流的迟滞作用有关。

3. 留学日本运动复苏于中日邦交正常化

在中日各界，其中包括留日归国人员多年努力后，中日关系正常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首相、大平正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以及日本政府的有关官员乘坐专机到达北京。当天下午，与中方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廖承志顾问、韩念龙副外长、陆维钊亚洲局长；日本方面有：田中角荣首相、大平正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吉田健三亚洲局长、高岛益郎条约局长。双方强调，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务必要使这次实现邦交正常化。

经双方共同努力，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中日之间存在的战争状态与战争赔偿、日本侵华战争的责任、台湾地位三个关键性问题，取得了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在一些难点逐一解决和双方对联合声明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后，毛泽东主席27日接见了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和二阶堂官房长官。周总理、姬外长和廖承志顾问陪见。28日，周总理和田中首相举行了第四次会谈，最后确定了联合声明的条文。周总理亲笔写了“言必

信，行必果”，赠给了田中首相，田中首相也亲笔写了“信为万事之本”，回赠给周总理，两国领导人表达了恪守信义的决心。

29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中日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周总理和姬外长，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了字。签字仪式后，大平外相和二阶堂官房长官在设于民族文化宫内的新闻中心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日中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从今天起宣告结束。

中日《联合声明》的发表和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两国关系的新的一页，结束了中日两国半个多世纪的不正常关系，确定了发展两国关系的一系列基本原则。邦交正常化后，中日友好往来出现了“官民并举，相辅相成”的新局面。两国政府和民间的交往与日俱增。

中日建交后，两国政府部门达成关于建设海底电缆的协议。之后，两国政府又在1974年1月签署了中日政府间的贸易协定。中日两国政府还签订了海运协定、渔业协定、航空协定。两国间的一系列协定，把中日政府和民间的往来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与这诸多往来同时出现的，还有中国人留日活动的再现。

历经数十年后，中国大陆留日活动再现，其主要赖于中日政府联合声明，赖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因此说，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也揭开了中国大陆留日活动新的一页。

4. 鲜为人知的第一批中国大陆留日学生

提起70年代末期中国大陆兴起的新时期留学活动，人们

知道，1978年，邓小平正式提出扩大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的意见，随后中国开始增多向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增派留学生，至于向日本正式派遣留学生，则始于1979年。就是说，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人留日活动略晚于留学其他国家的活动。这样说，没有错。人们提起这一段历史时，往往都将1979年的留日活动说成是“正式派遣”。这就掩盖了实际情况的另一面，即在1979年“正式派遣”之前的好多年，中国已开始了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人们常常认为70年代中国大陆留日活动产生于1979年，这正说明了在此之前的留日活动是“鲜为人知”的。

1972年9月，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两国间各方面交流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活动即行展开。派遣活动始于1972年。从1972年到1976年间，中国政府每年派遣数名留学生到日本学习日语。1977年，还派遣了7名理工、农专业的学生到东京大学大学院进修^①。关于这一时期中国留日学生的人数，李东翔有一个说法。1992年，李东翔在任中国国家教委留学生司副司长期间，“作为从事中日留学生交流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的他说：“1978年，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只有23人。”^②李东翔的说法应该是准确的。

尽管这一时期中国留日学生的生活鲜为人知，但我们还是可以寻觅到他们的踪迹。比如他们在创价大学的生活。

^①《学好本领为国显身手》，《人民日报》（海外版）1996年4月24日。

^②《一衣带水 和睦万邦——纪念中日关系20周年座谈会纪要》，《光明日报》1992年9月5日。

日本创价学会作为信奉佛教日莲正宗的新兴宗教团体，有着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成立已有数十年的历史，会员多时达1000多万人，青年会员约占日本青年的四分之一。创价学会所支持的公明党在日本政界中占有重要地位。孙平化回忆说：“据我所知，这支社会力量早在60年代初，就受到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重视。记得有一次我从日本访问回来，廖公领我去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办公室直接向总理汇报。在我的汇报中，有两件事引起了周总理的注意。一个是日本陆上架桥、建高速公路、解决现代化城市交通拥挤的经验；另一个就是创价学会的日趋活跃和力量的不断增强。周总理要我们有机会同创价学会进行接触。高碓达之助也向我们提出过类似的建议。后来，赵朴初访日时同创价学会的干部进行过接触；我有一次访日，经作家有吉佐和子介绍，也同创价学会干部一起吃过饭。但这都只不过是初步的接触，还没有建立正式关系。中日恢复邦交之后，经过公明党委员长竹人义胜的介绍，才于1974年实现了池田大作访华。”^①

创价大学是1971年4月2日由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先生创办的新型私立文科大学。教学主楼前的《建学碑》上，镌刻着池田大作先生亲笔题写的三句办学宗旨：“应是教育人的最高学府，应是建设新文化的摇篮，应是保卫人类和平的要塞。”

1974年五六月间，池田大作首次来华访问。回国后热情撰文介绍中国和宣传日中友好，强调要在日中之间架设友好的

^①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120页。

金桥。以这次访问为开端，中日友好协会和日本创价学会之间架起了友好的桥梁，双方的交流越来越广泛、频繁、密切。1974年12月，池田大作先生第二次访华，曾会见了病中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说：“我是在50多年前，于樱花盛开的时节由日本回国的。”池田大作先生动情地说：“希望周总理在樱花盛开时再次访问日本。”对这次会见，孙平化也有所回忆：“周总理晚年患病住院后会见外宾就比较少了，池田大作是周总理生前最后会见的很少几位日本外宾之一。我有幸参加陪见的最后两次就是会见池田大作和保利茂（记得后来见过稻山嘉宽和藤山爱一郎，不久周总理就去世了）。那是1974年12月，池田大作应北京大学邀请第二次访问北京的时候。池田大作知道周总理青年时代留学日本，很喜爱日本的樱花，他热情邀请周总理在樱花盛开的季节重访日本。周总理表示谢意，并说，愿望是有的，只怕身体由不得自己了。池田大作祝愿周总理保重身体、健康长寿。”^①

为了纪念这次不平凡的会见并祝愿周总理早日恢复健康，也为了迎接来创大学习的首批中国留学生，1975年11月5日，高松和男校长和6名中国留学生，在创大校园“文学之池”的小湖畔，一起挥锹植下一棵命名为“周恩来樱”的樱花树。1979年4月7日，中国青年联访日代表团一行访问创大时，又在樱花盛开的“周恩来樱”旁植下一棵命名为“邓颖超樱”的樱花树。^②

^①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第121页。

^②见宁新：《留日三幸》，载田恒 唐景芸编：《留日归来忆扶桑》，第120页。

这一时期的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少，活动少，影响小，但他们却为数年之后中国人的留日运动奠定了基础。

中国学生留日的 1972 年，不仅是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一年，同时，它还是影响中国许久的“文革”正进行的年代，它也还是中国人留学其他国家很少的年代，这个时刻中国新的留日运动发轫，不仅对留日运动本身来说值得纪念，就是对中国人的全部留学活动来说，意义也十分重要。

第五篇

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
的重振和热潮
(1977—1996)

第一章

留学日本运动进入新时期 (1977—1986)

第一节

赴日留学运动的历史性转折

1. 邓小平提出扩大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的意见

1976年，中国历时10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经济、科技、文化事业开始逐步走向正轨，选派留学生工作也从此出现转机。

选派留学生工作，首先是由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来的。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开始关注中国的科技、教育以及人才培养的问题，他在各种场合多次提起，由此推动了中国教育事

业开始走上正轨，也为出国留学开大国门做了重要的准备。

1977年5月，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领导同志谈话中指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上去，抓科技的同时必须抓教育。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还特意提到日本为教育进行了大量投入。邓小平还指出办教育要注意提高。他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科技人员美国有一百二十万，苏联九十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①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在开幕式上，再次重申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还提出了进行国际交流的问题。他说：“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

^①《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7页。

然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我们要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加强同世界各国科学界的友好往来和合作关系。对于一切在科学技术上帮助过我们的国际朋友，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①邓小平还特别强调，在人才问题上，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

邓小平在强调科技、强调教育的同时，还酝酿派人出国留学的计划，并不失时机地给予指示。

1977年8月8日，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发言，发言中他讲了关于对十七年的估计问题，关于调动积极性问题，关于体制和机构问题，关于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问题，关于后勤工作问题。在这次发言中，邓小平明确提出了留学的问题，他说：“外交部反映，有一批华裔学者要求回国。周恩来同志过去就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们要创造条件，盖些房子，做好安置他们回国的准备工作。他们回国总要有个家，总要有必要的工作条件吧！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我们还要请外国著名学

^①《邓小平文选》，第92页。

者来我国讲学。同中国友好的学者中著名的学者多得很，请人家来讲学，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为什么不干？”^①

邓小平在上述讲话中提到“留学”，虽然是在“关于后勤工作问题”中提出的，虽然所提话语不多，但这毕竟透出了一个信号，表明邓小平已把大规模派人出国留学列入了治理国家的宏伟计划中。

1978年6月，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工作汇报时明确提出，要扩大向国外派遣留学人员，并定出当年就要向国外选派3000名留学人员的具体目标。邓小平同时还设想，在一段时间内，中国派人出国留学的规模应该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上。

邓小平作为中国社会的掌舵人，提出扩大派出留学人员的意见，无异于是在表明，中国已把出国留学作为国策确定了下来。而后，中国社会的出国潮开始涌动，以至于汇入的人员愈来愈多，成了21世纪来临前中国社会的一大景观，也与世界范围内的出国留学潮并驾齐驱、交相辉映，为中国步入21世纪做出了一个重要的选择。

需要说明的是，70年代末期中国重开留学的大门的步子是一点点迈的，因为这时中国还有很多困难，尤其是经费，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国家还有困难，有些实际问题一下子还解决不了。”^②

2. 中国政府制定新的留学政策

邓小平明确发表扩大留学生人数的谈话后，国家计委、财

^{①②}《邓小平文选》，第54页。

政部和教育部等部门迅速落实邓小平的指示，当年就派著名科学家周培源等率团赴美国进行考察，与美国政府当局、教育单位和科研机构具体磋商，签订协议。许多著名外籍华人教授和外国科学家也纷纷出主意、想办法，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地位帮助打开渠道，动员一些大学和科研单位接受出国留学人员前去深造。

1978年8月4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增选出国留学生的通知》，指出这次主要是增选学习理、工科（包括农、医）有关专业的人员，出国留学人员的来源为：“出国留学的大学生拟从今年高考考生及高等院校一年级学生中选拔。进修生，则从高等学校教师、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以及科技管理干部、企事业的科技人员中选拔。”选拔的办法是，首先由各单位按照选拔条件进行初选，初选合格人员必须参加全国外语统考，然后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委（局）和省、市、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初选合格人员的政治条件、专业水平、外语统考成绩，作综合比较，全面复审，并签署意见。最后，教育部从参加全国外语统考的13383人中择优录取了出国预备人员3348人，其中出国进修人员、访问学者2456人，出国研究生367人，出国大学本科生525人^①。

《关于增选出国留学生的通知》，是这一时期中国有关留学的第一个重要文件。

1978年8月21日至9月7日，在教育部、国家科委、财

^①《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第667页。

政部和外交部的积极筹划下，四部、委在北京联合召开了部分驻外使馆文化参赞会议，落实扩大派遣留学人员的方案和留学人员管理工作。会议指出，派出人员的质量要有保证，不能滥竽充数，如有可能，还要力争多派。会议还指出，具体办理派出时，步子要稳，成熟一批，派出一批。

1978年，也就是邓小平提出增派留学生的同一年，中国派出留学生人数骤然增加。这一年教育部共向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派出留学生860人，而上一年派出的仅为220人，增加了近3倍^①。

第一批留学生启程前，邓小平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这批在新的留学生政策确定后即将负笈海外的学子，教导他们莫负国家和人民的重托，学出成绩，报效祖国。接见之后邓小平还与他们合影留念。

中国新的留学生政策确立之后，首先是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增派了留学生，随后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工作也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与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进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早在1972年9月，中日两国政府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结束战争状态，随后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但从立法程序说，声明和协定代替不了条约。早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周恩来总理就对日本朋友说，中日双方要缔结的和平友好条约，不是单纯宣布战争状态结束，而主要是在于使中日

^①《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90），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6页。

两国世代友好下去。

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双方“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根据这一精神，中日政府从70年代中期以后展开了签约的谈判，其间历经数年，出现了一次次波折起伏，在日本也经过了田中、三木、福田三届内阁。

1978年8月11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草案在北京举行的事务级谈判起草小组委员会会议上最后拟定。次日，中国外长黄华和日本外相园田直分别代表本国政府正式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条约第三条中约定：“缔约双方将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

10月22日至29日，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为参加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仪式，访问日本，陪同访问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和外交部长黄华等人。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在东京隆重举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为中日文化交流，为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应该注意的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正是邓小平正式提出增派留学生意见后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在互换批准条约仪式上，邓小平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继续和发展。它为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更加牢固的基础，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交流开辟了更加广阔

的前景。”^①

日本福田首相在换约仪式上也说：“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两千多年来不断进行紧密接触和交流的日中关系开辟了新的历史。这次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给日中两国关系增添了更加光辉灿烂的一页。”^②

随后，邓小平于当天下午在东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进一步阐明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发展前景，其中包括派遣留学生事宜。他说：条约的签订“为进一步加强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的交流，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和生效，今后两国人民的合作理所当然地要加强。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合作都要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包括派留学生、参观、访问等，民间的要增加，政府间的接触也要增加。这些方面，当然不需要一种固定的形式。这一点，我们同福田首相会谈时有共同的想法^③。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两国就派遣留学生问题达成了协议。1979年4月9日至19日，邓颖超副委员长率领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日本，在东京记者招待会上，她高度称赞了中日两国签订交换留学生的协议，她说：“中日两国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以后，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又有了发展。各种友好交往成倍增加。年初邓小平副总理访美途经日本，又一次受到了日本政府和人民

^{①②}张暄：《当代中日关系四十年》，时事出版社1993年，第392页。

^③同上，第395页。

的热烈欢迎。最近两国的首都北京和东京结成了友好城市，为首都人民的友好合作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5月份廖承志同志将乘坐中国第一艘友好之船访问贵国各地。我们热烈地期待着欢迎大平首相尽早访华。华国锋总理也已决定应邀访日。两国政府还就交换留学生达成了协议，并且正在酝酿签订科技和文化协定，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多么美好的前景！”^①

同年12月5日至9日，日本总理大臣大平正芳访问中国，日本外务大臣等也随同来访，中日两国政府12月6日在北京签订文化交流协定。文化部部长黄镇和日本外务大臣大来佐武郎代表本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促进文化交流的协定》上签了字。

这项协定是根据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有关条款签订的。协定规定，两国政府以下列方式进行合作：

（一）进行学者、教师、学生、艺术家、运动员和其他从事文化、教育以及学术活动的人士的交流；

（二）对在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以及研究机构从事学习和研究工作的另一方国家公民，提供奖学金和其他方便；

（三）组织学者和研究人员共同进行学术研究和学术调查；

（四）举办报告会、戏剧演出、音乐会、电影会、美术展览会和其他文化活动；

（五）交换书籍、期刊和其他出版物以及学术研究资料；

（六）交换胶片、唱片、磁带和其他视听材料。

两国政府促进两国各种团体以及个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并

^①张暄编著：《当代中日关系四十年》，第402页。

使之顺利进行。

协定指出，两国政府注意到两国间文化方面的历史关系，确信发展两国间文化、教育、学术和体育交流，有助于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中日文化交流协定的签订，为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政策的实施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使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工作水到渠成。从1979年起，中日两国正式互派留学生^①。自此，中国政府多年停止正式派遣留学生去日本的情况得到了彻底改变。此前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只有港、澳、台的中国人及海外华侨。因此说，1979年在中国人留日运动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开创了中国留日运动的新纪元。

3. 新时期留日运动的先声

1979年留日运动再兴后，最初的几年中，这场运动基本呈现了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学习自然科学的人数多。

1979年和1980年，教育部等部门两次召开留学生工作会议，都强调了要多派出学习自然科学的留学生。

教育部、国务院科技干部局于1979年12月20—29日，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出国留学人员工作会议。会议指出，今后选派出国留学人员的方针是：在确实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根据国家的需要和可能，要广开渠道，力争多派。在选派工作中，必须

^①杨孝臣：《中日关系史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27页。

坚持以培养高等教育师资为主、以自然科学为主、以技术科学为主的原则，兼顾其他方面的需要。并应以选拔进修人员和研究生为主。会议还讨论安排了以后两年的选派计划。

教育部、外交部、国务院科技干部局、财政部、文化部、中国科学院于1980年10月28日至11月8日，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出国留学人员管理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是部分驻外使、领馆，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部分省、市、自治区和高等学校的代表150余人。会后，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出国留学人员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认为，从1978年中央提出扩大派出留学人员方针以来的留学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打开了局面，积累了经验。

在这次会议上修订了有关留学人员管理工作的规章、制度，提出了关于计划、选派工作的改进意见。会议认为，为了更好地贯彻中央关于派出留学人员的方针，必须努力做到：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争取多派一些，并在最近几年内保持派出数量相对稳定。派出留学人员仍应以自然科学各专业为主，适当增加管理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名额。自然科学领域不应忽视基础科学，但应以技术科学为主，工程技术和管理方面应该多派。派出人员应从目前以进修人员、研究生为主，逐步做到以研究生为主；今后几年选派留学人员应以培养高等学校师资为主（不应少于派出总人数的60%），并兼顾其他方面的需要。

另外，1980年5月28日，中日两国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决定采取下列形式进行合作交流：（1）派遣和接受科学家和技术人员；（2）举办两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参加的讨论会、研究

会等；(3) 进行共同研究；(4) 交换有关科学技术情报；(5) 两国政府同意的其他合作形式。协议指出，两国政府尽可能支持和促进两国各种团体、机构和个人之间的科技合作，设立由两国政府代表组成的中日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委员会轮流在中国和日本会晤。^①

中日科技合作协定签订后，两国间的科技交流（包括派员留学）异常活跃。这种交流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两国政府间进行。中日双方通过定期的科技合作委员会，逐步确定合作领域和具体项目。如中国国家经委和日本通产省、农牧渔业部和农林水产省、铁道部和运输省、气象局和气象厅、交通部和邮政省、卫生部和厚生省、建材总局和通产省、教育部和文部省等政府对口部门建立了人员交流关系，两国的友好城市之间也进行地方性的科技合作。二是通过日本政府外围组织、民间科技团体、学会团体进行交流。如中国科学院和日本学术振兴会以及理化研究所，中日国立大学之间，铁道部与日本铁路公团，煤炭部和日本新能源综合开发机构等进行交流，其中中国科学院同日本 14 个官方和民间团体建立了向日本派遣进修生和留学生的联系。再如，到 1984 年底，中国已有 60 所高等院校与日本 50 多所高等院校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日本社会也相应地成立了日中科技交流协会、日中建筑技术交流协会、日中农林水产交流协会、日中医学协会等团体。三是通过贸易团体、企业进行交流。如中国科学交流中心同日本三菱、三井、住友、三和、日立、索尼、日本电气、富士通等大企业和

^①《人民日报》1980 年 5 月 29 日。

企业集团分别签订了科技交流协议。

从留学生的人数来看，也可以看出学习自然科学的留学生较多。

1979年，中国向五大洲32个国家派出留学人员1750人；其中，进修人员、访问学者1298人，出国研究生117人，大学本科335人。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1445人，占82.6%；学习和研究外国语言的282人，占16.1%；学习和研究社会科学的23人，占1.3%。

1980年，派出留学人员2124人；其中，进修人员、访问学者1635人，出国研究生260人，大学本科229人。他们当中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1895人，占89.2%；学习和研究社会科学的64人，占3%；学习和研究外国语言的165人，占7.8%。

1981年，派出留学人员2922人；其中，进修人员、访问学者3049人，出国研究生212人，大学本科155人。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3076人，占90%；学习和研究社会科学的186人，占5.4%；学习和研究外国语言的154人，占4.6%。

以上所列的虽然是派往各个国家所有留学生的统计数字，但日本的情况大同小异，同样也是学习自然科学的留学生多。

第二，文化层次较高的留学生多。

留学运动重兴之初，由于留学生多由国家统一派遣，故留学者文化层次普遍较高。

自1978年9月底至1981年底，中国向五大洲50多个国家派出留学人员共10356人；其中，教育部派出的留学人员7456，其他部门和地方自行派出的留学人员2900人。

教育部派出的7456人中，进修人员、访问学者5946人，占79.8%；出国研究生642人，占8.6%；大学本科生868人，占11.6%。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6039人，占81%；学习和研究社会科学的267人，占3.6%；学习和研究外国语言的1150人，占15.4%。留学人员学成回国的有2000余人，其中1981年回国的1143人。他们当中已在国外获得博士、硕士学位的有101人，其中博士学位62人，硕士学位39人。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一是派出人员素质普遍高，二是学成归国者取得了博士、硕士学位的较多。

为保证派出的留学生有较高的素质，中国还实行了留学人员国内预备期制度。

1979—1981年共有5222名出国留学人员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的外语培训。其中，英语2528人，日语998人，德语805人，法语691人，塞尔维亚语100人，意大利语60人，西班牙语40人。另外，约有2000余人参加了国务院有关主管部、委和地方组织的外语培训。1981年，教育部为使录取的出国预备研究生在出国前具备一定的实际工作和独立工作能力，能较快适应国外的学习、工作条件，以期取得较好的学习效果，除根据有关协议必须按期派赴国外学习者外，其余出国预备研究生，分别到全国71所高等学校和研究所报到。自报到之日起，试行1—2年国内预备期制度。

对中国人学习日本语，日本方面也积极地给予了支持。大平正芳首相曾表示：“为促进中国的日语学习，1980年以后要

用具体的形式来帮助”^①。日本方面所采取的帮助形式之一，是每年由中国选拔 100 名日语教师集中在北京外语学院，由日本专家访华进行为期一年的日语特别训练，其中利用一个月，由日本政府招待，全体学员赴日本参观学习。这种特别培训被人称为“大平班”。

第三，公费赴日的留学生多。

1979 年，中国公派赴日留学生为 140 人，从 1980 年起每年数百人。1981 年达到 830 人，1982 年 9 月达到 960 人。但是同期，留日自费生的人数则相对少，比如 1981 年，留日自费生仅有 121 人，比同年公费生少 709 人，公费生几乎是自费生的 7 倍。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自费生人数虽然初期较少，但是发展势头却很快。1981 年时仅为 121 人，1983 年时一跃为 1098 人^②，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 1982 年 9 月时的公费生人数，两年时间增长了 8 倍多。

但不论是公费生还是自费生，自留日运动重兴之后，每年增加人数愈来愈多，这是这场运动的总体态势。

留日人员就其身份来讲，大致有以下几类：高等专门学校留学生、本科生、研究生、进修生、访问学者。他们绝大多数在学校，少数在国公立研究所、公司、企业和农场，遍布日本各地。

^①白根滋郎著、方桂芝译：《战后日中贸易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第 200 页。

^②国家教育委员会出国人员北京集训部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北京咨询处编：《出国留学便览》，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0 年，第 115 页。

留日运动重开之际，一次不属留学活动的活动，却起到了推动留日运动的作用，那就是周恩来诗碑在日本揭幕。为纪念中日友好条约签订，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京都总局长吉村孙三郎决定建立周恩来诗碑，他的倡议于1978年9月取得了国际贸促会京都总局会员总会的赞成及各有关方面的理解，并得到了与邓小平副总理一同在京都访问的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的支持。1979年1月，以京都友好团体为中心设立了诗碑建立委员会。4月，邓颖超访日期间，举行了诗碑揭幕式。孙平化在1986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中日友好随想录》中详细地记述了诗碑揭幕前后的经过。书中记述到：

1979年4月8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应日本众、参两院议长的邀请，率人大代表团访问日本。邓大姐既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又是日本朋友衷心爱戴与尊敬的周总理的夫人，所以日本朝野上下以欢迎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双重心情来迎接她的到来。

周总理生前在会见日本外宾时曾不止一次地谈到他1919年在日本的情景和印象。当时周总理年仅21岁，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东渡日本，足迹遍及东京、京都等地，岚山遍开的樱花、琵琶湖的碧波美景都在周总理的脑海里刻下了很深的印象。时隔半个多世纪，还保留着许多美好的回忆。周总理还曾表示希望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以后第一个樱花盛开的春天再去日本看看。日本朋友也一直衷心盼望和邀请周总理如愿以偿地重访日本。但十分不幸，这一愿望终于

未能实现。为弥补这一永生的憾事，周总理逝世后，日本朋友纷纷提出邀请邓大姐访问日本，他们要隆重而热烈地欢迎。选择什么时候去好呢？我们和日本朋友几乎完全想到了一起，大家一致意见是开樱花季节去。原因之一是樱花盛开的季节是日本一年四季中最美好的时候，风光明媚，气候宜人；其二，周总理生前很喜欢樱花，总理年轻时在日本就写下三首有关樱花的诗词。访问路线的安排也选择周总理曾经去过的地方，沿着他当年的足迹，先访问东京、箱根，然后京都、岚山、琵琶湖，最后从大阪启程回国。最大的难题是，双方要商定哪天由北京出发，到日本才能看到樱花盛开的绝景。……随同邓大姐访问日本的副团长是人大常委会委员罗青长、林丽楹，团员中有著名人士赵朴初、胡立教、陈毅元帅的儿子陈昊苏、著名电影导演谢铁骊、越剧演员袁雪芬等，他们都是人大代表。另外有一个工作班子，我是秘书长。邓大姐德高望重，博得日本朋友的尊敬，受到国宾规格的接待。代表团一行下榻的宾馆是日本政府的迎宾馆，只有国家元首和贵宾才安排住在这里。这座迎宾馆最早是皇室的一所离宫，以后改作政府的迎宾馆。1972年重新改建时田中首相曾表示，邀请周总理作为第一位客人来此下榻。改建落成后，时隔几年邓大姐来此下榻，也算是兑现了田中前首相的诺言。大平首相在官邸会见邓大姐及代表团一行时还谈起这段往事。……邓大姐到达日本的时候，东京樱花的盛开期已

过。“樱花前线”向北推移。但我们到箱根时，箱根山上正是樱花烂漫的最佳时期。……4月16日，邓大姐来到京都风景秀丽的岚山，参加周总理诗碑揭幕式。说起建碑的历程也是十分动人的。要深深感谢当时95岁、现已逾百岁的矍铄老人吉村孙三郎办了一件永世流芳的大好事。这位同中国人民有着深厚感情的老朋友为了留下一个永久性纪念物以缅怀周总理，亲自发起，四处奔走，交涉用地，在京都府、京都市当局及各界日本朋友的支持下，选择在周总理留下足迹的岚山建立一座纪念碑，并精心筹划，要赶上邓大姐访问京都时落成揭幕。碑上镌刻总理写的诗篇，以便把周总理为中日友好事业作出的丰功伟绩传之后代，永志不忘。日本朋友经过精心考虑和设计安排，选择京都特产鞍马石来作碑石。这种石头质地坚硬、经久不蚀，表面经过大自然的锤炼呈赤褐色，内部却是青蓝色，雕成石碑，可延年千载，清晰不变。吉村老人特请廖承志会长书写了周总理留学日本时作的诗词——《雨中岚山》全文，由两位技术娴熟的老石匠精雕细刻在石碑上，在岚山山麓树立了石碑，成为岚山名胜中象征中日友好的胜地。

揭幕前的晚上细雨蒙蒙，一直不停，人们担心白天也将是个阴雨天气。但是天公作美，随着揭幕典礼的进行，细雨停了，阳光放射出耀眼的光辉。真是难得的历史性巧合，就像《雨中岚山》诗中所写的情景一模一样：“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娇妍。”邓大姐在

讲话中离开讲稿，即席插话说：“刚才太阳出来了，照耀着我们，它象征着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友好的无限光明。”娇妍的阳光映射在周总理诗碑上，邓大姐的话说到了每个人的心坎上。

揭幕结束后，主客 300 多人在诗碑东侧岚亭饭店院内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新制作座”剧团在团长真山美保率领下赶来为大家演唱助兴。她们身着节日盛装，满怀深情地歌唱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我们无限怀念您……”，还唱了周总理生前喜爱的歌曲：“洪湖水，浪打浪”。

诗碑落成的次年 4 月，余秋里副总理访日，日本方面还举行了诗碑落成一周周年庆祝会。周恩来诗碑，成了中国留日运动的诗碑，成了中日友好的诗碑。

4. 从“留美热”、“留澳热”到“留日热”

探讨 70 年代末、80 年代的留日运动，如果从它最初的产生看，可以肯定地说，是由于中国实施了新的留学政策；如果再进一步看它的发展，比如这场运动为什么会发展得那么快，声势会那么大，投入的人数会那么多，显然仅用一个留学政策问题是远远解释不了的。要理解这场运动的发展，必须将其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必须将其置于同一时期的整个留学运动中，这样，才会更清晰地看清一些这场运动发展的动因及发展的特征，从而更深切地理解这场运动。

1978 年邓小平提出增派留学生的意见，而后教育部下发

了增加选派留学生的通知。同一年，教育部派遣留学生人数骤然增多，达到 860 人，是上一年 220 人的 3.9 倍，增加了 640 人，其政策效果极为明显。但是，这一年所选派的留学生，都是往美国等回家，独没有日本。因此说，中国制定新的留学政策之初，留学日本的活动就慢了半拍。中国政府正式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是新的留学政策确定后的第二年，即 1979 年。

再从留学运动的发展上看，“留日热”的兴起也在“留美热”、“留澳热”出现之后，同样是慢了半拍，并且“留日热”所以能够出现，与“留美热”、“留澳热”的发展进程有着一定的联系。

为了理解它们之间的这种联系，有必要对“留美热”、“留澳热”的产生与发展作一概述。

出国留学热是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正常现象，就像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一样顺理成章，只要条件具备，这种流动便会形成。中国政府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伊始，便预示了留学热将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重要的组成部分。

1981 年底，在国外的教育部公派留学人员共有 8151 人，其中美国为 3726 人，占总人数的 45.7% 强；另外的 4425 人，分布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英国、法国、加拿大等 40 余个国家，其中人数居第二位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 856 人，比美国少 2870 人，仅是美国的 23% 还不到；人数较多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英国、法国、加拿大五国，合计为 3012 人，比美国还少 714 人，为美国的 80.8%。再如日本的人数为 830 人，其人数虽居第三位，还是比美国少 2896 人，为

美国的 22.3%。

以上数字虽为教育部公派人数，但由于这一时期自费生人数不是很多，不像后来那样自费生呈现出了后来居上之势，因此可以说，这一组数字完全可以表明这一时期留学生国别分布态势。这种态势，表明了留美的中国人数占有了绝对的优势。

国家大量派遣公费生赴美，是因为美国有居世界第一的科技优势；再后的大量自费生赴美，除了美国有科技优势外，还因为那里有优裕、舒适的生活条件，有容易取得的奖学金，甚至还有“绿卡”。

1981年12月，中国举办第一届托福考试，以后考点不断增多，到1985年已兴起“留美热”，当时进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已有3万多人，还有1万多人在等待签证。

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主要有下列渠道：

1. 中国政府派遣留学人员

(1) 国家教委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每年按计划派遣一定数量的人员赴美公费留学。

(2) 根据两国政府间的文化交流协定互派交流奖学金生。

(3) 国外一些基金会团体组织、知名教授、学者和爱国人士提供资助，由国家教委选拔符合条件的人员，统一派出。

2. 单位公派的留学人员

(1) 中国在国内或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学术上有较深造诣的学者、教授，应对方学校、科研单位邀请，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研究的，其在美期间的费用一般由对方支付。

(2) 个人根据单位人才需要，经组织同意后对外联系，获取了美国校方的奖、助学金，以学生身份赴美学习。

(3) 属于校际交流项目、或科研单位与科研单位间交流项目的公派留学人员。这部分人当中大部分是以进修或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学习或研究。

(4) 单位自筹资金，根据本单位的科研题目和人才需要，由单位选拔经所属部委批准派出的。

3. 自费留学

自费留学人员是通过定居在国外的亲友资助，或是获取了美方提供的奖、助学金，或是使用个人的外汇存款，持因私普通护照在美学习或进修的。

“留美热”的场面是壮观的。学英语书籍被列入了畅销书行列，形形色色的英语补习班应运而生，有新概念英语班、许国璋英语班、高级口语班、基础英语班、出国留学人员英语训练班、《美国之音》中级美国英语班等等，名目繁多，数量庞大。

赴美留学最热之时，也是赴美签证最难之时。有移民倾向的，没有确切经济担保的，不出示美元存款证明的，入境动机不明的，甚至莫名其妙的什么缘由，都难以得到签证。为搭载人们所说的“最末一班车”，为美国的紧缩政策所动，中学生中考托福之风也刮了起来，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大城市，部分重点中学的优秀生，放弃大学考试，报名参加托福考试。据报道，上海市10所重点中学仅1990年一年出国的学生就有96人，一些在全国或上海市物理、数学、外语比赛获第一名的学生，也放弃重点高校免试入学的待遇，而选择了出国。

“留美热”受挫、但仍在延续之际，留澳的人数在悄悄增加。1986年下半年，中国人对澳洲的向往达到了最高峰。因

为有传言云：只要交纳一笔报名费，不论英语成绩如何，也无须经济担保，便可到澳大利亚各大学、院校学习。

传言虽不属实，但赴澳大利亚留学毕竟比赴美留学容易些，一时间赴澳风起，“留澳热”也达到了高潮。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内，申请签证的留学生人数突然激增，迫使签证处从澳大利亚请来临时工加班，申请表格供不应求，不得不赶去香港加印。

赴澳的道路也不平坦。澳大利亚的政策不久即收缩，其费用也不比美国少多少，很多人钱花出去了，签证办不下来，交的款难以收回。“一位34岁的男子至今不想结婚，整天忙着练气功。他也是5年前开始准备出国的，指望练好气功出去以后混饭吃。他没有海外关系，没有学历，也没有外汇，他只有气功测病和推拿的本领。从1986年开始，国内掀起一股去澳大利亚热，行情在800美元左右。他倾其所有，以4000多元人民币换得500美元。为凑齐其余款项，他一改用气功看病不取分文的做法，开始收费行医，最高的一位被他治愈的偏瘫病人，一次付给他1000元报酬。他又变卖了家中祖传的红木大橱、红木方桌，800美元终于近在咫尺。不料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也感到了某种恐慌，澳驻华使领馆的官员频频向中国青年说明赴澳之难，并宣布一项新规定：赴澳前必须先交第一学期的学费和一年的生活费共8000美元。按照外币兑换的黑市价，这位气功师至少还要再准备60000多元人民币！”^①

留美、留澳余热未退之际，人们转而将目光转向了日本，

^①陈颂：《出国·出国》，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页。

并很快出现了“留日热”。

探究由“留美热”到“留澳热”的衍变过程，便不难发现，无论是留美还是留澳本身，或是这一过程的转变，实际上都存在着共性的东西，即外语水平要求高、费用高、签证难办，正是这种共性的存在，先是阻碍了人们留美，继而又阻碍了人们留澳，并且导致了人们由关注留美转向关注留澳。

那么人们由关注留澳转向关注留日，除一些其他因素外，同样有外语、签证、费用问题在起作用。因为在这几个方面，日本较之美国、澳大利亚都显然容易一些。于是，“留日热”便很快兴了起来。

所以说，中国社会由“留美热”、“留澳热”转变到“留日热”，是由各种实际情况决定的顺理成章的转变。

第 二 节

留学生在日本的初步体验

1. 通过留学类书籍了解日本

留日人员在出国前学习日语，是普遍的现象。公派留学者自不消说，他们一般原都有程度不同的日语基础，况且相当一部分人在出国前还会接受集中培训，就是自费生，他们也有各种不同的日语书籍可供选用学习。有人统计，1988年4月25日，北京王府井外文工具书店首次出售《生活日语》^①及配套的磁带，一种是上海出的9盘40、50元一套，一种是北京

^①该书为日本文化厅编，实用性比较强。

出的6盘31元一套，一个上午就卖掉了20余套。

留日运动兴起后，各种日语语言教材类书籍大量出版，数不胜数，有的直接以“留学”类字眼来冠名，如《留学生用精读现代日语》（北京出版社1985年出版，日本早稻田大学语言教育研究所编）。引人注意的是，在大量的语言书籍中，出现了一些实用性较强的书籍，学习此类书不仅可以学习语言，还可同时从各个方面了解日本社会，这对留学生更有益处。如《服务日语情景会话》（大连出版社1988年出版，石原正宣、宋继庆编著）、《日文书信大全》（北京出版社1985年出版，吴美瑛、卞铁坚、张生林编著）等。后一种书，内分社交书信与外贸书信两种内容，社交书信中再分为问候信、贺年片和贺年信、慰问信、贺信、通知信、感谢信、介绍信和推荐信、询问信和请托信、邀请信、社交电报及便条、条据、凭证文书等，内有注释、译文，极为实用。

留日学生在出国前了解日本社会，可依赖的渠道很多，可以口口相传，可以阅读已经大量出版的日本历史、游记、风俗介绍等方面的书籍。

对留日学生来说，最具有实用价值的，还是出国咨询一类的书。留日运动之初，咨询一类的专门书籍尚少，在日本驻华使领馆门前有人兜售私自翻译、油印的介绍性材料。咨询性书籍最初出版时，出版社方面搞得小心翼翼，如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过《国外接受留学人员单位简介》上下两册，还谨慎地标上了“内部发行”的字样。

《出国留学指南》（国家教育委员会出国留学咨询中心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5年出版），是出版较早、较权威的一

本咨询性专门书籍。该书 16 开，296 页。但就留日来说，该书所介绍尚少，“日本”一目，仅占 12 页，内分教育简介、留学须知、附录三部分，在留学须知中介绍了留学途径、奖学金、与留学有关的日本民间团体、出入境及其他手续等四个方面内容。幸好该书文字简洁、明了，读后也可对留日情况有个大体的了解。但是，该书基本是介绍学校方面的问题，对日本的风俗及留日生在日本的生活方面的内容尚无介绍。

1986 年出版的《出国留学实用手册》（胡孟浩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介绍日本的篇幅就比较多了，共 48 页，所介绍比较详尽，尤其是有了启程准备、在日本生活等生活方面的内容，每个方面又包含了多方面小项，每项都醒目、简洁，一看目录便知其所写为何事。

留学咨询类书籍是留学活动的“副产品”。这样讲，并不就是说这类书籍无意义或是意义不大，实际上，它们不仅可以指导留学生，从而对留学运动有所裨益，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们的出现和存在，还可以反映出留学运动发展的程度，可以折射出留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下面不避繁冗，将《出国留学实用手册》书中有关日本部分的目录内容摘录于下：

高 等 教 育

高等教育的现状

大学的类型

高校的组织结构

师资

私立大学的现状

学期的划分

教学层次

专业分布

招生及考试

大学生的生活

奖学金

高校和专业的选择

留学的途径

学费

语言

招生

日本政府提供的留学生奖学金

留学生的入学考试

勤工助学

国立大学简况

公立大学简况

接受自费留学生的私立大学简况

东京的大学

注意事项

留学的条件和入学申请

留学的条件

对学历的要求

申请入学许可的必备材料

保证人和保证书

在留资格和“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办理“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健康证书

申请护照、签证

申请出国护照需要准备的材料

办理出国护照

办理入境手续

关于入境许可

启程准备

去日本的航班和国际旅费

衣物

礼品

药品

日用品

书籍

食品

对出国携带的行李重量的限制

在日本生活

月生活费

租房

交通

写信

与日本人交往

打电话

就医

日本的国定节假日

气候

书店

用餐

购物

怎样才能及时获得各种信息

附 表

日本入境签证申请书

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入学许可书

身份保证书

身份担保证明书

《出国留学实用手册》还是属于综合性的留学咨询书籍，其中除介绍日本留学外，还介绍其他很多国家留学。该书对日本留学介绍虽多，毕竟也还是容纳有限。随后出现的专门介绍日本留学的书籍，则突破了这种限制，如《赴日留学、探亲、访问指南》。

《赴日留学、探亲、访问指南》（杜海清、鲍炳中编译，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1988 年出版），书目中虽有探亲、访问字样，实际上书中内容对留学生皆有益处。该书 32 开，共 111 页，另附日语学校所在地、东京都的范围、日本行政区划图计 3 张。该书不仅介绍了留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还增加了在日居住、逗留手续和日本概况等方面的内容。下面同样不避繁冗，将其目录内容列入：

自费赴日留学手续指南

- 一 赴日自费留学的条件
 - 二 如何取得入学许可书
 - 三 出国前必须办理的手续
 - 四 留学生所需的保证人
 - 五 留学费用
 - 六 自费留学费用表及学校介绍
 - 七 校历
 - 八 留学手续的日程安排
 - 九 赴日留学日语培训中心
 - 十 日本留学协会简介
- 附日语学校分布图

在日外国人居住、逗留手续指南

- 一 出入境管理的基本内容
 - 1 概述
 - (1) 何谓出入国管理行政
 - a 有关出入境事项
 - b 有关外国人的居住、逗留事项
 - c 有关驱逐出境事项
 - d 有关难民认定事项
 - e 有关外国人登记事项
 - (2) 有关出入境管理的法令
 - (3) 管理出入境的机构
 - a 法务省入境管理局设有以下六个课和一个难民认定室

b 入境者收容所

c 地方入境管理局

2 外国人入境手续

3 签证免除协议

4 居留资格与居留期限

5 入境的特例

6 居留期间必须遵守的事项

(1) 不同的居留资格对居留活动的限制

(2) 居留期限的延长

(3) 携带护照等证件的义务

(4) 关于在日外国人申请登记的义务

(5) 其他

二 居留手续

1 概述

(1) 在日居留手续的种类

(2) 提出书面申请

(3) 申请的受理

(4) 许可手续费

2 细论

(1) 如何取得资格外活动的许可

(2) 如何取得居留资格变更的许可

(3) 如何取得居留期限更新的许可

(4) 如何取得永久居住的许可

(5) 如何取得居留资格的许可

(6) 如何取得再入境的许可

(7) 其他有关居留方面的手续

a 取得居留资格手续

b 印章转记手续

c 有关就业、转业或进行目的外活动的手续

(8) 各种申请书的格式

三 在日外国人登记制度

1 概述

2 登记对象

3 初次登记

4 变更登记

5 在日外国人登记证明书的补发和更换

6 在日外国人登记证明书的定期复核

7 外国人登记证明书的缴销

8 按捺指纹的规定

9 各种申请书的格式

10 入境管理官署一览表

日本概况

一 日本的自然地理

二 日本的气候

三 日本的人口和民族

四 日本的行政区划

五 日本的行政区划简表

附日本行政区划图和东京都简图

六 日本的主要城市

七 日本的名胜古迹

- 八 日本的教育制度
- 九 日本的文化事业
- 十 日本的风土人情
 - 1 日本人的人生礼仪
 - 2 日本人的谈吐
 - 3 日本的宗教
 - 4 日本的婚俗
 - 5 日本茶道
 - 6 日本的花道
 - 7 日本的澡堂
 - 8 日本的节日
 - 9 日本人喜爱的体育项目
 - 10 日本人的姓名
 - 11 日本人的衣、食、住、行
 - 12 日本之最

留学咨询书籍，是应需要而出现。以上所述几种书，就留日方面说，其从篇幅短到篇幅长，从内容单纯到内容宽泛，从国别的综合性到国别的专门性，无不在昭示出留日运动在向前发展，这种昭示一是留日生人数在增多，对书的需求量在加大，二是留日生活需要更深入、更广泛。

2. 留日学生的生活费用与打工

日本是世界上著名的高消费国家。中国学生赴日本，各项支出对他们来说是个很大的数目，尤其是对自费生来说，开支

就更显得沉重。

自费生找保人一般需要花钱，衣、物等各项准备费，旅费、礼品费等等需很多。到日本后，各项支出又接踵而至。

日本高等学校的学费，各校情况不完全相同，据 1985 年的有关资料统计，一般情况为：

国立大学第一年学费为 31 万日元（报到时要交的金额）；

私立大学第一年学费为 86 万日元（报到时要交的金额）；

文学系、教育系的学费为 71 万日元（平均）；

法律系、经济系的学费为 71 万日元（平均）；

理工系的学费为 86 万日元（平均）；

药学系的学费为 149 万日元（平均）；

艺术系的学费为 120 万日元（平均）；

医学系的学费为 91 万日元（平均）。

一般的自费生，去日本后，须先在大学附属的日语学校或民间的日语教学机构学习几个月至一年、二年不等，学习一年左右的较多，然后再报考大学。日语学校对留学生来说是接受专业教育前必须接受的预备教育之地。日语语言没有过关的留学生到了日本后，首先必须为能听懂大学、专门学校的上课内容而攻读日语。

以日本拓殖大学（私立）的情况为例来看。拓殖大学语言学研究所附属日语进修中心位于东京都文京区小日向町 3—4—14 号。该中心的前身是日语研修所，已有 20 多年的历史，创办时主要是为印度尼西亚留学生教授日语，以后范围逐步扩大，不仅接收亚洲各国的留学生，也接收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该中心开设日语进修课程及其学费如下：

3 个月课程，10.3 万日元；
 6 个月课程，27 万日元；
 夜读班（3 个月），7 万日元；
 夏季班，35 万日元。

另外，该校还有留学生预备科，由国际科主办，一学年 50 万日元。在该校，学习 6 个月日语进修课程的留学生居多。

一些语言学校为吸纳中国学生，为他们代办入境手续等，但这些服务，都要收取费用。下面是几所学校的留学生费用表：

东京语言学校费用表

单位：日元

费用项目	金额	备注
①入学费	2 万	
②3 个月的学费	8.4 万	
③留学手续申请费	2 万	
④代办入学及入境手续等费用	6 万	
⑤运营费（包括伤病保险）	4 万	有在日身份保证人照顾者只需 2 万
⑥代办租房手续费	1.5 万	有在日身份保证人照顾者不要
⑦工作咨询费	1.5 万	有在日身份保证人照顾者不要
合计	25.4 万	

注：3 个月后必须付每月的学费 2.8 万。

居留期限 2 年，以上生活费没有计入。

东京国际学院费用表

单位：日元

费用项目	金额	备注
①入学费（包括设施费）	6万	
②3个月的学费	9万	
③留学手续申请费	2万	
④代办入学及入境手续等费用	6万	
⑤运营费（包括伤病保险金）	4万	有在日身份保证人 照顾者只需2万
⑥代办租房手续费	1.5万	有在日身份保证人 照顾者不要
⑦工作咨询费	1.5万	有在日身份保证人 照顾者不要
合计	30万	

注：入学时间为1月、4月、7月、10月。

3个月后必须付3个月的学费9万及设施费1万。

居留期限2年，以上生活费没有计入。

日本商业专科学校费用表

单位：日元

费用项目	金额	备注
①入学费	6万	
②6个月的学费	20万	
③留学手续申请费	2万	

续表

费用项目	金额	备注
④代办入学及入境手续等费用	6万	
⑤运营费（包括伤病保险金）	4万	有在日身份保证人 照顾者只需2万
⑥代办租房手续费	1.5万	有在日身份保证人 照顾者不要
⑦工作咨询费	1.5万	有在日身份保证人 照顾者不要
合计	41万	

注：未升学者，交付下学期的半年学费20万；

居留期限为2年。以上生活费未计入。

留学生的月生活费，1985年前后，东京地区为9万至10万日元，京都约8万日元。其中每月伙食费为3.5万日元左右，房租为3万日元左右，交通费为4千至9千日元。如东京大学的学生食堂，定食（包饭）200—350日元，面条300日元，一盘菜50日元，咖喱饭200日元。待至80年代末，日本政府对在东京学习的各国自费学生做过一次有关生活费用的抽样调查，其显示的结果为平均每个自费留学生每月需要支出近16万日元的生活费，其具体情况为：租房——39850日元，伙食——34410日元，书籍——5720日元，交通——5120日元，娱乐——1410日元，其他日用杂费——19610日元，额外费用——40150日元。

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为了节约开支，只能是节衣缩食，住最便宜的房子。日本《朝日新闻》1987年11月11日的一篇

《留学生饱受日元升值之苦》报道中称：“中国自费留学生 A 为了省下用于洗澡的费用，他不去花钱的浴池洗澡，在自己的房间里烧热水擦洗身体。他说：‘对日本人来说，洗一次澡花 270 日元确实很便宜，但是，如果合算成我们国家的钱，够全家人吃顿便饭了。’他的宿舍在东京的东中野，是一间带榻榻米的狭小房间，只有 4 个半榻榻米大小（注：约合 9 平方米），A 同他的两个伙伴，3 个人在里边过着自己动手做饭的生活。房租每人 1.6 万日元，寝具只有从本国带来的夏季用的薄被子。没有取暖设施，一到夜里很冷。在房间的角落里堆放着两摞人约有 30 厘米高的漫画杂志，在学习时，它们是书桌，在吃饭时，用它们当凳子。在亚洲国家来的留学生当中，中国的留学生在日本的生活特别艰苦。”

生活、学习费用高昂，中国留学生不可能依靠国内家人的资助维系留学生活，取得奖学金亦相当难，实际大部分自费生争取不来奖学金，于是，中国留学生只有靠打工维持留学支出。不仅自费生打工，就是很多公费生，为了生活更加宽裕，也悄悄地加入了打工者的行列，只不过他们打工较之自费生要少些。

打工，这也是中国留日运动兴起以来这一时期独有的特色，并且成了与留学生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日本可供留学生打工的机会很多，有基本定期的工作，如洗盘子、端菜，当售货员，做语言教师等，有不定期的工作，如当导游，做杂工等。

打工的机会多，并不等于打工容易。为了生存，为了完成留学学业，中国留学生在打工的特殊体验中，吃尽辛苦自不待

说，另外还备尝欺凌与污辱，为此，生病者有之，自杀者有之。一位中国留学生见到国内去的记者，大嚷：“我已买好飞机票，过几天要回国了。我来了半年，受够了！你回去写文章告诉他们，不要再来了！”^①

打工对中国留学生的重要程度，从留日运动再兴 10 多年来所出版的各种有关留日的书籍中也可以反映出来，尤其是纪实类书籍，反映打工的内容在书中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3. 留日学生的入学与学习

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主要分布于三种学校，一是语言学校，二是专科学校，三是高等学校。

日本语言学校的课程短的有 3 个月，长的达两年。每天课程通常为 6 小时（1988 年 9 月日本法务省规定语言学校每天上课的时间不能少于 6 小时），每周上课 5 天。开学时间各学校自定。留学生在入学时要进行一次测验，然后根据程度编班。毕业后可获得学校颁发的证书。

语言学校除少数为大学附属、一些机构设立的外，多数是为外国留学生专门设立的，并且多是私立性质的。留学生在语言学校，日语课程通过语法、发音、文字、听力、会话打下日语基础。一般来说，留学生要经过半年至两年的日语学习，才能进入专业课程的学习。有些语言学校除了设置语言课程外，也为留学生日后考大学设置模拟考试课程等。下面 3 所学校的日语课程表，便清晰地表明了学习内容、学习时间等方面的情况。

^①丁小莉：《留学东瀛话彷徨》，《南方周末》1988 年 12 月 9 日。

东京国际学院日语课程表

课程	日语课程	大学升学课程
学校地址	东京都足立区东和4-23-8	东京都足立区东和4-23-8
入学	1月、4月、7月、10月	1月、4月、7月、10月
日语水平	初级者以上（日语3级50%以上）	限于上级者（日语3级80%以上）
教学期间	期限/以1年为单位。 周课时/星期1~星期5, 20小时 每日4个课时 [上午班] 8:30~9:30, 9:30~10:30 10:30~11:30, 11:30~12:30 [下午班] 13:00~14:00, 14:00~15:00 15:00~16:00, 16:00~17:00 假日/星期6, 星期天, 节日 暑假1周, 寒假2周	期限/以1年为单位。 周课时/星期1~星期5, 20小时 星期6, 英语等课程 每日4个课时 [上午班] 8:30~9:30, 9:30~10:30 10:30~11:30, 11:30~12:30 [下午班] 13:00~14:00, 14:00~15:00 15:00~16:00, 16:00~17:00 假日/星期6, 节日暑假1周, 寒假2周
学习内容	通过语法, 文字, 发音, 听力, 日常会话的学习打下日语的基础。	通过语法, 文字, 发音, 听力, 日常会话的学习达到考大学的水平。

东京语言学校日语课程表

课程	日语课程	大学升学课程
学校地址	新宿校/新宿区新宿 5-3-19 池袋校/丰岛区东池袋 1-46-11 大久保校/新宿区百人町 1-21-24	大久保校/东京都新宿区百人町 1-21-24
入学	随时	随时
日语水平	初级者以上 (日语 3 级 50% 以上)	限于上级者 (日语 3 级 80% 以上)
教学期间	期限/以 1 年为单位。 周课时/星期 1 ~ 星期 5, 20 小时 每日 4 个课时 〔上午班〕 8:30~9:30, 9:30~10:30 10:30~11:30, 11:30~12:30 〔下午班〕 13:00~14:00, 14:00~15:00 15:00~16:00, 16:00~17:00 假日/星期 6, 星期天, 节日 暑假 2 周, 寒假 2 周	期限/以 1 年为单位。 周课时/星期 1 ~ 星期 5, 20 小时 周课时包括英语, 社会科学各 2 小时 每日 4 个课时/〔上午班〕 8:30~9:30, 9:30~10:30 10:30~11:30, 11:30~12:30 〔下午班〕 13:00~14:00, 14:00~15:00 15:00~16:00, 16:00~17:00 假日/星期 6, 星期天, 节日 暑假 20 天, 寒假 15, 春假 11 天
学习内容	通过语法, 文字, 发音, 听力, 日常会话的学习打下日语的基础。	通过语法, 文字, 发音, 听力, 日常会话的学习达到考大学的水平。

日本商业专科学校日语课程表

课程	大学考试课程
学校地址	东京都港区南青山 6-7-13 青山分校
入学	4 月和 10 月
日语水平	限于上级者 (日语能力 2 级考试 50% 以上)

续表

课程	大学考试课程
教学期间	期限/以半年为单位。 每周课时/星期 1~ 星期 5, 20 小时 每日 3 个课时/9:30~10:50、11:00~12:20、13:10~14:30 期间/前期 4 月上旬~9 月下旬 (暑假 1 个半月) 后期 10 月上旬~次年 3 月下旬 (春假 1 个月)
学习内容	通过语法, 文字, 发音, 听力, 日常会话的学习达到考大学的水平。

日本在大学与中学之间, 还设有各种类型的专科学校 (近似于中国的中等专业学校)。这些学校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实际技能, 开设实用专门技术教育课程, 其学制从 1 至 3 年不等, 因学校、专业而异。主要专业有电子、电气、计算机、建筑、汽车修配、烹调、美容、营养、护士、牙科技工、财务、簿记、秘书、旅游、宾馆、服装设计、服装剪裁、手工艺、电影、表演、音乐、美术、商业等。据日本文部省 1982 年的统计, 日本共有高等专门学校 62 所, 其中国立为 54 所。

下面是招收外国自费留学生的部分专科学校, 其中的 1——为有效课程; 2——为第一年学费; 3——为挑选学生的方法; 4——为申请入学的要求; 5——为外国留学生数目; 6——为申请入学的期限; 7——为宿舍情况, 用“有”、“没有”和 () 里的数字表示能容纳多少人^①。

^①韩志鹏:《实用自费留学指南》, 花城出版社 1990 年, 第 162—168 页。



千代田工科艺术专门学校

1. 工艺专业：计算机软件课程（2年），数据处理课程（2年），电子/计算机工程课程（2年），数据/通讯系统课程（2年），信息系统课程（1年），O—A系统课程（2年），视听工程课程（2年），电子通讯课程（2年），航空电子课程（2年），视听工艺课程（2年），电工训练课程（1年）。艺播广：美术课程（2年），声音艺术课程（2年），戏剧音乐课程（2年），通俗文学课程（2年），电影艺术课程（2年），广告课程（2年），流行音乐课程（2年）。设计摄影专业：商业设计课程，室内建筑课程（2年），动画片制作课程（2年），漫画课（2年），构图课程（2年），摄影课程（2年）。2. 工艺专业：842,000—942,000日元。艺术业：764,000—786,000日元。设计摄影专业：720,000—786,000日元。3. 审查有关证书、证件与日语考试成绩。4. 中学毕业或与之相等的学历。5. 总数：33（朝鲜14，台湾7，中国1，香港5，泰国2，马来西亚1，印度尼西亚1，孟加拉国1，密克罗尼西亚1）。6. 从11月到第二年3月。7. 有（男、女均可）。

早稻田电子专门学校

1. 数据处理课程：正规课程（1年 日/晚班，2年 日班）
2. 470,000日元（晚班），850,000日元（日班），1,450,000日元（2年日班）。3. 有关证书和证件审查。4. 12年学校教育或与之相等的学历。5. 总数10（朝鲜，中国，台湾，尼泊尔）。6. 从11月1日开始。7. 有。

日本美容专门学校

1. 美容师课程：基础课程（1年），应用课程（1年）。

2. 530,000 日元。3. 基础课程：有关证书及证件审查。应用课程：有关证书和证件审查，工艺考试。4. 基础课程：能够用日语进行日常会话。应用课程：已完成基础课程或有相同的工艺水平及知识水平并能用日语进行日常会话。5. 总数：91（台湾 76，中国 3，新加坡 1，香港 1，伊朗 1，马来西亚 1，泰国 1）。6. 从 11 月 1 日起。7. 没有。

山野美容专门学校

1. 美容师课程（1 年）。2. 601,500 日元。3. 有关证件及证书审查。4. 多于 12 年的学校教育或与之相等的学历。5. 总数 102（台湾 51，朝鲜 34，香港 4，中国 2，泰国 2，马来西亚 3，新加坡 2，菲律宾 2，文莱 2）。6. 从 11 月 2 日开始。7. 有（20）。

东京空中旅游学校

1. 旅游课程（2 年），国际酒店设施课程（2 年），航空系统设施课程（2 年），空中小姐训练课程（2 年）。2. 870,000 日元。3. 有关证书、证件审查，写作考试（英语、日语短文等）和面试。4. 12 年教育或与之相等的学历。5. 总数 16（台湾 7，朝鲜 4，香港 1，中国 4）。6. 从 11 月 1 日开始。7. 有。

东京外语专门学校

1. 英语会话课程（2 年），翻译和导游课程（2 年），英语和书法课程（2 年），国际酒店课程（2 年），空中小姐课程（1 年），商业英语课程（1 年），办公室自动化英语课程（2 年），国际旅游课程（2 年），日语课程（1 或 1.5 年）。2. 666,000—802,000 日元。3. 多于 12 年的学校教育或与之相等的学历。4. 推荐或写作考试（日语课程加面试）。5. 总数 173（台湾 112，

朝鲜 35, 中国 12, 香港 5, 泰国 2, 孟加拉国 4, 菲律宾 1, 巴基斯坦 1, 缅甸 1)。6. 从 11 月 1 日开始到第二年 3 月中旬。日语课程：到第二年 2 月底或 8 月底。7. 有。

PAI 商业学校

1. 金融商业课程 (2 年), 产业商业课程 (2 年), 设计商业课程 (2 年), 旅游商业课程 (2 年), 2. 730,000—750,000 日元。3. 面试和作文。4. 多于 12 年的学校教育或与之相等的学历。5. 总数 8 (台湾 4, 朝鲜 3, 中国 1)。6. 从 11 月 1 日开始到第二年 3 月 18 日。7. 没有。

国际观光专门学校

1. 国际旅游课程 (2 年), 国际酒店课程 (2 年), 空中旅游课程 (2 年)。2. 273,000 日元。3. 推荐：面试；考试：笔试和面试。4. 多于 12 年学校教育或与之相等的学历。5. 总数 60 (台湾 27, 朝鲜 12, 中国 7, 香港 5, 泰国 2, 马来西亚 1, 菲律宾 1, 印度 1, 孟加拉国 1, 斐济 1, 西萨摩亚 1)。6. 从 11 月 1 日到第二年 3 月 22 日。7. 有 (可容纳男生 50 人, 女生 30 人)。

文化服装学院

1. 服装制作课程 (2 年), 编织课程 (2 年), 时装工艺课程 (2 年), 普通基础课程 (时装工业系) (3 年), 时装商业课程 (2 年), 服装设计师课程 (2 年), 陈列展览设计课程 (2 年), 时装剪辑课程 (2 年), 广告课程 (2 年), 2. 902,000 日元—1,002,000 日元。3. 普通基础, 时装剪辑, 广告：有关证件和证书审查, 笔试和面试。其他课程：有关证件和证书审查, 面试。4. 多于 12 年的学校教育和听懂用日语授课。5. 总

数 227 (台湾 150, 朝鲜 64, 中国 26, 香港 15, 马来西亚 10, 泰国 7, 巴西 1, 新加坡 1, 法国 1, 美国 2)。6. 从 10 月 1 日到 12 月 25 日。7. 有。

白萩服饰专门学校

1. 时装设计学院课程/时装造型系 (2 年): 时装商业专业, 编织和手工艺专业。2. 660,000 日元。3. 有关证书和证件审查, 面试。4. 多于 12 年的学校教育或与之相等的学历 (必须已完成日语学习)。5. 总数 59 (朝鲜 35, 台湾 16, 中国 8)。6. 从 11 月 1 日到第二年的 2 月底。7. 没有。

青山日语学院

1. 进入大学预备课程 (自然科学, 人文学科等), 日语专业特殊课程 (初级、中级、高级、毕业) (分别为 6 个月、1 年、1.5 年、2 年)。2. 进入大学预备课程: 260,000 日元 (6 个月), 日语专业特殊课程: 212,000 日元 (6 个月)。3. 有关证件及证书审查。4. 多于 12 年的学校教育或与之相等的学历。5. 总数 210 (中国 177, 台湾 15, 巴西 6, 美国 4, 香港 5, 新加坡 3)。6. 从 4 月、6 月、9 月到 11 月。7. 有 (可容纳 300 人)。

新宿日本语学校

1. 学院预备课程 (上午/下午)、日语课程 (上午/下午/晚上), 预备课程 (希望教日语的人参加): (分别为 3、6、9 个月或长于一年)。2. 注册费: 25,000 日元。3 个月上午班 135,000 日元。3 个月下午班 120,000 日元。3 个月晚上班 70,000 日元。3. 证书及证件审查。4. 年龄 18 岁以上。5. 总数 303 (中国 110, 台湾 53, 朝鲜 46, 香港 42, 菲律宾 7, 巴西 3, 法国 5, 瑞士 2, 德国 3, 美国 3, 新加坡 21, 印度尼西亚

3. 泰国 5)。6. 1月、4月、7月、10月。7. 有 (6个女生)。

东京工学院日本語学校

1. 日语课程 (4月份课程: 1年; 10月份课程: 1.5年)。
2. 4月份课程: 480,000日元, 10月份课程: 640,000日元。3.
有关证件和证书审查。4. 多于12年学校教育或与之相等的学
历。5. 总数 71 (台湾 29, 中国 25, 朝鲜 4, 香港 7, 泰国 3,
印度尼西亚 3)。6. 4月份课程: 10月1日至31日; 10月份课
程: 5月1日到31日。7. 有。

名古屋 YWCA 日语学校

1. 强化课程 (1年), 正规课程 (3个月), 夏季强化课程
(5星期)。2. 强化课程: 510,000日元; 正规课程: 63,000日
元。3. 有关证件及证书审查。4. 多于12年的学校教育或与之
相等的学历。5. 总数 60 (美国, 英国, 法国, 加拿大, 巴西,
波兰, 西德, 丹麦, 澳大利亚, 新西兰, 中国, 泰国, 印度尼
西亚, 朝鲜, 斯里兰卡, 菲律宾) 6. 强化课程: 从课程开始
前的6个月到课程开始前的1个月这段时间; 正规课程: 从课
程开始前的1个星期内。7. 没有。

据1982年的统计, 日本共有大学 455所, 其中国立 95
所, 公立 34所, 私立 326所; 有短期大学 526所, 其中国立
36所, 公立 51所, 私立 439所。短期大学是2年制, 一般大
学是4年制。大学以上是大学院, 其硕士修业2年, 博士 5
年。留学生进入日本的大学, 要通过日语考试和大学入学考
试。从1984年开始, 日本政府对外国人实行一至四级的日语
能力测验, 获得一级测验合格证书者, 入大学可免去日语考
试。该测试水平要求如下:

第五篇 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的重振和热潮

水平	内容	时间	总分	要求标准
一级	写作词汇 听力 阅读文法 合计	45 分钟 45 分钟 90 分钟 180 分钟	100 分 100 分 200 分 400 分	应掌握高水平语法，两千汉字和一万单词。能有相当的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要达到这种水平，大约需要学习日语 900 个小时。
二级	写作词汇 听力 阅读文法 合计	35 分钟 35 分钟 70 分钟 140 分钟	100 分 100 分 200 分 400 分	应掌握高水平语法，一千汉字和六千单词，有一般的会话、阅读和写作能力。要达到这种水平，大约需要学习日语 600 个小时和完成中级日语课程。
三级	写作词汇 听力 阅读文法 合计	35 分钟 35 分钟 70 分钟 140 分钟	100 分 100 分 200 分 400 分	应掌握基本语法，约三百汉字和一千五百单词，有日常会话的能力，能阅读书写简单句子。要达到这种水平，大约需要学习日语 300 个小时和完成初级日语课程。
四级	写作词汇 听力 阅读文法 合计	25 分钟 25 分钟 50 分钟 100 分钟	100 分 100 分 200 分 400 分	应掌握初级语法，约一百汉字和八百单词。有简单会话能力，能阅读书写简短句子。要达到这种水平，大约需要学习日语 150 个小时和完成初级日语课程的一半。

在日本，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国立大学主要有东京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御茶水女子大学、神户大学、横滨国立大学等；公立大学主要有横滨市立大学、大阪市立大学、京都府立大学、名古屋市立大学、东京都立大学、爱知县立大学、北九州立大学等。接收中国自费留学生的私立大学主要有早稻田大

学、法政大学、庆应义塾大学、近畿大学、东海大学、爱知大学、同志社大学、创价大学、上智大学、明智大学、亚细亚大学、日本大学、关西大学、大东文化大学、天理大学、津田塾大学、中央大学、立教大学、东洋大学、专修大学等。

日本的大学是以难考著名的。有人说，美国的大学是好进不好读，日本的大学是好读不好进，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留学生报考日本大学，首先要选择好学校和专业，因为各个学校、各个专业，它们的学费相差悬殊，考试难易程度不同。一般是公立大学学费低，私立大学学费高；文科学费低，工科学费高。国立大学最难考，它实行全国统一考试；私立大学的考试内容、范围、难度和日期等全是自行一套，五花八门。台湾去的留学生，普遍经济条件宽裕，他们往往采取的做法是一下子报考几所甚至十几所大学，一个个去考，考上哪个算哪个。中国大陆去的留学生则要精打细算，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学业、特长、爱好等精心选择学校与专业。在经济等条件的限制下，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往往只能选择学费较低的公立大学了。

考大学难，读大学同样也不轻松，这是中国留学生的普遍感受。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赢得了日本社会的称赞。有的日本人说：“中国留学生在经济方面未必是充裕的，但是，他们的勤奋与顽强则无与伦比。”^①

4. 留日学生对日本社会的体验

生活、学习会是什么情况？日本人、日本社会怎么样？这

^①《朝日新闻》1987年11月11日。

是每个留学生出国前都要考虑的问题。一本留学咨询的书中是这样告诫留学生的：

与日本人交往

抵日以后，要尽量多了解日本人的风俗习惯，以免在交往中发生误会。例如，不要向日本人询问年龄、工资、以及婚姻状况。与日本人一同外出游玩，吃饭、车票、门票等都要自己付钱。

在衣着方面要保持整洁，要常换洗衣服，男同志要注意刮脸和刷鞋子。因为这些也是对他人的尊重。

在日本可以经常见到日本人下班后三五成群地去喝酒或喝咖啡。对日本人来说，酒店和咖啡馆是他们交际的场所，他们在那儿交流感情、交换信息。日本人往往把“个人交际”同“家庭交际”分开对待。“个人交际”是指与自己的同事、同学或朋友之间的交际。这种交际，日本人多半在酒店或咖啡馆等处进行，不像中国人常邀朋友到家中做客。“家庭交际”是指一家人与另一家人之间的来往，也就是说，带着家眷到对方家去做客，或者把对方请到自己家做客。但是未经对方的邀请一般是不会去访问的，而且次数也很有限^①。

程明是新时期留日运动兴起后即赴日本的女留学生，后来

^①胡孟浩：《出国留学实用手册》，第265页。

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是这样回答的：

1. 您即将出国时有何想法？

（答）我 1979 年去日本留学，即将出国时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更多的是不安。因为我是第一个到日本石川县留学的中国学生，担心语言不过关，也不知食宿如何解决，想得更多的是会碰上一个什么样的导师，我能否胜任他给我的课题。

2. 留学期间，使您感慨最多的是什么问题？

（答）我的研究主要在实验室内进行，工作离不开仪器设备和试剂。日本研究所的设备更新换代快，应用这些先进仪器设备得到的实验结果和数据也就更精确、更可信，操作也更方便。使我感慨的是，订购仪器、试剂不用出实验室。公司上门服务，主动推销，按期送货，售后服务完善，一旦仪器出故障，一个电话就能找来维修人员。

3. 您留学时最难忘的一件事？

（答）一次我去外地参加学术交流会，上了火车，看到我的座位上已有人坐下了，一对车票，车厢座号是一样的。是电脑出了差错？找来乘务员，他再三道歉，把我领到绿色车厢（相当中国的软席车厢）安排了座位，不仅没让我增补车票，反而赔偿了 30% 的车费，以致歉意。这种把旅客当上帝的优质服务使我难忘。^①

^①《神州学人》1992 年 4 期，第 22 页。

程明的心态和感觉，确实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具有普遍性：对留学生活疑虑，对日本的科技与社会文明羡慕。

中国留学生抵日，踏上这个与中国有悠久文化往来而又陌生的国土，开始紧张而又全新的生活。这种生活，从广泛的意义上看，它不仅仅是学习生活，更主要的还是一种社会生活。在这种社会生活中，留学生们了解了日本社会，开阔了生活的视野，促进了思想的嬗变，结交了日本的友人。留学生活赋予中国学生的这些，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单纯的学习。从历史上看，正是某些特殊的纽带（包括留学生活的纽带）使中日两国人民即使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也维系了世代的友好。如此看来，中国留学生对日本社会的了解以及与其沟通，愈加显得重要了。

留学生活是全面的生活。在日本，中国留学生要学习，要打工，要应付各种事情，要应酬各种场合。所有的这一切，都给中国留学生了解日本社会提供了条件。留学生在生活、学习、生活、打工、交往中也难免对日本社会产生抱怨情绪，但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中国留学生，不论是公费还是自费，不论是留日时间长还是短，他们都结交了一批日本朋友，朋友之情往往会冲淡他们思乡之苦，会解除他们辛劳之乏。

一般地说，中国留学生在日本都承受着学习紧张、打工劳累的煎熬，但就是在这种煎熬的历程中，他们有意或无意在体验着日本的社会。1980年9月至1982年10月在大阪关西大学院研修的中国留学生卞崇道就说：“在中国留学生中，半工半读者不少，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认为，对于留学生来说，勤工助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从经济上解决一部分学习与生活费

用，更重要的是能更深入地了解 and 认识日本社会。”^①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为了更多地了解日本社会，他甚至不惜辞掉原来的一份工作再另寻其他的打工机会。他这样叙述自己的打工经历：

到日本最初的半年，给“朝日新闻笹井贩卖店”送报。同是送报员的中泽胜子“一家人对中国人非常友好，节、假日她常邀我到她家做客，向我介绍她家这样普通日本人的生活与工作情况，使我目睹和感受到普通日本工人的勤奋、质朴和热情。”介绍我做送报工作的山田作郎先生，“是地方小报《啄木鸟》的主编，同时从事中日友好活动、曾任高槻市日中友好协会事务局副局长。山田作为一名新闻界人士，知识面十分宽广，他常跟我开玩笑地说：‘我是杂学博士’。在与山田先生的接触中，我不仅感受到他对中国的满腔友好感情，而且确实学习到许多知识。为了提高我的日语水平，他常为我选择适合的教材，有时还录好音给我；每当我遇有不懂的问题向他请教时，他总是引经据典，详细地解答；他还带我参观富田町的寺庙古迹，介绍当地历史，使我有山田先生是我第二导师的感觉。”

“为了进一步了解日本产业工人的工作与生活，半年后我辞退了送报工作，经李大容先生和佐野佑二先生介绍，又到京都丰荣纤维公司蕾丝工厂（提花针织厂）当工人，和这里的纺织工人一起劳动了一年半。”“我是作为一名工读留学生，到车

^① 卞崇道：《情系东瀛——忆留日生活点滴》，载田桓、唐景芸编：《留日归来忆扶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第 134—135 页。

间当工人的。车间实行两班倒，早班从早 5 点到下午 1 点，晚班从下午 1 点到 10 点（包括吃饭一小时），每周一换，双周休息三日制。对于工厂，我是陌生的。因此，进入这个工厂后，我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劳动关。由于厂小人少，尽管机械化程度较高，但分工还不是很细的。为了使我能独立工作，日本工人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老工人岩上春雄是个技术熟练、性格耿直的人，从进入车间应该注意什么，到如何发现和排除机器故障等等，他都耐心指点。他操一口京都方言，我听不大懂，有时道理很简单，他反复解释，我还不得要领，这时急得他对我直发脾气。事后他怕我不高兴，总要找我解释几句，安慰一番。中年骨干堀胜三和伊藤民夫，经常和我同班，他们对我不仅言传，更注重身教，遇到难度大的技术，他们总是先示范，然后指点我作，直到后来我独立工作时，凡是我解决不了的难题，他们也总是不声不响地过来帮我解决。”

“金山政夫是我最亲密的一位工人朋友。他不仅勤奋好学，而且为人忠厚、质朴。记得在 1982 年春天我感冒发烧时，躺在宿舍两天滴水未进（正值工厂休息），到第三天金山上班时，发现我病了，他直埋怨我怎么不及时告诉他。他妻子得知后，每天从家里做好适合于我吃的饭菜，亲自送到宿舍，一天两餐，一连几天。当她每次送饭走后，面对着热气腾腾的饭菜，我总止不住热泪横流，这岂止是几顿饭菜，它代表的是一位普通的日本工人全家的心愿和情谊啊！金山对中国怀有诚挚的友好感情，这个工厂曾与杭州针织厂搞补偿贸易，即由日方提供机器和技术指导，中方以产品补偿。金山是技术骨干，每次都是他随公司经理来中国，帮助安装机器和维修，解决技术难

题。为了便于工作，他自学中文，有时把课本带到车间，利用休息时间让我教他；每次来中国之前，他都认真做准备，从可能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到车间的日常用语，他都不放过。每次从中国回来后，他又兴奋地给我讲述在中国的生活，话语间对中国充满无限的赞美与向往。”“留学期间，我还受聘在大阪骏台外国语专科学校、京都花园大学讲授中文”，结识了一些日本朋友，“他们都曾给予我许多帮助。留学二年，时间虽然短暂，但在我的人生中却写下了难以忘怀的一章。”

中国学生在留学过程中体验、感受日本社会。同样的，日本人也在观察、体味中国留学生。虽然有的日本人因站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下看问题，对中国留学生过多打工不无微辞，但体现在留学生身上的中国人优秀品质，日本人也是有目共睹。不过，与此相反的看法也还是存在的。一位叫佐佐木明子的日本家庭妇女这样说：

我是在国内举行的“通过野外活动加深与留学生的友谊”的野营活动中，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留学生的。两个月后，在野营活动中认识的一个日本妇女向我介绍了一个住在东京小平市的中国留学生。从那以后，我和几个家庭妇女就跟那个留学生开始了交往。我们向他学习中国话，他向我们学习日本的方言，这种交往持续了一年半。

坦率地谈谈我对中国留学生的意见吧：

(1) 他们时间观念差，缺乏责任感，尤其是集体活动，大家一起定下来的时间，需要大家遵守，迟到

和随意改变会影响别人的。我认识的中国留学生这一点就差。

(2) 他们不习惯向人道歉。这样容易伤害日本人的情感。有一次，我把一套十几卷的文学全集借给了那个中国留学生。等他还给我之后拿回家一看，其中有一卷书里竟有7页被沾上了红墨水。可是那个中国留学生没有向我道歉，以后也没有向我道歉。

我的朋友对我说：“他们迟到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听他们说过‘对不起’。”

(3) 擅自行事。K夫人到中国访问时，A小姐曾作过她的翻译。当A小姐提出想来日本留学时，K夫人做了A小姐的担保人，并让她住在自己的家里，A小姐毕业回国后，给K夫人写来一封感谢信，同时把她的朋友B介绍给了K夫人。K夫人无可奈何，只好为素不相识的B小姐当担保人。B小姐的性格与A小姐不一样，B小姐跟K夫人合不来。尽管如此，K夫人还是忍受着直到B小姐回国。可是B小姐回去后，又把素不相识的C小姐介绍来了，这种做法很不好，于是K夫人予以拒绝。日本人为朋友做件好事，只为朋友做，这一点，与中国人不一样”^①。

^①西泽正等：《挣扎的中国留学生》，载李珣编：《魂断梦觉的飘零》，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388—389页。

第 三 节

留日运动的主流特征

1. 日本的奖学金及其政策

奖学金制度，是世界现代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现代中国留日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也是日本接纳其他国家留学生政策的一个具体体现，在某种程度上，它对中国的留日运动健康地向前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日本对外国学生的奖学金，主要有以下几类：

1. 日本政府（文部省）奖学金；
2. 自费外国留学生学习奖励制度，该项奖学金由财团法人日本国际教育协会授予；
3. 日本民间团体提供的奖学金；
4. 地方公共团体提供的奖学金；
5. 日本各高等学校提供的奖学金；
6. 日本大学的学费奖免制度。

以上各类奖学金，其详情如下^①：

1. 文部省奖学金（国费）

负责者：文部省学术国际局留学生课。

资格：（1）对象：到每年的4月1日止。符合下列条件的私费生中的成绩优秀者。

- a. 在日本的大学本科毕业随后考进大学院，学习

^①韩志鹏：《实用自费留学指南》花城出版社1990年出版。

修士（硕士）课程者，或者是在外国的大学读完本科，现在在日本的大学院学习修士课程已满一年者；

b. 在日本的大学院完成修士课程，现在已进入博士课程者，或者是在外国的大学读完硕士课程，现在在日本学习博士课程已满一年者。

注1：私费留学生的概念，是指以留学为目的来到日本并已入学者，也就是具备4-1-6在留资格者，并且本来就没有得到文部省奖学金的人。

注2：如果博士课程有前2年后3年之分，那么前2年就是这里所称的修士课程。

(2) 年龄：未满35岁者。

(3) 下列三种人不能获得此种奖学金：

- a. 过去已得过文部省奖学金者；
- b. 夫妇双方，如果其中一方正领取文部省奖学金；
- c. 已经在领取其他形式的奖学金者。

金额：(1) 奖学金：月額17.3万日元。

(2) 研究旅费：年额4万日元。

(3) 听课费等：免缴。

(4) 回国旅费：按奖学金发给的最后期限回国者，发给飞机票。

(5) 住宿费：由日本国际教育协会补助部分金额。

支付期限：一年为期，但也可申请延长。

申请材料：必须向所在大学校长呈交下列表格：

- (1) 申请书；
- (2) 宣誓书；
- (3) 健康证明书；

- (4) 大学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 (5) 目前在学的证明书；
- (6) 学习成绩证明书；
- (7) 4-1-6 在留资格证明。

申请截止日期：由大学定（每年1月份左右）。

考取方法：(1) 校长根据申请材料以及面谈进行选拔，然后向文部大臣递交推荐书。

(2) 文部大臣听取意见后决定。

通知方法：由学校通知本人。

2. 私费生学习奖励费

负责者：日本国际教育协会学生生活课

资格：年龄未满30岁的本科3年级以上学生，成绩优秀。

名额：160名（以1984年为例）。

金额：月額4万日元。

支付期间：从6月到次年3月。

申请材料：(1) 申请书；(2) 成绩证明书；
(3) 外国人登录证。

申请截止日期：由大学决定（5月左右）。

选拔方法：(1) 大学校长根据书面申请材料以及面谈结果进行选拔，并向国际教育协会推荐。

(2) 协会作决定。

通知：由大学通知本人。

注：(1) 若该学生中途转学，奖励费即取消，有特殊原因者除外。

(2) 奖励费全部领取之后，要向大学校长呈交学习报

告书。

(3) 原来已经通过其他途径领取 4 万日元以上的奖学金者不能获得此项奖励费。

(4) 夫妇双方同时申请，只能批准其中一方。

3. 亚洲研究协会奖学金

地址：日本国东京都港区六本木 5 丁目 11—16 国际文化会馆内

资格：亚洲留学生的大学院院生以及进行有关亚洲地域研究的留学生院生。

名额、金额、支付期间：不定。

申请材料：由于不是公开招募，材料需要提出。

申请期限：不定。

选拔方法：由协会推荐，再通知本人。

4. 亚洲留学生奖学金

地址：日本国广岛市中区八丁堀 7-11

广岛 YMCA 国际事业部内

资格：在广岛的亚洲、非洲留学生中生活有困难者。

对象：本科生、院生。

名额：12 名（1984 年为例）。

金额：每月 1.3—4 万日元。

支付期间：不定，按认为是最需要的期间付给。如需延长，则每年要重新申请。

申请材料：申请书。

申请期限：1 月—3 月。

选拔方法：根据申请书和面谈结果决定。

通知：用邮寄通知本人。

5. 矶野育英奖学金

地址：日本国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室町1丁目12番地

资格：东京都内高中生、本科生中品学兼优、但生活困难者，包括日本人和外国人。

名额：5名。

金额：月額1.5万日元（每3个月发一次）。

支付期间：4年。

申请材料：1) 申请书；2) 校长推荐书；3) 在学证明书。

申请截止日期：每年5月20日。

选拔方法：协会根据推荐审议决定。

通知：学校书面通知本人。

6. イワタニ国际奖学金（岩谷直治纪念财团）

地址：日本国东京都千代田区永田町2-10-2 TBR
712号

资格：1) 亚太地区在日院生，其课程与自然科学有关；
2) 读修士课程未满30岁者，读博士课程未满35岁者；
3) 没有领取别的奖学金；
4) 对国际亲善有所贡献。

对象：在学院生或者博士课程已完成，为取得学位而继续在学者。

名额：10名。

金额：每月9万日元。

支付期限：1年

申请材料：1) 申请书；2) 履历表；3) 研究计划书；
4) 在学证明书；5) 成绩证明；
6) 导师推荐信；7) 体检表；
8) 一寸相片二张。

申请截止日期：1月20日。

选拔方法：根据申请材料初选，合格者于2月中旬进行面试。

通知：2月中旬书面通知。

7. 小川育英会

地址：日本国东京都江东区龟户1-38-6大都工业ビル内

资格：高中、大专、大学品学兼优但生活困难的学生，含日本本国学生与外国留学生。

名额：高中12名；大专1名；大学12名（以1982年为例）。

金额：月額：高中8千日元；大专2万日元；大学2.5万日元。

支付期间：在学期间。

申请材料：1) 申请书；
2) 校长推荐书；
3) 在学证明书。

申请截止日期：5月20日。

选拔方法：面试。

通知：6月20日前后由校长通知本人。

注：1) 申请者应向校长申请。大学只限于指定的20所大学。

- 2) 领取奖学金者每学年末要向理事长书面报告学业与生活情况。

8. 榎山奖学财团

地址：日本国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 3-10-5

榎山株式会社内

资格：1) 来自亚太地区的院生（修士课程第 1 年、博士课程第 1、2 年者）。

- 2) 读修士课程者要 30 岁以下，读博士课程者要 35 岁以下。

- 3) 不能同时领取其他奖学金。

- 4) 关心国际亲善者。

名额：6 名。

金额：月額 10 万日元。

支付期间：二年。

申请材料：1) 推荐书；2) 申请书；3) 履历表(连照片)；

- 4) 健康体检表；5) 成绩证明书；

- 6) 在学证明书；7) 研究计划。

申请截止日期：5 月中旬。

选拔方法：根据申请材料选拔。

通知：书面通知。

9. 北野生涯教育振兴会（大学听讲生奖学金）

地址：日本国东京都目黑区五本木 1-12-16

资格：有 5 年以上工作经验；年龄在 30 岁以上；在文学部以外的其他学科听课的学部听讲生、大学院听讲生；含日本人与外国人。

名额：大学院听讲生 10 名；学部听讲生 20 名。

金额：每年大学院 15 万日元；学部 10 万日元。

申请材料：1) 申请书；2) 在职证明书（注明工作起始年月）；

3) 在学证明书以及听讲生证书；

4) 照片（5×7cm）。

支付期间：1 年（可连续申请延长 2 次）。

申请截止日期：4 月末 5 月初。

选拔方法：根据申请文件。

通知：5 月底通知本人。

注：领取者每年 4 月与 10 月要写一书面“状况报告书”。

10. 国际文化教育交流财团（石坂纪念团）

地址：日本国东京都千代田区大手町 1—9—4

经团连会馆内经团连会员课

资格：下列大学中在学的品学兼优但生活有困难的院生（特殊情况下学部生也可以）：

北海道大学、东北大学、筑波大学、千叶大学、东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东京外大、东京艺术大学、ICU、庆应大学、上智大学、早稻田大学、国际大学、名古屋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广岛大学、同志社大学、九州大学。

名额：8 名。

金额：每月 9 万日元。

支付期间：1、2 年。

申请材料：1) 申请书；2) 校长与导师的推荐书；

3) 大学及大学院期间的成绩单。

申请截止日期：4月下旬。

选拔方法：面试（5月中旬）。

通知：书面通知。

11. 小林外来留学生奖学财团

地址：日本国冈山县冈山市门田屋敷 1—4—16

资格：1) 在冈山县境内大学读书的亚、非、拉国家留学生（含短大生、学部生、院生、研修生）。

2) 品学兼优，尚未取得博士学位，且又没有同时领取其他奖学金者。

名额：15名左右。

金额：每月3万日元。

支付期间：2年。

申请材料：1) 申请书；2) 4—1—6 在留资格证书；

3) 以前的学业成绩表；

4) 在学证明书（注明入学年月）；

5) 如果是刚入学者，要出示入学通知书；

6) 导师推荐书；7) 体检表；

8) 近照2张（5×3.5cm）。

申请截止日期：5月底。

选拔方法：根据申请材料与面试结果。

通知：书面通知。

12. 五岛育英基金

地址：日本国东京都渋谷区道玄坂 1—10—7

五岛育英会教务课

资格：由下列大学推荐的品学兼优学生（含日本人与外国人）：

- 1) 武藏野工业大学：院生、学部二年级以上生。
- 2) 亚细亚大学：院生、学部二年级以上生。
- 3) 亚细亚大学留学生别科的留学生。
- 4) 日本经济短大生（2 年级）。

名额：武工大：院生 13 名；学部生 60 名。

亚大：院生 15 名；学部生 54 名；别科生 1 名。

经短大：4 名。

金额：院生、别科生：年额 10 万日元。

学部、短大生：年额 8 万日元。

支付期间：7 个月。

13. 实吉奖学金

地址：日本国东京都千代田区大手町 2—6—2

日本ビル433 号室

资格：35 岁以下；未婚；没有同时领取其他奖学金的专攻理工科课程（农医类除外）的大学院留学生院生中品学兼优者。

名额：10 名左右。

金额：每月 9 万日元。

支付期间：1—2 年。

申请材料：1) 有日本保证人签名的申请书；
2) 校长和导师的推荐书；
3) 履历表。

申请日期：4月—5月末。

选拔方法：由该会面试。

通知：6月10日左右由校长通知本人。

注：限于下列大学的学生：东京大学、东京工大、横滨国立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

14. 大学妇人联盟在日外国人奖学金 (CWAJ)

地址：日本国东京都杉并区高井户西3—15—15

CWAJ 奖学生选考委员会

资格：女性；有4—1—6在留资格；没有同时领取其他奖学金的留学院生。

名额：2名。

金额：年额200万日元（分两次支付）。

支付期间：1年。

申请材料：1) CWAJ 格式申请书（包括回邮信封、邮票）；

2) 由导师书写的推荐信，并付“亲展封印”；或者由师长亲友等写推荐信，付“亲展封印”；

3) 母校大学成绩单；

4) 大学院在学证明；

5) 大学院成绩单；

6) 4—1—6在留资格证书副本。

申请截止日期：12月15日。

选拔方法：1—2月进行书面考试；3月1日通知结果。面试用英、日语进行，3月31日通知结果。

通知：书面通知本人。

- 注：1) 每年9月公布下次申请的规定；
2) 支付期满后，要书面汇报学业情况；
3) 盲人学生奖学金另有规定。

15. 大学妇人协会 国外奖学金委员会

地址：日本国东京都新宿区新宿7—17—18

户山マンション241号

资格：国际大学妇人联盟（IFUW）成员，有学士以上学位的留学生。

名额：1名。

金额：全额70万日元。

支付期间：3—6个月内。

- 申请材料：1) 申请书；2) 本国的大学妇联推荐书；
3) 师长亲友等3人连名的推荐书；
4) 体检表；5) 照片3张（护照规格）；
6) 日本方面的接收单位（大学、研究所等）的接收证明；
7) 以前的著作、论文（若是用英、日文以外的文字写的，要用英或日文写出该文的要点）。

申请日期：4月初—6月10日。

选拔方法：由委员会进行考试。

通知：书面通知。

16. 情报处理教育研修助成财团（FINPED）

地址：日本国东京都千代田区丸の内2—6—1 古河总合ビル

资格：与情报工学有关的经营学科的大学院生。

名额：10名。

金额：50万日元（一次性发放）。

申请材料：1) 申请书；2) 在学证书；3) 成绩单；

4) 导师推荐书；5) 照片；

6) 在留证书；7) 体检表。

申请日期：1月15日—2月15日。

选拔方法：大学推荐。

通知：3月上旬书面通知大学。

注：限于下列大学的学生：东京大学（工、经）、东京工大、一桥大学、庆应大学（理工）、早稻田大学（理工）、大阪大学（基础工）、名古屋大学（工）、电气通信大学、山梨大学（工）。

17. 东急外来留学生奖学财团

地址：日本国东京都渋谷区桜丘町 26—20

资格：亚太地区院生、修读博士课程者（35岁以下）；修读修上课程者（30岁以下）；没有同时领取其他奖学金；关心国际亲善事业者。

名额：20名。

金额：月額10万日元（出差研究另有补助）。

支付期间：2年，必要时可延长到3年。

申请材料：1) 申请书；2) 照片2张（5×3.5cm）；

3) 成绩单；4) 研究计划；

5) 导师推荐信或师长亲友推荐书；

6) 履历表；7) 体检表；

8) 在学证明书; 9) 入学通知书。

申请截止日期: 10月1日—12月20日。

选拔方法: 书面考试, 合格者参加面试(4月底5月初)。

通知: 书面通知。

注: 单身男子可以住川崎市溝の口的宿舍。

18. ベターホーム国际亲善奖学金

地址: 日本国东京都渋谷区渋谷 1—15—12

ベターホーム协会内

资格: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学部生、院生(均私费);
女学生优先。

名额: 20名。

金额: 每月3万日元。

支付期间: 到毕业为止。

申请方法: 由校长推荐(3月初)。

通知方法: 4月中旬由校长通知本人。

注: 限于下列大学的学生: お茶の水女子大学、东京水产大学、横浜市立大学、日本女子大学、横滨国立大学、东京农工大学、学习院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理科大学、关西学院大学、大阪府立大学、名古屋大学、大阪市立大学、京都工业纤维大学、神户大学、庆应大学、东京大学、千叶大学、京都大学、奈良教育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九州大学、北海道大学。

19. 前泽育英财团

地址: 日本国东京都中央区京桥 1—3—3 前泽工业(株)
内

资格：东京都范围内大学本年度新入学的私费学部生、院生中品学兼优但生活有困难者（含日本人与外国人）。

名额：学部生 60 名；院生不定额。

金额：月額 1 万日元。

支付期间：到毕业为止。

申请材料：1) 申请书；2) 校长推荐书；
3) 在学证明书。

申请截止日期：5 月 31 日。

选拔方法：面试。

通知：6 月中旬由校长通知。

注：限于下列大学的学生：庆应大学、工学院大学、中央大学、东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东京电视大学、东洋大学、东京家政大学、日本大学、法政大学、明治大学、立教大学、早稻田大学。

20. 盛田国际教育振兴财团

地址：日本国爱知县名古屋市中区荣 1—4—30 盛田（株）内

资格：爱知县范围内大学的学部生、院生中品学兼优但经济困难者（只限于留学生）。

名额：3 名。

金额：年额 100 万日元。

支付期间：1 年。

申请材料：1) 申请书；2) 校长和导师推荐书各一份；
3) 成绩单。

申请截止日期：7月底。

选拔方法：根据书面材料和面试。

通知：12月中旬通知。

21. 守谷育英会

地址：日本国东京都中央区八重洲 1—4—22

守谷商会 允付守谷育英会

资格：东京都内学校品学兼优的学生，生活有困难者（含日本人、外国人）。

名额：30名（外国留学生占半数）。

金额：月额：高中生 1万日元。

大专生 1.5万日元。

学部生 2万日元。

院生 2.5万日元。

支付期间：到毕业为止。

申请材料：1) 申请书；2) 在学证明书；3) 照片二张；
4) 校长与导师推荐书。

申请截止日期：5月31日。

选拔方法：根据书面材料和面试结果。

注：1) 可以同时接受其他奖学金；

2) 每月用明信片报告一次学习情况；

3) 每年3—4月报告一年内生活、学习情况。

22. 守屋留学生交流协会

地址：日本国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 3—29（株）

帝国书院内

资格：亚洲私费留学生中 30 岁以下品学兼优但生活有困

难的学部三年级生。

名额：15名。

金额：月額4万日元。

支付期间：2年。

申请材料：1) 申请书；2) 成绩单；3) 体检表；

4) 外国人登录证明；5) 推荐书。

申请截止日期：4月30日。

选拔方法：根据申请材料。

通知：由大学通知本人。

注：每年度末要写书面学习报告书。

23. 公益信托ヤマハ发动机国际友好基金

地址：日本国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室町2-1-1

受托者 三井信托银行(株)信托部信托营业室

资格：专修工科的大学院新入学的修士生中品学兼优但生活有困难者，对日友好，年龄满30岁。

名额：4名。

金额：每月9万日元。

支付期间：2年。

申请材料：1) 申请书；2) 在学证明书；3) 成绩单；

4) 体检表；5) 校长(或系主任)和导师推荐信。

申请截止日期：12月1日至次年1月末

选拔方法：根据申请材料和面试结果。

通知：书面。

注：限于下列大学的学生：东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千

叶大学、横滨国立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电气通信大学。

24. 山村育英会

地址：日本国兵库县西宫市东浜町 2 番 113 号山村硝子
(株) 内

资格：学习优秀的学部生。

名额：10 名。

金额：每月 2 万日元。

支付期间：学部生在学的后 3 年（医科学生后 5 年）。

申请材料：1) 申请书；2) 大学推荐书；3) 申请理由书；
4) 成绩单；5) 履历表。

申请截止日期：4 月中旬。

选拔方法：5 月份进行面试。

注：限于下列大学的学生：神户大学、甲南大学、关西学院大学、神户商科大学、神户商船大学、神户外语大学、姬路工大学。

25. 山室纪念会

地址：日本国东京都千代田区丸の内 1—4—5 三菱信托银行内

资格：从事有关实业学科研究的 22 岁以下大学 2 年级以上学部生中，品学兼优但生活有困难（日本学生家庭年收入在 8 百万日元以下）。

名额：留学生 2 名。

金额：月額 1.5 万日元以上。

支付期间：至毕业为止。

申请材料：1) 申请书；2) 履历书；3) 家庭经济状况报告；4) 体检表；5) 推荐书；6) 在学证明书；7) 外国人登录证明；8) 照片；9) 誓词；10) 个人印章；11) 成绩单。

申请截止日期：5月中旬。

选拔方法：根据推荐。

注：限 25 所大学的学生。

26. 汤本育英会

地址：通过下列大学办理：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东京女子大学、青山大学、明治大学、成城大学。

资格：东京都内新人学的学部生中学业优秀但生活困难者。

名额：10 名（含日本人、外国人）。

金额：每月 1.3 万日元。

支付期间：至毕业为止。

申请材料：1) 申请书；2) 校长或代理人的推荐书；
3) 在学证明书。

申请截止日期：6 月 15 日。

选拔方法：面试。

注：限于上述大学的学生；残废学生也可申请。

27. 亚细亚大学“太田奖学基金”外国人招致奖学金

资格：30 岁以下、没有同时领取其他奖学金的院生、学部生中品学兼优者。

金额：年额 120 万日元，另有来回旅费，免缴学费、听讲费等。

支付期间：至毕业为止。

申请期间：9月1日—10月31日。

28. 庆应义塾大学奖学金

资格：学部生（含日本人、外国人）。

名额：留学生8名。

金额：{ 第1种：相当于听课费全额及图书费(3.4万日元)。
第2种：相当于听课费半额及图书费(3.4万日元)。
第3种：图书费(5.1万日元)。

支付期间：1年

申请日期：4月

29. 庆应义塾大学大学院奖学金

资格：院生。

名额：留学生6名。

金额：第1种：学费、实验费等（3.8万日元）。

第2种：学费、图书费（3.8万日元）。

支付期间：1年。

申请日期：4月。

30. 国际基督教大学外国人学生奖学金

资格：学部生、院生中学业优秀但生活有困难者。

名额：20名。

金额：免学费或免缴半额的入学费、听课费。

支付期间：1年，可申请延长。

申请截止日期：5月末。

31. 上智大学（含日本人、外国人）

(A) 新入生奖学金

资格：以上智大学为第一入学志愿、入学试成绩优秀但经济有困难者。

名额：10名。

支付金额：相当学费的全额。

支付期间：1年。

申请日期：入学考试之前、申请入学时。

(B) 大学院新入生奖学金

资格：以上智大学为第一入学志愿、入学考试成绩优秀，但经济有困难者。

名额：29名。

金额：相当于学费的全额。

支付期间：1年。

申请日期：入学考试之前、申请入学时。

(C) 第1种奖学金

资格：由系主任推荐的优秀学部生。

名额：98名。

金额：5万日元价值的图书购买券。

(D) 第2种奖学金

资格：经济困难的学部生、院生。

名额：学部生265名，院生103名。

金额：学费的全额，或者学费的1/3—1/2。

支付期间：1年。

申请期间：11月上旬，新入生或留级生在6月上旬。

(E) 第3种奖学金

种类： 资格： 名额： 金额：

- 1) 大泉存 文学部学生 1名 7.4万日元(年额)
- 2) セントルイス・ファbund法语科学生 1名 9.9万日元(年额)
- 3) ンフィア・ブリタニカ英语科学生 7名 50万日元(总额)
- 4) 沼田拓实 化学科生 1名 7.4万日元(年额)
- 5) ライヤール・ド・シャルダン理工科院生 1名 40万日元(总额)

(F) ンフィア特别奖学金

资格：学部生、院生中进行研究活动者。

申请材料：有明确题目的研究计划，一年之内5项内容或论文等。

金额：总额10万日元。

32. 西南学院大学

(A) 外国人留学生奖学金

资格：由与之订立协定进行国际交流的外国大学校长推荐的学部生、院生。

名额：4名。

金额：月額学部生10万日元；院生12万日元。

支付期间：9个月。

申请截止日期：8月31日。

(B) 同窗会奖学金

资格：2年级以上、没有同时领取其他奖学金的学部生、院生中品学兼优者(含日本人与外国人)。

名额：10名。

金额：一年听课费的一半。

支付期间：1年，可申请延长。

申请日期：9月。

33. 拓殖大学奖学金（含日本人与留学生）

(A) 甲类奖学金

资格：学部生新生。

名额：第一种：10名；第二种：20名；第三种：30名。

金额：第一种：免缴学费和住宿费，并支給50万日元(年额)；

第二种：免缴学费；

第三种：免缴听课费。

支付期间：4年。

申请日期：11月1日—12月3日。

(B) 乙类奖学金

资格：学部生中符合下列条件者

①商、政、经学部2年级生上位12科目，3、4年级生上位8科目，平均分80以上。

②外语学部2年级上位14科目，3、4年级上位10科目，平均分80以上。

名额：留学生5名左右。

金额：同甲类奖学金。

支付期间：1年。

申请日期：4月21日—5月7日。

34. 东海大学留学生奖学金

资格：学部新生。

名额：15 名左右。

金额：第一种：相当于学费、听课费、杂费的总额；

第二种：相当于听课费；

第三种：相当于学费和杂费。

支付期间：1 年，可申请延长。

选拔时间：4 月中旬。

35. 同志社大学及同志社女子大学

(A) 外国人学生奖学金

资格：由研究科主任及系主任推荐的同志社大学及女子大学的院生及学部四年级生（限于台湾地区学生）。

名额：院生：1 名；学部生 2 名。

金额：年额：院生 10 万日元，学部生 5 万日元。

支付日期：10 月份。

申请截止日期：9 月。

(B) 新岛基金留学研修费

资格：由校长推荐的上述两校的中国大陆地区留学生院生。

名额：2 名。

金额：1) 研究奖学金每月 10 万日元；

2) 日本中国之间往返交通费一次；

3) 学费：学费全免；

4) 资料费：每月 2 万日元。

支付期间：2 年。

申请日期：随时。

36. 南山大学

外国人留学生别科学生奖学金

资格：留学生别科中品学兼优但经济有困难者。

人数：不定。

金额：减免听课费。

支付期间：1学期。

申请截止日期：12月中旬，5月中旬。

37. 法政大学

(A) 外国人学部留学生奖学金制度

资格：学部新入学生。

名额：2名。

金额：相当于学费、听课费、杂费的全额。

支付期间：4年。

(B) 法政大学奖学金

资格：成绩优秀者（含外国人与日本人）。

名额：留学生30名。

金额：年额：一部10万日元，二部8万日元。

支付期间：1年，可申请延长。

申请日期：6月。

38. 武藏野音乐大学

福井直秋纪念奖学金

资格：学部生、修士课程生的优秀者（含日本人与外国人）。

名额：院生30名，学部生65名。

支付金额：月額：院生1.7万日元。

学部生1.4万日元。

支付期间：1年。

申请期间：1月19日—2月24日。

39. 早稻田大学

大隈纪念奖学基金

资格：外国留学生的院生及2年级以上学部生。

名额：院生8名，学部生8名。

支付金额：大学院：修士1年级：相当于学费、听课费、杂费的全额另加15万日元。

修士2年级：相当于学费另加18万日元。

博士1年级：相当于学费、听课费、杂费的全额另加36万日元。

博士2、3年级：相当于学费另加36万日元。

学部：相当于听课费（文科34万日元，理科54万日元）。

支付期间：1年，可申请延长。

申请期间：4月中旬—5月中旬。

40. 亚洲经济研究所

海外客员研究员制度（只在日本国外申请）

地址：日本国东京都新宿区市谷本村町42番地

资格：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从事经济、社会、法律、政治、统计等专业研究5—6年以上并有博士学位者。要求有工作单位的推荐书2份以上，本人熟悉英语，同时没有领取其他奖学金。

接收机构：アジア经济研究所（亚细亚经济研究所）。

名额：10名。

待遇：1) 日本至该国来回交通费；

2) 研究费、生活费等 32.1 万日元—35.7 万日元；

3) 提供图书馆、研究室等。

支付期间：3—10 个月。

申请材料：1) 申请书；2) 研究计划；3) 推荐书 2 份。

申请期间：5 月与 11 月。

选拔方法：根据申请材料。

41. 鹿岛学术振兴财团

研究者交流援助

地址：日本国东京都港区赤坂 6—5—13

资格：在日本国内、国外申请皆可。分甲、乙两种研究人员，甲种为著名教授；乙种为院生以上者（30 岁左右）。均须有大学校长推荐。

授受单位：指定 15 所大学 37 个学部。

名额：甲、乙各 3—4 名。

待遇：1) 来回交通费；

2) 生活费：

甲种：每日 1.7 万日元。

乙种：每月 19 万日元。

3) 可用有关单位的宿舍。

支付期间：甲种 3 个月，乙种 1 年。

申请材料：申请书。

申请日期：9 月中旬—12 月 15 日。

通知：3月下旬通知申请人。

42. 国际交通安全学会海外研究者招へい助成金

地址：日本国东京都中央区八重洲 2—6—20

对象：以陆上交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人员。

限额：2项。

金额：每项 150 万日元，作为在日本的生活费和活动费。

申请材料：1) 申请书（5名以上连名申请的，其中必须有一个负责人）；

2) 日方接收单位（大学、研究所或学术会议）证明书。

申请截止日期：12月20日。

通知：3月底。

注：回国后一个月内要递交报告书，内容是有关研究活动和助成金的使用情况。

43. 国际交流基金フェローシッププログラム

地址：日本国东京都千代田区纪尾井町 3 番 6 号パークビル内

资格：在日本国内、外均可申请。

1) 甲种：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作家、艺术家等进行与日本有关的研究者；

2) 乙种：人文、社会学科的博士生，须在日本完成与日本有关的博士论文者。

上述两者须兼懂英、日语，并且不能同时领取其他奖学金。

接收单位：自由选择。

名额：65名。

待遇：1) 往返交通费。

2) 甲种：每月30万日元；乙种每月18万日元。

甲、乙两种的行李运费、图书费等也可报销。

支付期间：甲种：长期4—12个月；短期2—4个月。

乙种：14个月以内。

申请方法：申请截止日期为12月1日。日本境外申请者

可到日本驻该国使、领馆以及该基金会的海外

办事处申请。申请时须提出自己的研究计划。

44. 内藤纪念科学振兴财团

国内研究交流助成金

地址：日本国东京都文京区小石川4-6-10

资格：已获得博士学位40岁以下、经本人研究单位推荐者。限于与医疗、健康有关的研究。

名额：10名。

金额：头3个月月额10万日元，第5、6个月为40万日元。

支付期间：3—6个月。

申请截止日期：前期7月20日，后期11月20日。

通知：前期10月初，后期2月初。

注：1) 最后要写报告书。

2) 三年之后可以再度申请。

45. 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招へい研究者

地址：日本国东京都千代田区麹町5-3-1ヤマトビル
(人物交流课)

资格：1) 短期：著名的科学家；

2) 长期：青年研究人员。

名额：短期 190 名，长期 40 名。

待遇：1) 往返交通费；

2) 生活、研究费：短期：日额 1.8 万日元。

长期：教授级月額 30 万日元。

副教授级月額 27 万日元。

讲师、助教月額 24 万日元。

支付期间：短期：120 日内。

长期：6—12 个月。

申请文件：该会规格的申请书。

申请期间：前期 5 月份；后期 10 月份。

注：另外还有“两国间学术交流”；“发展中国家学术交流”等奖学金制度。

46. 野村学芸助成金

地址：日本国东京都杉并区高井户西 1—11—9 野村学芸财团

资格：在日本国内的研究者含日本人与外国人。人文科学方面主要从比较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艺术方面以音乐为主，绘画为次；自然科学方面，以理论的方法进行基础理论研究；教育学方面，以东西方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特别是语言学研究。

限额：15 项。

金额：每项 20 万日元。

申请材料：1) 申请书；2) 推荐书。

申请截止日期：2 月底，5 月底，12 月初。

选拔方法：根据申请书及申请者的研究情况。

通知：申请截止日期后两周书面通知。

47. 法政大学外国人研究留学生奖学金

地址：日本国东京都千代田区富士见 2—17—1

法政大学国际交流センター

资格：日本国内、外均可申请。具有修士或博士学位者，
年龄 35 岁以下，兼懂英、日语。

名额：3 名。

待遇：30 万日元作往返旅费，已在日本者只付给一部分。

金额：月額 17 万日元。

支付期间：6 个月—1 年。

申请材料：1) 申请书；

2) 主要著作或论文的副本或提纲；

3) 学历学位及研究成绩的证明书；

4) 申请者以往研究项目的指导者或合作者的
推荐书（要注明推荐者本身的现职、地
位）；

5) 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的副本。

申请截止日期：9 月 30 日。

通知：11 月 30 日前书面通知。

注：1) 可使用政法大学的各种设备；

2) 归国前要写一份报告书；

3) 不能以报酬为目的接受其他单位雇用。

48. 松前国际友好财团研究奖学金

地址：日本国东京都千代田区霞ヶ関3—2—5

霞ヶ関ビル33阶

资格：在日本境外申请。修士或博士课程修完者，年龄在40岁以下，兼懂英、日语。不能同时领取其他奖学金。自然科学、工学、医学研究者优先录取。

接收单位：自由选择，可与本财团协商。

名额：20名。

待遇：1) 往返旅费；

2) 入境安家费30万日元；

3) 研究、生活费：月額20—30万日元；

4) 住宿：与接收单位协商。

支付期间：6个月以内。

申请材料：下列材料均要英、日文各2份。

1) 申请书和照片4张(5×4cm)，要注明姓名、国籍；

2) 研究计划；

3) 以往的著作，论文的副本，或英、日文的提纲，并注明出版年月，出版社，合作者，装订规格，页数等，盖上个人印章；

4) 履历表；

5) 上级推荐书；

6) 本科、修士、博士课程的全部成绩表(英文)，及修业证明书；

7) 接受单位的长官或导师的意见书。

申请期间：12月为止。

选拔方法：根据申请材料。结果直接通知本人。

49. 吉田国际教育基金

地址：日本国东京都中央区八重洲 1—9—9 东京建物
(株)

资格：只在日本国内申请；申请者必须从事与日本有关的研究。

名额：不定。

待遇：往返交通费；研究、生活费 10—60 万日元。

支付期间：短期。

申请材料：履历书；推荐书；接收单位证明书；研究计划等。

申请日期：随时。

选拔方法：根据申请材料并面谈。

50. 日本国际教育协会学习奖励费

地址：日本国东京都目黑区驹场 4—5—29

资格：30 岁以下的学部 3、4 年级生。

名额：165 名。

待遇：每月 4 万日元。

支付期间：1 年。

申请日期：4—5 月份

51. 岩城留学生奖学会

地址：日本国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本町 4—1

イワキ株式会社内

资格：医、药、有机化学专业的学部生、院生。

待遇：月额 10 万日元。

支付期间：2 年。

以上各类奖学金，只有文部省奖学金的名额比较多。该奖学金的主要奖学对象是攻读学位的高层次学生，自费留学生能够获得的不多。自费留学生要想获得奖学金，基本得依靠其他类的奖学金，但是，那些奖学金所给予的名额都比较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日本的奖学金种类、层次虽多，但学习语言的留学生基本得不到。因此说，中国的大部分留日学生需靠勤工助学来维持留学生活，只有那些攻读高层次学位的留学者，才有机会获得奖学金的资助。

但不论怎样说，日本的奖学金制度毕竟为众多的学语言的留学生带来了希望，给一部分读学位的留学生解除了经济的后顾之忧，使他们可专心于学业，其作用可谓十分重要。

2. 帮助中国留学生的日本民间团体

中国留学生在日期间，不仅广泛地得到了普通日本人的帮助，还得到了一些民间日本团体的帮助。这些团体，有专门为留学生成立的团体，如留学生友之会；有中日友好团体，如创价大学中国研究会、日中友好加须市的市民会议等；有普通的日本民间团体，如熊猫俱乐部等。

日本民间团体对中国留学生的帮助是多方面的，如果归纳，主要的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组织中国留学生进行游览等活动。

日中友好加须市民会议组织中国留学生进行游览活动是非

常著名的。一位 1991 年公费留日的中国留学生，1982 年 8 月下旬参加了他们的游览活动，事后他是这样回忆这次活动的：

以梅泽一郎市长的夫人梅泽三保女士为会长的日中友好加须市民会议是当地的日中友好团体。为了大力开展日中友好活动，该团体这次邀请了近 40 名中国留学生去加须市访问了三天，住在热衷于日中友好的会员家中，充分体验了这一带居民家庭生活。我住在农民半田寅松家中，大体上了解了这里农民生产、生活情况。在加须市我们一起参观了农业实验场，手工工厂和学校以及福利设施。同市民会议的会员们进行了联欢活动。

在这里最使我们感动和钦佩的是梅泽一家对中国人的深厚友情。梅泽夫妇及其所有子女都非常热心于日中友好活动。在他家的带动下，加须市的市民们多与中国人有亲近的感情，梅泽一家对中国人有感情的历史很久，梅泽夫妇早在战前曾在我国大连居住过，长女清水佐知子就出生在大连。1986 年我访问梅泽家，梅泽夫人特意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上面拍照的是一位年轻姑娘手扶高山上的一座塔。看着那塔，我很眼熟，但一下子搞不清人是谁，塔是哪儿的塔。她看我实在认不出这张照片，便对我说：“这是我 1936 年从大连去你的家乡熊岳城旅游时，在望儿山上的留影。”我这时恍然大悟。1936 年正是我出生之年，50 年前的照片保存至今，也怪我认不出来，由此可见梅泽夫人对中国人的感情。

近十年（按：约 1981 年—1991 年）来，日中友好加须市民会议每年夏天都邀请 40 名左右的中国留学生去加须市民家中做客，或者由他们陪同去日光等名胜古迹游览。十年来他们

总计招待了四百多名中国留学生，加须市民同广大的中国留学生之间结下了难忘的友谊。其中尤其是梅泽一家同中国留学生之间结成了世代友谊。每年夏天一大批留学生访问加须市时，梅泽一家老少三代十几口人，都满腔热情积极参加接待活动。我们很多留学人员到梅泽先生家，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无拘无束。梅泽夫妇二位老人和他的儿女们不辞辛苦，不怕麻烦，热心为很多中国留学人员的子女赴日私费留学作经济保证人，这一点我深有感触。我的长子在北京高考落榜，不甘心在家待业，想要出国半工半读。但谁能给儿子作经济保证人，我拿不定主意，经过再三考虑，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给梅泽二位老人写了信，没想到二位老人爽快地答应作保，使儿子实现了赴日留学的愿望，并考进和光大学经济学部，攻读经济学。用儿子自己的话说：“如果没有梅泽老爷爷老奶奶的帮助，大概我一辈子也摸不着大学的门，真不知应该如何感谢二位老人。”^①

在这次游览活动的前一周，他还应长野县冈谷市国际亲善协会的邀请，同另外五名中国留学生组成中国留学生冈谷访问团，游览了冈谷市。他们受到了冈谷市市长林泰章、国际亲善协会会长林裕藏、副会长萨摩正等人的欢迎，该市的国际交流性团体——扶轮社和莱昂斯俱乐部的成员也接待了他们。为便于中国留学生与市民交流，安排他们分散住到了国际亲善协会会员的家中。

这位留学生，频繁被接待参加日本团体安排的活动，他是

^①田桓：《留日回顾》，载《留日归来忆扶桑》，第85—86页。

幸运的，因为他是“大陆新中国到东京大学大学院法学部来的第一个留学生”，他又是和普通中国留学生一样，不在少数的中国留学生可以享受得到这样的机遇。

第二，组织中国留学生进行补助性学习的活动。

创价大学中国研究会在这方面的活动比较突出。创价大学与中国多所学校有校际交流协定，每年都有中国留学生来这里留学。该校中国研究会是校内最活跃的学生研究团体之一，成员约有四五十人，来自文学、法学、教育、经营等几个学部，其指导教师山口和子教授，在中国东北长大，热心中日友好事业，曾被中国辽宁省铁岭市授予荣誉市民的称号。中研会以“中日友好架金桥”思想为宗旨，旨在通过研究中国历史与现状、学习中文，来了解中国，促进中日友好。来到创大的中国留学生，从到校起，便会受到中研会成员的关照，便会参加中研会为他们组织的活动。

每年4月第二周的星期日，是创大、也是中研会的盛大节日，这一天，中研会照例在校内举办“周恩来樱”观赏会，会上少不了邀请中国留学生参加。另外，中研会还常邀中国留学生参加他们的中国语辩论大会等活动。这些作为课余的补助性学习活动，极大地丰富了留学生的生活，其益处可以体现在各个方面中。

第三，同中国留学生进行交流性活动。

所谓交流，可以很宽泛地理解，许多活动都可以将其看成是交流活动之一。这里所说的交流，则是一种单纯意义上的交流。熊猫俱乐部就是一个注重交流的民间团体。一位1982年5月到东京大学进修的中国留学生是这样回忆他与熊猫俱乐部的

交往的：“在日本进修时，我参加过不少次日中友好团体的联谊会。在一次向中国留学生赠送日语教科书的送书会组织的聚会上，初次见到了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他的衣着朴实，他那对人热情诚恳的举止吸引了我，他就是坂田养藏先生。熊猫俱乐部是用通信方式交流感情增进友谊的中日两国青年人的组织，其中也有一些年长者。原来，坂田先生也正在与国内的朋友通信。当时，坂田先生正和另一位留学生交谈，我加入了他们一伙一起闲聊。谈话中知道，坂田先生住在埼玉县浦和市，在那里经营着一间不大的书店。由于他每天都和书本打交道，自然就培养起了喜欢读书的爱好。在读书中他爱上了中国文化，我想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成了熊猫俱乐部的一员。我和坂田先生的交往从那以后就不断了。不久，坂田先生和我相约，他从浦和市来到我当时的住地千叶县船桥市来看我。他给我带来的珍贵礼物是辞书《广辞苑》。我们就在船桥寮的宿舍里随意交谈起来，从我的日常生活到中国和日本的生活习惯、风土人情，无所不谈。坂田先生用我刚从同伴那里借来的两盘磁带听了当时国内流行的中国歌曲，大概是对中国文化的偏爱，他说他很喜欢中国歌曲，因为中国歌曲的旋律很美。那天我用事先就准备好的材料给他包饺子来招待他。本来我的手艺一般，但那毕竟是日本人在当地的中华料理里也吃不到的正宗的中国水饺，令他赞口不绝。这次会见使我更加感到坂田先生具有待人真诚的可贵品德，我们之间的友谊进一步加深了。”^①

^①屠世润：《真挚的友情——记几位日本友人》，载田桓 唐景芸编：《留日归来忆扶桑》，第328页。

中国留学生友之会是帮助中国留学生最多的日本社会团体之一。该会于1979年11月1日成立，会址设在东京都港区赤坂四丁目闹市街旁横川大楼301房间，有会员二三百人。该会的宗旨中称：“我们考虑到中国留学生为了学习和研究，要在日本逗留一年或数年。他们离开自己的眷属、亲友，肯定会有很多不方便之处，为此，我们成立以日本母亲为主要成员的中国留学生友之会。加上日本各界人士的援助，我们总会帮助中国留学生干点什么。譬如，让留学生看一看日本人的家庭生活，请他们欣赏一下日本的传统艺术，寒暑假时带他们去海边或山区进行参观游览，让他们养精蓄锐，迎接新学期的学习任务……。”

中国留学生友之会的发起人，多是日中友好事业先驱者的尊夫人、日本的母亲们，如已故前首相大平正芳的夫人大平志华子、已故前外相园田直的夫人园田天光光、日中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的夫人宇都宫辽子、日中协会会长茅诚司夫人茅伊登子、国会议员野田毅夫人野田绿、第一任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夫人小川嘉子等。她们都以慈祥的笑脸迎接中国留学生，热情为中国留学生安排各种活动，以便加深对日本的理解。以1984年为例，中国留学生友之会为中国留学生组织56次活动，留学生参加人数1994人次。他们组织的那些活动中，有很多是感人肺腑的。例如，在大平私邸举行的忘年会。正如大家所知，日本人最重视新年这一节日，正因为如此，新年前夕也是日本人最繁忙的时候。然而在百忙中，中国留学生友之会每年岁末，组织数十名中国留学生到大平私邸，大家围坐在大平志华子夫人周围，有说有笑，共同谈论着中日两国友好的前景，

并一起品尝她精心为留学生准备的美味佳肴，大家都争着与这位德高望重和蔼可亲的日本母亲摄影留念，度过那愉快而难忘的时刻。

忘年会一过，中国留学生友之会便开始准备一年一度工作量最大的新年会。为这一活动，每年岁尾就开始向有关团体、个人征集新年纪念品、工艺品、食品、文具等，然后分成数百份，放进写有“福袋”的纸提兜中，编上号码，新年会时让留学生抽签领取纪念品。听说这一活动前，动员了中国留学生友之会的很多人参加这项义务劳动。忙不过来时，中国留学生也去帮一把。新年会那一天，还请很多热心于中日友好的各界人士，他们与中国留学生欢聚一堂，畅叙友谊。

一位参加过中国留学生友之会活动的中国留学生充满深情地记述了几位中国留学生友之会成员的情况：

中国留学生能参加各种有意义的活动，不能不提到长谷部志峰子女士。她每天守在该会电话机旁，为中国留学生忙碌着。我回国之前，去中国留学生友之会致谢，受到长谷部女士的热情招待，我借机问她：你为中国留学生办了那么多好事，在那些活动中有何苦乐？她回答说：“我很高兴做这项工作，中国留学生来电话提出各种要求，如想调个房子，想得到某种资料等，我都一一记在纸上，将其贴在墙上，每当我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就把纸揭下收起来，这时有一种说不出的乐趣。他们寄来明信片、感谢信，我读后，对我是极大的鼓励和安慰，它们会使我把工作中的疲劳忘得一干二净”。

该会常任干事上野繁子女士是位热心人，她从事教育工作，多次陪同中国留学生参加各种活动。她常谈到：“我是教

师，接触不少学生。我深知学生是消费者，经济上不富裕，在异国他乡的中国留学生更是如此。所以在组织留学生活动时，我尽量为留学生着想，⁵⁹日本人脸皮薄，但为了使更多的留学生能参加活动，有时我是厚着脸皮让接待单位准备午饭，解决交通工具。当我看到留学生们踊跃参加活动时，我从心底里感到高兴。”

中国留学生友之会干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安藤阳子女士，是早稻田大学教授。从1984年4月，她在早大开设一个谈话室，主要以提高中国留学生的日语水平为目的，每月一次，请中国留学生轻松愉快地去喝茶，一边饮茶，一边用日语会话^①。

中国留学生友之会的事务局长是冈嶋昭治先生，他还兼东京都日中友协常务理事、东京太极拳协会副会长、社团法人日中协会评议员等职，一位中国留日学生这样记述他和中国留学生友之会：

我认识冈嶋先生是在我去东京大学进修不久，那是1981年5月的一天，我到东京不到一个月。那天，冈嶋先生来到我们居住的善邻会馆，又叫后乐寮。后乐寮是当时中国留学生比较集中的一个住所。当时寮里住着60多名公费、自费留学生和华侨子弟。他一到后乐寮，很多留学生在楼道里围着他亲切地攀谈，情景很热烈，我也围了上去。他对这里的学生都很熟

^①贾惠堂：《日本风土人情》，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77页。

悉。在谈话中他发现我是新来的，就说，听说最近来了几位新留学生，我因为忙于其他事务，没有及时来看望你们，实在对不起。一边说着，便来到了我的房间问长问短。……临走的时候他环顾一下我的房间，然后视线集中到我的桌子上。当时我并未留意。过了一些日子，冈嶋先生亲自开车，和夫人、小女儿一起把自己的一个铝合金桌子和转椅送来了。我这才明白那天冈嶋先生为什么注意着我的桌子。

……

在和冈嶋先生接触中，我逐渐对于他的工作和为人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对中国留学生和中国人民的深厚、真诚感情更使我感动。冈嶋先生原是日中友好协会成员。随着我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和改革开放，去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起来。1979年11月，冈嶋先生跟当时的东京都千代田区日中友协会员（现任日中协会事务局长）的白西先生商量，为了更好地有组织地开展支持和帮助中国留学生的活动，组成了中国留学生友之会。十几年来，他一直奔波于援助中国留学生的工作岗位上。担任中国留学生友之会事务局长职务后，他的工作更忙了。为了让中国留学生更好地了解日本社会，经常组织留学生参观工厂、报社、证券交易所、国会大厦，拜访社会活动家和名人等活动。有一次我问冈嶋先生能不能参观日本国会大厦，他说，我们正有这个打算。没过几天，他把参观的一切事宜联系妥当，领我们留学生去国会大厦。我

们不仅详细参观和了解了国会大厦情况，还旁听了众议员例会，目睹了会议上议员们进行争论的乱哄哄的场面。

中国留学生友之会还利用春、暑假组织留学生到富士山、江之岛、热海、镰仓等名胜地去游览。每次组织这种活动，冈嶋先生总是忙个不停。他们发动东京或地方的日中友协支部以及中国留学生友之会的成员，和留学生一起去。他们带着自己做好的拿手的饭菜来招待我们。这些旅游活动不仅为了观光，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活动加深留学生和日本人民之间的感情交流。旅游活动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留学生和日中友协成员混合编组恳谈会。座谈中日关系、日本社会问题、中国和日本历史等广泛内容，气氛极为融洽。他们还利用新年、樱花节、中国国庆节、春节等日本和中国节日，组织中国留学生和日本人民之间举办联欢会、恳谈会和演讲会，中心内容是围绕如何发展中日友好，互相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加深友谊。这些活动的准备、进行、结束经常是冈嶋先生忙前忙后。这些活动中冈嶋先生常讲，日中民间交流推动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实现邦交正常化后的日中友好关系的根基，仍然是民间交流和友谊。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活动推进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为日中友好添砖加瓦。他还说，不仅我们这一代珍惜日中友好，为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们访问中国或到中国观光时尽量带自己的子女去，让他们也了解中国，认识中国。

中国留学生友之会是个民间组织，活动经费有限，基本上是靠会员的会费和日本人民的资助来维持。但是，中国留学生友之会的活动开展得这样好，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这与冈嶋先生和全体会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们在日本人民中广泛宣传中国留学生友之会活动宗旨和目的，宣传中日友好，扩大其影响。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留学生友之会成立没多久，其组织就以东京为中心逐渐发展到全国其他地方。为了更好地开展活动，每年都召开中国留学生友之会总会，还发行中国留学生友之会会报。召开总会时邀请留学生代表参加，一起总结一年来的活动，制定来年的活动计划。我在东京时曾参加过第三届总会。出席会议的有茅诚司夫人茅伊登子、园田直夫人园田天光光等 30 名会员。会上茅夫人说，我们中国留学生友之会的活动逐步走上了轨道，但还不能充分满足留学生的期望。望诸会员给予更多的协助。冈嶋先生作了 1981 年度活动及收支、决算报告，并提出了 1982 年度活动计划及预算案。我从冈嶋先生报告中深深体会出：他们是在经费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为了中日友好，为了中国留学生，怎样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颗火热的心。^①

^①金相春：《留学生之友——冈嶋昭治先生》，载田桓 唐景芸编：《留日归来忆扶桑》，第 227—230 页。

中国留学生友之会确实是一个帮助中国留学生非常多的团体。他们为中国留学生组织运动会、音乐会活动，组织各种各样的参观活动，仅一位中国留学生就在他们提供交通费用的情况下参观游览了下列地方：东京的日本国会议事堂、东京证券交易所、日本广播协会、东京港、葛饰区垃圾处理厂、日产座间工厂、新日铁若津钢铁厂和埼玉县的果园、水产养殖场等。^①

正因为这样，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很多人知道冈嶋昭治和中国留学生友之会，并且怀有无限的深情。

日本社会民间团体对中国留学生的帮助，给留学生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和安慰，为留日运动谱写了美好的一章。

3. 留学成就引人瞩目

70年代末再兴的留日运动，既有对以往留日运动的继承，又有新的历史阶段的发展。既然有继承，便发扬了以往留日运动的优良传统；既然是发展，便作出了新的探索。在继承和发展中，这场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并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切实的基础。尽管这一阶段运动仅经历数年时间，初步看来，这一阶段的留日运动还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收获。

第一，中国留学生赴日后日语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这是留学生中一种普遍现象，是留学生知识水平提高的一个标志，是留学日本取得的第一个成就，也是留学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公派的留学生和直接进入专科以上学校学习的自费留学生

^①田桓：《留日回顾》，载田桓 唐景芸编：《留日归来忆扶桑》，第80页。

是如此，先进语言学校学习日语的自费留学生也是如此。他们到日本后，已不局限于只在学校课堂上学习日语，社会成了他们学习日语的大课堂。在这种环境中学习日语，其成效要比在国内学日语快几倍。对在语言学校学习的自费留学生来说，衡量他们日语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外国人日语测验。这个测验，是在日本的自费留学生全国统一考试的一个组成部分，每年举办一次，测验分为4个级别，考取1级，可以作为进入大学本科的一个参考依据。在日本，每年都有很多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外国人参加这项测验。

第二，中国留学生赴日后学习能力和学业水平都有了较大进步。1985年考入日本东洋大学的一名中国女留学生，在课堂上听到日本老师讲了这样一段话：“什么叫大学生？……他们的学习是主动的、自觉的、独立的，不需要依赖任何人，只需凭藉学校为他们提供的一切有利条件，按照自己个人设想的方向去充实自己、造就自己，……大学老师从你们的考卷中”，“希望更多地看到你们独立的思考、探索和新观点。”^①在大学里留学生是按照这样方法学习的；在语言学校里，留学生更是主要依靠自己来进行紧张的学习。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留学生们的学习能力必然有很大提高。另外，留学生学业水平的进步，从他们获取奖学金的情况即可见一斑。日本奖学金主要有三种：一是文部省奖学金以及学习奖励费；二是地方自治体以及各大学提供的各种形式的资助；三是民间团体以及企业发放的奖学金。获取奖学金，标志着发放奖学金的机构对留学生学

^①小草：《日本留学一千天》，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156—157页。

业水平的肯定，同时也是社会对留学生学业水平的肯定。获得各种奖学金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众多。例如 1983 年 3 月，一名中国留学生取得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每月 38 万日元的较高额奖学金，并以基金会研究员的身份入日本大学艺术研究所从事研究。再如有一年在日的外国留学生共有 22154 人，获得各种奖学金的有 6891 人，占总人数的 31.1%，其中获得教育部奖学金的有 3458 人。在 3458 人中，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占 20.2%，其次是南朝鲜、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①。在语言学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学业水平进步的标志之一，还体现在参加日本自费留学生全国统一考试上。这种考试每年举行一次，目的是供准备报考大学本科的留学生入大学时校方作参考。从 1984 年起，这种考试更趋于完善，分别按文科和理科各自的基础科目来举行。

第三，中国留学生赴日后，吃苦耐劳的品质在留学这一特殊经历中，得到了新的磨练和提高。日本“这个国家堪称发达，堪称富裕，但它远远不是人间天堂；自费留学生活，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苦斗，酸、甜、苦、辣，百味俱全。”^② 这是一位 1984 年春自费留学日本，次年考入东洋大学，以后又入东洋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日本文学的中国留学生，所写下的一段深有感触的话。中国留学生孤身赴日，公派的还好些，自费生赴日本后，面临着打工、住宿等方面的问题。不论他们年龄多

^①项说：《中国公民出国法律指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第 421 页；金戈：《如何领取奖学金》，载《日本展望》1989 年 11 期，第 19 页。

^②小草：《日本留学一千天·序》。

大，不论他们在国内时的经历如何，他们全都有一番艰苦创业的经历，就在这酸、甜、苦、辣的经历中，他们体现与弘扬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优良品质。

从中国到日本的距离不远，但这是一个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多中国留学生一踏上日本国土，往往为接踵而至的种种困难而缠绕。一般地，他们为了交付学费和支付生活费，都很快寻找打工的机会，他们从事的工作名目繁多，诸如商店营业员、饭店服务员、清洁工、搬运工、家庭教师、刷盘子洗碗、送报纸等。要学习，也要打工，为此，很多留学生在日本往往一般是早晨5点起床，晚上12点以后才能入睡。打工的生活是艰苦的。如送报纸，在5点左右就得起床，人们上班之前要把报纸送到每个应该送到的家庭，要风雨不误，该几点送到就要几点送到，稍晚一点就得向读者道十二分的歉。楼梯一级级地爬，路一段段地走，此种苦楚，没有坚强的毅力是难以承受的。中国留学生从事最多的工作是在餐馆刷盘子，当服务员。留学生一到日本，基本都是先从餐馆工作干起，以后找到挣钱多一点的工作，再辞掉餐馆工作。刷盘子一般是每小时600日元左右，做服务员工作的，一般可以多挣一点。需要强体力的工作，如建筑工地等，多的每小时可挣1000日元，若是能够遇到教日本人学中国语的机会，则是“福星高照”了。忙碌一天，精疲力尽，有的留学生说，每天不是走着回家，而几乎是爬着回家的。

住宿是留学生遇到的又一大问题。日本出租房屋的很多，留学生能租起的，大都是条件不好的房子，绝大部分没有卫生间，没有厨房，通风不良，冬天很冷。有单独租，也有合租

的。月租一般为1—3万日元，租房时，先要交相当于5—6个月的房租钱，其中包括：通过房屋介绍所的，要交付相当于1个月房租钱的介绍费；向房主交1—2个月的礼金；向房主交1—2个月的押金；向房主交第1个月的房租。这是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钱。这样的房子，无洗澡条件，为了节省到外边洗澡的几百日元，很多留学生只能弄点热水在屋里擦澡。留学生在房间里安上电话的也有，但并不很多。总之，一切困难，他们都坚持了过去，在艰苦的留学生活中，中国留学生显示了一种坚强而高贵的品质和奋斗精神。

第四，中国留学生赴日后，对日本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另一方面提高了人们的现代意识。在中国大陆，人们对现代化缺少感性知识，往往是一知半解。中国青年留学日本，在具有现代化文明的日本社会中学习与工作，加深了对现代化的理解，意识上发生了深刻变化，缩小了他们与现代化文明的距离。正如同20世纪前半期中国人留学日本归来后，对中国的经济技术与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样，80年代留日学生学成归国后，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也会逐渐显现出来。

第五，这场新的留日运动，对于促进中日交流，推动中日友好，也有重要意义。日本《产经新闻》经过调查，“称中国留学生‘属于优秀分子集团’。他们当中，男性以开拓大度，具有远见卓识者居多；女性则以人品出众，善于独立思考有独立见解者为主，其中包括众多优秀的工程师、科学家、艺术

家、运动员。”^① 这些“优秀分子”，每一位都是中日两国友好的使者，他们经过在日本数年旅居，广泛接触了日本各个阶层，增进了中日两国人民相互间的了解，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和交流架起了又一座新的桥梁。80年代初，中国自费生留学日本所找的日方担保人，往往是留学者本人的亲属或朋友。随着自费生的增加，担保人范围超出了一般亲属与朋友关系，出现非直系关系也为中国留学生做担保人的现象。这从更广泛范围内加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往来与了解，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具有积极作用。

另外，这一时期的中国留学生，在学业上和一些专业领域也取得了较突出的成绩，这一点尤其令人瞩目。取得突出成绩的，有公费生，也有自费生；有男留学生，也有女留学生。

母晓东和程明都是这一时期第一批赴日的留学生。母晓东，男，辽宁台安人，1956年生，1979年在吉林大学外语系学习，1979年4月赴日本，次年考入创价大学，在经济系经济专业学习，1982年3月获经济学学位，随即考入该校经济学研究科深造，1983年3月通过《中国经济模型研究》论文，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在论文中，他根据经济学的普遍原理，通过大型电子计算机的演算，对中国经济结构进行分析，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进行了具体的预测^②。程明，女，江苏常熟人，1942年生，1979年赴日留学，回国后取得多项重要科研成果，1991年获“全国有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称号。她说：

^①孙伟：《中国社会大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68页。

^②《神州学人》1987年2期，第34页。

“回国之前，考虑的是如何把在国外学到的知识技能同国内需要结合起来，同时搜集有关的文献资料，购置必要的试剂和物品等，以便回国后开展新的课题研究。”^①

林行刚也是1979年赴日留学的，归国时他已获得了博士学位。他是江苏吴县人，1946年生，1978年考取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研究生，1979年由教育部派送去京都大学工学院信息工程系学习，1982年获工学硕士学位，1985年获工学博士学位，1986年4月回国。他的硕士论文《画有编辑和订正符号的文书图像的配准和处理方法的研究》，博士论文《用提高可靠信息的优先度实现工程图纸的图像理解》以及其他有关数字图像的处理和识别方面的十几篇论文，均在日本和美国的国际性学术刊物上发表，部分论文还被编入日本正式出版的信息基础教材习题集^②。

京都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在博士课程期间获得经济学博士的，是中国留学生张风波。他1980年1月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并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同年10月留学日本，在京都大学等主攻经济政策学和计量经济学，先后获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并被聘为京都大学客座教授，他还是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留日学生中第一位文科类的博士^③。

在专业领域取得成功的中国留学生也大有人在。他们有在音乐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有在美术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有

①《神州学人》1992年4期，第22页。

②《神州学人》1989年6期，第23页。

③《神州学人》1987年1期，第36页。

在体育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汪芜生是在摄影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1980年8月，35岁的汪芜生自费赴日留学。到日本后，他先在东京歌舞伎町斜对过的一家中国菜馆打工。第10个月的时候，他忍受不了那种单调、乏味又遭人嘲讽的打工生活，这时他也病倒了。此时，日本著名的《朝日画报》以7整页的篇幅刊登了他在国内时拍摄的12幅黄山摄影作品，这些作品一刊出，在日本的摄影界、美术界引起了关注，有日本画坛五泰斗之一称誉的著名画家加山又造先生，被那些作品所吸引，亲赴中国一睹黄山。归国后，他发表了《黄山云涌》、《黄山霖雨》等作品，并注明是受了汪芜生的黄山摄影作品影响而创作的。东京艺术大学的茂木计一郎把汪芜生的五张黄山影作放制成长4公尺，宽2公尺的巨幅照片，当作了装饰横滨的那座已经有400年历史的古刹劝行寺新落成的画院内室及本堂大厅内的障壁画。日本NHK广播协会及其他报纸，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这些消息，介绍汪芜生的作品。

初步的成功没有使汪芜生满足，他想争取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奖学金，并以基金研究员的身份到日本大学艺术研究所从事艺术研究。按日本文部省规定，申请国际交流基金并从事研究，需要三位教授级以上名人推荐。日本摄影家协会会长渡边义雄和东京大学艺术教授茂木计一郎答应作他的推荐人。1982年11月末，为找第三个推荐人，他冒闯了中国驻日使馆。宋之光大使把他看成是中国留学生的杰出代表，欣然介绍东京大学校长茅诚思先生作了他的推荐人。

1983年3月，汪芜生取得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研究员的

身份，入日本大学艺术研究所研究摄影艺术，每月得到 38 万日元的奖学金。这个奖学金虽只得一年，但其奖金额却是颇高的，一般的奖学金都要比它低很多。

不懈的追求，终于换来了更丰硕的成果。1988 年 6 月 17 日，由西武财团主办，面向日本贵族阶层的高档艺术作品展销会，在东京都高级住宅区附近豪华的高轮王子饭店举行了。这次展销会，被称为是世界上最精美、最昂贵的展销会，展厅内每幅屏风的价格都在 100 万日元以上，最贵的达到 200 万日元。汪芜生的影作独占一个大厅。汪芜生说：“我没有非份之想，我也不愿意产生这种念头。我想，这个世界能承认摄影屏风这种摄影艺术的表现形式，并且会有人出那么高的价格去购买，从而使我的黄山摄影作品能走进人们的家里，并让那么多人知道了中国的黄山之壮丽景色，……能做到这几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日本的摄影界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世界，它的摄影艺术水平确实领先于其他的国家，外国人的作品，能在这里被日本人承认，是非常之难的。”^①

1988 年 8 月，西武美术馆为汪芜生举行了题为“黄山幻幽”的黄山摄影作品展览；日本最大的出版社讲谈社出版了他的黄山专题影集。

汪芜生无疑是中国留学生中的成功者。他的经历，表明了自费留学道路艰辛、取得奖学金不易，更主要的是表现了中国留学生不倦的追求。从像汪芜生等人这批留学生的身上，会发现留日运动的意义之所在。

^①吴民民：《中国留日学生心态录》，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年，第 167 页。

4. 中国留学政策出现新的迹象

这一时期，新的留学国策刚刚确定，具体的留学政策制定尚处于初步阶段。

这一时期，中国对留学生工作，有两种迹象已经初步显露，一是鼓励学成人员及时归国参加国内的科学研究、文化建设及经济建设活动，二是将对已有的留学政策作些根据实际需要的调整。

这一时期，国家教育部（教委）向各国派出的公费留学生和回国的公费留学生情况如下：

年份	派出人数	回国人数
1978	860	248
1979	1777	231
1980	2124	162
1981	2922	1143
1982	2326	2116
1983	2633	2303
1984	3073	2290
1985	4888	1424
1986	4676	1388
合计	25279	11305 ^①

^①《中国教育年鉴》（1990），第16页。

从1978年到1986年的9年间，自费留学和其他公派留学不说，仅教育部（教委）派出的公费生，归国人数比派出人数就少13974人，归国的仅占派出的44.7%，这一比例相差十分悬殊。再从1981年的情况看，派出2922人，这一年至1986年的6年间，哪一年回国的人数都没超过这个数，五六年的时间，绝大部分留学生都应该在国外完成了学业。再从1984年至1986年3年的情况看，派出人数与回国人数更是相差悬殊。

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中国方面的重视，因为派遣留学生出国，目的就是让他们学成归国后为国家服务。所以，这个时期内，中国各个方面都对留学生采取了热情的态度，对他们在国外的留学生活给以关心，对他们毕业回国工作给以积极的支持。

按照人们的估计，从1984年秋天开始，1978年后派出的首批留学生应该陆续回国。1984年新年前夕，胡耀邦、赵紫阳、彭真和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留学人员发表了录像讲话，向他们表示亲切的问候和节日的祝贺，勉励他们把一切先进的科技知识学到手，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这是多少年来少见的，也是在国内学习的大学生、研究生享受不到的殊荣。

1985年新年前夕，由教育部、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组成的中央、国务院慰问留学人员代表团分四路出发，前往日本、朝鲜、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比利时、荷兰、瑞典、奥地利、意大利、法国、苏联、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瑞典、挪威、丹麦、联邦德国、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等21国，对在这些国家的留学人员表达中央的亲切关怀和慰问。代表团出发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接见了全体成员，并做了重要讲话。代表团每到一地，都向留学人员宣读贺信，并回答他们关心的问题。

另外，国家及有关方面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

1985年7月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在国内试办博士后科研活动站。凡博士后研究人员每人每年日常经费为1.2万元人民币。另设博士后科学基金，以鼓励博士后研究人员中有科研潜力和杰出才能的优秀人员。活动站管理协调委员会规定，各建站单位在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时，应优先吸收留学回国的博士。

1985年8月，国家首次批准中国科学院所属的理论物理、数学研究所和17个研究实验室对国内外开放，可容纳相当数量的客座流动研究人员，为归国留学人员又提供了一个研究园地。

1986年2月，国务院宣布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面向全国，资助从事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的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并规定出国留学人员在国外同样可以申请：在国外学习、进修，符合资助条件的青年科学工作者，可在回国前提出申请，获准者，回国落实工作单位后，予以资助，批准有效期一年。规定申请者具备的条件为：（1）年龄在35周岁以下；（2）已取得博士学位，或具有同等水平，能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等。该基金1986年共资助3432项，资助总金额近1亿元。

1986年，中国科学院设立中国科学院青年奖励研究基金，面向全院、面向全国进行资助，该基金采取一次性拨款形式发

放，获得资助者可在使用范围内自由支配，可跨年度使用。该基金建立的 1986 年，即资助了一些正在国外做博士后研究工作或进修的青年学者。

与国家采取措施的同时，各地方也试行了自己的办法。

1985 年，山西师范大学建立起同留学生、出国进修生联系的通信制度，定期向他们介绍国内建设成就，报告他们家里的情况。至 1986 年 5 月，学校已给留学生等发信 200 多封。

1986 年 3 月起，大连工学院设立留学回国人员座谈日，每周一下午 3 时至 5 时，院领导在院长办公室同留学回国人员对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为他们排忧解难。

以上种种情况都表明，中国政府及社会各界为招引留学生回国，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

努力归努力，其效果虽有，但留学生回国情况仍不尽如人意。大概是出于对留学工作的检讨，从几个方面传出了留学政策将作调整的信号。

1986 年 10 月 24 日，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教委主任李鹏在中南海紫光阁对一批美国学者说：中国今后将根据自己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需要的原则来调整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政策^①。

同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派遣留学生工作进行了专门讨论。12 月 13 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教委 12 月 13 日制定的《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这一规定，次年 6 月 11 日才正式公布。公布前，海内外已有传闻，称中国派遣

^①陈颖：《出国·出国》，第 96 页。

留学生的政策要改变。

1986年底，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教委主任李鹏在中南海接受新华社记者访问，就原有留学生政策的评估和新的留学生政策等问题全面地发表了意见。

李鹏强调，中国派遣留学生的政策不会改变。他说，派遣留学生，不是一项权宜之计，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这个政策要长期坚持下去，通过各种形式派遣留学生的政策也就不会改变。

对派遣留学生工作的得失，李鹏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先后派出（即公派）3万余人出国留学，还有一批人员自费出国留学。根据派遣计划和要求，目前已有1.6万余名公派留学人员学成回国。应该肯定，这几年派遣留学人员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吸收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提高人才素质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绝大多数出国留学人员在国外学习期间的表现是好的，勤奋好学，成绩优良，尊重所在国的法律，尊重其社会习俗，和那里的人民友好相处，不少人在科研工作中还有所创新和突破，受到了国内外的好评。

他说，派遣留学生所选择的学科与专业紧密结合国家建设的需要不够，有些学用脱节，再加上其他方面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以致影响了留学人员回国后作用的充分发挥。

李鹏强调，即将实施的留学政策，注重按需选派，保证质量，学用一致。过去公派留学人员在学科选择上不尽合理，理论性学科，如数学、物理，相对而言，派的人多了些；而国家建设需要的应用、管理等学科，人又少了。有的人研究的课

题，不是中国实际急需的，学成回来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李鹏强调：(1)按四化的需要派遣，重点加强应用学科、管理学科的派遣；对理论学科，还要继续给予足够重视；社会科学、文化艺术方面的留学人员，也要适当增派。(2)调整公派留学人员去往国家的分布比例，国家不分大小，都各有长处。(3)公派留学人员着重派出进修人员、访问学者，除学习语言和个别特殊学科，一般不派本科生；适当减少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增加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4)出国留学人员的招生办法进行改革，大部分公派出国研究生由用人单位派出，小部分由国家掌握。

对自费留学人员，李鹏说，要像对待公派留学人员那样给他们关心与爱护，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鼓励他们学成回国，获得学士学位以上的回国自费留学人员，国家在回国旅费和国内安家费将给予帮助；在分配和使用上，将和公派人员一样对待^①。

尽管李鹏承认，即将实施的留学办法，有的地方松了一些，有的地方严了一些；尽管他认为，严不等于政策收缩，宽不等于政策放松，但人们毕竟从他的谈话以及其他种种迹象判断出，中国的留学政策在具体的实施办法方面确实将要有所变动。

^①陈联 李少山：《李鹏谈改进派遣留学生工作》，载《瞭望》1986年51期。

第 二 章

中国大陆掀起“留日热” (1987—1989)

第 一 节

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赴日留学高潮

1. 自费留学生中就学生大量增加

就学生一词，是日本独创，并为日本独有的一种现象。它是随着外国人留日人数不断增加而出现的。“按日本出入境管理局规定，在未进入大专院校之前而在各类日语学校中学习日语的外国留学生被统称为‘就学生’，‘就学生’不具备留学生资格，无权享受日本政府对留学生提供的各种优惠待遇，不能申请奖学金，留日期限不得超过两年，而且必须半年办理一次

签证延期手续。”^①

根据日本法律规定，每个外国入境者都要由法务省入国管理局审查其入境的居留目的，并在签发入境签证的同时，据此在护照上标明居留资格。一旦入境，不得从事与其居留资格相悖的活动，否则将以违反入国管理法论处。在签证上，就已将就学生与一般的留学生相区别开来，就学生持4—1—16—3签证，一般留学生持4—1—6签证。就学生的居留待遇最受限制，管理也最灵活。在灵活的管理中，就学生往往又受到了更多的限制。留学生办理延期签证，一般比较顺利，对就学生，要严格的多。他们办理延期签证时，除要求他们出示在学证明和保证人证明外，还要求提供校方签发的出勤率证明和对本人的在校表现评语。

有报载：“据日本有关部门统计，1986年来自中国的自费生为2126人，1987年为7178人，截止到1988年8月，已增至19349人。”^②这里所说的留学生，尚不包括就学生。另据日本法务省入国管理局1989年7月30日在两年一度的《外国侨民统计》中公布，截止1988年12月底为止，在日本居住90天以上并作为外侨登记的中国学生，共有51030人，其中包括日本语等各种专科学校学生35388人。

就学生已占留学生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达到35388人，这是十分可观的数字。就学生大量增加，壮大了留日队伍，使得更多的人走出了国门。就学生在日语学校中学习，学习结束后可以报考日本的高等院校，从而改变资格成为一般意义上的留

^{①②}陈志江：《赴日留学面面观》，《光明日报》1988年11月30日。

学生。但是，由于就学生成分复杂，人数最多的留学队伍给新时期的留日运动带来了复杂的内容。

就学生中有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或本来就不想升入大学或专门学校，只是打工挣钱，使得就学生就含有了打工生的意思。有一个就学生算账说：“我们为入学花的三四十万日元不说，加上来时的旅费，到后租房的礼金、押金、给不动产商人的手续费和预付的一个月房租，几乎都是倾家荡产，甚至还要借债。在东京打工就算每周干40小时（法务省规定20小时），每小时平均700日元，每月不过能挣11万多一点。扣除学费、房租、饭费、杂费等，每月剩下的还不到4万，而且还都是按最低生活标准计算的。这样，我们前半年剩的钱都得用来还债或挣回老本，后一年多的时间好不容易存下个五六十万，大学是根本不敢想，就是进专门学校，最低学费也得45万以上。如果真的升学，就又要成为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万一有病怎么办？”^①

据有人对几所日语学校的采访和同近百名就学生交谈调查，他们来日本，有半数左右完全是为了赚钱；另有30%的人是想上大学、读研究生或者学习日语，同时也想挣点钱^②。

这样，就学生中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相当一部人成了变相的劳动者，二是想赴日考取大学的一批人，由于日本社会给予他们的帮助少，正常留学生的待遇得不到，使他们陷入了打工和学习的两难境地，强挺下去，只能是两者皆有损失。

^{①②}林小利 冯朝阳：《就学生的酸甜苦辣》，载《跨越国界的男女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年，第299页。

1988年，日本“D·F·W”沙龙组织赠送一笔奖学金给一名叫夏雨的33岁女留学生，据说，这是日本的社会团体“第一次把奖学金提供给一个还没有进入大学和大学研究生院的语言学校的就学生”。^①夏雨1987年10月赴日本，进入东京太平洋日语学校学习日语，同时又准备资料写法律方面的论文，做每小时650日元的打工。1988年4月12日，她留日半年纪念日的这天，她获悉母亲已在国内去世。她病倒了，又坚强地爬了起来，继续学习与打工的生活。她的经历被日本《产经新闻》社会部的记者野口裕之获得，进行了连续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反响，夏雨的经历也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同情，于是由日本国联东京妇女会常务理事河野爱子女士担任会长的“D·F·W”妇女沙龙组织赠给了夏雨一笔奖学金。

夏雨的事例，表明日本社会对就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已有所重视。然而，不能不看到，绝大多数就学生的情况依然是很困窘。

一位中国常驻日本的记者对就学生的情况有个综述：“‘就学生’数量大，成分复杂，日语水平参差不齐，来日目的也千差万别。他们之中确实不乏负笈海外、探索从事四化建设所需知识和本领的学子，但怀着其他目的来日的也大有人在。例如，有的想借东渡留学之名以镀金抬高身价，为将来回国调动工作或改变社会地位创造条件；有的则是因在国内高考中名落孙山而不得不改道日本谋张文凭；有的是想付点学费，增长见识，亲身体会一下资本主义世界的生活；有的则是‘就学生’

^①吴国民：《中国留日学生心态录》，第123页。

名义下的‘就劳者’，目的在于打短工、挣外块；有的则是为出国浪潮所裹挟，连自己也讲不清楚是何而来，……部分‘就学生’因来日目的不明，生活自理和社会应变能力较差，对日本社会严酷的现实缺乏认识和思想准备，生活方面的重负，精神方面的苦恼，时刻在折磨着他们，自杀、精神失常、病退或犯罪者时有发生。而经过千辛万苦的跋涉，真正能升入大学的只占6%—10%。”^①

就学生问题，是留日运动中的复杂问题。日本政府为此也曾做过很多努力，但一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直至延续到90年代中期。

2. 留日运动兴起最大的高潮

纵观中国大陆70年代末、80年代初再兴的留日运动，可以明显地看到以1987年为界分成两个阶段。1987年以前的第一阶段，留日人数逐渐增加，运动呈平稳发展之势；1987年出现“留日热”，以后为留日运动的第二个阶段。“留日热”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自费生人数激增，并远远地超出公派留学生人数，成为参与留日运动的一支最重要力量。所谓的就学生不计，1986年在日的自费生为2126人，1987年为7178人，1988年8月即达到19349人，可以看出，1987年明显为一界限，这一年自费生人数猛增，是1986年的3.38倍，1988年8月是1986年的9.1倍。1988年底，中国在日的所有留学生（包括就学生）达到51030人，从而中国成为在日本留学生人数最多

^①陈志江：《赴日留学面面观》，《光明日报》1988年11月30日。

的国家，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留日运动宣告出现。

这场留日运动的高潮能够出现，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中日两国科技、经济存在巨大的差距，日本的现代科学知识和管理经验值得中国人学习，日本的经济环境令中国人羡慕。

这场留日运动，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人数迅增，最多时每年以数倍的速度增长。第二，声势浩大，不到10年，这场运动的规模已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次留日运动，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留学日本第四次、也是最大一次留日高潮。1988年51030名中国留学生人数，是历史上留日运动最高峰1906年7285名的7倍多。第三，年龄悬殊，既有十几岁的高中生和本科生，又有40余岁的老高中毕业生等。第四，成分多样，既有毕业或未毕业的学生，也有具备一定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及各行各业的人才，还有个体户和农民。

兴起留日运动并发展成“留日热”，是多种因素促成的，除以上所举之外其原因还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一政策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措施，是中国奉行的一项基本国策。这一政策体现在文化教育交流上，就是国家提倡和鼓励青年出国留学，包括自费出国留学。这种政策保证和促进了留日运动的健康发展。

第二，日本政府接收留学生的政策。1982年中曾根出任首相后，为把日本建设成为“文化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占有更大的地位，积极推行接收世界各国留学生的政策。日本教育

部门宣布要在 21 世纪初把留学生增加到 10 万人。1983 年成立的日本国际大学，计划到 1988 年在校学生中要有 40% 是外国留学生。日本的这一国策，为中国人赴日留学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正是日本采取积极吸引留学生的政策，使中国留日运动持续发展。

第三，中日友好关系。1972 年中日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1978 年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促进了两国友好关系长期稳定地发展，人员互访和经济贸易往来迅速增加。1979 年 12 月，中日签订了文化交流协定，各种文化的交流与互访也空前活跃起来，到 1984 年底，中国有 60 所高等院校与日本 50 多所高等院校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随着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也逐渐加强。这一切都为留日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四，中国青年放眼世界的现代意识。80 年代，中国人中流行的口号之一是“改革开放”与“走向世界”，青年人把赴日留学当成是走向世界的一种途径。他们认为留学日本可以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可以开拓视野，增长见识，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建设，同时也可以充分地实现自身的存在价值。

第五，文化方面的原因。中日两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关系，日本文化较之欧美文化，对中国人来说较少陌生感与恐惧感。中日民族同属黄种人，也成了一部分人留学日本所考虑的因素。走在美国的大街上，一下就可以被认出来；在日本，只要不说话，经常会被当成是日本人。

第六，地理方面的原因。较之美洲、澳洲等，中日之间路途近，机票费用对于一般的中国人来说容易承担得起，回国探

亲也容易成行。

第七，历史方面的原因。这场留日运动，不是突兀产生的一场运动，它是历史上中国留日运动的继续。正因如此，这场运动更易为中国人民所接受，也为中国人联系学校、寻找保人以及学习、生活等创造了方便条件。

除以上列举的7种原因外，还存在着其他原因。如去日本留学，介绍等项费用有的可以用人民币支付，对于手中缺少外汇的众多中国人来说，这也可以算作是一个方便条件。正是在各种各样有利条件作用下，留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很多青年人见面，言必称留学日本。

当然，东渡日本的中国人，在他们东渡之前或抵达日本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也呈现出了各种各样的“面孔”。归结起来，至少有下列12种类型。

(1) 委派型。这一部分人，主要是公费留学生。他们为了完成本单位或上级部门等分配的任务而留学日本，其中不乏属于积极、努力争取得到机会的。

(2) 深造型。日本高度发达的现代科学与技术，是吸引具有强烈爱国心的知识分子出国留学的主要因素之一。

(3) 见识型。有的人认为现代人把自己看成是在“地球村”生活，一生只是囿于在中国这960万平方公里中，是坐井观天，于是走出了家门。一位记者说：“我没有别的目的，就是觉得身为记者，应该有更广阔的见识、视野，感受得越多越好。”

(4) 观望型。有的人感到国内一方面是人才短缺，一方面又大量人才积压，学有所长的人难以施展才能。故先出国留

洋，待机会来临再归国效力。

(5) 解脱型。一些知识分子自我苦于国内某种沉闷，学无所用，“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窝里斗”现象严重，又不甘在此种环境中耗费生命，因而出国东渡以求所谓“解脱”。

(6) 镀金型。有的高考未果和没有机会进入高等学府的“老三届”，期望出国去取得一张文凭；有的受过高等教育、取得过学位的知识分子，想再得一张在人们看来更有价值的洋文凭。

(7) 赚钱型。在有的人看来，日本工薪高，挣钱易，一小时可挣 600 日元，一天就可挣得在国内一个月的工资，几年回来，家用电器全有，还可带回外币，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把留学日本看成是“洋插队”。

(8) 跳板型。有的人看出，直接赴美国等西方国家困难，又需较好的外语，先留学日本，可把日本当成跳板，赴日本后，再从日本奔赴美国等发达国家。

(9) 移民型。有的人认为，在中国缺少大量接触外国人的机会，通过在日本留学，更多地接触日本人以及西方人，进而通过通婚或其他方式达到在国外定居的目的。

(10) 幻想型。有人以为日本是现代的人间天堂，日本的一切都是完美无瑕，在那里可以呼吸到仙境一般的空气，为了不枉此一生，他们带着幻想登上了似乎奔赴仙境的国际航班。

(11) 盲目型。这类人没有明确的目的，在全国兴起的留日热潮中，耳闻目睹，受其影响，被留日大军裹挟上了飞往日本的航班。

(12) 受骗型。有的人是被骗去挣钱，有的人是被骗去结婚。他们怀着美好的愿望赴日，一踏上日本国土，才始知受骗。

以上只是就主要倾向大致分类，实际上不只 12 种，而有的留日生又同时兼几种类型。在这 12 类人员中，有的只占总人数的很小比例，如受骗型，这类情况时有发生，但人员少。留日运动主流主要还是以求学为目的的深造型、委派型等。正因为这些积极方面因素的存在，这场留日运动才得以深入发展下去。

这场留日运动，与历史上的留日运动相比，特点呈现多维性，并且特点明显，利弊共存，利远远大于弊。对于这场运动之“热”，对于这场运动出现的各种特征，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从这场运动产生，这种关注就已出现。如日本《东京新闻》1988 年 6 月 4 日登载的《上海的日本留学热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文中说：“上海从今年年初开始掀起的日本留学热显然是热过了头。上海总领事馆为了缓和由于申请蜂拥而来造成的混杂，开始发行整理券，与此同时‘票贩子’应运而生，还发生了逮捕转卖证券的骚乱。虽然说去留学，但大部分人是去做工为目的出去赚钱。只要有这种强烈的欲望和去日本的可能性，这股热似乎就不会停止下来，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答应从找保人到手续全部都给包了，所以就付了钱，可是，还没有收到入学许可证。是不是受骗了？’——在上海，最近，围绕着去日本留学的诈骗事件在增加。”

这篇报道，写出了留日的热闹场面及其存在的几个问题。

类似这样的文字在中日两国都大量涌现，其热闹情景可以说是与“留日热”遥相呼应。但不管怎样，留日运动的成绩毕竟超过了其所存在的问题。

3. 变相的就学生出现

80年代初，中国社会出现了“进修生”一词。这种“进修生”，是指向国外企业派遣的学习人员。再向后发展，社会上又把向国外企业派遣的学习人员叫做了研修生。中国向日本派遣研修生的兴盛，是日本对就学生开始限制的80年代后半期。

进修生出现，本是件好事。1989年3月24日，《光明日报》在一版“报眼”位置（即最重要位置）登载报道《“中促会”向国外中小企业派遣进修生》，其“肩题”为：“学习先进应用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一条新途径”、“李鹏总理赞扬这种派遣是一个方向”。报道中说：中国对外应用技术交流促进会不花国家外汇，不要国家投资，自收自支，从1982年起分期分批向日本等国中小企业派遣进修生1600余名，1200余名已按期回国，成为有关单位的业务和技术骨干，对推动我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增进我国与国外的技术交流、技贸合作和友好往来起了积极的作用。李鹏总理对这项工作“十分关怀，并指出，这种派遣是一个方向。”派出去的人员来自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大部分是企业中优秀的中青年技术人员。

该报道同时还说：“我国每年都要往国外派遣大批留学生，主要到国外学校学习，回国后绝大多数从事科研、教育工作，进入生产第一线的寥寥无几。派遣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到国外中

小企业进修，边学习，边工作，时间短，花钱少，效果好，这就为培养我国企业所需人才，学习国外先进应用技术和管理经验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1990年12月24日，新华社发出电稿《李鹏会见赴日研修培训工作座谈会代表》，其中说：“国务院总理李鹏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赴日研修培训工作座谈会代表时指出，根据我国建设的实际需要，从生产部门选派科技人员和管理干部到国外学习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科学的管理经验，是中国政府的一贯方针，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李鹏说，近五年来，我国共向日本派遣了1.35万多研修培训人员，他们不仅学到了先进的知识，还增进了与日本人民的友谊，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学成回国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实践证明，有计划、有组织地选派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到国外进行研修培训，既学习理论知识，又参加操作实习的办法，是引进国外智力的有效方式之一。李鹏在讲话中希望有关部门认真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建立健全必要的管理制度，使这项工作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这一时期中国研修生所谓出国，基本都是去日本。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一的李鹏总理都极为重视派遣研修生工作，这一工作会有所发展是毫无疑问的。1991年9月1日，中国某地一地方党报登载一篇关于研修生的专门报道，以形象的文字介绍了一批赴日研修人员，这里将其转录于下：

近年来，在一批批赴日人员中，又多了一种新成

分——研修生，这就是从各行业中经过选拔、考核派到日本企业，边工作边学习，以期提高某一方面技能的人。这些研修生们不仅圆满完成了各自的研修任务，而且还创出了“研修”之外的“效益”。

消除偏见的自强者

一些日本人有种偏见，认为中国人愚钝、懒散。赴日研修生自尊自强，用优良的工作成绩，消除着这种偏见。

辽宁宾馆的面点师车德宏，两年前到日本一家糕点厂研修面点技术。开始，他被分配在一道较简单的工序实习操作。小车心里抱定一个主意，决不能给中国人丢脸，无论在哪道工序，都要干出个样来。由于他工作出色，很快就被派到另一个重要的岗位上。在新的岗位，小车同样很快掌握了操作要领，成为技术骨干，连一向自傲的工段长也不得不承认小车聪明、能干。尤其是小车靠感观控制糕点的重量、各层的厚薄度，都不亚于一台红外线测试仪，使日方人员很佩服。

以自己的才干令日本人刮目相看的事，在研修生中有许许多多。在日本工商界颇有声望的日中产业技术交流协会，就多次表示，很欢迎沈阳去的研修生。

友谊的使者

到日本的研修生，在与当地人朝夕相处之中，大大增进了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起到了一般宣传起不到的作用，促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市服务业管理局经贸处的工作人员尚明，1989年末到1990年期间，在日本静冈县的一个株式会社中研修日语。由于在这里工作的日本人，许多来自于偏远地区，对中国可说是一无所知。对此，小尚耐心地给他们介绍中国，从人们生活到现代化建设，她还指着自己身上的漂亮衣裙说：“瞧，这都是我们中国自己生产的！”通过这样的交流，许多日本人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并表示要取消去美国夏威夷的旅游计划而改去中国。许多人争着找她学汉语。

新经验的传递者

研修生们在日本工作期间，深切感受到先进的管理方式所产生的巨大效益，深刻体会到，日本的发达是靠人们干出来的。“日本人能做到的事，中国人为何办不到？”怀着一种强烈自尊心归来的研修生，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新经验的传播者，改革的促进派。

在日本神奈川县一家自动车株式会社度过一年研修生活的黄信义，在市台湾同胞联谊会工作。在日期间，他收集了大量素材，归国后，写出专题报告，向人们介绍日本的情况，其中谈及的日本企业的质量意识、文明生产及精干、有序的管理机制，给人以启迪；黎明公司技术人员丛建军，自从日本研修归来，便改变了以前“坐办公室”的习惯，直接下到生产第一线。他说，学习日本人那种勤恳的工作精神，首先

从自身做起^①。

研修生所去的，是中小企业，所研修的内容，是实际技术或日语。由于不是进日本各类学校，他们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留学生。但是，这一事物发展到后来，情况则有了变化，尤其是日本对留学生、主要是就学生政策严厉之后，一些人想去当就学生的愿望难以实现，便纷纷以研修生的名义奔赴日本。以研修生的名义去日本，同只想做就学生、不想升入大学的留学生效果是一样的，即可以学日语，可以打工。研修的内容一掺入了这一内容，研修生便有了就学生的实际意义。

1990年11月22日，中国某省城地方报纸登载了一条消息：《三十二名青工赴日进修学习》^②，其大意为：由省、市外事部门和市职工大学组织选拔的市内32名青年工人，于11月21日启程“赴日就学”，这些工人分别来自市重型机器厂等32个企业单位，年龄在20岁至25岁之间，他们将赴日本东京地区“进修学习日语和技术”，学期为两年。

上述消息中，使用了“就学”、“进修学习”等字眼。实际上，这次活动筹办之初，就是以研修名义进行的。其进行情况大致如下：

第一阶段：登广告招生。

1989年3月21日，当地报纸登出“第一期赴日日语研修

^①杨春燕：《初识研修生——部分赴日研修生小记》。

^②出于某些考虑，隐去有关的地名及人名；以下非报载的材料，系为著者的现场记录。

生招生”的广告，其内容为：

经与日本国有关方面商定，现招收第一期赴日勤工俭学日语研修生 120 人，学制二年。结业后由日方学院发毕业文凭。凡本市 19 至 30 周岁，具有高中以上毕业文凭，有一定日语基础，思想品德好，身体健康的在职职工（男女不限），请持单位介绍信、身份证、学历证书、近期健康证明、免冠照片二张，即日起到 A 市（隐去市名，下同）职工大学培训处报名。

地址：（略）。

联系电话：550869。

3 月 26、27 日考试，考试科目：政治、语文、日语。交报名费 5 元，考务费 15 元。经考试合格被录取者，参加集中培训并办理出国手续。其培训费、出国费按有关规定办理。

（发布单位略）

第二阶段：培训及办理有关手续。

考试后，初步确定合格的人员参加了培训。培训之初，主办者印发了一份《赴日研修情况简介》，其内容如下：

一、研修学校、地点及报考条件

日本进德国际日本語学院，位于日本埼玉县川口市内，与东京相邻。

报考条件，本市 19—30 周岁，具有高中毕业以

上学历，身体健康，品行端正、具有一定日语基础的在职职工，性别不限。

二、勤工俭学学习内容年限

每期研修生在指定的日本进德国际日本語学院及有关企业学习、工作二年，以使研修生的日语水平在听、说、读、写、译等方面有较大提高，并能掌握一定的工作技能。

学习期满，符合毕业条件，并经考试合格者由日方学院颁发毕业文凭。

三、在日的学习、生活、劳动和管理

研修生经考试录取并经体检、政审合格后，由中方推荐入日方学院学习，入日境后，由日方学院办理入境后的有关法律手续，承担和履行中国研修生日方身份保证人、经济保证人之责任。

首批中国学生部分住在日方学院宿舍内，余者住在有关劳动企业集体宿舍内。宿舍有相应的卫生、生活设施，学院设有自助食堂，学生可以自做自用。

日方学院负责安排中国研修生的学习及勤工俭学劳动岗位。保证每周不少于20小时学习，42小时劳动。每小时劳动报酬不少于600日元（含加班费），基本保证其劳动收入能够支付其在日期间的学习、生活之费用。

在日工作期间，享受日方同等工人的有关待遇。二年内无回国探亲假，也不允许家属赴日探亲。在日期间的医疗和人身保险由日方负责。

中方将派出人员同日方共同管理中国研修生。

四、研修费用

1. 研修生出国前一次性交纳国内各项费用 4000 元人民币。

2. 入日境后应向日方交纳：(1) 一次性入学金 60000 日元（日方垫付）；(2) 每月交纳学费、教材费、宿费、管理费共计 55000 日元；(3) 前十个月每月交纳保证金 5000 日元，交纳的保证金，如学员在日学习工作期间不出现问题，回国前一次性还给学生本人，或作为回国国际旅费。

五、学员的开除和解雇

在日研修期间，研修生违反以下之一项者，日方征得中方同意，可以决定开除和解雇：

1. 触犯日本国的法律；
2. 由于不尊重当地居民的宗教及风俗习惯而造成严重后果者；
3. 学习成绩低劣，无故旷课，违反学习纪律，屡教不改者；
4. 勤工俭学过程中，屡犯劳动纪律，违反操作规程，造成严重后果者；
5. 其他不良行为，造成恶劣影响者。

被开除和解雇者一律退回国内，其回国费用由个人负担。回国后根据情节进行处罚和处分。

主办者又向学员出示了一份中方主办者（甲方）与学员工

作单位（乙方）之间待签的“协议书”草本：

一、为加速我市外语人才的培养，并通过勤工俭学学习日本相关企业的管理经验和实用技术，甲乙双方同意选派（ ）到日本国进德国际日本語学院和有关企业研修日语，并报请市政府批准。

二、研修生的出国手续由甲方负责办理，政审工作由乙方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办理。

三、研修生在国外研修采取半工半读形式，期限二年。无回国探亲假，毕业后由日方学校发给毕业证书。研修生在日期间的学习、劳动及生活管理等事宜由甲方负责，回国后的工作安排由乙方负责。

四、研修生办理出国所需费用由本人或单位负担，国外研修费用（学费、教材费、管理费及生活费用等）由研修生在日勤工俭学所得收入解决。结余归研修生本人。

五、研修生在国外期间，国内的工资、劳保、医疗、补贴等各种待遇及其家属应享受的待遇，由乙方同研修生本人协商确定。甲方对此不负有责任。

六、研修生在日本期间，加入日本健康和生命保险。发生工伤、残、亡等意外事故，甲方负责同日方交涉并索要保险赔偿，回国后的工作安排及善后处理由乙方按有关规定办理，甲方不再承担责任。

七、研修生在国外因违法乱纪等原因被退回，乙方应协助有关方面对其本人给予行政和经济制裁。

八、因各种原因研修生未被批准出国，本协议自行失效，善后工作由乙方负责。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代表签字，单位盖章之日起生效，研修生归国入境时终止。

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

中方主办者还让学员写下如下“保证书”（学员签字有效）：

在日研修过程中，我保证遵守以下各项规定，如有违纪之行为，愿接受任何处分、处罚。

1. 忠于祖国，严守外事纪律，维护祖国尊严。坚持原则，分清内外，谦虚谨慎，不卑不亢，严守国家机密。讲究文明、礼貌，注意服饰仪容。

2. 遵守日本国有关法律规定，不参与日本的一切政治活动，不擅自接受任何人的采访。

3. 服从中日双方管理人员的管理，研修过程中出现问题应首先向中方管理人员汇报、请示。

4. 服从研修学校及有关企业就学习和工作所做的安排，遵守中方与日方等有关方面的规章制度。

5. 勤工俭学工作岗位工种勿论，服从安排，努力工作，遵守操作规程，不与日本职工攀比工资，未经中方管理人员同意，不直接同接收学校和企业有关人员交涉费用问题。

6. 按期交纳学费、教材费、宿费、管理费、保

证金。按期偿还日方垫付的入学金及生活费。

7. 爱护研修学校及有关企业的各种设备和设施。

8. 随身携带护照并妥善保管，不得遗失。

9. 研修期间不回国探亲，家属也不前往日本探亲，出国期间不提出与本人研修无关的要求。

10. 如不履行上述保证，违反规定，本人愿接受中方管理人员做出的处理和处罚。

保证人： 签字 章

家属： 签字 章

在填写有关表格阶段，主办者特意叮嘱学员：赴日的目的不要反映出勤工俭学、挣钱、半工半读等意思，应写提高日语水平、结业后报考日本大学或回国服务等，学习期间费用来源，应写借日本朋友、借保人或靠父母支付等。

该活动进行之际，日方主办者来到中国，一位副市长给予了接见，8月10日的当地报纸以《A副市长会见日本客人》为题发表消息，其大意为：A副市长于8月8日午后会见日本客人前川清子女士。前川清子女士是日本遗孤，曾在中国A市生活了近40年，1985年她回日本定居后，不忘中国人民，特别是A市人民的养育之恩，致力于日中人民的友好文化交流活动。她在川口市创办了进德国际日本語学院，专门招收中国学生到日本学习日语。这所学校负责安排食宿，并负责介绍工作，学生可以半工半读。今年这所学校和市职工大学等单位签订了协议，将从A市招收240名学生入学。前川清子这次来A市，希望同A市一些部门作进一步交往以促进中日人民的友

谊。前川清子对 A 市副市长说：我是在 A 市长大的，有这么一个心愿，愿意为 A 市做点贡献。A 副市长对前川清子这种精神表示赞许，他还向日本客人介绍了近几年 A 市各项事业的发展情况。

事情的最后结果是：由于日本方面签证控制趋严，一是实际赴日人数比计划有所减少，二是改以赴日本企业为名成行，故成行时强调了赴日人员为工人。

类似上述那样的研修生事例很多，如同一城市的报纸还于 1989 年 10 月 18 日登载消息：应中国 A 市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之邀，以日本国日中产协井上先生为团长、齐藤先生为秘书长的日中产协第三次商务访华团一行 31 人于 10 月 14 日抵 A 市，副市长 B 会见并宴请了日本客人。日中产协访华团共代表日本 24 家企业。访华团将在 A 市进行商务洽谈、面试研修生以及参观访问和联谊活动等。

研修生大量赴日后，其研修内容出现偏差，为此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重视。1989 年 8 月 12 日《光明日报》登载了《日本防止外国研修生非法就业》一文，文中称：日本法务省入境管理局 6 月底做出决定，鉴于外国人以技术研修生的身份，越来越多的人在日本企业实际就业，日本将进一步严格执行研修生入境审查标准。迄今为止，这一目标执行的并不严格，为研修生非法就业提供了条件，此次，日本政府决心认真对待。外国赴日技术研修生，去年一年多达 23432 人，比前年的 17081 人增加了 37%，其中来自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增加的明显。法务省对外国研修生就业问题进行了调查，在对结果分析中，目前至少已发现了三个问题：（1）在课程研修的过程中，原定

以讲课方式实施的学科研修实际没有进行。(2) 研修生与日本工人一样在生产线上工作，难以区分是研修还是劳动。(3) 研修内容接近于单纯劳动，回国后能否发挥研修成果尚属疑问。为此，法务省已对各企业和有关团体进行了行政性指导，要求研修课程必须有三分之一要以讲课方式进行，必须写好研修日记等。

研修生，实际应该属于准留学生或准就学生，他们的心态，与就学生们无异。中国赴日留学生中如果算上研修生，那么留日人数将更为庞大。

4. 逾期不归的现象在增加

所谓逾期不归，可以从两个方面说。第一，对中国方面来说，逾期不归，主要是指公派留学生；第二，对日本方面来说，逾期不归，主要是指自费留学生，当然，公费留学生也不是说绝对没有。

在中国方面说，留学生逾期不归，具体的是指公派留学生超过了出国前与原派遣单位商定的出国学习年限。逾期不归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其主要有：(1) 国内的有些规定不尽合理，对攻读某些学位或进一步深造限制的过死，一些人希望延期学习，以便早日得到理想中的学位。(2) 国内的科研、教学、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以及职称评定、工作去向、住房问题等存在一些弊端，一时难以满足留学生归国后的需要，因此有人在持观望和等待态度。(3) 做了长期居留国外的准备，留学期间或结业以后有的与外国人通婚，有的受雇于外国公司企业。

对逾期不归的公派留学生，中国根据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态

度和措施，主要采取了合情合理解决的办法。1988年10月7日，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表示，国家对公派留学人员的权利和义务作出必要的规定，是许多国家的通例；一些留学人员由于各种原因，希望在获得学位以后继续进修和深造，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对此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允许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对待，只要他们向国内派出单位和驻外使、领馆提出申请，是会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考虑的，并得到合情合理的解决。这番谈话，是李铁映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柯莱伦斯·阿兰博士和副主席麦克·奥森伯格博士一行时针对在美留学生情况说的，但这种态度无疑也适用于赴日公派留学生。这段时期，为限制逾期不归，中国方面也有签定“延期罚款合同”，护照过期不予更换等情况发生，但鉴于这种做法伤害了留学人员的感情，反倒取得了相反的效果，中央随即提出，将再采取适当灵活的办法，不逼不卡，通情达理地解决问题。

1989年“六四”之后，公派留学生逾期不归出现增多的征兆，7月26日，国家教委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就“西方新闻媒介近来报道，有不少中国留学人员对回国工作持观望态度，有些人明确表示不愿回国，你对此持何态度”的提问回答说：“公派留学人员学成后有回国服务的义务，这些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有明确规定。中国也毫不例外。我国自1979年大规模向国外派遣留学人员以来，90%以上的访问学者及相当数量的研究生是这样做的，他们回国后，在教学、科研、生产等工作岗位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我们也注意到，在北京平息了反革命暴乱以后，

少数留学人员对国内真相缺乏了解，加之受西方歪曲煽动性报道影响，对回国工作有种种疑虑，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大多数留学人员是热爱祖国的，是盼望中国早日繁荣富强的，也愿意回国服务。近几个月，北京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就协助安排了 70 多名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四川省 6 月 10 日就有 9 名留学人员从美国按期回国工作。6 月上旬，一赴欧洲人才招聘小组在法国、英国、联邦德国顺利地完成了招聘计划，应聘的均为素质较高的急需人才。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对国内真相的进一步了解，留学人员的疑虑一定会消除，也一定会回国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对少数因各种原因不能按规定回国的留学人员，只要向我有关部门正式申请，我们将采取通情达理的态度予以妥善处理。”中国的这种通情达理的态度，后来果然证明了效果比较好。

在日本方面来说，逾期不归，就意味着属于非法居留。

在日本逾期不归的中国留学生，主要是自费留学生。1983 年日本政府提出到 2000 年时吸收 10 万名留学生的计划，并于 1984 年 10 月简化了就学生的入境手续，使进入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就学生迅速增多。据统计，1984 年在日本的中国（含台湾省，下同）留学生为 6870 人，1989 年时增加到 21306 人。就学生的增长数字更为可观，1984 年在日中国就学生只有 1268 人，1988 年达到了 35388 人。以后日本政府严格了审批标准，新入境的就学生人数有所下降，但 1989 年的中国就学生

仍有 31058 人^①。1989 年 12 月，日本对入管法做了修改，部分放宽了对研修生的限制，以研修身份赴日更易于成行。

按日本法律规定，就学生的签证虽可以得到几次更新，但在日停留的总时间不能超过 2 年，除非以后改换为其他的居留资格，如考入大学或专科学校后，申请改换为留学居留资格。再有，持留学居留资格者，毕业后进入日本公司工作，被审查批准后也可以改换成其他相应的居留资格。按日本政府的规定，原则上各种居留资格都可以互换，但在具体掌握上，持“短期滞在”居留资格的一般极难被批准改换为其他的居留资格。

于是，在日的中国留学生中便出现了签证到期而仍居留日本者，这些人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就学生”资格的留学生，虽然两年居留期限未满，但由于打工过多，上课时间未能满足日本政府的要求，不够再续签证延加居留的条件，故得不到再签证，还仍然在日本居留。（2）“就学生”资格的留学生，两年签证期满，没有升入大学或专科学校，不具备改换成“留学生”居留资格的条件，还仍然在日本居留。（3）具有“留学生”资格者，学业结束，没有考入更高一级的学校深造继续学习，签证到期，不具备再续留学资格签证或转换成其他资格签证的条件，还仍然在日本居留。

以上是对非法居留情况的大致分类，实际上，签证问题有着很复杂的内容。新的留日运动初始阶段，日本对留学生管理比较松弛，只要不长期旷课，出勤率在 80% 左右就能办下延

^①日本《国际人流月刊》1990 年 8 月号，第 31 页。

期签证。当日本政府发现留学生超量打工的问题十分严重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留学生办理延期签证时，要在表上写明是否打工，每天打几个小时，打工地点等情况，对就学生尤严，只要对出勤率、在校表现有一点不满，轻则只给一个月、三个月的签证，重则限期离境回国。办理签证时，还要有保人的材料和保人当年的纳税证明。自费留学生当初赴日时，其保人多是由语言学校给找，留学生付钱，是花钱买来的担保，只一次性有效，留学生赴日后原有的保人不会再为留学生担保。重新找保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担保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为了办理下来延期签证，中国留学生中出现了花钱从学校买出勤率证明，再花钱买保人作保的事情。否则，不仅是缺少出勤率，就是缺少保人也不能延期签证。

因此说，出勤率和保人问题在留学生不想承受、或承受不了的时候，便也会有非法居留的现象出现。

日本入管法规定，超过规定居留期限后继续在日本停留的，可被强制出境。留学生签证到期仍居留在日本，其所采取的办法只能是所谓的“黑”下来，哪一天抓住哪一天算，抓不住就继续居留。一般地说，抓住他们也不是很容易的事。“黑”下来的人有各种办法避开警方的视线，比如改名换姓更换住址，以别人的名义租住房屋，有的人甚至连固定的住所都没有。

对“黑”下来的人难以驱逐出境，有人在书中这样分析说：“现今日本政府实行的是国家公务员制，政府机构里的工作人员和警察都属于公务员。虽然公务员制精简了庞大的国家机关，但同时也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执法人员人力不足，

尤其是警察。日本警察都是‘全能运动员’，基本没有户籍警、交通警之分，尤其是派出所。一个派出所里的警察拳打脚踢什么都管，只要是在他的管片内。大量外国留学生的出现，使本来就显得人手不足的警察力不从心，只要非法滞留人员别惹是生非，他们一般不管。在留学生中还流传着另外一种无法证实的说法，说警察抓到非法滞留人员送交出入境管理局。警方说，因为是违反外国人登录法所以应由出入境管理局负责处理，而出入境管理局说，既然是警方抓的应由警方处理，谁也不愿沾手。也许这是造成现在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

上一书中还讲了这样一个例子：“在东京所有电车站的出入口处，都备有为方便顾客而设置的物品寄存柜，这些寄存柜是电脑控制的，无专人看管，使用一个不太大的柜橱每二十四小时五百日元，顾客只需往里塞足硬币，柜橱上的钥匙便可以启动使用。在东京中心地区有条铁路线叫‘山手线’，‘山手线’很像北京环城地铁，是一条围绕着东京都转圈的铁路线。有个别留学生充分利用了这两个条件，将自己的生活用品存入柜中，然后买一张最便宜的车票（东京地铁的票价根据乘车距离长短而不同），白天睡在电车里（除通勤高峰期外，平时电车里很空，而且电车内是长条座位可以躺下。），夜间出去打一整夜工。”^①

非法居留者也有被抓住的例子。如1988年，日本某大报纸刊登一条新闻：日本警察在东京池袋车站出入口，抓获一名违反“外国人登录法”的福建姑娘，并将其强制遣送回国。留

^① 葛笑政：《东京の诱惑》，军事谊文出版社1992年，第271—272页。

学生们认为，这是日本政府在杀一儆百。

非法居留在日本的留学生有多少，这是个无法确切知晓的数字，有人说有一万多，有人说还更多。这批人在非法居留后，其已不再是留学生身份，但他们当初实实在在是以留学生身份从中国赴日本的。

第 二 节

制定新政策，再创新成绩

1. 中国相继制定新的留学政策

从1987年开始，中国相继制定新的留学政策，从而使留学政策渐趋完备。

新时期留学运动再兴后，出国留学的方式呈现多元化、多层次的发展趋向。从1979年至1985年，主要分公派和自费两种，其中公派仅是以国家派遣为主，尚无各部门、各单位派遣人员出国学习的情况；自费留学生，国外亲友资助的占相当比例。从1986年开始，出国留学派遣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1986年5月，国家教委召开的留学生工作会议确定，通过各种形式派遣留学人员，实行国家统一管理，多渠道派遣的方针。公派出国留学人员不仅包括由国家财政拨款派遣的人员，还包括地方、单位以及个人经本单位同意，通过取得各种奖学金、贷学金、资助等多种渠道而出国的留学人员。因此说，留日运动进入1987年的“留日热”后，原有的公派留学已衍化为三种形式，即国家公派、单位公派、自费公派，再加上自费留学，赴日留学共有了四种方式，并且靠亲友资助自费赴日自

费留学的渐少，请日本人作担保的情况增多。

国家公派，是指按照国家统一计划，面向全国招生，统一选拔、派出，执行统一经费开支规定的出国留学人员，为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简称国家公派。

单位公派，是指按照部门、单位、地方计划，面向本地区、本单位招生、选拔、派出，执行部门、地方、单位经费开支规定的出国留学人员。这类人员为部门、地方、单位的公派出国留学人员，简称单位公派。

国家公派和单位公派留学人员，均是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得到国家以及有关部门、地方、单位全部或部分资助，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有计划派出的人员。这两种公派的留学人员按留学目标又分为大学生、研究生、进修人员和访问学者。

自费公派，是指某些专业技术骨干人员、毕业研究生、优秀文艺骨干、优秀运动员、机关工作业务骨干和具有特殊技艺的人才等，通过国外亲友取得资助，或使用本人的外汇资金，但纳入本部门、地方或本单位派遣计划的出国留学人员。

公派留学衍化为多样化，突破了中央统死的旧框子，照顾了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实际需要，有利于人才按需培养，有益于留学运动健康的发展；把一部分自费留学人员划入自费公派的序列，解除了这部分人员的后顾之忧，解决了他们由于出国留学而造成的实际困难，从这一点上看更是促进了留学运动的发展。

这一时期，中国相继制定、实施的留学政策，以1986年12月8日国家教委（原教育部）制定、1987年6月11日正式公布的《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最为重要，

该《暂行规定》分为出国留学工作的指导原则、出国留学工作的组织管理、公派出国留学人员的选派、从事国外的“博士后”研究或实习、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回国休假及其配偶出国探亲 and 自费出国留学六个部分。这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第一个比较完备、全面的留学政策文件，与过去的政策相比，它有所增补，有所变更，有所完善。

例如关于自费留学的条件。

1980年以前，自费留学存在一定的限制。在留学人员的学历、年龄，以及工作年限等方面都规定了限制条件，使一些具有自费出国留学条件的人员失去了出国留学的资格。如学历上，要求申请人必须具备高中或者大学文化水平，并且到国外学习，只限于上大学或是攻读研究生，到国外就读普通学校的，往往得不到批准。年龄方面，规定到外国上大学或者攻读研究生的，必须是35周岁以下。工作年限上，规定高等学校毕业的本科生、专科生必须在工作单位工作二年后，才能申请自费出国留学。在国外担保人方面，强调必须是可靠的亲属或朋友，一般邂逅相识的朋友，不被视为具备可靠的担保条件，因而申请往往难以得到批准。

1984年底，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解除了对自费出国留学人员的年龄、学历和工作年限的限制，规定凡中国公民个人通过正当和合法手续取得外汇资助或国外奖学金，办好入学许可证的，均可自费出国留学。如对在校的大专生、本科生和在学的研究生，规定可以在学校或单位申请自费出国留学；对在职职工，规定一般可停薪留职，本人要求亦可以退職。

1986年6月公布的《暂行规定》，对自费留学再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如对在职职工，规定：“为了保证国内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等单位的工作秩序，在职职工要求离职自费出国留学，应事先经所在单位批准。”并从其出境的下一个月起停发工资，保留公职一年。“专业技术骨干人员，包括助理研究员、讲师、工程师、主治医师及以上的人员，毕业研究生以及优秀文艺骨干、优秀运动员、机关工作业务骨干和具有特殊技艺的人才等，申请自费出国留学，应尽量纳入公派范围，他们在国外留学期间的管理和国内待遇按公派出国留学办法办理。”对在校大专生、本科生及在学研究生，规定：在高等院校学习的非应届毕业班的学生，可申请自费出国留学，被获准的，可保留学籍一年；“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班的学生，已经列入国家分配计划，应服从分配，为国家服务。国内在学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应按学籍规定努力完成学习和研究计划，一般不得中断学习自费出国留学。”

1986年6月公布的《暂行规定》，对公派留学也增添、补充了一些限制措施，如在“公派出国留学人员的选派”部分中，出现了“签订‘出国留学协议书’”一项。这种协议书过去未曾有规定。其规定为：“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办理出国手续前，要与选派单位签订‘出国留学协议书’。协议书由选派单位和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双方签字，并经公证机关公证后生效。”“‘出国留学协议书’的内容，包括国家和单位对公派出国留学人员规定的留学目标、内容、期限、回国服务的要求，向留学人员提供经费的规定以及派出单位和出国留学人员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和责任等。”

该《暂时规定》对各类公派留学人员在国外的停留期限、回国服务等亦同时做了较严格的规定，如：“公派留学人员应按照国家计划努力学习，按期回国服务。留学期间或留学期满后，一般不得改变留学身份。需要延期者，应提前提出申请，报原派出单位审批。凡是由原单位发放工资的，其在批准的国外延长期间的国内工资照发。未经批准逾期不归的，一年内停薪留职，一年后是否保留公职，视不同情况由派出单位决定。”再如：“研究生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后，要求转到第三国从事‘博上后’研究或实习，一般应先回国工作一段时间后，再提出申请。因特殊需要由国外直接转第三国的，应提前半年提出申请，按隶属关系报部委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部门批准。”^①

《暂行规定》是几年来中国留学政策的精华荟萃，是对以前留学经验与教训总结的结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以后的实践也证明它对留学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其中一些较严格的规定，短时期内也引起了部分人的恐慌，如在学的高等学校学生退学的有所增加，担心毕业前后出国留学受到限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议论。如政策公布后次年三四月间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人们纷纷谈及留学政策问题。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全国人大代表杨纪珂说：“对国内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应当适当放宽政策，给予出路。如果他们能够自费或找到奖学金就应

^①《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见《人民日报》1989年6月11日。

鼓励他们出去深造，这些人将来还会回来为祖国效力。”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杨乐说：“留学生政策不够稳定，不利于吸引留学生回国，而且对国内的大学、研究生也有很大影响。目前留学生的顾虑是怕一旦回国，将来再也没有出去的机会了。”西北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胡征说：“学生能弄到国外奖学金，国家就应该送出去培养。”^①

各方面的意见，引起了国家的重视。1988年7月7日至28日的21天时间内，国家教委安排了包括留日学生张维明在内的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澳大利亚7个国家的49名留学人员回国参观汇报，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时说，中国将积极推进留学生、留学事务工作，对于大家提出的关于留学生管理的一些政策不尽合理、不甚实际的意见，国家教委十分重视，表示要建立一种“长期的、开放的、稳定的、积极的留学生政策”^②。这表明，中国政府已有意建立更有益、更受欢迎的留学政策。

另外，这一时期，中国政府还相续制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留学政策，做出了有关留学的一些决定、安排。

1987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工作会议强调，除加强对出国留学预备人员的外语强化培训外，还应对他们的政治素质进行严格考察。

1987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出国留学人员工作座谈会后，

^①黄马辑录：《信赖·理解·并切·期望——“两会”关于留学生工作的部分言论》，载《神州学人》1988年4期，第6页。

^②亚南：《沟通思想 相互理解——记49名留学人员暑期回国参观汇报》，载《神州学人》1988年5期，第40页。

国家教委发出《关于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的通知》。《通知》强调，整个出国留学人员的工作包括计划选派、管理（教育和服务）和回国发挥作用三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要三个环节同时抓。选派留学人员要体现博采各国之长的原则，要有利于国内高级人才的培养，有利于国内高级专业队伍的稳定，当前应以应用学科为主。鉴于国内的研究生教育已有较大的发展，今后出国研究生要少派、精派。人员结构上要向高层次发展，要提高有实际工作经验的高级访问学者的派出比例。《通知》指出，单位公派留学人员的国别比例应作适当调整。从1988年开始，国家要对上述方面加以宏观指导。《通知》还要求抓紧留学人员学成回国发挥作用的工作。派出单位要加强同国外留学人员的联系，及早确定他们回国后的工作岗位，并在国内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他们创造必要的条件。对未确定国内工作单位的国家公派出国研究生，学成回国安排工作时，实行研究生本人和用人单位互相选择的办法。对留学人员中的尖子人才，应特别予以重视，要根据本地区、部门、单位的实际情况，对他们采取适当的特殊政策。

1987年11月，国家教委颁布了部分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管理细则。这些细则有：

《公派出国留学人员身分的管理细则》。其中规定：公派出国留学人员的身份按选派计划分为国家公派和单位公派，按留学目标分为大学生、研究生、进修人员或访问学者。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在国外留学期间，其公派身份不因经费资助来源或待遇的变化而变化，仍须遵守国家关于公派出国留学人员的有关规定。公派出国的大学生、研究生、进修人员或访问学者的

身份均在出国前确定，出国后不得改变。公派出国进修人员或访问学者，在国外期间不得改读学位，但如在规定的进修期限内，完成了出国前确定的进修或研究课题计划，而国外的导师和学校愿授予学位，可以接受。

《公派出国留学人员申请延长留学期限的管理细则》规定，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在其出国前，由国内选派单位明确其出国任务及期限；少数公派出国留学人员确因业务需要，须延长在国外的留学期限，应经过批准，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延长留学期间，不得改变留学身份；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延长留学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只能申请一次，要求延长留学期限在半年和半年以内者，须提前一个月提请有关部门给予办理。

《公派出国研究生留学年限及在国外期间国内工资（或生活补助费）待遇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工龄计算的管理细则》规定：（1）国内大学本科毕业生出国攻读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年限和获国内硕士学位人员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年限，根据各国不同情况分别做出规定。公派出国研究生应在规定的年限内完成学业。确因特殊情况未在规定年限内完成学业者，可按公派出国留学人员申请延长留学期限的办法办理延期手续。（2）公派出国研究生，如出国前系国内在校研究生，其享受的国内生活补助费，自离境之次月起停发。（3）1986年12月31日以前出国的公派研究生，出国后已由原单位按规定发放工资的，发放年限按有关规定（如国内大学本科毕业生赴日攻读硕士学位的为二年，攻读博士学位的为五年，硕士研究生毕业攻读博士的为三年）为准，超过规定年限者，其国内工资停发。（4）1987年1月1日以后出国的公派研究生，如出国前系国内高等

院校本科毕业后工作5年以上，或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工作两年以上的在职人员（包括在职研究生），学成后仍回原单位工作的，其在规定的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年限内，国内工资由原单位照发。（5）1979年1月1日以后出国的公派研究生，在规定的年限（包括经批准延期的时间）内获得博士学位，并按规定的留学期限（包括获得博士学位后经批准延期做博士后研究或实习的时间）回国的，其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时间计算工龄，计算年限以按有关规定的“国内硕士研究生毕业出国攻读博士学位年限”为准。

《从事国外博士后研究或实习的管理细则》规定：（1）博士后研究是指在某些国家的一些学科中获得博士学位的我国公派出国研究生，不改变留学人员身分，在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申请到“博士后研究”职位，在规定的期限内从事本专业的研究。博士后实习是指获得博士学位的我国公派出国研究生，不改变留学人员身份，进入国外公司、企业，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本专业的实习。（2）博士后研究或实习只能进行一次，期限一般在一年以内，最长为一年半。（3）获国内博士学位并在国内确定工作单位，工作满一年后的在职人员，根据单位需要，可申请从事国外博士后研究或实习。这类人员暂按公派出国访问学者的办法选派和管理。（4）我国公派出国研究生在国外获博士学位后即回国工作的，亦可按本细则第三条规定，申请从事国外的博士后研究或实习。（5）在国外的公派研究生申请从事博士后研究或实习，申请者必须在获博士学位半年前向有关方面提出申请。

1988年1月12日，国家教委、劳动人事部和公安部联名

颁布了《关于公派出国研究生配偶申请出国探亲假等事项的管理细则》。在颁布管理细则的通知中指出，今后对出国探亲假和探亲期间转留学的审批，要严格按管理细则的规定办理。各地公安机关要根据申请人所在单位出具的注有公派出国研究生派出单位意见的准假证明，依法审理。

留学生政策，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派出政策，一是吸引回国政策。这一时期，中国明显加强了制定吸引留学生回国的政策。1988年10月28日，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主持召开了国家教委第13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对出国留学工作的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了进一步改进出国留学工作的问题。李铁映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出国留学工作的重点，是认真帮助回国留学人员解决好工作和生活上的问题，要造成一个使回国留学人员能够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作贡献的良好环境。要贯彻“人才流动，合理竞争，双向选择”的原则，进一步拓宽回国留学人员的就业范围。他们可以到政府部门、公司、企业、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工作，也可以到集体所有制单位、外国独资、中外合资及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的企业工作或应聘到国际组织任职。会议指出，国家对公派出国留学人员的权利和义务作出必要的规定，是世界各国的通例，但对已在国外留学人员的具体问题的处理方面，应采取适当灵活的政策；对已在国外的一些公派留学人员，由于各种原因要求延长进修、深造时间的，要采取通情达理的开明政策，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对待。由于各国情况不同，留学人员的身份不同，国家给予留学人员的经费也不尽相同，因此，解决这些问题时，要有所区

别，并要尊重所在国的法律。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各有关单位以及驻外使领馆，应满腔热情地做好对出国留学人员的服务、教育和管理工作的。要有步骤地建设一批研究所和实验室，解决好回国留学人员所需编制、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以及相应的生活条件问题。会议希望各地各部门对出国留学工作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进一步总结经验，完善政策，以改革精神把出国留学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这时期留学政策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即改进了国家公费留学人员选派办法。1989年，国家对公费出国留学人员选派办法进行了必要的改进，强调国家公费出国留学人员的选派应认真贯彻“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的原则，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和财力的可能，以培养国内急需的高级专业人才为主。在保证国家当前重点建设需要的同时，兼顾长远需要和地方、部门的需要。在选拔人员的办法上，改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按照统一规定的项目，结合本部门的需要推荐人选，由国家教委组织专家评审后录取。1989年设立的国家公费出国留学项目有：访问学者、在学博士生、出国读博士学位以及根据需要设立的其他项目，要求各部门切实保证推荐人选的质量。

2. 中国的留学服务与管理工作的日益加强

中国的留学服务与管理工作的，经历了一个逐渐强化的过程。

新时期留日运动最初的几年，中国逐渐建立了有关留学的咨询与培训机构。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是出国留学咨询的重要机构。它是一个全国性的对外教育交流的社会团体，1984年9月在北京成立，其宗旨为：积极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教育、科学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增进中国与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共同努力为各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①。该协会由中国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和有关方面的代表共同发起组成，协会理事会由104名成员组成，大都是在教育界有一定影响、学术上有一定成就、教学上有突出贡献的大、中、小学及幼儿园的教授、教师、校长，还有少数是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领导干部。协会成立后，进行组织中等学校外语教师出国进修，组织职业技术教育出国考察等活动，同时，协会还为出国留学人员提供咨询服务。新时期留日运动第一个阶段，即1987年以前，该协会同日本、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个团体和组织建立了联系，其中，与日本的霞山会、日中教育交流恳谈会等十多个机构商签了相互交流协议或备忘录，另外还在国内10个省、市建立了分会，上海、广州等地分会也建立了出国留学咨询处。其北京咨询处设于北京语言学院内，提供口头咨询，开展不定期讲座、计算机检索等服务。

与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形成网络式咨询服务不同的是，北京及很多省、市的图书馆也相继建立出国留学咨询服务项目，它们的主要方式是辟设出国留学资料室。

出国留学人员的培训，主要是为公派留学人员而设。1978

^①《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载《神州学人》1987年1期，第52页。

年后，教育部先后在广州外国语学院、中山大学、同济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西安外国语学院、四川外国语学院、大连外国语学院共设立了9个出国留学人员外语培训部，此前国内还有北京语言学院和上海外语学院的两个培训部，其中北京语言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广州外国语学院、大连外国语学院、东北师范大学的培训部设有日语语种培训。各培训部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还向社会开放，承担部门、地方、单位公派出国留学人员的外语培训。各培训部按国家统一考试录取，培训部考试合格者，国家承认其出国留学的外语水平。各培训部除进行外语培训，还开展政治思想教育。

除以上培训部外，各部委、各省市、院校根据本部门派出留学人员的需要，也举办有许多各种类型的外语培训中心、培训点或培训班。

1987年以前，还出现了一个对留学运动有所影响的团体，即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该协会于1985年11月在北京成立，是一个全国性的专门从事国际间专门人才交流的非盈利、具有法人资格的民间团体。协会受到中国政府的直接支持，成立时协会主席由国务委员张劲夫担任，副主席由王淦昌、唐敖庆、王维澄、王迺等担任，理事会成员由中国政府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知名人士组成。协会的宗旨是通过国际间的人才交流活动，促进中国工业、商业、农业、财经、科技、教育、医药、文化等各界与各国同行间的交流与业务合作，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各国的友好往来、经济贸易发展和科技进步做出贡献。协会成立后，积极协调和帮助中国的有关部门、

省、市和大工矿企业对外开展人才交流活动，其活动方式之一就是选派中国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到国外的工商企业、农业或科研机构进行对口的实习培训，截止 1987 年初，已派出 2000 多名中国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到日本、美国等国家、地区进行培训。该协会还设立了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并在日本等国家设立了办事机构。

1987 年，“留日热”兴起后，中国的留学服务与管理工
作明显比前一个时期有所加强。这种加强首先体现在 1987 年 6 月 11 日公布的《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上。《暂行规定》专有一部分为留学生工作的管理，其内容如下：

出国留学工作的组织管理

(一) 国家教育委员会在国务院领导下，按照国家派遣留学人员的方针、政策，归口管理全国出国留学人员工作，包括出国留学人员的计划、选派、国外管理和回国后的分配工作。非教育系统的出国留学人员的派出计划和回国后的工作分配，按照统一的方针、政策，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会同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

(二) 根据简政放权的原则，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的名额，除国家统一掌握的部分外，实行分配到用人单位的办法，并经过试点，逐步实行出国留学人员的经费包干使用的办法，由派出单位掌握。

(三) 出国留学人员的派出单位应指定或委托专门的机构或人员与留学人员保持联系，指导他们在国

外的学习，积极配合和协助驻外使、领馆做好出国留学人员的管理工作。

（四）做好出国留学人员工作是驻外使、领馆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教育委员会派出的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或使、领馆指定的负责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干部，在使、领馆领导下，负责出国留学人员在国外的具体管理工作。

（五）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或负责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干部以及国内派出部门和单位应关心和帮助出国留学人员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帮助他们及时了解国家的发展和需要，热情地为他们服务。驻外使、领馆应在出国留学人员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教育，帮助他们增强艰苦创业，振兴中华的信念。

（六）出国留学人员在国外学习期间成立的“学生会”、“联谊会”等社团是留学人员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群众组织。

（七）国内留学人员管理部门、派出部门和单位，应及时做好出国留学人员回国后的工作安排，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上述规定，明确地界定了国家教委、驻外使领馆及派人单位各自应对留学工作所负的管理权限、责任以及所负的义务。《暂时规定》在其他部分中还规定了各部门对留学工作所应负的管理责任，如驻外使、领馆，即负有如下责任：

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国外经费的具体管理，由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专人负责或由使、领馆财务部门代管；

出国研究生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后，申请直接在国外从事“博士后”研究或实习，由申请者向国内派出单位和驻外使、领馆提出申请报告，并通过使、领馆通知其国内审批情况；

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公费回国休假向驻外使、领馆申请，公派出国留学人员自费回国休假、探亲由驻外使、领馆审批；

公派大学生、研究生，在国外享受国家或单位公费留学期间，公费或自费回国休假、探亲，国内生活费凭驻外使、领馆证明，由派出单位按国家统一规定办理。

《暂行规定》还对自费留学管理做出如下规定：“自费留学人员出国后应向我驻外使、领馆报到、联系。驻外使、领馆和国内有关部门也应主动与自费留学人员保持联系，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关心他们在国外的生活和学习。”到驻外使、领馆报到，对自费留学人员还有一个最实际的意义，就是他们回国时，得凭驻外使、领馆的有关证明购买他们按政策应享受的免税外国商品。

1987年10月，国家教委在《关于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的通知》中再次指出，对出国留学人员的教育、管理、服务是驻外使领馆的中心任务；目前对出国留学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要以“爱国、团结、自尊、创业”教育为基础。

以上是有关留学管理的政策性规定。另外，这一时期，对留学管理与服务还采取了具体的措施，其主要表现为：

第一，具体落实留学管理的政策。如1989年7月和10

月，国家两次召开驻外留学生管理干部会议，会议中分析了出国留学工作的形势，研究了以后的任务和工作方针，还就国家公费留学人员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提出了具体意见。

第二，成立相应的留学管理和服务机构。1989年，为加强对出国留学工作的宏观指导，国家教委成立了留学生司，其确定的主要职责是：拟定出国留学工作的方针、政策和计划，归口管理全国的出国留学工作，指导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做好有关留学人员的工作。

1988年12月，经国家教委批准，在原国家教委出国留学人员北京集训部的基础上，扩大成立了中国留学服务中心。该中心是具有法人资格的非盈利组织，其宗旨是为中国的对外教育交流人员提供多种形式的服务，特别是为出国留学人员回国提供双向选择服务。其所承办的主要业务有：为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提供信息咨询，为公派留学人员办理护照、签证等有关出国手续，为各类回国工作的留学人员和国内用人单位提供双向选择服务，为公派出国和回国留学人员提供食宿和交通服务等。1989年，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共为4463人办理了出国手续，接待学成回国的留学人员1379人，并为171人安排了工作。此外，还接待回国休假的留学人员392人，为11000多人次的留学人员提供了住宿和交通服务，为全国各地7150余人次提供了留学信息咨询^①。

国家教委留学生司作为统筹全国出国留学工作的行政管理部门，它的成立，是中国留学工作管理发展的重要标志。

^①《中国教育年鉴》（1990年），第383页。

中国留学服务中心，作为一个有政府背景的全国性留学生服务机构，成立伊始，它即在为出国、归国各类留学人员的服务中创下佳绩，并且在进入 90 年代后，该中心更是不断有所发展，成为中国为留学生服务的最重要机构。

在为留学生服务方面，除教育部门采取措施外，其他相关部门也落实了一些具体措施。如 1988 年，鉴于现行的制度造成留学回国人员安置不当，为解决问题，国家人事部成立了留学人员服务部，其作为全国人才流动中心的一个特设机构，专职负责留学人员归国后的工作安置问题，该机构的职责主要是：

(1) 定期向归国留学人员和准备归国留学生发布国内人才的需求信息，向国内各用人单位提供留学人员的情况并且为双方洽谈提供场所；

(2) 积极解决留学归国人员的编制、工资、福利、职位、职称问题；

(3) 为某些由于分配不当，而不能很好发挥作用的归国博士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工作调整；

(4) 对归国博士生的夫妻分居问题给予特殊解决，不受流向限制，凡是经批准调进北京、天津、上海三市的，不收取城市建设费；

从留学人员服务部所确定的上述职责来看，其政府行为的色彩较浓。它所面向的，主要是全国非教育系统留学人员。

留学工作的管理和服务的水平和程度，是留学运动发展的标志之一。其水平和程度，直接关系到留学运动的进程。

留学工作的管理和留学工作的服务，又是有所区别的两个

事物，前者政策性较强，着重点在国外；后者反映政策间接，着重点在国内。两者都对留学人员回国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留学工作管理和服，确是较上一时期有很大发展。

3. 学业的进步与广泛的活动

1987年到1989年，对留日运动来说，是个承前启后的时期。所以这样说，是基于两点理由：第一，相对于留日运动再兴看，这场运动，已走过了几年的历程，一些留学成果较之前一时期已更明显地显露出来，一些运动的特征也逐渐明晰；第二，从“留日热”来看，这一时期又正在兴起，而正兴的“留日热”必将给留日运动带来新的内容，引入新的特征。所以说，在至今已有十六七年历史的新的留日运动中，80年代末几年的时间是这场运动承前启后的时期，也是继往开来的时期。

在承前启后的这个时期，就留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来说，主要出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学习更勤奋。

这一阶段在语言学校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增加，较之第一阶段的留学生，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要低一些，然而他们并不气馁，利用在日本留学的有利机会刻苦进修，表现出了一种可嘉的学习精神。1987年11月11日日本《朝日新闻》中《留学生饱受日元升值之苦》一文赞许道：中国留学生的“勤奋与顽强”，是“无与伦比的”。文中介绍一位留学生，“处在‘常年没有休息日’的状态中，一边到日语学校学习，一边又要做

零工，他很有信心地说：“我要考学费低的国立大学，深入了解日本的文学和历史。””这样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有很多。这一阶段中国留学生勤奋学习的结果之一，是升入高等院校者明显增多。1988年日本《朝日新闻》中一篇文章报道说，据文部省调查，进入短期大学以上教育机构的中国自费留学生，1986年5月为3912人，一年以后增加到4936人，增长率为26.2%。这说明“留日热”尽管是以“就学生”增加为主要标志之一，但中国留学生的学习成效并没有降低，中国学生仍可视作是“优秀分子”。

这一时期中国留学生勤奋学习的结果之二，是他们的学习努力得到了日本社会更广泛的认可。1987年，从安徽医科大学毕业的金会庆，东渡日本，入东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留学期间，他深入地研究了预防医学中非疾病类交通事故这一尚无人涉足的领域。减少灾害，是全人类共同的奋斗目标，他用一年多完成了博士课程，然后在日本交通协会的资助下，边打工边研究，辛勤的劳作换来了丰收的果实，他的论文《中日驾驶员素质比较研究》一发表，就引起了日本有关方面的重视，东京大学教授要主动推荐他去美国深造。他的研究成果，填补了日本灾害学研究的一个空白。

当然，中国留学生在勤奋学习过程中，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必要予以注意并不断地加以改进。如《光明日报》访日代表团在几所大学里，都提到在日本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状况怎么样，对于这个问题，“东京外国语大学学长原卓也、东京艺术大学学长平山郁夫、京都龙谷大学学长信乐峻磨先生，都说中国留学生中不乏优秀者，他们勤奋努力，有使命感。但是，

龙谷大学负责留学生工作的木村胜造教授用委婉客气的语言谈了另一种情况。他说，龙谷大学1990年度招收各国和地区留学生137名，其中78名是中国留学生。留学生首先要学好日语，打好基础，才能听懂专业课。我作为留学生负责人，知道有的学生达不到这个水平。还有一些学生打工占用的时间过多，也影响了学业。这位教授还谈到中国留学生中部分人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较差。有的学生经常追着老师问‘我学什么’，不善于主动地去选题学习。有的教授坦率地说：这也许和贵国的教学方法有关吧。”^①显然，这些看法有不少值得我们深思之处。

第二，活动更丰富。

留学生们尽管打工艰苦，学习紧张，但他们没有将自己束缚于打工场所和学校课堂，仍然参加各种其他活动。有的是留学生们自己组织集会，有的是搞演讲，有的是闲谈式的庆贺喜庆事情。如一位先后入过早稻田大学和拓殖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东京中日文化会馆内作过以文学和国民性为题目的演讲，认为中日两国有完全一样的民族习惯和社会道德，把两国国民性重要方面写成文学作品，是文学家的职责。他还参加过由横滨地区华侨召开的民族振兴会。

留日学生活动的丰富性还表现在他们跳出留学生这个狭小的圈子，投入于日本的社会之中活动。如中央音乐学院男高音歌唱家王宪林，1988年考入东京艺术大学大学院歌剧研究科，跟随日本的世界一流女高音歌唱家东敦氏子学习声乐，获硕士

^①《光明日报》1990年12月10日。

研究生学位。1989年，他在日本第二届国际声乐比赛中获第二名，之后他多次应邀出任歌剧演出主角，被日本歌剧界称为是东京艺术大学实力派歌唱家。

留日学生从事多种多样的活动，丰富了他们的留学生活。

第三，交流更深入。

中国留学生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日本文化，而是积极地参与中日文化的双向交流。他们在了解日本文化基础上，积极地向日本人民介绍中国文化。一位留学生撰写了《从“收租院”的变迁看八亿农民的变化》的电视脚本，并随日本影片制作公司赴中国四川拍摄电视纪录片。他们通过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加深了对日本文化的认识，又进一步弘扬了中华民族的文化。

交流是留学生与日本社会沟通，与日本人民建立感情的最佳渠道。一位叫刘立善的留日学生在《崇山环绕友谊城》^①一文中记述了他在日本担任中文讲座讲师的故事。他在赴日之前和赴日之后，老师和朋友总叮嘱他：“最好是充分利用这个宝贵机会，除了踏踏实实地学好本专业知识以外，还要尽量多接触日本社会，只有这样才能进行真正的相互理解交流，才能较全面地了解日本。”他认为，自己在繁忙的学业之余，坚持长久而兴趣不衰地担任中文讲师，以此作为桥梁沟通了与日本人民的交流。他在文章中记述道：“记得在一次冈山大学留学生联欢晚会上，日中友协的友人对我说：‘在日本掀起与中国缔结友好城市的大潮中，新见市和河南省信阳市建立了友好往来关系。通过市长互访后，他们热诚为信阳市或培养林业研究人

^①《神州学人》1991年1期，第33页。

才，或传授水稻、水果栽培技术，或派遣小学生访华团与信阳进行校际交流。但在交往中甚感不便的，是相互间的语言障碍。”

“如果是那样，我愿意利用课余时间，到新见市开办一个中文讲座。”

毛遂自荐，一拍即合，新见市历史上第一个中文讲座终于在1987年盛夏里诞生了。开学典礼那天，出乎意料，竟一下子涌来了40多位学生，把教室挤得满满当当。《每日新闻》社派来了记者，市长、教育委员长等都出席了这富有历史意义的隆重仪式并致贺词，祝愿这个中文讲座成为架设在日中之间一座风雨难摧的友谊桥梁。

讲座每月举办两次，我从冈山市乘电车前去授课。课堂上，除了学习语言会话外，我还教唱富有代表性的中国歌曲，广泛涉及中国的民俗文化、风土人情、中日文学影响比较等，使听者大感兴趣，对中国有了更明晰的认识。同学们也热心向我介绍日本的、特别是新见的地方风土、历史文化乃至与中国友好之源流。书法家山口庄二先生是个十足的中国迷，他除了对几次访华感慨赞叹、赋诗作画外，还特意赠我一套新见乡土戏曲艺术“备中神乐”录音带和脚本。大泽女士驾驭已学的中文，沿古老的丝绸之路考察了闻名世界的敦煌文化。乡木规久子女士是一位退職高中教师，课堂上，她专心听讲，认真回答问题，像一个诚实的小学生；课后，她对我这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问寒问暖，十分亲切慈祥。她说：“我们非常崇拜历史悠久的中国文明，因为她是日本文化的母亲。迄今两次中国之行都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而第三次，我决定在刘老师毕

业归国后，去老师的家乡沈阳。”

几年来朴素真挚的交往，令人感到山城到处洋溢着清纯的友谊气氛，友人们简直把我看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市民，为了让我了解日本的乡土民俗，市里举办传统文艺活动时总邀我前去观赏；周围的名胜古迹我也都浏览了一遍；市民们及市政府与中国往来的信函、录像带内容乃至中日歌曲歌词的翻译等，几乎成了我的工作职责，当然，作为一个求学异邦的中国人，这些恰恰成了我向国际友人们介绍祖国的最好机会。在老班长阿部幸人先生的倡导下，同学们决定近年内访华旅游，一睹神州风采。

在课间休息或茶话会上，大家常常风趣地说：“将来再续编新见市地方志文化篇时，可别忘了刘老师是中文讲座的创始人，而我们都是致力于中日交流的一期生，多么自豪啊！”

1987年3月8日，在日本熊本市举行的外国人日语演讲大会上，中国自费女留学生赵丽娜获得了第一名。她在演讲中讲了三个内容：我使用日语中遇到的问题、一位日本好朋友、我对日本家庭的看法。她所以能获奖，应该说除了语言、表达外，还因为她用了一个好题目：《谈谈我对日本的印象》。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留学生与日本社会交流的重要程度。

第四，生活更清苦。

由于在“留日热”中大批中国自费生涌入日本，其中大部分又聚于东京，打工的条件相对困难了，一位留学生在信中说：“现在东京的几万名中国自费生中（自费生大部分在东京），上海来的占50%左右，福建来的占20%稍多，北京来的占20%。年龄基本上在20到30多岁。由于近几年来大批中国

自费生涌入东京，也带来了不少问题。人来多了，难免鱼龙混杂、良莠皆有。有些自费生思想素质差，文化水平低，说是中学毕业，实际上达不到。不少人没有经过系统的语言训练，有的连一句日语也不懂。有些是作个体户赚了钱就出国。现在自费生找工作比前几年难多了。最简单的工作是洗盘子，自费生来多了，现在洗盘子也人满为患。洗盘子的工资每小时在 600—800 日元之间，餐馆供给一顿餐，月收入在 12 万日元左右，学费、房租、交通、伙食费大约用去一半，尚可余下 5—6 万日元，能够找到这样的工作，算是好的了。但是日本的工作节奏极快，每天以工作 6 小时计算，再加上语言学校上课时间，以及来回路程，每天总要花 12—14 小时。一天下来，已经精疲力尽，用自费生自己的话来讲，每天不是走着回家的，而是爬着回家的。如果基本会话能过关，就有可能找上一个端盘子（跑堂）的差使，收入就可高些。上面两种差使是目前大多数自费生在做的工作。”^①

“据日本报界调查，一个自费生在日本每月最低费用约为 6—8 万日元，其中包括学费 2.5—3 万日元，房费 2—3 万日元，伙食费 2 万日元。这一标准在日本早已属于贫困线之下了。在日元升值，一美元只兑换 121 日元左右的今天，来自亚洲国家的大部分自费生单靠国内亲属汇款已越来越难以维持最起码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只能打工。大部分自费留学生所能从事的都是工资低的杂活。男的多在餐馆内洗碗，在大楼内清扫卫生，或在建筑工地作搬运工；女的则主要在餐馆

^① 伟君：《赴日自费生的困惑》，载《国际展望》1989 年 4 期，第 16 页。

内当服务员，有的则在各种酒吧、吃茶店内当女招待。随着外国自费生的大量涌来，日本出现了两种相反的价格波动。一方面是杂工工资下降，一方面是学费和房租直线上升。日本有人作过这样的计算，假设一位自费生每天平均劳动5个小时，每月劳动17天，每小时的工资收入为700日元，那么他每月的总收入才有6万日元，刚刚达到维持学习和生活的最低标准。日本有关部门规定，在日留学生每周打工时间不得超过20个小时。按此标准计算，一个月的总收入还达不到在日生活的最低基准。为了挣足学费和最低的生活费，在日本的自费留学生们只有两条出路可走，一是尽量多打工，二是进一步降低生活标准。他们常是早上5点起床，晚上12点睡觉，每天平均只睡5-6个小时，十分辛苦。过度的劳累和长期营养失调，使得一些留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恶化。与身强力壮的男留学生相

新留日运动经过数年发展，到这一阶段里，中国留学生取得显著成绩的人数不断增加。留学生取得的成绩包括，一是学业上的进展，二是在专门领域的成功。可喜的是，在自费留学生中，众多的人员从语言学校开始，接连地考入大学和攻读研究生学位。留学生在专门领域的成功，更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关注。在留日运动第一阶段里赴日留学的一名女留学生，以其亲身经历与体验写成了近20万字的《日本留学一千天》，此书1987年在国内出版后，1989年3月又由日本东方书店发行了日文版，在日本各界迅速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兴趣。留学生在留日期间，还有人被大学以及其他部门聘用，表明他们的才能和成就得到了日本社会的认同。1989年949名毕业的外国留学生要求留在日本工作，有707名获准，其中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有217名^①。

留日学生的学业成绩，还可用他们所取得的学位情况来说明。1989年，中国留日学生共有214人取得了博士学位。毕业于北海道大学的侯志新，这一年29岁，来自上海，1980年他作为第一批本科留学生来到日本，历经9年的拼搏，他如愿地拿到了博士学位。毕业于东京工业大学的范凯生，赴日前学的是自动控制专业，当他看到日本先进的交通系统与舒适的交通工具为人们提供极大方便时，毅然改学了交通规划专业。陈靖是为数较少的女博士生之一，在神户大学学习光学信息处理。

这214名博士生，年龄大的有40岁出头的“老三届”，如

^①朱心坤：《日本劳务市场的新动向》，载《国际展望》1990年18期，第21页。

在九州大学攻读电气专业的金新民，年龄最小的是龚三峡，他1963年出生在湖北宜昌，20岁到日本东京大学，学习固体物理专业，他说：“本人的目标是争取能在本领域的激烈竞争中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这214名博士学位获得者，归国前夕，编辑出版了《1989年中国留日博士研究生毕业纪念册》，作为对留学岁月的回顾，对学友的思念，对未来的憧憬。中国国家教委副主任滕藤为纪念册欣然题辞。

4. 留日学生社团的初步建立和发展

留学生社团组织，是留学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国大陆的“留日热”出现以后，留日运动向更成熟的方向发展，其标志之一是留学生的社团意识有所加强。他们将学习与组织社团活动联系起来，使学习生活趋向更全面、更丰富，对留日运动产生了有益的促进作用。

这一时期，留日学生的社团组织，以参加的人员划分，可分为两种，一是日本各地区中国留学生的团体，它们基本以地区冠名，这类团体一般地说成立较早，数量也较多，中国留学生较多的地区基本都有这样的团体，如东京地区中国留学生联谊会。在1990年8月23日闭幕的全国学联21届委员会会议上，该团体作为四个中国留学生组织之一，与全苏中国留学生总会、全法中国留学人员联合会、纽约市中国留学生学者联谊会共同当选为委员团体，由此可见其业绩不凡。二是国内各省的留学生在日本成立的团体，如日本中国留学生福建发展研究会。

日本中国留学生福建发展研究会，是40多名福建籍留日学生为促进福建省的经济、科技、文教事业发展而自发组建的，1988年成立，大阪大学留学生陈学海、饶平凡分别担任会长、秘书长。研究会的主要活动方针为：利用在日留学的有利条件，为福建省有关部门提供所需的经济、技术、市场等信息，并结合省情献计献策；积极向日本社会各界人士介绍福建的情况，吸引他们赴闽旅游、经商、投资；发挥在日本可以和台湾同胞广泛接触的优势，增进海峡两岸的交往；为广大留学生回国服务打通渠道，介绍情况，提供便利；出版研究刊物，举行有关的学术讨论会等^①。该研究会得到了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福建省人民政府、旅日福建华侨和日本友好人士的大力支持，他们还希望与在世界各国留学的福建同学取得联系，共同为家乡的建设出力。

这一时期，留日学生的社团组织，以活动内容划分，也可分为两种。一是联谊性的团体，这类团体建立的比较普遍，活动内容也比较广泛。其活动既有自助性的，也有社会性的。如1987年中国大兴安岭发生火灾后，京都地区中国留学生联谊会组织留学生为灾区捐款，并以联谊会的名义发回慰问信，信中说：“灾情的每一则报道及至气象的每一点变化，无不牵动着海外学子的神经。火在吞噬着绿色宝库的同时，也在撕裂着我们的心！在此，我们除向你们遥致深厚的慰问之情及崇高的敬意，并随信附上我们的捐款，数额有限，但饱含着我们的忧

^①《日本中国留学生福建发展研究会》，载《神州学人》1989年1期，第39页。

国报国之志。”^① 二是学术性的团体。这类团体有逐渐增多之势。

留日学生的学术性团体，可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活动内容比较广泛的团体，如中国留日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即属此类，留学生们在研究会中“交流研究成果，谈古论今，指点时政。”^② 一种是活动内容专一，专门性比较强的团体，如中国留日学生摄影会、京都大学中国留学生经济学会即属此类。中国留日学生摄影会于1989年10月1日，由十几位留学生在东京银座筹备成立，发起人有黄金树、吴立群、徐丰年、周剑生、徐沛、江汀、杜小鸥、高萱、周建平、钱斌、徐颀、郑园园。他们中有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和各分会会员，有普通摄影爱好者。该会“以热爱摄影艺术、交流创作经验为基点”。摄影会成立后，“在摄影会的组织下，有志于提高中华民族摄影艺术的留学生们将开展各种摄影活动，并将在日历即将翻过20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一页时，举办摄影展览会，向日本观众展示出具有中华民族风格的艺术作品。”^③ 京都大学中国留学生经济学会是以京都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攻读博士、硕士课程的中国留学生和农学部部分博士、硕士留学生为主成立的，其宗旨是：首先是要以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的实践为中心学习研究讨论，同时立足于国外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广泛搜集第一手资料，开展经济发展战略的比较研究，提

^①王俞：《祖国，高于一切，大于一切——记我海外学子为大兴安岭森林火灾募捐救灾活动》，载《神州学人》1987年3期，第45页。

^②陈志江：《赴日留学面面观》（一），《光明日报》1989年11月30日。

^③徐颀：《中国留日学生摄影会成立》，《华声报》1989年11月7日。

出对中国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一些切实可行的设想；其次是立足对日本及其他各国历史的、现行的经济制度和政策的比较研究，理顺几种经济发展的模式，避免陷于对尚存争议的个别理论及无从解释的国际新经济现象的理论问题进行空泛、抽象的议论；再次，是在一定学习研究基础上汇总成果，并逐步扩大对外联系，以广开思路，推动更深入地展开讨论研究^①。根据该研究会参加人员和其宗旨来看，它是一个比较高层次的留学生团体。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留学生社团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 社团意识是在留学生活中自然形成的，社团组织是在留学过程中自觉建立的。

(2) 社团的建立与活动，得到了华侨以及日本各界的支持。如社会科学研究会得到了日本财团法人国际文化会馆的大力支持；学会活动时，许多日本著名学者、教授也前去参加。摄影会成立时，得到了著名华侨摄影家黄金树的大力支持。

(3) 社团的建立与活动，得益于日本特定的优越社会条件。如日本社会高度的摄影艺术与发达的摄影器材为摄影会的成立与活动提供了有益的外部条件，在这种环境中，留学生们“增长了不少见识，开拓了艺术视野，从而激发起努力学习和创作的热情。”^②

(4) 社团组织较完善。如社会科学研究会活动得很有规

^①杨发金：《出国知识概览》，科学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98页。

^②徐颐：《中国留日学生摄影会成立》，《华声报》1989年11月7日。

律，每月聚会一次。

应该说，这一时期中国留日学生的社团，基本还属于初创阶段。一般性的社团多，专门性的社团少；普通性的社团多，较高层次的社团少。对于大多数社团来说，其活动多处于浅层次上，至于像留日学生摄影会那样专门，像京都大学中国留学生经济学研究会那样高层次的社团还不多。

第 三 节

出现的问题与日本政府的整顿

1. 超时打工与严格限制

留日学生打工，是新时期留日运动中出现的现象。

相对于新时期留日运动来说，80年代末期日本政府极为重视时，留学生打工又是由来已久的问题。

学生打工，是当今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社会与家庭提倡的问题。

中国留学生打工，主要的还是迫不得已，不打工，绝对维持不了在国外的生存，但留日学生在打工中所出现的问题，是指超时打工。

日本政府规定，留学生可以每周打工20小时。若以每小时打工挣700日元计，每人每月收入6万日元左右。而6万日元，在日本是难以维持生活的。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守法打工，生活困难，影响学业；违法打工，违背法律，也影响学业。在实际生活中，中国留日学生往往选择了后者，自费留学生中以挣钱为目的去日本的不说，即使是真心赴日学习追求学

位的留学生，往往也如此。超过每周 20 小时限制打工，是中国留学生中普遍的现象，差别就在于超过是多还是少的问题。

留学生超时打工，其后果是多种多样的，直接后果是读书时间减少，影响学业；间接后果就更多，有的男留学生走上犯法道路，有的女留学生做陪酒女。

日本人大野芳在《一个中国姑娘在日本的遭遇》一文中记述了上海姑娘小李在日本留学的一段历程，从她的经历中，人们会看出某些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轨迹。小李 23 岁，1987 年 4 月下旬赴日本，先进语言学校，刚一入学，似乎很有学习劲头，争分夺秒地学日语。多少懂点日语后，她去打零工，从挣钱少的店打到挣钱多的店，挣多了一点钱，她就寄回家。打工时间长，她的学习开始下降。去日本的当年，她的学习出勤率为 95%，在班里属领先者，到次年 3 月底，她的出勤率已降到了 44%，远远地低于延长签证所需的 80% 的出勤率。校方通知她，如此下去再办延长居住手续已不可能。她到美国大使馆申请签证，大使馆拒绝说：“日语还没有学好，为什么要到美国去？”在日本的居留期限过后，她得到了延长两个月的许可，就在她不得不做回国准备的期间内，与一个台湾男子同居了，再就与友人断了音信。

留学生超时打工，固然有留学生本人的原因，但将这一问题放在大的社会背景下，就会发现有很多促成它的因素。

首先，留学生打工适应了日本社会对劳动力的需要。据日本政府发布的消息，截至 1989 年 10 月 1 日，日本人口为 12325 万，比上一年增长 47 万，出生率为 0.38%，这是二战以来的最低增长率。就人口年龄而言，14 岁及 14 岁以下人口所

占比例一直在不断下降，1989年仅为18.8%，而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则持续上升，1989年达到11.6%。按照联合国的规定，65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超过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进入80年代后，日本20岁到60岁的劳动适龄人口每年以80多万人的幅度递减。劳动力日益严重不足，对日本经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东京工商研究中心于1990年6月14日发表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1989年度因人手不足而倒闭的企业全国为244家，比上年度的82家增加了近两倍。帝国数据资料情报中心的调查结果也表明，1990年1月至7月有122家企业因人手不足而倒闭，其中建筑业为58家，创了历史最高纪录。劳动力不足还导致了工资成本上升，物价随之提高，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

几万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做最苦、最累、收入最低的工作，受到了日本中小企业的欢迎。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日本民间，对此都很清楚。另外，日本政府对研修生这一劳工资源也极为重视。1991年，法务省、劳动省、外务省和通产省就外国研修生在研修结束后的一定期间内在同一企业就业达成一致，其被允许的就业期限为1—2年，日本计划“每年接受主要是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研修生10万人左右，除有助于消除中小企业人手不足外，还可促进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①

一位中国留日学生说：“尽管日本政府一再重申日本禁止纯劳动力的输入，但是，以赢利为目的的日本服务业以及现代

^①赵明：《日本将允许外国研修生在日就业1—2年》，《华声报》1991年10月8日。

的日本人非高价而不肯从事的诸如建筑等重体力劳动行业，却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些众多的难以用语言讲清楚的，却又无法在报纸上公开的苦衷，从另一方面来讲，也正是那些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就学生们至今仍然在增加着的原因之一。……（1988年）一些建筑工人打着标语，在东京都中心大久保地区游行，高呼中国就学生滚回去的口号，其原因倒并不是因为他们仇恨中国人，而正是由于中国的来日就学生，充当了建筑行业的廉价劳力，使得建筑业的老板们，把日工资从过去的三万五千日元降到了今天的六千日元，却仍然每天都在吸引着那些急待于寻找工作的中国人。”^①

从实际情况看，大批的中国留学生确实在充当着日本的廉价劳动力。

其次，留学生超时打工有日本语言学校引导、纵容的因素。有些语言学校大肆宣传能为就学生介绍勤工俭学的机会，并有意渲染能挣很多钱，但就学生来日后，语言学校却撒手不管，听任就学生去寻找打工的机会，或者给就学生介绍低薪的体力活，从中捞取“回扣”。有的语言学校为了使就学生能在早上9点钟赶去打工，在早上6点半到8点半上课，每周上5天课，因此只相当于政府规定的20个课时的一半，而且上课的许多学生由于打工十分辛劳，晚上睡眠不足，都趴在课桌上睡觉。

留学生超时打工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1988年，日本文部省主管私费留学生和日语教育的官员说：“过去来日学语言

^①吴国民：《留日学生心态录》，第79-80页。

的，主要是为了进大学，这不成问题。但近两年来，‘打工留学生’激增，其中不乏伤风败俗之人，影响了社会秩序。”^①日本前驻沪总领事吉田也说：“日本政府吸收外国学生来日留学的目的在于通过这些优秀青年达到让外国正确理解日本。现在这批来自中国的打工生干最底层的工作，拿最低的报酬，过最艰苦的生活，不可能对日本有好感。”^②

鉴于各方面的情况，1989年，日本政府开始对留学生超时打工提出了严格的限制措施。3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出入境管理和难民认定法修改草案，并提交国会讨论通过。其主要内容是：（1）实行不符合资格的人就业许可制度。各种语言学校的就读生，经过申请，每周最高可以打20个小时零工，违反者将采取强行驱逐出境等措施。（2）对于雇佣外国非法就业者的雇主和掮客，严加处罚。对于明知是非法就业的外国人还要雇佣的雇主，以及为非法就业的外国人介绍工作的掮客，处以3年以下的徒刑，或课以20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3）对外国人建立发给表明可能就业范围的“就业资格证明书”制度。

1989年12月，日本国会讨论并通过了“入管法”修改草案，其中对留学生超时打工和对雇主的限制、处罚办法从1990年6月1日起正式生效。

日本法律对留学生超时打工做出严格的规定，再加上对雇主制定出惩罚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对问题有所控制。

^{①②}陈清华：《就上海留学生问题走访日本文部省》，载《国际展望》1989年1期，第12页。

2. 语言学校泛滥与严格审查

中国留日学生，即使在国内是大学毕业，赴日后一般也须学习一段时间日语；多数人，还是为学语言而去。80年代初，留日学生不是很多，日本的语言学校也不多，全日本大概只有几十所。这一时期，语言学校一般也比较正规。1984年赴日的一位女留学生记述了她所在的语言学校的情况：“日语基础差的自费留学生初到日本得先专门进修一段时间的日语。在日本各地，为外国人提供这种学习条件的日语学校数量相当不少。我到日本的第一年就是在东京拓殖大学附设的日语学校学习日语的。这所学校在同类学校中虽不能说首屈一指，却也堪称名列前茅。它有五十多名教师和几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学校根据学生的不同需要开设了各种教学课程。以程度划分，有初、中、高级班；以学习期间划分，有三个月一期的，也有六个月一期的；另外还设有日间班、夜间班等等。进入这个学校感觉最新奇的是，学生的所在学习班级并不固定，而是根据每次考试的成绩不断加以调整。成绩好的不断提上去，成绩坏的不断刷下来，一次又一次地循环。刚进日语学校的头一天就是一场考试，根据程度编班。我最初是被编在B班（A班为程度最低），后来经过一场又一场的考试，渐渐由B班升到C班、D班，……跟我一同步步登高的同学不少，可也有些人直到一年后我们都从日语学校结了业，却仍旧停留在A班原地未动。这种日语学校的教学方法也与中国的外语院校不同。它不是把外语作为一门专业来教授，而只不过是帮助你由此得到在日本生活的最基本能力，也就是教会你起码的说和听

的本领。所以，上课时既没人给你一字一句地分析语法，也没人教你用日文写东西。学生们只是鹦鹉学舌般地跟着老师十几遍、几十遍地练习了一个个句型。在课堂上，我常常觉得我们这些大人都像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似的大张着嘴‘牙牙学语’。而我们的老师们也确实就像幼儿园里的阿姨——绝大部分老师是女的，而且很年轻。她们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地登上讲台，总是用微笑的眼睛看着你，用柔和而亲切的声音向你发问、讲述，并且特别喜欢在讲课时使用大大小小儿童玩具似的‘教具’。……日语学校的学习是紧张而愉快的。说紧张，不光因为每天都要满满当当地上六节课，还因为考试很频繁，隔不久就要来一场，万一考得不好就有被‘刷下去’的危险。说愉快，不光因为老师个个都可亲可敬，在这学到的东西天天能‘立竿见影’，还因为无论在哪个班级里，你都能感受到同学之间的深厚友情。”^①

中国“留日热”兴起后，日本的语言学校必然要增多；反过来看，中国兴起“留日热”，也有日本语言学校推波助澜的作用。1988年至1989年，日本各地的语言学校大增，并已到了泛滥的程度，这时期，全日本约有500所。这些学校中，固然不乏真正有志于从事日语教育者，但多数还是为赚钱而办。为扩大招生人数，很多日语学校根本不考虑学生的质量、有无学习能力和升学的可能，只要交钱便可入学。所以，35—45岁的“老学生”并不少见。更有恶劣的日语学校，或同风俗产业结合，或兼营打工斡旋，一手向学生要钱，一手向招工者收

^①小草：《日本留学一千天》，第63—64页。

费，真可谓生财有道。当然，这些日语学校的教学质量也很难保证，往往找些根本不懂文法和教授方法的家庭妇女来凑数。与此同时，专门为日语学校拉学生的“黄牛”也应运而生，除日本人外，先是一些台湾人、香港人，后来就学生中的个别上海人、福建人也插了进来。

泛滥起来的语言学校，以赚钱为根本目的，它们赚钱大致有以下办法：第一，滥发入学许可证。有的语言学校为了赚钱发放了几千张入学许可证，远远超过学校的定员。第二，伪造各种证明、文件和材料。日本语言学校为了扩大生源，为来日本学习的就读生提供伪造的担保人证明书和公司印章。由于入国审查管理日益严格，各种伪造的证明有所减少，但仍然有为数不少的学校以每份 50000 日元的高价向就学生推销更新签证、延长居留期限必不可少的有关证明。第三，在生活方面拼命榨取，进行盘剥。有些学校以拥有学生宿舍为诱饵，但提供的却是非常简陋和拥挤的宿舍，男女学生混居一起。据说还有个别就学生由于宿舍狭小，晚上只能在上野公园里过夜。但即便如此简陋、拥挤不堪的宿舍，每人每月还得支付 30000 日元的房租。有一个中国汤面连锁商店为了招募廉价的雇工，就特地开办了一个语言学校，在该校学习的大部分就学生课余就在连锁商店打工，干的是很重的体力活，拿的却是很低的薪水。第四，违反课时和定员的规定。入国管理局规定语言学校每班人数不得超过 40 人，但新大久保的一所学校每班竟有 150 人。为了赚钱，日本语言学校超额招募学生已是常事。第五，对教学敷衍了事，教育水平低下。许多日本语言学校的教育水平十分低下，大部分教师素质非常差。由于聘请正规的日语教师需

要支付高薪，因此大部分学校就聘请家庭主妇或自由职业者来教日语。这些仅仅经过2个月短期培训就登上讲台的日语教师肯定是不合格的。

1989年底，一位自费留学生去日本，他是这样记述语言学校的：我到达东京，安顿好住处立刻到语言学校报到，可是来到学校一看，大大出乎预料，与想象中的学校相差甚远，后来我才知道东京的语言学校几乎都是如此。虽然这些学校多冠以什么“国际”、“亚细亚”、“学院”之类的名称，但大都不具备办学的基本条件。许多语言学校没有院落（更别提运动场了）和像样的教室，而是用临时租来的几间办公室或民宅作为教室。就连一部分教师也是临时招聘的，就像留学生在餐馆里刷碗一样，不过是来语言学校打打工而已。有的教师根本没有教学经验，被学生们三句两句地一问就蒙了。更有甚者，有的语言学校因为中国学生占大多数，使用中国老师来教日语。我们学校租用的民宅是一栋二层小木楼，有门厅、厨房、厕所、客厅等，大一些的房间用作教室，小一些的房间用作办公室。报到时接待我的办公室主任是个娶了位大连姑娘的日本人，他说要测验一下我的日语水平，根据测验结果来分班。我被带到一间空教室开始答卷子，我非常认真地答卷，希望能答得好一些直接插入中级班。可是那位主任极力想说服我上初级班，费尽周折才总算如愿插到了中级班。开始上课后才发现许多学生并不好好学习，迟到早退和旷课现象很普遍，上课说话聊天吃零嘴儿都不足为怪。最使人想不到的是，原以为只要到了国外有个好的语言环境整天灌也能把日语灌出来，然而每天去学校学日语时用得最多的还是汉语。因为学生中会汉语的人很多。

语言学校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上课，作息时间是上午9点至中午1点。前三节课是必修课，最后一节是选修课，上完第三节课时已经12点左右，有的学生要打工，有的早就饿得溜回了家，再加上选修课也不记考勤，所以上选修课人不多，细算起来，每周上课时间不足15小时^①。

日本语言学校这一严重社会问题的产生令人深思。严格地说，日本政府尚无关于语言学校的明文规定和限制，这就使得形形色色的语言学校有机可乘，有空子可钻。按照日本学校基准法，对于得到都道府县知事认可的各类学校，都有各种各样的严格的标准。从建筑物归学校法人所有和定员的测算，到窗户的大小和厕所的数目，都有非常详细的要求和标准，而且这些学校都归文部省管理。但是日本各类语言学校的就学生所持有的是4—1—16—3签证，须得到法务大臣的认可。因此语言学校的学生不属于文部省管辖范围，而归法务省管，而法务省办理有关语言学校认可的业务，只是对就读生进行就学前审查。结果，由于法务省对教育管理知之甚少，因此对于各类语言学校是否合格就非常模糊。正是由于日本尚无有关语言学校的严格法规，才导致各类语言学校泛滥成灾，误人子弟，并酿成严重社会问题。

语言学校问题如此严重，与“外国就学生接受机关协议会”（简称“外就协”）有一定关系，它是归法务省管辖的。任何语言学校，只要提出申请交纳4万日元的人会费和4.8万日元的年会费（后来改为7万日元的人会费和6万日元的年会

^①葛笑政：《东京の诱惑》，第209—211页。

费)就可以入会。加入“外就协”以后,其校名便可刊登在日本凡人社发行的《日本语言学校便览》上,而这本书是唯一的一本刊登有日本语言学校名单的公开出版物,因此“外就协”所属的学校在国外非常出名,然而,由于任何语言学校不经过审查都可以入会,因此“外就协”所属的大部分学校都是不合格的,有的甚至滥发入学通知书和提供伪造的担保人证明书。

1988年10月,日本政府对赴日就学生入境审查实施若干新规定,致使大量持有护照申请赴日就学生未能得到入境签证,陷入困境之中,上海随后发生了要求签证的人在上海日本总领馆前游行示威的事,一些语言学校被骗取钱财的事也频频被曝光,日本政府不得不开始重视。据日本文化厅的调查,日本国内各种日语学校大约有200所是一般的语言学校。对于这些民办语言学校,日本没有严格的法律限制,它们实际上和私塾一样,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因此各类语言学校的课堂、教学方法、教师的素质和学校的管理都是十分混乱的。1988年10月,日本宣布对各类语言学校进行整顿,文部省随即设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以调查研究各类语言学校必须具备的教育条件。该调查委员会于1988年12月23日公布了日本各类语言学校的运营标准,并决定从1989年4月1日起开始施行。

根据运营标准,在学校教育方面,学生修业时间原则上必须在一年以上,总课时一年不得低于760小时,每周必须上课20小时以上。除此之外,一个班级的学生和各类专修学校必须限制在40人以内,上会话课时希望一个班级的学生能够控制在20人以内。如果学生不到60人,学校必须配备3名教师,学生每增加30人必须多配1名教师,专职教师不得低于

整个教师数量的一半。另外，各类语言学校的教师仅限于日本各类大学日语教育专业的毕业生和经过专门资格考试的合格者。

在学校设施方面，除配备图书室、卫生保健室、教师办公室等必要设施之外，学校总面积不得低于 115 平方米，平均每个学生所占的面积必须在 2.3 平方米以上。校舍的所有形态，以“经营者自己所有”为大原则，同时对租借的校舍也予以承认，但必须确保具有稳定的教育场所。考虑到语言学校的特殊性，希望各个学校配备若干生活指导人员，以帮助赴日就学生逐渐适应日本生活。文部省还将与法务省密切配合，使各类语言学校的运营标准在入国审查上得到体现，凡是不符合标准的各类语言学校将得不到法务省的认可，凡是持有这些不合格学校入学通知书的申请赴日就学学生，入境管理局将不予办理入境签证。

1989 年 1 月 13 日，日本宣布 23 所语言学校不合格，予以关闭。整顿学校是好事，但同时也使一部分留学生陷入困境。1 月 15 日，《光明日报》以《日关闭二十三所日语学校，五千名外国就学生陷入困境》为题刊登消息：“据《朝日新闻》早刊报道，日本法务省于 13 日以乱发入学许可证和超额招收学生为由，一举取缔了位于东京和神户等地区的 23 所非法日语学校（其中东京 20 所，埼玉县、栃木县和神户市各一所）。自去年 11 月上海青年到日本驻上海总领馆门前闹事之后，12 月份一个由日本法务省、外务省和文部省组成的联合调查团即赴中国北京、上海等地访问，对当地赴日学生签证发放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回国后，他们又对日本国内的各类日语学校的

教学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结果发现，为了盈利，二倍乃至四倍超定额招收学生的非法日本语学校竟多达数十所。这类学校将被分批予以取缔。第一批被取缔的 23 所日本语学校不准再发入学许可证，在上述学校学习的学生的签证不得再次延长。这些学生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日语学校和经济保证人。受到影响的各国就学生（绝大部分是中国学生）多达 5000 余人。有关上述学生的善后工作，日本语学校和日本政府有关部门不负任何责任，学生的转校问题全部委托给外国就学生接受机关协议会处理。近来由于天皇病逝，日本饮食、旅游业一直不景气，许多就学生打工找不到工作，加上日本法务省采取上述措施，他们在生活和学习上将陷入更大困境。”

1 月 18 日，《光明日报》再以《日取缔 23 所日本语言学校未做善后工作，我部分留学生在东京举行抗议活动》为题刊登消息：“为抗议日本法务省一举取缔 23 所日本语学校，而对有关学生的善后工作不闻不问的不负责任的举动，部分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今天在被关闭的‘明治日本语学校’门前举行了抗议活动。该校属被关闭的 23 所学校之一，招生定额为 1300 人，但它却在中国上海等地发放了 2500 多张入学许可证。举行抗议活动的学生向行人分发了传单，上面写有‘希望日本今后采取不损害留学生一切利益的负责任的行动’的口号。根据日本法务省规定，被关闭的日本语学校不得再发放入学许可证，在校生的签证也不得更新延长。受到此举影响的 5000 名各国留学生必须在今后一二个月内转入其他日本语学校。如何转校、谁来接收、转学费用由谁支付、新的经济保证人如何落实等都成了问题。留学生们的抗议行动正是由此引起的。学生

们的抗议行动得到了‘明治日本語学校’的部分教员和市民的支持。”

事态严重后，法务省召集被关闭的 23 所日语学校负责人，当面宣布，除一所学校情节特别严重以外，其余 22 所学校必须在半年之内进行整顿，若不加以改善，对于拿到这些学校录取证的人，不再发放入境签证。半年后，一所学校受到了让学生全部转学，今后停止招生的处分，6 所学校继续观察，其余学校有所改善，获准招生。

1989 年 5 月 9 日，日本教育振兴会成立，文部省责成该会对日语学校进行审查，并且以后每 3 年审查一次，合格者成为该会成员，未经审查的学校，其录取学生不予发放签证，其学生延长居留手续也不予办理。1989 年 9 月 12 日，振兴会已认定 77 所学校为合格学校，它们是：

道都総合専門學校

東京國際學園外語専門學校

文教大學言語文化研究所

イーストウエスト外國語専門學校

イーストウエスト外語學院千葉校

イーストウエスト外語學院千葉中央校

専門學校神田外語學院

駿臺日本語學校

明生外語アカデミー

OLJランゲージアカデミー

ソニーランゲージラボラトリー—新橋スクール

東京日本語センター

日本語センター
富士国際學院
アカデミーオブランゲージア；ツ
インターカルト日本語學校早稻田校
カイ日本語スクール
国際學友會日本語學校
財団法人国際教育振興會日本語研修所
新宿日本語學校
東京外語専門學校
東京工學院日本語學校
東京國際大學附屬日本語學校
東京ランゲースクール新宿本校
東邦日本語學院
日本外國語専門學校
日本文化言語學院（JCLI）東京校
ランテクス日本語學校
アジア學生文化協會留學生日本語コース
東京小石川日本語學校
日中學院
ウイズ外語學院
同文外國語學院
青山スクールオブジャパニーズ
永漢國際學院日本語學校
江戸カルチャーセンター桜丘校
江戸カルチャーセンター東校

河合塾國際教育センター
財団法人言語文化研究所附屬東京日本語學校
東京日本語學院
文化外國語專門學校
東京教育專門學院龜戸校
東京教育專門學院大井校
國際學園日本語學校
日本語學校東京語學院
ICA 國際會話學院
國際會話センターICC 日本語學院
システム桐葉外語
專門學校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スクールオブビジネス
サンシャイン外語學校
サンシャインビジネス社會副社專門學校
日本興德學院
日白日本語學院
わいこ外語學院
淑徳保育生活文化專門學校
東洋日本語學院
力行國際學院 JMA 日本語學校
ジェット日本語學校
東京外語學園日本語學校
赤門會國際文化部日本語學科
東京ランゲージスクール上野校
東京 YMCA 日本語學校

東進日本語學校

飛鳥學院

外語ビジネス專門學校

專門學校トライデントスクールオブランゲージ

ソニーランゲージラボトリー名古屋スクール

名古屋 YWCA 學院日本語學校

財団法人京都日本語教育センター京都日本語學校

京都イングリッシュセンター日本語科

大阪 YMCA 國際專門學校

大阪 YWCA 專門學校

関西國際學友會日本語學校

神戸 YMCA 學院專門學校

神戸 YWCA 學院專門學校

有益語學學院

南日本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スクール

振興会所认定的合格学校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诸如神田外语学院之类的专门学校，进入这种学校的学生，日本法务省发给的是留学生签证（即 4—1—6 的在留资格），持有留学生签证的人比持有 4—1—16—3 签证的就学生具有许多优越性。第二类，诸如国际学友会日语学校、东京 YMCA 日语学校之类的学校。这些学校历史都比较悠久，教师素质好，教学质量也比较高，而且这些学校的学生毕业以后考取大学的比例很高。第三类，80 年代中后期成立的语言学校。这些学校当中也有教学质量和教员水平都比较高的，但也有不少学校虽然被认定是“合格”的，但有时也通过掳客超额招收学生。

通过整顿，日语学校泛滥的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对于留日运动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3. 掮客的出现与留学生上当

按照日本的规定，外国人到日本来上日语学校，必须有日本人作保证人。日本人当保证人，意味着要向日本法务大臣作保证，保证所担保的外国人在日本居留期间不从事非法活动，代之承担法律责任。这就是说，被保证人在日本出了事儿，保证人要负责。正因为这样，日本人不轻易为外国人当保证人。

新时期留日运动之初，“许多日本友好人士和民间团体都在关心照顾中国留日学生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有的直接担当留学生的经济保证人，有的则以各种方式提供多方面的援助。然而，由于近几年中国赴日自费生增长过猛，友好团体和友好人士难以招架，不敢再为留学生担任经济保证人。日本政府作出的努力也远远不能满足留日学生增长的需要，于是各种各样的经济保证人便应运而生。这类经济保证人大致有以下几种：留学生通过其亲友介绍，委托某个日本友人或华侨充当经济保证人；有的是留学生本人在国内工作或学习期间与某商人或旅游者邂逅相逢，要求其担任自己的经济保证人；更多的则是由日语学校代为‘就学生’寻找的经济保证人。这种保证人多是由学校出面与附近某个公司的人事部门建立合同，校方支付一定的酬金，便可自由地借用公司职员的名义作保证人，有的公司职员作了某位‘就学生’的经济保证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在上述几种经济保证人中多数只是名义担保，在经济上对‘就学生’不承担任何义务。一旦某个‘就学生’出

现什么意外时，经济保证人大都避而远之，根本不负责。由于得不到切实的经济保证，有的留学生一踏上日本国土便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困境，机场无人接，学校无人领，食宿何处一切都是未知数。有的‘就学生’为了还债，不得不在经济保证人指定的工作场所打工，保证人从中抽头。不少‘就学生’空闲时还得为保证人收拾家务。个别女‘就学生’甚至被迫与保证人同居。‘就学生’们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忍受的精神上的屈辱与痛苦，远在国内的慈母们是无法想象的。”^①这说的是最初的情况。后来情形则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留学生找保人困难的情况下，便出现了专事为留学生“买”保证人的掮客。

做掮客的，有在日华侨，有台湾人，有中国留学生。有的留学生到日本后一不学习，二不打工，专门办理出国留学手续，少则每人赚一二十万日元，多则几十万日元。有的“人贩子”与语言学校相勾结，各取所得。由于“人贩子”为有些语言学校做出了“贡献”，所以一些学校还给“人贩子”提供假出勤表和成绩单，以便使“人贩子”能顺利通过出入境管理局的签证延期审查，个别“人贩子”发展成专业化的流水作业，他们雇佣专人负责成批抄写各种材料回国兜售。

1988年，日本的大型综合刊物《文艺春秋》登载了东京御茶水女子大学研究生山口玲子女士的调查报告，山口女士在文章中提到了一个上海的“人贩子”，称这个“人贩子”身着廉价西装，却随身携带上百万日元的现金（由于日本各银行间

^①陈志江：《赴日留学面面观》（二），《光明日报》1988年12月1日。

的计算机联网存取自动化及信用卡的普及，据调查，日本人出门携带的现金一般只有三五万日元)，“人贩子”不打工不上学，整日游手好闲。然而，经这个“人贩子”之手办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千人以上。

做掮客的，还有日本人。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了这样一起事件：东京都某区一个叫高木的公司职员，用非法手段轻而易举地获取了大批纳税证明书和居民票，用这些资料伪造了150份“保证人证明”，以每份5万日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名姓周的中间投机商，姓周的投机商通过两名上海人转手，以每份六七万日元的价格将这批“保证人证明”出卖给上海的就学生。此案东窗事发，当事人被逮捕，中间商在逃，80多名受害的上海就学生不得不为重找保证人而四处奔波。

一些专事掮客勾当的人，除了通过关系个别办理自费生出国外，他们还在中国境内公开活动，为此，中国国家教委、公安部发出通知：国内外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在中国招收自费出国留学人员。通知说，有一些国内外的组织和个人，擅自在我国社会上，公开或私下为“外国学校”招收学生。有的在报刊上刊登广告；有的公开在我学校设考场；有的“外国学校”下委托书，国内有关单位或个人接受委托为其招生。更有甚者，有的组织和个人以“自费出国留学咨询”或“帮助联系、安排自费出国留学”为名，不择手段地赚钱牟利，弄虚作假，使不少人上当受骗。通知指出，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我国的教育主权，违犯了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特别是国家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规定，必须迅速加以制止。为此，特通知如下：

(1) 国家对自费出国留学已有明确规定，凡符合国家规定

的，应予支持。但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违反国家规定。

(2) 符合自费出国留学条件的我国公民，要求出国留学，可以按国家规定自行联系或借助亲友帮助，落实国外的接收单位；出国护照，由本人向公安机关申请；出国签证，由本人或委托中国旅行社向外国驻华使馆申请。

任何国内外的组织和个人均不得在我国承办“联系和安排自费出国留学业务”。

(3) 为便于出国留学人员了解国家的出国留学政策和国外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学术水平及其他有关情况，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国内有关组织可以成立非盈利的、以服务为目的的出国留学咨询机构，向中国公民提供出国留学咨询服务。咨询人员应该是熟悉国家留学工作政策和国外情况的人员。咨询工作可按规定收取一定手续费，但绝不允许从中牟利。

(4) 任何国内外的组织和个人在我国国内为外国及港澳地区的学校等单位招生，即在我国内设立招生机构、刊登招生广告、设考场、办理考试业务等，必须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否则一律不得进行。

(5) 对在某些地方出现的私自承办为外国学校招生、联系和安排自费出国留学业务等活动，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主管部门，应会同当地公安部门进行审查、整顿。对已设立的未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的为外国学校招生的机构和出国留学咨询机构，应予撤销，个别已经有关部委或地方政府部门同意成立的，也需重新报国家教育委员会审批，未经同意前，不得继续开展活动。对违反国家政策和规定的国内组织或个人，要严肃处理。对通过未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的国内外组织或

个人招生或联系、安排、获得出国留学证明，提出自费留学申请的人员，公安部门不予办理出国手续。

掮客为想要出国留学的人“买”保人，“买”不到时，他们便私下伪造证件，把假证件卖给欲留学的人。他们先是伪造担保等证书，后来干脆发展到伪造日本入境管理局的审批件。为此，日本使馆及入境审查部门对证件的真实性极为关注。据日本当局的一次调查，1988年，有70%的中国留学生使用了伪造证件。持伪造证件的人，有的侥幸进入了日本，有的则被拦截而回。1988年底至1991年初，日本整顿日语学校，其原因也有打击伪造证件的考虑，日本政府在整顿学校的同时，也开始加强入境审查，同时开始严厉打击伪照证件的行为。

4. 留学生经济问题有所解决

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所出现的问题，实质上都与经济有关，与日本社会对他们的支援程度有关。

在日本，对外国留学生有所帮助的民间团体也有，如日本国际教育协会、国际学友会等。

日本国际教育协会（财团法人），位于东京都目黑区驹场4—5—29。它是在文部省和各大学的协同下，为外国留学生服务，促进留学生交流事业的机关。该协会领取日本文部省的补助费，从事与留学生有关的各项事业。例如，留学生会馆的经营管理，政府奖学金生赴日的迎送，住宿补助、医疗补助制度的实施，自费外国留学生学习奖励费的支付，留学生与日本人的交往，自费外国留学生的统一考试等。

在日本学习的外国留学生学成回国后，该协会仍对他们提

供某些帮助。例如，根据回国留学生的愿望，定期给他们邮寄专业杂志及学会杂志等。亚洲、太平洋地区及非洲各国领取日本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学成回国后，如学术上有所成就，该协会将再邀请他们到日本国内研修三个月，旅费及在日费用由日方负担。

日本国际教育协会下设机构有：（1）经营留学情报中心。该中心负责对自愿赴日留学人员提供日本教育情况及与留学有关的情报资料。（2）国际大学交流中心。该中心在日本有关大学的协助下，邀请外国学生在暑假期间去日本参加讨论会，有关日本社会及文化的座谈会、联欢会等活动，并组织他们参观日本的教育设施。

国际学友会（财团法人），以通过留学生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增进国际亲善为目的，利用国家补助费从事以下工作：（1）经营日本語学校。在东京开设国际学友会日本語学校（地址：东京都新宿区北新宿 3—22—7），在大阪开设关西学友会日本語学校（地址：大阪市北区扇町 75），对赴日留学生进行日本語预备教育。（2）经营管理留学生宿舍。在仙台和京都经营留学生会馆，在东京为国际学友会日本語学校设立宿舍。

日本国际教育协会和国际学友会均由日本文部省管辖。

日本各大学也设有外国学生科。其主要任务是为留学生提供有关的咨询和指导。但由于人力编制所限，这些设在大学里的外国学生科不可能为自费留学生提供很多的实际帮助。一些华侨社团或华人、华侨开办的企业也可能为中国自费留学生提供帮助。

日本还有一个叫“日本留学协会”的非盈利性的民间团体

(地址：东京都新宿区改代町2商城大厦)，成立于1987年2月1日。该协会为自费留学生提供的(有偿)服务项目主要有：一、代办入学、入境手续。二、提供语言学校的资料。三、代联系安排住处。四、介绍兼职工作。五、指导升学。六、提供在日身份保证人。七、代办各种保险手续。

以上各团体对外国留学生的帮助，其作用毕竟有限，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还享受不到他们的恩泽。进入1988年，中国留日学生中的问题进入了总爆发的阶段，这种爆发一是在中国，一是在日本。在中国，由留学日本而引起的纠纷、诈骗不断，出现了跨国间的索赔，出现了在日本总领事馆前的示威游行；在日本，众多留学生陷入困境，出现超时打工、荒废学业、介入社会丑恶现象中。

留日学生问题出现，引起了中国各界的思考，出现了对中国留日运动进行反思的端倪，如一篇题为《日本留学热的反思》的文章，文内的小标题分别为：语言学校还是商业学校、留学与留“钱”、生活的悲与喜、“留学”的利与弊、出走与回归、不是题外的话等，共6个，其反思的味道颇浓。大批中国人留学日本，本应是件好事，他们除了学习日本先进的科学文化之外，还要深入日本社会，结交各种阶层的日本朋友，他们是中日友好运动中的“民间大使”，起着沟通与促进两国文化及感情交流的桥梁作用。

但是，中国留学生赴日后，在学习、打工期间得不到日本社会温情的照顾，极易对日本产生反感情绪。他们大量涌入后，多从事日本人不愿干的简单劳动，报酬低，受歧视。有人指出：“如果日本政府再不对此作出反应，那么问题将会进一

步深化和扩大。”^①有人建议：“从长远讲，为了把赴日留学工作引上正轨，中方应随着国力的增强，逐渐加大公费生所占的比例。同时严格有关自费生出国的审批工作，使其稳步增长。日方应严格区分‘就学生’与劳务进口两者之间的区别，适当开放其国内劳务市场。日方还应当逐渐增加用于资助各国留学生的奖学金金额和各种投资，在接收外国留学生方面作出自己切合实际的努力。通过派遣教师、提供教学设备、教材等，健全国外日语教学体制，使外国留学生在来日之前就具备一定的日语基础，一踏入日本国门就可直接升入大学深造。就当前而言，希望日本采取切实步骤，进一步整顿各类为外国人开办的日语学校，严格对经济保证人的审查。对于那些已经受理的自费生的入国审批手续应加快进行，凡属符合条件者，应及时予以放行。对于那些与国际‘倒爷’内外勾结，通过发放空头招生名额等手段，从申请赴日留学的中国青年人身上牟取暴利的日语学校或个人，日本政府有责任对其进行干预，促其给申请者退款，不能让申请者吃亏。并且要采取坚决措施，尽量杜绝类似的行骗事件再次发生。”^②

有识之士不能不认识到，留学生中的问题不解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伤害中日两国人民感情的严重社会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在整顿语言学校的同时，也开始进行了一些援助中国留学生的活动，并且得到了日本社会的响

^①朱心坤：《丑态百出的日本语言学校》，载《国际展望》1989年1期，第14页。

^②陈志江：《赴日留学面面观》（五），《光明日报》1989年12月12日。

应。如日本政府决定，把原仅向 500 人提供的学习奖励费（每月 4 万日元）从 1989 年起向 8000 人提供；通产省向全国各大民间企业发出通知，希望民间企业能将空余的职工宿舍向留学生开放，对此，一些经济团体和企业表示响应，有的很快付诸行动；文部省还打算进一步扩大享受文部省奖学金（每月 17 万日元）的留学生名额，一些私立大学也开始向留学生发放奖学金。

另外，日本广泛的社会各界也向留学生伸出了支援之手。一位留学生说：“1987 年即将入冬之前，东京许多友好的民间组织、团体或个人自动地发起帮助外国留学生过冬的活动，他们将不少生活用品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留学生。在此影响下，我们学校也搞了一次类似的活动。那天，教职员工们将各自带来的东西集中在一间大教室里，留学生们可以任选自己需要的用品，所有物品没有价格，只在门口放置了一个纸盒子，留学生们选好用品出门时自觉自愿往里放钱，放多少全凭良心和各自的生活条件。”^①

以上各种措施和行动，反映了日本朝野对留学生问题的重视。但是，由于措施不多，程度有限，并且能享受得到的多是就学生之外的留学生，如 1988 年东京成立的社会科学奖学金，每年向 5 名中国留学生每月奖励 5 万日元，其奖励对象是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因此说，1988 年前后日本朝野所发动的对中国留学生支援活动，只能是说对留学生有所帮助，但并没有解决重要问题。

^①葛笑政：《东京の诱惑》，第 211—212 页。

第 三 章

留学日本运动方兴未艾 (1990—1996)

第 一 节

留学生生活走向新阶段

1. 学业成绩日益提高

历史刚刚进入 90 年代，中国即制定了有关留学的重要政策，也是新时期以来留学运动的重要政策，即 1990 年 2 月 10 日开始实施的《关于具有大学和大学以上学历人员自费出国留学的补充规定》（教留〔一九九〇〕十四号文），其主旨就是对自费留学人员设服务年限。该政策出台后，各地方亦纷纷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如 2 月 26 日辽宁省教委下发了《关于具有大学和大学以上学历人员申请自费出国留学有关问题的解答》，

其全文如下：

问：申请自费出国留学为什么要到省教委来审核，审核什么？

答：国家有关规定指出，国家按计划培养的，具有大学和大学以上学历人员，有为国家服务的义务，对他们实行定期服务的制度。他们只有完成为国家服务的年限后，才能申请自费出国留学。为此，国家规定，他们在申请领取自费出国留学护照之前，须先到省教委审核是否已经完成了为国家服务的年限。如已完成，由省教委出具证明，前往公安部门申请出国护照。

问：“具有大学和大学以上学历人员”是指哪个范围而言？服务期年限是多长？

答：具有大学和大学以上学历人员包括：

1. 全日制高等教育机构公费在读专科和本科生、双学位生、研究生班学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2. 未完成大学和大学以上学业的中途退学人员；
3. 大学专科和本科毕业生、获取学位毕业生、研究生班毕业生、硕士和博士毕业研究生；
4.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成人高等学校公费在读学生和毕业生。

全日制高等教育机构公费本科毕业生、获双学位毕业生、研究生班毕业生、硕士和博士毕业研究生，在读四年级以上学生（含四年级学生，下同）、研究

生的服务期均为五年（不含见习期和脱产进修时间，下同）；四年级以上学生、研究生中退学人员的服务期亦为五年；二年制和三年制专科毕业生的服务期分别为二年和三年。

全日制成人高等学校公费专科毕业生的服务期为二年，本科毕业生的服务期为五年。

问：那么，四年级以下大学生的服务期间问题如何对待呢？

答：全日制高等教育机构公费在读四年级以下（不含四年级）学生和全制成入高等学校公费在读学生在偿还学习期间国家负担的培养费后，可申请自费出国留学。自出境之日起八年内回国服务的，退还其所交的培养费。

问：入学前已有工龄的人员和在职研究生的服务期年限应如何计算？

答：入学前工龄已满五年的本科毕业生、获双学位毕业生、研究生班毕业生、硕士和博士毕业研究生的服务期为二年；工龄满二年不满五年的，服务期为三年；工龄不满二年的，服务期仍为五年。

对确已承担教学和科研任务的在职研究生，可将研究生学习阶段的年限折算成全时服务年限，与入学前的工龄合并计算。满五年的，服务期为二年；满二年、不满五年的服务期为三年；不满二年的，服务期仍为五年。

全制成入高等学校公费本科毕业生入学前工龄

已满五年的，服务期为二年；工龄满二年、不满五年的，服务期为三年；工龄不满二年的，服务期仍为五年。

问：听说对侨眷有些照顾，那是怎样规定的？

答：国家规定：归国华侨、国外华侨、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和外籍华人（简称六类人员，下同）在国内或内地的直系眷属：配偶及子女、孙子女和外孙子女（均含配偶）；非直系眷属：亲兄弟姐妹及其子女（均含配偶）。属在读或退学的全日制高等教育机构公费学生或研究生，如申请自费出国留学，须提交六类人员在境内、外定居的有效证件的复印件和直接负担申请人全额经济资助的证明，由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侨务部门或台办对其眷属身份按有关要求核实。六类人员的直系眷属自费出国留学可免交培养费，非直系眷属在偿还学习期间国家负担的培养费后，可申请自费出国留学；属应完成服务期年限人员中的六类人员直系眷属可免除服务期，非直系眷属在偿还培养费后，亦可免除服务期。

问：请你归纳一下，哪些人申请自费出国留学需交培养费，交多少，交到哪里？

答：全日制高等教育机构公费在读四年级以下（不含四年级）学生和全日制成人高等学校公费在读学生及上述人员中属六类人员的非直系眷属申请自费出国留学，均须偿还学习期间国家所负担的培养费。在读四年级以上（含四年级）学生和研究生中的非直

系眷属，在偿还实际学习年限累计的培养费后，可申请自费出国留学。

全日制高等教育机构 1990 年的培养费标准为：专科生每学年一千五百元；本科生每学年二千五百元；硕士研究生每学年四千元；博士研究生每学年六千元。今后，国家教委将根据培养费的变化，对上述标准酌情予以调整。

申请自费出国留学的在读学生偿还培养费，由其就读学校收取，并为交费人开具收费证明。

全日制成人高等学校公费学生的培养费标准，由所在单位根据实际提供的学习费用决定。

问：偿还培养费如何计算，钱交到哪里？

答：偿还培养费的计算方法为：按全日制高等教育机构在读学生当年的培养费标准，计算出申请自费出国留学的人员实际学习年限中累计培养费金额的总和，除以其应服务的年限，得出每年偿还培养费的平均金额。每服务一年减免一年的培养费，服务满九个月按一年计算。入学前已有工龄的人员和在职研究生，按折算后的服务期年限进行减免。

本、专科毕业生交纳的培养费由其原就读学校收取；硕士和博士毕业研究生交纳的培养费由其最后毕业的学校收取。此经费列入学校特种资金收入款项，由收取单位为交费人开具收费证明。

问：申请自费出国留学人员，如拟出国时现职工作又离不开怎么办？

答：完成服务期年限的在职人员自费出国留学，应提前半年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已与单位签订聘用合同（协议）的人员，须认定其已履行合同（协议）后，方可申请自费出国留学。

问：非全日制成人高等学校公费在读学生和毕业生申请自费出国留学，所在单位可参照国家有关规定，考虑其已有工龄，对服务期和偿还培养费等作出相应规定。

问：申请自费出国留学人员来省教委审核时，须提交哪些材料？

答：（1）国外寄给申请人有关出国留学的全套文字材料及其复印件（一份）和翻译件；（2）申请人的学历（含所获学位）证明及复印件（一份）；（3）单位人事部门出具的申请人完成服务期年限的证明（从有工龄时算起，分段叙述。特别是要标明见习期、脱产进修和读研究生等的时间段）；（4）申请人属六类人员的眷属所提交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侨务部门或台办的证明；（5）申请人提交的未完成大学和大学以上学历的退学证明和偿还培养费证明；（6）申请人属未完成服务期年限的非直系眷属所提交的偿还培养费证明；（7）申请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同意其自费出国留学的证明。

上述材料交到省教委后，将在十五天内提出审核意见。符合规定者，通知申请人持二寸免冠照片一张，前来填写《大学和大学以上学历人员自费出国留

学申请表》。经审核部门负责人签字、加盖公章，为其出具证明。申请人可持此证明前往公安机关申请出国护照。

办理上述审核手续的申请出国留学人员，要向省教委交纳人民币十元手续费。

问：办理审核手续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答：有。申请人必须如实、准确地提供有关材料。

对提交的证明材料不完备或有疑义时，将通知申请人做必要的补充。省教委有权向有关单位、个人进行调查、索取和核实有关证明材料。有关单位和个人应予协助。

申请人不得隐瞒或虚报事实，提供伪证。否则，一经发现，拒绝为其开具证明。对提供伪证的单位或个人予以通报，并提请有关部门予以纪律处分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具有大学以上学历人员自费出国留学需满足服务年限的政策实施后，虽然后来证明留学日本人员中绝大多数还是自费生，但它相对来说还是对留学活动有所抑制。

90年代伊始，中国制定紧缩的留学政策，日本也刚刚对留学生问题进行整顿，致使“留日热”明显降温，直至90年代中期，留日运动一直处于在平稳状态中发展。

在平稳状态中发展的留日运动，基于十几年发展的积淀，使得留学成绩更加趋向于突出。其成绩之一，就是留学生的学

业成绩日益提高。

曾在新潟大学作教授的涉谷武先生回忆，他带过的第一名中国留学生叫赵喜晨，来大学法学部作研究生时，48岁，需人翻译才能与他互相交流。他发誓，一年后交给您日语论文。他也是涉谷武教授收下的第一名外国留学生。赵喜晨从零开始学日语，一年后果然提交了4万多字的日语论文《中日交流的留意点》。从此之后，涉谷武教授喜欢上了中国留学生，几年间共带了10多位^①。

1991年11月旬，日本OVC专门学校副理事长中田高道访问中国，说起在他们学校读书的中国学生，称他们都很聪明。他还提到一位中国留学生，他来自中国东北，刚到日本时语言完全不通，但他坚持读完两年摄影专业又读了另一个专业，1991年10月拿到了第二专业毕业证书^②。OVC专门学校原名日本写真专门学校，是日本创办最早的一所高等摄影专门学校，已有30多年的历史，中田高道对在你们学校读书的中国留学生极力称道。

中国留日学生学业成绩提高的标志之一，是一批优秀留学生脱颖而出。如1996年4月6日，茨城大学博士课程黄斐增、东京医科齿科大学博士课程周怀谷、日本医科大学博士课程张家昆、东京大学研究生博明姝以及从中国华侨大学、暨南大学派遣来的各5名及其他共30名中国留学生获得了日本东华教育文化交流财团的奖学金。该财团成立于1988年，为了推进

^①段耀中：《留学生，留下什么？》，《人民日报》（海外版）1996年1月3日。

^②逢丽莹：《中田高道谈中国留学生》，《摄影报》1991年11月14日。

中日两国间留学生交流、增进两国间的相互理解和友好，9年来共有数百名中日两国的留学生获得了他们的奖学援助和研究支持。这次获奖的中国留学生，是在381名应征者中严格审查后挑选的。该项奖学金向每人每年支付96万日元，一旦决定便可获连续两年的资助。

中国留学生的学业成绩同样获得了日本社会的承认。1988年底到东京大学作客座研究员的中国留学生赵军，留日期间内，在中国和日本的学术杂志上发表近20篇上百万字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论文，1995年11月13日在神户举行的“堀川哲男孙中山研究纪念奖”颁奖仪式上，他获得了纪念奖的殊荣。“堀川哲男孙中山研究纪念奖”是为纪念已故著名学者、京都大学堀川哲男先生而设立的，这次是第二次颁奖。42岁的赵军，以其丰硕的研究成果，在众多应征的孙中山研究者中独占鳌头，日本一些著名的学者如陈德仁、山口一郎、狭间直树等给了他很高的评价。

1992年的一天，日本雅马一学生征文比赛“当前引人注目的日本农业其变化和对策”的授奖仪式在东京隆重举行。在佳作、优秀和特别优秀奖授完后，会议主持宣布：最高奖获得者为中国在日本京都工艺纤维大学读书的女留学生陈瑞英。而后，《日本经济新闻》、《全国农业新闻》、《日本蚕丝新闻》和《农机新闻》等报纸对此做了报道。3年前，日本著名农机厂家雅马农机株式会社倡导并出资发起了雅马学生征文比赛，其目的在于面对日益萎缩的日本农业，唤起青年人对未来日本农业的兴趣和注意，探寻以科学技术为基础，建立具有魅力的现代产业化农业的途径。征文的命题为：“当前引人注目的日本

农业其变化和对策”。作者可围绕这一命题，就日本农业的粮食生产、农业经营、育种和栽培技术、农业机械、设施系统、粮食加工、市场流通机构、农业政策、农村社会和文化、城市和农村的关系等问题，自由设定题目，就面对 21 世纪的日本农业“应有的姿态”、“希望的姿态”大胆构想，就其实施过程、方法，做出合乎逻辑的论述。征文的对象是专门学校、短期大学、大学和研究生院 30 岁以下的在校学生（包括出国留学的日本留学生和在日的各国留学生。集体创作也可以）。本次征文共收到 65 所院校的共 99 篇论文。参加者既有农学专业的学生（占 30%），也有其他领域包括经济、经营、文学、法学、理工学科、社会学、国际学、教育学和医学等学科的学生（其中 4 名在日留学生，26 名女生）。结果陈瑞英的《依靠无菌养蚕复兴日本的蚕丝业》一文，征服评委，独占鳌头，赢得本次最高奖大赏，获得百万日元大奖。陈瑞英《依靠无菌养蚕复兴日本的蚕丝业》一文，根据其导师松原藤好教授多年前提出的无菌养蚕的理论，用自己近年来研究的成果，把自古以来养蚕受时令（限于有桑叶的 5—10 月）限制的季节性生产，改用人工饲料，实行无菌养蚕，使养蚕成为可以常年连续作业的产业化生产，进而使养蚕、产茧、制丝、纺织到流通形成完整的生产体系，从而推动丝织业的发展，带动相关产业，推动地域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专家们认为，陈的构想和研究成果，具有相当的经济价值和前景，如能推广实施，将使省力、低耗、优质、安定、高产的蚕丝业成为可能，为日本和世界的蚕丝业的发展做出贡献。千叶大学教授唯是康彦在评讲中认为，陈的论文提出的用人工饲料无菌养蚕技术，振兴衰退中的

养蚕业，题目就很有意义，过去我们日本人，往中国派遣唐使，努力学习中国的一切，学来了养蚕技术。今天，一位中国女性，从中国特意来到日本，研究日本的养蚕业，探讨其发展、振兴的方法，这本身就是一个佳话。国民经济研究协会理事长叶芳和对陈的论文和文章中振兴日本养蚕业的建议，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这篇建筑在专业基础上的论文，可能会对日本的农业带来很好的影响，授予大奖是值得的。日本经济新闻社岸康彦说，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在全国到处采访，对地方的情况比较了解，最使我佩服的是陈论文中注重了地域社会和地域经济。虽然，中国的女性论述养蚕这一点很具新闻价值，但我推选她决非因此。陈瑞英所在的学校京都工艺纤维大学也引以为荣，校长在该校全体留学生大会上，对陈瑞英同学取得的成绩和认真钻研的精神给予高度赞扬，号召大家向她学习。陈瑞英的导师松原藤好先生更是高兴，因为这不仅标志着他带出了一个好学生，更重要的是他多年来所提倡的人工饲料无菌养蚕的理论通过陈的获奖得到了专家和社会的承认。他认为：陈的论文，由于展示了蚕丝业在农业中重要性而受到注目。他对领事馆教育领事说：陈在日本大学生、研究生参加的大赛中夺得第一名，确实令人高兴，陈现在所从事的研究在日本领先10年，与其他国家比，领先二三十年，如果不是日本学制限制严，她在1994年就可获博士学位。他感谢中国送来了这样优秀的学生^①。

^①魏能涛：《中国留学生陈瑞英获百万日元大赏记》，载《神州学人》1994年2期，第41—43页。

以上的事例都说明，这一时期中国留日学生的学业成绩以及围绕学习而取得的成绩，比以往任何一个留日运动时期都突出。

中国留日学生的学业成绩也得到了中国国内各方面的认可。1992年4月底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科协首届青年学术年会，30多名日本等海外中国留学生来到了会场。中国科协是联络全国科技工作者的民间团体。1991年科协“四大”换届以后，新一届常委会认为很有必要搞一次全国规模的青年学术会议。他们认为，这样一次全国规模的青年科技会议既可以检阅一下全国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科研水平，又可借此机会引起社会有关部门对科技、对青年科技人才的足够重视。国家教委留学生司在得知将要召开这次会议的消息后，立即会同中国科协向有关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发了电报，以期通知更多的留学生提供论文，并决定为论文入选者回国参加会议提供方便。同时，国家教委还将为参加会议的留学生代表提供返程旅费。后来，短短三个月时间，执委会收到了从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荷兰、瑞典以及俄罗斯等10多个国家寄来的留学生应征论文164篇，其中有62人被邀请作为正式代表参加。由于各种原因，最后实际来参加会议的留学生代表有34人，这个比例要比国内从8700多篇论文作者中选出6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的比例要高得多。来自日本的留学生任福继、范莉馨是一对夫妇，两人为年会合写的一篇论文以及范莉馨单独写的一篇论文都入选了。来自日本的另一位中国留学生田德在日本研究了一种风能发动机，他说，希望把自己的技术带到国

内来变成产品，成为中国人的专利^①。

留日学者、重庆邮电学院无线电系光通信教研室讲师史朝翔，作为日本文部省奖学金获得者，正在东京大学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学习和工作。他给全国科协的信中说：“当得知我有幸荣获第二届中国科协青年科技奖后，我的心情十分激动，久久不能平静。此时此刻，身在异乡的孤独，海外求学的艰辛，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以及作为一个中华儿女，对伟大祖国那种斩不断、理不清的情感，一齐涌上心头。在这里我只想说说：感谢祖国人民对我的培养，感谢国内那些曾经培养、关心、爱护过我的老师和同学们。”^②

中国留日学生的杰出留学成绩，使他们的一些优秀者频频出现在国内的一些荣誉场合。如 1993 年参加国家新春联欢会的留学生回国人员共有 283 名，其中留日人员有 50 名，其情况如下表：

1993 年参加新春联欢会留日回国人员情况表

姓名	年龄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学位	归国时间
旭日干	52	内蒙古大学	教授	博士	1984
饶平凡	36	福州大学	副教授	博士	1989
罗毅	32	清华大学	教授	博士	1992
李赞东(女)	33	北京农业大学	副教授	博士	1988
高文	36	哈尔滨工业大学	教授	博士	1991

^①朱国亮：《留学生回国参加青年学术年会侧记》，载《神州学人》1992 年 4 期，第 9—10 页。

^②蒙梓：《科技新秀聚京华》，载《神州学人》1991 年 5 期，第 27 页。

第五篇 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的重振和热潮

续表

姓名	年龄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学位	归国时间
王祖温	37	哈尔滨工业大学	教授	博士	1992
黄伟光	28	中科院工程热物理所	博士后	博士	1991
龚刃韧	38	北京大学	副教授	博士	1988
苏都莫日根	30	北京大学	讲师	博士	1991
卢东斌	48	中国人民大学	讲师	博士	1991
郭庆光	34	中国人民大学	副教授		1992
韩大元	32	中国人民大学	副所长	硕士	1991
陈强	37	清华大学	副教授	博士	1992
潘伟	36	清华大学	教授	博士	1991
张贤达	46	清华大学	教授	博士	1987
靳卫卫	36	北京语言学院	讲师	硕士	1992
程明	45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	副研究员		1987
张祥永	38	北京理工大学	讲师	博士	1992
赵彤	41	北京理工大学	教授	博士	1992
郑小琦	3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讲师	博士	1989
薄永林	33	北京医科大学	副教授		1992
周占祥	37	北京农业大学	副教授	博士	1990
万发荣	37	北京科技大学	副教授	博士	1988
张洪敏	33	北京化工学院	讲师	博士	1991
张培军	31	北方交通大学	副教授	博士	1988
李文彬		北京林业大学		博士	1992
黄瑞生	50	国防科工委	副研究员		1989
左继承	36	中国音乐学院	讲师	硕士	1992
陈锡先	37	北京邮电学院	副教授	博士	1990
吕廷杰	38	北京邮电学院	副教授	硕士	1991
张夫也	37	轻工部	副主任		1992
蔡国雄	41	能源部电力科学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博士	1986
何昌荣	32	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博士	1989
程展	31	国家海洋局环境预测中心	副研究员	博士	1991

续表

姓名	年龄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学位	归国时间
汤洁	32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副研究员	博士	1988
韩朴	39	石油科学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博士	1988
作克让	48	电子科学研究院	副教授	博士	1986
龙国庆	42	华能公司	总经理助理	博士	1992
魏加宁	35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咨询研究员	博士	1990
彭勇	37	工人日报社	编辑		1990
韩德明	42	北京市耳鼻喉研究所	主治医师	博士	1990
曹婉红(女)	27	北京市农科院	助理研究员	硕士	1992
刘景元	41	北京工业大学	讲师	硕士	1991
燕秋梅(女)	32	北京经济学院	讲师	硕士	1992
于燕生(女)	48	南开大学	副教授	博士	1992
孙彦	30	天津大学	副教授	博士	1991
杨延相	31	天津大学	副教授	博士	1989
郭富常	36	天津市农科院	副研究员	博士	1991
齐丙辰	40	天津师范大学	副研究员		1992
王小平	45	天津师范大学	教授		1991

他们参加这种活动是一种荣誉，也是国家对他们留学期间、回国后所取得成绩的充分肯定。

2. 留学生活动趋向多样化

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中国留日学生的社会活动有了较大发展，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出版活动渐趋活跃。

80年代，中国留学生已在日本开始了办中文报刊的活动，他们所办的主要有：

《中国留学生通讯》，由东京地区中国留学生学友会主办的通讯性期刊；

《新大陆》，留日学生组织创办的刊物，1988年10月创刊；

《留学生活》，由京都地区中国留学生联谊会主办的综合通讯性刊物，后来改为《岚山》继续出刊；

《留日青年》，由大阪中国留学生学友会主办的综合性期刊，有一定的政治性。

进入90年代后，中国留日学生的出版活动有所发展，一是不仅原有的报刊继续存在，另外，新的报刊又有创办，二是图书出版活动明显增加。

1993年9期《神州学人》杂志转引自《南方周末》报道：“随着留日中国学子的不断增加，日本的中文报刊也应运而生，特别是近两年，中文报纸发展之迅速，可称史无前例。截止5月底，由在日中国人主办、定期出版的中文报刊已达十几家，每期总发行量高达10万份以上。历史最久的当数1988年底问世的《留学生新闻》。该报创刊时仅十几页，发行量亦只几千份。现在发展到40页，拥有3万多名读者。去年问世的《中文导报》首创第一面与最终面彩色印刷的先例，并且以可读性强赢得广大读者。进入1993年，留学生办报的势头更是有增无减，第一份半月刊报纸《半月文摘》（12版）于4月问世；第一份对开八版报纸《东方时报》在4月印发了创刊号。留学生报纸在保持中国大陆报纸风格的同时，注意吸取日本报刊的长处，在版式上有创新。如去年创刊的《日中新报》针对大部分读者是日本人的特点，编出了日本人容易接受的版面。全日本中国留学生联谊会机关报《中国留学生报》及机关杂志《新

大陆》，以大陆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为中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留学生们在紧张的学习与打工之余，不忘弘扬中华文化，靠各自的努力开创出崭新的新闻事业。这十几家报的总编辑，除两三家是日本人挂名外，其余均为大陆学子。”

另据 1996 年 10 月 18 日《中国新闻》发自日本的报道：“近年来日求学和经商的中国人多了起来，一度几近匿迹的中文报刊重新相继涌现。《中国留学生》、《时报》、《留学生新闻》等刊物在中国人经营的食品店、录像带商店随处可见，一位在新潟大学专攻中文传播的博士生段跃中曾作过统计，近年在日出现的中文报刊已不下 20 种，这些报馆不但出报，又兼翻译、广告、排版、出版。中文与英语一样，在日本社会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这则报道使用了《“中文产业”在日本悄然兴起》的题目，可见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报刊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效应。

代表 90 年代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出版活动水平的最主要标志，就是 1996 年 8 月 11 日至 12 日在新潟成功地举办了“首届在日中国人新闻出版活动成果展览”。展览会上，出自在日中国人之手的 100 多册日语著书参加展示，1000 多名日本朋友参观了展览。新潟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教授多贺秀敏先生认为，这样的展示在日中关系史上尚是第一次，反映了在日中国留学生的显著成果，树立了中国留学生的崭新形象，增加了日本人对在日中国人的理解，在中国人留日历史迎来百年之际有着重要意义。本次展览是“战后 50 年新潟和平论坛”的参加项目之一，以现代留日中国人的新闻出版、日语著书活动为中心，本

着交流、借鉴、促进的目的，再现中国留学生的奋斗足迹，高扬中国留日学生的顽强精神，由新潟大学大学院从事“现代留日中国人和21世纪的中日关系”博士课程研究的中国留学生段跃中提议、具体承办。段跃中认为，尽管中国人的日本留学历史始于1896年，但中国人的日语著书活动仅仅是这10年来的事，鲁迅、郭沫若、孙平化等一大批已故或健在的留日英杰，在日期间或归国以后，写出了大量的震世之作，并有不计其数的作品被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但他们还没有过直接用日语出版单行本的历史。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炎黄子孙，掀开了中国人留日100年的崭新一页，创造了留日中国人直接用母语以外的日语著书立说的光辉历史。段跃中说，中国政府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来日中国人的新闻出版活动，始自10年前，一年比一年活跃。10年来，由在日中国人发行的华文、日文报刊，总数超过50种。现在继续发行的报刊大约有15种，每期累计发行数高达10万册以上。在日中国人直接用日语写的著作，已经突破100册大关，并且中国人的日语著书活动正迎来高潮，这都是中国人留日史上从未有过的。

首届在日中国人的新闻出版活动成果展示分为三大类。一是在日中国人发行的纯中国语报刊、日中两国语报刊、日中英三国语报刊和日语报刊。二是在日中国人的日语著书，包括直接用日语写的、翻译的、编辑的，以及留日中国人用中文写的被译成日语出版的，约100本。三是中国驻日记者的日语著书和日本人写的有关在日中国留学生的专著。

日本人士对展览的反响很强烈，好多人说这样的展览有助于日中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应该多办。日本最有影响的《朝

日新闻》记者接到东京总编辑部的通知，专门采访了展览。第二天的《朝日新闻·新潟版》，在突出版面图文并茂地报道了本次展示。当天晚上的NHK电视台、新潟电视台等分别在新闻节目里报道了展览。当地报纸《新潟日报》和《长冈新闻》等也在显著位置报道了展览^①。

展览结束后段跃中说：“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准备，首届在日中国人的新闻出版活动成果展示顺利、成功地举行了。当我扛着那二米多高的广告牌回到研究室的时候，真是百感交集。一方面，在日华人无不对日本报刊媒介的中国人犯罪报道感到非常愤慨。另一方面，现代中国留学生在岛国留下的辉煌的成果少有人知。这种反差与不平，说到底是我们自己如何把中国留学生的新形象传达给更多的日本国民。新潟大学多贺秀敏教授非常理解我的用心，是多贺先生的支持，我在异国他乡作了一次小小的尝试，有人称赞展览在日本华人史上是第一次。这能不令人高兴吗？为吸引更多的日本观众参观展览，除了通过当地的新闻媒介宣传外，我还印刷了大量的传单，或放在中华料理店、或请新潟的民间团体散发。在8月11日开幕的当天，我又把前天晚上准备好的300份展览说明一一发给陆续来看展览的朋友。然而仅用了三个小时，展览说明就全部发完。第二天，除又增印200份外，我还把当天《朝日新闻》的大篇幅报道复印了100份，但还是满足不了观众的要求。我在展览说明里，把展出的约50种报刊作成一览表，把100余本日本语著

^①岳钟：《首届在日中国人新闻出版活动成果展览在新潟举行》，《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年8月16日。

书的作者姓名和著书册数整理到一起，一些日本朋友看了以后说：‘光是这份展示目录，就能说明中国留学生的实力。’两天的展览，接待了 1000 来人次参观者。他们对中国人的新闻出版活动非常有兴趣，特别是中国人直接用日语写的书，因此想购买者不少。他们说，这些书在一般的书店里都没有，可又很想读一读。在他们的一再要求下，只好在展览结束的时候，把其中几册重复本卖给了他们。对其中十来册只有一本书，我将替他们向书店统一预订。现在，我又有了新的点子。对这次展完的华文报刊、日语著作，除了我个人好好研究、向社会介绍这些资料以外，还应该让更多的人查阅、利用。我建议设立一个‘中国留学生文库’，或者‘在日华人新闻出版信息中心’把凡是能收集到的各种资料汇到一起，像图书馆那样保存、管理，然后向社会公开开放，最后贡献给北京图书馆或祖国的研究部门。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能办到的，需要所有华文报刊社、所有中国人著者、所有在日的中国人、所有热心中日文化交流的中日朋友的大力支持。因此，借办展览的机会，我编写了《在日中国人的新闻出版活动成果展示资料集》，可以说这是有关现代在日中国人的新闻出版活动最为全面、最为详细的资料集。全书分为 6 部分，加上图片约 10 万字的篇幅。”^①

第二，社团活动发展迅速。

日本东北大学博士、中国留学生杨克俭说：“考察当今留

^①段跃中：《树立海外儿女新形象》，《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 年 8 月 23 日。

日学人的现状，可以说其最大特点之一就是近几年留日中国人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立，随口就可以列出许多来，如全日本中国留学生学友会，各地区、大学的学友会，清华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复旦大学等校友会，在日中国科学技术者联盟，社会开发工程研究会，计算机网络杂志‘华声和语’，‘东北风’，NIFTY中国论坛等。这些社团，尽管其组成人员及志趣各不相同，但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其目的均是：建立和沟通日中两国人民之间，中国和日本社会之间的联系，并以各种方式为中国的发展作贡献。这反映了当代在日中国人的群体协作意识和参与精神。可以说，这一代留日学人社团组织在数量、质量和人数方面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蕴藏的能量也是巨大的，应充分发挥在日学人社团的潜力，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①

80年代中国留日学生成立的社团，在90年代仍然存在，并有声势壮大之势，如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在中日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口号一百周年之际，该会于1995年1月25日在东京与上海社联、国际文化会馆共同主办了“中华世界与中日关系”大型学术研讨会，100多名中日学者和学生参加。该会代表、早稻田大学讲师蔡建国说，以后像这样的大型社科研讨会每年举办一次，每个月还将举办一次定期研讨会，邀请中日两国学者、在日中国留学生就某一专题演讲。该会到这时，已成立9年，它不仅是中国留学生的学术

^①张弓整理：《纪念留日百周年座谈会纪要》，《人民日报》（海外版）1996年7月31日。

之家，也是中日两国学者的交流场所，两国著名学者常在这里作学术报告，使该会在促进中日学术交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90年代，中国留日学生的社团活动，从参加的人员看，除在学的留学生外，还有毕业后居留日本的中国人；从社团的性质看，专门性的、自然科学的社团明显居优势。

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留日学生社团有：

在日留学人员社会开发工程研究会。这是一个由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者和博士研究生等自发组织、以学术活动为中心的团体。研究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在日本学习和研究的中国留学人员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学术上的交流，扩大与国内的大學、研究机关和学术团体之间的联系，发挥留学人员在中日两国交流中的桥梁作用。研究会的主要活动内容包括：发行《社会开发科学与技术》会刊，为有关各方面建立联系提供信息，召开各种研讨会、交流会等。

中国留日学人教育研究会。1994年初前后，中国驻日使馆教育处邀请10名在日学习、研究日本教育的中国留学生及研究人员召开“中日教育改革比较研讨会”，会后这10人成立了该研讨会，旨在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服务。

中国旅日建筑学人联盟。约1994年初成立，其宗旨是联络广大中国旅日建筑学人，加强联系和交流，为中国、日本乃至世界现代建筑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联盟首届理事会会长由张在元担任，他们计划编辑出版《中国旅日建筑学人文选（学术卷和生活卷）》，举办“中国旅日建筑学人首届作品展”，召开“中国旅日建筑学人首届学术研讨会”，并每年出一期成员

名单。

北海道华人科学技术协会。据报道，该协会于1995年7月23日“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市内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成立。该协会是由活跃在北海道地区各大学、研究机关与企业的华人科技人员和部分博士、硕士留学生组成。现在北海道大学任教的吴南健博士担任会长。协会的成立，得到了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的大力支持。吴治安总领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希望北海道华人科学技术协会的成立能进一步促进中国与北海道之间的广泛交流和合作，并希望会员们以实际行动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从北海道各地赶来参加成立大会的代表们欢聚一堂，就如何促进中国各地与日本北海道之间的科技方面交流、沟通国内有关部门与北海道的联系，加速祖国的科技事业与经济的发展，畅所欲言，献计献策。北海道华人科学技术学会将发行会刊，开展多样化的学术交流，科技咨询等活动。”^①

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1996年8月成立，该协会是日本众多的中国学人团体中学历最高的、以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为己任的团体。协会《章程》规定，获得博士学位或有同等学历，在日本的教育和研究部门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中国学者均可成为该会会员。博士协会成立时在中国驻日大使馆的支持下选出了会长、副会长和理事会，工学博士、九州大学教授程京德出任会长，工学博士、广岛市立大学副教授任福继，工学博士、茨城大学副教授吴智深出任副会长。他们表示，协会将协

^①唐炜 吴小瑾：《北海道华人科学技术协会成立》，《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年8月30日。

助中国制定科学技术政策和开展高新科技，开发学术交流活动，促进中日两国进行联合学术研究，发挥中日学术交流的桥梁作用。

需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留日学生的社团，有的在总会下面又设立了分会，其中以在日中国科学技术者联盟（ACSEJ）最为突出。该联盟1993年成立后，至1996年6月30日在日中国科技者联盟——医学与药学协会成立前，已拥有了日中法研究会、生物科学与技术、电子及计算机应用、物理与化学、机械技术5个分会，医学与药学协会成立，其分会增至了6个。国内媒体在报道医学与药学协会成立的报道中说：“在目前旅日的中国学者与留学生间，医药学专业者为数众多。他们分布在日本各地的大学、研究所、医药企业中，许多人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成为我国医药学界在海外的一支重要力量。为沟通信息，加强合作，促进海内外的医药学交流，尽快提高祖国医药科技水平，各位学者本着‘架桥、务实、贡献’的精神，集结于‘在日中国科技者联盟（ACSEJ）’麾下，成为该组织下属的一个分会。该学会在筹备中，得到了中国科协、国家卫生部及相关医药学会和研究机构、众多国内著名学者的的大力支持。驻日使馆官员及日本相关的友好团体、学会也纷纷表示祝贺。成立大会暨首次学术演讲由徐明博士主持，倪建伟先生对大家关心的国内新药审批程序做了介绍，杨凌先生发表了有关肠道菌群对中药药效作用影响的研究，戴昭宇先生就中日两国传统医学现状进行了分析。与会者们兴致勃勃地展开讨论，最后还选出以赵中振博士为会长的理事会。该协会今后将不断加强同国内的联系，尽可能发挥出会员们各自的特长，以

学术研究为中心，以强化拓宽与海内外医药学界的交流，促进中医药学在日本的普及、发展为己任，担当起时代的重托。”^①

这一时期中国留日学生的社团活动，重要之处还在于一个规模最大的团体诞生，就是全日本中国留学生学友会成立。该会成立于1992年4月1日。1980年日本各大学成立中国留学生学友会，1986年东京地区中国留学生学友会成立，在这两个团体的基础上，成立了全日本中国留学生学友会。该会由全国学联所辖，后援为中国驻日使馆，成员团体有东京地区学友会、北海道地区学友会、东北地区学友会、名古屋地区学友会、北陆地区学友会、中国地区学友会、关西地区学友会、四国地区学友会、九州地区学友会以及下属各类大学的学友会。全日本中国留学生学友会是由就读于日本各类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含进修生、访问学者）组成的团体，以促进会员们的团结和互助友爱为宗旨，以推进中日学术界之间的相互交流、促进两国的友好关系为目的，在中国驻日大使馆的指导下组成的群众性团体。该会受到中日两国各界以及各友好团体的广泛支持。至1996年4月，该会有现任会员约2.4万人，已毕业会员有约1.5万人，时任会长为陈伟（东京工业大学博士生），事务局局长为张弓，事务局担当为娄卫东，事务局设于东京日中友好会馆后寮内。

这一时期，中国留日学生高层次的学术性团体接连成立，最大的社团亦已组建，这些都在说明留日学生的社团活动已进

^①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教育处：《东瀛学子成立医药协会》，《人民日报》（海外版）1996年7月10日。

人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内，无论是社团的数量、参加的人数，还是社团的活动，都超过了前一时期。

第三，生活活动丰富多彩。

这一时期，中国留日学生有组织、集体的生活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其中又以文艺性活动和体育性活动影响大，引人注目。

留学生的文艺性活动，一是固定性的活动，二是临时性的活动。固定性的文艺活动，往往有固定的文化团体。如约 90 年代初前后成立的“中国留学生民族歌舞团”，成立后一直比较活跃，他们在中国驻日大使馆、日中友协及各界朋友的热心帮助下，在校园、图书馆、实验室，在舞台上，都有他们的演出身影，他们参加过日本“中国文化日”、“东京日中友好文化节”的演出，以艺术的才华，为中日文化艺术交流，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尽了自己的一份努力，同时也丰富了留学生自身的文化生活。再如成立于 1993 年的“中国长城音乐团”，建团以后，举行过多次专场演出，足迹遍及日本关西地区的大、中、小学及各种表演场所，被誉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民间大使。1995 年 10 月 30 日，该团在大阪市中心筑波的高岛屋百货店前的火箭广场，为日本观众演出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民族音乐专场节目，受到了当地日本人民的好评。

临时性的文艺活动，如“首届在日中国人卡拉 OK 大奖赛”。其总决赛于 1995 年 1 月 15 日在东京池袋的丰岛公会堂举行。这次由东京中文导报社、良友俱乐部主办的大奖赛，从 180 名选手中评选出 21 名选手进入最终决赛，他们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省，绝大多数是留日学生。经两小时的激烈角逐，

来自辽宁的 20 岁女学生董璐以一曲天真纯朴、富有激情的《For You》荣登榜首，获得奖金 20 万日元；来自上海的学生周美君和广州的李琰分别夺得第二、三名。董璐在获奖后激动不已，泪花闪闪。日本著名舞蹈演出家、作曲家日高仁，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日中友好协会本部副会长清水正夫观看了决赛，他们说：歌手们甜美的嗓子和出色的表演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想不到在日中国人中艺术人才济济，令人鼓舞^①。

留日学生举行的体育活动也很多，如 1996 年 5 月 25 日由全日本中国留学生学友会和东京地区中国留学生学友会联合举办的“中日青年友好交流会”，其中一项内容就是中日青年友好运动会。运动会设立了投篮、羽毛球、乒乓球比赛。体育活动影响最大的当属关东地区中国留学生足球大会。为了丰富广大在日中国留学生的业余生活，加强各校间的交流，增进相互间的友谊，东京地区中国留学生学友会于 1995 年 11 月 12 日在日本埼玉县革加市独协大学举行了“第一届关东地区中国留学生足球大会”。学友会针对在日留学生中球迷多，其中又不乏原国内各大学校队主力的情况而组织的这次大会，一开始就得到了各校的广泛支持、响应。各校队员牺牲自己的课余打工时间，积极组队，抓紧训练。来自关东地区的九支大学代表队参加了本次大会。它们分别是：东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东京农工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横滨国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群馬大学、埼玉大学以及东道主独协大学。11 月 12 日，

^①沈强：《首届“在日中国人卡拉 OK 决胜大赛”在东京举行》，《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 年 2 月 8 日。

100多名来自各校的运动员和学生汇聚独协大学。专程前来参加开幕式的中国驻日大使馆周继平老师代表大使馆向大会表示祝贺，全日本中国留学生及关东地区中国留学生学友会陈伟会长也代表全体在日中国留学生祝贺本次大会的举行，并郑重宣布：1996年3月将举行首届全日本中国留学生足球大会，并将在此届大会之后成立“在日中国留学生足球俱乐部”，届时将邀请原国脚、现任日本富士通队主教练沈祥福以及名将高升等进行指导。大会根据留学生平日学习、工作紧张，体力差的情况，改变了通常的比赛规则，采用七人制及半场20分钟的规则，加强了比赛的精彩及激烈性。比赛结果，独协大学和东外大中国留学生代表队分别获得冠亚军，他们分别获得了中国大使馆教育处专程送来的中国国家教委特赠的景泰蓝奖杯。大会还评出最佳运动员和最佳射手各一名。他们是来自东道主独协大学的桂延文和吴欣军^①。

第四，关心国内的活动接连不断。

中国留日学生关心国内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回国考察活动。这种活动，往往都是在中国驻日使馆或国内某些方面安排或协助下进行的。如1992年9月中旬，全日本中国留学生学友会部分成员组成了“国内新形势考察团”，回国考察国内最新发展形势，国家教委留学生司何晋秋司长称他们的做法为加强留学生与祖国的联系带了一个好头。考察团团长由全日学友会机关报《中国留学生报》总编崔保国

^①陈伟：《相聚绿茵场——首届关东地区中国留学生足球大会在日本举行》，《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年12月20日。

担任。考察团在上海、北京等地进行参观考察，在北京参观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亚运村国际会议中心、首钢等地。

其二，在日开会活动。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参加或召开了很多次为祖国的改革和发展献计献策的会议。1994年5月7日至8日，中国驻日使馆教育处召开“中国现代化与中国留学生座谈会”，法律、金融、经济、管理等学科的留学人员20多人参加了会议，他们就中国现代化的形势与任务和留学生的使命展开了讨论。1996年6月23日，中国驻日使馆教育处举办“科教兴国讨论会”，来自日本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的23名留学人员参加了会议，他们纷纷表示，要利用在国外留学及工作的机会，把国外最新的科技信息介绍到国内，积极参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留日学生参加或主办的类似会议，不在少数。

其三，在日募捐赈灾活动。国内的每一次自然灾害发生，都牵动着留日学生的心。如1991年江苏、安徽等地发生水灾，东京地区中国留学生学友会发出紧急通知，倡议留学生向灾区同胞捐款；熊本大学学友会、九州地区学友会迅速募得捐款，汇寄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他们的捐款，不仅有自己的款项，还有向日本社会募捐所得。水灾的消息传到日本后，熊本的中国留学生走上街头，他们在路边张悬“中国大水害现状”一大块布，介绍水灾情况，同时拿去音响设施，用扩音器向行人介绍。他们赶制一批募捐箱拿上街头，箱上写有“中国大水害”、“请支援募捐”等字样。1996年，云南丽江发生地震，留日学生积极地开展募捐赈灾活动。一篇关于群馬大学医学部中国留学生学友会募捐活动的文章中写道：“正当日本各界纪

念阪神大地震死难者遇难一周年的活动刚刚落下帷幕，1996年2月4日，人们吃惊地从电视中看到一年前在神户房倒楼塌、家毁人亡的惨状又出现在中国的云南丽江，留日学生们都在为震灾中的祖国亲人而忧虑不安。2月5日，来自云南昆明的肖锋同学率先提出群马大学医学部的留学生应为处于灾难中的家乡父老们募捐，学友会全体干部及几个参加过1993年为国内水灾募捐活动的高年级博士生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召开紧急会议，制定具体方案。几乎就在同时，我们得知中国中央民族歌舞团将在群马县巡回演出，学友会当即决定利用民族歌舞团在各城市演出的机会开展募捐活动。2月6日，准备工作全面展开。每天深夜才回家休息的生理学博士马洪涛，早晨不到7点便到学校打印募捐的传单、标语。正在紧张准备论文答辩的药理学博士薛音欢放下手头的工作，与歌舞团即将访问的各城市市政府、国际交流协会及文化会馆商洽募捐事宜。行动分析学博士程希同在中午之前便把学友会的倡议书发到每位同学手中，倡议书号召同学们：立即行动起来，作为中国人，向祖国尽一份自己应尽的义务；作为留学生，向世人展示一个中国人的精神风貌。2月7日，群马县国际交流协会及中央民族歌舞团向学友会表示对募捐活动将大力支持。这时又传来了丽江发生强余震，灾区损失加剧的消息，同学们更加心急如焚，准备工作加紧进行。2月8日，中央民族歌舞团下午6时30分将在高崎市演出。学友会决定下午3时出发。内科学博士卫刚正在家照顾发高烧的妻子，听到募捐的消息，把妻子托付给邻居照看赶来了；眼科博士司英杰连续参加4台手术，未吃午饭赶来了；前一天刚从美国探亲归来的病理学博士熊珏尚未适应时差

也赶来了；自费留学生邹放旭推掉了晚上在饭店的工作也赶来了。同学们驱车1个半小时，4时30分便到达高崎市文化中心。文化中心及市国际交流协会把前厅最显眼的地方让给同学们，并细心地将各日本报纸关于云南地震的报道复印下来，贴在广告板上，同学们立即紧张有序地布置标语、摆放募金箱，之后站成一排，彬彬有礼地向来宾鞠躬募捐。云南地震后，日本新闻界给予了充分的报道，加之日本人民对于去年的阪神大地震记忆犹新，因此，观众无论男女老少，捐款非常踊跃。……民族歌舞团的演员们目睹了同学们的爱国之举，十分感动；代表团副团长特地代表歌舞团向留学生捐款，演员们表示一定要认真演出，以实际行动支持募捐活动。……2月11日，同学们再次跟随中央民族歌舞团到涉川市募捐。两次募捐款项共20余万日元，以如此短的时间，募集到如此多的捐款，在日本留学生中是前所未有的。大使馆教育处的老师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保证将捐款以最快的速度转往云南救灾部门。”^①

其四，捐助“希望工程”活动。留日学生捐助“希望工程”的活动，方式有多种方样，如名古屋工业大学中国留学生学友会会员们，在校园节的时候开办中国饮食摊，自己动手，做正宗的中国风味食品卖给参加校园节的日本学生及周围的日本人，所得收入全部捐献给“希望工程”。还有的留学生发表《热爱一个孩子吧》的文章，号召留学生捐助“希望工程”^②。

^①麻兴华：《拳拳赤子心——日本群馬大学医学部中国留学生学友会为云南灾区募捐纪实》，《人民日报》（海外版）1996年2月28日。

^②岐阜大学学友会吕福祿所作，原文载于1995年6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1994年至1995年间，“在中国驻日使馆教育处的倡议下，全日本的留学人员纷纷行动起来，开展了多项支持希望工程的活动。全日本中国留学人员友好联谊会向在日全体中国留学人员发出开展‘献东瀛学子之爱心，筑希望工程之未来——百校助百县’希望工程奉献活动的倡议，建议在新的一年里，每一位留日学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达自己的爱心和对希望工程的支持，并积极宣传希望工程的意义，争取日本各界友好人士和友好团体的理解和支持。‘百校助百县’为希望工程奉献活动，各大学或日本友好人士可以自己选择帮助对象县进行直接联系，对选择的县进行帮助。名古屋工业大学学友会为支持希望工程成立了学友会‘希望工程’活动委员会并在日本率先提出‘为孩子们打一天工’的口号。他们在《中国留学生》报上发表了倡议书：‘为孩子打一天工，也许这一天的劳动非常辛苦、劳累而又枯燥，但无论这一天的收入多少，能帮助一名或两名失学儿童，不都是尽了我们一份力量吗？只要一想到这一天的劳动可以使一个孩子重返课堂，也可能从此会改变他们的人生，难道这不是最有意义的一天吗？挽救一个流失生就是挽救一个未来；保住一个在校学生，就是保住一个希望。’倡议书最后呼吁：‘让我们行动起来，为了孩子，为了龙的腾飞，献出一份爱！’随后在名工大校园祭的时间里，名古屋工业大学中国留学生学友会在校园里设立了中国料理与物产模拟店，并将该店的全部收入捐赠希望工程。名古屋大学的陈勇及妻子吴蓉蓉共寄来4万日元并附信一封：‘愿受灾地区人民尽快重建家园，愿贫困地区的青少年都能尽早上成学。’这项活动也得到了中国旅日华人、台湾同学以及日本友人的参与。这次学友

会的活动，不但使广大留学人员了解了希望工程、支持了希望工程，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在日中国留学生的形象。……日本东京地区中国留学生学友会成立了希望工程指导小组，并以‘为了美好的明天，共筑希望工程’为题，号召东京地区的留日学人为希望工程奉献爱心。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中国留学生学友会也以‘让我们大家同伸援助之手，共筑希望工程’，倡议广大同学捐助希望工程，在国内援建一所‘留日学人小学’。东京大学学友会举办‘为希望工程献爱心、为失学孩子出点力’的电影募捐晚会，学友会提出的口号是‘伸出你的手、伸出我的手，帮一帮那些念不了书的孩子’，‘为了我们共同的心愿，让那些失学的孩子们重新回到课堂’。晚会播放的电影是《凤凰琴》，尽管时值暑假，还是吸引了100多名同学参加了晚会。参加晚会的同学们都热情地为希望工程捐了款，学友会财务部长胡梅在收大家的捐款时，没有忘记先把自己的捐款交上，她捐了1万日元。医学部博士生顾汉涛没时间看电影，急匆匆地赶来交了捐款又急匆匆地赶了回去，还有很多同学没能在当天捐上款，几天后他们按照宣传材料上的地址和电话，亲自把款项送到学友会负责人的手里。就这样，90%是自费生的东京大学中国留学生共捐款23.06万日元。”^①

其五，其他类活动。除上述活动外，留日学生还举行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如1994年第12届亚运会开幕前半年左右，在亚运会主办地广岛学习的留学生们就开始策划组织啦啦队，届时好亲临赛场为中国队多拿金牌加油助威。由广岛大学社会科

^①甘东宇：《留日学人支持希望工程》，《神州学人》1995年2期，第8页。

学研究科王冰同学为主的“在广中国留学生亚运会声援团联络会”负责啦啦队的组织、联络工作，他们先后在大使馆的协助下，准备了大大小小的国旗 500 多面，会旗、横幅标语、喇叭等也一应俱全。在离亚运会开幕不到 20 天的时候，经在高崎经济大学经管系学习的刘劲科同学的牵线搭桥，得到了广东中山“今日集团”的大力支持，啦啦队制作了统一的美观大方的啦啦队服，并正式取名为“中国今日大丈夫啦啦队”。亚运会期间，啦啦队得到中国驻大阪、驻福冈领事馆总领事、领事及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教育处的大力支持和关注。1994 年 10 月 6 日，中国驻日大使馆徐敦信大使还通过使馆教育处亲自对啦啦队表示关心和慰问：“你们啦啦队组织得非常好，啦啦队表现了极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体育代表团凯旋而归时，国家体委主任、中国奥委会主席伍绍祖对送行的同学们说：“中国体育代表团所取得的优异成绩也有你们留学生啦啦队的一份功劳。同学们辛苦了，祖国人民不会忘记你们！”^①

作为留日学生活动的一部分内容，他们还向全世界中国留学生发出了《让中国走向世界，把世界带进中国》的倡议书^②，其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学、遍布五大洲的留学生朋友们：

我们同是来自那片历经磨难而又充满希望的大

^①皮自力：《高扬的五星红旗——亚运会广岛中国留学生啦啦队纪实》，载《神州学人》1994 年 12 期，第 36 页。

^②《神州学人》1993 年 1 期，第 9 页。

地，来自千年不毁的长城脚下，万事不枯的黄河岸边。我们的肩头担负着母亲深沉的期待，我们的心里充满着亲人甜甜的思念。有千种理由促使我们奋力拼搏在异国他乡，而每一种理由无不系在我们身后那片梦牵魂绕的黄土地上。离开了母亲，方更感悟母亲的养育深恩；身处异国，方更珍惜家乡的圆月清辉。乡音乡情，是我们海外学子的共同思绪；爱国爱乡，是我们海外学子的共同心声。每当祖国取得成绩时，我们每一个人都为之欢欣鼓舞；每当祖国遇到困难时，我们每一个人都为之焦虑揪心。1991年秋季，当华东地区受到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袭击时，有多少海外学子，纷纷解囊，掏出一张张浸透了辛勤汗水的纸币，向祖国的父老乡亲们献上一颗颗赤诚的心。我们欣慰，自己的心脏与祖国母亲紧紧相连。我们欣慰，自己的脉搏，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在世界的沧海里搏风击浪，我们更深知，只有祖国的强大，才有我们个人的前途与自尊。

如今，我们的祖国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如同一股不可抗拒的滚滚春潮，冲击着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为大江南北铺开了一片蓬勃的生机。曾创造出灿烂文明的古老而又年轻的祖国，赋予我们热血与信念的祖国，曾错过多次重新崛起的机会！从戊戌变法到改革开放，现代强国的梦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有志气的中国人。今天，不屈不挠的中国又一次挺起了伤痕累累的

胸膛，昂然站立在通向希望与成功的起跑线上。要求发展、要求开放、要求改革，已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包括我们海外学子的心声：我们不能再错过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

搞好改革开放，建设强大的祖国，振兴中华民族，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也是历史赋予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庄严使命。同时也为我们海外学子报效祖国、实现自我提供了用武之地。回顾一部近代史，上面刻着多少前辈留学生的名字！他们为了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富强，忍辱负重，许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我们民族的复兴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业绩，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从容闳、詹天佑、孙中山，到李大钊、周恩来、邓小平、钱学森、李四光……活跃于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有多少留学归国的前辈！

今天，中国又一次向世界敞开了大门，众多热血华夏子孙肩负着祖国的重托，到世界各地学习进修。从密西西比河畔到富士山麓，从英伦三岛到欧洲大陆，到处回荡着我们渴求新知的呐喊，到处留下我们坚毅攀登的脚印。尽管身处不同的国度，我们的经历不尽相似，我们的境遇不尽相同，但报效祖国的拳拳之心却是息息相通的。时代为我们广大留学生创造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祖国需要大量的人才，我们年轻的肩上，担负着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明天。亲爱的朋友，机不可失，时不我待，让我们20万海外学子携起手来，齐心推动改革开放的大潮，

共同将爱国热情化为爱国行动。

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发挥聪明才智和一切所长为中华腾飞奉献力量。让我们只争朝夕，学有所成，早日携手回到那片属于你我的神州大地，回到生我养我的母亲怀抱，回到望穿秋水的亲人身旁。让我们采用一切方法将属于我们自己的梦，播种在属于我们自己的祖国大地上！

我们播下的是一颗沙粒，长出来的，将是一个灿烂的星系！

全日本中国留学人员代表大会

中国驻日使馆教育处刘青然于1996年7月13日的一个座谈会上总结说：“1992年华东水灾，留日学生捐款2400万日元；1994年广岛亚运会期间，留学生组织了庞大的啦啦队，在中国队出场的所有比赛项目中为中国队加油。去年，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留学生学友会组织了很有规模的纪念活动，表明了全体留学生的态度，产生了较大影响，也使许多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有模糊认识的日本人深受震动。最近3年，留日生为‘希望工程’捐款每年都超过1000万日元。”^①

3. 留学生生活呈现多层面

所谓留学生生活多层面，可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①张弓：《纪念留日百周年座谈会纪要》，《人民日报》（海外版）1996年7月31日。

第一，自费留学生的生活依然困难。

据日本有关方面统计，到1990年5月1日止，日本国费留学生为4961人，占外国留学生总人数的10%，其中80%以上是在研究生院攻读学位的留学生；1991年，享受日本民间团体奖学金的外国留学生约2700人；1991年，享受日本各高等学校奖学金的外国留学生约1700人；1991年，享受财团法人、日本国际教育协会奖学金的外国留学生、专科学生有300人，短期大学学生有200人，大学本科生有3300人，研究生院硕士生、博士生和进修生共1200人。

90年代，中国自费留日学生仍绝大多数生活困顿，需靠辛苦打工维持留学生活。

日本于1988年制定“关于日语教育设施的运营标准”，次年设立了日语教育振兴协会，开始实施对日语学校的认可制度，只有经过财团法人、日语教育振兴协会认可的日语学校才有资格招收外国学生。截至1991年7月底，共认可的日语学校478所。这478所学校按地区统计：北海道6所；宫城县2所；秋田县1所；山形县1所；福岛县2所；茨城县3所；栃木县6所；群馬县2所；埼玉县越市2所、熊谷市1所、川口市4所、浦和市6所、大宫市5所、所泽市1所、深谷市1所、与野市2所、越谷市1所、蕨市1所、上福冈市1所、三乡市1所；千叶县千叶市3所、市川市4所、船桥市1所、松户市3所、柏市1所、浦安市1所、山武郡1所；东京都千代田区11所、中央区2所、港区9所、新宿区53所、文京区11所、台东区8所、墨田区3所、江东区7所、品川区11所、目黑区3所、大田区5所、世田谷区4所、涉谷区23所、中

野区 10 所、杉并区 12 所、丰岛区 41 所、北区 12 所、荒山区 6 所、板桥区 13 所、练马区 5 所、足立区 8 所、江戸川区 7 所、八王子市 2 所、立川市 2 所、武藏野市 2 所、三鹰市 1 所、小金井市 1 所、福生市 1 所、多摩市 1 所；神奈川县横滨市 10 所、川崎市 5 所、平塚市 1 所；新潟县 2 所；山梨县 3 所；长野县 4 所；岐阜市 2 所；静冈县 8 所；爱知县 15 所；三重县 3 所；滋贺县 1 所；京都府 12 所；大阪府 46 所；兵库县 13 所；奈良县 1 所；和歌山县 1 所；冈山县 1 所；广岛县 8 所；山口县 1 所；香川县 1 所；福冈县 10 所；佐贺县 1 所；长崎县长崎市 1 所；熊本县 3 所；宫崎县 1 所；冲绳县 5 所。

经过认可的日语学校，其条件与秩序较之 1988 年前后有所改观。但是，也不是所有的日语学校都令人满意，仍有一些学校将中国留学生置于了困难的境况之中。飞鸟学院阿寒学校即是这样。

阿寒学校位于北海道最偏僻的东部，一批从上海来的留学生到这里后，发现学校附近只有一家才 10 人的肉食品加工厂，除此之外就是连绵不断的荒山。学校宣布，该校实行的是日本唯一的 24 小时管理制，学生不得自由活动，离校要请假。学生向校方提出出去打工申请，学校坚持前 3 个月内不许打工。学生提出转校申请，阿寒町政府和学校表示同意。可当一批学生刚一走出学校，就被校方强制拦回，并被收去了护照，过段时间才发还回来。拿回护照的中国学生，有一批趁黑夜逃离了学校。他们于凌晨 3 点穿过阿寒町，走过钏路机场，向钏路市挺进，“由于不断地躲避夜行的汽车，学生有时只能走荒野小径，蒿草丛中的水珠和天上的雨水很快浸透毛衣，冰凉的衬衣

皱巴巴地贴在身上。他们每个人的手中都拄着一根木棍，那是准备与随时可能扑上来的野熊、野狼搏斗的武器。公路上空无一人，只有远处牧场偶尔透出一点亮光。学生们渴了还可用舌头舔舔嘴边的水珠，饿了却什么吃的都没有。几小时的徒步急行，只觉得两条小腿肿胀得难受。北海道天亮得特别早，四周的黑暗渐渐变成雾茫茫的一片。学生们突然从晨曦中看到一大片城市的轮廓。到了，前方就是钏路市，逃亡者带着一身疲惫，从心底里发出了吹呼。到达钏路市，时间尚早，学生们买好车票后不敢在候车室久留，悄悄地绕到站后一间无人的小棚里换上干衣服，又饥又渴却不敢出去买食物。开往札幌的电车还有一分钟就要发车时，他们才奔进车站，跳上车厢。列车启动了，看着冉冉升起的太阳，同学们击掌欢呼：逃亡成功。”^①其余的中国学生，半年后，得到了下半年的延长签证，也逃离了这所学校。日本 NHK 电视台连续报道了这所学校中国学生的逃亡过程，记者米原尚说：“在号称最先进的日本国土，竟还有一块连世界公认的生存能力强的中国人都不愿呆下去的地方。”^②

日本社会的一些经济情形也为留学生的生活雪上加霜，如日元升值，就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1993年4月21日日本《东京新闻》的《日元升值，留学生叫苦不迭》的文章中说：4月21日上午，一时曾达到1美元兑换109日元的纪录。这些天的日元急剧升值对留学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影响。由中国上海来的方淳说：“4月份是留学生和就学生最多的时

①②蔡耀：《留日学生梦断北海道》，《楚天周末》1993年6月19日。

候。因最近日元升值，我的朋友无法应付在日本生活的开支，陷入了困境。”早稻田大学去年接受了来自世界 41 个国家的 1200 名留学生。该大学的国际交流中心的人士说：“过去，每年到这个时期都有来申请助学金或请求减免学费的学生，但今年尤其多。”他说：“因为经济不景气，找不到临时工作，再加上日元升值，留学生的生活很艰苦。留学生即便向我们诉说日元升值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困难。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负责东京附近各县约 1800 名留学生登记注册的财团法人“内外学生中心”的人士说：“虽然表现并不是那么明显，但似乎，从 4 月起刚来日本的留学生因日元升值外汇贬值，交学费困难很大，有可能对学生的生活产生影响，我们在注意这一事态的发展。”

在生活困难的情况下，有的留学生走上了犯罪道路。1996 年 2 月 21 日，东京发生一宗杀人案：来自上海的 29 岁女学生潘茜被勒死于杉并区高圆寺的住宅内，她辛辛苦苦储蓄下来的 1500 万日元的帐簿及印鉴被人窃走，歹徒到附近的银行提取了 100 万，被银行的闭路电视录下了他的形貌。之后，他还打电话到银行柜台，询问提取 1000 多万日元及撤销储蓄户事项。根据歹徒只能说简单的日语及发音判断，警方认为可能是中国人。4 月又发生一起命案。来自中国的女子在自己住所全裸躺在床上，已被勒毙。邻居因听到“救命”的喊叫声即打电话报案。当警方赶到现场时，凶嫌已跳窗逃走。警方后来破了案，在一家华人餐馆逮捕了一名中国男青年。他承认是误杀，因为被害人向他提出分手的要求，使他非常愤怒，在一怒之下杀害了她。这些是新闻媒体作了报道的罪案，媒介尚未披露的还有

不少。日本的“拍青哥”店宣布，暂停使用1万日元的该店磁卡。据说，有些中国人专长于电子仪器，变造出这些高额的磁卡，到“拍青哥”店拿钢珠，再拿钢珠换成现金。据统计，1995年内，这些发行“拍青哥”店磁卡的公司因为伪造磁卡的横行，损失达630亿日元。据日本电视报道，暗查伪造磁卡来源发现，由一些中国人与一个日本暴力集团勾结所致^①。

第二，感觉孤独是中国留学生的普遍现象。

1990年的圣诞节前夕，东京的一家留学生后援团体对待中国护照的300名留日中国学生，进行了关于生活方面的专题调查。其中，在“你在日本求学中的最大的烦恼是什么”的问题中，有85%的人回答说：“是因为爱情和孤独。”这里面甚至还有人补充写道：“爱情和孤独互相关联，会使人疯狂和变态”，“它远比经济问题恼人”。

中国留学生们实在太忙，太枯燥，太累，也太穷了。日本社会有着数千万种名目繁多、花样迭出的娱乐场所！歌舞，音乐，摩登芭蕾，立体电影，卡拉OK酒吧，迪斯科舞厅，激光游戏，音乐沙龙等等，难以计数，可是，这一切对于留日中国学生来讲却全是一些奢侈品。他们的时间要用来学习和打工，他们的金钱除了要支付昂贵的学费、房费、生活费和交通费以外，还要给家乡的父老兄弟、亲戚朋友准备各种各样的见面礼品和家用电器。

《留学生新闻》报纸曾专门就留日学生的衣食住行等实际状况，对581名留日中国学生进行了公开调查，其中问到每个

^①程昌远：《中国留日学生备尝艰辛》，《广东侨报》1996年7月19日。

月一共支出多少娱乐费用时，有 24.4% 的人回答为 5000 日元以内，18.9% 的人回答为 1 万日元以内，21.7% 的人回答为 2 万日元以内。在回答生活开支上根本就没娱乐费用这一项，即娱乐费用为 0 日元的人，竟也达到了 11.5% 之多，而这些人的身份几乎都是硕士生和大学生。

中国留日学生感觉孤独的结果之一就是思乡。一名留学生的《东京抒怀》诗颇能表现出他们的思乡情结。诗云：

孤灯下，
木屋中。
他孑然一人寂寞地望着窗外……
他的心早已飞走，
越过那滔滔的大海。
诉不尽的哀肠，
抒不完的情怀。

孤灯下，
木屋中。
他从美丽的梦中醒来……
站起来正视现实吧！
重逢的喜悦就要到来！
坚持吧！
勇敢地跨过这寒冷的地带！

于日本东京思乡斋^①

第三，有众多的日本人帮助中国留学生。

帮助中国留学生的，有的是个人，有的是社团。

这一时期的中国留日学生，心中记下了很多热心帮助他们的日本友人。九州福冈的须之内齿科医院院长须之内茂子女士即是一位热心帮助中国留学生的日本人。为了帮助中国学生学日语，她经常举办由当地日本人和中国留学生共同参加的联谊活动，通过活动使中国留学生直接向日本人学习生活用语及在日的生活经验。她还经常为中国留学生介绍打工的工作。有一位刚到福冈的中国女留学生，因身体瘦小不能干体力活，经人多方介绍，仍没找到工作，带来的钱也花光了，她急得哭了好几场，甚至想放弃留学，打算归国。须之内茂子得知后，主动帮她找到合适的工作，使她能顺利在日本留学。她帮忙中国留学生的事情有很多，以至于九州地区各学校的中国留学生有什么困难，时常去向她求援。

在日本学园都市筑波，竹原竹之助以帮助中国留学生而闻名。他作为“罗达利”米山纪念奖学金财团的常务理事，极力为中国留学生争取这个奖学金。他认为，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是在日留学生中经济最困难的，他们又是最优秀的，应该得到资助。1988年，在争取未果的情况下，他自己牵头在土浦市成立了大家纪念奖学基金，主要面对筑波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获得者每人每月给7万日元，获奖期1年。在他的不懈努

^①白刚创作，载《神州学人》1995年5期，第37页。

力下，“罗达利”米山纪念奖学金从1989年后开始向中国大陆留学生发放，获得者每人每月给15万日元，获奖期2年。截至1995年6月，已有800多名中国大陆留学生获得这个奖学金。该奖学金不仅从经济上援助留学生，而且每月定期组织各种活动，使留学生增长见识。另外，汤原先生还从其他方面帮助中国留学生，甚至把自己的房子无偿地给中国留学生居住。

顾国璞、单聪聪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武田良枝夫妇帮助中国留学生的故事：武田良枝的家在国立大阪大学附近，“一天，我们应邀到她家作客，在座的就有4个中国留学生。福建人杨子峰刚来日本读书时，举目无亲，生活很困难，靠送报纸维持生活。每天一早起来给各家各户送报，送满一个月上门收费，武田良枝夫妇见他日语讲得结结巴巴，一问才知道他是刚来不久的中国留学生，就与他攀谈起来。从此他们建立了联系，武田一家主动关心他。每当中国留学生在她家聚会，就邀他来参加，帮他渡过难关，如今杨子峰已取得硕士学位就职了。武田良枝就这样通过各种机会，结识在大阪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她和丈夫都非常热情好客、乐于助人。节假日，丈夫在家休息时，武田良枝就忙里忙外，到超级商场采购，邀中国留学生来聚餐交谈，她的家就成了留日学生的联谊场所。温州人曾一民，早先他哥哥嫂嫂在大阪大学留学时就得到武田一家的帮助，毕业后离开大阪，接着曾一民来日留学，又成了她家的常客。”^①

^①《温暖如春——记关心中国留学生的好大姐武田良枝》，《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年6月28日。

帮助中国留学生的日本民间团体，有的是社会性的，有的是家族（家庭）性的。如“垣花基金”，是日本颇享声誉的核科学家垣花秀武于80年代个人出资创办的，该基金经常提供费用供中国留学生外出研修旅游。千叶县的冈本财团是1992年由冈本正先生创建的一个旨在为促进千叶县的外国留学生国际交流服务的家族财团，财团事务所设有图书阅览室、资料室，还有各种咨询服务和定期的日语讲座等，还建有宽敞舒适、设备齐全的“留学生会馆”，无偿供初来日本居住有困难的留学生使用。财团还每年拿出2000多万日元专门为千叶县的学习努力、生活困难的留学生设立月額8万日元的奖学金，1995年有21人获得了此项奖学金。中国留学生从冈本财团那里得到了很多帮助。北海道旭川市的“鸣海会馆”，被称为是中国留学生的乐园。它有200多平方米，主人是鸣海良司先生和良子夫人。节日以及平时，会馆召集中国留学生聚会，或是组织他们旅游，极得中国留学生的赞誉。

总之，无论是日本的一些团体还是一些个人，他们都为中国学生在日留学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第四，留日学生经历了一次地震的灾难。

日本时间1995年1月17日凌晨5点46分，兵库县南部，大地突然剧烈抖动起来，一场巨大的灾难降临了。地震，使数千栋房屋顷刻间成了废墟；断裂的高速公路桥从几十米高的天空塌下来，扭曲着，砸向地面；地震引起的火灾将神户上空映得通红；救护车、救火车的警报声此起彼伏——整个兵库、尤其神户在呻吟。

水、电、煤气供应停止，通讯、交通中断，消防车被倒塌

的房屋和下陷的路面所阻，无法灭火。由于灾情严重，道路受损等原因，救援工作一时难以奏效，大量救灾物资难以及时送到灾民手中。

据统计，在兵库县的华侨、留学生及中国公务人员总计达 1.3 万人，其中主要集中在神户地区。留学生住的矮小棚房，地震后基本已倒塌。地震发生后，除中国国内各有关方面给了及时的支援外，中国驻日领事馆和在日的华人社团等组织均给予受难的华人和留学生以切实的帮助。

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协助大阪华侨总会、神户华侨总会、冈山华侨总会等成立了震灾救助总部，帮助华侨及留学生撤离危险区。

神户华侨总会因会所房屋受损不能使用，就在受损轻微的中华同文学校设立了紧急对策委员会，以图沟通信息，谋商救灾之计，同文学校自然也成了受灾华侨和留学生的临时避难所，留学生把这里当成了过往的免费客栈和联络点。震灾对策总部还请日本的国际电话电信公司在一楼走廊架起了临时通信卫星天线，供华侨和留学生用免费电话与祖国亲友取得联系通报平安。

在日本拥有 300 多名会员的在日中国人计算机网俱乐部 (CCJ)，震后迅速开展了为死者募捐的活动。他们考虑到来日奔丧的留学生家属人数多，特别是失去亲人悲痛欲绝的心情，需要安慰，还有其他一些问题需要与有关方面交涉解决，这些光靠领事馆可能力量不够。在大阪大学任教的许炎和顾海松二位博士，代表 CCJ 到旅馆亲手将捐来的钱物送到死者亲属手中，并逐户与他们谈心，帮助领事馆做了大量安抚工作。树德学寮

协会中国文化交流中心的许多工作人员都生活在地震严重的地区，他们想到许多留学生的住房已倒塌，无处安生，同时还有余震和二次灾害的威胁，若全部都要马上回国，困难较大。该中心经与当地国际交流社团联系，找到一些愿意接受中国留学生入居的日本人家庭，以便让留学生能在有安定住处的情况下或联系回国或寻找下步出路。受留学生欢迎的长城俱乐部，灾后十分关心中国留学生的情况。该组织负责人武岛夫人，给她所知道的每位生活在灾区的留学生打电话，了解受灾情况，并对有困难的同学真诚地表示愿意将事务所腾出来让大家避难。

震后，中国留日学生还积极地进行了自救活动。为自救，全日本中国留学人员友好联谊会同兵库县地震受灾中国人救援会联合发出了《紧急倡议书》，其全文如下：

1月17日日本兵库县南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受灾地区损失惨重。截止1月24日，当地华侨及中国留学人员在此次震灾中丧生的已达数十人。全日本中国留学人员友好联谊会对遇难同胞深表哀悼，并怀着骨肉之情关注着受灾同胞，祈祝受灾的同胞团结互助，渡过难关，早日战胜灾害，恢复正常的工作和学习。

据悉，震后当地中国留学人员和华侨的受灾情况越来越为严重，令人担忧。在震灾中遇难同胞的后事处理、临时避难同学面临救援物资不足、难以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学习等，已引起日本社会各界及在日中国同胞的深切关注，纷纷伸出温暖的救援之手。

作为留学日本的学子，我们对同胞受难深表同情，并愿为受灾同胞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全日本中国留学人员友好联谊会为此发起并成立“兵库县南部地区受灾中国人救援会”，号召在日本各地的中国留学人员、学者及日本社会各界踊跃捐款、慷慨解囊，救助震区受难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

“兵库县南部地区中国人救援会”将详细向您报告捐款的使用情况，并请各位将捐款凭证复印件寄往以下地址：

〒135 东京都江东区平野 2—2—9

中国大使馆教育处

郑晓林

南部地区中国人救援会由以下成员组成：

郑耀军（组长、东京大学）

Tel.0489—57—2119 Fax.03—5689—7253

汪志平（北海道大学）

Tel.011—727—0247 Fax.011—747—8849

潘青海（东北大学）

Tel.022—275—6268 Fax.022—275—6268

李振保（大阪大学）

Tel.0726—92—0997 Fax.0726—92—0997

杜小勇（名古屋大学）

Tel.052—323—7955 Fax.052—323—7955

王路明（九州大学）

Tel.092—622—6472 Fax.092—632—2373（第二

解剖)

具体捐款方法：请通过银行办理。

银行口座：三和银行本郷支店（普）3805327

名义：全日本中国留学人员友好联谊会

代表：王东明

问询电话：中国大使馆教育处

03—3643—0370 03—3643—0359 03—3643—

0188

截止到1月22日统计，有18名中国留学生及其家属遇难，他们是：

卫红，女，28岁，大阪大学经济系研究生；

沈一春，女，32岁，神户大学攻读硕士课程；

武力平，女，34岁，神户商船大学访问学者；

傅建鸿，男，24岁，神户大学工业系进修学生；

曹璇，女，50岁，神户大学农学系；

孙绪孟，男，49岁，以曹璇家属身份来神户；

郭清华，男，35岁，神户大学医学系毕业；

苏惠玲，女，32岁，郭清华夫人；

郭欣，性别不详，郭清华子女；

雨京，女，25岁，神户学院大学；

李一兵，男，32岁，日本語学校学生；

李冰，男，32岁，日本語学校学生；

伍鸣，女，28岁，原京都大学留学生，就职单位不详；

寇秀微，女，44岁，来日探亲，其夫在商船大学学习；

李绽，女，年龄不详，神户文化服装学院；

邓山，男，22岁，ELS国际语言学院；

姚蚕，女，24岁，加古川工商所企业研修生；

吴婕，女，年龄不详，神户大学经营系。

很多人还记得，日本天皇伉俪访华时，有一个中国女孩作翻译，叫卫红，她1994年10月进大阪大学读经济学研究生，因为她是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请来的客人，就住在协会宿舍内，震后宿舍完全倒塌，人们在瓦砾中找到了她的尸体。

震后，留学生除一部分仍留原地外，还有一部分在中国使领馆的安排下，转赴他地或启程回国。

留日学生这种多层次的生活，表现出了留学生活的真实情况，也表现了日本社会对他们的影响、帮助的程度，应该说是—幅中国留日学生生活的百景图。

4. 留日学生纪念中国留日运动百周年

1996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留学日本第100年，为纪念百年留日运动，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从而使这些活动的本身也成了留日运动中的重要事件。这一系列活动，旨在回顾总结中国学人的留日历史，珍惜今日在日学习的机会，胸怀远大理想，努力探求祖国的强国富民之路，并为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起积极作用。

为使纪念活动顺利进行，全日本中国留学生学友会成立了留日百年纪念活动筹委会。按计划，该纪念活动将分四部分进行。第一部分为组织对留日历史及其现状的研究，主要内容为：截至6月末，就留日百年历史及留日学生对中国近代化、

现代化的贡献为题进行学术论文征集；预定于7月20日举办“中国留日学生的历史、现在及其未来”新老留日学生恳谈会；以“在日留学，报效祖国”为题举办留学生作文竞赛及摄影展；人民日报海外版协助设立“百年历史”、“历史人物”、“现代英杰”等关于留日学人的定期专栏，系统介绍中国学人留日学习的历史及现代风貌。第二部分将以中日友好交流为主线，举办“留日100周年中日青年友好交流会”、“留日百年历史、现状学术研讨会”。第三部分将于8月3日举行留日100周年纪念大会及纪念音乐会，以此将活动推向高潮。第四部分为继续为祖国的希望工程作贡献。在留日学生中持续开展两年有余的希望工程募捐活动已为国内捐助建设了两所希望小学，救助了数百名孩子重返课堂。在此基础之上，以这次纪念活动为契机，再度进行募捐活动，拟以此项资金创立一所名为“留日百年纪念希望小学”的小学校。

纪念活动筹委会在“纪念留日100周年”征文启示中称该次征文活动：

宗旨：今年是中国政府首次向日本派遣留学生100周年。在近代中国海外留学史上，留日运动占有光辉的一页。无论是在留学规模方面，还是在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响方面，都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回顾历史，我们无限缅怀黄兴、蔡锷、周恩来、鲁迅、郭沫若、苏步青等老一辈留日学人的不朽业绩。展望今日，新一代留日学子负笈东瀛，倾心报国的感人事迹层出不穷。放眼未来，东渡扶桑，刻苦学习，学成归国的有志青年将成为祖国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材。为纪念中国政府首次向日本派遣留学生100周年，全日本中国留学生学

友会决定举办征文活动，希望海内外留日学子踊跃投稿。

征文内容：一、论述中国留日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化的贡献。二、歌颂留日学子心向祖国、为国服务的爱国精神。三、描写留日学生学习、科研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等诸多方面的留学生活。

征文体裁：散文、诗词、报告文学、摄影作品。

来稿要求：一、语言：要求使用汉语。二、字数：散文、报告文学不超过3500字，诗词不超过50行。三、书写：要求打印，用12号字体。四、用纸：A₄。五、摄影作品：形式不限。

作品评选：由在日作家和驻日使馆教育处组成评选委员会。评选结果将于8月份举行的“纪念留日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颁布。

设奖情况：本次征文设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二名、三等奖三名；优秀作品奖十名；优秀摄影作品奖五名。

征稿日期：自1996年3月15日至1996年6月30日止。

投稿地址：〒一一二 东京都文京区后东寮 一一五一三 后东寮一一六号室 全日本中国留学生学友会事務局

主办单位：全日本中国留学生学友会。

协办单位：中国驻日使馆教育处、人民日报海外版、神州学人杂志社。

为筹建“留日百年纪念希望小学”，纪念活动筹委会发布了“倡议书”，其中称：“当我们看到发达国家的现代文明时，在我们心中产生的最强烈的感受莫过于盼望祖国能早日富强起来。国家要富强，教育是根本。但是现在，在祖国的贫困地区仍有相当数量的少年儿童因经济困难而失学，这不仅是他们个

人的不幸，也是民族的遗憾。为了中国的未来，我们留学生应该行动起来。今年，正值中国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学生 100 周年，先辈学人东渡扶桑，求索救国救民之路。今天，我们肩负着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求索东瀛。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特殊时刻，全日本中国留学生学友会倡议全体留日学生：纪念留日百年为祖国的百年大计作出自己的贡献，行动起来！为失学儿童重返学校奉献出我们的爱心，为希望工程添砖加瓦。全日本中国留学生学友会倡议用全部捐款在中国西部的贫困地区以全体留日学生的名义建一所“留日百年纪念希望小学”。望各大学学友会和同学们积极支持这项活动；同时也希望社会各界支持和参加这项活动。”

倡议书发出后，4月10日接到了首批——埼玉大学中国留学生学友会 18.5 万日元的捐款。这笔捐款，是该大学 1995 年 11 月举行大学祭时几十位同学辛勤劳动的成果。早在大学祭开始前几个月，学友会干部就决定将所有大学祭收入捐给中国的“希望工程”，并向全校近 300 名中国同学发出号召，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大学祭举行的 3 天时间内，每天平均有 30 几位同学在帮忙。从上午 8 时干到晚上 12 时，其中除一部分是国费生外，大部分是自费生。当他们获知全日本中国留学生学友会为纪念留日百年而倡议筹建一所希望小学的消息后，决定将这笔款奉献给希望小学。

计划中的其他活动后来也都如期举行。

7月13日，全日本中国留学生学友会和中国驻日使馆教育处，联合在使馆教育处举办了主题为“留日百年，报国奉献”的中国学生留日百年纪念座谈会，50 多位旅日学人结合各自的

留日经历，畅谈如何继承前辈们的光荣传统，为国效力。

全日本中国留学生学友会会长陈伟说，回顾百年历史，深切感受到留日学生的责任感。与留学其他国家的留学生相比，留日学生颇具特点。首先地理上与祖国相近，联系密切；其次是随着日本企业投资中国的增加，他们相对较快地被推上重要岗位；三是留日学生平均滞留六年半，大部分回国服务；四是艰苦的求学、生活环境培养了爱国主义精神。原东京大学学友会会长胡和平说，中国学生留日百年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纪念百周年的时刻，不能不想到自己肩负的责任，祖国的强大与个人的前途和发展密切相关。目前，许多前辈已学成回国，担负起祖国发展的责任。我时刻感到祖国这片热土的强大吸引力，也决定今年暑期回国，到清华大学供职。原东北地区学友会会长杨克俭在座谈会上说，留日学生参与的社会组织日益增多，有的组织人员参加国内学术活动，有的担任日中投资贸易的中介，有的通过校友会活动，帮助母校开发新学科，建立基金会，其潜力和作用不可低估。原东京地区学友会会长寿国梁说，1993年留日学生成立了在日中国科学技术者联盟，近年又建立了机械技术、生物科学、电子及计算机应用、物理化学、医学与药学等分会。联盟与国内同学科单位进行了积极的交流，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中国大使馆教育参赞曲德林最后说，中国留学生留日已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今天的留学生正面临世纪之交，在纪念留日百周年的时候，希望把视角放在留学生在21世纪怎样为国做贡献的高度来考虑。目前国家的留学政策是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就是要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以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

人才回国工作。祖国对回国服务和为国服务都是支持的，对留学生为国服务寄予很大期望，希望留日学人多办实事，爱国报国多做贡献^①。

8月3日，2000名左右的中国留学生在东京国立女子学园国立讲堂举行隆重集会，以纪念留日百年。为召开这次规模空前、意义重大的集会，几个月前，东京地区各主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代表在中国驻日使馆几次召开预备会议，在第三次预备会议上，正式成立了“中国留学生留日百年纪念大会筹备委员会”，全日本中国留学生学友会会长陈伟被选为大会主席，各大学学友会的主要干部分别担任各部执行委员。纪念大会由全日本中国留学生学友会主办，中国驻日大使徐敦信、日本前副总理后藤田正晴等官员及民间友好人士出席了纪念活动。大会上，陈伟在致词中说，我们在此举行纪念活动，是为了在缅怀先辈的丰功伟绩的同时，发扬先辈的光荣传统，以开辟崭新的未来。徐敦信在讲话中勉励留日学人学好本领，为中日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作出贡献，为祖国的兴旺发达奉献智慧和才华。

纪念大会后，日本艺术团体和中国留学生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中国留日学生举行的一系列纪念百年留日的活动，得到了日本各界的支持。一向大力支持学友会工作的日中友好会馆、日中友协以及大平正芳纪念财团等友好团体从各方面给予了关照协助。此外，东京的几个乐团为活动免费演出，日本电气株

^①张静波 刘莉生：《纪念留日百年 畅谈报国奉献》，载《中国新闻》1996年7月25日。

式会社、日本国际通信株式会社等日本企业也非常积极友好地给活动以赞助。

继东京地区中国留学生举行一系列活动之后，日本其他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也纷纷举行纪念活动。

8月25日，中国人留日一百周年广岛地区纪念会在广岛和平纪念馆举行，当地中国留学生及日本各界友好团体、友好人士350人出席了纪念会。

9月1日，日本九州地区中国留学生学友会在福冈市早良市民中心举行中国人留日百年纪念大会。中国驻福冈总领事吴从勇、中国大使馆教育参赞曲德林、九州地区中国留学生及福冈县、福冈市的各界日本友人共500人参加了大会。会后，当地的一些报纸、电视台还对大会作了报道。此次留日百年纪念活动是由九州大学中国留学生学友会率先发起，于2月拟订了具体实施方案，得到了九州地区各大学中国留学生的响应。之后，同学们便投入了紧张的筹备工作。他们首先走访了福冈县、市政府的有关部门及一些友好团体、企业，一家家地宣传召开纪念大会的意义。同学们的行动很快受到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读者新闻》、《西日本新闻》、《每日新闻》、《福冈经济》杂志及RKB、KBC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介均给予了介绍、报道。许多日本人给予支持和鼓励，还有许多人慷慨解囊赞助纪念活动。福冈市政府免费为大会提供场地、音响、钢琴等设施，福冈交通局破例在地铁沿线各站张贴出留日百年纪念大会的海报^①。

^①贺雪鸿：《留日学子对祖国母亲的爱——九州地区留日百年纪念活动侧记》，《人民日报》（海外版）1996年9月11日。

在留日运动走向成熟之际，中国留学生举行一系列纪念百年留日的活动，其活动的意义已不仅限于总结历史，更主要的，他们是以此作为起点，再度弘扬光大中国人的留日运动。

第 二 节

留学生学成归国建佳绩

1. 中国鼓励留学生学成归国

留学生学成归国，为国家的建设、发展出力，是每一个国家派遣留学生最直接、最重要的目的。90年代伊始，由于受“六四”的影响，中国留学生归国一度有所波动，为此，中国领导人多次就这一问题阐明政策，表明态度。

1990年3月20日，李鹏总理在全国人大七届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为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稳定发展而奋斗》中指出：“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是执行对外开放政策的组成部分。今后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德才兼备、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的原则，改进和完善派遣工作，并努力为留学生学成回国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

1990年6月7日，李鹏总理会见日本客人池浦喜三郎时说：“党和政府对卷入去年‘六四’风波的人将视不同情况采取更加宽容的政策。去年的那场风波以后，在国外的部分留学人员由于不了解国内真相，受到西方新闻舆论歪曲报道的影响，有过一般的错误言行，因此害怕回国工作、探亲时受到政府的追究。随着我国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党和政府同样对他们也采取更为宽容的政策，不仅可以既往不咎，而且只要他们表

示愿意遵守中国的宪法和法律，我们都热诚地欢迎他们回来工作、学习或探亲访友。我们的政策是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

1990年6月14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座谈会上进一步阐述了中央对广大留学人员和在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政策。他说：“我们一贯相信，广大的留学人员和在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爱国的，对祖国有深厚的感情。他们中许多人过去为祖国的建设和进步作出过贡献。相信他们今后还会这样做。李鹏总理最近和日本朋友池浦喜三郎先生说过，在去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的风波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人对国内的真实情况不了解，有所误会。有的说过一些过头的话，做过一些过头的事。对于这些人，我们仍然采取爱护和团结的方针，一律不予追究。愿意回国的，我们都欢迎，并在工作、学习、生活上作出妥善安排，不加歧视。对于想回国探亲、休假或短期工作的，也同样欢迎，保证来去自由。即使是参加过反动组织的人，只要他们表示悔悟，脱离反动组织，不再进行反对和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我们也欢迎他们回来。”

1990年6月30日至7月8日，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访日，离开东京前夕，他夜访中国留学生集中的日中友好会馆，与100多名留学生促膝交谈，并为留学生写下了“今日万里求学，明日百年报效”的赠言。李铁映说：“去年的那场风波以后，部分留学人员由于不了解国内真相，受到西方新闻舆论歪曲报道的影响，有过一般的错误言行，因此担心回国工作、探亲时受到政府的追究，这些担心是不必要的。党和政府不仅不咎既往，而且只要他们愿意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

我们都热诚地欢迎他们回来工作、学习或探亲访友，保证来去自由，并为之提供方便条件。即使是参加过反动组织的人，只要他们表示悔悟，脱离反动组织，不再进行反对和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我们也欢迎他们回来。”“由于种种原因要求延长进修和深造时间的留学人员，他们的合理要求会得到通情达理的解决。”“对回国工作的留学人员，我们要积极地为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创造条件，做出妥善的安排。”^①

1992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在外留学人员有关问题的通知》，再次放宽、明确有关政策。其全文如下：

广大留学人员热爱祖国，愿意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做出贡献，他们在外努力学习，许多人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赢得了荣誉。留学人员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党和政府一贯热情关怀、团结教育广大在国外留学人员，祖国期望他们早日学成回国，建功立业。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出国留学工作的指示精神，适应改革开放形势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做好出国留学工作，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现就对外留学人员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欢迎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公派在外学习人员有义务在学成之后回国服务。所有在外学习的人员，不论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如何，都欢迎他们回来，包

^①《今日万里求学 明日百年报效——李铁映同部分留日学生座谈》，载《神州学人》1990年5期，第1页。

括短期回国进行学术交流合作，以及探亲、休假。对在国外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一律不予追究。即使参加了反对中国政府的组织、从事过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人员，只要他们退出这些组织，不再从事违反我国宪法和法律的反政府活动，也都一律欢迎回国工作。

二、对持过期因公普通护照或一次性出入境因公普通护照的留学人员，可为他们办理护照延期或换发新护照；对要求将因公普通护照换为因私普通护照的，也可给予办理；已取得外国国籍的人员应提出退出中国国籍，依照我国国籍法的规定办理，按外籍华人对待。

三、留学人员申请办理护照延期、换发新护照，以及退出中国国籍手续时，应予办理。如与原派出部门或单位有经济及其他未了事宜，应与这些部门或单位协商解决，不影响上述手续的办理。

四、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后，只要他们持有我国有效护照和外国再入境签证，无须再履行审批手续，即可随时再出境。

五、派出单位应加强与在外留学人员的联系，主动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留学人员回国后，按“双向选择”的原则，可回原单位工作或自行联系工作，也可以进入“三资”企业工作或自行开办企业等。要鼓励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在国外兼职。

六、留学人员的家属申请出国探望留学人员，应当允许，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审批。

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按照本通知精神落实具体措施，方便在外留学人员回国，简化入出境手续，妥善解决留学回国人员工作、生活上的具体问题。

八、在留学回国人员较集中的地方，可由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或社会团体根据需要建立留学服务机构，帮助留学人员办理有关事宜，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

九、我国驻外使领馆代表国家管理留学事务，应保护我留学人员的合法权益，对他们的学习研究工作和日常生活给予帮助，为他们排忧解难，并及时向他们介绍我国内情况。要教育他们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努力学习，自尊自爱，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热爱祖国，维护祖国的荣誉和利益，为国争光。

以上无论是国家领导人的谈话，还是通知，其强调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欢迎留学人员学成归国。

为吸引留学人员归国，中国政府陆续制定措施，实行办法。其主要有：

第一，建立留学人员工作站。

据1995年5月10日至12日人事部在昆明召开的全国留学人员工作站工作座谈会所发布的消息，为拓宽留学人员的就业渠道，解决留学人员回国后择业时间短、择业难和“一次分配定终生”等问题，自1990年起，人事部先后批准在大连、宁

波、烟台、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西安、济南、福建、南京、首钢总公司、珠海、海南、河南、淄博、福州、上海、安徽、湖北建立了 17 个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留学人员工作站。工作站在为留学人员提供服务上主要做了 4 项工作：一是联系工作服务单位。二是帮助解决留学人员住房、配偶子女随迁等实际困难。三是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工作站积极与用人单位及有关部门联系，帮助留学人员解决必要的科研工作条件，工作站还负责为留学人员申请专项科研经费。四是支持创业。工作站利用留学人员的独特优势，通过开发项目建立科研场所和办公司等方式，组织进站留学人员进行新技术开发、新产品试制等创业工作。如：南京工作站成立的瑞腾公司（RETURN），西安工作站成立的人才开发有限公司都发挥了较好的作用。留学人员工作站自成立后，已接收安置了 200 多名留学人员，受到广大留学回国人员、海外留学人员和国内用人单位的广泛欢迎和好评^①。

留学人员工作站建立之初所确定的任务是：（1）利用留学回国人员在专业、语言、国外生活经历等方面的优势，鼓励和引导他们到生产第一线，直接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2）解决留学回国人员在“双向选择”过程中因择业时间较长，致使其科研工作中断、日常生活造成困难等问题；（3）对留学回国人员实行优惠政策，吸引留学回国人员参加经济建设；（4）在人员流动机制上进行探索和试验。

^①陈树荣：《人事部召开留学人员工作站座谈会》，《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 年 5 月 31 日。

第二，中国留学服务中心不断拓展工作范围。

服务中心成立后，不断拓展业务，加大服务，其1994年建立的“信息网络系统”，可作为一个重要标志。该系统进一步强化了如下服务项目：

1. 为学成回国人员择业和国内用人单位录用留学人员提供双向选择服务，并办理有关手续。

2. 为各类留学人员短期回国讲学、合作科研、学术交流牵线搭桥。

3. 为在外留学人员回国参加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和向国内引进技术、项目、资金提供信息咨询，联系合作伙伴。

4. 为留学人员回国独资或合资开办公司、企业协助办理有关手续。

5. 为留学人员申请国内专利、转让技术提供代理中介服务。

6. 按有关规定，代为受理留学人员申请和发放国家教委回国留学人员科研资助费，支持留学回国人员的科研启动工作。

据1995年5月29日至6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首次留学回国服务工作会议的消息：中国留学服务中心自1989年成立以来，在5年多的时间里，共承接了4000余名留学人员的求职申请，为1500名留学人员落实了回国工作单位并办理了派遣手续；受理了近200个科研合作项目，为3058位留学回国人员提供了1.02亿多元科研资助费；完成了“留学人才、技术供需信息网络系统”的建设工作；在海外及全国23个省市建立了留学服务分支机构。近年来，我国留学人员回国工作

的人数不断增加，此外，还有大批留学人员以短期回国讲学和合作科研等多种形式为国服务。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坚持以“快速、准确、热情、周到”为服务宗旨，积极拓展服务领域，在留学人员回国安置、海外留学人才、技术、智力开发及简化安置手续、规范服务程度、完善服务手段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给留学人员提供国内一些单位的用人信息，中国留学服务中心编辑了9期《国内用人单位需求信息》，收录了800多个国内用人单位人才需求信息近5万条，发至海外近50个国家和地区，为留学人员回国择业提供了参考信息。由于国内众多单位对外国的教育和学位制度缺乏了解，致使一些留学人员迟迟不能落实工作单位，或虽已就职，但在工资待遇和职称评定方面遇到不少麻烦。为了促进留学人员回国服务，保证其所获学历得到合理承认，从1992年起，留学服务中心开展了对外国高等教育机构颁发的学历和学位证书的评估服务工作，受理评估上百件，涉及到11个国家大专以上的学历。在网络建设上，中国留学服务中心以沿海城市为依托，逐步向内地辐射，去年该中心分别在宁波和重庆对42家人网单位进行了系统培训，已进入推广使用阶段^①。

第三，相继建立一批科学基金。

80年代，国家及地方相继建立各种科学基金，可供归国人员深入开展科研活动，其情况可见下表^②。

^①雪虹：《全国留学回国服务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年6月14日。

^②《神州学人》1990年1期，第44—45页。

中国部分科学基金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建立时间	资助范围	资助强度	联系地址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986 (年)	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	1986—1988年共资助9000余个项目, 总金额3亿元	北京西城鲍家街43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	1987	全国35岁以下自然科学工作者	每年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划出一定金额。限额资助(5万元以下)。1987—1988年共资助267个项目, 总金额879.43万元	同上
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1986	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	每年1000万元。1986—1988年共资助1106个项目, 总金额3159.61万元。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
4	青年社会科学基金	1989	39岁以下社科工作者	每年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划定50万元。	同上
5	国家教委青年教师优秀基金	1986	全国高校	每年600万元(含40%外汇额度)。1986—1988年共有194人获得资助; 平均资助强度7万余元。	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 国家教委
6	非留学人员经费	1986	全国非教育单位1978年以后出国留学人员	每年400万元(含40%外汇额度)。1986—1988年共发放880余万元, 资助科研项目(课题)148项, 及小额经费、参加国际学术活动经费若干。	北京和平里中街12号 国家人事部流动调配司留学人员处

续表

序号	名称	建立时间	资助范围	资助强度	联系地址
7	震旦基金会 英东高等教育学院青 年教师基金	1986	35岁以下(90年前40岁)高校教师	单项资助金额, 5000—20000美元。每两年评审一次。首次评审, 44人获得资助。	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 国家教委
8	国家博士后 科学基金	1986	博士后人员	A级: 1万元人民币和2千美元; B级: 5千万元人民币和1千美元。目前已进行2次评审, 43人得到资助。	北京三里河南一巷一 号人事部专家司博士 后处
9	高等学校博士 科专项基金	1985	高校博士点副教授 以上人员	每年2千万, 平均强度3万余美元。	北京西城区柳荫街29 号国家教委科技管理 中心
10	地震科学基 金	1984	全国地震科学工作 者	1985—1988年总经费1399万元, 平均每个项目3—4万元	北京复兴路63号地 震科学联合基金会
11	水利水电科 学基金	1984	全国水利水电行业	申请限额3万元。至1988年4月, 共资助项目251个, 总金额360.95万元	北京车公庄西路10 号水利水电科学基金 办公室
12	机械工业技 术发展基金	1987	全国机械行业	1986—1987总基金数8400万元, 项目平均资助强度10万元。	北京三里河机械电子 部

续表

序号	名称	建立时间	资助范围	资助强度	联系地址
13	水利技术开发基金	1985	全国水利技术应用开发部门	1985—1987年共拨600万元,资助金额一般3万元以内,个别项目5万元。	北京白广路二条,水利部科技司
14	航空科学研究基金	1985	航空航天部航空工业单位	1986、1987年共资助250个项目,平均强度3.2万元。	北京市761信箱
15	测绘科学技术发展基金	1985	全国测绘科学工作者	1986、1987两年资助总额360万元,平均强度8万元。	北京百万庄国家测绘局内,测绘基金会
16	卫生部科学卫生研究基金	1985	全国卫生系统	年经费700余万元,每项6万元左右。1986—1988共资助316项,总金额2149万元。	北京后海北河沿卫生部科教司
17	卫生部青年科学研究基金	1987	全国卫生系统(35岁以下)	1987年资助项目81个,总金额150万元	同上
18	电子工业科学技术发展基金	1985	全国电子行业	1986—1987年资助总额1820万元,项目平均强度2.8万元。	北京万寿路27号机械电子部电子科学院
19	气象科学基金	1986	全国气象科学工作者	1986—1987年资助总额为120万元,平均强度0.5万元	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国家气象局科教司

续表

序号	名称	建立时间	资助范围	资助强度	联系地址
20	城乡建设科技发展基金	1986	全国城乡建设行业	1986—1987年资助总额311万元,平均强度2万余元。	北京西郊百万庄建设部科技局。
21	国家医药管理局新药研究基金	1987	全国	1987—1988两年资助总金额600万元,项目平均强度约6万元。	北京北礼士路甲38号
22	地质行业科技发展基金	1987	全国	1987—1988年资助总金额600万元,平均强度3万元	北京百万庄大街26号地质科技基金办公室
23	煤炭科学技术发展基金	1985	煤炭系统	1986—1988年共资助170项,总金额600余万元。	北京和平里煤炭科学院技术处
24	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	1986	福建省	1986—1987年资助金总额为201.4万元,资助项目213个。	福建省科委
25	上海自然科学基金和青年基金	1987	上海市	1987年基金总数320万,其中自然科学基金项目95项,平均强度1.7万元;青年科学基金157项,平均强度1万元	上海市科委
26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	1988	浙江省	1988年基金总额300万元。	浙江省科委
27	山西省自然科学基金	1986	山西省	1987—1988年批准项目159个,平均资助强度1万元左右,最高3万元。	太原市迎泽大街60号省科技大楼720室

续表

序号	名称	建立时间	资助范围	资助程度	联系地址
28	贵州省自然科学基金	1986	贵州省		贵州省科委
29	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		甘肃省		甘肃省科委
30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1987	广东省		广东省科委

注：1. 表中所列第2、5、6、7项基金，留学人员可在回国前申请。

2. 表中货币名称除注明者外，一律为人民币。

进入 90 年代后，除国内原有的基金外，又相继有科学基金建立，其目的在于确保留学归国人员有较充分的条件进一步施展才能。

除上述各种措施，国内有关方面还通过召开留学归国人员座谈会，搞留学归国人员工作成果国内展、国外展，制定留学归国人员优惠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赴国外招聘等措施，鼓励学成人员归国工作。另外，有的省、市以及众多的部门、机构等也制定各自的优惠政策以吸纳留学人员。

各方面的努力，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因为在归与不归的问题上，很多留学生处于两难之中，国内的吸引力大了，他们回国的可能性就大了。

1995 年中秋节前夕，名古屋工业大学中国留学生会征集对联，其中一副应征的对联为：“越洋东来欲到天，辞家见月几回圆；勤工助学似插队，就职回国两难全。”横批是“请指教”。这副对联，典型地反映了一部分留日学生的矛盾心情，一方面是祖国的需要，一方面是高的收入和好的工作条件，在归和不归的问题上他们颇费思量，甚至是很痛苦。

胡和平获得日本文部省奖学金，于 1992 年 10 月入东京大学，1995 年 9 月获得东京大学工学博士，当他准备归国时，有一些人不解。他回顾说：“当得知我要回去的消息，很多人都显得很吃惊，都来问我为什么回去。我曾担任过东京大学中国留学生学友会会长，认识的留学生很多。当时的 640 名中国留学生有一半以上我都认识。他们中有的人对我说，你刚拿到学位，正想和你商量一块干点事情，怎么就急急忙忙地回去了。一块儿工作的有四位中国人，他们迷惑不解地问我，你现

在所在的日本公司工作专业很对口，待遇也很好，干得好好的，怎么就要走了。住在一个住宅小区的有几十名中国人，他们中有的人对我说，你回去的消息像是在这里爆炸了一颗小型炸弹。有一位朋友打来电话问我的决心是怎么下的，他说他打算回去已经好几年了，可就是下不了回去的决心。”^①

也许胡和平是“名人”，但他的经历，确实反映出了相当一部分留日学生的真实心态。

不管留日学生的心情怎样矛盾，他们回国的人数在逐渐增加。

从1979年开始，中国政府正式向日本派遣了留学生。这一年共派出131名自然科学的进修生；同年，中国向日方交涉派遣访问学者事宜。从这一年起，日本政府开始向20名中国政府派遣的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当年还有20名自费生赴日本留学。从1980年起，中国除每年向日本派遣进修生，并开始选派60余名访问学者和100名本科生留日。1980年，各类留日学生总数已达550人。从1982年10月开始派遣130名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研究生。1980年至1984年的5年间，共派出本科生约400名。1979年至1986年共派出进修生1800名。1982年后，中国逐步放宽自费留学。1984年赴日的自费留学生增至1500人。各类留学生总数为2500余人，日本政府为中国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数增至225人。1984年至1986年期间，中国公派的留学人员每年保持在600至700人的水平

^①胡和平：《为投身祖国建设事业而骄傲》，《人民日报》（海外版）1996年11月13日。

上，尤其是自费生人数成倍增加。截至 1986 年底，上述各类留学人员总数已达 4500 人，占全日本外国留学生总人数的 20%。从 1987 年开始，中国政府除向日本派遣访问学者外，还开始派遣两国导师联合培养的博士生。此后，每年国家公派留日学生总数保持在 250 至 300 人之间；而单位公派、尤其是自费生的人数逐年显著增加。截至 1996 年 4 月，中国在日留学人员（不包括日语学校学生和在企业研修生）总数已达 2.4 万人，占全日本外国留学生总人数的 44% 左右，所学的专业几乎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其中国家公派人员以理、工、农、医等学科占多数，自费留学生中学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约各占半数。中国的留学人员涉及中专生、大专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进修生、博士后等各种层次。至 1996 年的 18 年来，中国赴日留学人员的总数 4 万人（其中国家公派的约 6000 人），在中国外出留学的 100 余个国家中占第二位。截至 1995 年底，已回国服务的留学生约有 1.5 万人，尚在学的有 2.4 万人，其中自费生的比例高达 90%。

1996 年 7 月间，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教育室领事单耀忠在接受采访时的对话基本概括出了近几年中国留日学生归国人数增加以及其中的原因。其对话如下：

问：听说你是第二次来大阪工作，能否谈谈这次与上次情况有何不同？

单：1988—1991 年我曾在大阪工作过。那时学生以公费为主，自费生很少，因而工作重点放在公费生身上。现在则是自费生占绝大多数。上一任期间毕业

生较少，毕业后允许再作2年博士后研究，所以回国人员就更少。而这次来已累计有好几批毕业生，回国人数也大幅度增加。因此，这次要适应这种变化。

简单来说，对在学的留学人员，要为他们学有所成和成才创造条件，提供帮助和服务；对已经结束学业暂时尚未回国的留学人员，要给予更多的关注，鼓励他们早日回国工作或以各种方式为国服务。

问：请你介绍一下留学生的回国情况。

单：据统计，1995年从世界各国回国的中国留学人员达5000多人，比1994年递增了15%，创历史最高纪录。1995年从日本回国的留学人员达1374人（其中关西地区回国250人），比1994年增加近30%。今年上半年从日本回国的人数已达822人（其中关西地区150人）。这种留学回国人数不断增长的势头还将继续发展。

问：你能否分析一下留学回国人员增加的原因？

单：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国内政治稳定，经济持续良好发展，为留学人员回国施展才华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舞台。由此而产生的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更多的留学人员心中涌动的爱国热情变成了回国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干事业还是回国好。第二，一些发达国家近几年经济不景气，例如日本，数年来经济持续低迷，复苏缓慢，失业人员增加，留学生求职难，有的虽能找到一份工作，但心头总有“寄人篱下”之感。

相比之下，祖国是“风景这边独好”，回国干心里踏实。第三，相当一部分人结束学业后在外工作了一段时间，短的2—3年，长的5—6年，知识丰厚，钱包渐鼓，回国很少有“后顾之忧”。第四，不少留学人员在外生儿育女，许多孩子能讲一口流利外语，母语却听不懂、说不了。子女的教育成了一块心病。于是，为了下一代，不少人当机立断，“打道回府”。

问：你说的第一条原因很重要，想听听你对抓住机遇的见解。

单：机遇，无论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是对一个企业、一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抓住机遇就是成功了一半”。许多留学回国人员获得了成功，虽有不少人在学业阶段就是出类拔萃者，但更多的是在回国后才显露头角的。中国有句俗语叫“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你早晚要回去的话，那么“晚回不如早回”。“捷足先登”可能占据有利位置，而“姗姗来迟”，选择的余地就要小得多。

问：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对留学人员来讲是不是也是一个机遇？

单：从现在到2010年这15年，是下一个世纪中国谋求更大发展的基础阶段，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需要跨世纪的人才。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去年国家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而留学人员无疑是科教兴国的生力军。祖国和人民正翘首企盼海外莘莘学子在实施科教兴国伟大战略目标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这对留学人员来讲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如果你能把握住机遇，在祖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征途上留下自己的足迹，那么，待到祖国山花烂漫时，你就可以理直气壮、问心无愧地说：“我是出了力的！”

问：可我不时听到留学人员抱怨回国不好找工作，你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单：不排除有这种情况，但要具体分析。如果留学人员回国都想去天（津）、南（京）、海（上海）、北（京），就难免出现“求职难”。如果去大学工作，都想去北大、清华、复旦、交大、天津、南开，人人争先恐后，那么学校选择的余地就大，而这些高校接纳人数是有限的；对留学人员来讲，选择的余地反而小。

“你想去的地方未必要人，要人的地方你未必想去”，这是一个矛盾。我认为，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相比，经济发展滞后，原因虽然很多，但缺少人才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那里是“求贤若渴”。毛主席说过：“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有志者到那里去“闯荡”一番，恐怕能一显身手，干一番事业。当然这需要勇气，需要一种创业精神。机遇与挑战并存。对青年人来讲，挑战则更富有刺激性。

问：一些人包括日本人对政府派遣的留学生学成不归有看法，你能谈谈你的看法吗？

单：国家出了培养费，要求留学生学成回国工

作，是理所当然的。中国人讲“忠孝”，忠者，报效祖国；孝者，孝敬长辈。所以，我从来都是理直气壮地要求公费生增强义务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尽快回到生你养你的土地上去，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作出贡献，而不要迟迟不归，被人说三道四^①。

2. 从事文教科研活动的归国留日学生

90年代，中国人才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各部门、各单位纷纷把目光瞄向留学归国人员。为吸引人才，他们各自制定自己的政策。如1995年3月，汕头大学对未取得副高以上任职资格的博士、博士后到校工作的人员待遇作出了如下规定：

一、人事关系已转入本校，受聘上岗工作者：

项目 \ 学历 待遇	博 士	博士后
国家工资	按国家工资制度执行	按国家工资制度执行
校 内 岗 位 津 贴	一年内按讲师待遇，一年 后经考核合格按副高待遇	按副高待遇
住 房	按讲师待遇（带家属）	按副高待遇（带家属）
职 称	按职称评审程序申报、评 审	按职称评审程序申报评 审
备 注	经职称评审程序取得专业技术任职资格并受聘上岗 后，则以受聘职务（职称）享受校内各项待遇。	

^①李彦春：《祖国正当振兴时，学子如何写风流——与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教育室单耀忠领事交谈录》，《人民日报》（海外版），1996年7月24日。

二、人事关系未转入本校，以借聘等形式到校工作者：

项目	学 历	博 士	博士后
	待 遇		
国家工资		按国家工资制度规定金额发给补贴	按国家工资制度规定金额发给补贴
校 内 岗 位 津 贴		按讲师待遇	按副高待遇
住 房		按讲师待遇（带家属）	按副高待遇（带家属）
备 注	人事关系转入本校后，则按“一”表规定执行		

一些留日学生归国后，他们在祖国的文教科事业中，成果显著，令人钦佩。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李文彬是 80 年代中期留学日本的。赴日 3 年后，他获得了静冈大学农学硕士学位。又过 3 年，获得爱媛大学农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在米山工业株式会社做博士后研究 2 年。1992 年，他回到了中国，到北京林业大学任教。“人机环境工程学”是一个新兴的边缘学科，李文彬到校后，便开始向这一领域进军。国内缺少有关的仪器设备，他用自己的科研启动费购置必要的仪器。他主持了森林作业环境与劳灾安全的研究，开展了自选课题便携式林业机械与人体手臂界面的人机工程学研究，还主持了霍英东教育基金项目油锯动静态对操作者手臂肌肉疲劳的综合效应研究。经艰苦攻关，他的高把油锯降噪及手把保温系统的研究已告完成，研制出的新型“高把油锯加温手把”获得了国家专利，还有有关的多篇论文

问世。

除科研外，李文彬还在教学活动中贡献亦多。他开出了“人机工程学”、“应用人体工程学”、“人机环境系统测试与分析”等新课，参加指导研究生的工作，身兼机械教研室主任、机械工程系主任之职，又挑起了森林工业学院副院长的担子。回国的几年时间里，他连续被评为北京市高等学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和北京市优秀青年教师，并被破格晋升为教授^①。

在归国的留日人员中，有人是几次赴日留学。吉林建工学院副院长、环保专家尹军就是这样的一位留日归国成员。

1985年盛夏，31岁的尹军第一次来到日本著名学府早稻田大学进修。他先后在建筑学科和土木学科参加了污泥生物浓缩处理技术和中水道技术两项课题的研究。污泥是污水处理的副产物，如不对它进行妥善处理，将会导致二次污染，使耗资巨大的污水处理失掉价值。当时，国际上采用的污泥浓缩处理技术大都是重力浓缩。而他们研究的生物浮选浓缩技术，则是利用污泥在厌氧条件下产生的气体，使之上浮、浓缩，并使之和下段污泥消化处理连成一体，因此将使处理效率大为提高。然而这项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历程却是十分艰难的。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使这项课题很快取得阶段性成果。在紧张的研究工作之余，尹军还以出国前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在3种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5篇学术论文。1986年岁尾，尹军进修即将届满。他的两位导师都挽留他，希望他留下来攻读博士学

^①铁铮：《爱心无限——记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李文彬》，《人民日报》（海外版）1996年9月11日。

位。为使尹军能在日本安心学习，在他来日本不久，远藤教授就亲自作出安排，使他夫人也来到日本。一些国内留学生和日本朋友也劝他把握住这次机会，把博士学位拿到手。从内心讲，尹军也渴望得到博士学位，但那至少还要5年时间。尹军毅然决定按期归国。

在从日本归来的4年时间里，尹军以旺盛的精力开展了4项科研项目研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和大型国际会议上发表了30多篇学术论文。1991年1月，由国家教委选派，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尹军再一次东渡日本。当他得知早稻田大学建校100多年，虽曾接受过100多名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但至今尚无一人向这所大学的博士学位进军时，尹军凭坚韧不拔的毅力，仅用一年零两个月便完成了长达20万字，题为《中国城市水污染控制系统的研究》的博士论文，在1992年3月摘取了早稻田大学工学博士的桂冠。学业结束，他决定立即回国。归国后，他很快担任了学院副院长职务，还在环保科研活动中取得3项重大科研成果，它们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①。

类似上述两人那样在科研教育活动中业绩突出，成为系统、部门业务骨干的归国留日学生在全国各地都有很多。如1994年初，由国家教委组织实施的《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专项基金首批获资助者有42人，其中23人有过出国留学、合作培养、进修或访问的经历，而这23人中又有5人是留日归来者。他们是：

^①张玉来：《情系松江水——记吉林建工学院副院长、环保专家尹军教授》，《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年11月8日。

罗毅，清华大学教授，33岁，留日博士，研究半导体激光器；

郑南宁，西安交大教授，博导，41岁，留日博士，研究计算机视觉模式识别并行分布式处理；

刘进元，清华大学教授，36岁，留日博士，研究植物与微生物相互作用的分子基础；

蔡少青，北医大副教授，33岁，留日博士，研究抗糖尿病新药；

刘忠范，北大副教授，31岁，留日博士，研究电化学、光电化学、功能材料学及生物物理化学。

首批跨世纪优秀人才，他们每人每年将得到15万元人民币的科研资助，连续资助3年，成绩优异者还可继续申请资助。

一批批归来的留日人员取得成绩，受到重用，从一个方面表明了留日运动的意义之所在。

3. 从事实业活动的归国留日学生

为鼓励留学归国人员发挥所长，各地纷纷制定政策。深圳于1995年制定《鼓励出国留学学生来深圳工作的规定》。其规定如下：

第一条 为鼓励出国留学学生来深圳市工作，发挥出国留学生的科学技术专长和对外联系的桥梁作用，促进深圳市科技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留学生，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公派、自费出国学习，取得学士学位以上的人员和在国内已取得

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并到国外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进修二年以上（或一年以上，但在某些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访问学者或进修人员。

第三条 深圳市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引进智力办）是深圳市主管留学生工作的专门机构，负责对留学生来深圳联系工作的接待、咨询、服务和审定工作。

第四条 年龄 50 岁以下的留学生在深圳可以选择适合自己专长的工作单位，经用人单位同意后，报送市引进智力办审定。

第五条 接收留学生的单位如受编制、调干或干部录用指标限制的，可以追加；入常住户口，可免收特区基础设施增容费及免于调干考试；除合同另有规定外，留学生在深圳市范围内可以自由流动；如要求回内地工作，由市人事局负责协助联系。

第六条 凡来深圳市工作的留学生应向市引进智力办分别提交下列资料：

（一）留学生须提供本人护照复印件、国外学历证明、学位证书原件及成绩单；自费留学生还须提供留学国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的证明。

（二）访问学者或进修人员须提供本人护照复印件、国外院校的邀请函复印件以及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职业资格证书原件；进修不到二年者，还须提供在某个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证明材料。

第七条 凡从 1988 年 10 月 5 日以后自愿来深圳工作并由市引进智力办接收的留学生，因私申请出国，按照来去自由的

原则，由所在单位签署意见，经市引进智力办报市人事局领导审批后，送市有关部门办理出国手续。

第八条 已在深圳入常住户口的留学生可以在市内创办私营企业；允许以境外注册公司的名义到深圳投资；也可以用自己的专利、专有技术或资金向深圳的各类企业投资入股。

第九条 留学生在深圳工作期间，凡需要受聘担任专业技术职务者，应首先按规定的程序评定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定时不受指标限制。

第十条 留学生在深圳进行科学研究、新技术开发或生产高科技产品，经深圳市科技局出具证明，凭其工作单位的企业法人证书或企业证明，向有关单位申请科学技术发展基金或向银行申请开发生产基金贷款，接受申请部门应优先给予考虑。

第十一条 留学生在深圳工作有突出贡献者，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和用人单位给予奖励或表彰；留学生引进的技术项目，经市科技局评审，确属有先进技术并取得重大经济效益的，应给予重奖。

第十二条 留学生在深圳工作期间取得的合法外汇收入，本人要求汇出境外的，可通过特区内中国银行办理。

第十三条 留学生在深圳联系到接收单位需要调人的，应根据下列不同情况办理有关手续：

（一）由国家教委或人事部分配的留学生，凭国家教委《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报到通知》或人事部《分配毕业留学生工作介绍信》到市引进智力办报到，并凭以上材料和市人事局的行政介绍信到市公安局办理入户手续。

（二）不属国家教委或人事部分配的自费留学生，凭市人

事局的行政介绍信及出国留学前户口所在地开具的户口迁移证或户口注销证明到市公安局办理入户手续。

(三) 按规定归国后, 回原单位工作的留学生, 由市人事局与其原工作单位商调, 如原工作单位同意调出, 优先办理调动和入户手续。

第十四条 留学生的配偶、子女(不含在校大、中专学生)调入或随迁应根据下列不同情况办理有关手续:

(一) 配偶属国家正式干部或工人的, 由人事、劳动部门优先办理调动和入户手续。

(二) 无正式工作的配偶及子女, 属城市户口的可以随迁; 因故不能随迁的, 也可以在以后迁入; 以后迁入的, 由市引进智力办开具证明, 市公安局给予优先出具准迁证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三) 农村户口的配偶及子女, 按特殊情况给予优先办理“农转非”手续。

第十五条 留学生如不正式调入, 而短期来深圳工作的, 由留学生本人与用人单位签订聘用合同, 并按规定办理暂住证。

第十六条 调入深圳工作的已婚留学生, 其配偶调入后, 可购买一套福利商品房。接收留学生的单位, 应优先解决其住房; 单位确有困难解决不了的, 则由市引进智力办协助其向市住宅局申请, 按集资房屋政策和价格提供住房。该住房按《深圳经济特区集资建房管理办法》管理。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出国留学学生来深圳工作的暂行规定》(深府〔1988〕

305号)及《关于印发〈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出国留学人员来深圳工作的暂行规定〉实施细则的通知》(深府〔1989〕252号)同时废止。

1996年,烟台开发区内开辟留学人员创业园区。进园的对象包括国家公派、自费出国学习取得学士以上学位的人员;在国内取得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到国外高等学院或科研机构进修一年以上的访问学者或进修人员,以及在国外留学已获得长期居留权、留学国再入境资格的人员。创业园区鼓励留学人员进区从事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型项目的研制、开发和生产;兴办各类科研开发机构,从事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贸易;建立科研开发中试基地;兴办信息咨询、投资服务,以及律师、会计师、翻译事务所等机构。在园区内,留学人员可以独资、合伙或与国内企事业单位或国外客商合作,到园区从事科研、生产,也可委托有关单位或个人到园区从事科研、生产。对经过认定的留学人员企业,园区在办公场所、购买住宅、税收、配偶的工作安排和子女入学等方面予以优惠。烟台市和开发区财政每年拨出一部分资金,有偿资助留学人员兴办企业或从事科学研究。开发区还配套了一些优质周转住宅,为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居住提供方便。

以上的烟台留学园区自不必说,就是深圳的规定,也有相当一部分条款是鼓励留学人员从事实业活动的。

留学归国人员从事实业活动,基本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跻身于实业性企业,作为企业一分子发挥才能,一种是自办实体,或与另一方合作办实体。随着归国留学人员的增加,后一种情况在呈增多趋势。

上海市在吸纳留学人员方面做得更突出些。上海为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发展科技产业，于1995年创办了中国首家留学生科技创业园，一期工程建成后，留学人员进园创办的科技企业达到了数十家。上海市同时出台了为留学人员创办其他技术性、智力型企业的优惠政策，包括注册资金可适当降低，来去自由等。优惠的政策，使上海很快出现了留学人员企业群体。截至1996年7月，上海已有300多家享有外商独资企业待遇的留学人员企业开业。这些企业发展迅速。仅1996年1至4月，由留学人员创办的企业就比过去净增53%，注册资金增加2.47倍。

直接吸纳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开发新产品，替代进口和填补国内空白，是留学人员所办企业的一大特点。而留日博士冯坤范回国创办的上海玉垒环境生态技术有限公司，则是众多留学人员创办的企业中的佼佼者。

冯坤范女士原是上海中山医院的护士，1988年赴日本留学。留学期间，她发奋刻苦，学业卓凡，成为她所在学院博士生中唯一获得文部省5年奖学金的人。留学期间，她还立志要在环境保护领域为祖国做些实事，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故乡上海能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清洁美丽的城市相媲美。为此她用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进行考察，查找文献资料，反复比较，最终选择了曾在处理波斯湾石油污染中名声大震，在阪神大地震后消除恶臭建奇功的“东江微生物新技术”。东江微生物是名为阿加利埃菌的放射菌，是靠吃土壤中污泥和新鲜垃圾而生存的有益菌。为取得该项技术，冯坤范找到东江先生，东江被她爱国爱乡的精神所感动，同意以1500万日元最优惠的价格将东江

菌在中国的使用生产权卖给了冯坤范。

冯坤范拿出自己的积蓄，又向同学借贷，凑齐 1500 万日元，拿着菌种回到上海，于 1995 年 5 月 4 日创办了玉垒公司。她在上海农学院院内一条 180 米长的河流中做试验。投入菌后 3 个月河中污泥不臭了，河水变清了。在上海回国留学生服务中心的支持、帮助下，她的公司名声大震，新闻媒介纷纷报道。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国家科委主任宋健都指派秘书打电话表示关心。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黄菊、徐匡迪都为玉垒公司做过批示。1994 年 10 月的一天，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华建敏专门带市农委、科委、环保局领导去玉垒公司考察。

玉垒公司名气大后，冯坤范也忙了起来，找她洽谈运用新技术，购买产品的与日俱增^①。

1996 年，中国留学服务中心设立留学人员投资事务处，为留学生创业又提供了一个方便条件。该投资处的服务内容有：

1. 为留学人员提供投资政策、法律、法规、国家产业投向、有关地域的投资状况、投资环境以及申办程序、手续等咨询服务；

2. 为在外留学人员回国投资办企业、短期讲学、合作科研、科技成果转让、新技术开发、引进国外新技术项目等寻求国内合作伙伴，提供牵线搭桥中介服务。

3. 提供新产品开发，非专利技术、设备等入股资产的代

^①张敏：《为了一个绿色的追求——记留日学生冯坤范女士和她的治污工程》，《上海侨报》1996 年 8 月 27 日；金丹 汤为民：《上海崛起留学人员企业群体》，《文汇报》第 17741 号。

理评估服务；

4. 为国内企业寻求境外资金，先进技术项目及产品谋求国际市场提供信息服务。

4. 从事商贸服务业的归国留日学生

留日学生归国后，从事文教科研活动的很多。由于他们中的一些人原本就是各文教科研单位所派出留学的。从事经济活动的，除搞实业外，广阔的高贸服务业也是他们纵横驰骋的天地。他们可以利用在国外所学的知识，可以利用在留学时建立的各种关系，可以依靠留学生活带来的阅历与胆识，从事中介活动，从事贸易活动，从事形式众多的服务业活动。

一位日本记者从中国返回日本后，写了一篇文章，文中写道：“留学生办公司已不奇怪，这是一种文化、一种思考方式的变化。在中国新的经济发展时代，中国青年留学生也有新动作。如神户大学的博士生郑剑豪，从少年时期想当政治家，而现在他是国际经济人——他和朋友们一起创办‘剑豪公司’，努力干着。在巨大的时代潮流中，我发现，他们的精神，像当年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青年，奋勇理想……”

上文中所说的郑剑豪，1965年出生，1982年考入北京的大学。留学日本后，他从硕士读到博士，用日语写过一本14万字的论著《论日本官僚制度》。他对自己从事经济活动解释说：“我看到的坐而论道的中国留学生太多了。在神户大学读书这么多年，深感他们太可惜了。我试做贸易，是因为我比中国国内的官员更了解日本国情，比一些个体倒爷更能宏观看世界。譬如我协助一家日本公司，做它的最新产品变色瓷砖在中

国的总代理，已在上海、杭州一些建筑外墙上使用，这比盲目进口过时淘汰品更有意义。”^① 郑剑豪虽然还在北京租赁了两间小餐馆，在家乡制造新型水泥管道，但他还声称，将来自己要搞政治。

既然创业，就有艰辛，也会有曲折。很多留日学生是以学生的身份出现在日本的，他们中没有继续读大学的，两年后需要回国。他们中的很多人原本就没有正式工作，即使有工作，出国几年也会使工作丢失。因此，他们回国后，往往需用留日期间勤俭节约下的一点钱作资本自谋职业。只不过他们因文化层次不高，不引人注目，回国之后很快就湮没在人海里，所以他们的事业鲜为彰世，若不，他们的活动将为留日归国人员的经济活动增添更丰富的内容。

留日归国人员在经济活动中的艰辛和波折，可以从他们在上海地铁商城的经历中看得出来。

1995年4月，上海第一条地铁正式通车。地铁由锦江乐园到上海火车站，中途经过徐家汇、淮海路、人民广场等。地铁尚在施工阶段，一些上海籍的留日学生就开始打地铁的主意。按照日本的情况来推理，地铁商城应该是异常繁荣。地铁开通前，一批留日学生先行一步，纷纷抢租地盘。地铁商城里70平方米的店铺，每月须交租金1万元，装修还得再花十几万元。他们租的店铺开张后，店铺冷落顾客少，大大地出乎预料之外，几个月后，陆续有人退租。

在徐家汇地铁商城，也有一批大阪的留学生租店售货，没

^①纪涛：《郑剑豪：从这里“创业”》，载《神州学人》1994年8期，第30页。

几天，顾客也日益稀落。结果，他们或是退租，或是苦撑。

与上述经营困难的店铺相比，一家女留日学生朱瑾开的“神户咖啡店”显得多些生气。朱瑾说：“我店才开张一个月，但我有信心再办 10 家大众化、价格便宜的咖啡馆。我学习日本人的经营方法，告诫小姐服务第一，她们是大学里的学生，素质好，文化层次高，……这里凡是男士进来，赠送一个打火机，上面印着店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女士进来发一张优惠卡，……这里的服务与众不同，送冰水，送消毒毛巾，让客人享受到贵宾一样的待遇。我还准备发放一些小广告，只要把知名度打出去后，客户一定会源源不断的。这儿的潜力很大，日本老板对我说过，搞饮食行业，不要看眼前利益，要看是否有发展。”^①

留日归国人员所创办商贸、中介、服务类公司，也不乏取得较明显业绩的例子。身兼日本高桥贸易株式会社海外事业部部长的金国毅，回上海开创了三鑫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公司于 1993 年开办后，为国内多个项目进行了工业计算机系统的开发和技术指导。1993 年创办的北京时代律师事务所，是由 9 位律师办的合作律师事务所，该所副主任吴鹏，原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后公派赴日本国立九州大学法学院，主修国际法及国际投资法，相继取得法学学士、硕士、博士资格，1993 年回国后即与友人合办了律师事务所。“‘时代’所分设八个相对独立的业务部门，以其独有的规模优势和结构优势，

^①林惠子：《留日学生进军上海地下商城》，载《中国留学生报》（东京），转引自《神州学人》1996 年 1 期，第 27 页。

在提供高度专业化服务的前提下给客户集体和协作的服务，它分别为金融与证券事务部、投资与能源开发部、期货法律事务部、知识产权部和房地产法律事务部。各部律师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又互相协调，密切合作，从而使律师个人摆脱了什么项目都接，什么官司都揽，整天忙碌，疲于奔命的局面。‘时代’所的每一位职员都有一种共识：客户就是上帝，服务就是本份，正是本着这个原则，‘时代’所发展了广大的客户群和广泛的合作关系网络，在它的客户名单中，不仅有国内大型企业如华润公司、中国粮油总公司、四通集团公司等，还有国际著名的跨国公司，如摩托罗拉公司、日本三菱公司、美国三菱公司等。所内部分律师从事律师工作时间悠久，办理大量的诉讼、仲裁及其他非诉法律事务代理工作。在外多年的吴鹏先生就能熟练使用英语、日语提供法律服务，对日本及英、美等国的法律体系及文化背景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他曾为美国摩托罗拉有限公司、日本三菱商事、索尼公司、北京商品交易所、胜利油田实业公司等几十家中外企业提供了法律服务，并担任法律顾问，参与有关项目的谈判及合同的起草、审查及修改工作，他以自己丰富而成熟的经验和技巧而被誉为资深律师。‘时代’所也因拥有一批这样的律师而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的经验和‘实战’能力的律师机构，也因此取得了令同行们羡慕的成绩。”^①

但是，从整体上说，留日归国人员从事的经济活动，目前

^①沈婷昭：《创一所世界级的律师事务所》，载《神州学人》1995年8期，第21页。

还只能说尚属创业阶段。但这却是一种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将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所作用。

第 三 节

留学生停留日本和转往他国

1. 定居日本的中国留学生

按日本国籍法规定，外国人如想获得日本国籍，有两种方式，一为申报入籍，二为归化入籍。在归化入籍中，又分为如下5种情况：(1) 一般外国人；(2) 与日本有一定血缘或地缘关系的外国人；(3) 日本国民的外国籍配偶；(4) 与日本有特别密切身份关系的外国人；(5) 对日本有特别功劳的外国人。

按中国留学生的情况，他们如想留学生活结束后长期居留日本，取得日本国籍，最可能的渠道就是与日本人结婚，先争取延长签证，再假以时日，进而取得日本国籍。

有一些不想归国的中国留学生，便走上了与日本人结婚的道路。当然，这种婚姻可能是稳固、长期的，也可能是脆弱、短期的，如是后一种情况，则会在正式定居日本后解除婚姻关系。

因为中国留学生有与日本人结婚的需要，于是在日本便有了各种报刊杂志及其他媒体上的专门面向中国人的征婚广告。下面就是一则这样的广告：

国际婚姻资料介绍

日本最大的国际婚姻相谈所，热心帮助想和日本男士结婚的中国女性免费介绍理想的对象。日本×××协会具有长达20年的优秀业绩，讲信用，负责任，并严守秘密，咨询免费。

有大量诚实、温和的日本男士在本会登记，去年NHK、朝日电视台、日本电视台、东京电视台在向日本全国播放的节目中，曾报道过本会促成美满国际婚姻的具体业绩。

本会介绍的对象成婚率每年平均一百五十对，现在他们都过得非常幸福。

本会同样接受怀着这种希望，引颈待望在北京、上海的各位妙龄女士，并尽力去促成她们的梦想。请各位女士安心来访。如果来信，请务必寄一张生活小照，并写上联系地址和电话号码。

营业时间：早10:00~晚7:00（午间无休息）

株式会社日本×××协会

联系地址——（略）

联系电话——（略）

FAX 传真——（略）

上则征婚广告，是专门向女留学生发出的，这是因为，相对于男留学生来说，女留学生寻找日本人作配偶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些。

在日本办理结婚手续，是十分简单的事情，只要男女双方

在结婚申请书上签名盖章，再请上两个证人作证，在申请书上留下姓名以后，就可以把它送到区役所结婚登记处去了。登记时也不需要男女双方同行。但是，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与日本人结婚不论是真情还是假意，他们所关注的，不仅仅是那一层婚姻关系，而是更注意要把“日本人配偶”字样写入签证，使居留资格从“就学生”、“留学生”等改变成“日本人配偶”，从而使签证得到延长。

留学生与日本人结婚后，要想更改签证资格，延长居留时间，必须要经过法务省入国管理局官员的那关。入管局官员在审核时，主要看的不是结婚手续材料，而是要观察、提问，进而确定是否应该给外国配偶居留权。

一位上海姑娘（B小姐）1986年从上海赴日留学，7年后，与一位叫田村晴男的日本青年在未结婚的情况下办了结婚手续，在办理延长签证时，同入管局的官员有了如下的对话：

“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半年以前。”

“在什么地方？”

“在……在留学生会馆……” B小姐随口编造道。

“留学生会馆？”

“是留学生会馆吧？那一次，好像在宴会上……
哎，田村，你说是吗……”

“是…是的。”戴着一副白边眼镜，显得十分老实的田村晴男点着头应允道。

“你们的结婚仪式是在哪里办的？”

“在一家教堂。”

“什么教堂？”

“好像是一座叫做西山的基督教堂。”

“好像……难道你们连自己举行结婚仪式的教堂的名字都记不住，这座教堂在什么地方？”

“回谷。”B小姐强作镇静回答。

“噢……回谷教堂。”

“你们有没有举行结婚仪式时的照片？”

“有……不过，今天没带来……”B小姐的冷汗冒出来了。她和田村晴男至今连一张合影照片都没有照过。

“没带来……那好吧，请你下次取护照时一起带来吧！”

“下一次……取护照……难道我的护照放在这里？”

“是的，我们要对你们的婚姻状况进行调查，在确认你们的真实情况以后才能把护照还给你。”

“你们同居在一起了吗？”

“……是的。”

“住在什么地方？那地址是否就是这张民票上写着的那个地方呢？”

“是的”

“那可是一幢高级的公寓呀，可是你们的收入呢？你丈夫还是个学生，而你又没有工作单位，你们靠什么来支付那昂贵的房租呢？”

“房子是我爸爸出钱帮我们借的。”田村晴男生气地说道。

“那么你们的日常生活费用呢？那总不会也是你爸爸给你们的吧！”

“现在我每天都在做临时工，每月总能有20万日元的收入。”B小姐解释着。

“临时工？你在那做临时工？”

“田村商社。”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随后我们将根据今天的情况对你们进行调查，在一个月以内我们肯定还要到你们家里去了解情况，最后的审批结果将在两个月以后通知你们。”^①

1995年8月6日香港《亚洲周刊》一篇《思变——嫁给日本人的中国姑娘》的文章讲述了一些中国留学生与日本人结婚的情况。居住东京都丰岛区北冢的中国姑娘张小姐，1995年4月跟一位年近半百的日本男子登记结婚。她深有感触地说：“目前，这是我最好的选择，除此之外，我没有更好的生存方式。”1990年，为了赴日，她像许多中国姑娘一样，变卖了家产，倾尽积蓄，又向亲戚朋友借贷，才凑够了代办人提出的近4万元人民币的费用。为此还停了公职，经过许多周折，终于来到东京。在日语学校完成两年学业之后，她又以每年上百万日元的学费进了一家专门学校。不久，与她同居、在日本

^①吴民民：《东京夜话》，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60—163页。

打“黑”工的男友因交通违章被警察抓住，男友被遣送回国，她的护照、身份证号码也被登记。在日本5年，除了打工交学费，她没有多少积蓄。假如回上海，她的财力和学力都无法给她带来新的转机，她决定无论如何要留在日本，在日本的这几年，她一直在一家小酒店打工，结识了不少日本男人。现在成为她丈夫的这个人就是其中一位。律师佐藤功有不少经办国际婚姻的经验。他说：“在我这里，中国姑娘与日本男人结婚占所有国际婚姻的50%左右。在这些婚姻中，因在酒吧、酒店工作结识了日本男人而结婚的中国姑娘大概占30%。结婚后，双方性格不合的很多，有些女孩子的命运甚至十分悲惨。”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来自中国大连姓宋的姑娘，结识了一位日本料理店里做寿司的小伙子而结婚，但那位日本丈夫粗鲁暴躁，酗酒成性；酒后必定要把小宋揍得鼻青脸肿，而且因为好酒，又喜欢周旋于美女如云的酒店，于是负债累累。小宋不得不外出打工为他还债，却还要经常受丈夫怀疑而备受屈辱。结婚几个月，小宋终于无法忍受，逃离了丈夫。她的丈夫找到佐藤要求解除婚约。

据日本厚生省统计，1989年，中国女性与日本男性结婚的，有3291人；1993年一年中，达到5691人。当然，这些数字中，还包括不是以留学生身份、而是直接从中国被介绍到日本的女青年。

除了上述那几种情况，中国留学生与日本人结婚不是出于定居日本的目的和中国男留学生与日本女性结婚的情况也都有。雪晓通就是这二者都有的一位留学生。

雪晓通毕业于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1986年赴日本，入

东京大学攻读综合文化研究的研究生课程，之后又进修社会学博士学位的课程，学业有成后在日本开设了一家叫和华的公司。在公司的业务往来中，他结识了在夏普公司供职的小林美智子。1989年6月，他昏迷病倒，小林美智子给了他温情的照顾，此后二人结为了夫妻。1990年，雪晓通加入日本太平洋投资株式会社，代表公司对中国投资。在上海，他成了太平洋都市房地产发展（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该公司曾在上海一举投资7亿人民币，建设住宅小区，成为了在上海颇有名气的一家外资房地产公司。该公司还广布棋子，开设子公司，事业越滚越大。

留学生要想凭“日本人配偶”的资格得到延长签证，须经入管局官员仔细审核。至于再以后提出入籍申请，更须受到严格审查，即使条件已全具备，也不一定会很快得到批准，因为很多方面都会被列入审查范围，如是否有过偷漏税现象，是否有过违法行为，甚至是否有过违反交通法规被处罚的经历等等，都有可能影响到入籍的批准。

1989年，日本共批准6089名外国人“归化”入籍，其中有中国人1066名^①。这一数字还包括日本孤儿以及由他们带去的中国亲属等，其余才是以婚姻关系入籍的，其中包括留学生。

以婚姻关系延长居留、入籍的中国留日学生，他们有喜，也有悲，有幸福，也有痛苦。但不管怎样，他们也曾是留日学生中的一个群体。

^①李林林：《日本的外国人政策和法律》，人民法院出版社1993年，第143页。

2. 在日供职的中国留学生

按日本法律规定，外国留学生在日本读完大学或者研究生院，如果有人雇佣，就可能获得在日本的工作签证。中国留学生在学业结束后，有人或因在国内的工作没有落实好，或在日本有更适合自己的工作，于是他们中的有些人就延长签证，在日本工作一段时间，视情况再决定是去还是留。所以，在日本就形成了一个由中国留学生组成的供职群体。

一般地说，供职于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是在学校中被聘作教师，在科研机构中被聘作研究人员，一是被聘入日本人的企业、公司。日本企业、公司雇佣外国人，主要是利用外国人对外国市场和外国消费者的了解以及他们的外语能力，以扩大对外交易。从1983年开始，日本企业雇佣外国留学生的数量在稳步增加，其详情可见下表：

被批准在日本就职留学生统计表^①

年 度	申请数 (人)	批准数 (人)	年 度	申请数 (人)	批准数 (人)
1983	144	110	1987	487	416
1984	214	189	1988	592	522
1985	270	249	1989	949	707
1986	479	403	1990	1199	1004

能够在日本取得供职机会的中国留学生，都是很优秀的留学生。在日本供职，所享受的待遇固然比较好，但那毕竟是为

^①李林林：《日本的外国人政策和法律》，第178页。

别人打工，如果有机会，他们还是会另辟天地，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

王征成就是走过了由供职到创业路的留日学生。他是较早赴日留学的中国人之一，在国立九州工业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去了一家日本著名的汽车公司供职，成了公司试用的第一个中国人技术员。公司给他的研究课题是降低汽车发动机排气黑烟。一年半的时间，他完成了别人须3年才能完成的任务，作为同期进入该公司的600多名新职工中唯一的一名中国人，他被破格提拔为系长。不久，他辞掉令众多日本人羡慕的系长职务，放弃了在汽车公司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去了一家电子公司。

在这家有数千人的电子公司里，他再显才华，仅在半年的试用期里，就把一条赤字生产线扭亏为盈，被提升为生产技术课课长，再后又提升为研究所所长，而他也不负众望，接连推出新的技术成果。第一个成果是世界上最小的半导体三级管，第二个成果是高度自动控制用的神经网络微电脑，第三个成果是解决了集成电路封装时的一个高度技术难题。一个个的成果，使他接连被日本著名新闻媒体采访报道，在国际流体力学会议上演讲。又经一番努力，他还拿到了九州大学的工学博士学位。

他在电子公司供职8年，先后当过研究开发部长、计算机情报部长、新制品制造部长等要职。他的实绩也受到日本社会的重视。居住地的福冈县政府请他当顾问，聘他任县组织的不同行业企业技术交流会的执行主席，又任福冈县系统工程研究会的委员长、九州产学官协力会议的营运委员等职务。

在荣誉和待遇皆来临之际，他毅然辞去电子公司的职业，

率领一批志同道合的中国留日博士生，于1995年7月1日成立了梅地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专门做中日间的技术引进和交流业务。

很多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供职，都是暂时的。供职期间，他们难以摆脱开中国情结，尤其是供职期间遇到不满意事情的时候。一位原是公派自费留学生，后在大阪一所较有名气的大公司做对中国贸易的赵性供职者说：“我感觉每天的生活压得我喘不过气，早出晚归不用说，每月七七八八要付掉一大堆费用。房租这一项是最可怕，玩命挣来的钱被眼巴巴地吞掉一大半，害得我想给家里打个电话，也要等到深更半夜，可以折价啊。说是日本社会富有，可大部分地方我们却无力问津，只能手贴瘪瘪的口袋，两袖清风逛逛街而已。这些都好忍受，最让你不能平衡的是，在许多场合，还要受到一些人的歧视！真是怒火中烧！”另一位自费留学生，后在大阪某机械设备制造小型公司供职者说：“几年前，甚至现在也有人喊着去日本挣大钱，去捞一大把，好像日本黄金满地。我博士毕业出来，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后来还算是我的导师开恩，介绍了这份薪水很薄的工作。其实我内心真想回国与家人团聚，在国内发展。可总觉得脸面放不下来，回去怎么说，要事业没成，要钱没挣到，我老婆也常在电话中骂我。其实，别死爱面子，最终受罪的还是自己。凭我学的专业知识，在国内很容易谋到职。看来不能再顾面子了！我下定决心回中国去开拓。”^①

一些在日供职的留学生，就职一段时间后，他们真的就返

^①夏正会：《选择》，《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年1月11日。

回中国，结束了供职生活。一位叫于建的留学生，1990年3月获东京大学合成化学专业博士学位后，进入三菱汽体化学公司研究所任主任研究员，从事工程塑料高性能化的研究开发工作。供职期间，除发表多篇论文外，还获得25项日本专利，在公司内部发表6份极有价值的研究报告，开发出多项高性能化产品。在日本的事业正处在上升阶段时，他决定回国，在中国驻日使馆教育处推荐下，他于1994年8月回到北京去了清华大学任教。另一位叫孙潭镇的留学生，取得博士学位后，于1989年进入日本一家银行供职，后来又进入一家证券公司。回国后，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研究工作，再后则到国营金鹏国际期货公司任职，做了公司的副总裁。有几个亿资产的公司，有他的一份努力和贡献。

留日学生在日本暂时供职，不仅仅是得到一份优厚的待遇，从长远看，他们在供职期间所获得的知识 and 经验，对于留学生本人，对于中国社会，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3. 在日创建公司的中国留学生

在日本学校、科研机构、企业、公司供职，只是中国留学生学业结束后在日本创业的第一步，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中的有些人就会创建自己的公司，从而提高在日就业档次，争取更大的成功。

留日学生在日本创建公司，一是与日本人合办，一是独办或与志同道合的中国留学生合伙办。

留学生与日本人合办公司，往往选择对中国、对留学生很有感情的日本人。如中山干彦先生，他作为“满洲国开拓团”

成员随父母到过中国东北，中学时代在沈阳度过，大学时就读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他在日本与友人共同创办三广贸易株式会社，在上海、北京等地设立了事务所。多年来，他深深地怀念中国，热爱中国人民，并为北京康复中心捐献医疗设备，为沈阳的母校捐献教学设备。他对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亦十分友好。1995年初，他联合几位日本友人，会同中国留学生，共同创办了中山国际情报株式会社，为留学生及中国提供各种信息，出于对留学生的关心，中山国际情报株式会社还向在日本发行的《中国留学生》报投入了一部分资金。

留日学生们自己所创办的公司，有大有小，业绩不一，其中一些收效不凡者，确也令人侧目。严浩，曾就读东京大学医疗情报（资讯）专业，获博士学位。他先是被一位日本人看中，与几位中国留学生加入了日本人的公司。1991年，他买下公司的股份，自己担任社长，将公司易名为“东京EPS”公司。几年的努力，公司有了很大发展，1996年第二季度，营业额达到了700万日元左右。1989年自费到日本留学的刘石，先入语言学校，后进入东京大学研究所专攻精密机械。学习期间，在东京的一家电脑软件公司打工，后来被该公司正式聘用作职员。1994年9月，他在东京创立了自己的京通公司，4名职员中，两名是日本人，另两名是清华、北大毕业的留日学生。他的公司还于1994年1月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从事电脑软件设计开发。刘石的京通公司，业绩也不凡，1996年前3个月的营业额，即达到了4300万日元。对于经营旅游业的女留学生张希，1996年有一篇文章这样报道她：“设于东京西新

宿的‘悠游世界旅行社’32岁的女社长张希，成就不让须眉。包含张本人在内，悠游世界旅行社只有5名职员，3名是日本人。今年4月份4200万日元营业额中的57%，是由张本人赚得。在这种带头冲锋的社长领导下，职员不拼命都不行。张毕业于南京的专科学校，在中国饭店、贸易公司上过班，1988年赴日本。念完语言学校和专门学校后，1991年开始在东京一家旅行社就职，抱着将来独自创业的目标，张拼命地工作，业绩一直名列公司的前茅。但公司受不景气影响倒闭，张和其中一名日本股东于去年7月成立旅行社兼商社的‘国际悠游’公司；今年再独立成立专做旅游生意的‘悠游世界旅行社’。旅行社职员都是以前倒闭那家公司的同事，基于对张能力的肯定和信任，自动前来投效。悠游世界旅行社目前大半的营业项目为销售日本、中国之间的机票和赴中国旅行的企划案。张充分了解日本观光客重视旅游信息和完整服务更胜于价格便宜的特点，利用过去在中国工作的经验和关系，和中国各地旅行社密切合作，提供给前往中国的日本客人最完整的旅游信息。张将今后事业发展的目标摆在欧美，今年秋天，悠游旅行社将首先对欧洲的华侨推出日本观光的企划案，并且也计划对日本的华侨推出欧美投资考察团的企划。据估计，今年最后一季，该旅行社的营业额可达4亿日元。”^①

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创建自己的公司，应该说是取得了初步成功。这种成功，得益于他们在留学期间建立的人际关系、学到的知识以及在日本社会的体验。同时，他们的成功也与努

^①原载《日本经济新闻》，转引自《海南侨报》1996年9月10日。

力、智慧分不开，这种努力和智慧，既有留学生个人的，也有留学生群体的。这种群体性体现最明显之处，就是中国留学生在为数不少的团体中，还建立了在职人员的专有团体。这种团体，既丰富了留学生团体的内容，又为留学生在日本进一步谋求发展创造了条件。当然，这种团体参加的人员，不仅有创立公司的留学生，另外还有在日本供职的留学生和正在学习的留学生。这种团体有中日产业开发联合会和日本关西地区在职中国留学生联谊会等。

中日产业开发联合会是1994年7月16日在大阪正式宣告成立的。成立之日，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梁宝杰、魏能涛领事，日本国会议员、日中科学技术协力会议代表中马弘毅，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副理事长藤尾昭等应邀出席了大会。会议期间，中日双方各界友人及多家机关、企业和民间团体向大会发来了贺信、贺电。在成立大会上，中日产业开发联合会的首任会长、原大阪地区中国留学生联谊会会长李虎向大会致词，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等来宾的代表也致了贺辞。成立大会结束后，100多名出席大会的中日各界人士就两国间企业开发、合作等话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探讨。中日产业开发联合会最初是1993年12月由在大阪、京都、神户等地区的在职中国人及留学生酝酿的。该会宗旨是通过开展中日企业、团体及个人间的相互交流，加强促进两国产业、经济及技术的合作与发展，为加快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与科技进步，推进日本产业界对中国市场的投资及技术转让而发挥桥梁和媒介作用。联合会主要开展为中日企事业单位、团体及个人提供产业、经济、技术信息和投资环境、市场开发的咨询服务；促

进中日间的产业、经济及技术人才交流；组织实施两国产业、经济、技术的相互考察活动；协助两国企事业、团体在对方国办理各种业务以及举办有关的技术研讨会、报告会和展览会等活动。该会于1994年8月开始在中日两国出版发行了《中日产业开发》会刊。

日本关西地区在职中国留学生联谊会，1995年10月8日在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教育室正式宣布成立。在关西地区就职的80余名原中国留学生出席了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联谊会《章程》，选举了理事、会长、副会长及事务局长。原京都地区中国留学生联谊会会长、在神户钢线工业工作的方苏春出任第一任会长。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总领事刘智刚及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教育处参赞李东翔到会对联谊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倡议成立该会的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教育室的单耀忠说：“一部分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在外国的学校、研究机构、企业、公司等就职。我认为这部分人已经学有所成，其中不乏优秀人才。不将这部分人拥有的知识和才能利用起来为祖国服务，对国家来讲是人才资源的浪费。因此，将他们组织起来，目的是将分散的力量形成合力，使他们成为关心、支持及参与祖国建设的一支力量，并通过各种方式为国服务。”^①

以上主要由在职留学生组成的团体，其目的固然在于形成合力为中日技术交流、为中国建设服务，但它们成立后，也为留日学生在日本就业、发展创造了有益的条件。

^①李彦春：《祖国正当振兴时 学子如何写风流——与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教育室单耀忠领事交谈录》，《人民日报》（海外版）1996年7月24日。

在日本创业的中国留学生，文化层次普遍较高，他们基本都有专门的技术，或有较强的交往能力，因此他们在日本投资受限制很少，并且有机会从日本金融机构获得免担保融资，其发展势头也明显看好，因此日本淑德大学都市社会学副教授田岛淳子预测，今后在日本发迹致富的中国留学生将更多。这一预测，应该是会得到验证的。

4. 转往他国的中国留学生

1991年底，日本OVC专门学校副理事长中田高道先生访问中国期间说，在中国留学生中，也有令人遗憾的事情，近几年他们学校共接收了十几名学习摄影的中国学生，这些学生基本都不能读满两年毕业，读到一年半时便从学校失踪了，学校在日本找不到他们，与中国联系他们也没回国，可能他们是去设法留在日本赚钱了，有一位中国导演的女儿也是这么做的。所以他们现在不得不让中国学生入学时签下保证，保证自己努力读完两年课程并在毕业后马上回国就业^①。

中田高道所说的中国留学生失踪，然后留在日本想法赚钱，这种情况是存在，就是所谓“黑”下来。

1996年5月，东京著名的“红灯区”歌舞伎町有传闻说，一日本男人被中国酒吧女雇人割伤了喉咙。记者历经周折找到了传闻中的酒吧女，她承认确有其事。该酒吧女于3年前以就学签证来日本，学两年日语后回国，不久前又以留学生身份再度来日，就读于一服饰专业学校，课余时间则到酒吧来打

^①逢丽莹：《中田高道谈中国留学生》，《摄影报》1991年11月14日。

工。一日本男子原说与她结婚，实际他已有妻子，并不想与吧女结婚，吧女受骗，还受到那位日本男人散布谣言的污辱，一怒之下，雇人伤了日本男人。吧女说：“那家伙对我太过分了，所以我出10万日元请个人给他点颜色看看。但是，我没有存心杀掉他。”记者见到了吧女所雇的人，那人是4年前取得就学签证从上海来日本的，后来是“黑”了下来，没有签证非法居留，不过他这时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因为他花110万日元买了一份假护照，变成了新加坡人。他表示，谁肯出30万日元，他就会替谁杀人，然后可以逃往新加坡^①。这就是一个“黑”下来的例子。

中国留学生从日本学校“失踪”，有“黑”下来的，有的则是离开日本，去了第三国。

中国留学生从日本转往第三国，有的是通过正常渠道，如留学、定居等，也有的是采取购买假证件等办法，非法前往他国。

日本的中文报纸《留学生新闻》曾对包括来自中国大陆275名就学生在内的311名留日学生，进行了一次综合性调查。其中有一条问到“学校毕业以后是继续升学，还是在日就职，或者去第三国，以及回国就业。”回答期望继续升学的人占44.1%，期望在日就职的人占28.8%，期望回国就业的人占17.7%，期望转去第三国的人占16.1%。

上述回答中，期望继续升学和就职的人数最多，而实际情

^①陈周暖：《红灯区里的罪恶——东京新宿区歌舞伎町采访纪实》，《民主与法制》（画报）1996年10月23日、11月6日。

况是，不仅是留学生在日就职不易，就学生们则更难了，其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因为日本法律明确规定，不允许持就学生签证的人在日正式就业。他们能够升上大学的也不会多。对于他们来说，最实际的就是两年后归国，或是转往第三国。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移民他国的风气早已有之，而1990年前后正盛。大约在1989年底，日本的一家以外国劳工和留学生为主要阅读对象的新闻小报登载了一则广告：

假如你感到返回原居地将遭受政治迫害，而在现居地您又无法可能获得永久居留；假如您期望您的未来生活更具魅力，并期待异国情调能够从此光顾您的情怀，那就请您和本中心一起来绘制您的未来蓝图。

在竭诚为阁下提供咨询服务的同时，本中心的电讯将发往您所向往的美洲、欧洲和大洋洲。和您的心情一样，本中心将竭力促成您的梦想。

1. 移民——投亲、靠友、创业、投资、养老等类别。

2. 劳工——家务、烹调、特技、体育、艺术等技术。

3. 留学——大学、专科、外语、技术、职业等课程。

4. 婚友——品貌端正、忠厚善良的中西方仕女。

以上各类，敬请查询，并请来函具体指明所需要的类别资料。海外者请附上资料邮送费10美金。

本中心真诚地等候着您的决断，一旦实施，第三

国的签证、居留证，即时 OK。

通讯地址——阿根廷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里约内大街第×道××号南美洲友谊服务中心。

联络电话：

美国洛杉矶——×××——××××。

加拿大温哥华——×××——××××。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

澳大利亚堪培拉——×××——××××。

日本东京——×××——××××。

香港——×××——××××。

FAX 传真——（略）

上述广告，实则是为出卖第三国护照而抛出的诱饵，他们的办法是，让留日学生买到外国护照，然后再在日本继续呆下去。1990年5月中旬，日本的一家民间团体，在日本法务省的新入国管理法颁布之前，对卷入移民潮的中国留日就读生作了抽样调查。其中，在询问到他们的移民动机时，大约有65%以上的学生回答说，他们想利用日元升值及日元和人民币的兑换差价，打工挣钱，发一笔财以后再回国。过去，因为是学生，光打工不上课就拿不到日本的延长签证。而现在，在日本的两年期限将满，即使再想去学校学习也不行了。无可奈何之中，干脆就设法移民，想方设法在日本混下去。哪怕就是采取那种买外国护照或者居留证，冒险去第三国后，再以观光旅游的身份重返日本的方式也可以。这份对中国就读生的抽样调

查表明，持那种观点的学生中间，尤以上海人为多。

几年来，中国政府多次重申，购买来的护照不予承认。1990年2月，中国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负责人就一部分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或者境外，通过各种关系，用高价购买外国护照一事，向《人民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这位负责人严肃指出：中国政府对短期出境，在国外买得外国护照，或者通过不法手段，在国内买得外国护照的中国公民，一律不承认他们具有外国国籍，也不承认双重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中关于“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的规定，不适用上述买得外国护照的中国公民。中国政府对上述人员买得的外国护照，一律不予承认，一经发现，将予以没收。并对买卖外国护照，或者持这种外国护照进行偷渡、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将根据中国刑法来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中国留日学生究竟有多少人从日本转往了第三国，这是一个说不清的数字。其人数不论多少，它毕竟也是留日运动中的一种现象，或者说它是留日运动主流之外的一个支流。至于以合法手续，通过正常途径转往第三国，就更是一种正常现象了。

结 语



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 的展望

中国人留日运动的里程，既长又短。

中国人留日运动的道路，曲折起伏。

中国人留日运动的景观，波澜壮阔。

中国人留日运动的成果，举世瞩目。

中国人留日运动的未来，让人遐想。

留日百年的纪念刚刚过去。纪念历史，是为了放眼长远；放眼长远，则须立足现实。瞩目现实，不能不令人有更多的思考。纵览当今世界，国际竞争已是人才的竞争，而留学生日益成为了竞争的焦点；进一步开放的中国渴求人才，归国留学生将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举目环顾，人们会发现这样的现实：

中新社北京七月二十三日电 十七年前，邓小平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派遣的第一批留学生送行时，勉励他们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十七年后，中国新一代留学生中的许多人已学成归来，在各个领域发挥着聪明才智。

由欧美同学会主办的“21世纪中国与新一代留学生”研讨会今天在此间开幕。

研讨会以国家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与海外学人的人才、科技、贸易、教育和文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同时探讨海内外学人如何为祖国经济发展多做贡献，如何为海内外学人为国服务与回国服务创造条件。研讨会设立三个议题：社会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高科技与经济发展、留学生工作的相关政策。

据介绍，到去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近 25 万人，分布在世界 103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已有 8 万多人学成回国。近两年，每年平均有四五千名留学人员回国工作。

欧美同学会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阶平表示，新一代留学生中许多人学成归国，为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富有成效的贡献；目前尚在海外的十多万学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也渴望以各种方式、通过不同途径报效祖国。

他希望在中华即将腾飞世界之际，中国的海外留学生们，为祖国的富强繁荣、为世界的进步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来自英、法、德、美、日等 9 个国家的 80 余位海外学子参加为期三天的研讨。

研讨会开幕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见了参加研讨会的代表^①。

同在 1996 年的这次会议上，华盛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谈了当代中国留学生的特点：

(1) 人数之多史无前例。十七八年间，中国前往世界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累计高达 25 万人，是 1949 年前百余年来全部留学人数总和的近 3 倍，目前已经回国的 8 万

^①赵海燕：《“21 世纪中国与新一代留学生”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载《中国新闻》1996 年 7 月 24 日。

人就已相当于中国近、现代留学人数的总和。

(2) 中国当代留学人员在原先较好的专业基础和知识水准之上，通过海外的系统学习和严格训练后迅速接近或达到了国际上的先进水平。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出国前即已是各自专业中的佼佼者，通过在海外留学，许多人无论在学习还是工作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并开始在各自己的领域里崭露头角。

(3) 留学人员的学科分布发生很大变化。早期学习和进修自然科学者占中国留学人员总数的 80% 以上，改革初期三年多时间里中国全部留学人员中从事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者不到 300 人，而近几年，从事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比率在不断上升。由于人数众多和专业分布广，中国留学人员已成为一个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等几乎所有专业领域的庞大人才群体。

(4) 留学人员所在的许多国家剧烈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使得中国当代留学人员中的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在国内已有一定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者，进一步开拓了视野并增强了理性思考的特点。

(5) 多年来海外中国学者所创立的各种社会团体及相关的社会活动也十分引人注目，成为凝聚海外中国留学人员和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沟通与交流的天然桥梁。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时说，党和人民对广大留学生寄予厚望，希望海外的留学人员关心祖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为祖国的发展和繁荣做出贡献。

江泽民还说，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留学人员，将继续坚持贯

彻“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把有关留学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在留日运动百周年到来之际，中国政府能够将留学活动与跨入 21 世纪连结起来，难以把它说成是巧合，只能是说中国政府对留学活动的重视。

转目再顾，人们又会看到这样一条消息：

中新社东京三月十九日电 据日本文部省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日本政府原定的 2000 年招收外国留学生增至 10 万人的“十万留学生计划”看来难以完成。

调查说，外国留学生的增加于 1990 年曾达高峰，随后开始走“下坡”，据去年五月的统计，总数为 53847 人，第一次出现达不到原计划的局面。文部省官员认为，下降的原因在于留学生的生活因日元升值和经济不景气陷入困难的境地。

“十万留学生计划”在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提议下于 1983 年开始实行。目的在于解决日本国内外国留学生人数稀少的问题，同时有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培养。该计划以至 2000 年达到与法国并驾齐驱的 10 万人数为目标，决定每年增加比率为百分之十四。

文部省透露，去年五月份的调查中，包括大学、短大、大学院、专修学校、高等专门学校在内的留学生仅比上一年增加 0.1%，比原计划的 6349 人减少了

大约 2500 人。计划实行当初出现的比预料进展快得多的现象一去不复返，近 5 年来的增长率连年钝化。

调查显示，在日留学生中，自费留学生约占 84%，日本政府援助接收的留学生占 13.7%，外国政府公派的留学生占 2.2%。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最多，占 44.7%，韩国次之，占 23.5%，台湾占 9.3%，位居第三。来自亚洲的留学生占总数的 91.5%。

调查还显示，73% 的留学生住在民家或简易公寓。因日元升值，留学生收到的国内寄来生活费随之减少，而日本经济不景气又使留学生越来越难以觅得临时工机会^①。

看到这条消息，人们难免会由现实推想至历史。有人作过这样的总结和阐述：

回顾 1896 年至 1937 年的中国留日学生历史，我们发现，留日学生总数大约 11 万人，而在日本各校毕业的只有 1.1 万人。同时，在留日历史上，留日学生会多次决议集体回国。为什么有 90% 的留日学生不能毕业，为什么有那么多次集体回国行动呢？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1905 年 11 月 2 日，日本政府以文部省名义对中

^①《中国新闻》1996 年 3 月 20 日。

国学生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引起中国留学生强烈抗议，留学生会决议集体回国。陈天华就是在这个时候投海自杀的。这次回国人数逾 2000 人。这是中国留日学生第一次采取的大规模回国抗议行动。

1909 年日本提出安奉铁路工程改良问题并谋求大沿线权利，引起留日学生抗议，部分学生归国策动京津间的抑制日货运动。

1911 年武昌起义后，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清室退位，国内局势大变，留学生中的革命派及其他人士大规模回国，据说只有 500 人滞留未归。

1915 年，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机，向中国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大部分留学生以集体回国形式表示抗议。

1916 年，袁世凯帝制失败，因“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日本的国民党人士大举归国，使得留学生人数减为 1914 年的半数左右。

1918 年，日本迫使中国签订中日军事协定，谋中日共同出兵西伯利亚，并借机攫取中国权利，留学生再次以集体回国表示抗议，回国人数超过 2500 人。

1923 年，因关东大地震，部分留学生归国，人数不详。

1926 年 12 月，留日士官生抗议日本士官学校第 18 期对中国学生在教学上的歧视，发表退学宣言，

集体归国。

1928年5月，留学生抗议日军在济南制造的屠杀事件，大规模集体归国，人数不详。

1931年2月，千余名官费、自费生因学费、生活费难筹，纷纷归国。9月，因日军在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留日学生决议全体归国，人数超过2300人。

1932年2月，因日军进攻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660名留日学生集体归国。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全面大举侵华。留日学生全部归国，只留下伪满留学生403人。

以上集体归国事件共13次，从1896年至1937年的42年间，平均3.2年一次。13次集体归国事件中，除一次自然灾害（1923年大地震），一次为留学经费难筹等因素外，其余11次纯为政治性事件引起。在11次因政治事件引起的集体归国中，有两次（1911、1916）纯属国内政治变故引起，其余均与对日交涉有关。而在9次与对日交涉有关的集体归国中，只有两次（1905、1926）是因反对日本文部省或校方对中国留学生的歧视而起，其余7次纯属抗议日本侵略中国的政治事件。其实，1931年初因留学经费难筹导致归国事件，表面上是技术性原因，实质上也是政治性因素在起作用，涉及日本政府对庚款助学的不当处理。这是一次隐性政治事件。如果加上这一次，则有10次与对日交涉有关的政治性归国事件，平均4.2

年发生一次。由上可见，无论 13 次也好，11 次也好，10 次也好，都构成了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留学史上的独特现象。

为什么世界上接受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日本，不能培养中国留日学生对日本国家的亲善感情呢？作为一个问题，日本人在本世纪初叶就提了出来，并作为政治问题提到了国会的议事日程上。国会组织了专门委员会研究中国留学生问题，提出了给予中国学生以某些方便的措施。

问题的症结何在？不在细枝末节，而在大政方针。日本采取的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与其国家秉持的对华根本方针是不合拍的。日本自明治开国以来，进一步说自甲午战争以来，再进一步说从东方会议以来所实行的所谓大陆政策，是有计划地、由缓及骤地推行灭亡中国的国策。又要留日学生亲善日本，又要对这些留学生的祖国实施肆无忌惮地侵略，这真好比鱼与熊掌，岂可得兼耶^①！

一位叫做须之内茂子的日本女士说：“日本的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国际环境，日中两国友好，日中两国受益，亚洲受益，也有益于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留学生到日本留学，促进了日中两国的相互了解，也会促进日本的国际化进程。他们是

^①张海鹏：《留学生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人民日报》（海外版）1996 年 6 月 9 日。

日中友好的使者。注重日中友好，就必须关心支持中国留学生。”^①

1992年，在北京举行的中日关系正常化20周年座谈会上，中国国家教委留学生司副司长李东翔发出呼吁：“中日留学生交流的成果，是两国政府和民间共同努力的结果，应该倍加珍惜。从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大局考虑，中日双方都不应满足现状。要进一步扩大留学生交流与合作，并使其更有实效。我作为从事中日留学生交流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回顾中日留学生交流的历史，展望未来的美好前景，我充满无限的喜悦和信心。我确信十年、二十年之后，通过留学生交流所建筑的‘中日和平友好之桥’，一定会把中日两国人民联结得更紧密，奔驰在‘新干线’上的友好列车会以更高的速度把中日友好推向21世纪。”^②

怎样能使中国留日运动在进入21世纪后道路平坦不曲折，取得更大的发展，也可以听一听中日民间人士的声音。

1996年4月3日，北京，第6次中日民间人士交谈——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齐怀远：“我们真诚地希望中日双方能以更加务实的态度确定今后合作的目标和框架，进一步发展双方在教育、文化、青年等方面的交流。”

日本前厚生大臣、众议院议员、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林义郎：“我想在本次会议上提出下述建议以加强面向21世纪的

^①于谨：《东渡桑梓逢知己》，《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年7月26日。

^②《一衣带水 和睦万邦——纪念中日关系正常化20周年座谈会纪要》，《光明日报》1992年9月5日。

日中友好合作关系，希望日中双方委员加以研究，并努力付诸实现。第一，培养人才。积极开展肩负两国未来的青少年在留学、修学旅行、体育等方面的相互访问和交流……。”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名誉会长黄辛白：“几年来，中日两国留学生交流已达到新的水平。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已有2.4万余人，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亦有0.8万余人。实践证明，留学生交流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还为中日两国的经济、贸易、科技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留学生信息咨询、外语补习、学习和生活环境、提高留学实效等方面，还有待中日双方采取官民并举的方针，共同努力加以完善，以继续推动中日留学生交流事业，使其健康有序地发展。对于日本各地有许多照顾中国留学生生活和学习组织和人士，如本次会议委员、中国留学生朋友会代表小川嘉子女士，我在这里表示谢意。”

日本前文部省事务次官、新国立剧场运营财团理事长木田宏：“关于留学生交流，不言而喻是需要政府妥善安排和支持的。为提高留学成果，有必要进行语言教育，同时安排好生活也是必不可少的。……并希望日中两国政府有关部门就事前进行日语教育通力合作，因为目前尚有不少为学日语而来的‘就学生’，由于疲于生活和学习，而放弃了来日的目的。”

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彭家声：“就学生问题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如不能尽早加以妥善解决，必然影响留学生交流的顺利发展，希望双方共同

研究出有效的改进方法。”^①

回顾历史，正视现实，已似乎应该使人们有所启迪。

中国留日运动走过了百年的里程，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那么中国留日运动今后将会如何发展，似乎更会引起人们的思考与猜测，因为昨天已成为历史，人类更加向往的是明天。中国留日运动的明天，我们不妨作一番展望。

首先，中国留日运动必将继续发展下去。

发展留学运动有利于促进和平运动。和平，是人们美好的愿望与追求，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它已成了人类的最强音。人类经历了几次大规模战争的劫难，更加向往没有硝烟，日本人民不想再看到广岛原子弹那样的震颤，中国人民也不想再听到芦沟桥的炮声，而留学生，恰恰是中日两国人民沟通、理解的使者。

发展留学运动有利于促进经济往来。如今科技发展、经济繁荣的时代，只要轻轻地迈出一步，中国人可以到达日本，日本人可以到达中国。这告诉人们，世界已变得越来越小，经济的发展使国家之间越来越具有依存性、互补性，市场的诱惑超过了其他一切的诱惑，留学运动的发展，无疑会推动中日两国间经济往来的发展。

发展留学运动有利于促进文化交流。留学生是中日交流的媒介，是中日交流的桥梁。没有留学生，就没有昨日中日交流的成果；没有留学生，也不会有明日中日交流的丰富。两国间

^①阿牛：《中日民间人士会议中的留学生交流话题》，载《神州学人》1996年6期，第10页。

的交流，缺少了留学生的作用简直不可想象。

正因为需要留学生，我们才说中国留日运动会奔腾不息地一如既往发展下去。

其次，中国留日运动难免再有波折起伏。

任何事物，从来就没有纯粹直线型的发展，在它前进的过程中，总有制约它的力量存在，总有影响它的因素发生，在中国留日运动的未来发展过程中，下列因素将会永远成为影响的因素。当这些因素从正面影响留日运动时，会促进留日运动的发展；当这些因素从反面影响留日运动时，会阻碍留日运动的发展，甚至会使留日运动在一定阶段内、局部内出现波折，出现起伏。

国际政治的发展影响留日运动。和平是当今世界、也是未来世界政治发展的主题，现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发展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世界政治格局的发展同时也证明了，与和平主流相伴出现的还有非和平的支流，与整体合作同时存在的还有局部的对抗，与长期发展同时存在的还有阶段性的倒退。因此，留学运动将会永远受到国际政治发展的影响。

中日关系的进程影响留日运动。百年留日运动的发展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每当中日关系出现大的波折或倒退，留日运动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可喜的是，自本世纪 70 年代以来，中日关系显然是互相沟通，充分理解，和平进步在起主导作用，并且和平友好也已列入了两国 21 世纪的发展主题。

留学政策的调整影响留学运动。留学政策包括两方面，一是中国的留学政策，二是日本的留学政策。留学政策的每一变化、调整，都会对留学运动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将会发

生在各个方面，比如整体运动的进程、留学人员的多少、留学生受教育的水平、留学时间的长短、留学人员素质结构、留学人员生活水平、留学人员归国等等，而留学政策的局部、阶段性的调整将是不可避免的。

再次，中日两国留学政策趋向稳定成熟。

中日两国留学政策不断趋向稳定。政策稳定，是留学运动发展的基本保障。自 80 年代初“留日热”兴起以来，不论是中国的派出留学生政策，还是日本的接收留学生政策，它们在十多年时间里都保持了一种基本的相对稳定，双方所作的局部、阶段性调整，并没有改变留学政策整体的一致性、延续性。正因如此，中国近代以来的第四次留日高潮才持续未断地发展了十多年。在未来的发展中，留学政策的相对稳定必将会保持下去。

中日两国留学政策不断趋向成熟。向高级、成熟阶段前进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中日两国留学政策发展到今天也已走向成熟，走向与世界接轨，即使是局部的调整，也基本是朝着有利于留学，有利于发展的方向进步，成熟起来的留学政策将会对未来留日运动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中日两国政府日益鼓励留学。吸纳留学生，已成为当今世界上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基本国策，日本同样如此。80 年代以来，日本积极推行接收世界各国留学生的政策，日本教育部门曾宣布要在 21 世纪初使接收的留学生达到 10 万人，要实现这一计划，日本吸纳的留学生人数尚需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的留学生政策不断走向开放，鼓励多渠道留学，支持留学已成为中国政府毋庸置疑的一条基本国策。

最后，中国留日运动定会出现新的发展。

未来的留日运动，既然是整体事物的一部分，那它就会除保留某些整体性的特征之外，再出现一些新特征，即这个时期所独有的特征，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

关于已经出现的特征问题。已经出现的某些特征，如果条件适合，它将会再充分化，再明朗化，以至于更加鲜明地强化下去。80年代以来中国留日运动中已出现了其他各个历史时期所不具备的某些特征，如奖学金多样化，政策允许范围内的打工，结业后被日本公司聘任，身份由留学生变成长期居留等。已经出现的特征，一是发展，二是萎缩、消失，这两种情况将会同时存在、并驾齐驱。

关于可预测的特征问题。可预测的特征，是说依据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参照事物发展的现状，尚可以进行预测的特征。而这种预测，是相对的，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推测，它实际出现与否，尚是未知数。比如留日队伍继续加大，学习科目增多，日方资助广泛，毕业后去向多样化，与日本社会融入更深，留学功能多样性，都可以说成是一种预测。

关于难预测的特征问题。留学运动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影响，可抗力与不可抗力、人与群体、政策与环境、世界与国家，它们都会对留学运动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留学运动中的各个方面，都随时会有难以预测的特征出现。

但是，留日运动将会发展，留学生活将会多姿多彩，留学功能将会丰富，必将成为中国未来留日运动的发展方向。

后 记

近代中国人，是从 1896 年开始留学日本的。迄今，整整一百年了。

一百年的留日历程，令人难以忘怀。

一百年的留日历程，令人感慨万千。

一百年的留日历程，给我们，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话题和反思。

值此中国人留学日本一百周年之际，我们终于去写这部沉重的历史了。

在我们的笔尖触动这部沉重的百年留日史时，有幸获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 1996—1997 年度的出版资助，从而促使本书顺利问世。这里谨向日方致以谢忱。

当本书收笔之时，我们心中的诸多感触和愿望仍难以倾诉。借此机会，我们向一百年来在留日运动中做出各种贡献的一切志士仁人表示深切的思念和祝福。我们深知，历史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本书是历史的结晶，也是心血的结晶。

本书是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副编审赵中男的精心策划下撰写的。多年来，赵先生在教育出版物方面的辛勤探索和成功经验，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全书主要由沈殿成执笔。参加本书有关章节撰写的还有沈殿忠、庞玉珍、李维国、邓玉萍、王连捷、徐凤舞、赵朔、赵

玲、赵喆、张莉、金文学、马莉等人。

我们在研究和撰写工作中，承蒙各界朋友和同事给予大量支持和协助，同时也得到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沈阳市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等部门的热心帮助，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问世之后，我们将在欣慰之余，继续进行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的研究工作。为此，广大读者对本书的批评指正，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我们愿以更新的研究成果，与一切有兴趣关注留日运动的朋友们共勉。

作者

1996年12月于沈阳